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下 册

〔美〕汤 普 逊 著



97593

K13
15: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300—13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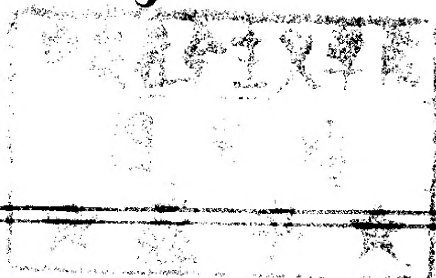
下 册

[美] 汤普逊 著

耿淡如 译



200305918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目 录

第十七章	十字軍时期的意大利(1100—1300年).....	1
第十八章	十字軍时期的法国(1095—1270年).....	50
第十九章	霍亨斯陶芬德意志(1125—1273年) 法兰 德斯和低原国家.....	81
第二十章	日耳曼人向东扩展和殖民	102
第二十一章	斯干的那维亚	131
第二十二章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西班牙(711—1284年)	139
第二十三章	中世紀的商人旅行、市場和市集、香宾市 集、貿易管理.....	161
第二十四章	新寺院团——克伦尼派、息斯脫西安派、普 勒孟斯特派、法兰西斯派、多米尼克派	208
第二十五章	教会和封建社会	261
第二十六章	封建制度和封建階級	324
第二十七章	庄园：中世紀时代的农民状况.....	358
第二十八章	城市的兴起和行会的形成	407
第二十九章	早期中世紀时代的結束	443
参考书目提要	460
附录	譯名对照表	508

地圖目次

德意志和意大利間的商路	7
北意大利的商路	15
中世紀德意志的商路	97 頁前
斯拉夫人地區內的日耳曼人城市平面圖	114
香賓地區市集	194
一所理想寺院的平面圖	239
一所莊園的平面圖	367
公元 1300 年時中世紀歐洲的經濟地圖	459 頁前

第十七章 十字軍时期的意大利 (1100—1300 年)*

意大利在西欧、拜占廷和穆斯林世界之間的中心地位决定了它在十字軍时期占着中世紀商业史上的优先和卓越地位。沿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和巴利逐漸增加了它們和君士坦丁堡、埃及、叙利亚、巴巴利海岸的貿易。阿馬斐、热那亚和比薩同科西嘉、撒地尼亚、巴巴利海岸和南法进行着貿易。正是意大利人，首先組織了在河流上用船舶、在阿尔卑斯山路上用大篷車的运输方法。他們是香宾市集上的主要商人集团；他們也首先改进了商业上的重要营业方法，就是使用汇划票的办法。尽管有通行稅和关稅的阻碍，尽管有沿途的不安全和时常碰到战事的危险，意大利的商业还是非常繁荣的。

在上面一章里，我們已提过：政治統治的不同和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多樣性是中世紀意大利历史上的显著特征。在十字軍东征时期，这些特质还加剧并扩大起来。意大利比往昔更加成为“一个地理名詞”了。所以，叙述意大利的历史时，我們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統一体来讲。相反的，我們必須追叙几个个别地区的历史，尤其是那里的几个城市的历史，因为意大利本质上是有众多城市的和城市国家的地方。意大利的半島形状决定了那些伟大商业共和国：威尼斯、热那亚、比薩的海运性质，也决定了諾曼人意大利和西西里在地中海区同利凡得的广大貿易。意大利內地也先后发展了两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72 頁。

个重要的商业和工业地区,就是,伦巴平原和多斯加納;人口稠密的伦巴城市,尤其是米兰城,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早已表现出来,而多斯加納,后来在十三世紀由于有着两个竞争的城市,佛罗伦薩和塞亚那,也得享盛名。羅馬城从来不曾有过商业上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教会高度发展的財政政策,在十二世紀,它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由此看来,意大利可分成为五个分隔的商业地区:(1)伦巴第,(2)威尼斯以及沿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扎拉和拉古薩城市,(3)利古里亚沿海共和国:热那亚和比薩,(4)下意大利和西西里,(5)多斯加納。当貿易的重要性提高的时候,这些竞争地区之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早在十二世紀,它們之間已时常发生战争。所以,对于各地区的历史,約在 1200 年之前,还可分別叙述;但在此之后,全意大利都已卷入一个政治經濟斗争的漩涡里了。

关于意大利的这些个别的商业地区,应指出一个重要点:即地理环境对它們的影响。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薩由于它們地位的关系,沒有可控制的腹地,所以,是海洋性的,而它們的商业是依靠它們的海权的。下意大利和西西里經營半陆运、半海运的商业,而伦巴第和多斯加納城市,因为在內地,則完全从事于陆运貿易。

在伦巴第和多斯加納,基本人口是手艺人、勤劳而又守法的人民;在他們之上有一个繁荣的中等阶层;他們大多从事于商业,他們的商业公会系統,是一个又牢固又有伸縮性的組織。对外貿易使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薩变为强大,正象从制造工业所获得的財富使米兰和佛罗伦薩能够征服并兼并在它們周围的貴族領地那样。对这两种富源,羅馬城一种也沒有。它的位置是不适合于貿易的;因为沒有市場,它不出产什么可以出售的东西,又由于长期的疏忽,它的沿海区坎帕納的不健全状态,使那里的肥沃土地遂无法利用……因为沒有工业,所以那里沒有什么值得称做一个市民阶层的人口。居民仅仅是烏合之众……他們住得太近圣物,因而对它們沒有多大尊敬的感觉;他們凌辱教皇并敲詐云集在那里神殿的香客們;他們也許是在欧洲沒有运送过新兵。

去参加十字軍队伍的唯一社会。教士、僧侶和一切形形色色的教廷食客，构成了人口中的大部分；而在其余的部分中，很多人在半行乞的状态下，依靠无数的宗教团体来維持生活；这些团体本身也是由于接受贈与或由于掠夺拉丁基督教国家而发财的。那里的貴族家庭众多，既强橫又残暴；他們有一群目无法紀的扈从队伍跟随着，經常地互相进行战斗，或在附近乡村的堡垒中，或在城內的街道上。^①

至于羅馬城商人，只是些店員。全部真正兴旺的工业，仅仅是云石匠、金銀匠和鑲木細工的行业；他們都是依靠教廷来維持生活的。

在十字軍里获益的意大利国家中，威尼斯是最早的，也是最大的国家。上文已說过，早在那个运动发生之前，威尼斯在亚历山大城已享有貿易的垄断权，并在君士坦丁堡已获得一个重要的基地。当波希蒙德在 1105 年象他父亲在 1081 年所想做的那样，企图占領都拉索的时候，威尼斯再一次阻撓了这一計劃，并向拜占廷皇帝索取报酬，要求增加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利益。他們所获得的让与权，非常巨大，所以亚历修的继承人不願繼續履行条約；威尼斯为了报复这一行动，占夺了薩摩斯和开奧斯两島。后来，拜占廷帝国由于害怕諾曼人的侵犯，仍然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接受威尼斯的要求。在援助了皇帝麦紐尔在科孚抵抗諾曼人（1149 年）之后，威尼斯的前景似乎比以前更加燦烂了。它被給予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新的居住区和另一个碼頭；而它的貿易自由权还扩展到克里特島和塞浦路斯島。此后，威尼斯人开始同希腊人互通婚姻，也总是完全局限于他們的居住区内。1172 年，他們和麦紐尔的誤会，使商业停止，但不久威尼斯人又获得了和希腊人平等的地位。单单在 1192 年这一年里，伊撒克·安极乐斯賜給威尼斯四张单独的特权状，而在 1200 年，他的弟兄还以东羅馬帝国全境

^① 布賴斯：《神圣羅馬帝国》。

內的貿易自由權給予威尼斯人。當時，西歐人對帝國竟以保護人自居，而稱之為“小羅馬”。威尼斯殖民帝國，就是這樣地建立起來的。在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商站位於佩拉的郊外，人口很多，以致希臘政府為此常感到焦慮。從伊撒克·安極樂斯的一項條約里，我們可判斷威尼斯人在“小羅馬”各地僑居的人數怎麼多；條約規定：威尼斯人，如遇帝國需要他們的援助，應配備一百只船；每只船應有一百四十個槳夫，總共應有一萬四千人。從這一項規定的數字看來就可想見一個包括婦女、兒童、商人、代理人、手工藝人在內的巨大人口了。在意大利，威廉二世於1175年也以他國家內的自由貿易權賜給威尼斯人，並把他們應付的關稅，減少了一半。

從十字軍初次出現時起，希臘皇帝就害怕它們來到東方，而事件的進展果然証明了：他們的畏懼心理是具有充分理由的。為了盡量利用這項局勢，東方皇帝曾竭力聯絡意大利的商業城市，以期它們成為有用的同盟。1111年時，比薩獲得了那位在黃金角的南岸、對着威尼斯居住區并毗連過港渡口的一個碼頭，那就是今天的加拉達橋所在地。威尼斯的權利擴大了。麥紐爾一世昆尼諾斯(1143—1180年)開始認識到：一個力足以成為有助的同盟的城市也可成為一個危險的敵人，他對在首都里的這些團結的外人團體，有些害怕，因而他要求每個人應舉行封建式的忠誠宣誓，使意大利人對他負有付租、獻金、服軍役等等的義務；而他所要索的又往往是苛重的捐稅。據估計，1180年時，在君士坦丁堡約有六萬個意大利人。然而，那正在和諾曼人作戰的并夢想對意大利重建東方帝國權力的麥紐爾，為了實現他的目的，對意大利人還賜給了更多的讓與權。威尼斯人所得的部分，上文已講過。比薩人在過去一個不知道的時期，曾被逐出城內，現在，在他們的領事向皇帝宣誓效忠的條件下，准予回來了(1171年)。在早些時候，熱那亞在加拉達已有一個居住區，但直到麥紐爾時代，它的市民才被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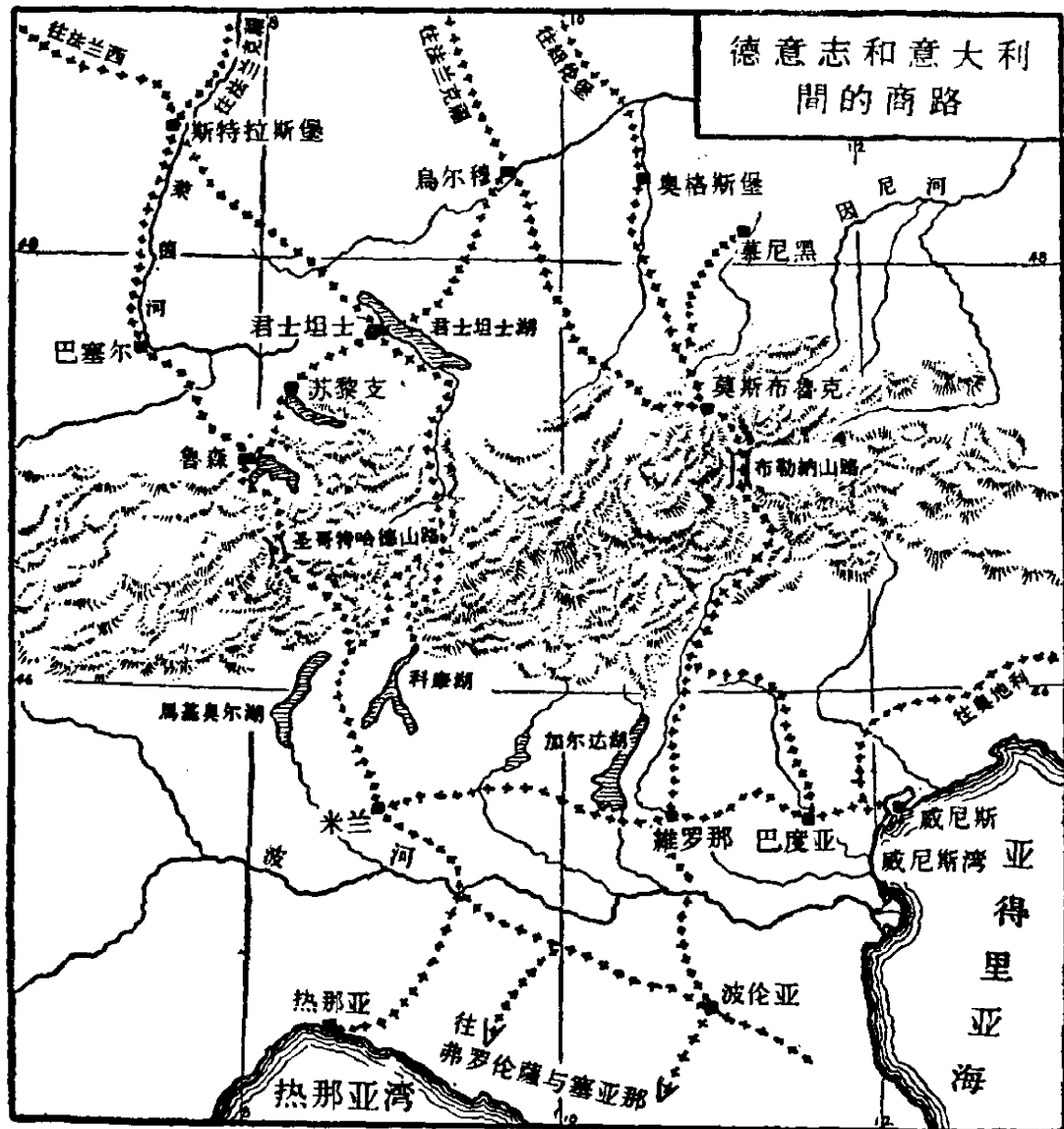
在和比薩人平等的地位上。热那亚人的居住区有着一段困难的历史;它曾被威尼斯人或希腊人破坏过,并約在 1200 年时由于居住区主人的海盜行为被沒收过,但在 1201 年热那亚人的特权得告恢复,那是在第四次十字軍之前給予商业城市的最后一次让与权。在这时期,在加拉达有一块居住区的拉古薩,也可算作一个意大利城市。这些居住区,都是位于黄金角的水濱上。每个居住区不可缺少的部分,是那連接碼頭和船舶的扶梯(*scala*)。有趣的是:今天土耳其人还沿用“*scala*”一詞来指一切船塢和碼頭。

伦巴城市的誕生固然不是由于十字軍运动,但它們却大大地激励了这些城市的发展。它們运输貿易的数额和种类变为这样巨大,以致威尼斯、热那亚、比薩的沿海城市和布罗溫塞尔城市象馬賽那样,都不能完全承担下来。波河的巨流以及它通至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北方支流、那些輻輳于伦巴平原的阿尔卑斯山路、这些山路所提供的到德意志和法国去的捷径——所有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使米兰、巴費亚、格里摩拿以及几乎每个其他北意城市都增加了它們的財富和人口。

伦巴城市兴起的直接因素,是商业的复兴。我們可把格里摩拿的历史作为例証。起初,威尼斯和科馬奇奥的商人来到这个城里經商,后来,当地商人开始把商业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在格里摩拿,主教和附近貴族反对市民阶层势力的日益成长,因而他們和市民阶层之間时常发生冲突,如在 924、970、978、992、998、1031、1048、1058、1066 年。从这种冲突次数的增加,可见那里的貿易日益变为重要,而那里的市民的政治自觉性也逐漸发展起来了。1066 年以后,关于这些冲突,沒有記載。但显然,到了 1114 年,主教和貴族早已放弃这项掙扎,因为在那一年,当皇帝亨利五世給格里摩拿城以城市宪章时,他表示:他似乎是在使一个长久存在的情势变为合法化而已。

米兰，由于它接近大部重要山路的幸运，由于它的市民的努力，占有这项貿易的最大部分。在西端，巴費亚占着第二位，因为巴費亚为热那亚充当了中間商角色。格里摩拿可能占着第三位。在所有的伦巴城市之間，为了貿易的优厚利潤而进行了激烈的竞争。格里摩拿，在1098、1116和1130年，曾进攻格里馬；在1110年，曾进攻布里西亚和托东那；在1120年，曾进攻帕馬。但是米兰的貪欲比起任何其他城市还要大。罗塞耳二世在1136年曾看出：伦巴第是“一个城市公社的战场；各城市之間存在着深刻的仇恨，使它們分成敌对的同盟体系”。十二世紀早期，在伦巴第成立了两个敌对的城市同盟；它們的首領，米兰和巴費亚，互相爭霸。帕馬、摩德拿、格里馬、托东那和布里西亚站在米兰方面；罗地、格里摩拿、皮阿森扎、勒佐、諾瓦拉和阿斯提站在巴費亚方面。1111年，米兰人把罗地城削为平地，逐出了那里的居民，使他們居住于它周围的小村里。巴費亚同盟被迫接受了屈辱的条件，那标志着米兰的商业霸权。于是托东那城重行建造，亚达和提斯諾两河上的桥梁也告恢复；这样，米兰可直达諾瓦拉領土和蒙斐拉侯爵的庄园。

据说，在十一世紀末期，米兰已有三十万人，住在米兰城内和在隶属它的周围村庄地带内。它曾拟訂一项宏伟计划，就是，要集中所有波河流域的商业于自己手里或强制它的竞争者向它納貢。米兰陆上部队在公路上巡邏，拦阻商队，强制他們把商品运到米兰去，不管他們要到哪里去。它的武装船舶在河流上和运河上对格里摩拿及其他城市的船舶进行检查。当这些强制办法不生效力时，它就采用战争了。1127年，在长期围攻之后，它使科摩变成废墟；在这次围攻里，它的很多臣服城市的民兵也参加作战。在这次战争里，米兰还雇佣了比薩造船匠来建造一支湖上舰队。为了自卫起见，北意城市在巴費亚领导之下，組成了同盟；1130年当皇帝罗塞耳二世来到意大利时，它們請求他的支持。然而，皇帝因事远



至南意，然后遄返德意志去；因而没有什么结果。但是，1158年，当米兰第二次破坏罗地时，它发觉自己已做得过火了。当时，罗地乞援于皇帝。

皇帝腓特烈红鬃子的政治和社会哲学，是封建传统和复兴的罗马法的混合物；里面不容什么自由城市制度的，更谈不上这样大胆的城市公社制，象米兰城的那样。在他领兵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后，他一定曾认为：伦巴意大利是一个奇特的景象。弗赖辛·鄂图，皇帝的叔父，也是十二世纪中杰出的历史作家，流传下来一

篇关于这个地区的描写：

几乎整个地区分属于各城市，每个城市强制它的領土上居民服从自己的权力。在一个广大区域内，人們几乎找不到有一个有地位的或重要的人是不承认他城市的政权的……論财富和权力，它們胜过了世界上一切其他城市；它們的统治者〔皇帝〕繼續駐在阿尔卑斯山彼側因而长期不在的情况，也进一步促进了它們的独立地位……它們虽以生活在法律下来自豪，但并不服从法律……在所有的这些城市中，米兰已成为领导者……在意大利王公中，差不多只有阿斯提的主教和蒙斐拉的侯爵威廉（一个高貴的伟人），能够使自己脫离了城市的控制。

按社会經濟的意义来讲，这些城市居民通过从工商业积聚起来的財富的增加，已摆脱农奴状态而成了自由人与市民了。按政治的意义来讲，伦巴城市已成为自由的自治共和国。米兰所实行的原則和腓特烈一世在伦巴第所看到的城市独立的巨大程度，两者都是使他震惊的。“伦卡里亚會議是对由于搗毀市民巢穴而重建了秩序所举行的一次庆祝合唱”。当时，所流行的可怕混乱状态，也同样使得他感到震惊。米兰对平原上的大部城市正在进行战争；威尼斯对拉溫那，維罗那与維晋薩对巴士亚与特累維索，比薩与佛罗伦薩对卢加与塞亚那，也都在战斗。一个德国历史家写道，“残酷的作战派別，使意大利浸沉于血泊、火焰和搶劫的氛围中……城堡、村庄、田野都被破坏无遺。”对于他的說法，如果沒有一个伦巴作家予以証实，我們可能有所怀疑；有位伦巴作家写道：“荒野和狼比农业增加得还要多”。伦巴城市还需要长久的时间和痛苦的教訓来学习这一道理：自由和自治只有通过經驗，才可获得；如果濫用的話，它們就会失掉。

經由西阿尔卑斯山通法国的四条山路，对皮德蒙特和西部伦巴第的关系，正象德意志阿尔卑斯山路对中部与东部伦巴第以及南部德意志的关系一样。现在，我們必須談一談这些山路。它們是：大圣伯尔拿山路（这是唯一向西北的山路，对萊茵河流域和塞

納河盆地都同样有利)、小圣伯尔拿山路、塞尼山路、日内佛尔山路。由于这些山路地势高、嶮峻以及气候的危险性,旅行本来是困难的,而况古代羅馬的建設已被破坏。查理曼传的作者爱因哈德,伤感地論述了跨越阿尔卑斯山路的“困难”。当然,他对这些山路是很熟悉的,因为他有一篇生动的記載留传下来:他描述了把两个东方圣徒的尸体运过阿尔卑斯山到德意志路途上所遭遇的艰苦情况。在中世紀的中期,这四条山路都位在勃艮第王国境内,但当封建分化过程逐步进展的时候,那个“王国”几乎成为一个政治的空壳,而这些山路的控制則落入阿尔卑斯山兩側的各个領主手里。于是,这些山路的西端大部归属薩伏衣公爵所有。

然而,在长时期內,位于意大利那边的这些山路的起点,是在皮德蒙特的公爵手里:例如,伊甫累阿的侯爵控制了大圣伯尔拿山路的意大利方面的入口处;亚俄斯塔的伯爵同样地控制了通往里昂和格勒諾布尔的塞尼山路以及小圣伯尔拿山路;苏薩的領主扼守了通往布罗溫斯和格勒諾布尔两城的日内佛尔山路的入口处。从伦巴第各城市来的商人,都須取道于其中这一条或那一条山路的;巴費亚、阿勒散德里亚和摩德拿,实际上是他們的票据清算所。1027年,当皇帝康拉德二世同英国和丹麦的国王卡紐特大帝,在羅馬城会晤的时候,他們協議暂时合理地豁免了香客与商人在这些山路上的通行稅;伊甫累阿·阿多英曾封鎖意大利那边的山路起点,而这种情况直到皇帝康拉德二世在1032年获得了勃艮第橫跨阿尔卑斯山領土时,才得改善。到了十二世紀,有三条山路和日内佛尔山路的意大利一端,已完全归薩伏衣所有。同薩伏衣公爵分享通行稅收入的,只有某些被照顾的寺院,然而,后者对于往来旅客給予救济,作为还报。亞馬厄斯三世在1124、1125、1137年,对大圣伯尔拿山路上著名的庵堂^①,曾多次贈与,他同时也关心于改

① 阿尔卑斯山中往来旅客寄宿之所。——譯者

进那些塞尼山路上旅客的安适条件。在他的开明統治下，苏薩山峽曾有过繁荣景象。虽然他在薩伏衣的利益，在于征收封建捐稅，但他很聪明，能看到：在皮德蒙特，他贊助公益的事情，是对他自己有好处的。苏薩成了他的一处喜欢的地方，因而是被免除通行稅的。同时，他还保护他在薩伏衣的农业利益并“禁止他的伦巴臣民到他的勃艮第領土上去购买綿羊或羊毛，大概因为畜牧和出产羊毛业是那里的主要实业，因而伦巴中間商人，不准去参加这种貿易。”在阿尔卑斯山路上的通行稅中，塞尼山路上通行稅的收入，最为丰富。公爵精明地豁免了来自意大利的意大利人的通行稅，而在回来时，他們也只繳付半通行稅；这一规定一方面增加了交通運輸，另一方面也鼓励了在阿尔卑斯山南側臣民的貿易。

在皮德蒙特意大利，阿斯提是最重要的城市；它的位置有利于橫跨阿尔卑斯山的貿易的。它的銀公司：沙拉利、巴得利、巴拉尔利和比卡同香宾市集，有着密切联系。它們也处理薩伏衣伯爵們的很多政治业务。巴費亚是热那亚和南德意志之間的中間商。

尽管有战争、虐政和舞弊，伦巴城市的事业进展仍是与日俱增。正是这种强暴状态，象征着在社会經濟上方兴未艾的新欧洲之希望和力量所在。这是为帝王不得不承认的自治市民的一个欧洲，这是自由手工艺者和商人的而非束縛于庄园領主領地上农奴的一个欧洲，这是新經濟状况、新社会結構、新社会观念、新政治形式的一个欧洲。

經過几年的破坏战争之后(战争的过程，这里我們无須詳述)，伦巴城市赢得了胜利。在君士坦士和約里(1183年)，这些农奴和賤农的后裔被承认为帝国的公民，就是市民；他們的城市变为自由、自治的社会；制訂法律、执行司法和課征賦稅之权，掌握在他們手里；自由商人和自由手工艺人的地位也获得承认；那些久已被城市所废止了的旧封建法律，让位給各个城市的近代习惯法，就是，

符合于时代精神的习惯法,而非过时陈腐的封建习惯法;几乎所有从貿易和商业所产生出来的私人动产,也是和不动产处于平等地位上。在伦巴意大利,封建制度只是一个空壳而已;只是一些存留下来的枯萎而古旧的中世紀遺迹而已;象山頂上的頹废古宫一样,它們是靜寂的东西,也是奇怪的东西。

米兰在被腓特烈一世化为灰烬之后,复兴起来,比以前还要伟大。米兰和其他伦巴城市,除了自己所造的商品之外,还直接采购利凡得进口貨,并站在中間商的地位上把这些商品分配給阿尔卑斯山外的地区。伦巴人以木材、生鉄、熟鉄、谷物、羊毛布、咸肉、食盐和玉蜀黍来交換肉桂、胡椒、蕃紅花、生姜、靛青、檀香木、硫黄、絲絨、毛毯、白矾、樟脑、苏木、糖、制香材料、沒药、綢緞、銀鼠皮、染料、金綫錦、香粉、珠宝和首飾品。到了十二世紀末期,阿尔卑斯山路已完全成了通商大道;在春夏两季,路上商人队伍往来不絕。

在 1183 年君士坦士和約簽訂之后,伦巴第的重要經濟发展,是在建筑桥梁和开通运河方面。但是,波河下游不容易以固定桥梁来橫跨两岸的,因而那里只有浮桥。这些新兴的土木工程,对于商业和农业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对商业說,在于使交通便利和運費减低,而对农业說,在于使大面积的土地获得了經常灌溉。在十三世紀中,伦巴第的繁荣景象,既表现在农业生产品、牲口和羊毛方面,也表现在它所經營的貿易方面。

在十二和十三世紀,伦巴第开通运河和建造灌溉系統不是新的事情,而是古代羅馬慣例的复兴。在这些近代运河中,很多名字甚至和原来的羅馬名字,也沒有多大变更。第五世紀后,在物质文明普遍崩潰的状态下,由于堤壩和排水工程的荒废,或由于引水管的毀損,羅馬的坎帕納、彭廷沼地、多斯加納的瀕海区都已变为瘴气瘡疾的地帶了。伦巴第虽然从来沒曾有过象这种传染疾病的地区,可是連伦巴平原的大量土地也逐漸变为沼澤地了。一个意大利

历史家写道,“在这时期,伦巴省的大部分已遍布森林。现在,茂密耕耘的地带,原来是一片积水的低地,或干燥荒地。稻子或桑树的种植,当时还没有知道;而土地上的产物都是充作食料的普通谷物以及为制衣服用的亚麻。”另一历史家也说,“然而,往昔较好时期的某些痕迹,依然留存着。水草地的存在还被提到。它们的产品通常按青草或干草作为普通量度来计算的方法(这个方法还在使用),可远溯于第九世纪的初期。然而,对那使平原有着陆沉危险的洪水的斗争,后来约有二百年之久未曾进行……在1100年以前,但正确的日子还没有知道,那些原来在罗马人时代所建筑起来的古代工程,已经恢复并扩展……1162年,米兰城先由皇帝腓特烈红鬃子的破坏以及它后来约在1176年更大规模的重建,导致这些水利工程的扩充。”^①

罗马法律对河流和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看法,是健全而现实的。可航行的河流,是属于公共性质的。私人权利只适用于两岸和河流中的岛屿;在河流改道的情况下,那遗弃的旧航道认为是属于毗连土地所有人的。但是,封建法已把这一切倒置了,中世纪贵族把他们的私人所有权扩展到可航行河流的水道方面;他们横吊鏈子,或放置木桩来拦阻交通,以便对往来河流上的一切交通运输,征收通行税。换句话说,封建制度把那些作为浮动道路的河流,看作陆路本身一样。但在1183年的君士坦士和约里(第3条),那在意大利从未消逝的罗马法,获得重申,而伦巴城市恢复了所有过去被封建主所僭窃的权利。^②从那个时候起,河流被看作公产了。这些权利归于伦巴平原的城市。至于有关伦巴第道路系统和桥梁

① 布鲁希提:《米兰内河航运计划与工程史》。

② 在伦巴城市,对罗马法进行精深的研究,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拉希达尔说:“在意大利城市的商业和政治社会里,需要实用的知识,需要管理社会生活的科学——需要按最严格意义的文明。而这一需要是以恢复研究久被忽略而尚未完全忘了的古罗马法律来适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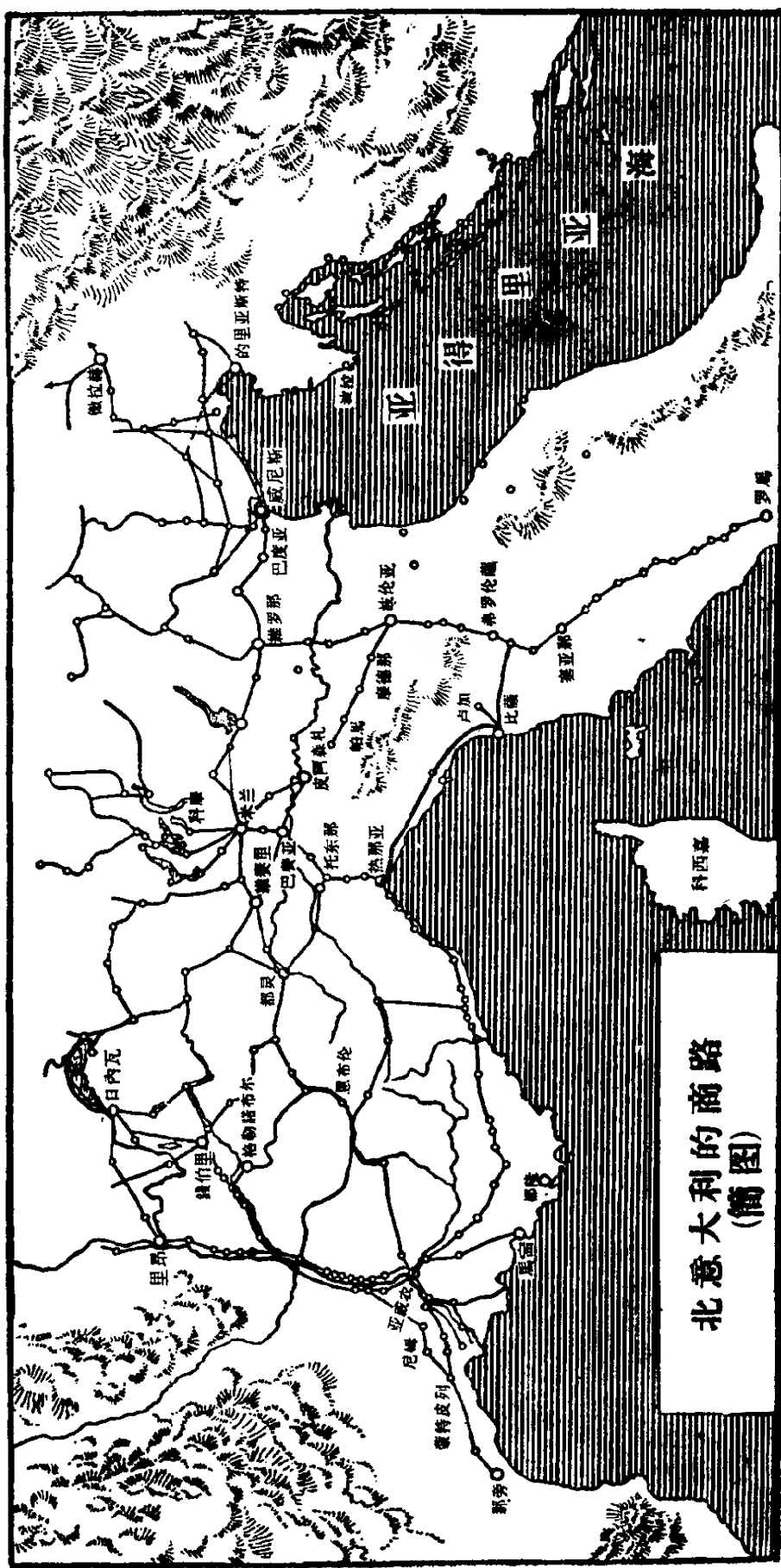
的封建权利,封建主也同样地繳出;这样,城市遂恢复了管理它們的权利。

提斯諾运河的开始日期,是在1177年;孟都亚周围的人造湖的形成是从1188年建造明韶河上的著名工程开始的,而該河发源于加尔达湖。1191年,在巴士亚附近,建造了巴塔格里亚运河,这一命名,是用以紀念战胜皇帝腓特烈紅鬍子的楞雅諾战役(1176年)的。在同一时期,波伦亚以从累諾河建造运河的执照,发給当地一个团体。1257年,“大运河”可以通航到米兰的城垣下,但它的通航是从1177或1179年开始的。(在1272年,它成为可以通航到城内。)1220年,开通了罗基亚·摩薩运河,即亚达河的最重要的人工支流。新亚达运河,象巴塔格里亚运河那样,是用以紀念1239年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失敗的。这条运河通过亚第达河,在喀西諾·斯卡那西奥,使摩薩河和北蓝布罗間取得了銜接。阜姆·波瓦也是伦巴第的最老运河之一,在1298和1308年間,由布里西亚的領主、后任主教的貝拉度·馬基开凿出来的。为了爭夺这些运河的控制权,城市之間往往发生激烈竞争,甚至实际战争。例如,摩德拿和罗基奥之間在1183年曾发动战争,而为了爭取塞歧河水路的控制权,它們爭执了二十年之久。

近代的灌溉系統,是从伦巴城市的这些水利工程里获得了直接起源的;而在伦巴第今天所存在的灌溉系統和十二世紀所开始的,还是一脉相传的。息斯脫西安派僧侶特别是由于提倡灌溉的緣故,而获盛譽。据伦巴历史家兰杜尔福的記載,在圣伯尔拿离开米兰(1135年)后不久,一群僧侶来到了那里,在米兰附近,建造了基阿拉瓦尔寺院,并利用了那些和微塔比亚河連接的灌溉运河,来开垦以前荒蕪的大部分土地。关于中世紀很多大礼拜堂的建筑师的姓名,我們无从知道;同样,关于这批內地巨大建設的工程师的姓名,也沒有記載留下来。

在意大利半島西海岸上，利古里亞灣畔的城市，如熱那亞和比薩，跟着十字軍東征而沖進了東地中海。熱那亞是烏爾班二世在1096年所向呼应的第一个海洋國家。1097年11月，在十字軍圍攻安提阿的時期，由十二只船組成的熱那亞艦隊到达了聖西緬港口。在占領安提阿的戰役里，熱那亞人一定會出過很大部分力量，因為他們得以統治聖西緬港，直到該港歸并給安提阿為止；而且，在安提阿，它的統治者波希蒙德還賜給他們一所商站、聖約翰教堂、三十幢房屋、一處泉源和一所市場。關於耶路撒冷的戰爭，如果沒有熱那亞人曾及時來到扎發，以供應品接濟圍攻兵士，他們也許不能占領耶路撒冷。1101年4月25日，耶路撒冷王鮑爾文同熱那亞人簽訂了一項條約，允許他們在他們幫助下所攻下的每個城市里有一處居留地和三分之一的戰利品。於是，他們對其他沿海城市就開始了進攻。到了同一年底，熱那亞人已立腳在托托薩、阿蘇夫和凱撒利亞；1104年，他們在亞克獲得了一塊居留地，1106年在阿帕米亞，1109年在勞狄栖亞，1110年在貝魯特，也都獲得了一塊居留地；最後1124年他們還在太爾建立了一所商站，因而使威尼斯人憤恨不平。為了保證這些有價值的讓與權的保持，乖巧的熱那亞人把所有賜給他們的商業權利，列成一表，刻在一塊銅牌上，並把它安放在“聖墓”教堂內高祭壇的背後。這項預防辦法，是做得對的，因為在國王阿摩里（1162—1173年）使上述條約毀滅以後，熱那亞就難于獲得其他特權了。

在熱那亞人同耶路撒冷王鮑爾文所簽訂的條約里，曾規定：如值基督徒征服埃及，他們將獲得三分之一的開羅城。然而，由於國王的柔弱，這項出征遲遲未曾進行；所以，熱那亞在1177年單獨地同埃及蘇丹談判了一項條約，從而它獲得了埃及的商業權利和特權。因此威尼斯人壟斷埃及貿易的局面，第一次被沖破；而他們的勁敵也進入埃及。這一年，就是熱那亞和威尼斯之間長期衝突之



开始日期。尽管有威尼斯人的反对，热那亚商船已推进到希腊領水內；显然，在第二次十字軍时期（1147—1149年），热那亚在君士坦丁堡城外一块尚未查明的叫做奥尔康的地方上，已經获得立脚点，因为在1154年我們看到他們扩大了旧特权。但在1170年，热那亚人的商站迁移到加拉达半島上的科拍利奧去，那是在距比薩人居留地不远的地方。

上述的热那亚的发展激怒了现在正在权力高峰的米兰，后者企图垄断北意大利的貿易經營。上文已談过，1130年，米兰因为巴費亚为热那亚充当中間商人把热那亚的东方进口貨轉运到阿尔卑斯山外去，怎样进攻了巴費亚。但在1168年，以米兰为首的伦巴同盟，建造了亚历山大城（这是为尊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这样命名的），来一箭双雕地打击热那亚和巴費亚。該城位在塔那洛河畔的皮德蒙特，即在塔那洛河和波米达河汇合处的上面。这一設防的前哨站，真的是盘踞在热那亚和巴費亚之間的道路；結果使巴費亚的商业城的地位破产，而使热那亚的向北交通路綫也被堵塞住。

可是，这项影响迫使热那亚和南法的貿易关系更加密切起来。虽然在起初几年中，它为此深感混乱，但热那亚最后从伦巴第斗争所造成的形势改变中，可能获得了利益。因为早在十二世紀起初几十年中，我們已可看到有关热那亚商人在下列地点的記載：布罗溫斯、翁提布、佛利犹、馬賽、阿尔茲、貝稷亚、卡卡逊、那旁、帕皮尼安、尼姆、圣齐尔茲、塔拉斯空、蒙特皮列和土魯斯。到了十二世紀末期，热那亚商人再向北推进，远至法国的勃艮第和香宾。他們第一次在香宾市集出现，是在1193年。从那里，只要再前进一步，就可达到法兰德斯了。

在这里，我們可看到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間的显著差別。在威尼斯方面，由于它的地位关系，它摆脱了那震蕩意大利大陆上的內

証。而且,在威尼斯,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政府对全部商业,予以严格而精密的管理。在热那亚,則相反;城市公社是和第一次十字軍同时出現的,政府掌握在时常冲突的大商人家族手里。例如,在1183年,溫提族和卡斯提里族之間发生了內战。薩拉丁在“圣地”的胜利,是对热那亚的一个严重的打击,在第三次十字軍里它才恢复了部分損失。但在1193—1194年間,內战重新发生,終于大家族丧失了政治控制权而它們的商业垄断权也被推翻。于是,叙利亚貿易开放給热那亚人民和那些在“共和国”直接控制下的殖民地;现在,热那亚和威尼斯不同,是一个民主的而非一个貴族的政府了。

在十字軍时代热那亚在和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建立有利貿易的同时,还和西西里进行貿易,和对岸的穆罕默德教非洲沿海岸維持它旧的貿易,尤其是和布吉亚和修达两地的貿易,并大大地扩充了它和南法和西班牙的商业。1147年,热那亚帮助了卡斯提尔国王反对哥尔多华的哈里发,因而被給予半島上貿易特权的报酬,可是,在1262年卡斯提尔国王占領加的斯之前,它从这些特权所得的利益很少。1157年,它从科西嘉、撒地尼亚、巴利阿利群島逐出了最后一批穆斯林人。

在热那亚和比薩之間,存在着尖銳的竞争;这两个邻邦激烈地互相敌对;海上冲突不时发生。从1119到1132年間,和在1195年,在它們之間有着实际战争。在1199年,热那亚和芬替里亚进行过战争。

最有趣而又最重要的,是热那亚对組織商业公司来經營商业企业方面的貢獻,就是,組織真正的商业公司,这种公司是发售股票、分配利潤并分担风险的。每只商船上帶着一个管貨員或代理人来代表投資人的利益。这种公司被称为“海上协会”以区别于那种經營內地城市貿易的类似商行。它是一个真正的股份公司。它

的組織形式，是熱那亞在商業史上的一個重要貢獻；在中世紀后期，它流傳到別處而被採用了；熱那亞人在敘利亞的殖民試驗，對後來歷史上的影響，也不見得比此少些重要性；這項試驗使他們能夠於十三世紀，就是於 1261 年希臘帝國恢復以後，在黑海沿岸建立了一個巨大殖民帝國。

當比薩在東地中海大量擴充它的商業活動範圍的時候，它象熱那亞一樣，還緊握不放它同北非和西班牙沿岸的舊貿易。1113 年，比薩征服了瑪約喀；於是它成為在穆罕默德教非洲港口、在突尼斯和布吉亞建立常設貿易站的第一個意大利城市。1134 年，它的商人和摩洛哥蘇丹，談判了一項通商條約。六年之後，他們在塔巴卡島上還建立了一個珊瑚站。突尼斯總督在 1157 年的一項文獻里，把比薩人說成是“在基督徒中他的最真誠的朋友”^①。明矾是比薩和突尼斯間貿易上的主要目的物，因為它的收斂性，在染色工業上，是很有價值的；它能使紡織品上所染的顏色耐久而不致褪色。

無可避免的是：盧加將被卷入熱那亞和比薩之間的衝突漩渦。因為比薩和盧加之間也有著它們的商業爭執。比薩控制阿諾河口，那是多斯加納內地貨物和由海道運入商品的一個天然吞吐港。比薩對港口上一切進出口貨物，盡量征收捐稅。盧加位於法蘭西琴路上，那是從阿爾卑斯山路延伸到羅馬城的一條進香和通商大路。盧加為了報復比薩，對凡是離開通行大道而要往比薩去的旅客，都課以通行稅。結果，在 1126—1128 年間和 1143—1147 年間，比薩和盧加發生了戰爭；又在 1165—1171 年間的戰爭里，熱那亞幫助了盧加。在這最後一次衝突里，戰爭除了在海上進行外，還蔓延到南法，在那里每個城市都各有所偏袒。那旁站在比薩方面，

① “*veris amicis meis quos pro ceteris mundi Christiani diligo*”。

土魯斯·雷門站在热那亚方面。有一次,圣齐尔兹的大市集,因为战斗在它的中間进行而遭受了破坏。热那亚从这冲突里获得了主要利益,因为这战争驅使利維耶拉河两岸上它的弱小邻邦——薩窩那、諾里、芬替里亚、圣摩里佐和圣勒穆——站到热那亚方面以求保护,从而造成了一个“大热那亚”。我們将在下文看到,另一个受益者是佛罗伦薩;它名义上站在比薩方面来进行灵活的干涉,为的要获得阿諾河口的港口让与权。

现在,我們必須轉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方面,并在那里寻找諾曼人国家的历史綫索。

罗伯特·基斯卡的征服南意大利以及他的兄弟罗哲尔一世的征服西西里曾造成两个分立的諾曼国家。但在 1127 年,可畏的罗伯特·基斯卡的世系中断,而由罗哲尔二世(死于 1154 年)所代表的諾曼族的西西里系把諾曼人的大陆和島屿領土并成为一个王国,或象后来所常称的那样,“两西西里王国”;这一名称是重要的,因为在这联合王国里,西西里是一个較大的成員,而巴勒摩便是它的首都。

在整个地中海世界中,再也沒有一块地方比西西里的地位更有利于貿易的。这一个大島象一只抛錨的战艦停泊在东西地中海之間的窄狭水道上,扼守着每一条通路,向每一只通过的船舶課征通行稅。在南方,埃及和非洲,尤其是开溫,納貢于它;在北方,它几乎在意大利以西全部欧洲海岸上征收捐稅。巴勒摩位在正中点,成了所有經過它的纵横貿易路綫的軸心。巴勒摩的繁盛带动了王国的其他港口的兴旺——阿馬斐、墨西拿、那不勒斯和撒列諾。在上述的各港口內,常常并排地停泊着西自比薩、热那亚、馬賽、那旁、加的斯、修达、布吉亚、米第亚和波那来的船只和东自威尼斯、君士坦丁堡、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港口和亚历山大港来的船只。西西里成了各种不同血統、語言、商品、宗教和文明的总汇。这

里是东方和西方的接触点，这里也是北方和南方的会合处。在它的市場上，西欧人、希腊人、东方基督徒和利凡得犹太人中間混合着阿拉伯人和各种教派不同的穆斯林黑人。在西西里的貨棧里，来自远东的奢侈品，如珍珠和宝石、印度鉄器、稀有染料、香粉、中国絲綢、胡椒和香料、埃及棉織品、波斯和土耳其地毯、紅皮和从阿特拉斯山脉来的彩色云石、从非洲来的象牙、鸵鳥羽毛、獅子皮和豹皮，并排地堆儲着。

西西里国王充分利用了

它所具有的貿易上无比的便利；这些便利是由于它的很多港口和它与大海路連接的位置所产生的……王国南部的商业，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就是說，貿易經營主要不是在象巴利和阿馬斐那样的自己城市手里（这些城市在拜占廷时代曾是很繁荣的，而在諾曼人統治之下，已失掉它們的地方性独立地位），而是在王国以外的商业城市——比薩、热那亚和威尼斯——手里。其中每一个城市的相对重要性，跟着意大利政局的变动而有所不同，但在这中間它們是分享王国的對外貿易的。我們看到：在它的东海岸上有威尼斯人，在撒列諾有热那亚人和比薩人，在主要港口上，他們有特殊的貨棧以及常常有相当大的居留地；热那亚和比薩的最早商业纪录，尤其是一个热那亚公証人，約翰“抄写員”的簿冊，使我們能够找出它們的商人对商人的、港口对港口的营业情况。西西里不仅是作为以出口貨交換外地产品（如北意和法国的布匹和东方的香料）的地点；而且也作为国际貿易的舞台：通过墨西拿海峡的大道，同东方进行貿易，通过巴勒摩与东方南方沿海各港口，同非洲与西班牙进行貿易。从这一切貿易，国王征取了通行稅。罗哲尔和他的后继者，既不放弃他們封建領地进款中或广大专利事业中的任何一項，而又对欣欣向荣的商业，征收了各种港口捐費以及进出口貨物稅，这样，他們从那个西欧的商人阶层取得了他們的現款；这一阶层就是后来西欧君主国家所賴以建立起来的。据說，单从巴勒摩所得的进款，比起英王从全王国所得的还要多。^①

王国内部資源的开发，是和對外貿易的繁盛并駕齐驅的。在墨西拿周围和在喀拉布里亚，出产鉄矿；在厄特納山周围，开采硫

^① 哈斯金斯：《諾曼人在欧洲》，第232頁。

黄;在特拉巴尼煮盐;显出有趣的阿拉伯的影响的巴勒摩陶器,是很出名的;它的金銀制品是精致的艺术品,在制造玻璃方面,巴勒摩的手艺人在技术上优越于西欧任何工人,連威尼斯人也不例外。总之,諾曼西西里的文明,無論物质的或精神的,都是地中海世界各种文化的混合物。所有这灿烂文化,好久以前已經消逝,现在只有一种关于它过去宏伟美丽的紀念物流传下来,就是它的建筑物。蒙利尔教堂,是在諾曼西西里文明中所有最伟大而又最好的东西的結晶。

伟大伯爵罗哲尔二世,是在西方基督教国家中的一个拒絕被卷入十字軍热狂里的国君。他和穆罕默德教,没有什么冲突。不仅如此,他非但容忍它,而且还羡慕并模仿了发源于伊斯兰文明的很多东西。他很幸运,得从十字軍所产生的商业复兴里取得漁人之利,但迟迟不参加它們的无意識行动。这本来是他父亲的賢明政策,而他对这政策确是信守不渝的。当耶路撒冷王鲍尔文在1100年因占領了耶路撒冷而感到兴高采烈的时候,他还梦想基督徒征服开溫,以图分裂东方和西方的穆罕默德教的势力,而他茫然不知道东方和西方伊斯兰教徒本来是死敌;在那个时候,这个又精明又现实的罗哲尔,写給国王的一封信里說:

如果其他的法兰克人会来到这里,我就得供給他們以軍隊和渡海用的船只。又如果他們征服那地方并留居在那里,他們会把西西里人所經營的生活必需品的貿易夺去;而我就会失掉从他們那里得到的谷物貿易的收入。又万一他們的冒险事业失败了,他們一定会回到这里。于是,我所可期待的,必然是敌对的反击,而我們与非洲之間的貿易和友誼关系将化为烏有了。

如果情势順利的話,罗哲尔期望扩展自己的統治到非洲大陆上去;但他很謹慎,不願以什么不容忍宗教的战争来触怒那里的穆罕默德教徒。事情的发展証明了他的智慧和他的耐心是正确的。因为当沿海城市因反叛开溫的苏丹而乞援于諾曼国王时,罗哲尔

二世竟沒有經過一次战役而合并了从波那到的黎波里一带的全部非洲海岸,在那里,他的公平而又仁厚的統治使本地居民很快地归順新政府。一个阿拉伯历史家談到他时說:“他复兴了扎威拉和瑪第亚两个城市,他貸給商人以資本,救济穷人,以司法行政委托給民众所欢迎的法官,并安排好这两个城市的行政制度”。

諾曼国王对于諾曼人在叙利亚和“圣地”的扩张势力,是冷淡的,但对于非洲,在有利的情况下,他是乐于兼并它的。但是,罗哲尔二世野心的最終目标,是要征服拜占廷帝国,这一梦想,是他从罗伯特·基斯卡和从他以前的波希蒙德所承袭而来的。如果这一計劃能够成功的话,西西里可控制东西地中海的全部貿易,可迫使威尼斯納貢,而且从黄金角上,可同时对欧亚两洲发号施令了。另一方面,正是这项恐惧心理,使得君士坦丁堡賜給威尼斯和比薩以大量貿易特权,使得热那亚和威尼斯甚至消除了它們之間的仇怨,使得德意志皇帝罗塞耳和第一位霍亨斯陶芬的皇帝对諾曼·西西里势力的增加有所担心。1147年,罗哲尔二世趁着第二次十字軍的机会,动手了,但他不是直接进攻君士坦丁堡,而是进攻拜占廷帝国中两个最重要的工业城市:科林斯和底比斯。从科林斯所得的大量战利品,够支付这次出征的經費,而从底比斯,即拜占廷絲織业的中心,这位伟大伯爵带回了二千以上的手艺人,其中很多是犹太人,并把他們定居在巴勒摩城的一个永久居留地上。这是一項杰作。因为在这以后,西欧在絲綢方面不复依靠拜占廷了;后者自从查士丁尼时代——第六世紀——以来,能够严密地保持着这项有利工业的垄断权。在下一世紀里,蚕蛾和桑树的种植从西西里传入意大利和布罗溫斯的大陆城市。那个住在罗哲尔宫廷里的阿拉伯历史家和传记家爱德立塞,关于他說得很好:“他睡觉时所做的事情,比起別的人醒着时所做的,还要多”。在十二世紀上半期,沒有一个君主,在才干和精力方面,能够比得上他的,連亨

利·金雀花或腓特烈紅鬍子也望尘莫及。

罗哲尔二世在司法和行政方面，也和他在这战争和外交方面同样出色。毫无疑问，諾曼西西里君主国，在基督教欧洲，是最有理智、又最有效能的一个国家。它在财政行政和征税制度方面，特别卓越。它的财富超过了一切国家。在它各种不同的社会组成分子中，它的政府的整个体系恰好足以建立他们之间的团结和满意的统一；这些分子包括諾曼意大利人、拜占廷希腊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就是，四种不同信仰和四种不同文化的民族。“伯爵所面临的一个事实是：西西里是一个不同种族、不同文明和不同语言的汇合处。由于这个事实，他建立了一种政府体系，把政权建筑在各种分子的宗教容忍和自由杂处的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分子，是不能用武力来强制联合起来的。”绝对的宗教容忍，盛行一时。犹太教教堂和穆罕默德教寺院，希腊基督教会和拉丁基督教会，在巴勒摩及王国的其他各城市里，同时存在着。穆斯林人保存着自己的法律，有着自己的法官；对希腊人和犹太人，也给予很大程度的宽容。各个民族享有着完全的贸易自由。一切人们同样须缴纳人头税，没有什么种族或宗教的歧视。这是一切人们的平等权利的象征。

凡是封建世界所熟知的社会阶级——僧侣、贵族、市民和农奴——在西西里都保持下来；这些阶级的混居杂处，使王室经常能够利用一个阶级来抗衡另一个阶级；所以，僧侣或贵族阶级在王国内都是从来没有获得过优势，或者迫使人們有所害怕的。政府虽然在形式上是封建的，但在精神上却是非封建的。国王的大臣是俗人，而不是教士，象在中世纪欧洲的别处那样。在宫廷内，经常使用着希腊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虽然“整个说来，那异于地方习惯法和政治组织的王国法律体系，基本上是諾曼人的，而罗马的、伦巴的和教会的法理学的影响在性质上总是次要的”。那从市民阶层选拔出来的并经过高度训练的一个官僚集团和一个贵族阶层的

有势力的行政团体相对抗，因而遏阻住封建主的囂張跋扈。陸軍和海軍人員，是从諾曼人、希臘人和薩拉森人中招募来的。罗哲尔二世的一个海軍大將(英文“海軍大將”[admiral]這一個詞，是起源于阿拉伯文的)，是敘利亞希臘人，另一個，是阿拉伯人。

然而关于这两位罗哲尔的行政天才，再也沒有有什么比他們在賦稅与財政制度方面，表现得更为显著；那就是把拜占廷和阿拉伯的先例和习惯巧妙地加以吸收並和諾曼人慣例結合起来。阿拉伯人所建立的土地分配制和土地丈量制，都被保留下来而成了課稅的基础。“这类紀錄，象紀錄本身明白地告訴我們的那樣，是以那些保藏在國庫內的土地簿冊为根据的。这些簿冊，和國庫本身一样，是从阿拉伯人得来的遺產；其中至少一部分，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國庫(即“doana”)的官职，象“doana”这个詞一样，也是用阿拉伯文写的。”这些土地簿冊，是一个有价值的而大部分尚未經探查的財政和統計資料的泉源。对伟大伯爵來說，关于取得完备而又正确的統計資料，是一項迫切的需要。所以，在他占領那不勒斯以后，他所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关于測量全城，以求确定它的面积范围和它的人口数量。

諾曼西西里政府的財政部，無疑的，在欧洲同类的行政部門中，是最有效能而又是最进步的組織。这行政部門的两个最高級官員，是英國人——塞尔比·罗伯特和托馬斯·布朗——后者后来任职于英王亨利二世的財政部內。在諾曼文献里，奇怪的，他們的名字是用希臘文和阿拉伯文写的。在十二世紀后半期，英國的財政和賦稅行政制度和同一世紀前半期的諾曼西西里的制度之間，存在着很多类似的地方。而且，英王和法王的政策，在某些方面，是从西西里得来的。当法国腓力·奧古斯都 1180 年登极时，有一个大臣劝告他應該学习諾曼西西里的政府制度。至于西西里和英國与諾曼底間的商业关系，我們所可得的証据很少。可是，象

哈斯金斯所指出的那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我們听到在撒列諾有一个伦敦商人；在柏刻特墓市集上有一个布林的西商人；在阿味薩地区內，至少直到1135年时，卢昂的货币还在通用。”

罗哲尔二世的求知兴趣，对經济社会史，也具有影响的。他酷爱历史和地理；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他把当代最著名的阿拉伯地理家爱德立塞召唤到他的朝廷上来。爱德立塞用了十五年的工夫于研究工作；直到伟大伯爵逝世之前六周(1154年)，才完成了一本著作(用阿拉伯文写的)。

这一本书，叫做《罗哲尔的著作，或爱好周游世界的人們的快览》，是根据十二个地理学家的旧著作写成的，包括古典的和穆斯林人的著作。但是，他不滿足于仅仅依靠文字作品的編纂，为了达到更正确的目的，罗哲尔邀請了香客、旅行家和各国商人集合在他面前来討論和审核他对他們的报告，詳加揀选并核对。当罗哲尔发問时，爱德立塞执笔纪录。他仔細地比較了尺度和距离之后，制成了一只銀盘，上面刻划着所有已知世界的海洋、島屿、大陆、平原、河流、山脉、城市、道路和海港。这幅地图还附有释文和各种关于产品、风俗、种族、宗教、物质与精神特点的表格以及关于一切气候的表格。这一只繪上地图的銀盘，已經破碎，而这“地理书”还保留在阿拉伯学者的藏书室里。可是，这是关于实际探险和有系統的統計的一篇最早的論文，里面，諾曼人和阿拉伯人的天才各貢獻了一部分。^①

关于諾曼西西里王国对經济史的影响这一討論，再說几句话，就可結束了。上面关于十字軍一章里已經讲过，海洋和商业法，即国际公法的开端，是从地中海世界在十字軍时期的冲突和融合里产生出来的。对于这项混合法典，有一个在諾曼人統治下的下意大利的城市曾作出重要的貢獻。这就是亚浦利亚的特拉尼城，位于海岸上巴利城的上面。該城的商业繁荣在十字軍时期大大地增长起来，因为它的港口便于船只的进出和貨物的装卸。在这一方

^① 昔蒙：《意大利(巴勒摩)杂記》。

面,它堪与布林的西和巴利两港口相媲美。这里,寺院騎士团在早期已为香客們建造好一所医院;这里,比薩、热那亚和佛罗伦薩有着它們的商店和銀行;这里,威尼斯維持着一个常駐領事;阿馬斐人有着一个特殊居留地;这里,圣尼古拉每年一度的市集吸引着成千上万人。由于所有上述的商业关系,特拉尼的海洋法,在地中海地区获得了承认,因而它有助于从希腊、阿拉伯、意大利、布罗溫斯和卡特伦起源的法律的汇集,而这些法律的总汇成为十三世紀中所可看到的成文的国际法规。关于这特拉尼法典的形成日期,迄无定論。过去,有人认为这个日期是在 1063 年,但这一年代似乎也太早些;现在,学者們把这法典的形成日期放到 1183 年。法典的拉丁文原本已經失传;所保留下来的,只是意大利文的譯本,也許于 1363 年,在那不勒斯安吉文朝时代譯出的。

热那亚、比薩和威尼斯,对西西里都抱着又害怕又妒忌的心理。对于所有这三个国家來說,政治、貿易和宗教,是互相交錯而分不开的。1135 年,当教廷发生分裂而西西里·罗哲尔二世支持反教皇派的时候,比薩就抓着这一借口,劫掠了阿馬斐。次年,当教皇英諾森二世贏得胜利的时候,他着手組織同盟来破坏諾曼政权,并邀請了热那亚、比薩和威尼斯参加。热那亚不願参加有比薩和威尼斯参与的任何組織,而罗哲尔对威尼斯人給予西西里的商业利益来使他們脱离同盟;这些利益,还在 1175 年予以重申。这样一来,同盟破裂;它的成員遂一无所得。

在本世紀的后期,意大利局势跟着腓特烈一世紅鬚子的参加意大利事件而变为更加严重起来。腓特烈雄心勃勃,不滿足于破坏伦巴城市的計劃,他还梦想扩展帝国权力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去。为了这項目的,1162 年在征服米兰以后,他竟然同君士坦丁堡皇帝麦紐尔·昆尼諾斯簽訂了同盟条約,允許希腊人占領安科納和巴利来割断威尼斯从諾曼人方面取得接济的路綫(这一政策,

对麦紐尔來說, 不勝歡迎之至, 因为他正在憤恨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的高压手段); 腓特烈还慷慨地約許比薩占有从維奇亞城到热那亞边境的几乎全部海岸以及在下列地点的貿易自由: 西西里、喀拉布里亞、亞浦利亞、那不勒斯的一半地区、撒列諾、墨西拿、巴勒摩、加厄大的全部地区、馬薩拉和伊拉伯尼。同时, 腓特烈还以类似的允諾来引誘热那亞: 約許它可占有叙拉古, 西西里島中央的二百五十个封邑, “并在每个城市里一条街道和一个商站, 得完全豁免捐稅。布罗溫斯商人将被禁止进入西西里和喀拉布里亞; 威尼斯人亦然……最后, 承认了热那亞人对从摩納哥到維涅尔港一带的沿海岸統治权”。

即使腓特烈一世真的会有力量来完成西西里的征服, 对于热那亞和比薩的易受欺騙, 就是, 它們竟然认真地相信这些允諾的誠意, 我們也难于忍得住好笑。这些利古里亞城市, 如果不被貪婪心理所蒙蔽的話, 不應該如此糊涂。因为腓特烈一世在要求撒地尼亞和科西嘉作为帝国封邑这一点上, 已够使它們发生惶恐; 在这两島上, 比薩和热那亞好多年来已經从事开发工作。从这些夸张的允諾里, 原是得不到什么結果的。腓特烈一世被召回阿尔卑斯山外去了; 同时, 热那亞和比薩在君士坦丁堡的居留地也开始了战斗。

到了十二世紀后半期, 意大利三个强大海洋共和国的政策已清楚地确定了: 比薩是属于强烈的帝国派或基伯林派^①; 热那亞和威尼斯是属于反帝国而亲教皇派, 即卫尔夫派^②。可是, 局势并不是这样簡單的。因为热那亞和威尼斯虽然都反对皇帝, 但相互之間, 仇恨很深; 这一情况促使比薩和威尼斯逐漸接近而締結了同盟, 尽管其中一个国家和皇帝友好而另一个国家和皇帝敌对的。最

① 中世紀意大利的反对教皇而拥护皇帝派。——譯者

② 拥护教皇而反对皇帝派。——譯者

后，热那亚向諾曼人献媚求宠而威尼斯对諾曼人的嫉妒也不少于对拜占廷人的嫉妒。在腓特烈一世逝世(1190年)和他的儿子亨利六世登极之后，政治和商业的局势迅即走上了高峰。亨利由于获得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王国而终于实现了霍亨斯陶芬的梦想。他坐在罗伯特·基斯卡所建立的王朝的宝座上，因而复活了基斯卡的计划——那个基斯卡曾两次企图攻占君士坦丁堡，合并巴尔干、希腊、亚得里亚海諸島屿、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和商业帝国，但两次都告失败。比薩由于希望而傲然自得，热那亚则垂头丧气而有忧虑；至于威尼斯，它瞻念前途，极为愤慨。1197年，皇帝在横越大陆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的时候，突然死去。于是霍亨斯陶芬那个宏伟计划就烟消云散般地消逝——这一计划是要统治从波罗的海到西西里全部中欧，合并神圣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为一个“超帝国”，使地中海和黑海成为日耳曼-諾曼人的内湖。这样一来，威尼斯得成为未来的主人翁。关于那一段历史，在叙述第四次十字军过程里，已经谈过。

罗哲尔二世所努力建立起来的西西里灿烂文化，在他的孙儿腓特烈二世时代(死于1250年)继续存在，甚至更加灿烂。巴勒摩成为欧洲最有文化而又最多样化的首都。

腓特烈二世的宫廷不能认为是一个孤立的或单纯的个人现象。它站在中世纪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之间，所以，我们必须从諾曼西西里的世界性背景里予以观察；它是希腊、阿拉伯和拉丁文化的汇合点，在历史上果然站在中间地位，而在地中海区的地理上也是如此……在腓特烈二世的宫廷上，希腊因素的意义是很小的。他的法律的希腊文译本曾印行过，而意大利诗人也以希腊文的诗歌来赞扬他；但拜占廷的影响跟着希腊帝国的衰落而下降；在这时期，我们很少听到在南意有希腊学者或希腊文译本出现。另一方面，在腓特烈时代，尤其是在他访问东方之后，阿拉伯的影响，如果有不同之处，只是变为更强，而这项影响，由于和穆罕默德教国家的政治和商业关系，得以持续；他的帝国利益也促进了和北意、德意志和布罗温斯的交往……他所领

导的十字軍导致和埃及苏丹发生了政治和商业关系;这一关系在他的整个时代繼續維持;同时,在和突尼斯統治者签订1231年通商条約之后,即在突尼斯建立了一所西西里領事館。^①

但是,皇帝和教皇之間所进行的长久而又可怕的战争,使全意大利和西西里陷入了毁灭的紛乱里。正在这个时期,有一个法兰西斯派教士,法拉·薩冷本,漫游意大利好多地方;他描繪了一幅可怕图景:

在帕馬、勒佐、摩德拿和格里摩拿的附近地方,人們既不能耕耘撒种,又不能收获,既不能翻耕葡萄园又不能收集葡萄,更不能住在村庄里。然而,在紧靠城垣的地方,人們在城市民兵保卫之下耕种田地;这些民兵按照城門的数目,一区一区地集合起来。武装兵士整日这样地保卫农民进行农作;由于流氓、土匪和盜賊的无限度增加,这样的做法,是属必要的。因为他們常把人們綁架到他們的盜窠里去,要求支付贖款;他們还赶走老牛去吃掉或出售。

下面列举令人痛心的惨事:

于是,大地上各种各样的灾禍倍增;野兽和野禽:野鷄、鷓鴣、鸕鶿、野兔、牡鹿、小鹿、水牛、野猪和貪食的狼,无限度地增多。因为它们不能按照它們的习惯,在村庄里找到牲畜来吞噬;既无綿羊又无羔羊,因为村庄已被烧光。所以,狼結成了大队,由于极度飢餓的痛苦,繞着城市,凄厉地咆哮着;它們夜里爬入城內,吞噬睡在回廊下或馬車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們……当我住在羅馬納省的时候,全省都蒙受着这种战争的禍害。^②

在腓特烈二世失敗以后,那曾盛极一时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轉移到一个法国亲王,安如·查理手里(1268年)。安如·查理野心勃勃,企图征服君士坦丁堡,来在巴尔干半島上为了自己的利益重建那个傾复了的拉丁帝国;虽然他的这一計劃沒有成功,但他在爱奥尼亚和爱琴海島嶼中,获得了一个立脚点。在突尼斯,尽管他兄弟所领导的十字軍在那里遭受了惨敗,他还能談判了一項

① 哈斯金斯:《中世紀科学的研究》,第244,258頁。

② 引自庫尔頓:《从圣法兰西斯到但丁》。

有利的通商條約；他的代理人还在多瑙河区边境上、在韃靼^①、乔吉亚忙于活动。由于他的努力和王国有利的位置，那不勒斯还能維持东西方貿易大都会的地位。

与此同时，安吉文王朝在意大利获得了一个卓越的地位。它成为教会党和卫尔夫派的首領，所以南意大利得摆脱那由霍亨斯陶芬朝政策所强加于半島上其他部分的隔离与敌对的状态。安吉文朝諸王的对内政策和他們的对外政策同样地切合实际。他們急切需要增加王国的資源和建立一个有效能的征稅机构。他們的財政利益决定了他們对农业、工业、商业的政策，也驅使他們建立专卖事业、海上企业以及那些他們所沉迷的广泛投机冒险事业。可是这后几項的活动証明是失敗的，甚至是損失重大的；它們驅使政府征收重稅，操纵貨幣以及改变度量衡。象这一类的禍害，不能因为道路上的和平安全、盜匪的肃清、港口工程和桥梁的建筑而获得弥补。王国的又长又弯曲的海岸以及許多港口，促进了沿海貿易和海上商业；因而定期航运往来于南意大利和埃及、叙利亚、小亚細亚、君士坦丁堡、南法、西班牙、突尼斯、波那、布吉亚、扎拉、拉古薩、法馬古斯塔、亚克、亚历山大港、罗得島之間。他林敦、巴利、特拉尼的市集，也是出名的。

欧洲几乎每一个商业民族，除了德意志人和英国人外，都有代表駐在那不勒斯王国的各港口上。其中有的占着一个卓越的地位，象外来人中的布罗溫斯人和卡塔伦人；象意大利人中的塞亚那人、卢启塞人、比薩人、佛罗伦薩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而以威尼斯人最重要。佛罗伦薩人享有財政上的优势，尤其是巴尔第、佩魯齐和阿細乔利三大銀行。那不勒斯王国，在 1282 年虽然惨遭西西里失于阿拉貢的不幸，但还能苟延残喘，可是到了 1345 年，当巴尔

① 指一个无限定的地区，包括亚洲和东欧。——譯者

第銀行以及几乎所有其他佛罗伦薩銀行，因英国撤消了爱德华三世在 1337 年为和法国进行战争所借的大借款而陷于破产时，那不勒斯王国也和它們一起崩潰了。

威尼斯，在 1261 年后，由于努力不懈，在爱琴海和黑海貿易上所受的損失，获得了补偿；尽管热那亚竭力損害它，威尼斯还是繼續繁盛。但它的利古里亚海岸同盟，即热那亚的競爭者比薩所处的境地，沒有这样的幸运。在 1242 年，又在 1251 年，比薩和热那亚之間，发生了战争。在 1261 年后，威尼斯因为太忙于捍卫自己的商业以防止热那亚的侵犯，无暇再来保护它的同盟国比薩了。如上文所述，热那亚因接近布罗溫斯，已在罗尼河流域并和香宾市集，发展了重要的商业关系。所以，1268 年，当安如和布罗溫斯亲王查理，即法国路易九世的弟兄，接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的时候，热那亚人在他的港口內，得到宽厚的待遇。因此比薩以支持阿拉貢人对西西里的野心来进行反击。

地中海国家所制造的几乎所有的阴谋綫索，终于引起“西西里晚祷”事件^①的爆发(1282 年)，那是堪与 1204 年和 1261 年事件相比拟的另一次革命事件。1268 年，当野心家安如·查理征服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的时候，他梦想要做他的前任者霍亨斯陶芬皇帝亨利六世在过去諾曼王位上时所曾想做的事情，就是，征服拜占廷帝国。当然，那个失败的皇帝鮑尔文二世和所有的被逐出的法国貴族都是归向查理的。在威尼斯看来，这项計劃的前途，对它的危险性，和过去的同一計劃是相同的。因为威尼斯不可能容忍亚得里亚海入口海峡之两侧受着同一国王的統治。但甚至在它的恐惧中，威尼斯还巧妙地利用了皇帝比它更大的惊惶来恢复它在

① 西西里人因反对法国封建主的掠夺，于 1282 年耶穌复活节星期一晚祷时间在巴勒摩发动起义，杀死了所有在西西里的法人。因为起义者以晚祷的钟声为信号，所以在历史上叫做“西西里晚祷”事件。——譯者

爱琴海上的若干旧貿易特权，因而再建立了一个商站于薩罗尼卡。这是 1277 年的事。但拜占廷皇帝迈克尔八世不願冒险。当他认为：由安如·查理的弟兄路易九世所代表的法国权力，有可能起来反对他的时候，他完全不相信威尼斯有所作为。所以，他默許阿拉貢的彼得三世即安如·查理的死敌的阴谋，来为自己另作未雨綢繆之計。“西西里晚祷”事件（1282 年）是在巴塞罗纳和君士坦丁堡設計出来的。那个警钟响起了法国对希腊野心的丧钟。阿拉貢因为占得了西西里而获得酬报。但热那亚从这事件里也取得了得来容易而又丰富的利益。安如·查理因为需要热那亚舰队在所計拟的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計劃里的帮助，願意扩大它在希腊帝国中所已有的很大商业特权作为酬报。但相反，热那亚宁願利用希腊人对安吉文王朝的恐怖心理。热那亚的“商人-亲王”弟兄，麦紐尔和貝尼得多·扎卡利亚，久已垂涎小亚細亚佛开亚的大明矾矿，而皇帝就賜給了他們以这项让与权。迈克尔八世，因为他实现了推翻安吉文朝的政权，也許会觉得已充分地获得了补偿。对皇帝來說，这是一項良好的政治手法。对扎卡利亚弟兄來說，这也是一項优越的商业活动。因为

从这矿产所得的利潤，比那付給皇帝的年租要多到好几倍。明矾对染色，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所以西欧的回程船只，常常在佛开亚装运这种有用产品。对这项商业的唯一严重竞争，是来自黑海沿岸的明矾貿易，而这项明矾是由热那亚船只装运到欧洲去的。麦紐尔起初是商人，而后来是爱国者，劝說皇帝以禁止攸克辛海〔黑海〕这一部門的貿易来保証他得垄断明矾市場，就是一种保护措施，这事情导致皇帝和热那亚之間发生爭执。^①

1282 年当法国人在西西里被屠杀以后，比薩由于支援阿拉貢而取得了报酬，就是，在巴勒摩和島上其他地方上的有利貿易权利。竞争者間的斗争，现在达到了最后阶段。热那亚人，由于安如·

① 威·密勒：《拉丁人在利凡得》。

查理和法国（它仇恨阿拉貢）在精神上的支援，完成了他們毀灭比薩的陰謀。1284年，比薩城被占領，城內一切可移动的东西都被搶劫一空，而它的港口也被一种魔术般的工程技巧破坏了。原来，阿諾河水流湍急到这样程度，以致水流一向把那些从多斯加納山上冲激下来的碎石子，从港口內清除得干干淨淨。但现在，热那亚人建造了一条斜跨港口的大石堤，使水流舒松，因而它所带下的泥滓停积在河道中。由于这一緣故，比薩的港口徐徐淤塞起来而成为不可航行。因此，商人和銀行家迁移到卢加或佛罗伦薩去，而比薩的黄金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

热那亚因遭受威尼斯死仇的敌对越来越多地从东方港口被排挤出来，就在西欧，特别是在法国与法兰德斯，也越来越多地发展了它的商业。在一个时期，不是在十三世紀的晚期，便是在十四世紀的初期，它大胆地开始了热那亚港与布魯日（和伦敦）之間的航运业务；那是注定在中世紀貿易史上和貿易路綫上要发生革命性的影响的。尽管有海盗、风暴、浅滩和暗礁的危險，这项新事业却能欣欣向荣，因为運費削減而通行稅也可避免。这新航路的效果，还可从下列事实看得出来：（1）香宾市集的相应的衰落（虽然它們的衰落还有其他原因），（2）萊茵河上經由阿尔卑斯山路来的貿易總額与通行稅收入的縮減。

威尼斯也馬上急起直追；它一向注意貿易的机会，并監視它的竞争者的行动。1317年，威尼斯第一次船队出发，經過直布罗陀海峡而达到了布魯日和伦敦。在这以后，直到近代时期，威尼斯船队在西欧貿易中成为一个經常的組織，并且不久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热那亚的船队。

到了1300年，热那亚不复是威尼斯的一个凶狠的对手。关于热那亚最后失敗以及威尼斯巨大成功之原因，是政治性的。而这些原因又大部是由地理位置所规定的。

热那亚内部不断发生的革命运动，在十四年中爆发了三次严重的革命，以及革命之前的一切騷动，一定會使它在和較稳定的竞争者的冲突里，处于不利地位。热那亚也不可能避免了这项不利情况；它不是一个由难攻的礁湖环绕着的島上城市；它位在大陆上，它拥有沿海岸上东西面的領土。山岭本来可提供很可防守的边疆，但热那亚城所在地却是那个边疆上最弱的一环。塞尔维亚、斯塔勒、奥尔巴和波米达各河流到它的边境附近……热那亚也无法避免要卷入卫尔夫和基伯林两派政治斗争的漩涡里；这项斗争已把它的邻邦撕得破碎。而且，它所占有的这块領土，对热那亚人口的性质也起着一种显著的影响。它的大貴族，不仅是巨商，而且也是大地主；他們占有广大土地，并建造了城堡来保护它們；他們之間相互竞争；他們也同样是貪得无厌的。意大利的政治局勢影响了热那亚的生活，而它的大貴族之間的仇怨，还使城市内部分成了派系。可是，威尼斯的情况則截然不同了。它由于环礁而与大陆隔离开来，的确，它几乎不能算作意大利的一部分；它的利益是轉向东方的，卫尔夫派和基伯林派斗争的歪风，不会吹动它宁靜河灣上的波紋的；那里沒有封建制度及其武断划分的社会等級来破坏居民中間牢固的团结精神；也沒有有势力的大地主貴族阶层作为群众嫉妒的标的。威尼斯是非常统一的。商人貴族、會計員、船主以及造船匠，都是属于一个股份公司的合作者和股东。威尼斯成功的秘訣，即在于此。对热那亚的斗争，在长期消耗交战国双方的資源方面，是可怕的，但結局如何，一向是在意料之中的。^①

当威尼斯和热那亚在海上耀武揚威并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来爭取海外市場和产品的时候，很相似的猛烈商业竞争，在意大利内部，在伦巴第和在多斯加納也在进行着。米兰和佛罗伦薩是这些冲突的中心。两城各爭取在它的自然疆域內的霸权，来反对当地封建貴族和竞争的城市。小城市同它們附近邻人的冲突，比佛罗伦薩同比薩与塞亚那的战争，其猛烈程度并不輕些。而且，这些城市也常常由于派別斗争而内部分裂。

上述情况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在于上层富裕的中产階級和下层平民阶层之間的日益扩大的分裂；前者控制行会（现在变为商人

^① 《英国历史評論》第 12 卷，第 348 頁（卡罗的一篇书评）。

的或工业团体),也控制当地政府,而后者中間包括工人阶级以及居民中的临时工部分。这就是富与貧的斗争、雇主对被雇佣者的斗争、资本对劳动的斗争。最后,教皇和皇帝政权之间的巨大斗争,也渗入并扰乱着这一切的混乱和无政府局面,而该项历史性斗争在十三世纪已达到了拚死的决斗阶段。在意大利的每个城市中,有一个拥护腓特烈二世的立场的基伯林派或皇帝党,同时也有一个卫尔夫派或教皇党。从表面看来,这种党派的冲突,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或一般性的政治问题。但如果我们深入这些派系的内层来看,我们就可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又深刻又有重大意义的经济社会的分裂。这是城市和它们周围的农村地区之间的冲突,市民和封建贵族之间的冲突,封建制度所依靠的土地财产和由工商业所产生出来的新财富形式之间的冲突,墨守陈规的封建保守主义和富有朝气并体现完全现代观点与感应的城市新物质生活之间的冲突。保守的封建利益站在皇帝方面;而新的利益站在教皇方面。教廷,世界上最古老的机构,把它的权力和它的利益同欧洲最新的经济社会势力结合在一起;这一点使它的胜利可有把握。因为城市对封建制度的胜利,必然会产生教廷对代表封建主阶级权益的皇帝的胜利的。

依据经济社会史观,十二世纪欧洲所发展的新的经济社会变更,是腓特烈二世和教皇之间的斗争之根源。意大利学者,陆力亚和维拉利,已清楚地看出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现在,我引述前者的一段话:

在罗马帝国的毁灭使制造工业的各种痕迹抹去以后,在经济舞台上,土地财产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而领主是唯一的演员……但在自由城市出现后……独立手工艺人的收入……和局限于城堡内的土地收入,遂分庭抗礼了。这样,产生了土地收入的持有者和工业收入的持有者之间的斗争……在楞雅诺,在康判尔第诺、在蒙特柏提,武装派系双方各相信他们是为一个理想而斗

爭，為教皇的或為皇帝的勝利而鬥爭……但不管他們為了什麼理想而投入了戰鬥，那激起鬥爭的未知而又看不見的精神，不是從理想主義的高峰下降，而是從經濟功利主義的下層地區產生出來……當意大利城市達到一個穩定狀態而建立了自治政府的時候，那現已占着優勢的工業收入，就組織了一個對封建收入的猛烈反抗運動。於是，由於工業家和封建主之間的這項新鬥爭，反對城堡的慘酷戰爭爆發起來了；在這衝突里，工業家組成了衛爾夫黨而封建主也組成了基伯林黨……當城市和封邑之間的衝突爆發的時候，農奴立即從他們領主的莊園里逃亡出來，而在城垣的庇護之下找到了自由。而且，在封建主已轉化為市民之後，衛爾夫黨和基伯林黨之間的鬥爭還在城垣之內繼續着；在衛爾夫黨每次勝利時，手藝〔行會〕的特權擴展到居民中的新階層去；但在任何時候基伯林黨贏得了勝利，他們重建最微賤的僱傭關係，而對他們所用作爪牙來反對資產階級的普通人，則提高待遇。最後，當封建主變為毫無勢力而從城市政府里完全被擠出以後，當中產階級的優勢已達到無可爭辯的地位以後，城市又分成為兩個敵對的黨派，一個包括富裕工業家，另一個包括普通人，即小手藝者和學徒們。^①

關於剛在上面所述的經濟社會發展，可以多斯加納的佛罗倫薩城作為例子，它是十三世紀內地意大利典型的而又是最有特點的城市，正象米蘭城是十二世紀內地意大利典型的的城市那樣。在十一世紀，佛罗倫薩在經濟上是落後的，在物質文明上也是粗野的；當德意志皇帝把多斯加納作為一個被沒收的封邑（1115年）奪取過來後，德意志在那裡所建立的穩固統治以及在十字軍時期意大利本身對新興商業和工業力量的覺醒，給這個城市以新的推進力並給它開放了新機會的大門。德意志政權原來可固定在聖米內阿多（“德意志城市”）並可從多斯加納封建主，象阿爾杜布蘭得奇家族那樣，找到同情的支持，據說，這個家族所擁有的城堡，比一年的天數還要多。但城市資本的穩步侵入農村，使封建主的占有制慢慢地破壞了。當皇帝和教皇為了爭取女伯爵馬替爾達大量遺產

^① 陸力亞：《社會的經濟基礎》，第192—194頁。

的继承权而作战时，佛罗伦薩置身于两派之外，而严格注意营业方面。它所推行的政策，很象在前一世紀里米兰的政策那样，就是压服它的竞争者。因此，佛罗伦薩和塞亚那之間时常发生了战争。

塞亚那，位在南多斯加納，孤立无助，沒有附近的同盟国。当时，卢加为了实现它争取出海口的野心和比薩进行战争；佛罗伦薩人巧妙地借手于卢加来为自己获得港口而让它負担这项侵略經費。那个港口，就是比薩本城；它好几年来已享有多斯加納沿海貿易的实际垄断权。卢加人在热那亚的支持之下，侵略性地力求貫徹他們对这港口的要求。皇帝因为需要做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无暇来支援比薩。塞亚那又在內地离得太远。由于一阵惊惶，就是，害怕热那亚和卢加的联合进攻，比薩乃向佛罗伦薩乞援，那是大錯特錯的，因而它的命运遂决定于 1171 年 7 月 4 日的条約了。

为了答謝佛罗伦薩的援助，比薩人允諾：在陆地上和海洋上“救助并护卫”佛罗伦薩国家的人；无论何时佛罗伦薩人从事于战争，提供由四百人组成的一个騎士队……沒有佛罗伦薩領事的同意，決不和卢加媾和或停战；按照运输比薩人自己貨物的同样条件，在海上运输佛罗伦薩的貨物和人；贈給在比薩領土之內关于沿河捐稅的特殊豁免权；“在福利斯巴达”，拨給一所住宅供佛罗伦薩商人寄宿并在阿諾河桥畔供給两月店鋪。^①

佛罗伦薩沒有丧失一兵一卒，沒有花費分文，而达到了海口，并使比薩成为它的附庸。

在这以后，佛罗伦薩在多斯加納的扩展势力，从緩慢而变为迅速了。1197 年，当亨利六世的計劃震惊了全意大利时，它組織卫尔夫同盟；这一同盟类似 1167 年的伦巴同盟，使它便于进行“和平渗入”的步骤。在 1209—1214 年的时期，我們可看到多斯加納的德意志皇党組織的完全崩潰。教廷和腓特烈二世之間的冲突，把佛罗伦薩赶入卫尔夫陣营，并使之投入教皇的怀抱里；因为腓特烈

^① 黑武德：《比薩史》，第 198 頁。

对城市的发展是敌視的。教皇烏尔班四世，为了报答佛罗伦薩的援助，使它成为教廷財政政策的金融总汇，因而为佛罗伦薩充当一个有力量的銀行业中心开辟了道路。在 1215 年后几年中，佛罗伦薩的控制权落在由富商、大行会和放款者所組成的卫尔夫党手里。皇帝的代理人和他的女婿安提阿·腓特烈在多斯加納的橫征暴斂，加上教廷的阴谋与法兰西斯托鉢僧的鼓励，使卫尔夫同盟更有力量。这是一个工商业大繁荣的时期，但也是一个以“非法牟利”、行政賄賂、假公济私、財政混乱和土地霸占为特征的时期。在佛罗伦薩，百合花金币的鑄造^①（1252 年）和所得稅的創立，是关于这个时期財政建設方面的两个实例。

佛罗伦薩經濟的声势，起初是依靠它的工业，后来才依靠它的商业和銀行业。它的主要活动，是工业而非商业的。它不能参加东方商业和运输貿易，因为它不是位在海岸上。十字軍对它是沒有直接帮助的，虽然佛罗伦薩也从一般的商业复兴里获得了利益。佛罗伦薩不是个中間商，而是个生产者。所以，它的問題是要发现某种一般或普通需要的貨品而把它制造出来。它抓住了呢絨制造业，并把它发展到精密的程度。多斯加納山区，虽对农业是不宜而又不利的，但对养羊业却是非常适合的。撒地尼亚提供丰富的羊毛，其他供給則来自卡斯提尔最南的一省亚尔加尔威，来自法国的郎基多克以及来自英国^②，佛罗伦薩周围的村庄和寺院成为羊欄

① 1252 年，佛罗伦薩开始鑄造这种金币，因上面刻着百合花而得名，重五十五厘。——譯者

② 英国的紀錄指出：1273 年，意大利商人取去羊毛产品的百分之三十七；北法商人，百分之二十四；不拉奔商人，百分之十七；南法商人，百分之八；德国商人，百分之六；佛来銘商人，百分之三；西班牙人，百分之一。但据說，英国和法兰德斯之間的貿易关系在 1278 年曾中止过。在意大利人投入英国羊毛貿易的資本中，皮阿森扎的苏格提公司有二万一千四百馬克，卢加的利西阿第公司有一万零八百馬克；佛罗伦薩的夫勒斯科巴第公司有八千八百馬克；那可說明佛罗伦薩在这項营业中还是年輕的。见《英国历史評論》第 24 卷，第 399 頁及以下。

和牧場。

在养羊的机构中,赫米里提的教堂是最出名;赫米里提是在伦巴第和多斯加納的一个寺院团,单在伦巴第一处,它就拥有一百五十所教堂——它的教堂房屋,全部用作出产羊毛的場所。据传说,这寺院团的創立人,是若干曾被亨利三世放逐到德意志去并受到长期禁錮屈辱的米兰貴族。他們被释放以后,回到老家而建立了一所寺院。据另一說法,赫米里提寺院团是起源于1135年圣伯尔拿在米兰的热烈布教。这两种說法,都是不正确的。赫米里提寺院团的起源可从宗教观念和經濟困难的結合方面来找出。早在十一世紀后期,“純洁教派”异端以及在伦巴第与它相似的异端“改造僧侶派”都表达了宗教狂热和經濟社会的不满;那些伦巴城市无产者,即穷苦手工艺工人特别是羊毛工人,数以千計地接受了这些异端教派。后来,这些异端的旧名称虽已經消逝,但情况与集团还是存在着;到了十二世紀中期,从这块愁苦与宗教狂热的土壤上跃起了赫米里提寺院团,旨在为城市中这些穷苦工人提供經常而稳定的职业。这寺院团的成員,生活又严肃又簡朴,专心于手工劳动,特别是紡織羊毛布。这組織是半世俗性、半宗教性的,开始时,即被教会側目而視的。的确,在赫米里提教派和发尔多教派^①、約阿喜謨教派与法兰西斯教派間,存在着某种相似的理想和实践。可是,教皇英諾森三世在1201年对这新的寺院团,給予正式承认,强制它接受寺院规程,并命令它执行一种特殊义务,就是,要它对改造僧侶派和发尔多派异端运动进行斗争。

但是,赫米里提寺院团对实际的救济事业,比对传教事业,更多注意;它宁願多做些养羊事业,多照顾些城市下层劳动人民的福利。所以,它曾被确当地称为“寺院团和工业行会之間的中間物”。

^① 发尔多教派(Waldensians或 Vaudois)在1170年由里昂人彼得·发尔多所創立。——譯者

在很多地方，有人把儿童付托給赫米里提寺院团去照管，使他們受到职业教育，很象学徒在行会中所受到的訓練那样。但伦巴城市当局从赫米里提寺院团的日益增加的財富里，看出了一种城市收入的泉源；因为它们是属于一个半世俗性的組織，所以，他們迫使它們繳納賦稅并强制它們貸款給政府。因此，它們逐漸出售了在伦巴第的教堂，而迁到比較友好的多斯加納去了。佛罗伦薩，即兴旺的工业城市，向来是注意好生意的；因而在 1239 年邀請这寺院团定居于它的領土內并要它們在城內建立一所学校，即我們所称的职业訓練所，来教育羊毛工人。

甚至在这时期之前，佛罗伦薩的羊毛业中，已組成了七个工业行会；它們代表着从单一工业中分化出来的行业，例如，刷毛工、漂布工和染工。但是其中有两个行会，站在最高地位，就是，毛織业行会和呢絨加工业行会。前一行会用本地产的和进口的原羊毛来織造呢絨；后一行会在外国市場上，主要是在法兰德斯，采购粗坯和次等羊毛織物来加工，使之成为精細的高級貨品。这一項有利的經營，不仅显出佛罗伦薩人的聪明，而且也証明了佛罗伦薩工人是具有高度的技术水平的。的确，在刷毛、梳毛、修剪、尤其是在染色方面，佛罗伦薩迅即領導了全欧。当时所知道的最不褪色而又最美丽的顏色，是佛罗伦薩染工所染的。为了这项目的，他們在世界上到处搜覓稀有的植物和矿物。許多洗染程序是保密的；染坊中只一兩人員是知道染色公式的。据那个一生專門研究中世紀佛罗伦薩历史的德卫孙的記載，佛罗伦薩城在 1281 年时已有人口四万五千人。由此可见它的繁荣已达到了怎样盛大的程度。我們知道：在 1331 年它有人口九万人；它本城历史家微拉尼說，在 1308 年它有三万人在羊毛工业各部門中做工作；有二百个工場，每年出产布匹八万卷，价值在二十万百合花金币。可是，奇怪得很，在十三世紀，佛罗伦薩对生絲的生产，却是漠不关心，而让那項工业給卢加

去干。如上文所說，卢加絲业的开端是从巴勒摩得来的。再从卢加，桑树和蚕蛾沿着里維耶拉区传布而入布罗溫斯。直到十四世紀，在 1314 年，由于暴动的緣故，佛罗伦薩才把絲織业加入了它的工业里。在那一年，它对卢加发动了战争，毁坏了它的貿易，还把卢加的大部工人带回到佛罗伦薩城。

佛罗伦薩在教皇和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激烈冲突里所舒展的手腕，灵敏到和教皇本人特别是英諾森四世和烏尔班四世同样灵敏的程度。上文已提过，教皇是拥护意大利的城市公社运动的并从城市的財富里汲取了他們的經費，而皇帝是依靠旧封建貴族的。大部意大利城市，虽非全部，支持着教皇，而教皇方面也很关心，使它們因此而获得好处。

英諾森三世使羅馬納和多斯加納脱离了德意志統治，并恢复了教会在法王丕平旧贈与范围内的世袭領地。教皇格列高里九世繼續推行他前任者的政策。在教皇和腓特烈二世之間的长期战争里，全意大利都被卷入了漩渦，因而很多城市破产，很多貴族遭受灾殃。教皇为了取得城市和貴族的归順，乃迅即利用了自己的巨額进款中的一部分，来代他們偿付債款，并归还他們的土地作为教皇座的封邑。

可是，如果认为教廷在这綿延冲突里的行动完全出于自私自利的心理，那会是一个錯誤的历史結論。有人說得对：“未来时代的萌芽，在于城市公社；所以，城市公社而非帝国，孕育着文明的原則……教会，象在十二世紀一样，立即挺身而出，站在保护市民阶层和市民自由的地位；反过来，从这些城市——这个时代的权力泉源——汲取了力量来重振自己。”因为尽管教廷抱有建造帝国的野心和傲慢的态度，但就这一項政策而言，它是站在扩展民主运动那一方面的。不幸，这种新形成的市民精神，还不能抵抗那从激烈战争里所产生出来的残暴和放肆状态；当城市自由問題获得了胜利

解决以后，城市又互相斗争，又和教皇与贵族斗争，因而陷于无政府状态，最后它们就转到世袭的地方专制魔王权力之下了。

这里，关于教廷庞大财政活动之兴起和发展的历史，无须予以详论。我们只说下列一点就够了：在十三世纪中，教廷财政权力，不论是为了和平或为了战争，在欧洲已成为和今天国际大银行的权力同样地伟大。从教皇格列高里九世（1227—1241年）即位以后，意大利城市的重要银行各有代理机构设在罗马城和外国，象在法国、法兰德斯和英国那样。它们的主要业务，是收集“彼得便士”及其他教会的进款，并把它們汇到罗马城去。但这些教皇的顾客把教皇权力和自己的金融力量搞在一起来促进并保护他們的营业活动。如果有一个来自佛罗伦萨或米兰的意大利商人在法国或在英国被抢劫，或者被某个贵族强暴地勒索，或者不能收回一笔外国债款，教皇就为他进行干涉，而这项压力一般是有成效的。这样一个密切而有利的互相利用，把意大利商人阶层和教廷吸引在一起了。

在对教廷的关系中，再也没有别的意大利城市象佛罗伦萨那样成功的。正是在十三世纪中，所有佛罗伦萨的大银行奠定了它們的基础，它們是阿貝第尼、阿尔比西、阿的西奥尼、巴尔第、貝列科西、伊尔杜布兰的尼、波哥、斐力匹、瓜尔夫勒第、斯卡拉、塞尔奇、第奥米狄提、林伯的尼、夫勒斯科巴第、阿奎勒里、里奥尼、摩那尔第、露西、苏格提、馬科尔第、德达尔第、斯匹格里提。

在教皇对腓特烈二世进行斗争的过程里，这些银行坚定地支持了教皇，获得了他們的报酬。同样，在1268年，当安如·查理出征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时，它們把它看作一个有利的投机机会，并給予大量的财政支援。1282年阿拉貢在贊助“西西里晚祷”事件的成功，使安吉文王朝失掉丰富的西西里島；那对佛罗伦萨銀行家來說，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那对那不勒斯的查理二世來說，則

更糟糕,因为他的整个王国实际上已抵押給它們,而他自己已变为佛罗伦薩的領受年金之人。因为通行稅、矿場、盐場、森林,等等,作为对他和他父亲貸款的保証,已落在他們手里。他們还控制了南意大利的谷物和絲綢貿易。

所有这物质繁荣促进了卫尔夫派財閥政治在佛罗伦薩的建立。这个財閥曾操纵政府,課征賦稅并指导外交政策。結果,在1280年,有一次激烈的政治和阶级斗争在城内爆发;在这斗争里,老的党派名称,如卫尔夫和基伯林,还在出现,但已丧失了它們原来的意义而获得了一个新的意义。“在手艺人看来,一个发财的銀行家和一个封建貴族同样是可恶的家伙”。在1282年6月,当“西西里晚祷”事件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薩的时候,手艺人 and 无产者就发动了革命;那本质上是佛罗伦薩民主派和手工艺工人对卫尔夫派的財閥政治的反抗。

这项斗争,按它的本质看,是經濟的;所以,反对財政巨头的斗争;在行会本身以內,最为激烈;行会的头子們曾被看作敌人,而非同僚。在后来的年代里……所有一个接一个的办法,都是針對着富人的。农奴的释放和“百人會議”(一种确定的中等阶级會議)的建立,便是这项过程中的实例。可是,平民方面的不滿情緒还在蔓延着。許多官員实际上还是卫尔夫巨头們的工具,行政腐敗,賄賂公行。最后,在1292年12月,屠夫、鞋匠、金属匠和石匠四个行会取得了领导地位,并提出了正式的改革要求。^①

1293年的运动,是

征服財閥和封建貴族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驟,这已成为十余年来内部冲突所追求的标的;这运动是导致設立“長老院”的情势所产生的自然后果;它解决了这一問題:应由旧望族和“新富”的寡头来統治阿諾河区呢,还是应由人民来决定他們本城的命运呢?

在佛罗伦薩,銀行家在大行会和小行会之間的冲突里,在貴族

① 《英国历史評論》,第26卷,第372-373頁(評德卫孙:《佛罗伦薩史》)。

与民主派之間的党派斗争里，再一次起着重要作用。他們在俾安岐和美里两派^①的起源里，有着經濟的影响或可以說有着貨幣的影响。大雇主狡猾地以貶值的銀币来支付工資而保存了黄金。1296年当銀币跌到它原价的六分之一时，这项办法遂激起了暴动。

在佛罗伦薩奋力爭取多斯加納的經濟霸权里，塞亚那是它的最大竞争者。但塞亚那，尽管为了爭取伟大地位而作奋勇战斗，却是在开始时已預先注定要失败的。象佛罗伦薩那样，它没有一个出海口，而受到位于內地的不便利。但不象佛罗伦薩那样，它从来没有能够达到过海洋。而且，也不象佛罗伦薩位于富饒的盆地那样，它是一个山区城市；它周围的土地远不及佛罗伦薩周围土地的肥沃。最后，塞亚那連飲水的供应，也感缺少。在它境內的两条小河，即爱尔薩和翁布隆，只是溪流，在夏季里容易干涸。所以，塞亚那从来没有能够发展象織布和硝皮这一类的主要工业。它的一个重要經濟优点是：它位在法兰西琴路上，这是一条从布罗溫斯到羅馬城的沿海大路，是一条从貿易复兴最早时期起香客商人往来頻繁的道路。这一条公路指出了塞亚那走向繁荣的道路——香宾市集第一次記載塞亚那人的出现，是在1216年。塞亚那不久也发展成为一个銀行业中心，从这一事实，可见塞亚那商人在这貿易里获得了巨大利潤。这项发展也把它引入了教廷財政的有利軌道內。在塞亚那，今天还存在着一所中世紀的房屋，那是在1234年由塞亚那的一个最早的資本家安吉利列·索拉斐卡所建造的。在那房屋的前面，可看到下列銘文：“教皇格列高里九世的別墅”。

① 俾安岐(Bianchi)和美里(Meri)是多斯加納的政治派系；两者都是属于卫尔夫派。在1300年不久之前，两派发生冲突；这冲突在佛罗伦薩和附近城市是很激烈的；俾安岐終于加入了卫尔夫的仇人基伯林派。1301年俾安岐从佛罗伦薩被放逐出去。——譯者

那里的最大銀公司，是波塞諾立銀行，叫做“大表”銀行，那是从貨幣兌換表而得名的。1289年，它的資本达到了按那时标准一个巨大的数額，三万五千百合花金币。它放款給皇帝、教皇、王侯、城市。

塞亚那所有这种繁荣景象，不久激起了佛罗伦薩的不可和解的敌对。十三世紀中，在这两个爭夺多斯加納霸权者間，战争和边境冲突几乎是經常的事情。但尽管塞亚那在蒙特柏提战役（1260年）里赢得了佛罗伦薩大胜，但它的資源和它的政治机謀，却不能和佛罗伦薩的財富与外交相比。在皇帝和教皇的連綿的斗争里，它可能由于忠心和情感，始終站在基伯林党方面，但这是一个致命的政治决定。頑固的教皇們曾想尽方法，以求挫敗他們的敌人。1260年11月，在蒙特柏提战后尚不滿六个月的時間內，教皇就以停止宗教仪式来打击塞亚那了。这对塞亚那产生了悲慘的效果。許多塞亚那銀行倒閉了。在法国圣齐尔茲、波揆耳和香宾市集上的塞亚那商人，因为他們不能收到欠他們的帐款而宣告破产了。然而塞亚那人还頑强地繼續掙扎，于是，教皇以最后的而又最有力的毁灭性武器来威胁他們——加以“純洁派”异端罪名和发动一次十字軍。这项誣陷虽然是駭人听聞的，但在本世紀早期对南法的亚尔比教派十字軍所表现过的狂热和貪婪，已够使人們担心于这种事件的重演。原来以“正宗教”和天主教热忱自豪的佛罗伦薩，对它竞争者的失敗，当然是幸灾乐禍的。如果腓特烈二世的两个浪漫继承人，曼夫勒德和孔拉丁，能够在意大利恢复帝国的权力，塞亚那将可能渡过难关。但霍亨斯陶芬在全意大利地位的丧失以及接踵而来的安如·查理的胜利（他是由教皇选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的），使塞亚那的希望毁灭了。“大表”銀行的倒閉，使全城破产——教皇尼古拉四世也因此損失了八万百合花金币，但他还是滿意的，因为这个坚强的基伯林派基地終於被打破。在其他受这

破产牵累的多斯加納城市，有許多破落的家族漂流到佛罗伦薩去；那倒是一个有趣味的后果。但丁曾嫌恶这种迁移，而在这渗入的行动里，也看出了一个衰敗的象征。俾阿特立斯^①的家族，是从飞厄索勒来的一个逃难家族。她和巴尔第大銀行的老板西門·得·巴尔第結婚。然而，教皇也很聪明；在他們胜利之后，应用了宽大政策。他們不願完全落入佛罗伦薩銀行家的財政魔掌里，所以，他們和塞亚那残余的銀行，重新建立了金融关系。但是塞亚那的大批銀行已經倒閉，別的已經迁到布罗溫斯去，还有另外一些也已移入佛罗伦薩；在那里它們依靠着那些大銀行家所願意給它們的面包屑来过活。塞亚那虽繼續存在，但它的大批領土、它的很多銀行事业已轉到阿諾河畔的城市〔佛罗伦薩〕手里了。它在苦难的状态下，意志尚高，力图从精神事物里找得补偿，因而在十四世紀中塞亚那的艺术攀登了它成就的高峰。

在結束本章所討論的意大利在十字軍时期的經濟社會史之前，我們还应略談一些作为这一时期特征的一般文化状况。

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人們心理所产生的魔力，使我們对于这个运动的阴暗面，有所忽視了；而这些阴暗面是和意大利文学和艺术的誕生同时并存的。那些由于突如其来的大量橫財所产生的大部弊病和放纵状态，象在后来世界里我們不幸而看到的那样，在十三世紀意大利社会中早已出現。資本主义制度的兴起，造成了一种特殊可憎的“暴富”阶层：他們喜欢炫耀夸张，沉迷于庸俗奢侈、粗魯作风、残忍行动、毫无慈悲心腸。他們就是但丁所譏笑的“新貴”。关于他們，可以引用象約翰遜博士就十八世紀与此相似的英国豪富阶层所說的話来描写：“他們失掉了商人的客气，而沒有获得了紳士的风度”。他們的营业作风正象他們的恶劣态度一样，既

① 她就是但丁所热爱的女子；在“神曲”里备受表揚。她生于1266年，1287年，嫁給西門，1290年死去，时年二十四岁。——譯者

唯利是图,又非常酷辣,押款經營和放高利貸已成为普遍现象。基安斐格利西家族的財富,是从抵押放款和取消贖回抵押品权的无情的詭計而得来的。福尔沙·坡提納里,即但丁的理想化的美女俾阿特立斯之父亲,是以重利盘剝而成为巨富的。据说,法兰西斯科·达庫沙,一位大学教授(他所得的工資一定比今天的大学教授的工資要高)“在他的学生中間,找到了他的最有利的牺牲对象”。

竞争城市之間連綿不息的陆上战争、海上的掠夺行为,就强暴和破坏程度而言,一定是远过旧时封建战争的破坏性的。那些要指斥封建时代是“残忍刻薄之世”的人们,应该在发表論断之前,稍为想一想。但在十三世紀,欧洲能够忍受得住这种可怕的損失,因为它的財富比以前大得多,而貿易利潤又这样大,以致在抵消那么重大的損失后,还可剩有利潤的余額。

意大利在十三世紀中鏟除了封建制度的缺点,同时也破坏了封建制度的优点:它的深刻的个人义务观念和荣誉心,它的守法精神、它的高貴和廉洁自豪心理、它的重視等級、它对服务的崇高理想、它对神圣教会的崇拜。封建領主往往对于实际的残暴行为不聞不問,而对于受苦受难更是漠不关心。但到了十三世紀,人們,特别是在废弃封建制度的和具有虛伪作风的意大利的人们,常常是故意并恶意地干出残暴勾当。现在,他們不是象过去那样为了实现“权利”(“权利”归根到底是观念,而基本上不是出于物质扩张欲的)而进行微小的家族冲突或斗争,而是为了爭夺領土或为了爭夺市場或为了毁灭一个竞争者,总之,为了单纯自私自利的物质扩张而进行战争了。新兴资产階級,态度粗魯,道德墮落,大吃大喝,貪得无厌,完全没有那些由旧封建貴族社会几百年来所培养出的风雅、文明和爱好礼貌的风度。我們只要把象英国威廉·馬歇尔、法国乔伊維尔、圣路易这一流的紳士,把象法国布罗溫斯的馬葛利特、卡斯提尔的布浪希这一流貴妇,同意大利城市中粗野的风云儿

与暴富戶来对照一下，就可觉得这中間的不同了。所謂封建时代的私战——甚至强盜封建領主的掠夺——在和意大利城市之間的战争或流行于每个意大利城市中的党派冲突比較之下，就黯然失色了。法拉·薩冷本是一个意大利法兰西斯派僧侶，生存于十三世紀；在漫游中看到意大利的很多情况；很少人閱讀他的《自传》內的記載，而不会觉得毛骨悚然的。厄士里諾·达·羅馬諾的残酷行为，如果发生在十二世紀里，一定会震动全欧的。在法国路易六世时期，托馬斯·得·瑪恩也許是在封建时代所产生的最残暴的一个人；但他所干的事情在和厄士里諾所挖空心思的、駭人听闻的酷刑相比之下，只可认作野蛮而已。可是，厄士里諾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他是一个典型，后来在十四和十五世紀，意大利产生了很多属于这一类型的人。这是在十三世紀意大利里的一个特殊奇迹：它既集貪婪、荒淫、野蛮、伤风敗俗的大全，但同时还能产生这么多美丽、真实而值得传頌的东西。

但丁于 1265 年出生于佛罗伦薩；他是个道德家、爱国者和詩人；他对自己国家內道德的如此墮落和社会标准的如此腐敗深感痛心；他知道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它迅速获得了的无限財富，而这项財富沒有那在封建制度黄金时代的傳統精神，就是，与封建财产俱来的責任感和服务心。但丁在回顾“淳朴的古代”时，看到佛罗伦薩城“沒有項圈或冠冕，也沒有穿用华丽鞋子或腰带的貴妇人，而这些飾品会比她的容貌更引人注意”。在那个时候，結婚不是象现在那样为了財產和丰厚的嫁奩。奢侈风气尚未出现。房屋的建筑是为了居住的舒适，而不是为了財富的炫耀。貴妇脸上并不涂脂抹粉的。人們从乡村移入城市而使城市受損害的情况，也尚未发生。“人品的混杂，从来是城市禍害的开端”。那个时候的生活，是簡朴的。“价值昂貴的丁香”——暗指那些奢侈浪費的貴重香料——尚未起着腐蝕作用。“新貴和橫財，产生了驕傲自滿与纵欲无

度”。

当然，我們对于但丁控訴的过火部分，也必須打个折扣来听。这是由一个被放逐者和痛心于幻想破灭的梦想家^①所发出的不平之鳴。可是，这控訴的基本論点，是正确的：意大利在十三世紀和以后的世紀里，是在追求財富、物质享受和肉欲。

① 但丁曾参加多斯加納的俾安岐政治派系。該派在政治斗争中失敗。1031 年俾安岐派包括但丁在內，从佛罗伦薩被放逐。——譯者

第十八章 十字軍时期的法国

(1095—1270 年)*

“法兰西”象十二和十三世紀的意大利一样，是一个地理的名称，而不是一个統一的政治实体。这个国家的历史，必須按各个封建省分来研究，因为其中每一个省保持着它的强烈的地方情感和地方传统。法国省分，按照它們是否內陆的或临海的（或濱英吉利海峡或濱大西洋或地中海），按照是否属于河流流经之地或属于靠近阿尔卑斯山路的地方，按照土壤性质和农业状况，按照居民血统与語言的差别，彼此之間极为不同。

甚至法兰西君主国在腓力二世奥古斯都（1180—1223 年）和圣路易九世（1226—1270 年）时代的政治扩张之前，大封建領主在他們的省分內已相当成功地建立了安定的政府形式。到了1150年，由于大貴族（其中还須包括主教和住持）的有力統治，封建制度最混乱时期已一去不复返了。那些历史性的省分，已經完整形成并且以新形式固定下来。这些省分是：法兰德斯、香槟、勃艮第、諾曼底、安茹、波亚图、基恩、加斯科尼、土魯斯、布罗溫斯。这种改进的和平状况和秩序便利了貿易并保护了工业；而这两种經濟活动，在十二世紀都在向前进展。农民在他們的命运中也感受到物质生活的改善。农业、商业和工业上的发展，反映出法国欣欣向荣的生活。路易七世，在某一天和窩尔特·馬普談話里，以法国他自己的資源和英国亨利二世的資源相对比，他說，“英王不缺少什么东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69 頁，參看第 76 頁。

西：人力、馬匹、黃金、絲綢、珠寶、水果、谷物、野禽和野獸。我們在法國，除了麵包、葡萄酒和快樂之外，就沒有什麼別的東西了”。我認為，一言以蔽之，這一段話總結了法國人的經濟社會生活——不是屬於整個王國的廣義的法兰西的生活，而是屬於法兰西島的生活，即塞納河盆地法王自己領地的生活。

在十二世紀，所有法兰西島周圍各省的廣大地帶，都是屬於封建領主的；其中很多領主比法王本人要強。除了巴黎和奧爾良城以外，法王的小城市在和他附庸的首府相比之下，還成什麼樣子呢？

在十二世紀後半期，巴黎只不過是法國大城市之一。甚至在那個時期的法兰西有限的範圍之內，巴黎、厄坦普和奧爾良也是可相提並論的，而在它的疆界以外，盧昂、都爾、波爾多、土魯斯都是地方的中心，在社會經濟的意義上，也在政治的意義上，都是獨立的。^①

對於法兰西島，法王給予深切的注意。它儘管是小的，但它是一個良好的遺產。塞納河從王國的中央穿過那里直接流入海峽。羅亞爾河靠近它的南部。在塞納河兩條向東的支流中，瓦茲河流向法兰德斯新興的城市，瑪恩河流入萊茵蘭。法兰西島的土壤，以肥沃出名，小麥和葡萄長得很茂密。在十一世紀，有一個詩人，盛贊布里田野的肥沃，并把摩城的所在地同伊力稷安樂土^②相比擬。他吹噓該地區所產的梅子、生梨、蔬菜；他贊揚那里的畜群、干酪和谷物。他狂喜地喊道，“如果你愛女谷神的話，你會在摩城看到最豐富的收穫。在那里，你也會看到地窖接受了酒神的贈品。這是一塊又富饒又肥沃的地方。”

巴黎的發展和改進，當然是法王最密切關心的一件事。巴黎

① 鮑威克：《諾曼底的失去》，第 10 頁。

② 指任何想象的樂土或福地。——譯者

的日益增长的物质进步，反映在十二和十三世紀的大量河流運輸貿易方面。十二世紀，是行會的起源和傳布的时代，而這些組織中的最早的，是若干船夫協會；當時的船夫是兼做運輸和商品貿易的。巴黎商人公會出現於 1121 年，它是最早見於史乘的。它曾控制中塞納河的航運。下塞納河是在盧昂的一個類似的組織的壟斷之下；上塞納河和約內河由第三個商人公會，即勃艮第商人公會所壟斷，它的總部設在奧舍耳。關於這些公會和其他船夫行會的起源不詳。在羅馬高盧，幾乎每一條河流上有着許多船夫協會，是否可能它們就從這些古羅馬的船夫協會傳下來的呢？這些沿河公會，還是由寺院“職業農奴”所組織起來的呢？在查理曼的和平時期，寺院農奴使用了寺院的船舶往來於河流上，並在第九和十世紀他們擺脫了封建控制。儘管我們多么願意把十二世紀巴黎的這批塞納河船夫和古羅馬的巴黎船夫相聯系，但我們必須坦白承認：這兩種組織之間的历史的連續性，是无法證明的。在前面一章里，我們已經說過：在 861 年巴黎有着一塊船夫的居留地，而別的作家已推測：這個集團在早期封建時代苟延殘喘而後又公開活動；並從法王路易六世，獲得了王家的承認。但這項假設，也認為是“證據太不足”。另有第三種推論，即獲得了最廣泛承認的推論是：巴黎商人公會是由那批往來於塞納河上的巴黎商人在諾曼底人征服英國之後為了防止盧昂的競爭而組織起來的；當時，盧昂的商業由於諾曼底和英國的聯合而獲得了有力的刺激。不管怎樣回答這一問題，無疑的，在十二世紀塞納河上船夫和商人行會的出現，都是一種商業覺醒的預報。

在腓力·奧古斯都時代，巴黎商人公會成為城市的法團，是貿易公司，也是巴黎市府。巴黎從來不是一個城市公社，象法國其他若干城市那樣。巴黎城在法團的地位上，是由巴黎商人公會來代表的；它是以“商會長”為首的一個商人集團。商會長的屬員被稱

为“商务吏”。1170年路易七世批准了他們的旧慣例。公会控制葡萄酒和食盐貿易,对商人小販发給執照,准許“叫喊”权,即在街头上叫卖商品之权,管理度量衡,规定入市稅及其他捐稅。商人公会有一个碼頭在巴黎,另一碼頭在約內河和塞納河的汇合处,第三个碼頭在蒙特。法王白費心机地企图把在塞納河上营业的三个公司并成为一个公司。那个时代的精神是不容許这样做的。甚至在1204年从英国夺回了諾曼底以后,那还是不行,虽然关于葡萄酒方面法王拒絕了卢昂商人把西葡两国的葡萄酒和吉伦特的葡萄酒經由卢昂港口轉运到巴黎的权利;然而,勃艮第和法兰西島的葡萄酒則可順流而下运到卢昂去。卢昂商人按旧例,从比斯开灣輸入食盐,但他們沒有从巴黎水上商人公会获得特許狀,不得在巴黎、在法兰西島的任何一块地方,出售食盐。

在987年卡佩政变之前,巴黎城的范围严格地說,只限于“首都的小島”(Ile-de-le-Cité)上。在塞納河两岸上的近郊,特别是在左岸,是沒有城垣的。早期卡佩朝諸王开始了巴黎城扩展的过程。路易六世,是第一位法王給近郊居民和两岸周围的散住人口伸出了保护的手。在塞納河灣上,他建造了圣澤門城堡,作为保卫巴黎西北方面的前沿堡垒;而在南北两方,建造了大城寨和小城寨来保卫本城,并把近郊圈入城垣之內。那环城堡壘防綫的遺迹,今天按城內的街道,还可在許多地方寻找出来。后来,这些环形防綫对于不断发展的首都,变得太窄狹了。在1188年,剛在他为第三次十字軍出国之前,腓力·奥古斯都認識到必須扩展城界,命令建筑一个新城垣,这城垣的遺址也可按街道寻找出来。它的建造費了二十一年的時間。在塞納河的左岸,距城垣若干步外,法王又建造了那著名的卢佛尔主塔,因为在第九世紀諾曼人的进攻已証明那里是一个弱点。

腓力二世在1180年登极时,鋪設了两条橫穿巴黎城的街道:

一条自北至南，另一条自东至西，在图耳·圣扎克地点交叉着。但首都全城街道的鋪設，在百年时期內，还未曾完成。腓力二世，也是給巴黎建造一条引水管和两处水池的第一位法王，一处是在市場內，另一处在英諾森墓旁。这两块地方都位于那块叫做“牧場”的低湿地帶。在那里路易六世已进行了部分排水工程并在那里建造了一所市場。腓力再以墙垣来圈围这块墓地，而在市場的廣場上建造了陈設商品用的回廊。这些“回廊”的建筑式样，起源于古羅馬公所周围的走廊的，底下是作为貨棧。在法国，另有一个这样拱廊形式的著名市場，就是在索睦耳的市場。它是由亨利二世所建造的，乔伊維尔曾把它說成是象息斯脫西安派的寺院那样。他所作的这项比較确是合式的，因为修道寺院，按建筑式讲，是古羅馬建筑物的前院，兩側附有走廊。这种式样，在后来中世紀許多城市里，象布魯日那样，成了一个普通的市場形式。关于这方面的例証，甚至今天还有存留。这一形式一直繼續到十六世紀为止。这些“回廊”，有时是属于一个世俗或宗教貴族的財產；有时是属于城市的市場。在路易九世时代，巴黎有着两所經營布匹的“回廊”。后来这两个市場組織各有自己的街区。佛来銘城市曾建造壮丽的建筑物作为市場，例如，布魯日、阿拉斯、伊泊尔、根特各城市的布市場；又如，根特、伊泊尔及后来的安特卫普各城市的粮食市場。最好的例子，是伊泊尔的布市場（在 1201 年开始建造，在 1304 年完成）以及布魯日的布市場。亞丰斯·得·波亚叠，即路易九世的弟兄，在拉·罗瑟尔和尼奥尔曾建造类似的建筑物，象路易八世在奧德牟桥畔所建造的那样。法国諸王，在那些从英人方面收复的省分內，曾不惜工本建造市場大厦。那是含有安撫性质的政策。

有一个法国历史家，在腓力二世統治的早期，曾作出豪語說：巴黎是“王国的首都也是王室的駐所”；这是正确的。英国巴塞洛繆曾称頌巴黎周围的造屋石头和水泥，也曾贊揚城市的建筑式样。

腓力二世是第一位能够洞察貿易的价值并力求促进貿易的法王。据说,路易七世曾准许卢昂船夫得上溯塞納河远至蒙特为止,来促进运输貿易;对于这一回事,虽然还有可疑,但对于腓力二世要在海峡沿岸获得自由港权利的決心,則是毫无問題的。

腓力·奥古斯都在 1204—1205 年間,从英国曾收复下列封邑:諾曼底、安如、緬因、图梭、波亚图;那是具有重要的經濟动机和經濟后果的。無疑的,在十二世紀中,諾曼底是北法的最繁盛区域;除了法兰德斯以外,也許是人口最密的地方。在諾曼底,农奴制度很早就消失,無疑的,一部分是由于諾曼人工商业的增加,因为在中世紀欧洲,随处可看到:在貿易活跃的地方,就有自由农的存在。諾曼底的这种高度繁荣景象,也許一部分是从早期“外侵团”的商业早熟状态承袭而来的,但大部分一定是由于英王在諾曼底公爵的地位上所实施的賢明而又有效能的統治。鮑威克教授曾声称:在十二世紀諾曼底是“欧洲的最先进的而又自給自足的国家”。卢昂商人行会,“在伦敦及在英国其他一切港口上,享有和英国商人所享有的同等特权;他們只須繳付王家捐稅”。在海峡两岸的商业,多么繁盛,“商人的帳册,每頁都是写得滿滿,而卢昂商人声势煊赫,和諾曼底領主一样”。在 1150 年(城市特許状发給的那一年)和 1204 年之間,“卢昂的权力达到了最高峰;而它的港口已成为南方和北方商人的大商埠”。它的硝皮业,是出名的,它的商船和商人一定会熟悉欧洲的主要市場,而它进出口貨一定是名目繁多的。喀因的漁业,是有利的事业。第厄普和巴佛勒所經營的海峡的运输貿易是活跃的。但卡雷繼續是一个小漁村,直到 1190 年卢芳·亨利,即不拉奔公爵,在那里建造了一个港口以及防止海水泛滥的堤岸为止。在这以后的十年之内,卡雷的商业重要性日益增长,所以理查一世給它的商人以特殊的王家保护状并使他們免繳市場稅。在 1196 年,又有一所行会大厅建造起来。在海峡和北

海里，有着很多卡雷漁船，從事捕魚，而它所經營的鱈魚和青魚貿易，是巨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運酒船隻也駛入卡雷港內。

和諾曼底在政治上與商業上相交織着的，還有其他金雀花朝的封邑。

西諾曼底和羅亞爾河各伯爵領有着特殊的密切關係……波亞疊和都爾的舊城市扼守着羅亞爾河的下游流域以及從波亞疊通北方的道路；的確，那條從都爾到波亞疊通過山峽的道路，在整個中世紀時代，控制着西北法全部；它是南北交通的要道……都爾扼守着從北到南的通路。交通路線從這個大城市向布腊和奧爾良、德勒和盧昂、里曼和喀因、翁熱和南特、波亞疊和波爾多輻射出去……那些在南方大道上來來往往的法兰德斯和那瓦的商人們或那些擁擠在壯麗聖馬丁寺院旁街道上要往昆波斯特拉去的香客們，給都爾市民帶來了利益；而對這些利益，金雀花朝也分潤了一部分。^①

安吉文葡萄酒同諾曼底的美多克和哥德多爾葡萄酒相競爭。從南特和拉·羅瑟爾的海港，船舶開往英國、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去。圖棧是法國各省中的一顆珍珠，而它的首府都爾（位於自北方到法國西南部的直線大道上）也許是王國內最熱鬧的內地城市。在十三世紀初，波亞圖也是繁榮的。在內地，尼奧爾、聖冉·敦格里是富庶的城市，尤其是富產葡萄酒，在那里有着大量出口貿易。尼奧爾位於色佛爾河畔（當時這條河還是可航行的），它不僅運出葡萄酒而且運出當地所產的谷物和羊毛到法兰德斯和西班牙去。聖冉·敦格里的白葡萄酒也是出名的。

在法國西部各省——韋恩、克雷因、舍爾、羅特、多爾頓——以河流交叉為特色，完全和東北法一樣，它們灌溉平原上的葡萄園和牧場，並提供便利的交通線。沒有人能夠了解法國的經濟，如果沒有看到這些河流在形成下列城市上的有價值的影響：波亞疊、盎古倫、里摩日、佩里革、亞仁，尤其是波爾多，即西南法格羅內河支流

^① 鮑威克：《諾曼底的失去》，第11—18頁。

上的王后城。貝云局处于西南法的角落，在那里庇里尼斯山脉向西伸出它們的海角；盛产馬和牛羊出名的加斯科尼是它的腹地，而它的各地通过阿杜耳河及其支流，都可以到达。至于基恩和加斯科尼，即英国的封邑，它們同諾曼底、法兰德斯与英国都有水陆两路的商业联系。理查一世和那瓦·貝梭加里阿的結婚，还刺激了金雀花朝的加斯科尼与卡斯提尔之間的貿易。

法国迅速而完全地收复了英国在法境内的大封邑；一般认为这是由于法王的力量与手腕以及由于他的竞争者英王約翰的愚蠢。但是，我們忽視了其中一个經濟原因，除非我們找出其主要原因在于金雀花朝竭澤而漁的稅收政策。諾曼底公共收入的历史，象中世紀諾曼底的伟大历史家利欧波尔得·得利尔所揭露的那样，可說明这一事实。獅心王理查一朝的光荣事迹，使他的臣民負担沉重。新堡的威廉說，当理查进行第三次十字軍出征时，他出让了他所有的領地。但这项初步的毁灭性的行动在和这次出征結果对比之下，就算不得什么了。

为贖回英王理查所付的贖金，使他国家的財源陷于枯竭。贖金总额达到十五万馬克，約等于今天的五十万美元，而这負担还最沉重地压在法境内英属省分身上，特别是在諾曼底身上；后者单独所付的数额，比英王国所付的，約多三分之一。当理查获释而返諾曼底后，他在那里又另征重稅，为的要建造卢昂上面塞納河畔的加雅城堡以防止法国侵入这块公爵領。这个著名城堡的建造曾花費十五万多美元，而这笔巨款又是在一年之內搜括起来的。这项灾难，还在英王約翰的不良統治之下，繼續增长。为此，諾曼底財政近于破产；喀因国庫已告空虛，因而英王抽調英国国内大量資金来弥补諾曼底的亏空。英王約翰在位第五年的国庫案卷內指出：英国大批现款經過海峡运到諾曼底去。这些情况已够說明腓力·奥古斯都之所以容易收复領土的原因了。在理查时代，英国光荣的

威信，還足以支持住諾曼底人的熱忱；而在失地王約翰時代，連這種心理慰藉也是沒有了。所以，諾曼底人對於法國的征服，沒有什麼反對情緒，而“諾曼底人樂於擺脫曾使他們陷入苦境的統治。只有那些為此而在英國喪失了領地的主教和貴族們，才對這項變動感到遺憾”。1204年，約翰對諾曼底的所有法國商人徵收了十五分之一的財產稅；這是約翰自取毀滅的措施也是腓力二世的勝利機會。

腓力二世相當精明，他以寬大態度來安撫他新征服地上的臣民。他批准了盧昂的城市特權並賜給它以對愛爾蘭貿易的專利權；這一項貿易歷時已有幾百年之久，因為它開始於都柏林的“外侵團”王國時代，開始於商業交往在所有由“北歐人”建立的殖民地之間流行無阻的時期。他撤消了那些由約翰曾經採用的虐政並以市民特權賜給了喀因、奧德牟橋以及其他小城市。他解除了市場和市集上那種由於理查的野心和約翰的貪婪所課征的苛捐雜稅。在羅亞爾河之南，他採取了同樣灵活的安撫方法。波亞疊、尼奧爾、聖冉·敦格里和里摩日也被賜予市民特權。凡是來到波亞疊市集上的外國商人，都被豁免捐稅。上面所引的歷史家繼續說，“正是在國王的行動里，我們可研究他在收復省內所採取的措施。他沒收了那些拒絕放棄他們過去的臣服關係的貴族財產，他把新的家族移入那里；他對城市和寺院給予新特權或批准舊特權。”

然而，海峽沿岸的無數小港口，由於法國征服諾曼底而受到了沉重的打擊，而它們對法人的憎恨本來久已存在著。當時，海峽充斥著英國的擄掠船甚至海盜；在恢復“失地”的希望斷絕以後，英人進行了多年的報復戰爭。英國高等法院的文獻里表明：英國政府抱有一種恢復諾曼底的很真實的希望（亨利三世對諾曼底商人和水手的寬大方針，就是一種標志）。可是這項希望在路易九世發表下列聲明之後，應該已經消失：1244年，路易九世曾宣布：凡是在

法国有領地的英国貴族，必須放弃他們在这里或那里的財產。法国王室当然要阻止在諾曼底亲英情緒的增长，所以，它捕拿在法国港口內所有的英国商人和他們的商品。亨利三世对于法人很少采取报复手段，至少关于諾曼底船运方面如此。而且，法国漁船被給予特殊优待。法英两国之間的紧张关系，到 1259 年和約为止，在多年时期扰害了海峡与比斯开灣貿易，而边境战争有时还毁坏了西法的英屬省分和法国本部之間的边境地区。馬太·巴黎写道，“当英王听到法王的胜利以后，就下令“五港”守兵，要尽一切可能来損害所有經過海上的属于法王国的商人及其他人們。”

1224—1227 年的战争，部分是属于商战的性质。当战争初起的时候，英法国王都随便地准許商人往来于他們各自的国境內，直到 1224 年 7 月 9 日止。从那个日子起，亨利三世对卢昂、第厄普及諾曼底的其他地方的某些商人，发給个别通行証。在拉·罗瑟尔落入法人手里以后，这一港口遂对英国船舶封閉；有若干葡萄酒載貨（从奥尼斯运来而属于里伊的一个船主所有）也被沒收了。为了报复，在英国港內和在英国市集上的法国商人都被逮捕；在海峡上的法国船只，都被帶入英国港，要不然的話，也被帶到革因稷島去。于是橫过海峡的商业，完全中断。这样一来，拉·罗瑟尔失去了它过去所享有的有利的英国市場而使波尔多获得了利益，因为今后波尔多在对英貿易中，一个竞争者也沒有。那些遭受損失的法英港口城市为了互相报复，大家采用了捕掠和海盗方法。所以，每个港口用巨大鉄鏈，拦断入口，以資防御。夜里，在城門关闭以后，放出大型爱尔兰猛犬在街道上徘徊。在布勒塔尼，圣馬洛的猛犬，是很出名的；也在那里，“狗看夜”制度最早出现，它成立于 1155 年——奇怪得很，直到 1770 年才取消！

1226 年，亨利三世曾下令逮捕在伦敦、散得維齿、扫桑普敦各港口上法国商人，并扣押他們的貨物。这项办法，在同年 12 月推

行到哈特普尔，在 1227 年 1 月还推行到斯坦福、圣伊維斯和圣波托尔夫各市集上的法国商人。然而，就在这一年内，为了照顾装运谷物、葡萄酒和食品的船只，解除了禁令。然而，这些处理办法原来是专横的，因为連亨利三世的臣民，即从波尔多到貝云港的船舶所有人也受累不浅；因为它们毫无理由地不是被迫停泊在港内，便是被迫开出。我們不知道：法国政府曾否同样严峻地对待英国商人。但有一記載說，1227 年由巴佛勒駛出的一只商人捕掠船曾捕获一只波尔多的商船。然而，英国政府的严峻办法，由于考虑到商业利益，在某种情况下，予以放松了。英王对于諾曼底人特別寬大，也許因为他还希望重得他們的效忠。1224 年，当法国船只与法国商品在英国全境被扣押时，一只曾在紐喀斯尔被扣留的从第厄普来的諾曼底船被释放并准予回老家去。一只卢昂来的船在金斯林被放回；还有一只第厄普船在勻蓝也被放回。1227 年，有八只巴佛勒来的船也被释放。

法国在北法所获得的英国封邑，虽是最大的，但却不是在腓力·奥古斯都时代法王政府所获得的唯一領土。因为法王由于获得了亚眠、圣垦廷、佩伦和維蒙答，几乎已插足于法国人的法兰德斯，并使索謨河成为法国的一条河流。在腓力二世扩展他的权力于亚多亚和維蒙答(毕伽第)时，他已显出：他的尖銳目光已注意到貿易以及从商业往来上所可获得的进款。因为在从喀姆布萊到亚眠的古羅馬公路和从阿拉斯到理姆斯的公路的交叉点上，是巴坡謨。在这交叉点上，远在第九或第十世紀，已有一个城堡防守，因为它附近的阿尔艮森林，是一个危险的盜賊出沒之所。在这个城堡的周围，后来建造了一批房屋来作旅行者、香客和往来商人的寄宿之所。这块地方原来属于法兰德斯的伯爵，在十一世紀他們在巴坡謨四条公路的汇合地点上建立了一所稅关。当法王获得亚多亚以后，巴坡謨遂落入他的手里。实际上，所有法兰德斯和香宾市集之

間的运来运去的商品，都須通过巴坡謨，它是从法兰德斯到布罗溫斯，从北海到地中海，穿过中欧洲的公路之要道。1202年，法王曾下令：“凡是来自法兰德斯的任何貨物，不論运往法国（意指法兰西島）或运往勃艮第或香宾或布罗溫斯或庇里尼斯山地区的，須一律在巴坡謨繳付通行稅”。在康边、佩伦和克雷普·恩·瓦罗亚，法王設立了輔助的稅局来截拦較小的貿易路。在这些稅局里，法国官員稽查一切貨物，檢驗一切文件。关于巴坡謨的通行稅，我們可看到它从1202到1442年之間的几乎完备的紀錄；那告訴我們它所課征的稅率、商人所从来的国家以及他們所攜帶的商品。除了周围省分的自然产品之外，还有来自北海的无数干魚或熏魚特別是青魚以及佛来銘的布匹通过那里；在路上还可看到从东方进口的奢侈品：象絲綢和胡椒、托利多的鋼、意大利的制成品、阿拉伯的皮革、象牙、染料、羽毛、来自突尼斯的明矾这一类。至于經營这种形形色色貿易的人們，都是从各地来的杂色人等——利凡得犹太人、意大利人、布罗溫斯人、西班牙人、法国人、佛来銘人、英国人、德意志人。

腓力·奥古斯都的政策，标志着中世紀政府对商业和商人的一种新态度。在这以前，封建慣例承认：在战争时期从外国商人夺取貨物来归偿他們同国人所欠的債款之行为是合法的。但1185年，当腓力二世和法兰德斯伯爵进行战争的时候，他曾公布：凡来自法兰德斯、維蒙答和彭替安，即敌人的領土上的商人們，在四十天期限內，可毫无恐惧地来到香宾市集上。1193年，为了佛来銘商人，他再次宣布了这种类似的豁免权。1199年，他曾准許他們只在繳付慣例的通行稅条件之下，得在索謨河上从事航行，从科比到出海为止。1209年，对于那些来到香宾市集的外国商人，还給予王家保护。腓力二世也大力保护了出国的法国商人。我們在伦敦档案中所保存下来的他的信件里，还可看到他写給英国首席法

官一封信；里面，他以坚决語气要求英国清理若干亚眠商人在英国出售小麦而未能收集的帳款。

在論述各省的經濟史以后，現在我們可來談一談南法的經濟史了。下列事实，是突出的：虽然由于約翰的懦弱和亨利三世的无能，英国对它在北法的各省放松了控制，但它对加斯科尼和基恩的領土，还能保持。关于这一点，我們可以經濟理由来作部分的說明。約翰和后来亨利三世之所以能够保持这些地方，是因为他們和加斯科尼城市的葡萄酒商人联盟来反对貴族和法王的緣故。波尔多、貝云、达克士及其他城市——其中許多城市被賜給特許狀——在混乱和战争时期，还是效忠于英国的統治。波尔多和英国的葡萄酒貿易，是很大的，而且这个城市享有許多特权。

在南法，綿亘着郎基多克廣闊平原，包括土魯斯大伯爵領和它的卫星封邑。它在地中海沿岸的港口——馬賽、亞格得、蒙特皮列、那旁——在十字軍运动的起初百年时期中繁荣起来，并成了它們背后平原所出产的大量农业供应品之出口港。在法国省分中，除了法兰德斯以外，工业再也沒有象在南法諸城市中的那样先进的——特别是織布业。塞芬的半干燥和崎岖的山区上，养着几百万头綿羊；庇里尼斯斜坡上也养着几乎同样多的綿羊；这两地区所产的羊毛送到下列各城市的織机上去：亚尔比（那时和现在一样它是南法的最重要的羊毛織造业中心）、蒙托班、尼姆、土魯斯、加奥尔——然而，最后一城更加以織造帆布出名；这种帆布叫做“加奥尔布”，是地中海海員所爭求的东西。在十字軍时期，運輸香客、兵士和商品到圣地去这一項营业，对法国沿海城市所給予的巨大刺激，在程度上仅次于威尼斯、比薩和热那亚所感受到的刺激。到了十二世紀末期，馬賽和蒙特皮列，在亚克城、君士坦丁堡、太尔、貝魯特和亚历山大城，各有自己的商站。那旁同埃及已經建立貿易关系。在圣齐尔茲市集上，常有佛来銘人、德意志人、英国人、諾曼

底人、法国人、加斯科尼人、西班牙人、热那亚人、比薩人、西西里人和西班牙南部及非洲总督区(突尼斯和开溫)的穆罕默德教商人来临。法兰德斯伯爵查理好人(死于 1127 年)，在圣齐尔茲市集上，曾买进一只黄金嵌珠宝的艺术性酒杯；那是他在宝庫中所引以自豪的东西。

在南法，农业和工业到处是从属于商业的。这个地区面临地中海，仿佛构成了北欧、西欧和地中海地区市場之間的一条桥梁；这一幸运的位置，是在商业和貿易里的一个有力的鼓励因素。它是北方和西方的商业、南方和东方的商业所經過的自然公路。所有东方和西方貿易表册上的东西，都出现于郎基多克各城市的商业纪录簿上。其中主要的商品是：葡萄酒、食油、香料、絲綢、麻布、毛皮、鞋子、兽皮、木材、鋼鐵、黄銅、青銅、柏油、甘草、糖、米、水果以及各式各样的肉。

有一个西班牙犹太人，杜德拉·本雅明写道：蒙特皮列的位置，对商业來說，是合式不过的，各国商人，基督教的和穆罕默德教的，都来到这里。根据他的記載，那里有从埃及、希腊、意大利、非洲、西班牙和英国来的商人。蒙特皮列在十三世紀属于阿拉貢，它是南法最大的商业港，胜过馬賽。它是法国大量貿易进入地中海的大門。这个城市所表现的商业精神非常銳敏；所以，当克呂尼寺院僧侶申請入境的时候，它首先要求他們建立一所公共市場来准許商人和商品进入；而后准許了他們建造他們所需的住所和堡垒。这个城市的商业是遍及世界的。它和語言与风俗上有自然亲緣的西班牙、意大利与西西里，和北法与北欧进行貿易；而貿易路綫网还把它和附近的南法城市象亚尔比、尼姆、卡卡孙、貝稷亚、亚格得及其他城市自然地相連接起来。那旁也是一个聞名的商业城市。它的市場比起蒙特皮列的要少，但它所接触的国家同样多。

1236 年，雷門·得·康奇斯随同馬賽駐亚克的領事吉拉尔德·

奧利維來到塞浦路斯；他是被派到塞浦路斯國王亨利一世朝廷上去的蒙特皮列大使；在那里，他談判了一項條約，給馬賽、蒙特皮列及其他南法城市商人在法馬古斯達的通商特權。在亞克和貝魯特，布羅溫斯各城市有着自己的居住區、教會和領事。從蒙特皮列來的商人在入境和出境時，不受什麼捐稅的限制，而那些永久留居的人是在他們母國權力的管轄之下。1243年，的黎波里的波希蒙德五世賜給蒙特皮列商人居留地以一塊城內居住區以及一所領事住的房屋。他沒有豁免他們的買賣稅和貨物過境稅，但只向他們征收一般稅額的三分之一。他是在下列條件下賜給這些特權的：蒙特皮列每年應派一只配備四十個水手和至少裝載八百噸貨物的船來到的黎波里。彼得拉斯·得·提力科，在1250年曾由阿拉貢王詹姆士一世派遣到安提阿來為他的人民實現更有利的條件；下一年，彼得拉斯訪問了的黎波里，為阿拉貢商人取得了新的特權。在十三世紀中期以前，蒙特皮列在亞歷山大城还有着一個商人殖民地，上面所提的雷門·得·康奇斯這個人，也帶着使命到過那里。阿拉貢駐在亞歷山大城的領事，以阿拉貢國王的名義來管理商務。

馬賽和蒙特皮列一樣，是十字軍的一個重要受惠者。在1200年時，亞田·麥紐爾在那里開始營業；他的大批營業文件，曾被保存下來。在十三世紀的早期年代里，他主要和西西里進行貿易；但他和下列各地，也有着銀行業務的聯繫：敘利亞、埃及和巴巴利沿岸的幾個城市，其中包括有修達、布吉亞、突尼斯、奧倫和特倫肯。1230年，亞田不再從事營業，而由其子伯爾納繼承其事。伯爾納繼續經營銀行事業；他派遣他的代理人到巴巴利和敘利亞去；他還擴大業務，以經營各種不同商品：自然產品和製造品的貿易。有些交換的商品是：葡萄酒、珊瑚、谷物、面粉、麻布、棉花、絲綢、羊皮和亞麻。我們從他的兩大卷帳冊里，可看到關於這項貿易的性質和

数量之大批詳細的文献資料。特別耐人寻味的，是在这貿易中东方产品占着这样大的比重；由此可知，馬賽在經營这些貴重商品的貿易里所享有的部分，也是相当大的。

到了十三世紀中期，馬賽的貿易已經增加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出现了关于管理委派本城領事到海外各国去的条例。1270 年，在突尼斯国王和法国腓力三世、西西里国王安如·查理与那瓦国王提波特之間，簽訂了一項以十五年为期的和平与通商条約。这项条約规定：薩拉森商人，来到基督教国家境內时，得享受特別保护，而上述国家的基督教商人在穆罕默德教統治者的王国境內，也应享有特別保护。如果有薩拉森船只在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沿海岸遭到了船难，如属可能，应把船貨保存并归还原主。对基督教僧侶和教士，将在总督的各区內給予一处居住的地方；对住在那里的基督徒，还将准予設立教堂和墓地。

那旁同布吉亚也有着有利的貿易关系。它把麦子、皮革和羊毛运到布吉亚来交換布匹和染料；它在突尼斯以馬匹和家禽来交換杏仁、无花果、香櫞、其他水果以及花瓶；这些花瓶“的純白和精致令人惊叹；世界上再也沒有別的国家能够出产同样精美的东西的”。1271 年，教王曾发出一項通告，劝告这个城市說，它应迫使每一个那旁人放弃这项和异教徒所进行的可憎貿易。这个威胁是白費心机的。那里的商人們依然进行他們的貿易，肯定地认为：在积聚了大量財產以后，他們懂得怎样来解脫自己的罪孽的。

这样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当然对那从事于此項貿易的国家，起着反射作用的。就南法來說，它的主要影响，除了它自然地带来了繁荣景象之外，还在于加速了外国人口的流入。由于商业利益的吸引力，不仅有大批犹太人，也有热那亚人、伦巴人、佛罗伦薩人、比薩人及其他意大利城市的居民，紛紛涌入了郎基多克；他們在象蒙特皮列、那旁、尼姆、貝稷亚这一类的大城市里还建立了他們的

常設營業所。南法在貿易上的偉大前途特別吸引猶太人來到那里。但當他們來到以後，他們就遭受突如其來的侮辱和迫害。那時他們所可享受的，只是生存的权利而已。在尼姆、蒙特皮列、貝穆亞、那旁和土魯斯，猶太人只准住在特殊地區。然而，後來對他們的憎恨情緒，逐步降低；在侮辱猶太人的浪潮過後，出現了一個他們得享有無數权利的時期。他們初被准許從事商業和職業，繼而被准予擔任公職。他們獲得了領主的保護；在少數場合下還獲得了教會主教的親自保護。

熱那亞和比薩對南法城市的嫉妒和憎恨的心理，是顯著的。我們很早就可看到，熱那亞人曾特別提出要使布羅溫斯各城市在貿易和航運方面完全依附于己。1109年，熱那亞商人向土魯斯的伯爵柏特藍強求：他應只准熱那亞船隻進入聖齊爾茲港口。在1121年之前，他們已經在蒙特皮列建立他們的貨棧。為了促進自己的利益，他們曾贊助土魯斯伯爵關於遞奪蒙特皮列和馬賽的自由權之計劃。1143年，他們還幫助了蒙特皮列伯爵威廉六世平息城市內的一次暴動；為此，他們強索了商業特權方面的一項重大報酬。依照條約，熱那亞人被准許在港口內卸下船貨而可不付慣例的通行稅。但是，只有那些屬於蒙特皮列人並和西班牙各港口有往來的船隻，或轉運十字軍戰士和供應品的船隻，才得出入港口。除了十字軍戰士船隻以外，向東航運限于到熱那亞去的沿海航行。後來在1155年簽訂的協定里，熱那亞人還堅持：蒙特皮列的海軍應限于沿海航行，向西到西班牙，向東到熱那亞。

又在1174年，熱那亞人和土魯斯伯爵雷門聯合制定了進攻馬賽和蒙特皮列的計劃，尤其是要對付前一個城市，以期破壞它的港口。幸而，這些計劃未曾實現。依照協定，在伯爵領土內所有的港口將只開放給熱那亞人以及他們所同意的國家的人民，而伯爵的人民，非得熱那亞的領事和元老院大多數的准許，不得開出商船到

大海上去。

热那亚不仅阴谋阻挠布罗温斯各城市和东方之间的一切商业关系,而也企图阻止它们同西西里方面的这类联系,因为西西里是当时对利凡得贸易的一个重要站。1157年,当热那亚使节访问西西里诺曼王威廉一世要解决他们的法律案件的时候,他们迫使他同意其中一项要求:他将不准许布罗温斯人商船进入他王国的港口,也将不为商业的目的而派遣船只到南法去。腓特烈红鬃子,在他力图使西西里岛脱离诺曼人的时候,曾获得热那亚舰队的帮助,因而他赐给热那亚的领事和城市以拦截所有布罗温斯人和西西里与下意大利之间的商业往来之全权。皇帝亨利六世在1191年的文书里,重申这项特权。然而,热那亚人渐渐认识到:他们不能永远束缚住布罗温斯的贸易。在十三世纪,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在蒙特皮列及其他布罗温斯的城市里,都维持常设贸易站。它们的货品常年陈列在货棧内;从那里,当时多么有名的市集和展览会获得了它们的主要供应品的来源。

在十三世纪初期,郎基多克所享有的经济繁荣状态,在当时其余欧洲国家里,是闻所未闻的,胜过伦巴第和法兰德斯的。然而,它从农业方面的收获,是很有限的,因为在南法,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属于山区性质。另一方面,在罗尼河流域和在地中海沿岸的平原上,土壤肥沃,尽人皆知。土鲁斯周围的泥炭岩地,在几百年的耕种时期中,从来没有过一次不取得丰硕收获的。

至于农产品的种类,实际上,那时的和今天的种类,完全相同。葡萄和五谷的种植,规模很大。葡萄酒工业,在十三世纪后半期,逐渐取得了地方上的垄断地位。在葡萄收获时期,所有其他的工作,都暂时停止。《葡萄歌谣》里,提到

“西班牙的葡萄,布罗温斯的葡萄,
蒙特皮列的和那旁的,

貝穆亞的和郭刻桑的，
摩薩克的〔葡萄〕……”

此外，关于橄欖的种植是带着某种神圣性的。有一条保护这种种植的法律，规定“基督徒不得毁坏或损伤那在洪水时期曾作为和平回到地面上的象征的并提供圣油来点亮圣灯的树木；违者作为犯罪論”。

南法居民，很自然地也从事于饲养兽类的事业；那是温带农业生活中的普通事件。饲养猪羊牛馬，是一种重要的营生；很多兽肉是出口的，部分因为人口中的亚尔比教派实行素食，认为所有的肉类和走兽的产品都受恶魔控制。屠宰場在数字上和磨坊或榨酒厂同样多，星罗棋布于境内；其中很多属于教会的财产；教会也認識到从这肉品工业里可获得大利。

南法的工业因为受到商业活动的刺激，达到了那种发展水平，即相等于并在若干方面超过于法国其他部分的发展水平。在若干城市，象在那旁那样，各种行业組成团体，各有一个选举出来的領袖。这批領袖构成一个仲裁部，对这些行业，实行一般的监督；他們总是尽量促进它們的利益。組成团体的有：屠夫、裁縫、粮食商、烘面包工、染工、理髮师、铁匠、鞋匠、織造呢絨者、織工和石匠。这一张各行各业的工匠名单指出了工业的各种类型。在十三世紀，制造呢絨业和印染业的經營范围比今天更加广泛，而所产的呢絨种类，还要多。蒙特皮列是郎基多克的主要紡織业中心。大量呢絨布出口到东方去，在那里的需要量很大。蒙特皮列是封建世界的巴黎城，它决定了服装的式样。

南法的文化比北法的文化受有較多的拉丁的影响而較少德意志的或封建的影响；而其中所包含的希腊和阿拉伯影响的气质几乎使它具有一种外来的色彩。南方是文雅而不柔弱，强壮而不粗暴。在北方，封建制度是强暴、苛刻而又野蛮的；知識的修养，限于

寺院。南方各省,几百年来对罗亚尔以北各省,是陌生的,甚至是敌对的。这不仅仅是由于种族反感的影响,而也是从它們不同的历史发展而来的結果。

南法有着一个更深更广而又更旧的文化,它的根深埋于古代羅馬的文化。商业和貿易是一个更积极的力量。由于經商而致富的城市中产階級,几乎完全摆脱了那些北法还在流行着的封建束縛。他們中最大富翁住在壮丽的宅邸內,这种宅邸的兩側常常附有塔楼,象封建主的城堡那样。他們自认和貴族站在平等地位,而土魯斯的資產者居然自称为“男爵”。在罗亚尔河以北,以严刑峻法来禁止那些出身微賤的人們进入騎士阶层。而在南方,則一个手艺人的儿子,通过发财或通过象一个浪漫詩人一样的风雅修养,就可达到这个荣誉地位。所以,在南方,社会生活更活泼而又更流动,知識修养更丰富,态度更溫和,而嗜好也更高尚。

不幸,对这个富饒而又条件优越的地区和对这些繁荣的城市,反对亚尔比教派的十字軍竟加以焚烧和屠杀。那在十二世紀曾鼓动十字軍反对穆斯林的狂热、偏狹、貪婪和政治野心,到了十三世紀掉过头来反对南法了;其动机和借口,是“純洁教派”异端在这些省內流行。在路易九世时代,最重要而又給人印象最深的事件,是法国君主政府向南方諸省扩展权力;由于对亚尔比教派的十字軍征討的結果,郎基多克的領土,包括土魯斯大伯爵領和它的附庸封邑在內,归并于王室領內。腓力·奥古斯都曾以王家軍隊征服了王国的北方諸省并达到了海峡上的蔚藍水面。圣路易趁着征服南方富饒省分的机会,一个接一个地逐漸合并了南法的大批省分。

对亚尔比教派的十字軍运动,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运动。在初期(1208—1209年),宗教狂热,势如旭日初升。但对西門·得·蒙特福及其党徒來說,在1209年,物质上的掠夺,是主要动机。如果說西門是教廷的拥护者,他同时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野心家,主要

注意于扩大自己的势力。从他在南法的行为看来，再也没有别的说法可解释他的性格。例如，他迫使蒙特皮列的阿格涅和雷門·特伦卡维尔让给他貝稷亚、卡卡逊、亚尔比、累士兹和亚格得的領地；那是为了宗教的利益，还是为了扩张自己的領地呢？英諾森三世曾宣称：“蒙特福伯爵，只为了占取貝稷亚的年輕子爵的土地，无缘无故地把他逼死”。西門对于异端的和善良教徒的财产，毫不加以区别；只要力所能及，他对于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要掠取。有人说过：他是为信仰而作战，但为自己而征服。1215年他曾拒絕焚毁土魯斯城，那不是由于什么人道主义的理由，而是由于“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他想要囊括該城的全部黄金和战利品为己有”。无疑的，他的野心，是要在南法为自己創立一个大公国；但这一野心終被腓力·奥古斯都的坚强意志所打破。如果說他是“一个信仰的保护人”，那末，这头衔，只在有利于他个人的野心的时候，对他才有意义。自私自利和經濟利益对他來說，是主要的；宗教上的企求，只是为实现他的目的而使用的方便工具。貝稷亚、土魯斯和卡卡逊的肥沃土地和盈利的商业的誘餌，积聚大量金銀財物的欲望，对他來說比起感化异端或毁灭异端的野心，具有更大的鼓舞力量。

对亚尔比教派的十字軍征討，象在东方的十字軍那样，迅速蜕化为一系列大规模的劫掠出征了。“集結于西門·得·蒙特福旗帜下的大批冒险家伙中間有一类有地位的人，他們以战争为职业，切望在南方的风景地区夺取从异端所沒收的土地作为安居之所”。据传说，英諾森三世“在聞悉这种赤裸裸的掠夺和盜劫詳情时，大为震惊……他显出不愉快的神色……他說，他們竟搶夺了那些从未遭受过异端污辱的領土了”。在这些基督教强盜帮中，还夹杂着路劫者、流氓和杀人犯的匪徒；他們靠战争、擄掠来发财。不拉奔人、佛来銘人、洛林人和卡塔尔人在地方上成群結队地进行搶劫。疾病跟着搶劫而来。路易八世死在亚威农（1226年）。在围攻該

城时,死尸横陈,臭气冲天,几乎因此解围。当突击占领貝穆亚的时候,被屠杀的居民估计为从一万五千到六万人不等。当战事和疫病过了以后,西欧最灿烂的文明,最有文化的勤劳人民,消亡殆尽。郎基多克成为一片荒蕪黑土而它的城市也化为废墟。1209年,卡卡逊的四郊被毁灭,后来在1240年城市本身也遭受了同样命运。在七年的时期中,城址完全荒废,城市周围的田野,也无人播种。在往日花园和葡萄园密布的地方上,现在荆棘丛生。有些患难余生的人们向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向北方各国逃亡,但居民的大部分已被毁灭。那里凄惨荒凉的情景,几乎令人难于想象——葡萄园、果园、田野或被砍除,或被烧光;磨坊、仓库、酿酒坊、榨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压榨机已被破坏;水井已被下毒。当然,马赛还是安然无恙;那旁和蒙特皮列也很少受殃。但是郎基多克的几乎所有其他城市,都被劫掠一空。地方性和国际性商业已经消逝,行会已经解散。西面的加斯科尼城市原来从亚尔比采购羊毛的,而现在和郎基多克城市割断了通商关系而转向英国去购买羊毛了。强壮的意大利人闯入这些荒废了的城市并定居在那里,所以后来当贸易开始复兴的时候,他们就占得大量贸易。

在法国王室所兼并的全部领土中,再也没有象郎基多克的兼并那样重要的。由于这个缘故,法国政治和领土的统一获得了保证。如果没有获得了这块领土,南方会发展成为一个独立民族,一个分立的国家。对亚尔比教派的十字军运动对于法国所发生的影响,象美国对南方邦联的战争那样,使它组成更加完善的统一国家。这个比拟,是恰当的。在法国南方象在美国南方一样,在战争的仇恨和热潮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以后,一个恢复和重建时期就跟着征服而来,注定要使南方比以前更加伟大。所有消灭了的或逃亡了的人口,由来自王国北方各省的移民来补充。于是法兰西岛、诺曼底、亚多亚的有些优秀血液得灌注于南方的血液里。来自北法

的家族代替了破落了的貴族。从北方各省来的商人和手工艺者流入南方，把資本帶入了財源枯竭的地区。国王政府到处显出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并又賢明又有力地办理了行政。破坏了的都市，重新建造起来。那些古老、拥挤、不合卫生条件的都市，街衢又弯曲又窄狹的都市的毁灭，倒是一种不幸中的大幸。因为那些新的所謂“矮屋”(bastides)是按几何形式来設計的：一般是四方形或长方形的，但有时也有六角形或八角形的；城中直綫街道互相交叉，形成直角，而在城的中心辟有寬闊的廣場。在旧城址外新建造的卡卡逊城是一个显著的例証。引用卢察尔的話，“南方和法国打成一片了”。在完成統一的过程里，实行过駭人听聞的残暴；尽管如此，但公平的判断一定会贊成这个最后的結果的。

在巩固法王在南法的最高統治权方面，也許再也沒有比郎基多克的这笔大財產所有权轉移給新手里这一变更，貢獻得更多。在王室領中，那些沒收来的土地分給宠臣，或以一般价格售給那些对因土魯斯家族傾复所产生的新秩序而感到兴趣的人們。王室官吏攫取了一切可能攫取的东西，或借口处理叛逆，或借口处理异端；虽然由于路易九世的公平正直，在1262年曾进行过审查而使大量非法夺取的財產归还原主，但这仅仅是全部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①

北法各省所有关于如何达到地中海并和东方建立直接貿易联系这一問題，由于南法的征服而获得了解决。馬賽，即南法的最大港口，属于布罗溫斯，而布罗溫斯伯爵領尚未成为法王国的一部分。蒙特皮列(不在沿海而靠近海岸)及其他最便利港口属于西班牙島王国——瑪約喀，它直到1349年才被法国王重获得。瑪基伦，位于一个由咸水礁湖环绕着的小島上，象小威尼斯那样，属于一个主教所有；而他紧握不放他在那里的商业利益。

在这些情况下，路易九世在他的十字軍开往埃及的时期，在亚格·摩特(意即“死水”)建造了一个人造港。这港口位于海滩中

^① 赫李亚，见《英国历史評論》，第2卷，第249頁。

央，在那长长的王室港灣可达海岸的唯一地点上。它以穿过沼澤的一条堤道，和大陆相接，而通过水流緩慢的运河网，和外海相通。这一地点，是荒凉而又有泥沼气的。为了使亚格·摩特生利，曾作出拚死的努力。法王的水师在沿海巡邏，企图阻止船只駛入瑪基伦港或馬賽港。为了避免这样的强迫，沿海航行甚至在夜里进行；这是一件违反地中海上所有航海慣例的事情。但是，尽管有着王室的保护和政府的鼓励，亚格·摩特終于失敗。当法王国在1257年获得了馬賽和在1349年获得了蒙特皮列以后，亚格·摩特所曾有过的什么小作用，完全丧失。今天，它的巨型城垣，还聳峙在礁湖的粘土上面——那是一个海边死城的骨架。

因为法王的势力已达到地中海，他使法国的北方各省分享十字軍与东方的商业。在十三世紀，馬賽在北非从修达和布吉亚到亚历山大城一带沿海岸上，都有它的商站。在南法城市里，又云集着意大利商人，尤其是热那亚人和佛罗伦薩人；他們常到波揆耳市集，再从那里前往香宾市集。在尼姆，有一个永久的意大利居留地，自称为“伦巴和多斯加納商人的大学”（这里“大学”〔Universitas〕一詞的意义相等于公会或行会）。它是在1270年由腓力三世按照大致和巴黎商人公会相同的条件，給予特許狀的。这公会充任比薩、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薩、皮阿森扎、卢加、波伦亚、皮斯托雅、米兰各地商人的代理机关。在南法，这些商人对法国商业的扩张之帮助，是很大的。这种关系也和法国在以后两世紀对意大利的政治兴趣的增长，有着密切联系。下面从一个当时的历史家的著作中所引的例子，足够說明布罗溫斯人在十三世紀中对貿易如何渴望：

当康华尔·理查1240年往东方去的时候，他在伟恩購了几只船，意欲下行罗尼河到阿尔茲去。伟恩及其他邻近城市的居民請求他把搭客船售給他們；并願意付出船的三倍价值給他。当伯爵拒絕这样做并說他不是商人

的時候，他們用武力扣留了這些船。

路易九世的時期，構成了巴黎行會和工業組織歷史上的一个界碑。為了有價值的《行業志》或《巴黎行業志》一書，我們應感謝這位國王的仁厚而又有效能的統治。該書是由亞田·霸羅編輯；他是商會會長，這一職位，象上文已說過，也包括管理首都的警察、司法和財政的事務。亞田·霸羅在 1248 年路易九世對埃及的十字軍的不幸出征時，伴隨法王前往埃及，在那里他被俘，後來以二千金幣贖出。在 1254 和 1258 年之間的某一時期，他曾擔任巴黎商會會長。在他任職之後，這職位不復是一個可以買賣的職位，而是一個公眾所委託的任務。他在執行職務上的成績使他永垂不朽。在《工業志》這本書里，記載着巴黎的一百零一個行會的章程。這些章程使我們能夠直接而確實地了解當時的日常生活情況。這些工業內部組織的進步性和高度複雜化是驚人的。所有前一世紀舊式的手藝工人和技工的簡單團體已分化而成為首要的和次要的行會，或大型的和小型的行會；後一種是輔助主要工業的類似行業的行會。當時，勞動的分工，已發展得很細。例如，在皮革業里，可看到剝皮工、硝皮工、漂皮工、皮鞋匠、馬具匠、馬鞍匠和細皮工；在石匠中，有砍石匠、泥水匠、膠泥匠。從屬織布工行會的，有梳毛工、漂布者、染工行會。木匠行會包括箱子和門窗匠、桌椅匠、船匠、車輪匠、轆轤匠、箍桶匠，等等。布業行會的類別，幾乎象布匹的種類一樣多。連估舊衣者也有一个行會。各種行會章程詳密規定：一个匠師所可僱傭的學徒人數、勞動的時間、所付的工資、學徒服務的條件；但這類規定在各行業中頗不相同。這些章程的訂立一般是由於雙重動機，就是，利他主義和經濟的動機，前者使一个匠師不應接受多於他所能够教得好的學徒人數；後者是要防止同行間的競爭而使價格下降。當時，一切工業都是家庭手工業性質——就是說，匠師的住宅即是他的工場，而他的學徒也作為他家庭

的成員而在那里生活。但是，匠师为了出售他的手工制品，可携带他的貨物到周六市場上去，在那里每个行会有它的摊子，在那里他和顾客討价还价，还和那些来自附近城市如波瓦錫、彭他茲、波未、亚眠的商人們磋商价目。每年六月，是巴黎的伟大商人月，因为圣澤門、圣雷德尔(雷扎尔)尤其是隆第特的三个市集都是在这个月內举行的。届时法兰德斯、萊茵兰、意大利、布罗溫斯的外地顾客和商人可能联翩而来。

为了严密阻止欺騙行为或出售赃物或次貨起见，政府对度量衡进行管理，并由警察予以監視。从下面一項关于管理制酒者和旧衣商的章程里，可看出法国当时的社会和經濟的情况：

造酒者除了用水和谷物，就是說，用大麦、用大麦和小麦的混合物、或用麦芽造啤酒外，不得也不应用其他东西制造啤酒；如果他为了加强啤酒浓度而放入了任何东西，如杜松、蒲桃或葡萄豆，他就必須对一次犯罪，向国王繳付二十个巴黎苏的罰金，而用这些东西所制成的全部啤酒，須充作慈善事业之用。本业的仲裁員宣布：不是所有放入啤酒的东西都是好的、适当的，因为它们对于身心，对于强壮者和病人，既不卫生而又有損害。

除了在酿酒坊內出售啤酒外，任何人不得也不应出售啤酒，因为販子所出售的啤酒沒有象在酿酒坊內所出售的那样良好純洁，而是又酸又变味，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把啤酒保持得新鮮。而且那些自己不造酒而販运啤酒到巴黎两三处地方去的人們，并不亲自去，也不是由他們的妻子去出售，而是派遣他們的小女儿甚至到外人的居住区，即粗野和墮落的歹徒所集結的地方去出售。由于这些緣故，本业的仲裁員，在国王准許之下同意了上述規則；任何违反这些規則的人一次犯罪应向国王繳付二十个巴黎苏；而在酒坊外其他地方出售的啤酒，須充作慈善事业之用。

任何人若欲在巴黎郊区充当估衣商，必須在本行业的首長和两个仲裁員面前，凭保护神宣誓說：他願意按照本行业的慣例，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做生意；就是說，他将不明知故犯地从小偷买进东西，如果他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来历的話，也不买进什么潮湿或有血漬的东西，除非他知道这潮湿或血漬所从来；也不从巴黎郊区的麻疯患者买进东西；也不买进什么宗教法服，除非这法服由于正当的使用已經破旧；任何人如违反上項規則之一，一次犯罪

就将丧失他的买卖；他不应当也不得再做这项生意，不論出售或購買任何东西，除非他已重新領取本行业的執照并按上面的規定，再舉行過宣誓。

任何估衣商不得漿洗布料，也不買賣漿洗過的衣服或假染色的布料。

上述禁售的各物，不論在什麼地方，若被以國王侍從長名義管理本行业的人看到，可予以沒收；經過本业仲裁員的同意，并当着他們的面，在市場全部開市的日子予以焚毀。

特權滲透了工業世界，正象滲透了封建世界那樣。“王家”行業的產品，大部是由宮廷購買的；對於這些行業的監督權，由國王賜給王宮高級臣僕作為犒賞。國王的司酒官分發執照給酒商、釀酒者和酒館主；廚司控制烘面包工，軍務司控制金屬行業，惟金銀首飾業除外，因為這個行業屬於侍從官的管轄範圍；侍從官也分發執照給布商、綢緞商、皮貨商及細布織造者。

顯然，在 1150 和 1250 年之間，在法國出現了商業和工業的巨大發展以及相應的社會結構的變更。貴族還保存他們的社會威望，但已喪失他們的政治權力于國王，他們的經濟權力于資產階級了。商業和工業所創造出來的新財富不僅使城市居民變得富裕，而也使地主階級陷于貧困，因為土地已失掉它作為唯一重要的財富形式之舊資本主義性質。在十三世紀時期中，有一個有力的平衡過程正在徐徐進行，這就是，使貴族地位下降而使市民階級通過經濟的變動和社會的轉化而上升起來。舊式社會慢慢地走向瓦解。舊貴族在國家機關中開始被“新富”所代替，而這批“新富”甚至还購買小貴族的特許狀。當財富跟着交通的改進和良好警察制度的傳播而獲得增加的時候，城市富商的住宅，在宏偉和華麗方面，賽過封建主的別墅了。

的確，在聖路易時代，法國是很繁榮的。公平的稅率、良好的貨幣以及建造港口和開辟市場這一類為鼓勵商業所採取的措施，可合併說明這個繁榮狀態之原因。而當時代歷史家的一致論斷，

也証明了这点。資產階級已显出那种夸张的、聞所未聞的奢侈风气，这种风气在十四世紀达到了鋪張揚厉的地步。那个时候的禁止奢侈的法律，指斥資產階級的奢侈作风。“法律规定：資產者，至少須有一千‘都尔鎊’的財產，才能穿着毛皮或栗鼠毛皮；使用馬繮或穿踢馬刺”。法律还规定：他們的妻子所可拥有的衣服件数，应以他們的財產数量为比例。但是，不管它的外表如何，这项命令的制定与其說是由于要以服装的差別来維持社会等級，不如說是由于要貫徹一項虛偽的經濟理論，就是，实施私人節約可使國庫变为富裕。

总之，十三世紀的法国比十二世紀的法国，更进步、更有秩序。一个有學問的佛罗伦薩人，布伦尼都·拉提尼，在游历法国时，贊賞法兰西島地方上沒有围墙的領主花园宅邸，兩側附有花园而周圍繞着和平农民的田庄。在那个时候，所有巨大城堡，几乎都是王家堡垒，即王家权力的卫城，不复是强盜男爵的住所了。在有些場合，城堡虽然还是留在封建主手里，但它們已象拔去了牙齒的巨龙那样。后来几世紀的法律家，把路易九世美化为封建主的仇敌，絕對专制王国的締造者；专制王国在他們的目光中，是法律和秩序的同义語。这项见解是完全非历史性的。法王本身是一个封建貴族，而且在王国中是最高的封建貴族。他从来没有攻击过封建制度，但他从来没有容許过封建制度的过度地方。他认为：政府是一个严格管理的封建行政的組織形式。为了实现这种观念，他把当时代的两个最严重的社会禍害連根拔除——私战和司法决斗。他使王室权力战胜了封建权力。

圣路易的一项最賢明命令，是关于规定谷物、葡萄酒和食品的自由貿易；这项命令妨碍了封建制度的排他性的狹隘利益。法王作出很多措施来保持食品的便宜价格。法王增加了市場和市集，并用警察来保护道路。为了保护小葡萄园主，他命令：农夫到市場

去出售自己的葡萄酒得免除通行稅。1247年，國王又命令執行吏去調查那些因遭受非法剝奪金錢或產品而喊冤的人們，並允許當場給予賠償。另有一項命令，使地方上土地所有者負責維持道路和保護旅行者。1254年，他命令執行吏，不得扣留役畜，除非是為了公共用途。他還制定了一個賢明的森林管理制度。國王還有一項有意義的規定，就是，指令王家調查員去調查各省內的老人和穷人，並以公費來贍養他們。

城市也感受到王室的壓力。到了1250年，城市的英雄時代已經過去。在中產階級中，富裕家庭已獲得對市政府官職的世襲控制權，並成了政治寡頭和社會貴族。由於經驗不足、各據一方的野心和腐化，在一世紀中，許多過去“良好”的城市陷於破產。城市財政，到處都受到破壞。對於它們，法王使用他的管理權和徵稅權來進行干涉，引用當時的一個法學家的話，“象法院為一個未成年嗣子指派一個監護人那樣”。所有這種對封邑和城市的王權的加強，是有利於貿易的，因為貿易由於和平、國王貨幣和度量衡的管理而獲益。1256年的“偉大法令”迫使各城的市長同四個仲裁員（長老）在聖馬丁節（11月11日）前一日來到巴黎，並隨身攜帶城市的收支帳目，以備王室稽核。

1254年，鑑於巴黎警察力量的不足——它包括二十個乘馬警察官和四十個巡邏警——法王使用了“行業守夜人”來補充；這種守夜人，是從行會得來的城市警察隊，每個行會，各服務三周。兩支警察隊，都是受巴黎商會會長的管理的。

的確，正是在十二和十三世紀的整個時期中，有大批關於法國的戰事證據，可是法國商業的增長抵消了象有些作家所描寫的混亂景象。所有這些衝突，是親屬間為了爭奪遺產而引起，帶着單純的家族紛爭的性質，其中受苦最深的，是參加的當事人。按照長子繼承法，幼子是无分享遺產的，至多從長子獲得一些恩賜；這項

法律的传布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家庭冲突。一个儿子或几个儿子往往起来反对父亲，为的要迫使他在死前把他的财产分给他们。封建爭訟时常达到极度而成为战争，因为按封建制度的逻辑，在极端情况下，附庸对領主的反叛或領主对附庸的镇压，都是正当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低估这些爭斗的后果，也必须予以适当的評價。在領主和附庸之間，果然有着激战，但混乱状态会跟着战事解决，即告終止。要不然的话，当参加者在一系列小战役中弄到筋疲力竭的时候，混乱也会结束的。这些冲突，是个人間的矛盾或集团間的决斗。在战争的日子里，属于斗争双方农民的田宅、牲口和谷物，都被尽情地破坏，而这些农民的生命也有遭受屠杀的危险。但大封建主和国王的高压手段限制了这类破坏行动的范围。憤怒的交战者必定要在彼此之間打到底；但他们不能牺牲一般社会，并且不能在战斗中破坏不隶属他们的其他农民的财产。有一个博学的法国历史家，谈到腓力·奥古斯都統治时写道：“在那个时候，战火弥漫全国，这几乎成了一种永世不断的灾难。”^① 当他說这句话时，他忘了当时的冲突是具有个人性质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史料可以証明：在法国，大体上說来，当时不仅国王直接統治下的各省，而且許多其他封邑是享有和平与繁荣的，而这些封建爭执未曾严重地扰乱过公众的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也有資料，可說明私战的减退。在十二世紀后半期以及在整个十三世紀里，我們看到馬上比武成为风行一时的时尚。这种尚武的游戏，对好战的貴族來說，是一种慰藉，因为他们觉得和平力量已重重地压住了他們的手，所以企图使用模拟真正战争的激烈行为来消磨沉悶的时间。《基云壮士歌》长篇紀事詩的作者，以几千行詩句来刻划了他詩中主角在馬上比武方面的成績，并

^① “la guerre était alors, sur presque tous les points du territoire, un fléau à peu près permanent.”

补充說：“我不能开始列举所有这些比武情况，因为几乎每隔两周在这块或那块地方，总是有着一次比武的”。教会之所以譴責这种激烈性的娱乐，与其說是因为其中表现出野蛮性和瀆神性，不如說是因为其中有着不可分离的豪賭行为。但是，国王和大封建主把它們看作一种軍事訓練，而予以贊成。也許他們很銳敏地看到：如果封建制度的战斗精神不給予这种形式的发泄，它将表现在更坏的战斗形式上。所以，馬上比武是真正有利于和平的維持。而且，在这封建盛世的两百年中，我們看到許多貴族发展了爱好和平事业的品性。他們成为紳士式的农民，或者重視书本知識；他們搜集图书，并爱护浪漫詩人和历史家。

在十三世紀，法国农村的物质进步和繁荣状态，并不比城市情况有所逊色。农奴制度在徐徐衰落。在諾曼底，如上文所述，这制度甚至在十一世紀已經消逝。到了十三世紀中期，在波亚图和郎基多克的大部地区，农奴制度已經过了时。教会大多頑固地墨守农奴剝削制度——而它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就是，結果它遭受了民众的反抗——但自由地和租种地制在很多地区內已在流行着。清除森林、开垦沼地、建立新村庄和寺院田庄、使用泥灰岩作为肥料、改进围籬、挖沟和排水的方法、推广三圃制（如果我們可把阿柏塔·馬格那的一段难懂的話作为三圃制解释），这一切都可証明法国农业和乡村农民状况的进步。蒙斐拉侯爵曾从东方帶回来一种叫做“薩拉晋”的小麦。风車磨坊也是从东方輸入的。最早提及它的时期，是在1105年。因为有一时期，农民曾热烈欢迎这一新机械，认为从此可摆脱了領主的磨坊禁令。但是，当农奴在教会土地上建立风車磨坊以图避免磨坊稅的时候，塞勒斯泰因三世在1195年下令风車磨坊也須課以什一稅。

第十九章 霍亨斯陶芬德意志 (1125—1273 年)

法兰德斯和低原国家

霍亨斯陶芬朝(1125—1250 年)統治下的德意志,和其余的国家相同,在十字軍时代,就物质文明說,获得了巨大进步。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向东方移动而产生的貿易刺激,但大部分則是由于德意志本身內在的有机性的和有力的因素,而和十字軍的影响无关的。

关于德意志进步的主要証明是:(1)人口的增加;(2)萊茵河和多瑙河地区的德意志旧城市的复兴和新城市的倍增;(3)市場、市集和通行稅的增加;(4)貨幣經濟的空前发展;(5)工业的发展和行会組織的传布;(6)德意志和意大利貿易关系的大增;(7)在国外和香宾市集,和法兰德斯、英国、斯干的那維亚与里窩尼亚的經常貿易联系的建立;(8)在德意志較老的省分內土地价格的提高;(9)森林和沼澤地面积的漸次縮减;(10)东方边境上侵略性的扩张并通过征服或驅逐原住在那里的斯拉夫人而占領“新东方”以及殖民。

所有这些事情都指出了日耳曼人的大规模的物质上的活动和不懈的努力。

关于人口增加的主要証明,在于城市生活的日益活跃以及西德老区的剩余人口不断流向东方新地去,同时对于老省的生产力也沒有明显的損害。德意志的人口可能从十一世紀的五百万至六百万人增加到十二世紀的七百万至八百万人。

科伦在十二世紀赶上馬因斯,而成为德意志的最大城市。在

南德，累根斯堡是最大城市，虽然奥格斯堡与纽伦堡同它还在竞争。在老德意志区各地，萨克森或萨利安时代所建造的古老城垣，对人口来说，变得太狭窄了，因而被拆除，并另造了扩大范围的新城垣。在莱茵—多瑙河地区诸省内，差不多每个城市经过两次这样地扩大，一次在十二世纪，又一次在十三世纪。1281年，科伦的城垣有六十五座城堡和十三座城门。这种扩展，是一种城市聚合的扩展，就是说，城市起初合并了那些环绕老城垣兴起的郊区，然后再合并四野的村庄。在德意志许多城市里，甚至街道的名字和地方的名称还显示出中世纪这种扩展的痕迹：如有些“环”形结构内街的名称（例如，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城内）这些街道是建造在旧城垣遗址上面的，还有象保留“城垣街”、“城塔街”、“老市场街”这一类的旧名称。有时，甚至有一座古老的中世纪城塔的遗迹，尚未被破坏，而依然屹立，作为对古老情景的沉默证人。关于城市成长的另一个证明，是在这两世纪中存在着改组教区的一般趋势。由于城市扩展和扩大城墙的过程，不仅有新教区并入了城内，而且城内的老教区以人口的增长，常常需要重新划分并建立新教堂。的确，在城市内那些创建于十二和十三世纪的教堂的数目，本身就是关于这个时期德意志城市发展的一个显著的历史证明。

十三世纪之前，在德意志城市内未曾有过市民法团的出现。诚然，“市民”（Cives）和“堡民”（Burgenseses）这两个词汇，只在十二世纪才得通用。其中区别是：前者是“城市”的居民；后者是“城堡”的居民。所有商人、手艺人或牧师等居民不是包括在“市民”，便是包括在“堡民”的名称之内。但在城垣扩大以后，“市民”和“堡民”之间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城内市场捐税的激增和水陆两路上通行税的增加，当然是跟着这种经济发展而来的。前一项课税的合法性比后一项要大。按理论，皇帝是河流的宗主；他被认作商人和旅客的最高保护人。但

在实践上，皇帝的特权已被封建化的大主教与高级贵族所篡夺而全部失掉。结果，在城市和各级的封建公侯之间，发生了广泛的争夺斗争；这种斗争损害了贸易，并常常酿成地方战争。皇帝罗塞耳二世是在德意志统治者中认真企图制止这种篡夺行为的最后一人。1132 年，他曾恢复下莱茵河上的旧税则，以利乌得勒支城；1136 年他又曾降低易北河上的通行税。但是，他不是经常能够防止封建勒索来保护商业的。莱茵区主教的收入，大多是从河流上和曳船路上所课的通行税得来的。特累甫城大主教也是这样：在科布林士所征收的通行税归入了他们腰包；马德堡的大主教在易北河上拥有三个通行税站。其次，货币使用的增加，也证明了这种繁荣状态。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地使用货币以代实物或劳役来缴付地方税和地租；更大更多地常用现金来进行贸易上的交割。城市档案里，充满着关于货币经济成长的资料。连编年史里也反映了这种变动，特别是圣布雷兴·鄂图的编年史，里面常常谈到金银与货币的。

在工业史上，行会组织的形成和迅速传布指出了一个类似的变更。最早的例子，是科伦的织工行会；它出现于 1112 年而到了 1149 年它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会社。1157 年，在哈勒出现了一个鞋匠行会。到了十三世纪，实际上，德意志城市的整个工业世界，已在行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了。这项发展指出了：庄园工业的崩溃、劳动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移动、新工业制度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行会从它们最早出现时起，就和国外城市里所流行的市民自由之新观念相密切地结合着。科伦城的行会，在 1112 年被编年史家说成是“为自由而组织的”。织麻布业，是奥格斯堡和乌尔穆的最重要工业；织呢绒业，是纽伦堡的最主要行业。凡是属于同一的或有关联的工业工人，都住在城市中专营那个行业的某些地段内。德意志工业的分化出现于十二世纪中，于是，织工行会

再分成为羊毛梳工、布匹修剪工、漂布工、搨布工、浆布工、染色工，等等行会。

现在，如果我们从霍亨斯陶芬朝统治下的德意志的内部经济发展转到它的对外经济史方面，那么，我们也可看到同样活跃情况。德意志在国境外所进行的商业扩展，是很大的。这种扩展除了和香槟市集的接触以外，开始于萨利安朝甚至开始于萨克森朝时代；但在霍亨斯陶芬朝时代，这项商业在伦巴第、法兰德斯、英国、波罗的海地区和斯拉夫边境上获得了空前的巨大规模。

在十字军开始后不久，威尼斯人从德意志皇帝，尤其是从罗塞耳二世(1125—1137年)，获得了商业特权。但这些特权，是适用于意大利王国内，而不是适用于德意志境内的。直到十字军的商业影响显然可见的时候，意大利城市才开始积极地向阿尔卑斯山外活动。在这以后，德意志城市，如奥格斯堡和纽伦堡，就欣欣向荣。

虽然腓特烈一世对米兰和伦巴同盟城市的长期战争一定会使跨越阿尔卑斯山商业受到扰乱和损害，但有资料，可说明德意志和意大利之间的商业关系还在继续。到了1127年，意大利商人确曾出现于法兰德斯；他们一定会越过阿尔卑斯山，下行莱茵河；他们的活动范围可能已伸入下德意志的城市，除非所传述的常到哥斯拉尔、喜尔得珊、布伦斯威克等城市之“外国商人”，是佛来铭人而不是意大利人。至于南德城市，意大利商人在十二世纪中期以后，一定是常在那里出现的。1153年，罗地商人在君士坦士向腓特烈一世请求他的保护来防止米兰的商业虐政；他们已使用德语来陈述他们的理由。累根斯堡似乎在十三世纪之前，已经有一块意大利商人的永久居留地。

甚至具有更大意义的，至少更为新奇的，是关于德意志商人在十二世纪进入意大利之资料。在1128年的热那亚通行税簿册上，

登記着那些携带成包的羊毛和麻布的跨越阿尔卑斯山商人。这批人也許是从萊茵兰或法兰德斯来的,因为那里紡織工业正在发展。1168 年科摩和米兰所簽訂的一项条約里,双方允諾彼此不得阻止德意志商人到对方的市場去。在那些和米兰敌对的各城市之間所簽訂的 1193 年一项协定里,提及了跨越阿尔卑斯山商人;而这些商人无疑是从德意志来的。1209 年的一项城市法规指出:科摩市民常常为了跨越阿尔卑斯山商人作保人。1220 年,有一个德意志商人在克里摩那和斐拉腊之間被劫掠;两年以后,又有两个里尔城商人的商品被劫,其中包括里尔、布魯日、波未出产的布匹和里尔出产的短褲。后一项事件是在科摩附近发生的,因而科摩城付給了受害商人九十七鎊賠償費。1228 年通行稅簿册上把德意志商人和法国及許多意大利城市商人写在一起。值得指出:在十二世紀德意志和威尼斯之間建立了商业联系。但是我們不能断言,这项发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因为在伦巴第战争的时期,伦巴第和德意志的貿易部分地轉移到威尼斯呢,还是因为威尼斯是到“圣地”途中的一个便利的上岸港口和輸入利凡得商品的一个重要地点呢?虽然沒有記錄可資証明,但无疑的,德意志商人早已到过威尼斯。第一次确切提到那个著名的“德意志商站”,是在 1228 年,但德意志商人早在十三世紀之前在威尼斯已和德意志香客們分享了这类的居住区。勃伦納山路,是奥格斯堡人和南德其他商人所共同使用的通路。

在整个中世紀时期里,虽然北意大利始終站在西欧商业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北欧国家的經濟发展的增长,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北海和波罗的海对北欧的关系正象地中海对南欧的希腊和羅馬語系地区那样。也象南欧有伦巴第和威尼西亚作为它的貿易中心点,北欧以法兰德斯及其他附近封邑,即大約今天的比利时,作为它的商业的集散中心点。这些“低原国家”成为一个封建

省分的集合體而插入德意志、法國和北海之間。法蘭德斯伯爵領的佛來銘部分以及不拉奔和黑諾特，是隸屬德意志和“帝國”的。但這些地區早已想望取得大量的獨立地位，而文化上也是一個很特殊的實體。大概說來，萊茵河極下游處的河南各省，是屬於瓦倫人的（法人的）或佛來銘人的地區，而河北的各省是屬於荷蘭人的地區。前一类地區，包括法蘭德斯（它占有帝國的一部分領土和法王國的一部分領土）、黑諾特和不拉奔。后一类地區包括佛里斯蘭、西蘭和荷蘭三個伯爵領。在瓦倫各省里，文化主要是法國形式的，在其他各個省里，是德意志形式的。在這些地方的公侯中，法蘭德斯的伯爵是最有勢力；他的勢力與其說是由於他的領土的廣大，不如說是由於他的財富的雄厚。早在 1150 年，一個歷史家已把法蘭德斯描寫為一個“人口稠密的地方”。歐洲這一部分的肥沃沖積地很早就已吸引人們來佔據了。這一塊地方是由萊茵河、謬司河、謝爾德河、索謨河形成的；而這些河流就在這裡匯合，幾乎平行地注入北海里。如上文所述，這些省分有一時期曾是喀羅林朝王室領的中心。這裡，寺院從早期起已經非常興旺；在寺院牆垣的周圍興起了密集的人口，從而在十一世紀就已出現熱鬧的城市生活；又在十字軍時期，由於商業和工業受到了刺激，城市人口增加起來；加之，在歐洲這一部分的領土上，河流縱橫交叉，沿海港口又多，四面八方都可達到；這種非常便利的交通，更使得它欣欣向榮。1128 年布魯日居民在反對伯爵威廉·克力都的控訴書里，清楚地指出：在那個時期法蘭德斯的商業，主要是對外商業。他們說：“我們被關閉在我們的地方範圍之內，我們沒有通貨，沒有外國商人來到我們這裡，所以，不能以我們的所有以易我們的所無”。

我們可把生產的兩個部門——工業和商業——分開來講。根特是工業中心。1300 年時，那裡有五十種不同的行業。布魯日，以立士運河通海，是主要的商埠。

佛来銘的主要工业，是紡織业。根特专门織造呢絨。伊泊尔是麻布生产的中心。几乎每个城市有着自己的一种特殊的織品、一种特殊的式样、一种特殊的染色，而且有許多中世紀織品的名称，是从这些地方的名称得来的。“阿拉斯”挂帐是从阿拉斯城得名；“喀姆布里”白葛布是从喀姆布萊城得名；筏侖西恩織造“筏侖西”絲毛緞。菱形花样是来自伊泊尔的；有一种叫做“琅”的細麻布是从琅城得名的——琅城虽是一个法国城市，但近于法兰德斯；圣奧德立市集曾創造出“俗艳”(Tawdry)这一个詞；在昔用以指示一种呢絨品质的，但当旧毛絨和长羊毛相渗杂以后，这个名詞就失掉它的原意了。在低原国家中，有些城市对制造金属器具有特长，特别是列日长于制造鉄器，第南特长于制造銅器，法文“制銅业”(dinanderie) 这一个詞就是从第南特(Dinant)城的名字得来的。

萊茵河是进入法兰德斯的极自然的通道，但是在那里，地势平坦，陆路交通几乎也同样便利；这条陆路，从科伦經亚琛、馬斯特立喜(在那里穿过謬司河)、卢芬(位于带尔河的橫渡处)达根特和布魯日。科不林士 1104 年的通行稅表，表明了在下德意志和法兰德斯之間的商业来往情况。1173 年，皇帝腓特烈一世，由于法兰德斯伯爵的申請，在亚琛和杜易斯堡建立了市場。

布魯日完全是一个商业城市，并成为北欧的大中間商。我們可看到 1200 年左右关于列举布魯日进口貨物的一段出色文字：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来自各地而汇集于布魯日的每一条商业路綫，我們就可熟悉十三世紀国际貿易的主要特征了；这些路綫是：不来梅的啤酒和汉撒城市的波罗的海产品，迂回繞过島屿，渡須德海，并为了避去萊茵通行稅站，再穿越錯綜交叉的荷兰水路；来自英国的羊毛、毕伽第的布匹、洛瑟尔的葡萄酒和食盐、巴巴利或西班牙的馬皮和羊皮，是由布罗溫斯商人运到香宾市集来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运输东方貨物的大商船，終于冒着海上的风险而来，这就会变成了与十三世紀国际貿易的主要特征分不开的标志，……英国在国王約翰时代和根特与伊泊尔貿易的中断，使布魯日能够建立它羊毛貿易的中心

地位；同样，后来法国和法兰德斯陆路上的混乱情况，帮助它接替了香宾市集的地位，作为北欧和地中海之間的主要联系环节。但直到十四世紀，布魯日才基本上成为一个国际商埠，而它的市民才成为在外国交易中的純粹中間商：而这批外国人的恒久居留地的名称，就成了城市內所有的街道和地区的名称……布魯日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形成，是产生于它的市民积极参与商业的活动：主要为佛来銘織工輸入大宗羊毛，即佛来銘-英国的和西班牙的羊毛，并輸出大宗法兰德斯的呢絨布。^①

在黑諾特和不拉奔，几乎只有农业人口；它們的主要生产是：牛乳制品、谷物和牲畜。安特卫普位于不拉奔境內謝尔德河口，直到后来十五和十六世紀，才在商业上占得重要地位；它是在布魯日衰落之后兴起来的城市。

上文已提过，“低原国家”人口的稠密，对于向外移民有重大的影响。在十二和十三世紀，佛来銘人和荷兰人殖民于“低地”和东德意志的土地上。很多佛来銘人还迁移到英国去；在产羊毛的英国，他們的織布技巧受到重視。洪水和海水的泛滥，也是促使这种外移的原因。几乎在每个春季里，萊茵河、謬司河、謝尔德河以及許多小河，由于上游洪水泻入而泛滥成灾。但海水的泛滥是最大的威胁。的确，在最易受灾的地方，建造了堤壩，以补充沙岡的天然屏障。可是，在大风暴里，这些堤壩常被冲破。在編年史里有很多关于洪水的悲惨記載，如 1135、1156、1164、1170、1173 年的各次水灾。在十三世紀中，計有三十一次。須德海和帖克塞耳島是由洪水形成的。值得注意：大水灾和荷兰人与佛来銘人的向外移殖，是在同一时期出現的。此中联系，是显然可見的。

佛里斯兰和荷兰的商业的重要性比萊茵河三角洲南部諸省的商业，要小得多。大部沿海居民从事于青魚和鱈魚的漁业。在十二世紀，萊茵河三角洲上的水道，实际上和它今天的水道一模一

① 《英国历史評論》，第 24 卷，第 774 頁（一篇書評）。

样,但它由于同海上貿易与内地貿易的联系,而获得了重要地位。只有在一幅大地图上,才可标出三角洲上的无数支流的名称。在左边,瓦耳河和勒克河从主流向西延伸而注入北海。在右边,伊塞尔河和維支特河向北流入須德海。不可能从海洋进入北面的海灣;如果要达到那里的話,必須先进入勒克河,而后由此向北行。

安亨是一个重要点,位于伊塞尔河从萊茵河主流分出的地点上。在它下面的很近地方,是烏斯特比克和罗比特,属于格尔德伯爵的領地。这两地是通行稅站。所有交通運輸被迫經過那里,因而对于这些勒索当然有人要反对的。在 1220 年的法兰克福議会上,曾特別提出抗議。杜易斯堡、多柴姆、安亨和莒特芬的重要性早已超出它們的地方范围,并从十二世紀末期起,外国商人慣常来到那里。1190 年的一項文献里,談到莒特芬;它位于伊塞尔河畔,安亨的北面。到十二世紀末期,莒特芬被认作貿易和商业的中心。从 1200 年格尔德伯爵和烏得勒支主教之間所簽訂的一項通商条約里,可看出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和它貿易联系的范围;条約规定:在莒特芬所鑄造的貨幣,不得和烏得勒支所鑄造的相同。烏得勒支位于維支特河畔;它在萊茵河北部支流中是最东的一条河。这里有一个通行稅站,早在十世紀已經有人提及过。它是沿海的魚类和食盐,內地的葡萄酒和谷物的轉运通路。在烏得勒支和科伦之間,有着經常的貿易,葡萄酒是最重要的商品。只有一部分葡萄酒是在当地消費的,因为烏得勒支已成为运往英国和北方去的葡萄酒之中心市場。除了葡萄酒外,谷物是河流運輸中的一項最重要的东西。三角洲地区是以养牲畜业出名的,但因为这里不能出产谷物,它必須从南方运入谷物。象关于葡萄酒貿易那样,烏得勒支成了谷物貿易的中心,这些谷物是从杜易斯堡的上面和下面运来的。食盐貿易特別是由佛里斯兰商人經營;他們經過須德海运来食盐。他們的最重要城市,是斯达伏伦,靠近須德海的最狹的尖

端上。雖然沒有文獻可證明在這個城市和烏得勒支之間存在着什麼貿易關係；但似乎有理由可設想：它們之間是有貿易關係的，因為這是佛里斯蘭的最大城市；而它的商人還常常遠至萊茵河上游經商的。而且，早在十二世紀起初二十五年中，亨利五世對這些在德意志境內經商的商人，已經給予保護。

現在，我們來談三角洲的左邊港灣。這裡，瓦耳河在商業重要性上超過勒克河，正象北面的維支特河超過伊泊爾河那樣。找不到什麼資料可證明：在勒克河上存在着什麼商業生活。另一方面，瓦耳河畔分布着一系列貿易站。在瓦耳河左岸上，距它從萊茵河分出的地點下面不遠處，是尼謨威根。這是一所關稅站，對所有從三角洲這一海灣運入的貨物征收捐稅；但關於它在這一時期的重要性，我們還未能相當確切地知道。提爾是瓦耳河畔的另一個城市；從第九世紀起，它同北德意志最重要城市並列為一個征收通行稅的地點。然而，在十二世紀，那里的海關遷到河流上面的很遠地方，即萊茵河畔的凱撒威茨城；那曾使科倫城大不高興。關於提爾商業地位的資料，我們所能搜集到的很少。可能在十一世紀初期，提爾是尼德蘭的一個主要貿易城市，但在 1134 和 1174 年間，它的商業重要性已經下降。由於這個緣故，通行稅站移到凱撒威茨城去。

瓦耳河是左邊三角洲地區內的主要水道。從十二世紀中期起，甚至在這以前，商人們曾利用這一條路，來到中德意志和上德意志。木材運輸是一個主要項目。木筏從上萊茵河順流浮下，遠達科布林士，但木筏究竟在何處拆散，則未能知道。魚類貿易，在重要性上也許僅次於谷物貿易。三角洲是魚類運入歐洲的大門。那些載着葡萄酒下行萊茵河而來的船隻，在回程上滿載咸魚回到科倫城去。

所有德意志和英國之間的貿易，自然而然地要通過法蘭德斯

或荷兰的。在前面一章里，我們已談过：早在埃塞尔勒德时代(978—1016 年)，德意志商人在英国已被給予王家貿易特权。他們被称为“皇帝的商人”，以示差別。“这种巨大特权似乎是：他們除了某种例外情况得在他們的船上做买卖交易；那无疑地就是使他們免繳其他商人所应負担的某种捐稅”。因为“諾曼征服”促进了英法貿易，所以它也同样加速了这项英德貿易。曼茲柏立的威廉，十二世紀的一个英国历史家，談到过在他的时代德意志商人在伦敦所占的貿易上重要地位。罕亭頓·亨利 1155 年著书时也說：英国和下德意志的貿易，是“广泛”的，并指出：英国的出口貨包括有鉛、錫、魚、牲口、黑玉、尤其是羊毛。反过来，德意志对英国所輸出的，主要是銅、白銀和鉄。

1157 年，英王亨利二世曾給侨居伦敦的德意志商人的行会或商会以广泛特权。文献里清楚地談到科伦人的“住所”。对于这些特权，后来还由理查一世(1194 年)、約翰(1213 年)、亨利三世(1232 年)和爱德华一世，加以批准或扩大。伦敦的德意志人“住所”或“鋼場”，是一个重要地点，就是，一块用墙垣圈围着的地区，內有几所貨棧、一所秤量所、几幢宿舍和一所教堂；在本质上，它是和在十字軍时期意大利商人殖民地在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城、叙利亚港口以及“圣地”所建立的商站，頗相类似。伦敦和科伦之間的貿易，是这项过海貿易的核心；但也有記載，說到有来自其他萊茵城市的德意志商人；他們来自律伯克和不来梅，不仅在伦敦，还在約克、赫尔、波斯頓、紐喀斯尔和林尼經商。

在腓特烈紅鬍子写給亨利二世的一封信里，他祝望英国和德意志間商业上的安全和自由。1176 年，律伯克商人被免除了“船难法”的約束。理查一世，在他被俘而获释后，經過科伦返国时，曾賜給那里的商人以补充权利。他們得免繳通行稅；他們在每年为他們在伦敦行会会所繳付两先令費用的条件下，得在英国所有的市

集上进行买卖交易。曼茲柏立的威廉以下面一段話来总结十二世紀英国的商业关系：“在高貴的伦敦城里，市民的財富很充足；各地商人特别是德意志商人所运来的貨品，充斥市面；因此，当英国遇到歉收而发生饥饉的时候，在那里所采购的食粮反而比在任何別处要便宜；外国商品是經過著名的泰晤士河而运入伦敦城的”。新堡的威廉写道：曾有一个德意志貴族說过这一句話：如果皇帝亨利六世曾知道英国那么富饒，他将迫使它为理查一世付出大得多的贖身金。約翰在 1203 年写給科伦市民的一封信里，允許他們：只要繳付他們祖先所付的慣例捐稅之后，他們得携带他們的商品自由进入他的領地內。这似乎表明：在理查一世被俘以后，科伦和英国的貿易曾一度停止过。1220 年，科伦商人在“鋼場”重新开始营业。1230 年，亨利三世还准許布伦斯威克的鄂图的臣民在他的王國內經商。1257 年，当康华尔·理查被选为皇帝以后——也許是由于他的神話般的財富而当选——他为律伯克市民从亨利三世获得另一张特許状。在同一年里，由于教皇貪婪所产生的苦难，康华尔伯爵的財物向德意志的輸出以及由于饥荒所产生的更大灾禍，这一切造成了伦敦的一次粮食危机；而这危机因为从德意志来了五十只运谷大船，而得告解除。这样看来，在早期金雀花朝时代，英国和德国間的貿易关系，已經建立得很好——不是通过英国商人的而是通过德意志商人的主动。当时，汉撒同盟处在萌芽时期。

霍亨斯陶芬王朝諸王，几乎对于十二世紀所有德意志商业和工业的內外扩展，貢獻很少。在这方面，連封建公侯也是漠不关心的。这发展差不多全部是由于商人和制造家自己的企业活动所引起。的确，就腓特烈(紅鬍子)來說，他对他的統治时代的真正性质，茫然不知，所以他对有些最重要的变革，是敌对的或冷淡的。当时的德意志封建主，不論是世俗的或教会的，也是如此。最出色的例外，是薩克森和巴伐利亚公爵亨利獅子；他的賢明治理，使他

的領土成为繁荣的出色榜样。但大致說来，在十二和十三世紀时期封建德意志的物质发展，是与政治权力与政治利益无关的。可怜霍亨斯陶芬朝諸王缺乏那种敏感的經濟理解力，这是他們的同時代人：法国的、安吉文的和諾曼-西西里的統治者的特色。在他們中間，竟然沒有一个人曾維持过一种建設性的經濟政策。

德意志的經濟状况，很可闡明霍亨斯陶芬时代的两个敌对政治派系之間的大冲突。卫尔夫党是贊助市民以及由市民所提倡的商业和工业革命的。另一方面，霍亨斯陶芬或基伯林派，即帝国派，对老封建社会秩序的改变，是敌对的。腓特烈一世对德意志城市的市民政策，和他对伦巴城市的政策，同样地頑固而无远见，幸而終于同样地毫无效果。1163 年，他对馬因斯城垣的破坏，使人回想到他对待米兰城市的殘暴行为。对德意志工业來說，幸而那里的行会尚未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足以惹起皇帝的憤怒，因而它們未曾遭受过騷扰。

霍亨斯陶芬諸帝，特別是腓特烈一世，对市民阶层抱有显著的偏見，这些偏見，鼓励了德意志封建主几乎到处占夺现行的通行稅并課征新的通行稅，尽管有腓特烈一世的豪語：萊茵河是一条“王家街道”。1155 年，馬因斯、法兰克福和班堡的商人徒劳地提出抗議，反对美因河上所勒索的那种“新的、无先例的、不合理的通行稅”。

特許狀汇编，說明〔皇帝〕曾以通行稅慷慨賜給（似乎近于任意发給）主教、寺院与伯爵……在这整个时期在全帝国所征集的通行稅中，可能只有微小部分得进入皇帝的錢柜。到了十二世紀，也許所有公侯們都已占有这些权利……1157, 1209, 1235, 1290 年，公侯們宣布非得他們的同意不得課征任何新的通行稅……为了保障他們大量进款的利益，公侯們和皇帝联合反对曳船路上搶劫的小股匪徒。接着公侯們又进一步互相联合来掠夺皇帝本人了。①

① 裴雪：《中世紀帝国》，第 1 卷，第 278—279 頁。

然而，尽管有这些阻碍的因素，但毫无疑问，在霍亨斯陶芬朝时代，德意志的商业和工业是稳步前进的。后来，如在下文将谈到，城市联合在一起设法遏阻上述的弊病。

在这时期，只有一个德意志公侯，在自己的领地以内是庸中佼佼，贤明地奖励了商业和工业。这就是亨利狮子（死于 1197 年），即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公爵。作为公爵，他仿效了他父亲亨利傲人在巴伐利亚所树立的榜样。因为累根斯堡与巴苏的市民，在他父亲和康拉德三世斗争的时期中，曾坚定地支持前者，而这些市民所希望的，莫过于和平秩序和工商业的繁荣。当亨利狮子继承他父亲的领地以后，他在巴伐利亚继续施行他父亲的政策，而把这同一宽大的经济奖励政策也施行到萨克森去；这一块领地是从他母亲方面承袭而来的。他在伊萨河畔建造了慕尼黑城；并在河上建造了一条桥；这一个新城吸收了一部分经勃伦纳山路而来的意大利和东方贸易；后来它作为西南德意志的市场，和奥格斯堡、累根斯堡和巴苏这类的旧城市相竞争。亨利狮子还看到那为其他公侯未曾看到的德意志境内这项市民运动的重要性，而且他也投身于运动内。卫尔夫派建立了布伦斯威克、格丁根、闵登、诺德豪森、爱因柏克，并大大地发展了瑙姆堡和律伯克。甚至科伦，虽然从来不是一个卫尔夫或萨克森的城市，但在卫尔夫和霍亨斯陶芬的党派冲突里也是同情于卫尔夫派的。它和哈次山地区的哥斯拉尔和蓝美尔斯堡的金属工业，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萨克森的腹地就不是这样了。

在亨利狮子的统治下，萨克森城市的工业发展和它们的商业繁荣，携手并进。不仅粗工业而且精细艺术都受到刺激。他的首都布伦斯威克，由于它建筑师、艺术家、金匠、银匠、木刻匠、石刻匠和象牙雕工的劳作，成为一个德意志的佛罗伦萨城。亨利狮子在他的办事方面，不一定是公平的，但对抓取经济机会他从来是又聪

明又銳敏的。

关于波罗的海的商业，丹麦人几乎垄断了約两百年之久。丹麦商人在斯德丁、服林、但澤，在皮恩河、奥得河和維斯杜拉河的河口，在斯拉夫居民中間，建立了居留地。亨利獅子雄心勃勃，想取丹麦人的地位而代之，以图在波罗的海地区內建立德意志的商业霸权。我們可以恰当地說，德意志在波罗的海地区內有成效的商业活动，是从 1158 年亨利獅子占夺律伯克开始的，律伯克位于伏赫尼茨小河內的一个島上。这块地方一度曾是斯拉夫人的一个坚固的炮台，但在 1143 年霍尔斯特頓的阿多夫伯爵已在那里建立一个霍尔斯特頓人的乡鎮。这个新城市就馬上同巴多威克，即查理曼的老貿易站，开始竞争；除了那些不在亨利統治下的汉堡和不来梅以外，它是德意志在极北地区的一个主要商埠。因此，亨利在律伯克附近，建造了一个新城市，以期和它相竞争；并以自己的名字称之为“獅子城”。但是这座新城市也象巴多威克一样，衰落下去。亨利貪得无厌，盛气凌人，于是又向霍尔斯特頓的阿多夫要求把律伯克一半归己；当这一要求被拒絕以后，他就强制关闭了那里的市場。敌对行动接踵而来；1157 年律伯克被薩克森公爵化为灰烬。当霍尔斯特頓伯爵拒絕把它重建起来，亨利就占夺了它(1158 年)；他重造了这个城市和它的城垣，建立了一个市場和一所造币厂；并宣布它为所有从丹麦、瑞典、挪威、維斯比来的商品的一个自由港；維斯比位于哥德兰島上，在那个时候是和俄国諾夫哥罗得进行貿易的基地，再通过諾夫哥罗得与基輔和黑海、拜占廷与东方貿易相联系。亨利獅子在取得丹麦的窩得馬尔的勉强帮助之后，对波罗的海上的海盜，着手剿灭；因而那个海上各島屿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可以安居的地方了。

关于亨利獅子行政上的若干其他特点，应略为提一提。他是一个伟大的公路和桥梁的建造者；他在河流上筑造了堤壩；他排干

了大片沼澤地，移入佛來銘人和荷蘭人居住，因為他們慣于那種土壤上勞動。

1181 年，公爵和皇帝衝突發展到最尖銳時使薩克森遭到破壞；1190 年霍亨斯陶芬的權力和政治利益的中心遷到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去；1198—1214 年間德意志卷入內戰和自相殘殺的戰爭里；這一切，未曾使全國的商業和工業遭受到嚴重的損害，象所可設想的那樣。因為在那個時候，德意志城市——這是些比鄉村有更大物質繁榮的所在，——已是由城垣圍繞的自由城市，並已有力量來捍衛自己。很少城市遭受嚴重的災難，除了哥斯拉爾以外；該城在 1206 年被鄂圖四世洗劫，因為在他和斯瓦比亞的腓力爭奪皇位的衝突里，它站在後者方面。在律伯克的亞諾爾關於這項災難的記載里，我們可看到德意志城市在十三世紀的商業發展上所已達到的高度水平。他寫道：“在八天之間，那非常富饒的城市遭受了破壞；街道和房屋都被搶劫一空；最富的市民成為俘虜。胡椒和香料數量之多，以致可車載斗量，分積成堆”。

在這多事之秋，中世紀德意志開始了那個政治不統一和封建分裂的漫長時期。皇室的權力，中央政府的權威，已化成幻影。國家的統治權分裂於有勢力的封建公侯和自由城市的市民團體之間，前者中間還有不少主教公侯。德意志由於它貿易的擴展，在國內有着大量現款；但皇室已經失掉對國內財富的徵稅權。鄂圖四世曾夢想課征一種“統稅”，但封建主和城市所享有的獨立與財政的自治權力，實在太大，以致他未能把它付諸實行。他贊助市民來反對公侯的政策，提出得太晚而未能奏效，這兩個階級都逃避了皇帝的控制。皇室已經容許商業、工業甚至土地上的進款滑脫了他的掌握。“只是一種要征收帝國統稅的謠言，已使鄂圖四世的有些最有勢力的擁護人掉頭而去”。霍亨斯陶芬朝曾如此長久地仰仗意大利以取得他們的現款；所以，他們在失掉倫巴城市的統治權之

后，就不能对德意志实行征税，因而力图在西西里搜括，以图挹注亏空。结果，他们既失去了德意志，而又使西西里王国分化为一束互相倾轧的封建小邦和剧烈竞争的城市集团。

在十三世纪，德意志的商业和工业历史，大部是德意志受封建统治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冲突史。这冲突的最严重的根源，是关于征收水陆两路上的通行税特别是莱茵河上的通行税。城市为争取城市之间的贸易自由而进行斗争。封建主从他们地产上的收入，由于十二世纪的经济变革，而日益削减；因而商业和工业上所获得的财富开始接替了农业上所获得的财富，这一情况，还因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入，而更加严重化。这样一来，封建主就尽量课征运输贸易上所能负担的通行税和关税，以求弥补他们地产上所遭受的损失。

“强盗堡垒，急剧地在增加……通行税站的不断增加，本身就已充分表明无政府状态的增长；虽然小贵族也乐于参加减少商人财富的工作，但由此所得的最大部分，则是归于教会公侯的腰包的。莱茵河通行税的盛筵是款待马因斯和科伦的殷富大主教的。”莱茵河在公众间被说成是“教士的胡同”。原来，在萨克森朝和萨利安朝时代的又贤明又有建设性的经济政策是：把从这些通行税所得的进款用在改进并保护航运方面的；而现在，继之以一种自私自利的地方性的财政政策。在霍亨斯陶芬朝后期，通行税站几乎已全部落入莱茵河两岸的主教和贵族手里。税站的数目，是令人惊异地增加着，从十九所增加到六十二所，而贵族和主教还是贪心不足，以致把税率继续提高，有时竟提高到百分之六十。这是一种剥削和勒索的政策，超过了运输贸易所能负担的程度，因而把商业破坏了。

这一情况是早期封建时代情况的重演，就是，每个贵族征收贸易上的通行税，并把自己的封邑疆界变为一种关税疆界。但有一

个不同点: 现在的情况, 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大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权力与独立观念的成长, 大大地严重起来了。在十三世紀, 强盜貴族所搶劫的, 不是穷苦的負販和流动的小商人, 而是一个又富裕又統一的商人階級; 他們掌握着大量財富, 还能以武力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

在城市和封建主間的这项政治和經濟的斗争里注定要产生十三世紀中期的一个伟大而又有建設性的运动; 它对中世紀德意志的商业和貿易史上将具有深远的影响。这就是組織城市同盟的运动。

早在 1220 年时, 在萊茵河中游地区, 似乎已有組織城市同盟的企图。但直到 1226 年, 当馬因斯、窩姆斯、丙根、斯拜尔、奥本海、法兰克福、吉尔恩霍逊和佛利德堡联合抵抗强盜貴族的压迫时, 这运动才产生了效果。馬因斯的西格夫里大主教为此曾向腓特烈二世申訴。代父亲攝政的亨利亲王回复說: 同盟必須解散。城市拒絕服从。它們所站的地位, 和前一世紀伦巴城市所站的, 大致相同。而腓特烈一世的孙子既沒有学到什么, 也沒有忘掉什么。1231 年, 窩姆斯帝国會議正式宣布禁止萊茵同盟; 而在这會議上市民是不得参加的。然而, 由于皇帝和教廷的激烈冲突, 皇帝对同盟, 未能作出任何取締行动。

其他在斯瓦比亚、威斯特发里亚, 連在瑞士的城市, 不久都参加了同盟; 1255 年 6 月 25 日, 組成了一个声势壮大的同盟; 这同盟最后包括有七十个城市, 扩展到整个萊茵河上下游, 包括中德和西德的大部分領土。在取得荷兰的威廉的承认之后, 这些“联盟的城市”(在“和平公約”上它們是这样称呼的) 組織了陆上的警察队和水上的水师队。在巴塞尔和科不林士(摩塞耳河与萊茵河的汇合处)之間, 这条河上水师队計有一百只武装船舶。只有經商的船只, 得进出于那些属于同盟的河上港口; 它們并設立一种“同盟关

稅”即正式通行稅，來維持公共開支。

在這樣建立了沿萊茵河上的安全之後，同盟對貴族所加的專橫通行稅進行了攻擊。1268年，城市從帝國會議，爭得了一項法案：規定取消所有的通行稅，除了根據舊權利所征的以外，並指令拆毀在斯特拉斯堡和科倫之間的一切征稅局。有很多城堡因此被破壞了。但其中最堅固的城堡，即著名的萊茵斐爾城堡，抗拒一切要占領它的企圖；它是在1216年建造，屬於卡次尼倫波根的第特立喜伯爵的。

1253年，威斯特發里亞城市仿效了萊茵城市的榜樣。閔斯德、多特蒙德、索斯特、利普斯大特聯合起來了。有時，只有兩個城市為了相互保護，也組成同盟，象巴塞爾和莫爾豪森在1246年，布倫斯威克和斯塔得在1248年的聯合那樣。1278年，上萊茵河和亞爾薩斯的城市，1285年，斯特拉斯堡、巴塞爾和弗賴堡也都聯合了。

無疑的，在霍亨斯陶芬時代，這些自由城市反映了德意志的最健康和最進步的生活。自由城市的數目，是很大的，至少達一百五十個。以今天的城市標準來作估計，它們似乎是小城市。但它們對當代的影響，和近代城市的社会影響，是不相上下的。它們不僅是商業和工業的集中點，而且它們跟着它們財富的增加，在提倡高級藝術和文學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世紀後期，德意志的建築，主要是城市的和行會的，而不象過去那樣是宗教的建築。在歷史編纂學方面，現在城市編年史開始接替了中世紀古老形式的寺院編年史。

研究德意志的商路和研究意大利與法國的商路一樣是具有啟發性的；然後觀察它們之間的異同點，而這些異同點是由自然資源，首先是由地形特點所注定的。意大利是個狹長的靴形半島，它的軸心是亞平寧山脈，三面臨海，境內只有一條重要的河流即波

河。法国是个大六角形的地区，南、西、北三面濒海；它的全部东疆和中欧相毗連，容易从伦巴第、德意志和法兰德斯进入。除了格罗內河以外，法国所有的重要河流都是从中央流向外圈的，換句話說，象輻条从車軸射出来的那样。法国的重心，自然在塞納河盆地內。政治的法国和自然的、地文学的法国，是完全吻合的。

另一方面，中世紀德意志，是个长方形的地区；可以說，它是由两个长方形部分拼成的，即上德意志或南德意志和下德意志或北德意志。这两个半部由美因河与厄革河彼此分隔着，前一条河向西流入萊茵河，而后一条河通过由平行山脉所构成的自然大水槽向东流入易北河。除了易北河（沿着自然的德意志的长对角綫流的）以外，所有德意志重要的河流都是沿着橫綫和直綫流的。这使德意志的道路地图有些象鉄格子那样；在它鉄条的交叉点上，有城市。仔細檢視地图，就可看出：德意志境內，有五条橫綫的商路，有五条直綫的商路。橫綫道路是：（1）多瑙河流域的路綫，从巴塞尔或斯特拉斯堡經烏尔穆、奥格斯堡、累根斯堡、巴苏、达維也納和布达佩斯；（2）美因—厄革路綫，从萊茵河中游到易北河上游，从馬因斯經過法兰克福、班堡、紐伦堡、厄革、布拉格；（3）科伦、加塞尔、爱尔福特、来比錫、宝承、布勒斯劳的路綫；（4）科伦、多特蒙德、索斯特、哥斯拉尔、馬德堡、柏林、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路綫；（5）科伦、閔斯德、不来梅、汉堡、律伯克、斯特拉尔松得、斯德丁、但澤的路綫。直綫道路是：（1）謬司河路綫，从凡尔登到法兰德斯的根特；（2）萊茵河路綫，从巴塞尔到烏得勒支，实际上是一条三綫并行的路，因为两岸各有一条路，而河流在其中間；（3）从勃勒納山路到波罗的海的路綫，經奥格斯堡、紐伦堡、班堡、爱尔福特、哥斯拉尔、布伦斯威克、汉堡到不来梅或律伯克；（4）从勃伦納山路經慕尼黑、累根斯堡、厄革、来比錫、哈勒、馬德堡到汉堡或律伯克的路綫；（5）从威尼斯經微拉赫、薩尔斯堡、巴苏、布拉格、布勒斯劳到奥得河畔法

兰克福或到但澤的路綫。

在十二世紀，德意志社会結構已和十一世紀的社会結構大不相同了。“授爵权战争”，从皇帝方面來說，是大封建主的叛乱；在这长期的战争里，一大群小封建主乘机树立了势力；他們在自己的城堡里巩固了防御力，并在他們周围的地区，施行了权力；他們想要使皇帝的权力和大公爵的权力同归于尽。这样一来，在政治上，德意志大规模地陷于地方主义和封建分裂主义的状态里——这一情况，正和法国所流行的情况相反。

在有城垣的城市里，市民阶层有力量来保卫自己，反对小封建主的强暴作风。但乡村农民則沒有这种保卫的力量。长期的內战、貧困、饥荒已使德意志大部自由农民阶层降到农奴的地位，甚至在薩利安时代結束之前，已經如此；而在十二世紀兴起的小封建主統治更确认并繼續保持这种状态。可是，按一般趋势說，虽然小自由农陷入农奴地位，而农奴的境遇就更恶化，但也有遏阻这种趋势的抗衡力量。在土地价格上涨的时候，业主之間剧烈地爭取劳动力来清除森林和排干沼地；从而业主阶级中的很多人被迫以宽大条件来吸引移民。而且，德意志城市的迅速增长和易北河外的德意志殖民运动，也促使了农奴状况的改善。劳动力在城市里和边境的新地上，有着那么大的需要；所以，如果农奴担負过重的工作，或遭受了虐待；他会逃亡到这里或那里去的。为了避免丧失他的佃人起见，业主虽不是出于仁慈心理，也須从利害方面謹慎考虑的。所以，农民为領主的服役，逐漸变成有限度的，而且属于半契約的性质；农夫在合理的条件下，得保有他的份地。所以，德意志农民的“艰难时代”倒不是在于十二和十三世紀，而是在于中世紀的末期，就是，在羅馬法的“接受”使他們的状况大大地恶化的时候。

第二十章 日耳曼人向东 扩展和殖民*

有人正确地说过：“日耳曼人在中世紀的大事业，是日耳曼族征服斯拉夫族而向东扩展，从而增添了近代德意志的五分之三的領土。”

在中世紀，存在着两个德意志；应该了解两者之間的差別。它們是：西方的老的封建德意志和东方的新的殖民地的德意志。前者是由属于古老日耳曼部族血統的人居住；保存了羅馬和旧法兰克統治和文化的传统；教会在那里，已是个久已建立的制度，而封建制度和文明在那里也已通行无阻。相反，新的东方的德意志按地理、种族和文化来说，是另一个世界。这是位在易北河下游、薩勒河、腊伯河和萊塔河之外，原来由斯拉夫人和馬扎儿人居住的一片广大地区。

图納教授在美国史上所说的“边境上的一般后果”^①，也可适用于中世紀德意志。在第九世紀，萊茵商人从荒野边界上的佛耳达和赫斯斐尔德的黑森人寺院庄园，曾把谷物和牲口运入萊茵城市。在这些寺院牧場之外，情况更是不发达的：人烟稀少的地区渐次退为零零碎碎的小块土地和森林中的垦地，由日耳曼农民草率地耕种着；直到薩勒河和易北河下游河畔的真正边界为止。日耳曼人向东扩展的各个阶段，是可以划分出来的，虽然不能象在美国的同一现象划分得那么清楚（因为缺少文献）。在查理曼时代，殖

* 地图：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80頁。

① 指美国早期的“西进运动”即向太平洋岸之移殖运动。——譯者

民边界——这里，我们必须区分军事边界和文明边缘——仅仅达到莱茵河彼岸的一些地区。在易北河下游、萨勒河、那布河沿岸之一连串的设防贸易站，从巴多威克到累根斯堡止，是一条远离文明的地带。

美国的向西扩展和中世纪德意志的向东扩展之间的这项比拟，不是异想天开的。易北河、奥得河和维斯杜拉河的各界线，清楚地标出了德意志向东扩展的阶段，象大西洋沿岸的“退潮线”、阿利根尼山和密士失必河标出美国向西扩展的各个接续阶段那样。在美国扩展运动里，“在不断推进边界线上回到原始状态，而即在那个地区上进行新的开发”，这种情况是如此明显，而德意志的边界史，也正是这样的。所有过渡的阶段，是完全相同的——从饲养牲口业过渡到农业、到商业、到制造业。在鄂图诸帝的时代，萨克森农民，在易北河下游和萨勒河的平原上，饲养牲口，条麟吉亚人在哈次山的松林斜坡上，牧放猪群。牛棚距老弗兰哥尼亚（马因斯、窝姆斯、斯拜尔）的城市生活并不很远，象它们在潮头所及的城市如巴尔的摩、里士满和查理斯敦已成为固定社会以后，接近美洲殖民地的“退潮线”那样。在德意志，爱尔福特、哈尔斯塔、福赫海姆、普利默堡、斯塞尔、马德堡，是同汶德族贸易的设防商站，象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格棱维尔、瑟力、斐德福各炮台，维吉尼亚的昆布兰，大卡那华河畔的契斯威尔以及萨卢达上面的普麟斯·乔治那样。上述的德意志设防城市，常常是建造在过去斯拉夫人村庄的遗址上，象美国移民占据印第安人的村庄那样。那些以毛皮作为重要商品的德意志商贩，穿入这些地点以外的斯拉夫人荒野里，象后来美国的商贩越阿利根尼分水岭而入垦塔启和俄亥俄平原那样。

历史上再也没有象日耳曼人向东扩展与移殖的历史和美国人向西扩展的历史之间如此相似的事情了：美国殖民从大西洋岸，初

到潮头所及的地区，继上溯摩和克河或越过阿利根尼山而进入了俄亥俄与密士失必平原。归根到底这两个移民运动，是农民寻找自由与廉价土地的行为。因为据估计德意志土地的价格，在十世纪到十四世纪之间，上涨了百分之四十，特别是在摩塞耳河和莱茵河的肥沃地区内。

查理曼的征服，是在这日耳曼人扩展的又长又血腥的历史上之第一阶段。在查理曼时代，法兰克人的扩展已经达到萨勒河和易北河下游；到了第九世纪中期，日耳曼人的势力范围，在多瑙河流域已延伸到恩斯河外（那是在阿佛尔人时代以前的日耳曼人扩展之极东界线）并已达到腊伯河。在这以后，近代的奥地利包括克伦地亚和士的里亚在内，不仅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已和德意志有着联系。

但是，查理曼帝国的分裂、内战的灾祸以及北欧人与马扎儿人的侵犯，使这项向东扩展运动受到了阻塞。直到919年萨克森王朝创立时，这项运动才得恢复。在亨利捕鸟者和鄂图大帝时代，德意志贸易和商业增加了，人口增长了；跟着这项发展而来的，是需要更多的土地。而且，由于教会和萨克森王朝的密切联盟，王朝对教会的重整旗鼓的传教活动，负有支持的义务。结果，对汶德族重新发动了进攻。

萨勒河和易北河上游之间的索本兰，是从斯拉夫人夺来的第一块领土，也是第一块受到日耳曼化的地方。928年，亨利越过哈斐尔河地区结冰的沼泽地，进行了冬季进攻；据编年史家的话，“用饥饿、宝剑和寒冷”占夺了赫微力安人的主要城市。这个城市叫做布鲁那波尔。它由亨利改成为一个炮台，即一个城堡。这个城市建造在一个低山上（这是在这沼泽地上的一件稀奇的事情）；在山顶上，有着一所汶德族的著名神庙，即力格拉特庙；这所庙宇改为一所圣母院。这个汶德族的小城市，无疑的是由满布河岸上渔夫

粗陋的茅舍組成的。汶德人，自然是一个打漁民族，住于河流和沼澤中間。可是，他們也是爱好飼養蜜蜂的。

勃兰登堡的历史，就是这样地开始的。这征服和殖民的过程，在残暴侯爵吉洛，即鄂图大帝的“北方总督”的时期，繼續进行。馬德堡改成为一个大主教区，賦予控制整个东北地区的权利，并建立了七个新主教区——鄂尔敦堡、哈斐尔堡、勃兰登堡、麦則堡（注意这重复的尾詞“堡”，因为每一个主教区半是教会，半是防御汶德人的炮台）、才茨、迈仙和布拉格。到了薩克森朝的末期，日耳曼教会的势力已籠罩在波兰全境；布勒斯劳、格尼孫和波森的主教区已經建立。日耳曼人已經达到奥得河。

与此同时，其他薩克森人也渡过易北河下游而进入了比伦革地区（梅喀棱堡）^①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然而，他們的居住区的界綫和軍事边界是不一致的。在条麟吉亚，文明的边界延伸到薩勒河，但在薩克森本部，这界綫停止在亚勒河及奥克尔河。在美因河中游沿岸文明界綫徐徐伸展，远至符次堡，象鄂图三世的一项特許状所指出的那样；这特許状把特权賜給那些願来清除森林、排干沼地的移民。亨利二世在1007年所建造的班堡，接替了符次堡的地位，作为美因河流域的边境前哨站。薩克森朝时期的資料表明：在向东扩展方面，有着很大的进步。德意志殖民沿王国的东方边境上，从易北河口到士的里亚山止，兼并了广闊无限的地带。

这些殖民先鋒主要从事飼養牲畜。在鄂图一世时代，这地区

① 梅喀棱堡省的名称，是从同一名称的設防城市得来的。斯拉夫人原来称之为“威利格勒”或“伟大城市”。当薩克森人占領这个城并把它改为一个“堡”后，他們在“堡”这一个詞上冠以老德文形容詞“梅喀尔”(mekel)即“大”或“巨”的意义。試比較中世紀英文“mickle”和盎格魯-薩克森文“micel”，它們有着同一的含义。所以，梅喀棱堡是威利格勒的一个德文譯名。它是在边防綫上的主要炮台；該綫从波罗的海延伸到許威林湖，包括有威斯馬、鄂尔敦堡、伊罗、布柯、在許威林湖一个島上的許威林以及在該湖北端的多宾。

的法院所判決的罰金是以牲口計算的，而當時的法律也表明，所有罪行多屬於邊境上所特有的強暴行為這一類。這地區，如美國的“新西方”，開始由薩克森殖民、牧人和農民稀疏地居住着；他們準備使用寶劍來對付汶德人，象美國的邊境居民準備使用來福槍來對付印第安人那樣。

據編年史家赫爾摩德的話，邊境上的薩克森居民（稱作“馬克人”或“邊民”）需有堅強的毅力，並須準備冒着流血的危險。這些中世紀日耳曼邊境居民，既果斷又刻苦勤勞；如果陌生的日耳曼人象他們那樣“遵守薩克森法律”，他們願給予簡朴的款待；但是，他們痛恨汶德人，並討厭象荷蘭人和佛來銘人這一類的外來者。

可是，這項征服不是持久的。983年，斯拉夫人狂風暴雨般起來反抗，搗毀了日耳曼人居住區。但邊境戰事的再起，使殖民運動重新進行。1000年，諾達爾賓吉亞第二次被斯拉夫人蹂躪。殖民運動再次恢復，而在1018年，斯拉夫人也再次起事，逐出了日耳曼人。所有日耳曼人的村莊和邊境站，都被破壞；連漢堡也遭受威脅。這是一個壓制不住的衝突。第三次，日耳曼殖民先鋒渡過了易北河，而斯拉夫人在1066年第三次逐出了他們；當時，斯拉夫人獲得了一個驍勇的首領克魯多，並在後來律伯克的地址上，建立了他們的根據地。於是勃蘭登堡陷落，直到下一世紀的起初二十五年中，薩克森人由於頑強的鬥爭決心，才能再度把它永久克服過來。1066年，霍爾斯頓有六百多個家庭離開家鄉，而移居于哈次山地區。

這些衝突造成一片荒蕪淒涼景象。十二世紀，當下德意志在霍爾斯頓的阿多夫、亨利獅子和亞爾培熊領導下再次恢復了“失地”之後，霍爾斯頓的赫爾摩德（他的銳敏觀察力使他應享考古學家的盛譽），在觀察什列斯威和梅格棱堡地方上的教會和寺院的遺迹里，看到了一種淒涼慘淡的景色，就是，日耳曼人在鄂圖諸帝時

代的权威所遗留下来的残破紀念物。

迄今〔他写道〕还遗留着关于过去的占领的許多証据，特別是在森林里，从吕贞堡城起穿过什列斯威的广阔地带，在那广阔无垠而又几乎不可穿透的荒野里，还可隱約看出那些一度曾作耕地的标志的犁沟。連旧时城市的和村庄的痕迹，在废墟里也可探索出来。在沿河流的許多地点上，那些由支流所冲积而成的淤泥土墩，还可証明：每一个这样的所在一度曾由薩克森人居住过——当薩克森人的勇气还强大的时候。

甚至易北河左岸上，在大河套地区和亚勒河上游之間（即今天环绕哈伯斯塔特、薩尔斯威德尔和斯騰达尔領土），情况也是相同的，“在那里，还可看到那些筑在易北河沿岸低地上的旧碼頭遺迹。当斯拉夫人蹂躪了这块地方后，薩克森人被消除，因而斯拉夫人得繼續占有它，直到我們的时代为止。”

总结起来，薩利安时代，就易北河外殖民來說，是以小得可怜的结果而結束的。1125年，东北欧語言的界綫，还是留在查理曼时代的那条界綫上。

在多瑙河的河套地区，日耳曼人移殖东南欧的历史，和他們移殖东北边境上的历史，是具有相同的特征的，就是說，他們进进退退起伏不定。正象斯拉夫人在983、1018和1066年的三次反击搗毀了易北河外的殖民事业，并三次逐回了薩克森殖民先鋒队到易北河以內那样，馬扎儿人在东南欧，破坏了巴伐利亚的殖民工作；他們在896年已定居于台斯河两岸上。900年，侯爵琉特波德用巴苏的旧羅馬城垣的石头来建造了恩斯堡。在955年，鄂图一世在奥格斯堡附近把馬扎儿人打得惨敗之前，對他們的侵犯，未曾作出什么有效的拦挡。在这以后，德意志殖民才源源不絕地流入了“东方馬克”的荒地上去。这些殖民先鋒的基本队伍，可能是来自巴伐利亚的，但有理由可相信：跟他們一起的，还有大批来自更西地方的法兰克和斯瓦比亚的移民。

在 955 年以後，儘管碰到障礙和挫折，日耳曼人向東南歐的殖民運動，即使緩慢，還是穩步前進的。殖民工作，是由大“掮客”——高級僧侶和大封建主——來進行的。不幸，關於這方面，我們沒有當時的作家關於這一運動的概述，象赫爾摩德所遺留下來的梅格梭堡殖民史那樣。在東南歐邊境上的主教區里，竟沒有一個人來記述它們的歷史，象不來梅的亞丹為漢堡所做的那樣。在任何奧地利編年史里找不出這項歷史，因為巴本堡族沒有編年史。

維也納森林，似乎在好多年內曾阻滯住移民運動。但比起大森林的阻礙更為重要的，是那些住在森林東邊的人口稀少但具有決心的居民之敵對（主要是馬扎兒人，但也有若干斯拉夫血統的移民）。這塊領土，是類似一種“無人地帶”，在那里每個人可以起來反對任何別人，肯定也反對任何侵入境內的日耳曼墾荒者。在 1002 年，可以找到關於維也納森林東邊的日耳曼殖民地之最早的可靠資料。

在奧地利的阿達爾柏公爵（1018—1055 年）的事業中，在某一個未詳的時期，他曾占領維也納的地方，可能要用作為一個前哨站，來掩護那時已經穿入維也納森林而建立的日耳曼殖民地。這些殖民地在這地區內的出現成了邊境衝突激烈化的信號；在這種衝突里，日耳曼移民顯然是侵略者。不久，馬扎兒人國王斯梯芬進行了干涉。不久以前，在斐沙河與萊塔河之間的狹隘地帶，象蘇格蘭邊界那樣，成為了這場衝突的戰場。這一衝突，在中世紀德意志文學上最偉大的德意志敘事詩上，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而又生動的印記。日耳曼殖民連有些冒險商人在內，仍然堅持向這地區推進。誰首先到奧地利作貿易旅行，我們固然無從稽考，但我們有資料可清楚地證明：從十世紀起已有商人來臨。累根斯堡人是第一批有相當人數的同來的人。在那個時候，奧地利幾乎還沒有自己的一個特殊的商人階層。在這時期，德意志文化向東南歐的進

展和它的政治发展,在重要性上,无所軒輊。到了亨利四世时代在主教巴苏的阿尔特曼(1065—1091年)的有力管理之下,这一部分的多瑙河地区,已开始摆脱一个边境教区所表现的粗糙作风,而获得了一些老德意志所可享有的物质文明的风雅态度。

授职权战争刺激了这种日耳曼移民运动进一步沿多瑙河而下的扩展,象在易北河以东它所进行的那样。德意志境内的混乱促使人口流入东方地区去。在下一世纪,我們可看到:在这些殖民地上存在着数字惊人的日耳曼人乡鎮。我們可从寺院的特許状,特别是在奥地利,找出关于日耳曼人扩展的更明确证据。主教和住持在十一世纪后期和整个十二世纪,在馬克、在斯坦尔馬克、在克伦地亚,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关于这一点有德意志地方名称的激增为証。这就是在麦尔克、克洛斯脫紐堡、亥力根克奎次、利林斐尔德、圣馬利亚·澤尔、次維特尔、宰登斯得敦、澤拉斯及其他寺院开始靠着土地的贈予而发财致富的时候。与此同时,大貴族家庭,如亚柏斯堡族、沙拉堡族、波涅族、普雷恩-普来斯坦族、薩尔斯巴赫族、法克斯坦族,也开始得势起来。当然,他們带来了一批移民,其中有自由人和农奴。其中有些家庭,可能在十字軍早期已漂流到多瑙河地区內的。在多瑙河之北,日耳曼人殖民运动的进展也不算小。日耳曼人和波希米亚边疆垦荒者,在广闊的波默森林里,发生了冲突,因为那里是“居住者主权”^①范围相接触的地点。

日耳曼人向东北的殖民运动跟着 1125 年薩克森的罗塞耳接任德意志王位之后进行了一次新的而又猛烈的推进。在下一世代的时期內,整个斯拉夫人的独立的社会組織垮台了。諾达尔宾吉亚、梅格梭堡、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由日耳曼人来居住了。这项

^① 指居住新地或未被占据的地方的人們所要求的主权。——譯者

迅快而又有效的变动，一部分是因为汶德人中間抵抗力量的崩潰，也許更大部分是因为在德意志經濟和社会情势下所积累的压力能够扫除一切阻碍。

“时势艰难”和封建压迫大大地迫使小农民阶层移入新地区去。然而，在十二世紀，封建貴族也开始表现出开明的态度。他們看出奖励农民移到他們所占有的广大森林地和沼澤地去的經濟价值，还急切希望从斯拉夫人手里夺取他們所垂涎的土地；所以他們开始以宽大条件来引誘移民。在 1106 年，不来梅大主教移入了几百个荷兰人和佛来銘人，并使他們定居于不来梅周围的威塞尔河畔大沼澤地上；这批人在比利时和荷兰的低地上，已习于深耕、挖沟和排水工作。勃兰登堡的亚尔培熊，在中世紀柏林周围的沼澤地区內，做过与此相同的事情。霍尔斯特頓的阿多夫伯爵是十二世紀中一个最賢明而又有清晰见解的貴族；他“派人到周围各地去，甚至到法兰德斯和荷兰去，宣告說：任何缺少土地的人可随帶家屬来領取最好的土地——一个丰产谷物、富于魚肉的空曠乡村，牧場也非常优良”。

由于 1143 年征服瓦格列族的結果，大批移民涌入了那些开放給移民的易北河外的地区。在 1147 年对汶德族的十字軍之后，人口流向边境去，几乎象“潮涌”那样。移民涌入，“帶着牛馬、帶着耕犁与貨車以及适合的工作人手，”^①使汶德人走投无路，束手无策，只有沮丧地屈服而已。再也沒有別的事情，象在 1812 年战争后美国人“涌入”“西方空地”和俄亥俄流域那样和它如此相似。在德意志的老区，人口已迁出得那么多，以致庄园領主被迫改善了对他們的农民的待遇，为的是害怕他們会逃到易北河外的新地上去。

这个边境社会，是粗野的，主要是汶德族的，但也散布着不少

^① cum equis et bubus, cum aratris et plaustris et personis ad opus idoneis.

勇敢而蛮横的垦荒者成分，据赫尔摩德的话，它是一个“野蛮族”。然而，在这批移民里，象在其他一切由于不满要求用改变现状来寻求出路的粗鲁的边疆社会里那样，虽然混有消极成分，但也夹杂着大批日耳曼族最优秀血统的成分在内。十二世纪移民的一部分，品质高雅，意志坚决，要改进他们的命运，并雄心勃勃，要攫取新地区内所提供的机会。

在新地区内，农田的分配方法，截然不同于老办法。旧式庄园农村原来有着“分条”耕地和公共的牧场和森林；这种情况已不常见。新的办法是：每个人领取一块长椭圆形的田地，从二十到六十亩不等，象近代的一处农场那样。他的房屋，建造在这块地上的一端，面向大路，绕以花园和果园。在那房屋的后面，如果土地的“地形”许可的话，设有农场，在农场的后面有牧场，最后有森林地。这种新的土地安排布局，在中世纪后期传布到德意志的其他部分去——上巴伐利亚、黑森林省、奥登森林省；约有四分之一的西利西亚的土地，是这样殖民的，象后来在奥得河、发特河和涅策河之间的沼地那样。这整个制度，可追溯到荷兰移民，他们初在 1106 年定居于北海沿岸和法兰哥尼亚森林中的开垦地上，继而在勃兰登堡外围的土地上。亚尔培熊所赐给的一张特许状里，曾提及过这些荷兰尺寸的庄园的。

今天，在东德意志我们还可看到景色多样化的村庄；它们是起源于这早期扩展和殖民运动的时期的。在那些管理得较松的居住区内，老式的“有核心”的村庄，可能建造在距新式村庄不远的地方。而且，我们到处还可看到典型的斯拉夫人“圆形村庄”。因为在斯拉夫人中间，房屋的建筑，不象日耳曼人村庄的建筑那样聚集在一块儿的，而是排列成为一个圆圈形或椭圆形，绕着一块草地的边缘，包围着草地的，只腾出一个大门；这样，许多房屋构成了一个围墙，里面可安全地关闭着村民的牲口。在一个日耳曼

人村庄里，道路是穿过村庄的中間的。在斯拉夫人中間，道路是經過村庄入口处的外面的。这种差別說明了一个事实：古代斯拉夫人还是在游牧阶段，而当时的日耳曼人已发展了农业，并已把牲畜飼养和耕田工作結合在一起。当日耳曼人开始向东压迫斯拉夫人并定居在薩勒河和易北河外的時候，他們带来了他們的“开放”村庄的式样，或建立了“街道”村庄；但有时他們也模仿斯拉夫人的圓形村庄式样。

在日耳曼人边境史上，还有其他細事，对美国学习历史者來說，該是容易明白的。在十二世紀之前，中世紀欧洲的最丰富的金銀銅矿，是在条嶺吉亚哈次山脉（中世紀的內华达^①）的矿产，而且采矿技术还大多是由薩克森人壟断的。那里的蓝美尔斯堡矿产，是象昆斯多克矿脉^②一样的；而哥斯拉尔是欧洲最重要的矿业城市。但到了十二世紀后半期，即在 1162 和 1170 年之間，厄尔士山脉里发现了白銀矿苗；那个屏障式的山脉隔断了条嶺吉亚“馬克”和波希米亚的联系。不久之后，发生了从哈次山的老矿区“冲入”这个新的厄尔·多拉多（El Dorado）^③去，那会使美国历史家回想到 1849 年的黄金热潮的。

据說，这项矿产最先是在阿尔騰則尔的息斯脫西安派寺院的土地上发现的；善于处世的僧侶，不久就开始輸入了哥斯拉尔的矿工。一批日耳曼人矿工营，在以前完全为捷克人居住的地区內，迅速建立起来，并逐漸发展为城市，其中最重要的是建造于 1171 年的弗賴堡。在十三世紀，据說，亨利显赫者，即迈仙的侯爵和这些丰富銀矿的所有人，拥有了滿藏白銀的宝塔；如果波希米亚王国会

① 美国西部的一州。——譯者

② 美国內华达州的著名的金銀矿脉，在 1859 年发现的。——譯者

③ 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紀所想象的南美洲富于黄金的城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 1848 年发现黄金矿后也常被这样称呼的。——譯者

出售的話，他能容易地购买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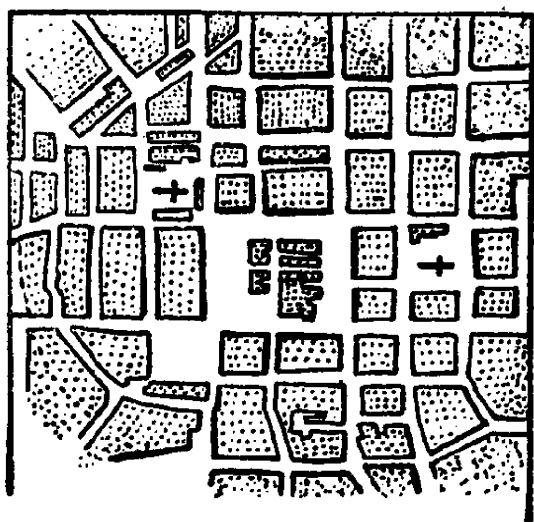
因为一般繁荣景象往往跟着工业而来，开矿从十二世紀起成了德意志經濟史中的重要因素。有些矿場，属于国庫的，其他則属于封建主的。根据印那馬·斯特涅格說，普通自由人对于在他土地上所发现的矿产，不得享有权利。关于德意志矿业の文献記載，开始于十二世紀，而在 1200 和 1400 年之間，迅速增加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特梭特的特許狀(1185 年)、哥斯拉尔的特許狀(1219—1301 年)、易格劳的采矿法(1249—1300 年)、庫騰堡的規程(1300 年)以及弗賴堡的法律(1296—1400 年)。虽然德意志出产金、銀、鉛、鉄、錫(1240 年后)各类金属，但关于开采銀矿的历史和技术，是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的。尽管缺少十二世紀的資料，但下列一个主要事实是清楚的。甚至在这早期，采矿业也是由一个团体来經營；一种真正的組織原則很盛行，一代一代地发展了一群有专门训练的矿工。

中世紀日耳曼社会的結構里，交織着下列殖民地：在亨利獅子时代在下薩克森并由亚尔培熊在勃兰登堡所建立的佛来銘和荷兰人的外人殖民地、麦則堡周围的盎格罗殖民地、在波希米亚山区薩克森矿工的居留地和建立在匈牙利西普塞-厄尔士山脉地区內的十六个自由“西普斯”城市；这种情况，象在美国哈德孙河的荷兰人、摩豪克河的日耳曼人和申喃多亚流域与皮德梦特的帕拉泰因日耳曼人同美国人相混杂的那样。后来，这些日耳曼人殖民地成长为城市；这些城市往往保留着它們旧时的斯拉夫的地方名称：如来比錫(Leipzig)、但澤(Danzig)、柏林(Berlin)、服林(Wollin)、庫斯特林(Kustrin)、堪明(Kammin)；因为那些有着“-zig”和“-in”尾詞的地方名称，一定是表示过去斯拉夫人的村庄的。連德文的地方名称，也可能仅仅是原来斯拉夫地方名称的譯名。例如，鄂尔登堡(Oldenburg)，是斯达拉卡德(Staragard)(斯拉夫文，意即“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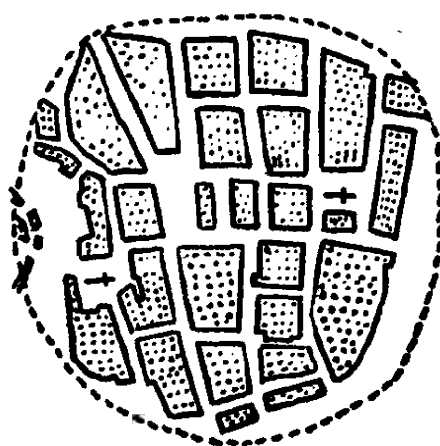
城”)的譯名;尾詞“-gard”或“-grad”是一个广泛传布的地方尾詞,意即“城”,象貝尔格莱德(Belgrade)或彼得格勒(Petrograd)那样,而冠詞“stara”,意即“老”。

葡萄的种植,是跟着农业的进步而来的,它在北德意志和东北德意志,即在梅格梭堡、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西利西亚的传布,比今天要远得多。随着荒野的征服和野蛮斯拉夫人的开化,毛皮、蜡、琥珀和森林产品的老貿易越来越多地让位給一种更大规模的商业了。在欧洲,再也沒有別的地方上那么大力地建造城市,象十二和十三世紀在易北河外的德意志領土上那样。斯騰达尔、布勒斯劳、柏林、德雷斯登、来比錫、索恩、馬里威德、厄尔丙可作为例証。这些新城市,不象中世紀的老城市那样有着狹隘、盘旋、弯曲的道路,而是經過仔細設計的,有着长方形的街道和空曠的广场。在这方面,它們相同于南法的新城市,就是,在对亚尔比教派十字軍的蹂躪以后和在圣路易与英王亨利三世間的英法战争的破坏以后,郎基多克和西南各省所兴建起来的城市。

布勒斯劳城



来比錫城



斯拉夫人地区內的日耳曼人城市平面图

在多瑙河地区內,在克伦地亚、卡尼鄂拉和士的里亚的斯拉夫

居民,遭受新来的日耳曼移民的压迫多于遭受驅逐,象他們在条麟吉亚馬克、勃兰登堡、梅格梭堡和波美拉尼亚所遭受的那样。但可惜,关于日耳曼人在东南欧扩展的历史,缺少那种出色的編年史,象麦則堡的铁特馬尔和赫尔摩德所写关于闡明东北欧殖民地情况的編年史那样。然而,还有相当多的特許状流传下来可以弥补。在南方斯拉夫人居住区内所建立的寺院的法规和紀录里,斯拉夫人地方和专门名称,在十一和十二世紀里,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在这些省分内,政治和社会的上层,是日耳曼人和貴族;下层,是斯拉夫人的后裔,按政治和社会地位說,他們是一个依附的人口。另一方面,在奥地利,虽然也有同一的貴族的政治和社会結構,但上层和下层主要都是属于日耳曼人血統;而依附人口是由日耳曼农奴組成;这批农奴被他們的主人带到东方而住在殖民地上。

日耳曼人在东南欧的扩展,被馬扎儿人有效地挡住,而在东北欧,在达到維斯杜拉河之前,他們沒有碰到了什么阻止的力量。1119年的边境战事,特別激烈。1131年,士的里亚被匈牙利人侵入,这一袭击,使薩尔斯堡的主教所建立的殖民地遭受了严重的灾难。据1133年弗賴辛的鄂图所說,多瑙河北岸匈牙利人的扩展已蔓延到这样远,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間隔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森林里”^①发生了冲突,象波希米亚人已和巴伐利亚人垦荒者在边境上波默森林里所发生的冲突那样。

德意志商业的扩展,自然是跟着日耳曼人殖民地的扩展而来的。在十二世紀,波罗的海成了一个日耳曼人的內湖。每年十一月中,在“大风”的时期,西欧船队为采购魚干和毛皮来到波罗的海沿岸上半斯拉夫人的、半日耳曼人的城市港口。还有一个小村叫做“青魚村”,现在它是个积水地,距斯德丁不远。波罗的海青魚貿

① In silva quae Polunios et Ungarios sejungit.

易,是重要的。“老律伯克”商人集团,甚至伸入波罗的海,力图夺諾夫哥罗得的古代瑞典-俄罗斯貿易以及发兰琴商路;并在哥特兰島上,建立了一个“商站”或貿易站。1134年,皇帝罗塞耳二世把他們置于帝国的保护之下。罗塞耳所发給的特許状原本,已經遺失,但亨利獅子在1163年10月18日賜給律伯克商人一項特許状上,曾談到它。在汉撒同盟的組成和汉撒同盟在1298年与維斯比集团合并之前,关于这种远地商业,我們所知的,只此而已。

誠然,先驅的商人有时走在日耳曼人殖民运动的前面,但在大多場合下,商人是尾随殖民运动而走的。在奥巴德利特地方(直到1147年的征服之后,它才成为梅格梭堡的公爵領),在斯达拉卡德城(奥巴德利特公爵普里比斯拉夫的首都),有一个相当大的日耳曼商人殖民地,是在1129年建立的。日耳曼人的貿易活动,一直延伸到魯根島上,那里的居民还是可怕的异教徒,斯拉夫人的著名的阿科那神庙就建立在那里。在日耳曼人和荷兰人联軍1168年袭击并占領这所神庙之前,商人們不仅必須掩蔽他們的基督教信仰,而且对神奉献重大礼物,以求获得做买卖的准許。在班堡主教的《传记》里,有一段奇怪的記載說:波美拉尼亚陆地上居民的改信基督教怎样在一个时期使他們和魯根人的貿易中断;因为后者不願和改了信仰的斯拉夫人有什么来往。在拉尼人即魯根人中間,貿易的状况是很帶原始性的;他們使用麻布条作为貨幣,象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中間使用貝壳珠那样。这种布条貨幣,一度也在波希米亚人中間通用过。在捷克文中,“麻布”和“計数”这两个詞,是从同一字根得来的。

厄波的《班堡的鄂图传》(鄂图曾两次游历波美拉尼亚,一次在1124年,又一次在1128年)和赫波德斯的《對話集》,告訴我們关于十二世紀上半期波美拉尼亚陆上貿易的有趣材料。鄂图还曾两次作过长久而又艰苦的旅行:下行薩勒河与易北河;从那里上行哈

斐尔，从而远达波罗的海沿岸的斯德丁和服林两城。

在那个时候，波美拉尼亚尚是一块沼泽地区，即溪流缓慢湖泊停滞的地方，那里住着纯粹斯拉夫人；他们尚按照他们部族的原始生活方式过活，绝对谈不上接触过日耳曼基督教文明的。因为大部是渔民，他们以鱼干的“重量”，也以蜜蜂巢来估计他们的财产的；因为蜜蜂也是一项大宗产品。他们的食品是：鱼类、裸麦以及几种蔬菜；他们常饮樱桃蜜酒。他们的纺织技巧是相当高的；但他们不是好农夫。在奥得河和皮恩河口的城市里，有着相当大的原料产品贸易，象鱼干、毛皮、柏油、绳索这一类的贸易；但这些城市是骯髒不堪的。唯一壮丽的建筑物，是神庙。在这幸免遭受象易北河斯拉夫人所遭受的不容忍、偏见和贪婪的迫害的人口中间，鄂图辛勤工作，以和蔼作风，赢得了波美拉尼亚人的信任。在中世纪的斯拉夫人地区里，只有波美拉尼亚人和波兰人在拉丁教会的控制之下；而教会通过感化而非通过武力的方式，来使他们从异教过渡到基督教，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

到了下一世纪，斯德丁以“整个波美拉尼亚的大都会”的面貌出现，虽然据说，它的人口还不到六七千人。它的主要竞争城是卡明。两城都是建造在海绵性的低湿地上；那是一个严重缺点。斯德丁被沼地所围绕，而卡明的街道上如此泥濘，以致到处铺着看来只是几片木板的桥。鄂图本人曾从一条木板桥上滚到泥浆里。那里的居民，虽然态度粗俗，但却是好客的。两城各有一所做交易的“市场”，那里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货币经济。还有仓库，可以想象，主要是为着储藏鱼类的。捕鱼是居民的主要活动；虽然毛皮和奴隶也是商品。青鱼漂到波罗的海浅滩上，但淡水鱼的贸易，也是活跃的。沿海贸易一定是相当大的，因为鄂图曾容易地由水路从服林旅行到斯德丁去。

到了1125年，显然，从“新”德意志的东部到辽远的波罗的海

的沿岸已有直达的通路。薩勒河畔的哈勒，是这一切东德商业的清算所和交易中心。当班堡的鄂图两次旅行到波美拉尼亚的时候，他在哈勒市集上“采购了”一些东西，从那里乘船下行薩勒河到易北河，再下行易北河到哈斐尔河口的維奔，于是，上行哈斐尔河，再下行皮恩河而抵达了斯德丁。

1158年，律伯克城的建立，永远保证了波罗的海上德意志商业的控制权。它不久成为整个波罗的海贸易的总汇。那些来自英国、丹麦、瑞典、挪威甚至俄国的商船，云集在港内。斯德丁是律伯克的距离最近的竞争者。下德意志语成为整个北欧的商业用语，因而原来为进行波罗的海贸易上所必需的易北河斯拉夫语，渐次消逝了。在百余年以后，汉撒同盟的纪录开始用这种下德意志语来书写了。到了十三世纪中期，律伯克是波罗的海沿岸上的主要商业城市，也是一大群小城市的贸易中心；这些城市是由北德农民的扩展的和移民的努力在征服的汶德族土地上所建立起来的，例如：罗斯托克、威斯馬、格来福森林、斯特拉尔松得、梅格棱堡、拉策堡、許威林、鄂尔敦堡，而后面四个城市，是建造（象律伯克本城那样）在斯拉夫城市的旧基地上的。

这些城市在十三世纪中，为了互相保护它们的商业利益，以防止沿海和河流上的海盗以及陆路上的盗匪队伍，结成了同盟；正是在这个同盟里，我们找到汉撒同盟的最早开端，虽然那个名称在1360年之前还是未曾被采用的。我们不能正确地知道这同盟过程的开始日期。在保存下来的文献中，最早的一项，是律伯克和汉堡在1230年所締結的一项很一般性的协定。但在1241年，当这项协定續訂以后，这同盟的条件是具有特殊性的。1259年罗斯托克和威斯馬参加了这个組織；在那个时候，这团体制定了一项规定：任何城市，必须是位于海岸上或在一条可航行的河旁，并保持着自己城门的鎖钥，才得成为同盟的成员。在1260和1265年之

間，我們看到同盟的第一次成文條例，其中有一項條文規定：各城市的代表每年舉行一次年會，以“制定有關各種事務的法律”。

漢撒同盟的較重要的歷史，大部是屬於十四世紀的中世紀商業史內的一章。這裡，我們僅僅略談它形成的歷史。可是，即使對於它形成的歷史，如果不了解十二和十三世紀日耳曼人向東擴展和殖民，也是不能充分理解的。到 1265 年，同盟已開始使附近王公，象丹麥國王、勃蘭登堡侯爵和什列斯威公爵，感到震動。但對城市來說，幸好這些王公，意見不一。丹麥垂涎什列斯威；勃蘭登堡對皮恩、奧得和維斯杜拉各河口的丹麥人殖民地虎視眈眈，因為它的侯爵想要占取梅格棱堡和波美拉尼亞。在 1283 和 1293 年之間，同盟拉入了哈德比和基爾兩城為盟員，因而順利地打破了丹麥的計劃；它並且也把沿海城市梅格棱堡和波美拉尼亞包括進去，因而挫敗了勃蘭登堡的野心。這樣一來，在好多年內勃蘭登堡受到阻塞，而不得抵達波羅的海。

其時，同盟還在屬於它活動範圍內的海面上，努力建立商業壟斷權。佛來銘和法里西安商人在“抵貨”的威脅之下，被排擠出波羅的海，哥特蘭人被排擠出北海。漢撒同盟曾進行一個重要步驟，來完成把波羅的海改變為漢撒同盟的內湖這項努力；在 1293 年當它占奪了哥特蘭大島上的維斯比，即所有日耳曼商人的最古老的沿海貿易站，並迫使那里的商人加入了同盟之後，它還企圖占奪俄國諾夫哥羅得的毛皮、柏油、大麻、木材的豐富貿易。這項高壓手段的行動，是 1280 年律伯克和維斯比間締結的，兩年之後又有里加（1201 年由日耳曼人建立的）加入的防禦海盜同盟的後果。這樣一來，維斯比遂喪失了对波羅的海貿易的控制權，然而，它繼續是非常繁榮的。的確，這城市的財富，已變為盡人皆知的事實。據說，“連豬也是在銀槽里吃食的”。維斯比的城垣，建造於十三世紀，迄今還保存得很好，它們可與歐洲任何地方最雄偉的中世紀城

垣相提并論；所有四座坍塌的教堂遺迹，还是美丽而令人伤感的紀念物，昔日繁荣，而今安在。

汉撒商人以“东方商人”(Osterlingi)的名义进入了英国，在那里他們和科伦商人发生了激烈的竞争——因为两集团各享有单独的特权——直到这两个竞争集团在爱德华一世时代合并于伦敦的日耳曼人行会大厅即“鋼場”为止。在同一世紀的中期，汉撒还在布魯日，建立了一所办事处。

但汉撒同盟对国内政治也是注意的。在皇位空缺时期(1250—1273年)，腓特烈二世，在他和北德王公斗争里，曾求助于丹麦，并实际上已让給它什列斯威、霍尔斯坦、諾达尔宾吉亚和梅格棱堡的整个領土（就是說，律伯克管轄下的全部領土）——这些領土的割让由于丹麦在布耳諾維德的惨敗(1227年)，而未曾实现——汉撒同盟，鉴于这项局势，在它的政策上，坚定不移地站在卫尔夫派的立場上；这一政策，頗有助于使它在威斯特发里亚的城市里，在下萊茵河地区以及在英国获得了好感。日耳曼族的东进运动，起初曾是一个农民、僧侶和貴族的运动，可是它跟着汉撒同盟的兴起，获得了新的推动力，而在十三世紀它和同盟的扩展結合在一起了。由于这个緣故，日耳曼商业势力得以直接繞过波罗的海灣而进入了俄国、里窩尼亚和庫尔兰；在那里，默麦尔、厄尔丙、利堡、哥尼斯堡、里加成了有势力的汉撒商人的基地。

在多瑙河中区，奥地利的政治变更：奥地利原来的侯爵成为一个公爵，以及領土的扩展和奥地利各地政治的团結两个同时并进的过程，对商业方面也发生了显著的影响。

由于資料的缺少，难于确定：在这早期貿易里所交換的商品是什么。然而，我們知道：在奥地利的进口貨中，占首要地位的是食盐，其次是布匹；在出口貨中有：蜂蜜、蜡、兽皮，后来还有越来越多的葡萄酒。在这里貿易可能起源于象刻特根所想象的，它一向起源于外国商人要以自己所有的产品来换取

他們所需的貨物这一情况。例如，和匈牙利的商业往来的兴起，是由于上德意志需要貴金屬黃金和白銀。然而，在十二世紀末期情况完全改变了：由于士的里亚領土的获得(1192年)，由于腓特烈二世(1230—1246年)抱有統一这地区的政治和商业的野心，那小型而又缺少管理的商业状态，已經消逝。奥地利获得了对帝国东南部通往匈牙利和威尼斯的商路之控制。现在，第一次有可能来推行一項有力的貿易政策，一方对上德意志，另一方对匈牙利。在腓特烈时代，还出现了第一批管理貿易的法令：禁止谷物的出口，給累根斯堡人以“客人权利”，通过1231年的特許状，給維也納以一項匈牙利貿易壟断权的保証。外国人不得同匈牙利人进行貿易，連在他們自己中間的交易也被禁止。比起这一特許状和类似的特許状所规定的限制性条款，也許更为重要的，是由特許状所建立的那些貿易中心：在那里商人穩可找到一个市場。這項賜給城市特权的政策，哈布斯堡的路德福繼續施行，并推广到格拉齐、朱登堡、紐斯达和弗賴斯达諸城去；在这政策的影响下，这些城市，在好多年中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政策的目的，是要給奥地利人以对外貿易的壟断权。也許，它受這項貿易的刺激太多了，因为在奥地利商人中間，特別是在維也納商人中間，发展了依附对外貿易的某种不健康状态。

在十三世紀中期开始的巴苏征稅簿上，我們可看到一些关于奥地利商业活动的范围。根据这些簿冊，我們可断言：从上德意志来的进口貨，比运往上德意志去的出口貨，要多出两三倍。然而，輸入品中的大部，不是在奥地利消費了的，而是由維也納商人轉运到匈牙利去的。关于布匹，尤其如此。在对匈牙利貿易方面，收支差額对奥地利一向是很有利的。這項差額，主要以匈牙利金銀矿的产品来支付的，虽然匈牙利也輸出一些牲口。除了這項对匈牙利的运输貿易之外，奥地利在整个中世紀时代的其他主要商业关系，是对威尼斯的貿易。這項貿易到了十三世紀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由此可见，奥地利的貿易，到十三世紀为止，有些是依靠这国家的地理位置的，有些是依靠它人民的能力的，但有些也依靠它統治者所賜給的特权的。也由此可见：奥地利境內外国制造品的消費，主要是由轉运貿易所得的利潤来弥补的，而食盐及其他原料进口貨的等价，則用葡萄酒及其他土产品的出口来对消的。^①

那談到威尼斯商人通过奥地利的最早文件，是属于1244年的。波罗的海对南德的貿易路綫大部分是上行穆尔得河，再上行

① 西奥图·万尔：《中世紀奥地利公国的对外貿易》(1903年)。(一篇书評)

那布河而达累根斯堡；前一条河流当它在查理曼时代成为日耳曼人世界的东方边缘之后代替了薩勒河的地位。在波希米亚，有一条商路，从布拉格开始，上行摩耳道河，越过分水岭而达到多瑙河畔的林茲。另有一条商路，上行厄革河——或通过諾伦多夫山路——再下行那布河而达累根斯堡。

到十三世紀，日耳曼人向东扩展和殖民，除了在普魯士、庫爾兰和爱沙尼亚的波罗的海地区之外，已經达到了它的限度。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波兰，虽对日耳曼殖民和日耳曼文明來說，不是不可透入的，然而，它們已力能捍卫自己，免受那易北河外斯拉夫之所遭受的命运。现在，关于东方边境上这三个国家的經濟史，我們應該略为談一談。

匈牙利第一位基督教国王史梯芬，是在 1000 年受了洗礼的；他固然欢迎日耳曼移民，特別是騎士和低級貴族的来临，可是也很小心，不使他們获得过大的势力。他的态度，在他的訓子篇中，可以看出：“尊敬这些‘客人’，因为他們給我国带来了外国学术和武器；他們对王座是一种点綴，也是一种保护。”日耳曼农夫，在这个时候，开始移入了匈牙利，并定居于王室領地上及貴族和僧侶的領地上。但当馬扎儿人接受了拉丁基督教并采用了很多日耳曼制度和 문화以后，那項势力的渗入和传布被严格地加以均衡了。国王該薩（1041—1061 年）是第一位积极鼓励日耳曼人移入王国内的匈牙利統治者。他似乎曾发出过类似上文所提的北德王公所发出的布告，招募日耳曼人移入匈牙利境内。可惜，这布告原文，已不可复见；連它的日期也沒有保留下来。仅仅有一段記載說：在下一世紀，匈牙利境内所可看到的日耳曼人社会，原来是由于該薩的招募而来的。差不多所有这些移民，都定居于山間矿区里。

拉第斯劳一世（1077—1095 年）和科罗曼（1095—1114 年）曾竭力使他們的国家摆脱野蛮和愚昧的枷鎖。这两位早期匈牙利国

王,就提倡經濟和社会福利來說,是杰出的賢明君主。在大部学术限于教士阶层的时期,科罗曼,作为当时代的一个俗人来看,是具有高度文化的,他从閱讀史书而获得了一些体会。在他的一项文件里,他深湛地評論說:“羅馬帝国在初期不断发展,而国王伟大而光荣,因为有許多貴族和賢人,来自各地,集合在一起……因为,当陌生人从各地方来的时候,他們就带来了不同的語言和风俗……因为属于同一語言和同一风俗的王国,是脆弱的”。科罗曼认真誘导西欧先进地区的人們移入匈牙利,并努力提倡貿易和农业。起初,大部日耳曼人,是从巴伐利亚和斯瓦比亚移来的——就是,从最靠近匈牙利的南德意志移来的。布达佩斯和普勒斯堡,在早期已有一个日耳曼人居住区,并有很多日耳曼移民,住在它周围的地方,如地方名称还可指明的那样。所以,直到今天,在匈牙利的这一地区內,一个日耳曼人,不管来自何方,常常被称为“斯瓦布人”或“斯瓦比亚人”的。

那被异教徒馬扎儿人破坏了的多瑙河流域和北亚得里亚海地区的商业,在第一批基督教匈牙利国王统治之下,得告复兴;匈牙利平原所产的谷物,成为对君士坦丁堡的一种有价值的输出物,毛皮和鉄用来交换絲綢、宝石、葡萄酒和刻着花紋的盔甲。从西欧来的商人和香客們,又可以自由穿过古代达謝地方;这种情况,七百年来已經沒有。这一条新路的重行开放,也給十字軍带来了一个直接而又巨大的冲劲。早在1092年时,在匈牙利已可看到穆罕默德教商人。在这以前,在君士坦丁堡,已經建立了一个匈牙利人居留地。^①

但在匈牙利文化中,虽然日耳曼和拉丁基督教文化占着主要地位,可是值得注意:有大量拜占廷文化从君士坦丁堡流入了匈牙利。在十二世紀,匈牙利在下列两地接触了利凡得的大规模商业:君士坦丁堡和亚得里亚海畔的扎拉。它和君士坦丁堡的活跃貿易,也把希腊教会的传教师带入了匈牙利;他們和巴伐利亚的本尼

^① 比士雷:《近代地理学的曙光》,第2卷,第484頁

狄克教派、斯罗焚人以及来自弗利阿里和阿金里亚教区的意大利人相竞争。

在十二世紀，匈牙利是很繁荣的。那个杰出的中世紀德意志历史家，弗賴辛的鄂图，腓特烈紅鬍子的叔父，曾在他的〔德意志历史的〕主题之外还討論过当时的匈牙利文明之优美特征。他承认：匈牙利在物质繁荣和精神修养方面，可能和以前一样，还是远远落后于德意志；他并評論匈牙利人的粗魯态度、城市的缺少、他們住在用枝条盖成的簡陋房屋里，还处在半游牧状态以及他們的簡陋农业。其实，他的叙述，是对馬扎儿人进步的一篇頌詞，就是說，他們从完全野蛮状态走上文明大道而向前迈进。

十二世紀，在匈牙利一个最有势力的殖民和文化机构，是法国的息斯脫西安派寺院。法国文明在十二世紀中大部通过这一教派僧团对匈牙利发生了影响这一事实，是耐人寻味的。国王貝拉三世（1173—1196 年）曾娶安妮·得·沙提永为王后，她是著名的十字軍士勒瑙·得·沙提永的女儿；国王的两个最亲信顧問，是侨居于匈牙利的法国家族之后裔。他似乎力图把法国制度移接到馬扎儿文明的嫩芽之上，也許是用作为对抗德意志影响的一种力量。他按照法国巴黎式样，在佛斯布林建立了一所学校；还按照法国式样，建立了一所王家高等法院，并在 1183 年塞吐的住持訪問他的时候，面請住持在他王国之內設立法兰西息斯脫西安教派寺院。不久，这个教派占有很大势力。貝拉在馬洛斯河畔建造了厄格勒西寺院，并从香宾的彭廷宜，邀請了法国修道僧到那儿（1179 年）；他还建造了比力斯寺院（1184 年）和刻茲寺院（在赫尔曼斯塔）；前一寺院迄今尚存在着，而它的第一批人員是从貝臧松附近的阿堪来的。在王后安妮死后，貝拉三世娶了馬葛利特；她是腓力·奥古斯都的妹子。在他逝世后几年，我們看到法国詩人土魯斯的微达尔出现在其子厄美力克的宫廷上；他留下了几首关于国王对他优

厚待遇的詩。这一切表明了：在十二世紀末期，法国对匈牙利的影响，是多么大。

但是，匈牙利国王限制外国人渗透境内的企图，大多由于十字軍的东征而归于无效，因为多瑙河流域已成为到“圣地”去的一条最重要的道路。甚至在这伟大軍事冒險运动开始之前，已有几千香客，一群群地通过匈牙利东去。不可能想象，这些人群在匈牙利土地上未曾留下雪泥鴻爪。的确，在国王安德魯二世的金印詔书里(1222年)，我們可以看到有关的証据。

在匈牙利，主要的日耳曼人乡鎮，位于采矿区内。塔特拉和喀尔巴阡山脉的探险，跟着波希米亚边境上厄尔士山黄金矿的发现而进行的。馬扎儿王公，因为要依靠薩克森矿工来开矿，以优厚条件来引誘他們移入。于是，这批矿工在十二世紀中成千上万地云集于匈牙利境内，带来了他們自己的語言、法律和风俗。到了1150年，塔特拉山的斜坡上、瓦格河和波柏河的盆地上、利普多和西普斯的台地上，日耳曼人的村庄星罗棋布着。这些村庄的名称，可令人想起它們的薩克森起源。值得注意，在这些地方上有那么多的地名用“-dorf”作为尾詞，而这一尾詞是通用于薩克森地名的。同这些薩克森矿工并居杂处的，还有一大批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侨民。

最大的日耳曼人殖民地，是在德兰斯瓦尼亚；它的丰富矿苗在十二世紀中已吸引了数以千計的矿工，从厄尔士山、从塔特拉和喀尔巴阡山、甚至从条麟吉亚来到那儿；同他們混杂在一起的，还有萊茵河中游地区的大批法国人。在1191年的一项教皇文件里，这些日耳曼人被称为“德兰斯瓦尼亚条頓人”。在东南欧这一部分，迄今还有許多地名，显然是日耳曼人的。

但是，在引誘日耳曼移民移入德兰斯瓦尼亚方面，軍事理由和黄金狂热同时起着作用的。因为在匈牙利人从南俄罗斯平原移到

中欧大平原之后，他們所撤退的地区，在十一世紀早期，已由拍克涅格人和庫曼人逐漸填補了——他們屬於韃靼或半韃靼部族——他們國家的領土廣泛地綿延在頓河與多瑙河之間的黑海沿岸。由此可見，日耳曼移民，沿這邊界上移殖，也是為着防禦的目的的。最後，在第三次十字軍之後，條頓騎士，在1224年遷移到普魯士之前，在這裡曾住過若干年。

在波希米亞和波蘭，日耳曼文化的滲入，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是不平衡的，也是不同於在匈牙利文化滲入的情況的。在西利西亞，日耳曼的影響，在十二世紀以後，是壓倒一切的。在波希米亞，日耳曼的影響繼續傳布，直到十五世紀胡司戰爭時為止；但在那裡，這發展過程是緩慢的，而有時還是碰到阻礙的。在波蘭，日耳曼化的程度，從來未曾有過象在西利西亞或波希米亞那麼大；日耳曼殖民在波蘭各地方，也有著密度不等的分布。在這些地方，最早而又最廣泛傳布の日耳曼影響，是在商業和貿易方面。在第九世紀，有商人可能是猶太人，已在摩拉維亞很活躍，因為在一本編年史裡，我們看到下面一句意義重要的話：“到處可碰到商人”^①。我們甚至可看到喀羅林朝後期的一張稅率表。

從布拉提斯拉夫二世(1061—1092年)統治開始的時期，標誌著波希米亞境內一個永久的、主要是日耳曼人的社會的第一個核心在國內安居下來。在赫拉德克尼山上布拉格城堡下面，在維塞拉德街上，除了生意興隆的猶太奴隸販子外，另有一大群商人集合著。這裡也是市集舉行的場所。在十一世紀，這些布拉格市集，是聲名遠播的；小販和商人從波蘭、俄羅斯的諾夫哥羅得和基輔、意大利、法國，當然也從德意志，聞風而來到那裡。在這些商人中，很多人留在布拉格，並永久定居在那裡，特別是日耳曼人。他們在聖

① *mercatores undecumque sunt.*

保罗教会的周围地方，构成了一个团结的社会。布拉提斯拉夫賜給他們特权；主要是由他們自己选举的行政官来实行自治的权利和按照他們自己的法律来生活的权利。这是一項最重要的特权贈予。跟着岁月的流逝，他們的居留地逐漸成长而扩大；部分是由于有其他新来的商人队伍的参加，部分是由于有人口的自然繁殖；所以，后来日耳曼人在布拉格构成了一个整个街区。这布拉格社会依靠商业而变得富裕起来，而它的人口也不断地增加着。到了鄂托卡尔一世时代，它几乎占据了今天布拉格“老城”的全部面积。1235年，当这居住区周围筑起了城垣和城池以后，它成为一个真正的中世紀城市。

巴伐利亚和斯瓦比亚农民，从东南德泛滥于波希米亚边境上，象薩克森移民由于向东北欧扩展运动在那里泛滥那样。因为波希米亚有如位于德意志权力的两条巨大投射影之間的角度之內，这种泛滥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德意志在亨利四世时代，长期內乱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显著地促使了那里农民向波希米亚紛紛迁移。由于这个緣故，在波希米亚的日耳曼人口，比起在波罗的海沿岸或多瑙河省份要多得很多。

从德意志城市建設的观点看来，在霍亨斯陶芬时代的波希米亚历史，是很有意义的。我們看到：与实行城市建設的同时，出现了貿易和商业的发展和森林地与沼澤地的开垦；而这些开垦工作是由教士和貴族带来的日耳曼农民进行的。西利西亚和勃兰登堡如此，波希米亚亦然。但波希米亚不象西利西亚和勃兰登堡那样深刻地日耳曼化，而移民在它的全境內的分布，也不象在那里的平衡。捷克人口，从来未象西利西亚的斯拉夫人口那样曾丧失过它的本体。德意志历史家有着一种傾向，即把中世紀波希米亚在日耳曼移民之前的文化故意貶抑。但波希米亚文明在十二和十三世紀已优越于波兰文明，而把两者归入同一范畴，从历史观点来看，

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如果說波希米亞在日耳曼殖民時代開始之前，普通各行各業，已應有盡有，日耳曼人所帶入的，只是日耳曼人的採礦技巧和日耳曼人的手工藝工人行會制度，那也是夸大了波希米亞在日耳曼人來到之前的自給自足程度了。其實，波希米亞在各種經濟生活方面，比德意志果然落后，但比波蘭却要优越。

波蘭的偏僻地位使它長期淹沒無聞。這地勢上的隔離狀態對波蘭人所發生的影響，早在十二世紀，中世紀波蘭的最早歷史家，叫做伽魯斯者，就已經看出；他寫道：“波蘭地區，遠離外國旅行者；除了到俄國去購貨者以外，很少有人知道的”。^① 這一句話總結了早期波蘭歷史上的很多東西。這塊又廣闊又遼遠的波蘭平原，滿地湖泊和沼澤，比波希米亞的森林稠密的山區“可怕荒野”還要難於穿入。一言以蔽之，隔絕的地位使中世紀波蘭比中世紀波希米亞或中世紀匈牙利，具有更大力量，來抵抗日耳曼化。

波蘭人對天主教的熱心，使日耳曼人所建立的寺院和日耳曼僧侶在波蘭成為頭等重要的經濟勢力。因為在那里，象在早期西歐那樣，建立一所寺院，一般就是一種殖民的行動。這些寺院同德意志境內它們的母寺院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在它們所屬地區內的民眾中間又傳布了自己的文化和風俗。修道士們從德意志帶過來農作和園藝的新方法；他們還深入民間，教導他們如何改良耕種的方法，因而他們對農民的社会經濟狀況，產生了一種有利的影響。

手工藝人和職工也來供應新寺院的移民居留地上的需要。但贈給這些團體的土地，不一定包括使當地居民淪為農奴之權利在內。因此，寺院常常被迫輸入外地的勞動者；他們照例多屬於不自由的階層。“在這方面，寺院在它們進入波蘭以後，是唯一的大土地私有者；它們在組織大莊園和使用半自由的外國農夫方面，提供了榜

^① “Regio Polonorum ab itineribus peregrinorum est remota, et nisi transeuntibus in Russiam pro mercimonio paucis nota.”

样，而这些农夫遂成为附着于土地的农奴了。”

在相当时期之后，日耳曼商人也进入了波兰，并在“居住区”内开始了营业，象他们在布拉格及其他波希米亚城市曾经进行的一样。

波兰的老城市：克拉科、勒伏（勒谟堡）、波兹南（波森）和波罗克，接受了大量日耳曼商人的流入；因而它们在德意志本国，被看作日耳曼人的商业、文明和政治势力的前哨。当地城市的法律被马德堡或哈勒的法律所代替；日耳曼银币也成为那里的主要通货；连市政记录也开始以德文来书写。这样一来，这些城市成了日耳曼势力的堡垒。在十三世纪初，还由于条顿骑士团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扩展，日耳曼庶民的流入波兰特别多。

波尔斯拉夫五世（害羞者，1243—1279年）尽力帮助了这项日耳曼化的过程。在他的时代，从奥得河东勃兰登堡来的殖民运动是富有侵略性的。维斯杜拉河畔的日耳曼人殖民运动也受到了一个有力的冲击。普鲁士人的土地被条顿骑士团所强夺；在那里慢慢地进行着日耳曼化和基督教化。就波兰国王来说，他们帮助条顿骑士来征服普鲁士这一行为，是非常盲目的。普鲁士的最后一个凶狠的土酋，斯维多波克，被骑士团击败，而后者是获得波兰国王的支持的。

但在这些边境国家的文化史上，还有一方面也应该指出。虽然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波兰大部分是面向西方的，但我们不该忘记：它们的东疆是和俄国接界的。那和德意志毗连的三个国家的东方界线是从波罗的海绵延到黑海岸；通过这条界线，波兰人、波希米亚人、马扎儿人，同中世纪俄罗斯，进行了贸易；而后的主要贸易中心是在诺夫哥罗德和基辅两城。1241年，蒙古人的猛烈侵袭几乎摧毁这一条交通线。只从东欧方面来说，基辅的被劫掠以及诺夫哥罗德同拜占廷与巴格达的联系之被割断，是中世纪商业

史上的一个轉折点。由于这一条古老的、竞争性的发兰琴商路的破坏,威尼斯和热那亚获得了好处,因为那使几乎所有利凡得貨物的运输投入了地中海方面。

韃靼人的大举侵入俄国,对波兰还有另一种影响。波兰的一大部分人口不是被消灭,便是被驅散,因而新的一批德意志移民又涌入了波兰境内。

波兰的江山破碎,而它的人口或被驅散或被消灭。难民向北逃亡,有助于人口稀少地区的移殖,也有助于維斯杜拉河以东馬卓維亞森林地的垦荒。在韃靼人退出之后,日耳曼人接踵而来了。他們沿着最少抵抗力的路綫前进。新移民免受垦荒者的艰苦和辛劳,因为他們所占夺的土地,在几百年以前,已經用于耕种的目的。所以,他們无需清除原始森林或开垦一片完全荒野。^①

那里的实际殖民的方式,类似勃兰登堡与波希米亚的方式。那就是由一个代理人負責把农民移居于一块土地上的方式。波兰貴族与地主,为了尽速吸引移民到他們荒蕪的土地上来,不得不提供特殊的优待条件,因而土地的授給,是附有豁免若干年賦稅的权利的。移民所負担的唯一义务,是那由代理人征收的每年繳付的地租而已。

① 利文斯基-科文:《波兰史》,第36頁。

第二十一章 斯干的那維亞*

在卡紐特大帝(1000—1035年)时代之后,丹麦的領土只包括日德兰、芬宁与西兰諸島、瑞典南部的斯干尼亚(即瑟宁)以及德意志波罗的海的沿岸部分。約在1100年时,有一个班堡的教士曾周游丹麦,他遗留下来一段描写这个国家的話:“这个国家有着市鎮与村庄,而沒有城垣,只有木栅和土堤。所有的貴族住宅和教会建筑物很簡陋而又粗俗。居民的职业主要是狩猎、捕魚和飼养牲畜;由于他們农业的可怜状况,他們所有的財富都是以牲口来計算的。”

但在十二世紀时期中,丹麦的商业和物质与精神文明得到迅速发展。城市增加了。这些城市几乎一般都是建立于海岸上,因为丹麦人习于航海远甚于种田。当他們筑造城垣以防海盜的时候,我們看到城市大部的名称是以“堡”(borg)作字尾,而那些住在城內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叫做堡民〔即市民〕。阿尔堡、法林斯堡、服庭堡和費堡,可作为例証。另一些城市,在丹麦和在法国与德意志一样,是在寺院周围成长起来的。其他城市的兴起可直接并特別归因于貿易便利的自然地势。丹麦地名的附加詞“-kjoebing”(意即“市場”)提供了关于这些城市起源的綫索;其中哥本哈根(kjoebenhavn 意即“市場港”)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哥本哈根是在1165年由伦德城主教阿布沙龙建造的;他在港口曾建筑一座城堡,为的是要保护商人以防海盜的掠夺。

什列斯威的利伯和哈德比,是丹麦在德意志大陆上的最重要城市。不来梅的亚丹告訴我們說:人們从什列斯威搭船东行到贊木納,从那里再东行,可达俄罗斯。人們从日德兰的另一边的里

* 地图: 錫倍德:《历史图册》,第58—59頁。

本，搭船西行可达薩克森（不來梅）、佛里斯蘭和英國。在十一世紀，那位于日德蘭半島上更北地方的亞胡斯城，同丹麥島嶼、斯干尼亞和挪威，有着貿易上的聯系。在古代，西蘭島上的羅斯基爾德，是國王的駐所。倫德城位在斯干尼亞，據不來梅的亞丹說，“在那個城里，有大量黃金，而這種黃金，是他們掠奪波羅的海地區中無數野蠻部族得來的，而丹麥王為了獲得貢物，容忍了這些海盜行為”。

沿波羅的海的南岸，在各河流的口上，有一些丹麥商人的居留地設在于古代斯拉夫城市里，如在斯德丁、服林和但澤城內。這些丹麥商人曾嫉視那些擠入了易北河彼岸的德意志商人；後者還力求在奧波德人和波美拉尼亞人中間進行貿易。在好多年內，丹麥人與德意志人之間存在着劇烈的競爭。但是，1124年德意志人的征服波美拉尼亞、1147年亨利獅子的十字軍以及1158年律伯克城的建造，終於轉變了形勢；德意志人的商業優勢把丹麥人從波羅的海地區排擠出去。在這多事之秋，丹麥、斯拉夫和德意志海盜雲集在波羅的海和丹麥海峽上。

丹麥人雖然已被擠于梅喀梭堡和波美拉尼亞，但還堅守着什列斯威，並雄心勃勃想要伸展勢力于霍耳斯頓，從而得占取那扼守地峽及波羅的海與北海之間的一條重要商路的漢堡和律伯克兩城；而這一商路比那條穿過海峽的又長又危險的很難航行的商路既較短，又較可避免海盜的搶劫。所以在十三世紀早期，我們看到丹麥人力圖利用由下列事件所產生的混亂情勢：薩克森的瓜分、亨利獅子的垮台以及腓特烈二世統治的早期的敵對衝突。年輕皇帝布倫斯威克的鄂圖，為了壓制皇位企求者，曾向丹麥建議，願以霍耳斯頓、勞英堡和部分梅喀梭堡給丹麥人來換取他們的援助。漢堡和律伯克因此震驚，並獲得了北德王公的支持來反抗丹麥人。這項衝突在彭霍維德戰役里（1227年）獲得了解決；這次戰役阻止

了丹麦人侵略德意志領土的野心，有几百年之久，并使律伯克得順利組成了汉撒同盟，把它的商业势力扩展到整个北方地区。

在十三世紀窩得馬尔二世的統治时代，我們看到，所有由漁村、海港或市場地点或堡垒周围形成的丹麦城市依然是小型的。在这一世紀，丹麦对英国的貿易，大部是利伯城的貿易。1208年，英王約翰把一个利伯的市民尼古拉·馬利尼拉斯，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約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来自利伯的“丹麦商人”，里瑟維那斯·得·里帕。1300年左右，利伯是唯一的有船只开往英国去的丹麦城市。在那个时候，丹麦商业已在汉撒同盟控制之下。

在上面略談了丹麦商业史以后，我們就可轉到挪威的商业史了。由于它地理位置的关系，挪威的大部貿易，是对英国的貿易。必須記牢：在这时期，挪威的势力籠罩着大部西方島嶼：冰島、格林兰、奥克尼、赫布里底、設特兰群島以及曼島。它有时还控制着部分爱尔兰地方。挪威本部是一个荒凉不毛之地。它的居民依靠飼养牲畜和捕魚以及一些狩猎来維持生活。国内人口过剩和大貴族間的几乎不断的战事常常迫使他們离乡他去。但尽管有着这些令人丧气的情况，我們也可看到它的和平时期，其时，賢明君主力图发展他們的国家資源。因为挪威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必須依靠捕魚，所以他們得成为优良水手；我們看到他們在北方地区經營着广大的運輸貿易，直到他們从这项有利的事业里被德意志商人排挤出为止。

关于挪威的商业，我們很早已有所聞。維肯早在十一世紀已有薩克森和丹麦商人来到，冬夏都有。維肯居民自己也常常航行到其他国家去：如到英国、薩克森、法兰德斯、丹麦去。挪威城市有着市場，在那里外商輻集，向本地人采购剩余商品。在这类性质的城市中，通斯堡是最早的重要城市。約在同一时期，还有刚吉赫尔、斯塔凡革、斯騰基佛、利凡革諸城。尼德拉斯(德隆亥姆)曾由奥罗

夫·特力格維森建造起来的，但在奧拉夫虔誠者(1015—1030年)統治之前，還未曾顯出什麼重要性。奧拉夫虔誠者曾建造薩普斯堡(在腓特烈斯塔德附近)；哈羅德·哈爾德拉德曾在1050年建造奧斯陸(克立斯坦尼亞)。奧斯陸遂成為挪威首都，因為它比其他城市較少冒着丹麥“外侵團”襲擊的危險，並從很早時期起，已成為勞馬立克和黑德馬壘的勢力最大貴族的“外侵”船只的停泊港。它也是一個外國商人的集合所。卑爾根注定要成為挪威所有商業城市中的最重要的城市；它是約在1075年由奧拉夫·庫爾建造的。在這以前，它也曾用作本地“外侵”船只和外國商船的一個停泊港口。

挪威的有些進步國王，在和平時期，曾努力開發他們國家的資源，並特別獎勵對外貿易。在哈羅德·哈爾德拉德時代(約1050年)，儘管對丹麥發生戰爭，它的對外貿易，沒有停止過，甚至和丹麥的貿易通過中立國船只也在進行，象奧登·伊斯倫庭斯和斯尼格魯-哈勒的歷史所指出的那樣。挪威和北歐國家，尤其是和英國，有着繁盛的貿易。據說，索爾在他航行到英國的時候，曾長久逗留在那裏，並帶回了許多名貴的東西給國王。當斯尼格魯-哈勒在漫遊英國後要想返家時，他曾企圖搭乘一只挪威船(看來那在英國港口是一件普通事)，但有那麼多的德意志人，帶着無數的貨物，占滿了船位，以致沒有空位給他，因而他不得不使用恫吓來獲得船位。丹麥、英國、愛爾蘭、蘇格蘭、法國和德意志是挪威人所與經商的主要國家；丹麥、英國、薩克森和德意志的船只常至挪威港口，特別是維肯港。挪威船還開入俄國港口內，來採購毛皮和名貴的亞洲貨物。它和格林蘭與冰島也有着貿易關係。

在十二和十三世紀，挪威的貿易變為更加廣泛。國王愛斯坦做了很多工作來鼓勵商業與工業。他改良法律，建造了許多教堂，他通過誘導、賄賂和曉以利害的方式，重獲屬於瑞典的耶姆特蘭省

的归順；这一省在哈康好人时代本来是属于挪威的。因为知道漁业作为自然資源的重要性，他命令在瓦根建造茅舍，以便漁夫的寄宿；还建造一座教堂和寺院使他們获得精神上的幸福。因为在亚格德尼斯常有船只遭难，所以他在那里建造了一条石堤来筑砌一个人造港口。他在有些山岩和海角上設置了航海标志和灯塔来向水手指示沿着危险的海岸航行。在息革德·馬格努孙时代(1130年)，卑尔根是一个又古老又富饒的城市。奥得立克說道：世界各地的船只滿載財物而来到那里。我們也可从拉涅发德·查尔的記載里获得与此相同的印象：他在从格林斯比到卑尔根的航程上曾看到該城的貿易欣欣向荣，那里的世界性不断增长。《史話》說：“船只来到这个城市，在那里集合着大批来自南北两方的人們；还有很多外国商人，他們把大量良好物品帶入境內。”

卑尔根成了欧洲大规模的漁市場。不久它还成了冰島商业的商埠。第一批在这奥拉夫·庫尔的新城市里享有貿易特权的外国人，是英国人。它和北德城市、苏格兰和冰島，也有着大量貿易。在十二世紀，在卑尔根有着若干船只，叫做“英国航船”。这些船只只是属于挪威的。它們把蜂蜜、羊毛、布匹和葡萄酒运入卑尔根。葡萄酒一定是从萊茵兰或法国来的，而英国商人似乎曾是这项貿易的中間商。在卑尔根和斯卡諾尔与福尔斯特博的富饒青魚漁場之間，还进行着貿易。

曼茲柏立的威廉談到約克的商业时說過：該城有从德意志和爱尔兰（特别是从爱尔兰的挪威城市，都柏林和窩特福德）来的商人。英国东海岸上另有一个重要商业城市，是格林斯比；那里在十二世紀初，已有挪威、奥克尼、苏格兰和赫布里底的船只开到。挪威人在格林斯比的商业，甚至在亨利一世时代(1100—1135年)，案卷里已經提到。在十一世紀，英国西海岸上最重要的城市，是底河畔的切斯特。从《末日审判册》(“Domesday Book”)里，我們知道，

英国北方的毛皮貿易，对切斯特來說，是很重要的。在爱德华懺悔者时代，該城每年向英王繳納貂皮稅。因为挪威已控制曼島、奥克尼和赫布里底群島，切斯特可能同挪威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曼茲柏立的威廉曾称布里斯多是“一个著名城市，它的港口寬闊，可容納所有从爱尔兰、挪威及其他外国地方来的船只”。从另一資料，我們看到：1190年卑尔根对德意志人的主要出口物是奶油，而它的主要进口物是葡萄酒；其时从英国运来的有：小麦、蜜、蜡、布匹和銅鍋。我們在下面引述一段关于1191年卑尔根的有趣的描写：

卑尔根，从它的卓越地位看来，是这国家內一个最大的城市，它包括有一座王室城堡和很多古迹……有很多居民，并为僧侶与尼姑建造了很多寺院。它的資源富足。干魚的数量不可胜述，这种干魚叫做“Skrejd”。这里是从世界各地来的船舶和商人的一个汇合所；他們来自冰島、格陵兰、英国、德意志、丹麦、瑞典和哥特兰。关于蜂蜜、木材、优良布匹、青魚及其他物品，它有着大量剩余。几乎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买到。

在十三世紀，挪威人特地来到英国东海岸上进行貿易，他們来到格林斯比、波斯頓、雅穆斯、斯卡巴洛，尤其是林尼。挪威王斯汾同英王約翰曾簽訂一項条約，并从他获得了軍事援助。挪威王哈康·哈康孙，在他登位之后不久，1217年秋，又同英王亨利三世訂立了一項商約，這項商約后来在1269年在溫彻斯特予以續訂。尼达洛斯的大主教和在卑尔根附近立士城寺院，还从英王获得了某种通行稅豁免权与貿易特权。挪威和英国的貿易，在十三世紀中期可能达到了高峰。那在十二世紀后半期发生的农民战争，到了1227年，由于它的基地利邦加城的陷落而告終止。在这以后，挪威的貿易和船运能够欣欣向荣。我們看到，它的商业在哈康·哈康孙的时代，有着显著的增加。1224年6月底，曾有十五只挪威船，停泊在林尼港口；这个数字在十四世紀中从来没有达到过。在

下一年(1225年),数字还要大。在1225年8月,英王亨利三世曾指令港口官吏欢迎挪威船只。尽管有禁止谷物出口令,他特准这些商人輸出一千“担”小麦。在伦敦,德意志人对挪威人的竞争十分强烈,因而在十三世紀后者的商业活动局限于英国更北地区的港口。1215年,我們听到最后一只挪威船开到布里斯多港;在伯斯条約之后,就是在赫布底里和曼島割让給苏格兰之后,它和布里斯多的联系就中断了。在下一世紀的中期,德意志商人由于从英王强索到若干貿易特权,实际上已控制了卑尔根和它的商业。

瑞典,在1000到1300年間,只包括近代瑞典的东部。斯干尼亚,即今天瑞典的最肥沃部分,在那个时候原本属于丹麦的。当时,瑞典也許是斯干的那維亞国家中一个最未开化的国家,因为它和欧洲的文明中心隔离得最远。它的联系,主要是和俄罗斯的联系。然而,不来梅的亚丹却說它是“一个很富饒的国家,盛产谷物、蜂蜜,牲口也飼养得很多。河流和地势,都是有利于各种对外商业的”。另有一个作家写道:在“外侵团”时期,瑞典的出口貨包括有奴隶、毛皮、馬匹(因为瑞典馬是出名的)、羊毛、魚类等等。稍后,它的木材和鉄也被列入出口物中。水上旅行比陆上旅行要容易,因为那里沒有公路。瑞典人,可以說,是以打猎、捕魚和飼养某些牲口为业的人民。到了这个时期的末期,它才有一些农业、小麦的种植和某种程度的鋼鉄制造业。瑞典人对于制造武器和盔甲以及造船事业,具有特长。到了十三世紀,在哥特兰有鑄鉄厂,在法勒姆有鑄銅作。在三个北欧国家中,只有瑞典的位置很差,除了和半开化俄罗斯貿易外,是不利于貿易发展的。因为波罗的海几乎是一个封閉的海,而在斯加基拉克灣畔唯一通北海的港口哥騰堡,又在丹麦人的控制之下。在好多年代中,瑞典其他唯一的貿易地点,是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柏卡,但它很容易遭受海盜的袭击。

波罗的海上对外商业的中心,是哥特兰島上的維斯比城。它

是波罗的海和北海上东方貨物的分发站；这些貨物是从黑海經俄罗斯境內河流到諾夫哥罗得而来的。在“外侵团”时期，哥特兰是北方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象在島上业已发现的大量阿拉伯貨幣所証明的那样。大量英国貨幣以及許多罗尼文^①碑銘（紀念那些死在外地尤其是在英国的侨民）表明了：瑞典和英国之間的商业往返，在这个早期，一定是相当頻繁的。在十和十一世紀，維斯比并不重要，而在德意志人定居在那里之前，也未曾成为一个城市。但在維斯比兴起之后，瑞典本地人的貿易，在德意志人的竞争之下衰落下去，但也未曾完全落入这些外国企业家手里，因为在十三和十四世紀我們在外国还可看到从哥特兰来的商人；他們的名字是属于純北欧人的，而且他們也不是属于汉撒同盟的。在伦敦，瑞典人老早已享有某种貿易特权，象丹麦人和挪威人一样。早在十一世紀，瑞典人在諾夫哥罗得已开店营业，并在1152年，在那里还有着自己的教堂。律伯克、汉堡和不来梅的德意志商人，对斯干的那維亚运输业來說，是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他們終于把它完全破坏。

① 罗尼文 (rune)，是最早时期条頓字母；斯干的那維亚人曾使用过这种字母。——譯者

第二十二章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西班牙(711—1284 年)

中南部西班牙，虽然毗連欧洲大陆，但按地质和气候，它很象北非洲。安达卢稷亚、木尔西亚和瓦連西亚，只有两个季节，即湿季和干季。它的常年雨量，少于意大利或希腊；后者位于同一的緯度上的。这种地势和气候的东方性可能部分說明为什么摩尔人和柏柏尔人对西班牙状况特别适应的原因。

西班牙是穆罕默德教帝国中最早脱离东方哈里发政权的一省。安达卢稷亚在阿布的拉曼时期(公元 756—788 年)，宣布为独立国。然而，直到阿布的拉曼三世时代(他死于 960 年)，它的統治者才采用了哈里发称号，而王国也改称为哥尔多华哈里发国。从西班牙哈里发国的建立起，北非洲和安达卢稷亚之间的联系，是密切的。柏柏尔人，在西班牙穆罕默德教人口中，占着一大部分，他們同海峡对岸的同族人維持着亲密的接触。原来，在征服西班牙后的第一个半世紀中，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之間进行着剧烈的竞争，因为前者要求西班牙作为他們的征服地。于是阿拉伯人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移入半島上的运动；因而奥米亚亲王阿布的拉曼，也曾来到那里。这运动的结果是：阿拉伯的灿烂文化輸入了西方并极其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另一方面，穆斯林西班牙和非洲联合成为一个統一国家，称为“两岸帝国”。

在穆罕默德教征服北非和西班牙后的三百年期間，阿拉伯文明在西欧是属于最优秀的文化。欧洲人前些时候所不知道的农作物，现在被輸入并有利地种植起来了，稻子、甘蔗、棉花、枣子、蕃紅

花、生姜、沒药树、桑树、楊梅、檸檬、木瓜、无花果、石榴、菠菜、芦笋、荞麦和芝麻，一般认为是由摩尔人传入西班牙的。橄欖、葡萄、生梨和苹果大量生产；为了取得香料，各种不同的花也培植起来。农业在别处还只是手工劳动的时代，在阿拉伯西班牙，却已取得科学的名称。諸哈里发对于耕种土地深感兴趣，并以自己的花园为自豪。又从摩尔人的諺語里，可知农业在他們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如何；諺語說：“誰要是耕耘播种，使土地生产出人类的食粮或牲畜的飼料的，誰就是作出一种貢獻，而这种貢獻在天堂上将記在他的帳上的。”他們把农业作为一种科学来研究，可从大批阿拉伯园艺术論著里看得出来。而且，王家花园也是由著名的植物学家負責管理的。

在十二世紀，西班牙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农业和农业經濟的作家：易宾·阿尔·亚汪和阿布·撒加利亚。他們都是塞維尔人；他們都曾受到羅馬化西班牙人科琉麦拉的著作的影响。前者在西班牙十分受重視；他的論文迟至 1802 年，还从阿拉伯文譯成了西班牙文，以利西班牙农民。易宾·罗永有指导性的田园詩是評注摩尔人农业优越性的一篇有价值的文字，同时易宾·卡尔頓的論文在几百年中远优于基督教欧洲任何类似的論文。他甚至发展了一种关于价格和資本性质的理論。

由于大量土地上的干旱情况，必須有高度的工程技术来建造灌溉运河，使山上融解的雪水得流到盆地上去。哈里发对于建筑引水道和灌溉运河曾耗費大宗款子。阿布的拉曼三世曾使用一条引水管，来供給哥尔多华城的用水，就是使水从山上通过鉛管而流入城内。这不过是許多工程中的一个例子；因为近代西班牙所有的灌溉系統，只是从中世紀阿拉伯人工程所遺留下来的东西。

牲畜飼养是中部和北部西班牙摩尔人中間的一項重要实业，特别是养羊事业。甚至早在羅馬时代，西班牙是以羊毛著名的；在

711 年穆罕默德教徒征服西班牙以后，半島上的养羊事业还有增加，因为摩尔人和柏柏尔人本来是个游牧部族。他們从非洲輸入新的羊种来改良品种。据說，阿布的拉曼三世“为飼养牲口建造了大型石槽，也为馬匹建造了飲水池”。这些建筑物可能是在市場的地点上；但因为境内一大部分土地需要灌溉，它們也可能是給牧場上牲口以飲水的。在若干城市里，給水处成为地方性市場的地点。摩尔人还注意于飼养山羊和养蜂事业。这些农村实业的提倡，使乡村有可能維持稠密的人口。他們堆积食粮以防长期的旱灾；谷物存儲于大型的地窖^①内；由于气候的干燥，这些谷物可以无限期地保藏下去。

摩尔人西班牙的最肥沃省分，是安达卢稷亚和木尔西亚。安达卢稷亚，有着半赤道性的气候，是西班牙半島上的花园地区；在那里种植着枣子、甘蔗、棉花、橄欖等等，同时，加达尔几維河平原是一个真正的谷仓。葡萄酒也是它的一种重要产品，特别是在黑累斯[Xerez, 英文“Sherry”(白葡萄酒)一詞由此得来]地区^②。瑪拉加也是一块著名的产葡萄区，它輸出大量葡萄干。木尔西亚和安达卢稷亚相同，在摩尔人科学方法的耕种之下，出产小麦、橄欖、織物原料、桔子、甘蔗。

摩尔人进行开发他們征服地上丰富的矿产資源。他們开采金、銀、錫、鉛、汞、銅、紅色与黃色赭石、矾和鉄。这些矿物原料本身是有价值的，但其中很多物資，用在工业技术上，价值更大。他們的主要工业是制造剑刃。托利多的剑刃，因为形式美观和品质优良，馳名全欧。在哥尔多华附近，阿尔-曼苏曾設立制盾工場，据說那里每年出产一万二千只精美的盾。木尔西亚是制造各种銅鉄

① 布計尔认为这些地窖，在西班牙羅馬人时代，已被使用过。其他的人主张：它們是由西班牙摩尔人发明的。

② 西班牙的都会，即今日的澤勒士(Jerez)。——譯者

工具的中心。几乎每个摩尔城市从事皮革制造业。所謂哥尔多华和摩洛哥皮革，是世界上最好硝皮厂的出品。摩尔人把棉花种植和絲織工业传入了西班牙。西班牙摩尔人所生产的生絲和所織造的綢緞，在全欧洲都有广大的銷路。亚尔美里亚制造出顏色漂亮、质地精致的头巾，馳名全世界。毛毯是在条拉拉制造的，顏色鮮艳的呢絨是在格拉那达和巴撒制造的。穆罕默德教工人还生产其他商品，如玻璃或陶瓷花瓶、鑲嵌品和珠宝。

摩尔人的財政收入，包括有对动产和不动产所征的賦稅，从領地上租戶所征的地稅，对农业、工业和商业所征的什一稅以及关稅。在他們最繁荣的时期，这些課稅額是根据調查資料来规定的，但由于哈里发国家的分裂，賦稅制度漸失公平性而变为专橫了。

在摩尔人的黄金时代，即第十世紀，哥尔多华城具有一个近代城市的許多特征。在城內有着許多工厂和作坊。街道鋪着石子，并砌着人行道。据說，在黑夜里“人們能够依靠来自一排綿延不断的房屋的灯光，走十哩路”。

哥尔多华的哈里发国，同东羅馬帝国保持友好关系。早在 839 年，据史籍的記載，“那位于法兰克人境外的城市”即君士坦丁堡的“国王”派使致送礼物給阿布的拉曼，并請求和好。在 949 年希腊大使在哥尔多华曾逗留了若干天，并有一位专使伴送他們返国；他們携回哥尔多华的礼物；其中包括有裝飾着漂亮馬具的安达卢穆亞馬匹以及托利多和哥尔多华的精制兵器和盔甲，还有安达卢穆亞其他的名貴产品。

但西班牙摩尔人对外貿易的大部分，当然是和穆罕默德教的世界部分，而非和基督教国家进行的。西班牙的絲和羊毛，包括原料和織品，运送到叙利亚、非洲和埃及市場上去。在这項貿易中，珊瑚、洋紅、水銀、鉄和其他金属以及武器占着显著地位。作为这

些物資的交換，香料、染料和膏藥從東方運到西班牙來。在十二世紀，據說，有多到千數的船隻經營這項利凡得貿易。在十二世紀之前，地中海地區的薩拉森人的商業，比基督徒的商業要大得多。意大利城市，尤其是熱那亞和西班牙摩爾人之間的貿易關係，出現於十一世紀的中期。一般的往來航程，是沿着巴巴利海岸經過加的斯和布羅溫斯的。這項貿易把金屬尤其是銅以及明礬運到熱那亞去。亞爾美里亞位於格拉那達王國內，是西班牙的主要港口；在那裡雲集着從敘利亞和埃及、比薩和熱那亞來的船隻；它以千所接待旅客的旅舍和四千所織造廠為自豪，此外還有銅、鐵和玻璃製造工場。在 1149 和 1161 年，熱那亞人和摩爾人王國，木爾西亞和瓦連西亞，曾談判通商條約。我們可看到，1155 到 1164 年間商業組織所訂關於熱那亞人在突尼斯、的黎波里、修達、布吉亞及其他非洲地點貿易的契約紀錄。熱那亞人似乎和修達與布吉亞保持着特別友好關係，因為他們在那些城市里有着常駐領事。1133 年，亞摩拉維德王朝蘇丹曾派遣使節到比薩，而使節受到了優待。比薩人重視從格拉那達來的無花果貿易。據記載，1186 年，在比薩和阿布·優素福·耶庫布（耶庫布·優素福的兒子，阿爾摩黑德哈里發）之間成立了一項新條約，訂定在比薩和修達、奧倫、布吉亞、突尼斯和安達盧穆亞各城市之間以二十五年為期的和平貿易。1180 年，諾曼西西里和摩洛哥國王簽訂了一項條約，後者控制着“全非洲以及西班牙的薩拉森人”。佛罗伦薩從瑪拉加和亞爾美里亞，獲得了大批織物原料的供應。在法國和西班牙摩爾人之間，很少商業往還。而且那不是一種直接貿易，而是通過卡塔倫人和巴斯克人進行的貿易。有些摩爾商品，在 1200 年之前，已遠達北方的法蘭德斯。

然而，儘管摩爾人西班牙在外表上顯出美好的物質繁榮景象，但它的文明却是脆弱而太不牢固。它和非洲的政治與宗教接觸曾

两次引起柏柏尔人的半开化和狂热教派，即亚摩拉維德派和阿尔摩黑德派的侵入——一次在 1087 年，又一次在 1146 年。这些事件在政治上扰乱了哈里发国家，使它所建立的高度而又开明的阿拉伯文化向后退却。穆罕默德教地方长官或总督趁机抓取权力，并使自己所管的地区尽量脱离中央。在十一世紀，哥尔多华哈里发国家瓦解为各个几乎独立的穆罕默德教小国，很象第九世紀法兰克帝国分裂的情况那样。而且，这些小国王公多半又和本是他們的共同敌人——北方的基督教王公——相勾結。

除了这些不利的外部力量之外，还有内部力量来促使哈里发国家的瓦解；这些力量属于政治性的少而属于社会性的多。摩尔人西班牙，是“一个种族和信仰复杂的混合体，不受什么指导原則的支配的”。在它的人口中，存在着有分裂可能的成分：阿拉伯化的基督徒，他們生活在穆罕默德教的統治之下；西哥特农奴的后裔的旧基督徒，他們为了获得自由而归依伊斯兰教以及犹太人。

在阿拉伯化基督徒中，很多人被任用于行政部門，有的甚至升任为大臣或軍隊司令。阿拉伯化基督徒有时連自己的拉丁語知識完全忘了，以致他們的聖經和教会法规需要譯成为阿拉伯文。他們在人口中是最馴良的分子；跟着時間的进展，他們在种族上和宗教上可和征服者完全同化。另一方面，那些改信穆罕默德教的旧基督徒，从一开始起，就是一个不調和的集团；穆罕默德徒和基督徒都是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他們。正是他們，煽动了总督的分裂傾向，甚至自己也在阿尔加布、木尔西亚和托利多創立了半独立的小国，在 853 到 933 年的时期，托利多是一个分离的“旧基督徒”国家。这些叛徒又常常逃往卡斯提尔和阿拉貢軍隊里去，不时来侵扰边境。瓦連西亚和木尔西亚的国王，易宾·瑪达涅岐，穿着基督徒的服装，說着流利的卡斯提尔語，有着一支主要是由那瓦人、卡斯提尔人和卡塔伦人所組成的軍隊。他的主要軍官是：烏耳赫尔

男爵的两个儿子和息德^①的最著名的副官阿尔发·富尼士的一个孙子。犹太人人数很多,构成了人口中第三种非摩尔人的成分。他們曾遭受哥特人不容忍政策的痛苦,并在711年实际上帮助了穆罕默德教徒对西班牙的征服;他們一般地是被容忍的。他們的商业本性和营业上的求利心使他們成为社会上一个有价值的經濟因素。他們多被任用于穆罕默德教文官职务方面,象稅收的承包人或稅吏那样。在十一世紀,有犹太人父子两人,撒母耳·哈·勒維和約瑟,担任了格拉那达的大臣达五十年之久。但他們的財富、他們的尖銳竞争、他們的包揽賦稅与决定稅收政策的地位,后来引起了反对犹太族的很大的經濟偏見。但如果西班牙北方的基督教西班牙人未曾进行那势不可挡的战争,所有这些社会成分——摩尔人、阿拉伯化的基督徒、旧基督徒和犹太人——很可能在种族上和宗教上終将融化为一个单纯民族的。但是,西班牙基督徒对摩尔人国家的經常进攻,使和平溶合的过程受到阻碍,因而分裂趋势加剧起来了。

现在,当我们轉到北方的基督教西班牙时,所看到的情况,总的說,显然是不同于南部西班牙的情况的,無論在地形、土壤、人口或文明方面。

在中世紀时代,基督教西班牙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是位于条件最差的地点上。它处于大陆的西南角,沒有国际通路橫穿境內。庇里尼斯山的巨大屏障,几乎割断了它和北邻之間的交通綫;又在十二世紀之前,穆罕默德教国家的强大海权扰乱了原来可經營的海上貿易。在大西洋沿岸,几乎沒有商业可言;从东方来的商业,是流向意大利和布罗溫斯,而不是流向西班牙的。而且,半島上崎岖地形,它的高原、纵横的山脉和不通航的河流,严重地阻碍着它

① 息德是西班牙的拥护基督教和西班牙老王族的勇士。——譯者

的商业交通和它的自然物資的運輸与交換。因为所有半島上的河流，都发源于那些几乎完全环绕高原的山脉之間，又因为河流很急，内河航运是不可能的；摆渡或架桥，也是同样困难的。所以，这种地势上的隔离状态注定要把这地区分成为若干小邦；这些小邦在中世紀时代的联合，从来没有完全实行过。这种地形上巨大差别还伴随着那由于許多山脉而产生的气候上的差别。中部西班牙是一块高的而又近乎干燥的台地，由加达拉馬山脉分成为两部分。由于这种广大地形的差别，要总述中世紀西班牙的經濟社会历史，是不可能的。最妥当地說，它的地形与气候是特別宜于游牧与牲畜的飼养。

在第九世紀查理曼帝国的总瓦解时期，“西班牙駐防区”也在瓦解；于是摩尔人再度侵入厄波罗河以北的大块領土；从那里他們曾被法兰克軍隊所逐出。大部基督教居民看来不是被毁灭，便是逃入了高卢。有的避难于少数有城垣的城市，象巴塞罗纳、微克和吉罗纳那样；它們能够抵御摩尔人軍隊。摩尔人騎兵虽蹂躪并破坏了平原地区，但不能穿入那些又高又偏僻的庇里尼斯山間的要塞，即居民的避难所。

北部西班牙的基督教居民在第九和第十世紀，曾組成几个凶狠善战的小邦；它們的合并終于形成了今天的西班牙。可是在中世紀时代它們虽有某种程度的联合傾向，但从来没有完全統一过。在西北部，人口属于巴斯克人，从来没有完全被羅馬化或高卢化。巴斯克人是一个頑强、耐苦、非常民主的部族；他們住在內地的，是小农和畜牧者；住在比斯开海岸的，是漁夫和捕鯨者。在那瓦和阿拉貢，人口是属于羅馬化的高卢系；他們住于夹在庇里尼斯山巒峰和支脉之間的高地上，几乎完全以畜牧为生。只有住在东北海岸的加达魯尼亚人——政治上已組成巴塞罗纳的一州——可以說有了一些商业。

在横跨西班牙北部从大西洋到地中海的大山脉脚下，那些最早成立的小邦有：(1)阿斯都里亚小邦；它是从来没有被摩尔人征服过的山间避难所。它位在一条窄狭的地带上，在北部以迫近海岸的一支山脉为界，在它和内地之间，隔着一条巨大山岭，只有由奥维亚多(阿斯都里亚的一个重要地点)所扼守的培托·得·帕查斯大路这一条山路。这块偏僻的小领土，从来没有被侵略军队穿过；在那里，耐劳而文化低的基督教居民进行他们的畜牧，因为高温滋养着茂密的青草。(2)那瓦小王国；它崛起于阿斯都里亚之东，在判普罗那周围的比斯开湾的转角处。这地区富于森林和山间牧场；在那里畜牧几乎是唯一的职业——除了对摩尔人的战斗之外。(3)那注定要在后来成长为阿拉贡王国的小州；它位于那瓦之东，插入那瓦和巴塞罗纳沿海州之间，正是在阿卡河——厄波罗河上游的支流——流域的底里尼斯山的中央。在第九世纪，“阿拉贡”这名词只指那位于流域上部的一州。在这里，经济资源也几乎完全是牛、羊与猪；后者在橡树和栗树的广大森林中，觅食果实。(4)巴塞罗纳州；它位于地中海沿岸，拥有一个古代罗马与西哥特的港口。它在西班牙北部边境上基督教国家中，可以说是有着一些商业的唯一的国家，而这项商业，在第九和第十世纪，因为受到地中海上穆罕默德教海权的阻挠，也是微乎其微的。

基督教西班牙的文明冉冉上升的时期，正是穆斯林西班牙的文明下降的时候。当后者在十世纪达到高峰时，北方的基督教小邦还是在半野蛮状态。在十一世纪之前，它们的经济生活很粗鲁而又不活跃。在这一世纪里，那瓦人、卡斯提尔人、阿拉贡人和加达鲁尼亚人开始了“再征服”运动，他们从异教徒手里一块一块地克复了他们的领土；那时，情况才有转变。可惜，对于这些西班牙基督教王国的物质兴盛的早期发展，我们知道得很不详细。在西班牙，象在欧洲其他部分一样，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进步是相

关联的。物质上的兴盛多少是按照王权的成长而增加着。但是，这项过程，在西班牙不象在德国或意大利或法国那样地明显；大概說，西班牙比其他欧洲国家約落后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时期。卡斯提尔在 1350 年的情况是和法国在 1200 年的情况相仿佛。

西班牙半島上的基督教权力是从两个中心——阿斯都里亚-那瓦和阿拉貢-巴塞羅納——放射出来的。前者注定要建成为雷翁·卡斯提尔王国，后者注定要建成为阿拉貢王国。加里西亚的居民，在阿斯都里亚的自由而好战的巴斯克部族的支持下，首先逐出了侵犯者。在 739 和 757 年之間，阿耳凡索“天主教徒”越过并征服了平原，达到杜罗河，虽然摩尔人还在年年侵入境內；这种侵袭，是为了掠夺馬匹和牲口，多于为了希望再征服土地。到了 910 年，西北地区的国家已摆脱了敌人侵袭的危险，所以加西阿把首都从奥維亞多迁到雷翁，而那个现已扩大領土的阿斯都里亚小邦，建成为雷翁王国。

可是，雷翁边境上还是要遭受摩尔人經常性的攻击，因而在那里建立了一所“駐防区”以保卫王国，地点在靠近高山斜坡的平原上。这一所駐防区，象欧洲其他存在类似危险状况的地方那样，是由一排城堡保卫着的；这些城堡的名称后来成为它們所在地的名称。基督徒与摩尔人都称这块地方为卡斯提尔（Castile 意即城堡）或城堡地区。在这些城堡的防綫后面的保护地区內，移民蜂涌而来；他們占据土地而成为农民和牧人。于是，在城堡的周围成长了一个移民的聚集区；它慢慢地发展为一个城市組織而被給予特許狀。我們看到其中最早的移民地区是：阿那雅和圣提兰（約 882 年），布耳各斯和奥維尔那（約 890 年），科蓝那·得·康德、奥卡、圣厄斯特本·得·高米士和塞比尔維达（在十世紀）。这边境上的英雄和卡斯提尔的創始人，是半传说性半历史性的洛德里谷，他的继承人对雷翁国王的关系从来只是名义上的臣服。

当然，雷翁、那瓦和卡斯提尔应该团结起来，因为它们有着一个共同仇敌，有着一个类似的经济，并有着一个本质上相同的人口。洛德里谷的最后的女继承人嫁给那瓦的桑科并在1037年他们的儿子斐迪南娶了雷翁王国的女继承人。由于这种婚姻的关系，在这多事的一年里，雷翁、那瓦和卡斯提尔联合了。那瓦的领土后来落入阿拉贡王国手里。但是雷翁和卡斯提尔，虽在1230年之前它们的联合还是松弛的，然而终于构成了西班牙半岛北部与中部的一个重要而又有力量的国家。斐迪南，认识到卡斯提尔显然要成为一个大强国的命运，正式采取了卡斯提尔国王的称号并从雷翁迁都到布尔各斯。于是，旧次序倒转过来；雷翁成为这个年轻国家的一省；后者已经兼并了旧领土于自己的版图。1102年卡拉特·阿那佐的大胜利把哈里发国家拦阻基督徒前进到半岛中心之希望，化为乌有。在十一世纪，卡斯提尔的势力越过杜罗河，远抵加达拉马山脉，继续移民开发土地，建造城堡与设防市镇，并赐给特许状。1201年，有人论及桑科·加栖阿时说，“他给全卡斯提尔以良好特许状和风俗”^①。

畜牧几乎是卡斯提尔居民唯一的职业；它的主要商品是羊毛和皮革制品。甚至寺院，其中很多是由法国人建造的，也是巨大设防的畜牧场所；住在寺院土地上的依附居民有：牧童、牧人、皮革匠和羊毛工。所有边境上的战事，实际上是双方经常进行的一系列抢夺牲口和驱赶羊群的行动。当然，在基督教和穆罕默德教统治之间的地带，是一条激烈争夺的边境，几乎完全荒蕪。摩尔人和基督徒的战争，主要是属于经济冲突的性质。牛、羊、马匹是所争夺的战利品。“无论何时，当异教徒从一块地方退却的时候，他们故意破坏了这块地方以阻止敌人的紧迫追踪；他们因此造成了一条

^① “Dedit bonos foros et mores in tota Castella.”

寬闊的中立地帶，即‘無人地帶’；這一地帶，加上大高原的自然貧困，有效地攔挡住基督徒的挺進。”今天中部西班牙的大荒野，人口稀少，城市缺乏；這些情況還是當年毀滅性衝突的淒慘紀念物。當時，在中間地帶之內，沒有什麼生物可以得到安全的。大家所知道的“西班牙城堡”這一句成語，是意指狂熱和變幻狀態的；它在十二世紀已經流行，並曾被引用於《玫瑰史詩》里。這一句話意味着：在這一片土地上，城堡是不可能長久保持的；因為它們如果不被破壞，就將被這方或那方占取而改成為炮台來反對對方敵人。可是這些邊境戰爭在小說里被渲染了，特別是關於《坎比杜爾將軍》這一篇史詩^④。但歷史上的（坎比杜爾）“將軍”是一個亡命之徒，一個邊境上流氓，一個叛徒；他常常站在新月旗幟下，也常常站在十字架旗幟下。的確，交戰的雙方各在很大程度上從邊境上無賴中招募他們的徒黨的。

在十三世紀之前，中世紀西班牙人反對異教徒的戰爭，不是大部由種族矛盾或宗教狂熱所激起的；他們的主要動機是在經濟方面。“中世紀時代一個西班牙騎士不是為了他的國家，也不是為了他的宗教而戰；他的作戰，象‘將軍’那樣，是為了獲得吃的東西”。他垂涎於他的摩爾鄰人所有的牲畜群，也必須奪取這些牲畜群所吃草的廣大牧場。西班牙人特別不喜歡農業的根源，也許在於這地區的一般地勢的特點，那里的乾燥高原是不可能深耕細作的。但這高原的自然瘦瘠的土質，還由於邊境上連綿不已的戰爭，而更加惡化。而且，在被侵襲的時候，常有機會把牲畜群趕到安全地點去，至於在固定地點上的莊稼一定會遭受侵襲者的燒毀。這樣的情況，還有一種顯著的社会影响。就是，那使封建制度在卡斯提爾

④ “El Oid Campeador”，寫於十二或十三世紀的一篇敘事詩，頌揚坎比杜爾將軍的戰功。——譯者

不可能十分发展起来,象在法国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因为封建社会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誠然,卡斯提尔貴族是大土地所有者;但他們的土地是牧場,而不是农場。他們是經營牧畜者,而不是一般的地主。在这些牧場上的依附者,是牧人,因而是半游牧性的;冬季住在可怜的泥舍里,夏季住在帐篷里。在冬季,他們住在平原上;在夏季当火焰般的热气晒干了牧場的时候,他們驅赶他們的畜群到山間較阴湿的草地上去。象人們在中欧所看到的庄园村庄,作为一个經济社会单位并有复杂的組織与古老风俗的村庄,在西班牙几乎是找不到的。另一方面,那經常的战事和长期存在的不安全状态比欧洲其他地方远更有力地促进了城堡的建造并助长了有城垣的城市的兴起。“移民到征服地上的問題,实际上是属于城市的問題远多于属于乡村的問題。在那里疆界繼續在移动;今天所占領的土地,明天可能就被侵掠,也可能就被敌人重新占領去。在敌对軍隊之間的中立地带,是不可能由散漫而无保卫的农民去占据的。所以,那些冒险去占据这一地带的人們,必須集結成紧密的集团来捍卫自己——換句話說,必須建造城市”。中世紀时代,在法国与德意志,有着很多乡間村庄和农业社会,而在西班牙,它們是很少的。封建时代,在欧洲的其余部分,基本人口是住在乡村的;而在西班牙則不然;基本人口住在城市;乡間人烟稀少,一村和一村之間隔离得很远。西班牙的乡間生活,是寂寞的,因为村庄既少而又孤单。当时,在欧洲較多封建化的部分,村庄是接連的。

十一世紀,数以千計的法国十字軍士干涉的結果,对伊斯兰教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而使卡斯提尔又一次获得了領土的大扩展。战争现在推进到半島的中部去。1085 年,攻克了托利多并渡过了塔和河。到 1094 年,瓦連西亚也被占領。这样,在加达拉馬山脉和瓜的牙納河之間,一个新的卡斯提尔建立起来了;它还以建造連續的城堡防綫来稳步地向前推进。同时,在防綫的后方,基督教人

口源源不絕地流入并定居下来。阿耳凡索六世(死于1109年)曾慷慨地捐贈土地給寺院,保护商人,鼓励进香,特别是到昆波斯特拉的圣詹姆士大神殿去的进香。麦地那·得·坎坡的市集,出现于十一世紀;塞哥維亞与法拉多利的市集,出现于十二世紀。可是,西班牙的商业,在和同时代欧洲其他国家的商业对比之下,是比較落后的;那可从下列事实看得出来:所有的市集是很少的,而且市集又是一年一次的,甚至两年一次的,而每次市集还繼續不了四周的时期。与此同时,在欧洲其他部分,市集在春秋两季都举行,有时也在夏季举行。

几百年来,卡斯提尔商业上的严重阻碍,是缺少出海口。加的斯和塞維爾,当然是受穆罕默德教占領而被封鎖的。它的自然的出路,原来是通过杜罗与塔和两河而抵奥坡托和里斯本的。但卡斯提尔不幸,这两个港口,在1139年由于葡萄牙的脫离卡斯提尔的附庸关系,也被封閉。卡斯提尔,直到1248年征服塞維爾和1262年征服加的斯之后,才得达到蒼海上。如果卡斯提尔未曾丧失了对葡萄牙的控制,它完全可能早已成为象阿拉貢那样的一个海洋国家。

西班牙的商业,象在欧洲其他部分那样,严重地遭受了种种阻碍,如地方通行稅的勒索、多样貨幣的使用以及度量衡制度的混乱。在这些方面,中世紀西班牙比同一时期的欧洲其余部分,果然談不上好些,但也不见得更坏。可是,它西北部三个巴斯克省的居民,却未曾遭受这些阻碍。这一刻苦耐劳的部族完全是由小农和漁夫組成的;他們的爱好自由已成习惯。巴斯克人,即使不是完全独立的,但一向是自由的;連卡斯提尔人的驕气在他們的粗野民主作风之前不得不低沉下来。巴斯克人性质,如此强悍,所以十六世紀中著名的哥尔多华的衰薩尔服說过:他宁指揮一队獅子而不願指揮一队巴斯克人。在巴斯克三省——基浦司科阿、微司开雅(比

斯开)和阿尔伐之内,存在着完全的貿易自由,無論在國內或國外貿易方面。南方的厄波罗河,是它的界綫。

关于卡斯提尔的工业发展之資料,在十四世紀之前,是不多的。直到中世紀晚期,在它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中間,沒有行会的組織,那就可說明它工业活动的微小程度了。大部行业是由摩尔人和犹太人經營的。卡斯提尔的工业,在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相比之下,是落后的;由于这个緣故,国王曾切心地保护并鼓励已有的少数地方工业。在十四世紀之前的法国,人們看不到这种保护政策,而在十三世紀的卡斯提尔,它已是显然可见。卡斯提尔工业的大弱点是:它大部建立在人口中非基督徒成分——摩尔人和犹太人——的技术基础上,虽然阿拉伯化的基督徒在工业人口中占着很大部分。因为出乎一般意料之外,摩尔居民在被征服之后,一般还是相安无事的,甚至被鼓励繼續居住。从財政和工业方面看来,卡斯提尔的摩尔人“构成了人口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从他們那里所获得的岁入,是属于国家最可靠的財源这一类……对他們所屬地主貴族來說,他們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們是有技巧的农民”。他們获得准許保留他們的財產、他們的宗教、他們的法律、他們的长官。誠然,摩尔人和犹太人被迫住在城市中的隔离区,并被禁止同基督徒通婚;但在經濟上和社会上,他們不仅是被容忍而且是受到欢迎的。商业和貿易,大部在他們手里。正是这种兴盛状态,造成犹太人和摩尔人在中世紀晚期陷于毁灭。因为西班牙僧侶和西班牙貴族,后来眼紅于他們的財富;而且这种貪婪心理还由于宗教狂热和不容忍的精神——由对亚尔比教派十字軍所生的毒花——爆发为敌对的火焰。阿耳凡索十世的統治(1252—1284年)标志着犹太人和摩尔人在卡斯提尔的极盛时期。

不幸,西哥特人的宗教权力的和宗教不容忍的傳統,传給了中世紀西班牙各王国,特別是卡斯提尔;而教会又不倦地灌注着对异

教徒进行經常战斗的原則。教会在征服区内当然是获得了大批土地的报酬并被豁免了經常賦稅。教会做了一件經濟和行政性的服务，即移殖并开垦破坏了的地区，使高原的干旱土壤变为可耕之地，那比灌輸教义具有更大的意义。大貴族在比高級教士較小程度上，也要求并获得了他們軍事服务的报酬。由于这种濫賜土地的緣故，卡斯提尔国王缺少充分的王室領，因而經常陷于財政窘迫的状态。

卡斯提尔的貴族抓住了由“再征服”所提供的机会来巩固他們的特权。最大的貴族是“显貴”(ricos hombres)；較低級的貴族是“中貴族”(hidalgos)和“小貴族”(caballeros)。显貴号称系出于“在国王賜封权力之外的”望族；中貴族(“hidalgos”可能从西哥特文“adalingi”这个詞得来的，意即“貴族”)，可能属于世家，但他們的地位多半依靠服务的酬报；“小貴族”相等于封建法国的騎士，即侍卫。然而，在卡斯提尔，从来未曾有过一种成熟的封建制度。“地方的情况，特別是經常移动着的疆界和高原上农业的不发达状态，对封建制度是非常不利的”。虽然很多东西是封建式的，但未曾有过封建制度。长子继承和限定嗣續地产的原則（要保护領地的完整并使一个家族的权利、势力和特权永久持續）是后来采用的——在法英采用这一慣例之后約二百年時間。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例外的情况，其中明显的例証是：只有西班牙有着三个本地人的軍事僧团，喀拉特勒瓦、圣提阿哥和阿尔坎达拉の僧团。

在这些領土扩展的世紀里，卡斯提尔历史上最有进步性的社会特征，是丰富而又活跃的城市生活。卡斯提尔的城市公社，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城市公社，除意大利城市之外，要古老，并具有一种可以羨慕的活力。它們的特許狀，在賜給大量城市自由权方面，比伦巴第和法兰德斯的特許狀，更为有利。在十二世紀之前，欧洲城市生活一般尚不明显的时候——只有意大利例外——我們

看到，卡斯提尔在十一世紀，已有活跃的城市生活。雷翁在 1020 年被賜給特許狀，布耳各斯在 1073 年，塞比尔維达和納澤拉在 1076 年，托利多在 1085 年，罗格罗諾在 1095 年，也都被賜給特許狀。可惜，卡斯提尔諸国王，由于太无見識，未能充分利用这种市民階級的力量。他們“随意濫发”特許狀；結果，他們对資產階級，象对貴族一样，很少有着控制的力量。西班牙的第三等級，从来没有象在欧洲其他国家的那样，发展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进步因素。而且，西班牙的市民在貿易的本領方面，也落后于法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市民。城市的商业繁荣大多依靠着摩尔居民的企业，而大部分稅款，也是由他們繳付的。那些建造在“克复”的时代^①的壮丽礼拜堂使我們想起西班牙当年的城市繁荣；但我們不是这样容易地看出：它們的建造費用大部分是从摩尔人得来的。西班牙的貧困、它人口的减少和它建筑术的衰落，都是从 1492 年逐出摩尔人和犹太人开始的。在这以后，卡斯提尔不再能繼續这种繁荣状态了。

卡斯提尔农民的地位，大多是取决于“克复”和受蹂躪地区內的移民运动的。当然，农民的基本目的，是要获得保护和安全，但他們为了这些目的，必須付出丧失全部自由或至少大部自由的代价。所以，城市外大部分农民，是属于各种不同程度的农奴，或者甚至奴隶。但当摩尔人失势和他們的版图日削的时候，不自由居民的状况在經濟上和社会上都有所改进。这种改进过程中的主要因素，是大批城市的兴起；当战争逐漸远离而从事和平工业的机会增加的时候，农奴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城市中去。

① 在雷翁，圣以錫多礼拜堂，在 1005 年奠基；圣提阿哥礼拜堂在 1082 年和 1128 年之間完成；奥維亚多、法拉多利和阿薇拉三所礼拜堂是从十一世紀后期或十二世紀早期开始的；在布耳各斯那个宏伟的礼拜堂出现于 1121 年。除了这些建筑物之外，还有巨大的防御物，如 1090 年所完成的西烏达·洛德里哥的堡垒和阿薇拉的城垣；有人认为它們是中世紀时代最坚固的建筑物。

農業問題，在卡斯提爾王國內，是最重要的問題，但也是最少獲得解決的問題。畜牧業是一項利用土地的自然形式，而農業就需要西班牙人力所不及的耐心和智慧；而且，農業上報酬，由於土質的貧瘠和干旱，也由於幾百年來附近敵人的襲擊行動，是不可靠的。此外，無數的羊群在它們的移動中對現有的農業，是有着破壞性的。種田的農民和養牛的男爵同樣反對羊群的吃草，因而養羊人和養牛人之間的衝突，層出不窮。

現在我們必須來敘述另一個西班牙王國阿拉貢的形成與發展的历史；它在十三世紀幾乎和它的競爭者平分了整個半島。在第九到十二世紀早期之間，阿拉貢小邦緩慢而不倦地擴展勢力，進入阿卡河流域而抵厄波羅河上游，從那里再順流而下。從地形看來，它的領地，和老卡斯提爾一樣，是不易迫近的，而且它有着一條更寬闊的河流作為天然屏障。因此，阿拉貢所遭受的共同敵人的騷擾，從來沒有象卡斯提爾所遭受的那樣多。阿拉貢和老卡斯提爾與新卡斯提爾一樣，是與海洋隔絕的一個內地高原王國。當阿拉貢不聲不響地在厄波羅河地區擴展勢力的時候，下厄波羅河地區的加達魯尼亞人也在擴張着；這塊領土政治上原是巴塞羅納的一州。他們在 1110 年占領杜德拉，1116 年占領塔拉哥納，1118 年占領薩拉哥撒，因而建立了大巴塞羅納州，即一個自然的地理單位。於是，阿拉貢和巴塞羅納的聯合，象雷翁和卡斯提爾的聯合，同樣是自然而又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阿拉貢歷史的轉折點，是在 1137 年它和巴塞羅納州的聯合，剛在雷翁和卡斯提爾的聯合百年之後。那使阿拉貢為它的產品獲得了一個出口，並使它的農業和加達魯尼亞的商業傳統與海洋利益合在一起。在這以後，國家雖然仍叫做阿拉貢王國，但它的命運實際上已掌握在加達魯尼亞的沿海省和巴塞羅納的商人手里。“正是在巴塞羅納，集中了所有王國的外交和海軍活動，無論在政治或商業方面；正是加達魯尼亞

人,建造了船只并配备了船只的人员;正是加达鲁尼亚人,憧憬着扩张和一个海洋发展的前途。”在巴塞罗纳,贸易也是一件旧事情。在1029和1050年,已有人谈到那里的海关。1068年,累蒙·貝伦伽曾出版《习惯》即巴塞罗纳的风俗一书,里面包括有关商业发展的资料。对商人的保护和路上的安全,曾特别给予保证。阿拉貢、热那亚和比薩日益增长的海权,在十二世纪一同反对穆罕默德教的海权中,逐渐占得了上风。但还有穆罕默德教海盗船,以巴利阿里群岛为活动基地,进行抢劫;那对海运贸易是一个经常的威胁;这一危险直到1237年瑪約喀島的占领才被完全扫除。

为了部分补偿穆罕默德教徒在十一到十二世纪对阿拉貢的自然地向海洋发展的限制,阿拉貢在南法找得了一个广阔而有利的场所来开展商业。因为巴塞罗纳伯爵的旧族是起源于法国并在巴塞罗纳和阿拉貢合并的时候,它由于巧妙的婚姻联盟已占有布罗温斯的大部分、米約和格伏登。这一类富饶的领地在1137和1204年之间,由于取得下列土地而获得了增加:魯栖永、佛亚、尼姆、貝穆亚和蒙特皮列(其中最大的一处地方)。在关于法国在十字军时期一章里,我們已看到:布罗温斯和朗基多克的商业和经济生活多么丰富多采;而蒙特皮列作为一个利凡得貨物进口港,和馬賽相竞争。这种繁荣状态大部分毁于对亚尔比教派十字军的破坏性战争里;在战争的过程中,阿拉貢的损失稍少于土魯斯伯爵领的损失;而当和平在破碎了的地区恢复的时候,南法的统治权已轉到法王手里了。1258年,依科比尔条约,阿拉貢把下列地方的全部权利让給法王:卡卡逊、亚格得、貝穆亚、佛亚、亚尔比、尼姆、那旁、米約、格伏登以及一切其他庇里尼斯山北的领土,蒙特皮列除外;蒙特皮列在法国宗主权之下,仍由阿拉貢保留,直到下一世纪为止。

毫无疑问,阿拉貢在南法势力的衰落使詹姆士征服者(1213—1276年)加紧对摩尔人的新进攻,以求补偿他在法国的损失。1225

年，瓦連西亞的摩尔国王被迫把他进款的五分之一付給阿拉貢。十三年以后，詹姆士意味深长地宣布：他将“連鸡带蛋一起取走”，結果，瓦連西亞被攻下，而所有在瓜达拉微阿河以北的領土，都并入了他的版图。但卡斯提尔现在以嫉忌的心理注視着阿拉貢的扩张。因为卡斯提尔在一种特殊意义上，是由“克复”运动所造成的；十字軍精神对它的推动力量要比对阿拉貢大得多；它把在西班牙留存的两个摩尔王国視若囊中物。这两个王国是木尔西亚和格拉那达。后者是注定要留存到十五世紀末期。但前者几乎沒有經過战争而由卡斯提尔和阿拉貢瓜分了；卡斯提尔取得了大部分。

还有一个新机会的大門，給阿拉貢开放着。在这个时候，卡斯提尔显然是由“克复”运动所产生的王国，也是所有留存下来的摩尔人西班牙的死敌。另一方面，在格拉那达和阿拉貢之間，或在北非穆罕默德教国家和阿拉貢之間，沒有这样的敌对状态。阿拉貢将来在半島上所可占取的領土方面固然遭受了損失，但由于这些国家开放給它更广大的商业活动范围，而获得了补偿；因为它們視作世仇的是卡斯提尔而非阿拉貢。现在，阿拉貢的野心，轉向于要获得在北非洲的商业优势，特別是在突尼斯、布吉亚和修达各地。

突尼斯無疑地是北非洲的欧洲貿易的主要中心；在詹姆士征服者的时代，阿拉貢在那里已設立常駐的商站和領事館。当然，在它和热那亚、佛罗伦薩、威尼斯及其他意大利国家之間，会发生强烈的竞争，因为这些国家在那里已經立足；但阿拉貢人一般能够保持住他們的地位……这种兴旺的貿易固然要受到一套精密的关税制度的限制，但反过来欧洲商人在北非各港口被最有效能地保护着，不受欺騙或虐待……这种良好組織大部是直接导源于阿拉貢諸王国的商人需求——因为瑪約喀构成了阿拉貢的一个姊妹国，而他們在北非港口上各种外国商人中間的卓越地位，是沒有問題的。

詹姆士征服者具有多么銳敏的貿易精神，可从下列事实看得出来：他对热那亚人的竞争，心怀嫉忌；他公布一項很有意义的航运法，规定阿拉貢制造的商品，如果能得到自己国家的船只运输，

不得由外国商船运输。的确，在十三世紀阿拉貢，不象卡斯提尔（它几乎是一个完全农业的内陆国家）那样，基本上已成为海洋商业国。瓦連西亚只能自給它所需麦子的三分之一，而加达魯尼亚几乎完全从巴利阿利群島与西西里輸入它所消耗的谷物。

但阿拉貢也伸入了东地中海来找寻市場。上文已提过，阿拉貢参加十字軍虽較迟晚，但在十三世紀，加达魯尼亚商人已大批出现于亚历山大港、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美尼亚。据詹姆上一世的关税表，巴塞罗纳的进口貨中有：香料、糖、宝石、稀有染料和絲綢；同时，帐册上还列出有从比薩、热那亚、威尼斯、巴勒摩和馬賽各地来的商人和貨运。

在十三世紀，阿拉貢認識到：它的前途不在陆上而在海上。它让卡斯提尔去收复西班牙半島上的其余部分。但是它的商业竞争激起了热那亚的强烈愤怒，因为后者在这以前曾独霸西地中海，并曾掌握着几乎所有从突尼斯、布吉亚和修达来的非洲貿易。因此，两国从朋友变为仇敌；热那亚的另一个劲敌比薩，现在同阿拉貢站在一起。竞争的主要場所，是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这里，阿拉貢曾以同霍亨斯陶芬朝締結一項王朝和商业的联盟而赢得了胜利。1262 年，当西西里的君士坦司公主（皇帝腓特烈二世的著名儿子曼夫勒德的女儿）嫁給了阿拉貢王彼得三世以后，阿拉貢成为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各港口的“优待国”。在这个时候，安如和布罗溫斯的查理，在教廷支持之下，正在阴谋夺取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热那亚在布罗溫斯有着巨大商业利益，它以舰队来援助查理，以期恢复它在下意大利的商业地位。这次斗争的结果，如在十七章內已經說过，是：霍亨斯陶芬朝的傾复、安吉文朝在西西里和下意大利政权的建立、热那亚的商业胜利和阿拉貢的失敗。但阿拉貢心有不甘，蹈瑕候隙，制造阴谋；1282 年，似可說，它“担保”了西西里的“晚祷”叛乱；这叛乱搗毀了西西里的安吉文政权和热那亚的商业

优势；于是，它获得了酬报。现在，这个富饒的大島，构成了阿拉貢王国的一个組成部分——阿拉貢的一个扩展部分——它位于地中海的中部，扼守着东西两地区間的海峽，并拥有巴勒摩这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此后，在几百年时期中，阿拉貢成为并繼續是西地中海之最前进的海軍和商业国家。甚至热那亚的嫉忌和它在复兴的希腊帝国中的优势，也不能排除加达魯尼亚人于爱琴海和拜占廷之外。

这样看来，在十三世紀末期，卡斯提尔和阿拉貢两大国已分割了几乎整个西班牙半島；其中卡斯提尔是陆軍农业国，而阿拉貢是海軍商业国。

第二十三章 中世紀的商人旅行、 市場和市集、香賓市集、 貿易管理*

所有中世紀的旅行不是步行，便是乘馬或乘驢。在十二世紀之前，馬車，即使在轉運重物方面，也不使用；在此之後，它們的使用也限于若干最便利的地方。貨車是用于運送農場上笨重物資和運送它們到當地市場上去。幾百年來，羅馬的龐大公路系統，已經破碎不堪；即使古代道路還在使用，但路面也已改變。古代用石子鋪設的路面，現在只是泥土的道路，冬季泥濘難行，夏季塵埃撲面；積水潭常常可碰到，而橋梁又少又壞。路上沒有“泄水處”，路旁也沒有排水溝渠。在最壞的地点上，雜草樹枝，縱橫交叉，如在濕地上用木條鋪成的道路。無論什麼地方，淺灘如仍可通行，就繼續使用；如果沒有，乃使用粗笨的渡船。除了這些旅程上不便利之外，還有路上遭受搶劫的通常危險、寄宿場所的缺少、風雪洪水這一類天災的困難；由此很可想見：中世紀旅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下列連禱^①的祈禱詞里，包含無窮無盡的歷史：“願您保佑陸上或水上一切旅客們：受分娩痛苦的婦女們、一切病人和嬰兒們；願您憐惜一切囚徒和俘虜們。”有人說得好：“所有這些由別人代為祈求的人們，不是偶然或隨便地混在一起的”。在中世紀，婦女不是小販或商人，但其中很多是由于必要而出門旅行，或是往某一神殿去的香客。

* 地圖：錫培德：《歷史地圖冊》，第98—99頁。

① 連禱是英國國教的共同禱告書中的祈禱文。——譯者

修桥补路，被认为是一种最积德的服务。寺院特别是以这项功德著名的，尤其是息斯脫西安教派寺院；这些寺院建造在辽远偏僻的地点上，常在沼澤或森林地区內，因而它們需要建造道路。在英国亨利八世的摧残寺院（1537—1539 年）和都鐸王朝时代的道路窳敗之間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当我们回想这些不良情况的时候必須經常記住：我們关于它們的消息，是从受害人的申訴或損害事故的紀录里得来的，而它們所表明的，当然是坏的一面而非較好的一面。

关于英王亨利一世，我們讀到下列一段文字：

1102 年他对他的軍隊曾发出命令，要他們經由哈比尔·黑本（惡障）进军，去围攻士魯茲巴立。那通过森林的这一段路被英人称为“哈比尔·黑本”（Hubelheben）；这个名詞在拉丁文中意即“坏路或坏街”。这一段路長約千步，尽是坑坑洼洼，路面崎岖，大石纵横，而又非常窄狭，两个乘馬的人几乎不能互相穿过……于是，国王下令：他們应使用斧头，砍去树木来开辟一条寬闊的通路，以备他的通过，并为后来永远的使用。

很少有貴族能够聪明地看到优良道路的益处。如果一个人能把他的产品运到最近市場上去，他就心滿意足了。当时很少“直达”貿易，所有的貿易都在流动商人手里，主要是在意大利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手里；他們不仅得不到別人的照顾，而且还被男爵們經常剝削。誰也不能从建筑良好道路获得了利益，除非他的邻人也这样做。因此，道路大部是听其自然的，直到十字軍时代，欧洲的商业和貿易剧增时为止；那时，貿易的数量十分重要，因而考虑及此。在这方面，查理曼曾关心过，他曾建造良好的道路和桥梁。但在他去世以后，道路系統跟着欧洲的整个衰落而衰落下去了。

下面是关于一个雇佣于寺院土地上的牧童的有趣故事；他的牲口曾落入一处水坑里。

有一个来自另一寺院的牧童，被住持派出去从草地运回青草。仆人們把

青草裝載在驢背上。驢子在回家途上通過某一段下陷的道路時，載貨破兩旁高起的地方夾持住，驢子滑過去自行回家。但牧童還茫然不知。他呆站在草旁，時常以鞭子打擊草捆，並拼命恐嚇着驢子（他不知道它已逃走）。他也並不離開那里，直到他的伙伴來找尋他；他們好不容易使他相信：驢子已經走了；而沒有一只獸，青草是動不了的。

行路靠左邊這一規則，今天在英國，還在流行。這項規則之所以形成，是這樣：在中世紀時期，每個人出外旅行時，是攜帶武器的；因為他走在左邊，與他并肩穿過的人，是在他的右邊，而他所攜帶的劍或槍自然是在他右手里的。這種預防，在一個路上相逢的任何一個人可能是仇敵的時代，是屬必要的。正是由於手槍的使用，改變了這項走路的規則。一個帶手槍的人，自然把槍和槍袋掛在左腋下面。所以當他走在路的右邊時，他使所碰到的任何人都站在他的槍口之前。在美洲殖民時代，新英格蘭和維吉尼亞的移民以及沿森林蹊徑的邊疆居民一向是這樣地旅行的。在美國，走路規則一向是靠右的。在歐洲，這項規則在火器發明之後好久，才被採用。據我所知，關於規定走路靠右這項規則的最早立法，是1736年的薩克森立法；就是，當奧古斯都強人在德雷斯登建造了一條橫跨易北河上美麗大橋的時候，他在那里採用了這項規則。

我們原可期待這種旅行者人數的增加來促進道路的改進，因為他們從道路的不良狀態所感受的損失最大；但事實上，不盡如此。雖然查理曼及其隨後的繼承者曾採取措施，來維持法蘭克王國內的道路和橋梁，但後來的國王關於這項權力的行使，變為限於他們的個人領地之內；那些接管王室職權的貴族，一般並不自找麻煩地來履行這方面的義務。新的道路，的確，為了軍事和市場的目的，時常开辟出來。在十二和十三世紀，有些進步的王公貴族似乎曾採取某種積極的公路管理方法，因為他們對於從通過他們領地內的交通運輸所可獲得的利益，感到興趣。到了十三世紀中期，

那些找寻大市集的商人，使用陆路几乎和使用水路同样多。可是任何广泛而又有恒久性的道路建設，由于缺少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政权来执行有力而又一贯的政策，受到了阻碍。在十四和十五世紀，欧洲的道路情况，看来比过去任何时代更坏，因为封建主对强制筑路的奴役劳动已逐漸丧失了权力，又因为没有别的合法的和經常的办法来維持公路。当时，道路和桥梁，用垂手可得的最容易方法，馬馬虎虎地来修补。有人談到一条桥，它的物料是用木头和石头东拼西凑的，以致不可能說出它原来是用哪一种材料来建造的。路上的凹槽，是用柴把来填平的；泥浆用扫帚来扫除。如果說这种記載是表明一般情况的（似乎是如此的），那么，不难同意下列說法：中世紀时代的距离，約等于我們时代的距离的七倍；所以我們对于实际上所发生的內地貿易的大发展，倒有些惊异。

然而，如果說在中世紀这个或那个时期道路是在完全忽視的状态下，那将是言过其实的。在这个时代，关于改进公路的努力，始終是或多或少繼續不断地进行着的；但这些努力主要是地方性的，又由于缺少实行的权力，常常变为无效。看来，下列兩項原則始終有效的：沿路的业主应負責維持这些道路；維持的費用应以征稅所得来支付，就是从使用道路者，特别是从商人所征收的通行稅来支付。一般說，封建主利用了他們的权力来征收捐稅，从而汲取尽量多的进款。通行稅的倍增，远过于修理道路所需的开支。通行稅中有：过桥稅、过路稅、护送过境稅等等。然而，如果这种进款真的用在維持公路方面，那些慣常征收的捐稅就不会是象常常所說的那样苛重或非法了。事情的弊病是：当旅行者在修路与保护的理下，一次又一次麻煩地被拦阻在路上来繳付捐稅以后，他多半是一无所得的。

普遍存在的地方政权，使商人无限度地負擔各色各样地方捐稅。每个封建主，上自公爵和伯爵下至子爵和小城主，即国王本人

也不能例外，對經過他領地的一切商人小販，處以罰金，課以重稅。這種捐稅的特殊名稱，省與省之間，國與國之間，有所不同，但它們的性質都是相同的；它們可分成六種不同的類型。下面所列举的捐稅名稱，已足以使人驚異：

(1) 對運輸所征的稅。例如，過境稅、橋梁稅、運貨車稅、河流稅、渡頭稅，而其中最普遍的是通行稅(péage)。最後一個名稱的字源，是有說明性的。“péage”(通行稅)是從拉丁文“pes”、“pedis”派生出來的；就是對負販和小販所征收的一種稅；他們是背負貨物，徒步而行的。

(2) 對貨物所征的稅，叫做貨物通行稅。現有几百種稅則，從十二世紀留傳下來，里面列举了無數的商品：如牛、馬、腌肉和熏肉、腌魚或熏魚、麥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鹽、金屬、皮革、毛皮、武器、顏料、羊毛、綫、磨石。

(3) 對葡萄酒所征的稅，自成一類，包括按桶、按瓶、按容量(加侖)所征的稅以及酒店稅或旅館售酒稅。領主享有出售其本年所產葡萄酒的優先權，所以，當市面“高”的時候，他出售了自己的葡萄酒，而農民的葡萄酒，只能在後來市面停滯的時候，才可出售。

(4) 管理度量衡權。在封建時代，管理度量衡權象鑄幣權一樣，是屬於封建特權範圍內的。單位相差很大。幾乎每個省或至少每個區有著自己的度量衡制度。甚至查理曼也從來沒有能夠建立過統一的度量衡制度，而在法蘭克帝國的破裂之後，地方的差別，當然變為更大了。

(5) 對市場和售貨所征的稅。執照稅屬於這一類，嚴格說來，它們是屬於封建主權的範圍，而非屬於土地所有權的性質。在沿海國家里，碼頭和港口稅也屬於這一類。在所有的產物中，麥子的出售受到最嚴密的監視；這一事實是很自然的，只要我們想到在中世紀時代所流行的飢饉的情況。

(6) 關稅(douanes), 在中世紀語言里, 一般稱為“壞稅”(maltôtes), 因為這種稅是很失人心的, 而且常常是苛重的。這種稅直到十二世紀末期才出現——就是說, 它們的出現和城市的興起是在同一時期的——它們又是一個有趣的証據, 說明在十字軍時代歐洲貿易的數量和種類之日益增加情況。這種課稅的形式, 在地中海地區的国家里, 無論在阿拉伯或拜占廷国家里, 本來早已熟悉。所以在西歐, 這制度的採用意味着西歐商業和經濟的復興。

一個領主常常迫使一個流動商人走着這一條路而不准他走那一條路, 為的要使他繳付通行稅; 或者當商人本可擺渡的時候, 也強制他通過一條橋。在德意志, 這叫做“強制走路”。甚至查理曼也必須用立法來反對這種行動。當地領主還要求取得任何從載貨車上落下來包裹之權利; 如果一部載貨車翻倒了, 他可要求那車上的全部載貨; 但道路一般是很壞的, 所以, 大部分商品是用騾子來馱運的。有時, 商人集團為了安全起見, 結隊而行。然而, 在這些男爵所征的賦稅中, 最麻煩的手續和最壞的弊病跟着有力而中央集權化政府的成長, 而趨於減少。在十二世紀, 開始發展着一種有系統的或習慣的固定通行稅, 而任意勒索, 除在德意志以外, 已逐漸消失。

關於這方面, 1236 年, 在腓特烈二世時代, 對王公們所提出的下列詢問, 透露了一些情況。“薩爾斯堡可敬的大主教問道: 當商人走着公路到市場去的時候, 任何人可迫使他們離開公路而走着私人道路到市場去嗎? 王公的決定是: 任何人沒有權利迫使商人離開公路, 而他們可到任何他們所願意到的市場去。”

中世紀公眾, 對良好道路的兴趣, 反映在各方面。保養道路, 認為是一種神聖而又慈善的義務; 捐造一座橋梁或一條公路, 或做關於這方面的勞動, 足以解除罪孽, 正象發賑款或去進香一樣。當地方上交通情況破壞得厲害的時候, 附近主教常常對那些願意捐

資或用劳动来修补公路的人們，賜給赦罪符。然而，当赦罪符不一定能够激起充分的反应来实现所希望的目的时，公共权力也来协助教会的措施。中世紀公众似乎对于桥梁曾特別注意，也許因为桥梁的缺少和倒塌情况，常使渡过河流有如跨越山岭之难。有时，在走过一条桥时，还有其他危险。传说，有一个替英基兰·得·庫栖服务的奴僕，他被派在苏尔德桥上收集过桥稅；他經常看守在那里，一旦遇到有一个单身的旅客出现；他就将这个旅客杀死，劫夺他的財物，并把他的尸体扔入河流里。查理曼曾賢明地以維持公路和桥梁的义务，加在寺院身上，而寺院也是有功的：它們在封建时代一直恪守了这项規則。寺院比俗人具有更大的見識；它們認識到良好道路对商业上所可产生的好处；虽然寺院当然也是为了征集当地通行稅的利益，而起来維持公路和桥梁的。下列情况也是常有的：若干家庭、租戶或个别的人联合負責，来保养附近的一座桥梁。1174年，在意大利，有兄弟两人从政府获得了某种特权；条件是：他們将好好地保养米拉河上的一条石桥，使过河的人获得了便利。

有些行会和团体的組織，有时是以修建桥梁为特殊的宗旨的。在十二世紀末期，微馬雷的一个年輕教士自以为：他听到上帝的声音，要他在罗尼河上亚威农(到羅馬去的香客的会集地点)建造一座桥。对这一启示，他非常热心；消息传布开来；結果，不仅建造了这一桥梁(1177—1189年)，而且还組織了“护桥兄弟会”，其中成員包括有俗人和僧侶。这种护桥兄弟会的組織，很受欢迎，因而在一个短短时期內，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同样組織的出现。这一座著名的桥，迄今还有四个拱形桥洞留存。在罗尼河更上游的地方上，“圣灵桥”今天还是在使用。里昂的基洛提厄尔桥的修建，是由教皇英諾森四世以赦罪符来补助經費的。据传说，伦敦泰晤士河上所建的第一条木桥，是由一个宗教团所建造的；而这宗教团的創始

人，是一个渡船夫的女儿，叫做曼丽。又据文献，泰晤士河上第一座石桥，是在十二世紀后期，由一个宗教团的首領——柯尔秋契的彼得——开始建造的。这项建筑工程費了三十年的時間；这个忠实的修道士死于它的完成前四年，葬于他自己所建的桥头小礼拜堂內。有时，还有用堡垒，来設防桥的两头。至今尚存留着两个这类奇怪的例子：一在羅馬城附近，一在法国加奥尔地方上的桥头。至于在城市內的桥上，如在伦敦桥、佛罗伦薩的維开奥桥、巴黎的紐佛桥上，两旁小鋪排列成行，风景如画。

从十二世紀起，我們可看到关于政府当局为改进道路所作活动的很多例子。1135年，英王亨利一世曾頒布命令說：一切公路应很寬闊，足够容两辆馬車从对面开过，或十六个騎兵并排前进。1285年，有一項法律规定：凡在連接市鎮的公路上，两旁所有的树木和荆棘在二百呎范围之内者，必須清除，使盜匪在沿路上找不到躲藏之所。在很多德意志国家內，曾使用法律来规定干路和支路的宽度以及使用这些道路的权利和維持它們的义务。在意大利，对于公路的疏忽情况，不象在其他国家內的那样普遍。那里的城市公社，对于使貿易道路保持良好状态，特別努力。比薩和皮阿森扎在十二世紀和維罗那、巴士亚和巴費亚在十三世紀，都曾頒布关于鋪設、維持和修理道路与桥梁的很多命令。

在中世紀时代，旅行者除了遭受由于坏路所产生的不便与危險之外，还經常冒着盜劫和掠夺的灾难。公路盜劫的案件，記載得这样多，使人們很可怀疑：有哪一次旅行，可幸免这类的經歷，或至少沒有这类的經常恐怖。在中世紀欧洲，每个国家的道路上，充斥着大批路劫者；所以如此，也許大部是由于政府的柔弱无能和居民缺少可以維持生活的职业所引起。这类匪帮，还由下列分子大大地补充着，即使主要不是由他們組成的：罪犯和逃避司法的債務人、被开除的兵士以及其他在社会上不能找得生存方法的人們。

在十二和十三世紀里，由于“上帝休战”的实行和王权的增长，那在最强暴的封建时代的强盗男爵，已逐渐变成一种时代的錯誤而不复可见。然而，另有逃犯尤其是散兵，取其位而代之，这批被解散的佣兵是以搶劫为生的。在后来的中世紀时代，还加入一批新的盜匪；就是，那些缺少金錢而陷于貧困境地的騎士。他們由于經濟情况的轉變、由于固定的地租与物价的高涨、由于生活費用的增加，似可說，被置于两片磨石之間而被磨得粉碎。这一批人，因不願忍受貧困，又因太驕傲而不願工作，流落为公路上的匪徒，变为小說中可貴材料。据記載，在1308年，有两个伯爵和威尼斯人談判条件，要把很多布捆还给后者；他們曾从威尼斯商人搶了这些布捆，連人帶貨，一起被拖到他們的城堡里。他們声称：由于貧困所迫，他們走上了路劫之途；願在取得貨物实价的半数的条件下，归还它們！另有一些貴族，自己虽不敢干着路劫勾当，但容許他們的城堡作为盜匪逃避法网和儲藏赃物之所。可是，我們知道，編年史家，在中世紀和在近代一样，所記的犯罪、事故与灾难远多于較平凡事情，因而近代作家也难免夸大了中世紀时代旅行上的危險。

到了十二世紀，政府更加积极地采行保护公路上商人的措施。这些措施往往表现在命令的形式，例如，1156年腓特烈一世的治安法令，其中包括有一項条文：“任何为經商而过境的商人，得携带一把劍，綁在他的馬鞍上或放在他的馬車上；但他应为防御盜賊，而非为反对无辜的人們而使用它”。城市和王公在保卫治安工作上，是互相合作的。现有許多資料，說明一个城市同一个住于沿途一带的大貴族簽訂合同以获得他的帮助，来保卫公路上的安全。为了这項目的，甚至皮阿森扎城管轄区内沿路居民也被征发去服役。这些人須宣誓說：他們将担任守望；一听到有任何人在公路上喊救命的时候，将赶快給予帮助。

德意志統治者对于那些往法兰德斯和香賓市集去的意大利商

人的安全，越来越加注意。哈布斯堡的路德福，在十三世紀末期，曾命令：他領地上的貴族对所有通过他們境內的商人，应給予保护；并使每个貴族对他土地上所发生的盜劫案負責。1301年，国王亚尔培同他王國內若干主教和貴族簽訂了合同来保持公路上的和平秩序。据舒尔特說，一个国王为要确保境內的治安，曾同有势力的部屬締結合同，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这还是头一回。德意志王公的命令，似乎不是完全沒有效果的。法王也曾企图責成封建主对在他們領地內所发生的罪行負責；但那在十三世紀之前，是很少成效的。

在中世紀时代，另一力求保卫旅行商人的方法，是报复制度，就是为了一国市民对別国市民所犯的盜劫罪行而进行报复。对于被害人想要从那損害人或他的同国人方面的貨物取得賠償之自然要求，政府予以承认，并通过政府的批准，付諸实行。这项制度，起源于十二世紀。但后来这项慣例曾用法律，予以精密管理；那被劫的商人，必須首先向他的政府申訴，然后，他的政府和盜劫者的国家办理交涉。如果交涉不得要領，乃可进行如下的报复方式：申訴者由他的政府給予一項书面准許，来从犯罪者同国人爭取任何所可获得的財產，作为他所遭受的損失补偿，不論用暴力或其他方法——这一項章程使盜劫者的同国商人遭殃，如果他們偶然路过或侨居在被劫者的国境之內。

政府对于外国商人的保护和救济，逐漸发展为一項更广泛的政策。有很多这类的事例，出现于十三世紀。然而，商业立法，在通过和执行方面，是时断时續的，又常是局部的而不公平的，或有限制性而不健全的。但另有一种国际法，也逐漸在发展，就是，“商事法”；依此法律，外国商人在各地可受到同样的管理；而王公貴族也力图公平地实行这项法律，为的要引誘商人們常到他們的市場和市集来。

另有一件比法律保護貿易較少重要性的事情，是供給流動商人的身與貨物的庇護所。從很早時期起，旅舍已經存在；但在中世紀的最早幾百年中，旅舍已感不夠，以致旅行者不得不隨身攜帶食糧和取火匣，有時還要露天睡覺。教會向來以收容旅行者和供給庇護所，特別在沿途的荒僻而危險的地点上提供住所，作為己任。當時，有很多寺院。可能在第八世紀，阿爾卑斯山的高山路上已有寄宿旅客的庵堂。舒爾特提及一所在十世紀被薩拉森人毀壞的庵堂，那可能已經存在了百年以上。在薩拉森人被逐出之後，其他庵堂又在阿爾卑斯山路上建造起來。在十一世紀結束之前，在聖伯爾拿和塞尼山路上，已有停息站或收容所；而在日內佛爾山路上，另有六所停息站。在庇里尼斯山路上也有寄宿旅客的庵堂。瑞典的法律規定：在大路上，旅舍與旅舍之間，應相隔半日路程。那些為營利而設立的公共旅舍的興起，也不落後於大路上商業旅行的增長。查塞蘭寫道：在英國，商人階層一般是使用“普通旅舍”的；寺院由於策略和救濟，只接待富人和窮人的。

在中世紀時代，陸上商品轉運，如上文所說，是使用獸力的。但到了中世紀後期，粗笨而牢固的馬車開始被使用了。這些馬車繪在當代的圖畫里，在為修建橋梁與公路而向商人徵稅的章程里，也常被提及。中世紀馬車或貨車的構造，曾考慮到路面上崎嶇狀態的。這類車子，笨重而牢固，經得起重重的顛簸。在德意志，使用小車輪，使車子在公路上轍窩里不致容易失掉平衡力而傾復，因而使它的載貨落入“着地法”（“grundrührrecht”）適用範圍之內；依此法律，凡是偶然落到地面上的載貨，都可由當地封建主占為己有。由於陸上運貨的困難與危險，商人只要能夠使用水運的地方，就使用河流，特別是在載運重貨方面。水路可提供既便宜而又容易的運輸，因為一只船可運五百頭獸力所可負的東西。在許多沿河市鎮里，可以看到那些經營運貨事業的註冊的船員或水手行會。

我們已經談過在盧昂、巴黎和巴黎上面約內河畔的這種行會。亞眠、亞貝威勒和科比的商人控制着索謨河。同樣，羅亞爾河被劃成為各個水手團體的“範圍”；而這些團體，直到十四世紀，才告聯合。在貝云，有阿杜爾河上的“貝云海員公會”。在下羅尼河上，在1150年時，阿爾茲城有關於警備河流和征收通行稅的一種詳密法規。我們還可得片斷資料來證明在法國其他河流上象梭恩河和格羅內河上那樣，也有船夫行會。同樣，在德意志的斯特拉斯堡、馬因斯和科倫，我們可看到萊茵河船員行會。在倫巴第波河上及其支流上也有許多船員行會。

在中世紀特別是在它早期的幾百年中，商人一般是跟着他的貨物而走的。如果他是一個富商的話，他可隨身帶着一隊僱傭的人作為衛隊；但較普通的方法是：他可安排出發的時間和地點，使可和其他商人結隊同行，就是參加那些走同一方向或往同一地點去的商人和旅客隊里。在這時期，人數最多的旅行者，是香客和商人；那些沒有武裝的兩類人樂於結隊同行，以人數多來增加安全；那些有錢的商人和帶武器的香客也可互相幫助，來對付路劫者和強盜男爵的勒索。這種結伴旅行的需要，使商人不得自由選定轉運他貨物的時期；但對商業的不便利，不象我們推想可能的那樣；因為市集的定期性，使商隊的移動也可能多少帶着定期性的。然而，也常有无伴侶旅行的商人，附於一個貴族的扈從隊里，當這個貴族偶然走着他所想走的同一路線的時候。

在中世紀時代，旅行的速度是一種很難決定的事情。商人的旅行，由於常常停息，一定是遲慢的。但驛使和信使旅行的速度，在十二和十三世紀里與在十六和十七世紀里，也許是同樣迅速的。在這方面的巨大革命，要等待蒸汽動力的使用。1190年，腓特烈紅鬍子死於西里西亞的消息，需要四個月的時間才傳達到德意志去。1190年理查一世在達爾馬提亞被俘的消息，費了四周的時間，傳

达到英国。从羅馬到坎特布里旅行的平均時間，是七个星期，虽然有一次在二十九天内完成了这项旅行的纪录。那些在香賓市集上营业的意大利大銀行，曾設立驛站系統；这种驛站照例在二十到二十五天的時間內完成这项旅程；由此可见它的效能了。每天走十八哩，也許曾认为是走了一个相当长的距离。但驛使常常每天可走一百哩之多。1421年，有一个信使，在三十小时之內，完成巴塞罗纳和珀皮尼安之間的二百一十哩距离的旅程。在十四世紀，一个商人从蒙托班經亚威农、恩布伦、苏薩、比薩、微特波到羅馬城，需时二十三天，即按每天五十六哩的速度。1461年，当查理七世逝世的时候，三个使者从布尔日附近的米恩，即国王去世的地方，被派往路易十一那里，那时他駐在不狂奔的哲那普。他們所騎的三匹馬，都倒毙，但他們能在四十八小时之內走了五百三十哩的距离。635年，穆罕默德教征服叙利亚和波斯的消息，在八年之后传达到中国；在中国史上，于643年才提及此事。

需要一个人負責送貨到市場上去，另一个人須照料本处事务；这一情况使中世紀商业上合伙营业方式成为很普通现象；商人一般以自己的儿子或其他亲属作为他的伙伴。但也有为着其他目的而組成的商业組合。貴族在河流運輸上征收大量的通行稅，但又沒有用在改善河道上，甚至沒用来維持河道开放通航，这一事实，促使沿河城市的大商人們联合起来，执行为領主所忽視的任务。他們把領主的征收通行稅权接收过来，維持曳船路，疏浚河道并建造倉庫和碼頭。到了十三世紀，管理运貨的法律已經充分发展，所以商人不一定需要亲自或派他的伙伴送貨到目的地去。有时，他們把运貨到市場去的事情，委托給轉运者；他們在市場上等候貨物的运到。这些轉运者受着严格的契約的約束，他們宣誓遵守契約条件，忠心地保卫貨物并把印着所有者商标的貨物原封不动送交市集或其他目的地去。然而，如果貨物碰到为轉运者所不能阻止的

暴力行动或其他意外事变而遭受了損失，他們不应負責。

总的說，內地的旅行条件，在中世紀时代，比較起来很少有所改善。公路上崎岖状态和危險，几乎沒有減輕，而运输工具也沒有很大改进。差可令人滿意的事情，則来自下列方面：管理通行稅制度的改善、旅舍和寄宿旅人的庵堂的增加以及商人权利在國內和国外受到政府的更有效能和更好的保护。

欧洲語言的复杂性，也是中世紀旅行者所感受的一种尚未过时的麻煩。在中世紀时代，几乎每个省份有它的特殊方言。的确，这些土語还有存留，作为表达思想的方言形式，但今天每个欧洲国家都有为它全体人民几乎都能懂得的一种民族語言。在中世紀时代，沒有这样的語言統一性的存在。在十二世紀，圣伯尔拿埋怨說，“隔絕不仅是由于距离而且由于語言的差別”。另一方面，由于教会的普遍存在的权力，拉丁語成为一种統一的語言，至少在全欧洲僧侶之間是如此；有时一定也可减少那由无数方言所产生的不方便情况。因为大商人使用拉丁文記帳，直到中世紀后期为止；当时如果他們不懂得拉丁文，至少是有一个書記懂得拉丁文的。

出海商人的生活，从十到十五世紀，一般是一种很危險的生活，即使不是比陆上旅行更困难的話。他在航程上所遭遇的事故，比陆上旅行所遭遇的事故，可能損害更重灾难更大。然而，就这些世紀中的航运方法与工具来看，它們比从研究陆上旅行所表露的情况，有更显著的改进。

在这时期的开端，沒有一个船主敢冒险出海到望不见陆地的洋面去，因為他們认为：那碰到暗礁和浅滩的船难危險，总不如沉沒大海里的可怕。对海洋的恐惧心理在十字軍运动开始之后已經减少，可是那安全而习惯航行路綫，还是在可以望见友好的海岸范围之内。在这整个时期中，所有滿載乘客或貨物的船舶，都不敢駛入公海上去。热那亚人、比薩人、阿馬斐人以及法国蒙特皮列与馬

賽的海員和加達魯尼亞人，一般是沿意大利半島西岸向南航行；在墨西拿停息之後，船隊照例採取環繞希臘半島的航路，沿干地亞北岸海面，駛向羅得島和塞浦路斯去，在那里，它們也時常停泊；於是，它們從塞浦路斯到敘利亞海岸，再沿岸南行，直到太爾和亞克為止。那些來自北海地區的旅行者，在穿過直布羅陀海峽之後，因害怕海盜，就不敢採取向東直航的路綫，但沿着西班牙、法國和意大利海岸作迂回的航行。在十三世紀，那些富有冒險性的船主，採取了從干地亞往敘利亞海岸的直接航綫。羅盤針直到十四世紀，才應用於航海方面，此後水手們能橫渡地中海而不愁迷失方向了。

地中海的航運比北歐航運在規模與效能方面發展得更快。第尼爾認為：大西洋、北海和波羅的海上沿岸港口的淺水，使在北海地區沒有建造大型船只之必要。1066年，諾曼底人橫渡英吉利海峽時所乘的船，每只載重三十噸，可搭乘五十到六十人。十三世紀早期的英國船，據說可載運八至十五匹馬，雖然這些船只在史籍上叫做“軍艦”。在愛德華三世時代，船只的平均載重，是二百噸，所提到的最大船只是三百噸。它們每載重百噸，配備六十五人，另有射手與兵士，約合水手的半數。北海船只的船首和船尾高聳水面上，而地中海船只的船身，則較低而又較長。

據流傳下來的記載所指出，地中海的船只，在大小方面遠遠地勝過了北歐的船只。據說，西班牙人按照他們阿拉伯鄰人的船只模型，曾建造大型船只并曾以他們的大船出名，直到他們在十六世紀喪失了海權為止。史載，在十字軍時期，威尼斯政府的船只平均載運五百噸“艙內的船貨，另有在甲板上的大量船貨”。又據記載，地中海區城市的運輸船載運八百到一千人，包括水手在內。這些數字也許不能作為我們判斷船只大小的正確標準；因為如果使用什麼象近代安全設備的東西，這種雜亂的載運方式，就是把乘客擠入房艙和貨艙內的方式，從它的大小來說，還可增加它所載運的人

数。1268 年，威尼斯所供給路易九世的一只船，共长一百零八呎，內有水手一百一十人。

当时，推进船只的方法，是帆桨并用的方法。在十三世紀之前，一支船檣上挂着一块方形帆，似乎已成通常现象。1268 年，在关于威尼斯提供法王船只的契約里，规定每只大型船应有两支船檣和两幅方形帆。在这时期，威尼斯人也已有了三幅帆或四幅帆的船。船只并不完全靠帆来航行，除非是很小的船舶；船上还按船型的大小，配备着桨。大型船上，在每条长凳上有三个桨手，各执一支桨；这些桨一起通过同一的桨架口；小型船上的桨，是一对一对的。桨手的长凳，从船尾到船首，排列着，高度照例相同，虽然在十三世紀后期，大船上还有設置两三只桨手椅座。老塞紐多在十四世紀早期写道：一只船有六十条长凳，两边各三十条，共有一百二十个桨手在工作。菲力克斯·法布里，在十五世紀后期，曾搭乘有六十条长凳的船，每条凳上坐着三个桨手。船上长凳和桨手的数目，因船型的大小和所需的速度，而有所不同；桨的数目有时达到二百支。推进船只劳苦异常。优尔曾推断說，在中世紀时期划桨工作是由自由应募的人們担任的。其他作家，关于威尼斯的船只，也作出了同样的論断；在 1549 年以前，威尼斯未曾使用罪犯劳动来划桨。1483 年，菲力克斯·法布里在搭乘威尼斯船时知道：“船上奴隶大多是船主所买来的奴隶；或者是地位卑微的人或囚犯”。他还补充說：“無論什么时候如怕他們逃走，就用鏈子把他們綁在他們的长凳上的”。由此一定可推論說：船上奴隶，在十六世紀以前，不是沒有的，虽然政府沒有使用过他們。菲力克斯·法布里所述关于虐待桨手之过度情况使人难于置信：会有人願自由应募来参加这种服役，除非他的描写有所夸大。可是他也說，商人“有时自願成为船上奴隶，为的可經營港口上的貿易”。

在十和十一世紀，船的构造是簡單的，大型船有甲板和船首

樓。我找不到在十三世紀之前有關船上房艙的記載。正在這一世紀的早期，幾只英國船上為了國王和王后的特殊使用，曾建造過房艙。在威尼斯於 1268 年供給路易九世的船只中，最大的兩只船，在船首和船尾，各有幾個房艙，並各有兩層甲板，高達五呎五吋。在十四世紀早期，加達魯尼亞人使用了三層甲板的船，可能全船上都是一樣。甲板上的“鋪位”是用粉筆標出的地位，等於一個人的長度和一只搖籃的寬度，分配給乘客作為“睡坐和居住”之用。在上甲板上槳手兩排座板之間的空地，用來作堆放貨物箱籠。在上甲板的下面是船艙，即一個寬大房間，除了通過甲板蓋口縫之外，沒有什麼光綫或空氣。菲力克斯和他的同伴就是住在那里所配給他們的六呎長的地段內；但在載貨船上，這一房間是用作儲藏船貨的。

船舶不能按照使用方面來很清楚地分類的。1102 年，塞伏夫所乘的一只“又大又堅固的”船駛到佐帕港；這只船和其他停泊在那個港口內的船只，裝載着“谷物和商品以及來來往往的香客”。作為運輸馬匹之用的船，有着特殊的構造。在這種船的船尾上開着一個為馬匹進入的門口，當馬匹進入以後，即被關閉並填塞住；“這些門口，當船在海上航行時，沉在水面下”。當時，特殊的戰艦，一般是沒有的，船只被使用於戰爭或商業方面，須看情況來決定的；它們往往是兩用的，因為一只商船時常需要對付海盜船或其他敵對的船只。在整個中世紀時代，戰爭的進行是依靠商船的，政府認為必要時就征發商船來使用。把商船改為戰艦所需的手續，只是充實船上人員和軍火的配備而已。可是，自古以來，也有一種很大差別：所謂“圓型船”，即船身常造得寬闊的船，是基本上要用在載貨方面的。而船身低而速度快的“長型船”是基本上要用在戰爭方面的。

中世紀船上的生活，是用嚴峻的法律和章程來管理的。船上

所流行的制度異於陸上所流行的制度。船上本身即是一個小世界，它有它特殊的習慣、法院和刑罰；船上所訂的交易和契約不能在陸上予以實施，乘客或水手中間的爭執，不能提交岸上來解決。庫爾頓摘述 1590 年所寫的漢撒航程記中一段話，據他說，這段話可代表從很早時代所傳下來的船上的生活特徵。過了晌午光景，船長召集了船上所有的人員並告訴他們說，“因為我們大家都依靠上帝的保佑和氣候的順利，所以，今後每個人和他的同行者，不管他的身分如何，都是平等的。又因為在這一航程上我們時常在突然出現風暴、海盜和海洋巨魚及其他危險的威脅中，所以我們是不能沒有嚴格管理而航行的。”當他們到達距他們的港口半日航程之內的時候，他們再次被召集起來聽訓話：對過去在船上所碰到的和發生的無論什麼事情，大家都“應互相寬恕，不要介懷；既往不咎”。

在中世紀時期，船上的習慣規則，象在鄂列倫法典所記述的那樣，是直接或間接從羅得島海洋法典得來的。象地中海海洋法一般得諸同一源流那樣，鄂列倫法典一定不僅代表英國的而且代表當時其他航海民族的習慣與思想。這法典成為十三和十四世紀漢撒城市與波羅的海國家所建立的海洋法體系之基礎。依據鄂列倫法典，制訂了良好的港口章程，規定了適當的停泊辦法以及使用浮標和其他促進安全的方法。港口領港員負有嚴格的責任；任何由於缺少經驗或奸詐的領港行為所發生的損失，須由領港員負責賠償；如果他有足夠的貨物，以他的貨物來賠償；如果他沒有，則以他的頭顱來作抵。船主啟程之前，必須同他船上的同伴商量，詢問他們對於風向和氣候之意見如何。如果他未曾這樣做，又如果由於風暴而發生了損害，他應負責任。如果船上有什麼商人，船主在要改動船的航線或選定停泊地點之前，必須同他們以及船員一起商議。依據地中海規則，一個商人或一個商人集團，在租雇船只運貨而自己也搭乘該船的時候，幾乎對它有完全的權力；如

有几个人时，大多数人的意见得支配船只的管理和开动事宜。船主只在违反商人大多数意见而行动的时候，才負有損害賠償的責任。

船貨的裝載，在《鄂列倫法典》上，予以詳密規定。這項裝載工作，由“裝載夫”去做；由商人支付工錢。他們“善于擺放各種船貨，把它裝得很緊密，安排各種箱籠、包裹、成捆的東西，使兩邊保持平衡；填補空隙，使各種東西盡量放得妥當”。又有叫做“肩袋者”；他們被僱傭于裝卸穀物、食鹽和魚類；他們防止商人遭受船上水手的欺騙。意大利城市共和國還制定了嚴密規則，以防止船上載貨的過重。船只的載重量，在船下水的時候，由稽查員測量規定，並在船的兩旁，油漆着一條綫作為標志，就是，水不得升出這一條綫以上。裝卸船貨技術，在歐洲各地再也沒有比在威尼斯更高度地組織化。一個旅行家曾描寫那里的著名“碼頭”說，它“象一條大街，兩面皆海而位于中間”。貨棧沿着江邊列成長長一排，各堆儲着特種物料與貨物。凡是準備出海的船只，從一個貨棧移到另一貨棧；從各個貨棧，碼頭扛夫扛出捆包、繩索、武器、食品等等，“因而從兩面獲得了一切可能所需要的東西；當船達到碼頭的終點的時候，它自頭至尾都已裝滿”。一只進口船上的卸貨，也是這樣的情況。

當在海上碰到風暴而看來應把部分船貨拋到海里去的時候，船主必須征詢商人的意見；但如果他覺得：為了船的安全不能接受他們的意見，他可按照自己的主張行事。商人們由于這種船貨的“拋棄”而遭受的任何損失，依英國法律，以船主和水手在船上的財產，作為補償；而船主還喪失了投入海中的這部分貨物之運費。

由于一年中某些季节里海上危險的增加，也由于海盜的經常危險，地中海的港口，從十字軍時期中期起，每年組織兩次大規模商船隊開往東方去。一次航行，是在耶穌復活節左右，另一次，是在夏季聖約翰節日（6月24日）后，雖然啟程日期容有變更。商人

們喜歡這種航行方式，尤其是在他們運輸極貴重商品的時候。一般是想法避免在多風暴季節里的航海的。羅道福·馮·蘇刻在1350年曾談到過地中海旅行的若干特點：

〔他寫道〕船隻從西方到東方，趁着順風，疾駛似飛；在夜里比在白天航行得要快，白天每小時可完成十足十五哩的航程……從西方開到東方的大船，照例是在9月和10月里回來，但那種船身低的小型船舶在8月風平浪靜的時候，就開始了它們西返航行；因為在11月、12月和1月三個月中，由於風暴的危險，沒有船隻能夠橫渡海面的。然而，除極少數的船隻外，沒有船隻，能夠不遭受辛勞、恐懼和風暴而安然回來的。

在十四和十五世紀，這個時期的船隻，不可能在同一季節里完成從意大利到波羅的海的一次往返航程。

在整個中世紀時代所流行的習慣法，即所謂“船難法”，擴大了对船難的恐懼。上文已提過，船隻的航行路線很少遠離海岸，而船難又是常見的。海員生活中的一項嚴重災難，就是這種船難的慣例；依這慣例，所有從難船上所漂流來的貨物，或在一只擱淺船上的貨物，全部或一部成為海岸所有人的財產。所以，凡是占有海岸上一條危險地帶的領主，在航行季節里，可能獲得一次丰收。在布勒塔尼海岸上有一個領主以他所屬海岸上的一個危險山岩來自豪，認為它是他王冠上的一粒最好的寶石。有時，農夫在山岩上放置燈光來引誘海員；可以想象：這是常在領主縱容之下所干的勾當。在比斯開灣沿岸，法國人在掠奪難船方面很活躍。在地中海地區的大多數國家里，有着嚴峻的法律，反對那些企圖劫奪遭難船隻的人們；任何犯有這種罪行的人將被先投入海中，然後被拖出，用石頭擊死，“好象用石頭打死一只狼那樣”。船難法早已被認為是對商業的一種損害，但它很慢才失去它的效力。普魯茨說道，這項法律首先在進行十字軍的國家里被廢止，這項廢止起初只應用於基督教海員方面，後來也適用於穆罕默德教徒方面。從十二世

紀早期起，在进行十字軍的各国和南欧的若干商业城市之間，签订了合同，规定为了后者的利益，前者废弃了“擱淺法”。1170年，东方帝国曾同意：在它的管轄区内，任何执行“擱淺法”来反对热那亚人的人，将被严惩不貸；并必須强制归还因此而損失的財產。在十三世紀，还有很多例証，說明关于解除“船难法”上的义务以及关于这项习惯法行使与舞弊的控訴；由此可见，它在地中海海員生活中，仍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在十二世紀上半期，在英国开始了緩和上述恶习的运动。亨利一世曾下令：如果从不幸的船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活着逃出来，它不将认为是一只难船。理查一世的一项法律，是要取締这种“万恶的习惯”以及貪婪的領主濫用这项习惯的行为；法律规定：如果有一个領港員故意引导船只駛向一个危險海岸因而使之遭難的話，又如果他是接受当地領主的賄賂的，他将就地絞死于一个高的絞刑架上；这架子将在那里繼續保留直到后代，作为对經過船只的炯戒。如果領主占取了船难貨物中的任何一部分，他将受“天譴”并以盜匪論罪。另一条文规定：如果一个領主犯有帮助掠夺难船的罪行，或者纵容一个不可靠的領港員，使船只漂到他的海岸上，他将在他自己的住宅內連人带屋被烧毁，而他的宅基将改为一个市場，“永远出售猪豚”。尽管有这严峻的刑罰，这项习惯法，在英国，和在別处一样，似乎依然是在繼續着。1236年，英王亨利三世，在“废止不公道风俗”的一项詔令里，规定：如果船上有一人逃出或有一头活的牲口，难船的財產必須归还。1275年又頒布了一项类似的法律，规定如果从船上还有一个人或一只鼠或一头犬活着逃出来，它不得作为一只难船。汉撒同盟竭力要消除海上习惯法中的“船难法”；1287年，一批常到維斯比城的商人們开会，并通过決議：船难財產应归还它的原主；同盟的會員城市应恪守这项規則；違者处以逐出“商业同盟”的处罰。1430年苏格兰議会的法令

規定：如果有船只在蘇格蘭沿岸遭難，它們的財產是否歸還原主或由國王沒收，應按“它們所屬國家關於船難的法律”來決定；由此可知“船難法”直到中世紀末期，還是相當普遍地在通行，並具有習慣法的效力。

由船難所產生的生命和財產的喪失，不是海員生活中之唯一的危險。海上旅行和陸上旅行一樣，還有碰到襲擊與盜劫的經常恐怖。為了預防這種事故，船只在出海時，一向是很好武裝着的。在九至十世紀里，海上行劫是所有北歐民族的主要職業。與此同時，威尼斯人正在發展的商業活動，在亞得里亞海上遭受着克羅特人與達爾馬提亞人海盜的阻撓，而在西地中海上遭受着薩拉森人的騷擾。870年，當薩拉森海盜企圖闖入亞得里亞海的時候，威尼斯人擊敗了他們；而在十世紀結束之前，威尼斯人又粉碎了達爾馬提亞人的權力並完全肅清了那個海面上的海盜。但這項禍害，在地中海和亞得里亞海上雖已告弛緩，但還是沒有被清除淨盡。職業海盜還是繼續在干着搶劫行為，海面上自始至終還是充斥着這類匪幫，象波羅的海上的“勝利弟兄會”那樣；他們的格言是：“上帝的朋友，全世界的敵人”；他們的勢力，後在十五世紀早期，被漢撒同盟所擊潰。

但除了這些無法無天地搶劫一切船隻的職業海盜行為之外，還有另一種形式的騷擾；它是由於政府的縱容或教唆而變為合法化，並被用作反對敵對國家的一種戰鬥手段。在十二至十三世紀，熱那亞、比薩和威尼斯，即使未曾鼓勵，但也至少容忍了海盜行為作為相互間商業鬥爭的一種武器。“五港”的海員，在1242年由亨利三世委派，對法國人進行了報復。漢撒同盟，雖然原來以壓制北海和波羅的海上的海盜行為作為它組織的目的之一，但只要在方便的時候，常毫不躊躇地使用着海盜的幫助來損傷一個競爭者的商業。那在“敵船捕拿許可狀”下的合法報復行動，大多發展為十

足的海盜行為，就是，沒有特別注意船隻國籍的掠奪行為。一個國家的商業海員變為海盜來掠奪另一國家的船運，有時甚至掠奪自己國家的船運；這是一件普通的事情。西敏寺的馬太說道：“在那些日子裡，水手們是無法無天的，每個人把他能夠搶到手或拿走的無論什麼東西，視作己有”。“五港”因為受到委派，就利用了機會，掠奪法國船隻，到 1292 年時，它們在英吉利海峽上不管對朋友或對仇敵如此漫無限制地損害；所以政府竭力取締它們的活動，但沒有完全成功。然而，一般說，在海盜船中間，不損害同國人的船隻這一項原則，是被遵守的。在卡紐特時代北歐海上貿易之所以繁榮，是因為同屬於他丹麥帝國的臣民，在相互之間是不掠奪船運的。屬於地中海地區歐洲城市的海盜船，對同國人的船隻，也是不加侵害的。

政府認識到公海上保護它們臣民的責任是緩慢的，而在獲得有效地這樣做的權力方面，則更緩慢。由於對海盜行為的半尊重狀態，由於它在戰爭時期有用處，統治者對這種行為，如果它是由他們自己的臣民所干的，採取縱容態度；如果它是由其他國家臣民所干的，他們一點也沒有辦法從對方獲得賠償。挪威貴族阿爾夫的故事表明了：有時這是多么困難的一個問題。海上和在陸上一樣，也不缺少它的強盜男爵，而阿爾夫是在十三世紀以波羅的海上的大盜出名的。有一次，屬於德國商人的三十隻小艇曾巡邏海面來搜捕他。阿爾夫逃回到老家去，在那里他的國王把他提升為子爵，而把追尋阿爾夫的德意志商人竟看作對他的敵對行為。

在早期，海上安全一般是由商人自己想辦法的。他們組成了團體，從而他們能夠開出成隊的商船；他們把船隻武裝以防海盜的襲擊，有時還有特別武裝的並配備了戰鬥人員的護送船。劇烈的戰鬥時常會發生；如果商人失敗而喪失了船隻與貨物，他們就使用報復辦法，一種私戰乃接踵而來。在政府開始注意於海上安全之

后，它們力图管理这种报复行为，规定要求赔偿首先应通过政府来进行；只有在这項行动失敗以后，被劫的商人才得自行处理。

意大利沿海城市共和国的繁荣景象，甚至它們的生存，是依靠着商业的；所以它們从十字軍时期之前起，已注意于肃清海盗并注意于管理和保障它們船只的通航。它們是第一批对邻近海面实施主权管轄的国家；威尼斯在十三世紀結束之前，已要求对整个亚得里亚海之管轄权。這項要求，虽然主要也許不是出于保护的动机，但却包含着維持那些海面安全的責任，而事实上在这方面也大有帮助。

当中世紀生活变为更安定更文明的时候，商业的組織，有所改进。物物交換和小販营业，除了在偏僻的乡村地区以外，已經消逝，而固定的市場和市集出现了，象在过去羅馬帝国时代所有的那样。市集和市場在中世紀时代所引起的經濟作用远多于在今天所起的。它們是分配地方产品和从外面买入必需品的主要的而又常常是独一无二的媒介。這項市場权利是很有利的，所以在喀罗林朝时代它是属于王室特权范围内的。在第九和第十世紀，男爵們，只要有可能，就僭夺了這項特权，并把它作为属于地方主权内的一种权利。然而，很多寺院和大主教区，通过王室的賜与而享有這項权利。在十二世紀，当封建政体較稳定之后，大封建主剝夺了小封建主的市集权利，但一般地还把地方性市場权利留給后者。这样一来，市集轉入了高級貴族的行政权之下，而市場依然留在庄园管轄权范围之内。

在中世紀时代，市場权利是一項封建权利。市場是采邑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庄园制度，限在属于一个領主的庄园或他的庄园集合体范围之内的。这类地方市場一定常是靠得很近的，是为一个小地方服务的。《薩克森法典》，即薩克森的地方法典，編訂于十三世紀而它的起源已在更早的时期；它规定：市場与市場之間的距离

不得少于一哩(德意志哩)。一个十二世紀的諾曼編年史家，奧得立克·維退力斯举出一个乡下人从市場上赶着一头母牛回家的例子，又在另一处說到“乡下人在市場上和在教堂場地上大談特談威廉·魯佛斯的死亡消息”。教堂院地，往往就是市場地点，而星期日下午是一个共同的市場日子。所以，另有一个十二世紀的作家，基柏特·得·諾戎写道：“在周六的日子，乡下人为了做买卖，从周围各地云集而来；他們运入蚕豆、大麦或任何种类的谷物来出售，而在市場上鞋匠和其他手工业者摆設着貨攤”。如果一个农民找到了一个顾客，而后者所要采购的谷物和牲口之数量大于他所运入市場上的东西，他常常会帶領这个顾客到他家里去，让他看看那些站立着的畜群和谷仓里的谷物。在这类市場上所出售的是什么东西呢？首先是食粮。所以，这种市場帶有一种农家风味，是当地农民所常逛的地方。市場跟着生活的发展，跟着嗜好的提高，而变为半常設性。它变为一种每周举行的市場，在那里，每月中的某几天——第二周的星期三，第三周的星期四，等等——还举行特种市場来出售谷物、木材、葡萄酒、馬匹、牛羊等等。

当大封建主扩展他們的势力的时候，当領土变为进一步統一的时候，有势力者的所在地自然成为最重要的貿易中心；其中很多后来发展为市鎮，而最后这些市鎮成为商业和貿易的主要地点；在那里，王公貴族象腓力·奧古斯都在巴黎所做的那樣，建造了市房、倉庫、儲棧。据麦特兰的意见，“一所市場的建立，不是属于那种不确定的现象之一；这种现象，应由法律史专家移交給經濟发展史专家去研究。它是一种确定的和法律的行为。市場是按照法律来建立的；法律禁止人們在合法組成的市場之外做买卖交易。这项禁令之目的是：要阻止赃物之容易脫售……任何人在別处购貨，就冒着被作为窃賊論罪的危險，如果他偶然买进了赃物的話……另有一个副动机是：可协助这种市場的建立。那些願做安全交易

的人們，須适当地繳付某些市場稅……也許另有一种有价值的考慮，就是，要应用大家知道的而又可靠的度量衡。”^①

在城市形成以后，这些市場就越来越多，而它們的地位也比以前重要得多。在十二世紀，庞大的貿易刺激了市場的大量增加，以致我們看到有关市場过多的怨言。然而，我們必須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不平之鳴打个折扣，因為它們主要是从僧侶发出的，而僧侶本来是憎恶那由于市鎮的兴起而产生的商业活动上的俗人竞争的。关于这点，从教皇尤金三世写給英王亨利二世的一封强硬的信里，可获得說明；教皇抗議說：巴叶主教的市場，由于英王所批准的新的城市市場而陷于破产了。在十二世紀的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威尼斯人、伦巴人、热那亚人和比薩人——首先开始經營从一国到另一国的“直达”貿易。但如上文所述，南欧的布罗溫斯人与加达魯尼亚人和北欧的佛来銘人与德意志人不久加入了竞争。馮·柏洛指出：就德意志來說，文献大多不能使我們划出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間的一条正确的分界綫。在一块地方，批发商业是在外商手里，而他們力求获得市政当局的批准来做零售交易，而在另一块地方，我們看到，这项活跃的批发交易，是由市民来經營的；其实，这两类商人之間的差別，已經消逝。小商人参与并热衷于进口貨批发，正如大商人無論在城內或城外，随使用批发或零售方法来銷售他們的貨物那样。

市集与市場之間的三項主要区别是：(1)市集比起市場来，是在較高級封建管轄权之下；(2)市集不是属于庄园范围的，而是为更广大的公众服务的(最大的市集在范围上是国际性的)；(3)市集是按季举行的，而非按周或按双周举行的。應該指出：对于前往市集的商人們，不仅給予特別安全狀(安全狀中规定：对侵犯商人的

① 麦特兰：《土地調查簿及其他》，第194頁。

人身和貨物的罪行，处以特重刑罰），而且給予下列优待条件：减低关稅和通行稅、售貨的便利、設立特种法院来解决爭執并协助收集債款。在英国，这种法院被称为“行商法院”，那是从諾曼法文“pied de poudre”这个名詞得来的。又市集的開幕日向来是一个隆重的賽会日(feria)，由此获得了“fair”(市集)这个名詞。

每个国家和每个大封邑，各有它的市集。在亚德尔·蓝伯的《編年史》里，有一段文字，記述基因·鮑尔文伯爵建立一处市集的經過；在那里清楚地說明了市集与市場这两种制度的区别。他写道：

他〔基因·鮑尔文伯爵〕也把在他的前人时代原来在色刻伽的市場迁到奥尔得威坎去；那不是为了什么特殊目的，而是出于偶然的。但他依循教会的劝告，未曾改变市場的日期；于是那些周围的居民，紛紛来到那里居住，作为市民。基因伯爵，因为有大量商品从各地源源运到那里的緣故，为了上帝的光荣，也为了对所有的人，即商人和其他的人的好事，还命令：在每年“圣灵降临”节隆重庆祝时期，在那块地方上举行一次公开市集；而这项命令，他还宣誓确认。他以双重沟渠与堡垒来环绕庄宅；在其中間，他建造市房与必要的房屋；又为了适合需要，他又在第一道围墙的入口处，辛勤而誠心地建造了一所小礼拜堂来奉侍圣尼古拉(商人的护神)，在那里，他指派一个教士，叫做史梯芬者，充当牧师，并置备了充分的书籍和各种宗教飾品，使城市增光。

在这些市場上，外国商人和外地人参加当地貿易的競爭。所以，在巴黎星期日，即“大”市場日，圣得尼斯、波未、喀姆布萊的布商多来出售他們的布匹；他們在“交易廣場”上，有一个特別房間；只有一項規定：所有这些商人在打钟发出开市信号之前，不得作交易，而当打钟发出收市的信号后，一切买卖必須停止，外国商人必須退出。常設的商业，就是每天做生意，是属于当地商人的特权。在巴黎“大”市場日，凡是城內設有店鋪的商人，必須关闭店鋪，而到市場上去做生意，违者处以四十个苏的罰金；每次續犯，則加倍处罰。商人和手艺人被迫到国王市場上，禁止在自己的店鋪內出

售東西。只有少數商人可獲得在市場日子在自己鋪內售東西的特權；但他們為了這項特權每年須付四十個蘇的費用給國王。但一般說，在市場上出售東西這一項規定是堅持的。這些措施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財政的利益，使商人在市場上繳付他們的捐稅，比派人挨戶收集它們，容易得多。在巴黎，市場是屬於王室的。在市場市房里，國王出租貨攤地位；所以，他希望看到在市場日子里市房內擠滿了人。在法王聖路易時代，王室會要求市場權利作為王家特權的一部分。它會堅持下列原則：非征得國王的同意，任何人不得在法蘭西王國境內任何地點上開設市場；市場如此，市集亦然。如果有人向國王申請設立一所市場，國王派遣專員或管家去調查情況。如果調查結果認為不合條件，這項申請將被拒絕。1265年，王家法院曾決定取消一所由封建領主所建立的市場。

在十二和十三世紀，商業和工業的勃興，使市集大大增加起來，所以，各國有着很多市集。當然，其中大部分是比較屬於地方性的，但它們所服務的范围，比舊有的市場已廣闊得多。市鎮很自然地成為市集的重要地點。意大利最出名的市集，是在比薩、威尼斯、熱那亞、巴費亞、摩德拿、巴土亞、米蘭、貝加摩、微特波、皮阿森扎、巴利、加普亞、加厄大、撒列諾、滿佛里多尼亞和布林的西。值得注意，羅馬城沒有市集。在德意志的大市集，我們看到：科倫、愛爾福特、瑙謨堡、布倫斯威克、來比錫、漢堡、馬德堡、累根斯堡、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和奧得河畔法蘭克福。在法蘭德斯和低原國家有：聖奧麥、布魯日、庫耳特累、里爾、圖魯特、杜厄、喀姆布萊、奧基斯、伊泊爾、亞羅斯特、奧登堡、亞克塞爾、摩里內斯、波拍林厄、蒙斯、根特和安特衛普各市集。法國有很多市集；其中最重要的，在諾曼底有：盧昂、科德柏克、厄爾柏夫、阿夫勒、喀因、厄甫勒、蒙馬丁-蘇-米爾（科通騰）、阿甫龍士、聖米雪爾山、庫坦斯、加倫坦、瓦洛涅、柏納；在布勒塔尼有：聖馬洛、勒內、彭托爾孫、岡功 [guingamp]

“柳条花紋布”(gingham)这个名称由此得来],特勒基尔、基姆卑尔、普卢斯卡特;在法兰西島有:巴黎、德勒、圣得尼斯、奥尔良、比伊苏、摩立尼、厄塔普尔、蒙特、蒙雷里、麦郎、波未;在安如有:維格爾、波普罗、馬立賴、布里薩克、索睦耳和翁热;在法国中部有:布尔日、內維爾、波亚叠、翁谷雷謨、谷耳維爾、佩里革、夏龙-緒-梭恩、第戎、奧舍耳、奧登、东涅尔、波佛雷、都尔、沙脫尔、沙托·第·罗亚尔 圣騰永、犀农;在英属領地有:波尔多、貝云、亚仁、沙提永;在法国南部,最最出名的有:圣齐尔茲和波揆耳市集。在西班牙的重要市集中有:麦地那·得·坎匹奥(最大的市集)、塞維爾、魁因卡、法拉多利、塞哥維亞、托利多和布耳各斯。在英国,斯图尔桥和圣爱甫茲两市集,是很出名的;其他市集是:切斯特、溫彻斯特、波斯頓、斯坦福、朴次茅斯、亞平敦、諾坦普吞、柏立·圣爱德曼斯。

巴黎的圣得尼斯市集,确是最古老的市集;它的历史在中世紀时代无間断地繼續下去。这市集在 630 年是由达哥伯一世所建立的,在每年 10 月 3 日后,即紀念圣得尼斯的节日后,举行四周。所以,它本来是一个秋季市集。但当商业与貿易約在十字軍时期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当巴黎人口和政治地位在卡佩朝諸王时代开始增长的时候,圣得尼斯寺院的僧侶們也要求建立一个夏季市集。因此,1124 年路易六世曾拨出蒙馬特耳北面的一带地方作为一个新的市集地点,叫做“伦第市集”^①。这市集的举行,开始于 6 月的第二周星期三,而終止于圣約翰节日(6 月 24 日)。在它开幕时,一向是举行宗教仪式的,由巴黎主教对群众举行布道:他为了这项服务,从圣得尼斯寺院僧侶領取十个巴黎鎊。伦第市集受到巴黎、

① “伦第”(Lendit)这个词从拉丁文“indictum”得来的,它原来指一个在固定(indictum, 古法文 endit)时间的宗教集会;从这个意义引伸到市集或圣日也是假日。

諾曼底和法蘭德斯商人的歡迎。事實上，它是北法商人的主要匯合所。那里出售的主要商品是：布匹、皮革、羊皮紙、毛皮和馬匹。聖得尼斯寺院的住持從出租店鋪方面獲得了進款，而對市集秩序，也負責管理。然而，在十四世紀，王室開始侵犯寺院住持的特權并把王室管轄權擴展到市集方面。倫第市集在歌曲中，幾乎和香賓市集同樣出名，特別在下列歌曲中：《查理曼往耶路撒冷進香歌》、《暴漢歌》和《倫第故事歌》。

我們有理由堅持說：在中世紀時代，大市集在商業、法律和文化方面是起着作用的。大量商品——小麥、麻布、絲綢和棉織物、明礬和染料、武器和金屬器以及其他很多東西——促進了水陸兩路的運輸；大大越過了城市和單純市場經濟範圍。難道還須追述英國羊毛貿易的全國性甚至全世界性嗎？又難道還須追述這個時期在多斯加納和法蘭德斯布匹貿易擴張的廣闊領域，即它的範圍與勢力嗎？

在中世紀歐洲，香賓諸市集，聲譽遠播，最為著名。那些位於巴黎之東和東南部的一批出名的封邑，幾乎在三百年的大部時間中，都是在香賓伯爵的統治之下；這一世系的統治者，在它的極盛時期，無論在力量、智慧、權威或財富方面，都可與強有力的王室本身，分庭抗禮。這些有勢力的領主，統治着五個伯爵領，其中香賓和布里兩個伯爵領占着最重要地位。在地勢上，它們連在一起，占據一片廣大平原，從巴黎之東几哩的地点起，即從塞納河和瓦茲河盆地起延伸到德意志邊境上。勃艮第大公爵領，在其南，嘿諾、不拉奔和法蘭德斯伯爵領，在其北。

只要一看地圖，就足以使人相信香賓地區具有突出的自然優點。在法國這一片廣闊的肥沃平原上，布着一個世界上任何地方不易找到的極其出色的河流系統，或可以說諸河流系統的匯合。上塞納河，經過香賓流入諾曼底到海峽沿岸出口；繆司河沿它的東

疆由南到北經過低原國家，注入北海。在它東南相距几哩的地方，摩塞耳河和梭恩河流過中世紀時代那叫做勃艮第公爵領的領土；後一條河是羅尼河的主要支流，因而它成為地中海的，也是中世紀整個商業世界的一個重要出口。在它西南幾乎同樣相近的地方，羅亞爾河流過布腊伯爵領（在中世紀也屬於香賓伯爵的一塊領土），它是一條通法國西岸海洋的水路。其他兩條河流，即瑪恩河和摩塞耳河，穿過瑪恩缺口，提供由東到西的幾乎全部水上運輸路線，因而它們使萊茵河和塞納河的交通獲得聯繫。阿爾卑斯山路——大小聖伯爾拿、塞尼山、日內佛爾各山路——由於有優良的河流系統來補充，使香賓和北意大利相連接。那些不經過阿爾卑斯山路來的商人，如熱那亞人、比薩人、塞亞那人也同樣容易地上溯羅尼河和梭恩河而達到香賓。

香賓地區另有一個顯著優點，就是它的中心地位。它是在一方面是北方低原國家的興旺城市、英國的羊毛生產者、北海的漁業和另一方面是南方意大利與郎基多克的銀行家與進口商人之間的中途站，也是在它東方的德意志與它西方和南方的全法蘭西王國之間的中途站；所以毫不奇怪，香賓在十一和十二世紀所揭開的新的工商業時代里，得成為各國商人的匯集地點。這樣看來，香賓是中歐貿易的焦點，所有由北至南和由東到西的商路，都在那裡輻集。

而且，除了上面所述它在这种商業中間商與分配者的地位之外，香賓本身也是一塊好地方。在好几百年中，這個灌溉好排水好的盆地，曾以盛產谷物、葡萄、牲口、羊毛和牛乳產品而出名。在那里，氣候溫和，由於它自然的肥沃土質和賢明的管理，香賓很早已成為一個人煙稠密的樂園。香賓諸伯爵曾熱心促進他們領土內的物質幸福。在史籍中，可看到很多關於他們測量森林和河流、排干沼地和移民于人口稀薄地區之資料。他們對於撲滅狼禍，還特別

积极。这大量狼群的存在,可証明:在如今几乎連木材也沒有的地区,在十二和十三世紀,是有着很多森林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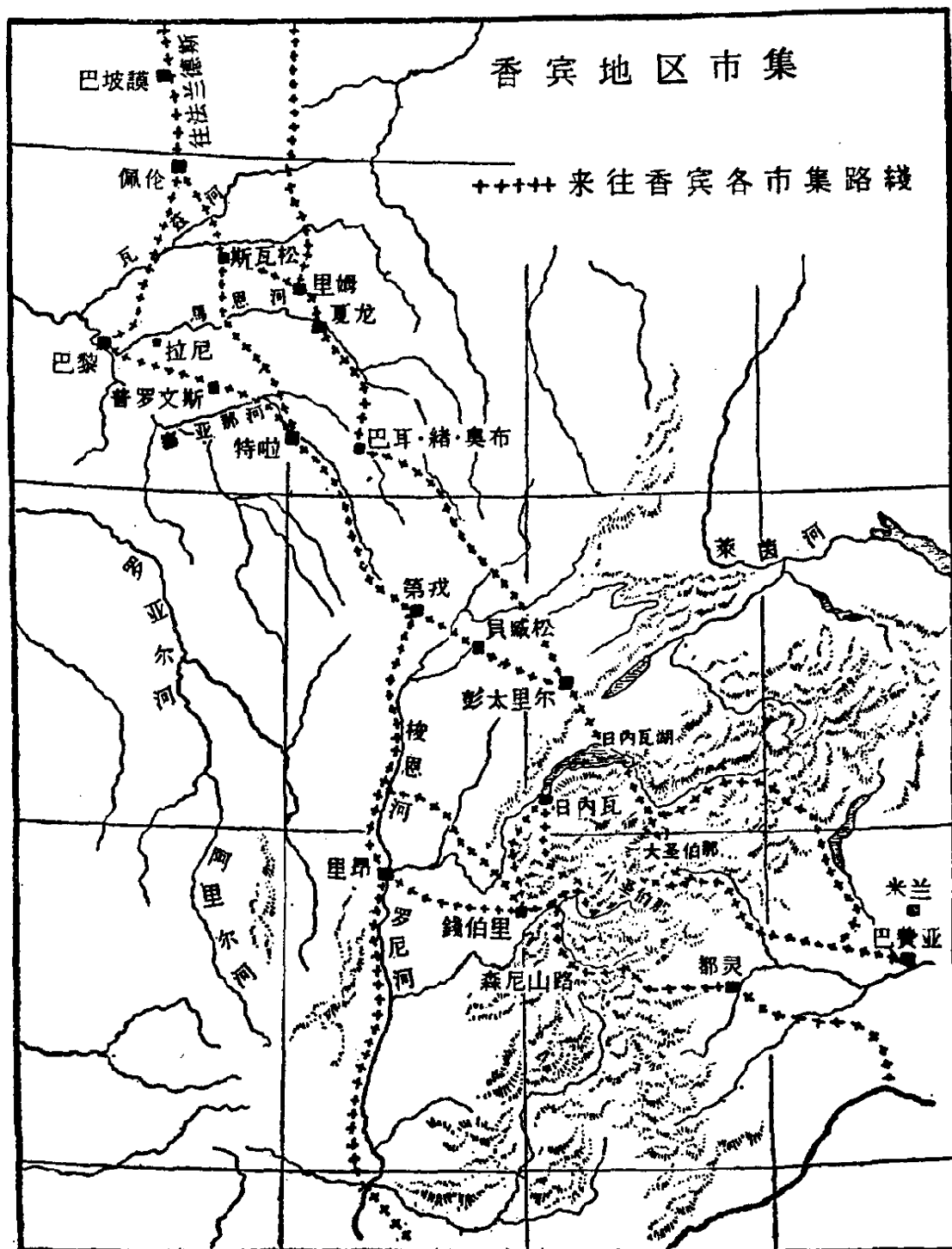
关于建立著名的香宾地区市集之正确日期,现已失传。可能,从很早时期起;当大陆上人民和貨物开始流动的时候,在这一地点就出现了一个市場。据羅馬人的記載,在第五世紀,特啦已有一个市集。但在羅馬市集与十二和十三世紀的大香宾市集之間,我們找不出什么有机性的联系。在一首法国歌曲中,把秃头查理作为香宾市集的建立人。但我們不能接受这项說法。据说普罗文斯的市集,在第九世紀,已經兴起。又传说,由于害怕“北欧人”的緣故,僧侶們曾把圣阿烏尔在圣柏納·緒·罗亚尔的墓穴里的遺骸,迁到普罗文斯去;在那里亚田伯爵为了圣阿烏尔教会的利益,让与并批准了一个市集。最早的可能日期,是在963年,当时曾有人談到过在夏龙·緒·瑪恩的一个市集。在996年,在拉尼·緒·瑪恩,另有一个市集。在同一年凡尔登的奴隶販子出现于香宾市集上。巴耳·緒·奥布和特啦的市集出现于1114年。关于意大利商人在怎么早的时期出现在这些市集上,我們不知道。可是,早在法王腓力一世的时代,教皇格列高里七世(死于1085年)已无根据地指斥他劫夺了那些往香宾市集去的意大利商人們。

现在有着从十二世紀早期开始而注明正确日期的一整套官方案卷,它們可以明确地証明:香宾市集在那个世紀的开端,已是一个固定而又繁荣的組織。这些案卷包括各种类型的文件:伯爵賜給附近寺院或教堂对某种商品征收稅款状,賜給它們在全部进款中分享若干份額状或准許它們租給旅客宿舍状。教皇教諭、宗教当局的各种特許状以及賜給世俗領主的贈与証,也談到市集和市集的重要性。1114年特啦的休伯爵的特許状,以征收巴耳市集上出售馬匹及其他野兽的稅款之权,賜給蒙蒂伦·德尔寺院;同一年的另一特許状以类似的恩惠,賜給特啦的圣皮尔·得·策勒寺院。

1137 年及以后的特許狀都表明：普罗文斯的市集建設得不差。1157 年香賓的亨利伯爵賜給圣亚田教会的一张特許狀，証明拉尼市集的存在，并表明了它們的組織和保护已是一件相当发展而又悠久的事情。从 1157 年起，給香賓和布里市集的特許狀，是很頻繁的。到了十二世紀中期，这些市集已在高度組織的状态下，又在十二世紀結束前好久，它們已享有国际声誉而它們的活动和庞大財富已成为普遍羡慕的对象。

香賓市集，实际上是一系列市集；至少在后来的时期，在数目上有着日益增加的趋势。可是，从开始起，就有几个特別著名的中心，在那里所举行的市集是具有国际性的。在这个或那个时期，香賓有五十多个市場，其中有六个市集特別出名，而以“香賓市集”著稱。在这些市集中，有一个市集在巴耳，一个在拉尼，而在普罗文斯和特啦每年各有两个市集。尽管其他市集也在这些地点上举行，并在后来年代里虽一再地准許在香賓的其他城市里設立市集和市場，但这六个市集依然保持着它們的領導地位。至于小地方上的最重要市集是：厄拍內、維特里、諾戎和夏龙。一旦这些市集地点表现了它們的自然优点以后，伯爵以特殊的立法、管理和安全保證，来把它們划为特殊区域；因此，所有外界的注意也都集中在那里了。其他市集可能在地方上的交換商品方面，是具有重要性的，但沒有一个能够贏得了国际地位。

起初，市集的时间是比較短的，但由于一再的特許和核准，它們得延长下去，直到每个市集可連續开放約六周多的时间；所以除了为安排事务和移到下次售物摊所需的間断时间之外，上說的六个市集使香賓几乎全年中一直有市。1160 年，巴耳·緒·奥布的市集，只繼續十五天，但到 1250 年，它历时約五周之久，后来它还延长更长的时间。在普罗文斯、特啦和拉尼，出现了差不多同样的过程，但还早得多。在市集的全盛时代，拉尼市集开始于 1 月 2



日；巴耳市集在懺悔星期二^①开市；在普罗文斯的“5月市集”开始于4月底或5月初，要看巴耳市集的情况来决定，因为后者遵守教

① 懺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是灰的星期三(Ash Wednesday)前之星期二，例子是日举行懺悔，作为四旬斋的准备。——译者

会所排定的日历的。圣約翰市集或所謂特啦“热”市集在圣約翰誕辰(6月24日)两周后的星期二开市;无论如何,須在7月的开始两周之內开市,而繼續到9月14日为止。普罗文斯的圣阿烏尔市集,开始于“十字架高升节”(9月14日),繼續到万圣节(11月1日)。这市集在上城举行,而在同一城內的5月市集,在下城举行。最后,圣勒米市集或特啦“冷”市集,开始于11月2日;实际上它結束这一年头,繼續到圣诞节前两周为止。

在这些市集中,拉尼市集属于圣比耳·得·拉尼寺院的僧侶;从秋市集或普罗文斯圣阿烏尔市集开始七天所得的收入,作为圣阿烏尔寺院僧侶們的犒賞金。其余的收入則全部属于香賓伯爵,除非他們把其中一部分暫時賜給別人。至于市集的支持和保护,都是依靠伯爵的行政机关的。

市集上的营业程序,在早期似乎稍有分歧,但当伯爵的管理权力扩展到市集以后,所有大市集的营业程序趋向于固定而一致。在每次市集之前,商人被給予八天的准备参加的时间,就是,他們来到市集,租定貨攤,打开箱籠,并陈列他們的商品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对于他們不征收什么捐稅。接着,就开始了正式市集;第一个十天期的市集,叫做“布市集”。在这时期,只有布匹得在市集的場所內进行买卖。在这布市集的第十天晚上,副警长在城內到处高喊“哈罗,哈罗!”,而布匹就不可复见。第二天,皮革、生皮和毛皮的市集开市,这市集也占十天的时间。在“哈罗”喊声結束了这市集之后,杂货市集开始,包括所有使用衡量与尺度来出售的东西在內,种类繁多。这一时期也是对市集管理員和管理局繳費的时期。在这时期的大部時間內馬匹及其他兽类的市集也在进行;这些兽类是从附近地点甚至从法国辽远的各州运来的。在布市集結束四周之后,最后的“哈罗”喊声关闭了錢币兌換所,于是市集完了。还有五天的宽放日期,来办理未了事:編造貨物清单,同

伯爵官吏結清帳目，領取“匯划票”，并在所有的重要契約上加蓋市集印章，來保證它們的效力。每天早上，用搖鈴來通知店鋪的開門；在晚上搖鈴後所有的店鋪須一律關門。非在規定時間之內，任何東西不得出售。

表面看來，市集和巴黎市場及很多其他城市的市場，大不相同，因為市集不是限于一個單獨大廳內，而是遍布於全城市的。這些城市有着它們的魚、肉的及其他大宗當地消費品的地方性市場，但市集佔據全城市，并在社會上和經濟上支配全城市，因而自然的，整個城市應大部移轉給市集。特別是在普羅文斯，它兩個市集，無論在這個或那個市集的時候，都佔據上城和下城。

在每個城市里，伯爵供給寬廣的營業大廳和大儲棧。在普羅文斯，這些儲棧，大多是在地下的，用地道來連接着，因而形成一個真正的地下城。許多在市集上進行交易的地方團體或集團，在上述的四個城市中的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城市里有着自己的常設營業所。這些房屋、貨攤、畜欄和儲棧，用作旅舍、用作陳列貨品與出售貨品的場所。在市集的人群中，有從法國下列重要省分來的商人：諾曼底、法蘭德斯、郎基多克、畢伽第、布羅溫斯；也有從下列各國來的外商：意大利、德意志、低原國家、英國、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波蘭。德意志商人在1178年第一次被提到。塞亞那人是老客人。市集上商品，象商人一樣複雜。它包括有：牲口和農產品、各色各樣的布匹——遠東的絲綢、法蘭德斯和多斯加納的毛織品、布勒塔尼的麻布、加奧爾的幕布——斯干的那維亞和俄羅斯的毛皮、德意志的鐵與皮革、南法和西班牙的葡萄酒以及由意大利和布羅溫斯商人從東方運來的很多種類的調味品和香料。

在香賓市集上所交換的商品中，布匹尤其是呢絨，佔着最重要的地位。各香賓城市本身，是這種商品不小的貨源地。普羅文斯在織造工業方面，早已發展得很好。據說，1230年，這城內居民有

五千戶，而其中有三千個織造工人以及漂布者和羊毛業方面的梳毛工人。所織造的布匹，種類繁多，從最精細的到最粗糙的布匹，並有為各種用途的布匹。染色是很進步的。行會有着高度組織性；織布事業由伯爵後來由接替他們權力的國王，精密地管理着。在特啦、巴耳、拉尼，也有織布工業，雖然它比不上在普羅文斯的那樣廣大。在夏龍·緒·瑪恩和理姆斯，也有紡織工業。從法國很多市鎮，如盧昂、阿拉斯、波未、巴黎、聖得尼斯、土魯斯、蒙特皮列和里摩日運來羊毛織品。而從法蘭德斯城市——麥克林、伊泊爾、聖奧麥、第斯特、根特、筏侖西恩、里爾、布魯日、那慕爾、杜厄、狄克摩德、喀姆布萊、盧芬及其他地方——運來的還要多。麻布來自屬於香賓市集的四個城市和理姆斯，來自德意志，特別是來自烏爾穆，而很出名的麻布則從勃艮第、貝贊松和洛林運來的。從遼遠地區，特別是從意大利城市和通過意大利城市運來的絲綢，是重要的。盧加的絲綢織品在市集上享有盛名，象它們在整個西方世界所享有的那樣。此外，還有其他稀有品種的紡織品。從利凡得、敘利亞、波斯和埃及運來的，還有金銀綫織成的珍奇布匹，用以製造大人物的外套和大衣以及僧侶們的禮服。

大量皮革、毛皮、生皮運到所有的香賓市集上，但特別是運到拉尼市集上。香賓本地也供給部分皮革，特別是它所由出名的羊皮。“哥爾多華皮革”來自西班牙的巴塞羅納或勒黎達，或來自南法的蒙特皮列、奧里臘克、里摩日和上魯斯；因為這種著名產品，在很多地方，被模仿得相當成功。巴黎本地也運送若干數量的皮革到香賓市集上。生皮和毛皮來自各方，種類繁多：綿羊、山羊、家兔、野兔、松鼠、睡鼠、銀鼠、貂鼠、水獺、麝貓、黑貂、鹿（並不被珍視）、海狸、野貓和家貓、狐狸、臭狸、狼及其他獸皮。

下列貨品是在“雜貨”的名義下出售的：各種由東方運來的香料、各種藥材、洋藍和洋紅顏料（洋紅來自布羅溫斯）、食鹽、絲綢、

麻繩、藥膏、豬油、脂肪、蜂窩、糖、蜡、枣子和瓜果等。

食糧和飲料兩類包括很多東西。其中很多是當地產物，運到市場上以供應當地居民的必需品和大批被吸引到市場上來的外地人的必需品。單在普羅文斯，有兩所出售麥子的敞廳，在那里并征收麥子的稅款；一在上城，一在下城；還有兩所屠宰場和兩所魚市場；對它的需要來說它們尚嫌不夠。兩所屠宰場各包括一間屠舍及許多出售肉品的攤子。在出售的食品中，有谷物和蔬菜——小麥、蚕豆、黃豆、菜、大蒜、青蔥——牛、羊、豬和小山羊以及各類鮮肉。各種咸魚和鮮魚在大魚攤上出售。布里的干酪在中世紀時代已經聞名。雖然很多食品是由香賓和布里供應的，但也不缺少證據表明：有大量東西，特別是有蹄牲口，也來自法蘭德斯、不拉奔、嘿諾以及法國的附近各州。本地和外國葡萄酒，在市場上的大交易里，占着一個重要地位，象對它們征收的大量捐稅所指明的那樣。香賓葡萄酒在詩文中很受贊揚，那里所釀造的而主要是在法蘭德斯和畢伽第消費的啤酒也是這樣。關稅章程上，有很多關於這種商品的條文。

香賓市場有力地刺激了這地區的地方性經濟活動。養羊和製造羊毛貨品，成為香賓的一項重要工業；鑄鐵業大多是在瑪恩河上游沿岸和洛林進行的；特啦城內的一個整個街區，是由硝皮匠占據的；普羅文斯的染工、俾安日和拉斐德·緒·奧布的漂布工人是出名的。理姆斯製造呢絨、羽毛布、嗶嘰等。

波基洛特列舉作為主要產品的而在關稅章程上常被提及的有：黃金、白銀、寶石、鐵、鋼、綫香、各種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絲、絲棉、大麻、亞麻、棉花（用以和羊毛、生絲或亞麻相混合）及其他東西。獸畜——馬、騾和驢——是大批運來的；在香賓市集中，每個市場各有一所專為出售獸畜的廣場；而這種交易在市場的大部時期內進行着。從這些獸畜出售所得的市場稅，一部分往往給

与当地寺院。

除了上述的东西以外，在香賓市集上所出售的各种制成品中有：来自第农的黄銅与青銅制的鍋和桶，尤其是桶；来自亚尔薩斯的木箱和浴盆；各种金属制的花瓶、面盆、水壶和大釜、第南特产的鍋和桶，是出名的。馬鞍匠的制品、零星杂货、甚至破旧衣服，在香賓市集上也可找到市場。出售的还有：带子、錢袋、头巾、手套、帽子、长袜、鏡子（不是玻璃做的鏡子，而是非常光滑的金属片）、籃子、坐垫、羊皮紙、車輪和貨車以及刀剑。关于刀剑，普罗文斯本城后来成为一个主要中心。在市集上可以购到珠宝、宝石与金銀飾品，象很多文学作品里所提到的那样。墨水瓶或墨水杯、琥珀念珠、牛鈴、馬鞭、鋼砧、从亚尔丁或英国来的砥石、木棒及很多其他东西，在那里也可找到顾客的。

在香賓市集上所使用的度量衡与流通的貨幣本位，实在太复杂，这里不能詳述。在法国各地，量度特別分歧，使用着很多不同的单位。几乎每一省有它的量度。“大桶”、“塞提尔”^①（一般合大桶量度的十二分之一）、量谷物的蒲式耳以及量液体的“大桶”，是最普通的量器。但是，香賓市集的度量衡，漸漸成为法国的一个标准。这一标准一直流传到今天——“特啦衡”^②是从特啦城（Tro-yes）得名的。当然各种量器还有很多細分的单位。衡器的分歧虽比不上量度的巨大差别，但也显出它們是不統一的。这里，香賓的衡器也漸成为广大地区的一个标准。衡器本来是属于伯爵的財產，但伯爵常常以一部分衡器，在特殊市集上，賜給寺院或其他团体，作为一种收入的来源；因为一切出售的东西，必須过秤，因而可征收手續費。“奥尼”（Aune）是量布的尺度。这一尺度原来相差很大，但在香賓它約等于三呎八吋。普罗文斯的“奥尼”（鉄尺的形

① 塞提尔是法国旧量器名，約合两加侖。——譯者

② 即金衡制，用以衡量金、銀和宝石的。——譯者

式，前些时候尚保存在那里的寺院里）等于三呎七又四分之一吋。它漸成为一个尺度的标准；連勃艮第也采用了它。目前所用的“布碼”尺，还保存了它的遺迹。

香宾伯爵在使市集发展为国际市場方面，曾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統治者的杰出世系，从 1010 年起，直到 1284 年香宾的女继承人嫁給腓力美男子为止，未曾中断过。后者在 1285 年成了法国国王；这样，香宾和布里伯爵領的行政遂归并于法国。亚田、亨利和提波特的这个悠长的世系，在有才而又賢明的伯爵夫人內助之下（偶然有过一个妇人統治者），为这些市集，曾规划并实行一个有政治家风度的計劃，就是，关于对内管理和对外支持与保护市集的政策。象这类有远见而又有一貫性政策的实例，在封建时代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香宾市集的光荣时期，是在香宾杰出伯爵亨利一世“慷慨者”的时代（1152—1181 年）。在他統治的第三年，他曾公布一項关于禁止私战的著名命令，因而他正式保証了他領地內农民与商人的安全。对这项政策，理姆斯大主教还給予贊助；后者是法王路易七世的弟兄。在亨利統治之下，拉尼、巴耳·緒·奥布、普罗文斯和特啦的市集获得了重要的国际地位。

香宾市集使城市获得了它們所享有的声誉；因而城市自然應該让位給市集。因为市集是伯爵們进款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他們关心的主要对象，理所当然，市集的行政管理应压倒城市的安排，在市集时期甚至完全代替了后者。因为按规程，凡是未曾指定作別用的市集捐費归于伯爵，又因为商人在市集界限之外营业者，不付什么捐費，所以，使市集界限和城市界限相接近，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留在市集外者就不能获得好处了。伯爵的官吏对香宾市集的控制成为象商人公会对其他城市的控制那样。不仅市集的界綫这样明确地划出，而且連商人集团、个别人員和貨物本身

所占的位置，也由伯爵的官吏控制。这精密排定的按日、按周、按月的程序单，如上文所說，是属于同一計劃的一部分。所有这一切布置，是为了进行监督以維持秩序的目的；另一目的，是要使所有应归伯爵的东西，都不致逃出他的官吏的控制。

为了市集行政管理，发展了一种精細的職員制度。在这些職員中，“市集监督”似乎是最早的一批。第一次提及他們的文献，是在 1174 年；在这以后，他們出现于整个香賓市集历史里。一般說，监督人数是两人，虽然在 1225 年，好象有过三人。他們領取固定工資，那是对监督的一种特別优待的事情；由此可见，伯爵們对个人的注意，多么仔細。监督的职务，是多方面的，包括司法、警务和公布管理的法令；一句話說，他們办理关于香賓市集上一般性的指导事宜。

其次是市集書記，常常被称为“监督助理”，在十三世紀后半期，初次被提及。書記本是有声望的人，有时被召唤来代替离职的或免职的监督。好象法兰克王国旧宮相的那樣，他們漸漸取得了监督的职权，直到他們終于成为市集的真正指导者。另有“秘书”，即市集的“监印官”；他的重要职务是：把伯爵的印章加盖在市集期間所訂的一切重要契約上。这印章保証契約的有效性，并确告訂約的当事人，伯爵将使用他的权力来实行这契約。市集上还有警卫官，他們是由监督和秘书所选拔的警察长。他們的职务是：維持市集上的和平秩序并执行监督的种种命令。这些官吏的人数，在各个时期，是不相同的，但在市集的最盛日子里，这种警卫力量一定是很大的。1317 年，它包括一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个步兵，二十个騎兵；在 1344 年以后，人数削减到一百人，但在这时期市集已經走向下坡。此外，市集上还需要差不多四十个代书人，他們担任紀錄員并为商人們起草契約。

除了这一伯爵的机构之外，当地的市长也参与这项行政。教

會官吏特別是普罗文斯的圣阿烏尔寺院的本尼狄克派僧侶和拉尼寺院的住持，在委托給他們管理的部分內，行使廣泛的管轄權，尤其是關於財政和司法權方面。有幾種案件，不受伯爵法院的管轄，而是由教堂或當地法院來處理的。國王的執行吏以及後來的教堂長(Prévôts)常常和伯爵的官吏分掌着當地的監督權。

關於香賓市集的法院，至少應當簡略地談一談。多少依照諾曼人的“市場法院”^①的形式，在市集上設立當地的法院來隨時解決所發生的爭執。這些法院是在市集監督與他們的助理以及教會官員手里，或在稀有的場合，顯然也有在地方官員手里。在特啦，有被稱為“特啦偉大日子法院”；它附屬於伯爵的行政機關，成為香賓和布里市集上的一種上訴法院。從這法院，再可上訴於王國的最高法院，即巴黎法院。

伯爵在香賓和布里伯爵領疆界之外所進行的活動，也有助於市集的成長。他們和許多國家曾簽訂條約與公約；依這些條約，凡是往香賓去的商人們經過它們的領土時，可減繳一大部分的慣例通行稅。甚至在沒有條約關係的地方上，伯爵的權威和聲望也足以保護在那里通過的商人們。其次，伯爵還竭力保護他們的顧客，不僅在防止封建主的勒索方面，而且在防止各類盜匪的掠奪方面。如果他們所發給的“市集通行証”沿途有被違犯的情形，伯爵將毫不躊躇地向那犯罪社會的當局提出極其嚴厲的抗議，甚至向卡佩朝本身提出，例如關於提波特大伯爵的著名事件。1148年，他向法王薩哲抗議，因為未茲雷的錢兌商在松斯，也許在松斯子爵的兒子縱容之下，曾被劫奪。伯爵所掌握的有力武器是：以從香賓市集上逐出任何犯罪社會的商人們作為威脅，直到犯罪人付出賠償或其他的人代替他們付出賠償為止。這武器也用以實施收集債款，

① 市場法院或“行商法院”，附設於市集或市場的法院。——譯者

因而那些在市集上做交易的商人們被迫履行伯爵的保證。這項把某些地方單位逐出於這營業興旺市集上的權力，即使不用作威脅，也已够使人听命於他了。

可是，“市集通行証”，虽可作为防止錢兌商和商人在沿途受到打劫與很多通行稅的勒索，却不能完全帶來了自由貿易。有勢力的領主們不願放棄這樣豐富的進款源流。關於這方面的著名事例，是法王在低原國家邊界上的亞多亞的巴坡謨以及培龍、魯伊、康邊和克勒比·恩·瓦羅亞，征收通行稅的制度。在這些地點中，最最重要的，是巴坡謨，在那個地點上，王室征稅員常受指責，因為他們獨占了对進入法境商人所征的通行稅。這種通行稅的征集，對香賓市集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大量佛來銘貨物，一定要在香賓市集上出售；我們還看到，在1262年法王在巴坡謨的勒索受到猛烈的抨擊。1293年，當腓力美男子通過他和香賓女繼承人的婚姻關係，已有权控制香賓市集的時候，他曾發布命令，規定漢撒商人，如果他們把德意志貨物運入香賓市集得免付捐稅；但如果他們運入佛來銘貨物則必須付稅。在十三世紀法王這項限制佛來銘貿易的立法，很值得注意的。他們垂涎於法蘭德斯的富庶領土；所以他們採用了這種限制商業的方法，來使法蘭德斯人因飢餓而變為屈服。到十三世紀末期，“貿易”已被卷入政治漩渦里；我們可看到關稅戰爭的事例；它們是十七世紀未來重商主義的大政策之預兆。

在香賓市集上做生意的商人們，一般不是單獨旅行的而是結成某種團體旅行的；他們推選一人為領隊人或“隊長”，來辦理團體領導人的義務和領事的義務，就是代表全體成員，從香賓伯爵或其他統治者取得貿易特權。朗基多克和布羅溫斯的商人在十三世紀中曾組織過這樣性質的一個團體；他們自稱為“法國商人社會”其中，蒙特皮列享有提名隊長之權。隊長宣誓就職，作為“法國和

在法國經商商人隊長領事”。在倫巴和塞亞那商人中間，也有這類組織的存在。

世界上沒有一個有商業地位的港口，未曾和這些內地大市場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接觸。當然，意大利和南法的先進工商業城市和法蘭德斯城市，最多利用了香賓市集。所以，在香賓市集上雲集着一種世界性的人群，包括各種種族，語言和服裝，從蘇格蘭到西西里、從卡斯提爾到大馬士革各地，都有人來。埃及人、敘利亞人、亞美尼亞人、希臘人、意大利人、法國人、西班牙人、德意志人、荷蘭人、不拉奔人、佛來銘人、英國人和蘇格蘭人互相混雜擁擠，來通過大厅；他們的聲音夾在廊柱周圍時起時伏的急劇嘈雜的聲浪里，在那里，正在進行討價還價的爭吵。從各地來的無所不在的猶太人，也雜在人叢中間。

香賓市集，對於商業的經營和技巧方面，起着一種深刻的影響。當市集從煙沒無聞的地位冒起頭來以後，一種貨幣經濟越來越變為穩定。各種貨幣在使用着，種類繁多，幾乎象從天涯海角輻集在香賓的複雜人群那樣。都爾內幣、巴黎幣、波亞圖幣及法國其他地方的貨幣，英國的“東方貨幣”、貝占幣及意大利各種硬幣，都出現於市面上。在香賓本地，有許多不同的貨幣，世俗的和教會的；但最著名的是普羅文斯幣，它成為香賓市集的一種標準幣。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貨幣制度是沿着“記帳貨幣”的路綫而很好發展起來的。德尼爾銀幣及它的輔幣，是實際通用着的，而蘇和鎊是理論上的貨幣，用以作為記帳和信貸的單位的。在十四世紀中，一個僑居塞浦路斯的佛罗倫薩人比哥洛提，曾漫遊各地；他“認為必須準備一張貨幣表和一張度量衡表，在亞歷山大城使用，另在意大利的十處地方、在布羅溫斯和香賓市集使用”。

在香賓市集上集合着這樣多的商人，當然會把很多貨幣吸引到香賓去的。此外，有人利用這個機會，來結算和商業無關的帳款

——付还在辽远地方所訂契約上的債款，甚至拖欠的租款。各种捐稅的支付更促进现款的需要。由此可见，为什么貨幣源源流入香賓的种种理由了。商品交換和貨幣匯划，由于“錢兌商”的制度，而变为便利；他們所經營的，就是今天銀行家所做的營業。这种制度，起源很早。事实上，它跟着香賓市集而成长起来的。十三世紀的文獻里常常談到“錢兌商”。在十四世紀，他們在国王控制之下，正式被承认为公務員。他們在市集上的營業所，是簡單的攤子，每一攤子包括一张敷着棋盘格布的台子，一付天平和放着硬幣与元寶的皮囊。他們的業務是：兌換錢幣因而收取一項定率的兌換手續費，收受存款，放款取息，發給市場票據即信用票，俾可免除轉運數量日增的硬幣上所發生的危險和困難。他們被准許放款取利，他們并常常貸款給伯爵和伯爵夫人本人。从伦巴第来的意大利人，即一个有堅強組織的集团，最早抓取了這項營業的相当大的部分，他們在长久时期中，是市集上的最出名的“錢兌商”，但也有其他的人来参加這項營業，尤其是加奥尔人和犹太人。

和市集的安排緊密地聯系的，还有关于收入的問題。應該記得：拉尼的市集和普罗文斯的圣阿烏尔市集的起初七天时期的收入，移交給当地寺院。关于其余属于伯爵的市集，伯爵照例以某种特殊贈与給当地宗教团体、寺院、寺院騎士团或其他。有时，这种特殊贈与，是关于征收出售牲口或某种其他东西的捐稅之权。有时，它是关于过秤或丈量的权利。大体說来，伯爵保留从布匹和生皮市集上以及从雜貨市集上所得的進款。从市集主顧所付的捐稅繁复情形看来，稅收制度是一种精心結構之作。其中最重要的而又最普通的一种，是營業稅，就是，对每次交易規定征收小費并當場征收的稅。理論上，这种稅半由出售者、半由購買者繳付，但事实上可能全部由購買者繳付。此外，还有房屋租費、商人住所和畜棚費、进口和出口費、摆摊費、盐醃食物費、各种貨物的衡量費、葡

葡萄酒特稅、犹太人和伦巴人特稅、契約上加蓋市集印章費以及罰款和過失費；這一切在國王管轄的時代，都有增加的趨勢。

除了來自各地的外國商人之外，還有香賓各城市的當地商人，即零售商和小販；他們到這裡來補充他們的存貨。有些鄰近領主，帶著他們的家屬，到這裡來看熱鬧、來买东西、欣賞市集上的遊戲。寺院修道士和世俗僧侶也混雜在人叢中。無疑的，很多手工藝人和逃亡農奴從附近莊園被奇異景象、嘈雜聲音和漂亮服裝的人群吸引而來。走江湖者、變戲法者及各種音樂師，爭先恐後地吸引群眾；牽着猴子、狗或舞蹈熊的人們、角力者、彈唱古代歌曲的漫遊詩人以及無數的售賣劣貨者，在那裡竭力使觀眾發笑和驚奇。在那裡，象在近代賽會上一樣，還集合着小偷、扒手、惡徒、流氓、妓女和乞丐。在這複雜的人群中，警士很難維持秩序。“晚上，當吹號者，帶着火炬隊，吹過熄燈令之後，游蕩者、醉漢、小偷、大批乞丐、大批男女放蕩者（市集是他們的一個集合所），給他們〔警士〕的麻煩比白天的人群，還要多”。十二和十三世紀的很多故事，如《有意義的錢袋》故事、《馬奇士的傳說》、《漢微斯浪漫史》、《洛林》傳說的本末片斷，有趣地闡明了香賓市集的生活和活動。

香賓和布里市集，甚至在伯爵們統治的後期，看來已經開始衰落，部分因為苛捐雜稅的壓迫，部分因為法王強制性的商業政策。它們衰敗的主要原因，是王室捐稅的經常增加，而這種捐稅是間接地橫加在市集頭上的。如上文所述，早在1262年，佛來銘商人已經威脅地表示：如果在巴坡謨向他們所征的通行稅不予減低，他們將放棄香賓市集。1284年香賓的女繼承人約尼嫁給法王腓力美男子這回事，使香賓和布里同時落入法王的實際控制；那是對市集的一個嚴重的打擊。其次，法王的臭名昭著的財政措施，不久使捐稅達到這樣的苛重地步，以致商人們開始避開市集。1296年，佛罗伦薩人遷到里昂去。在同一年，腓力四世對法蘭德斯開始進行

了戰爭；在這以後，法蘭德斯又被長期卷入英法戰爭的漩渦，因而市集遭受了嚴重的損害。最後，1317年當威尼斯人开辟了那條經過直布羅陀海峽和英吉利海峽到布魯日和倫敦去的著名的全部海上航路之後，香賓市集受到了幾乎致命的打擊。於是，它們萎縮為純粹地方性的市場了。

第二十四章 新寺院团——克伦尼 派、息斯脫西安派、普勒孟斯特 派、法兰西斯派、多米尼克派

在十、十一和十二世紀，寺院制度的势力达到了高峰；的确，这势力已很巨大，所以对这个时期的寺院制度作一比較精密的研究，是必要的。甚至当时代人也对那时的寺院制度的广泛而又迅速的传布，感到震动。新寺院团的这种激增，是关于中世紀时代宗教信仰的一个独特的証明。因为每个新寺院团无例外地是为了革除旧寺院团的积弊而建立起来的。“修道制度的历史，是一个腐敗和改革的长期紀錄”。所以在十世紀，克伦尼派接替本尼狄克派，在十二世紀息斯脫西安派接替克伦尼派，在十三世紀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接替所有以前的三个寺院团。那用以糾正寺院腐敗的方法，一向是增多僧侶——建立一个新寺院团来糾正旧寺院团的弊病，来重整这制度。中世紀人們似乎很少注意到：适当的补救办法也許不是增加而是削減僧侶的人数；和今天一样，无限制的民主的缺陷虽已很明显，但很少有人提出要使世界少些民主作为补救办法的。

可是，我們也时常听到反对寺院增加的抗議呼声。十二世紀中，有一个德意志作家写道，“僧侶和寺院充斥于世界了”。《这有什么用处？》是修道士和世俗僧侶之間就两类僧侶相对优点之對話集，而反对寺院制度的恶毒言論在中世紀文学里，是数见不鮮的。但一般說，我們必須把它們的論点打一折扣，因为两类僧侶之間存在着政治的、社会的和經濟的敌对状态，以至发展成深仇宿怨。他

們各自爭取土地、他們各自陰謀勾結或反对統治的封建主和封建國王。寺院团在利用它們所享有的聲望方面，也不落后。关于各世紀中所建立的寺院之統計數字，是具有說明性与启发性的。下列數字是关于中世紀时期法国的寺院建立情况：第四世紀，十一所；第五世紀，四十所；第六世紀，二百六十二所；第七世紀，二百八十所；第八世紀，一百零七所；第九世紀，二百五十一所；第十世紀，一百五十七所；十一世紀（克伦尼派时代），三百二十六所；十二世紀（息斯脫西安派时代），七百零二所。在十世紀末期，法国有五百四十三所修道院。从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时代起，新建寺院的數字，剧烈下降。在十三世紀，我們看到二百八十七所；在十四世紀（英法百年战争和“教会大分裂”开始的时期）只有五十三所。在十五世紀，這項數字降到二十六所。无怪特里次密斯在 1493 年埋怨說，“往昔，王公曾建造并資助寺院；如今，他們劫掠并破坏它們了。”后来，在 1496 年，他伤心地写道：“建造寺院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而破坏它們的日子，正在来临。”果然在四十年之后，英王亨利八世取消了英国的寺院。

寺院在整个封建世界里，同时是領主、附庸或宗主，但在它自己的范围里，它是宗主，有着奴隶，有着农奴；它是依靠农奴在它領地上的劳动而致富的。圣里奎尔寺院，当时还不算是很富的，尚有一百十七个奴隶，領受它的封邑。在它所在的城市中，正确地說，在圍繞它成长的城市中，它領有二千五百幢房屋；它們的租戶除对寺院繳付現款租之外，还須提供一万只小鸡、一万只闖鸡、七万五千个鸡蛋和四百磅蜡。“圣里奎尔寺院所收的地租和捐費清册告訴我們：早在 831 年已有人数众多的世俗手工艺居民，按他們的行业聚居在環繞那个寺院的各街道上，并为了报答給予他們的土地，他們对有些人供应工具，对其他的人供应帶子、布匹或食品”。

在中世紀的各种机构中，再也沒有比寺院享受着更大的公众

崇拜。所以，寺院在建立时期通常是获得大量基金的贈与。干得斯亥謨的女修道院，即薩克森族所偏爱的团体，在956年開創时，获得了一万一千处庄园的捐贈。赫斯斐尔德寺院在三十年時間內积聚了二千处庄园，分散在一百九十五处地方上。巴伐利亚的德哲尼西寺院，在十世紀早期公爵亚諾尔弗剝夺它之前，曾領有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六处庄园；与它遭受同一命运的本尼狄克特柏伦寺院，曾拥有六千七百处庄园。佛尔达寺院領有一万五千处庄园；罗耳士寺院領有二千处庄园；圣加尔寺院領有四千处庄园。早在787年，圣汪列尔寺院已拥有四千二百六十四处庄园；圣柏湯寺院在第九世紀已占有一百多所村庄；圣里奎尔寺院拥有二千五百处庄园；秃头查理曾賜給阿微納寺院一千一百五十处庄园来維持四十个尼姑和二十个牧师的生活。1023年，亨利二世曾剝夺圣特累甫的馬克息民寺院六千六百五十六处庄园，而它依然是富裕的。到1030年时，它有一千处以上的庄园，分散在一百四十处地方上。到了十二世紀，佛尔达寺院，在它被剝夺之后，又已逐漸获得了这样多的庄园，它在薩克森有三千处庄园，在条麟吉亚有三千处，在窩姆斯周围的萊茵兰有三千处，在巴伐利亚和斯瓦比亚有三千处。圣烏尔立喜寺院，确被认为是很穷的，尚有二百零三处庄园；在每一处庄园上，有一至六所村庄。

另一方面，有很多小寺院，仅有一小撮僧侶占据着。但一般趋势是：小寺院由于大寺院的兼并而消逝——克伦尼寺院大多用这种方式扩大起来的——或者被当地封建貴族所侵占；貴族对这种小型而又隔絕的寺院，是容易掠夺的。都尔內的赫尔曼所讲的一件故事，精采地說明了这类小寺院的隔絕情况。都尔內的圣馬丁寺院，是一所发财的寺院，并曾領得查理曼所賜給的一张特許状。在第九世紀“北欧人”侵入的时期，圣馬丁寺院住持，为了防止寺院的財物和手抄本遭劫，把它們送往巴黎主教管轄区内菲利厄寺院

去。在那个时候，菲利厄是一所重要的寺院，并以它有名的住持琉帕斯的学問著称。但“北欧人”在塞納河流域的蹂躪以及十世紀的封建混乱状态，使它貧困化，使它的人員縮減，所以它不复被大众所知道。圣馬丁寺院的特許状变为无影无踪，連菲利厄寺院的地点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約在二百年后，偶然有一个訪問过菲利厄寺院的庫耳特累的修道士，有一天在圣馬丁寺院里告訴住持說，他曾在菲利厄见过属于圣馬丁寺院的查理曼所賜給的特許状。但这个訪問者，在住持来得及問他菲利厄在哪里之前，已經离开了。好多年又过去了。最后，在 1119 年理姆斯會議上，住持碰到了一个来自巴黎的牧师，后者透露了菲利厄的地点，而所失掉的特許状終于失而复得了。伊摩拉寺院，虽然有一个主教并位于距波伦亚城不远的通意大利的一条大路上，但关于公共消息，很不灵通。例如，在 1106 年亨利五世即位两年多以后，它仍以为：皇帝的名字是查理。

寺院生活对于中世紀的人們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特别是对爱好研究学問的人們，或者对于嫌恶封建时期强暴风气的人們。基柏特·得·諾戎在他的《自传》里（它是中世紀时代极稀有的自传之一），生动地描写了这项誘惑力。禅房、圖書館和书斋的安靜生活、讀書和研究机会、庵堂与花圃內的林蔭小径引起了利欲熏心的武人們的好笑或蔑視；他們把修道士們的文学和书斋工作引为笑柄。奥得立克·維退力斯痛心描述封建主的态度，就是对他們所不懂的东西，对价值远超过他們的暴力行动的东西，抱有輕蔑态度。在《吉拉特·得·魯栖永》紀事詩里，武士阶层对寺院生活的輕視很显著。詩中一个角色起誓說，如果他有一个懦弱的儿子，他将使他成为修道士。

下列故事表明：在寺院制度中有着一項未曾被充分观察出的禍害。在中世紀时代，一个人不是鉄槌，便是鉄砧，二者必居其一。

外面世界，又粗暴又縱欲，對於柔弱的人們，不論在體力或精神方面，是沒有地位的。因此，參加寺院生活的道路，對許多人來說，是最少抵抗力的路綫。弱者、胆小者、疾病者在寺院之內找到了托庇之所。大多寺院的知識和道德水平，可能是低的；正是這種情況，可大部說明它們為什麼經常趨向墮落，並為什麼需要經常努力，以求改革。有時，也有一個有力量的人，可能被迫充當修道士的，因為使一個家庭成員做修道士，是光輝門楣的事情，或有關家庭財產利益的事情。這樣的一個修道士，是注定要不滿意或叛離的。在中世紀的一篇諷刺文章里，談到關於這樣的一個修道士的一件故事。他被住持派到外界社會去出差。“晚上，他騎着一頭渾身是汗的駿馬回來。他頭上戴着一只熊皮帽，他的外套已經截短，並已經前後開叉以便騎馬。他在綉花的軍用腰帶上，挂着弓和箭袋、槌和鉗子、一把寶劍、一塊打火石和鋼片以及一根橡木棒。他穿着寬大短褲，又因為他的踢馬刺很長，他必須用趾尖走路”。從這樣的一個世俗僧侶的筆下，我們有着一篇有趣的小品文章，叫做“武俠的娛樂”。

恰與一般所設想的相反，在中世紀時代，修道士大多不是那種負有救濟靈魂責任或對別人盡宗教義務的教士。

他們在修道士的地位上，既不布道，又不听取懺悔，既不執行聖餐儀式，又不行使任何宗教上的職權。他們是俗人，也只能是俗人，儘管他們確受着關於清貧、貞潔與服從的誓約之束縛；這種誓約是自動地承擔的，象現在任何人自己所可立誓的那樣，可是在這樣做法下，他們不會就終止為俗人的……他們是俗人的團體，指派他們自己的牧師，擁有宗教的財產，但不能因此就是教士了……雖然這些修道士事實上是俗人而且只不過是俗人……但他們的純粹世俗性却被一般人所遺忘，因而他們的世俗任務被他們的仇敵看作違反他們職業的嚴肅性的。但問題是：要區別事情本質上的不同與它後果上的差別；僧侶在田間自己勞動，象聖奧古斯丁所命令的那樣呢？還是他僅監督別人的勞動呢？住持手執鋤刀彎腰曲背面對泥土工作着，象在早期所做的那樣呢？

还是他仅安排个人及其他的人来替他做这种劳苦工作呢。^①

本尼狄克教规曾规定一切僧侣做实际的手工劳动。但关于劳动的这种旧理想,不久被湮没无闻了。在封建时代,僧侣不复用自己的手来劳动。他们从出租土地所得的进款,已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劳动由农奴代做。这种转变,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寺院已日益由那些嫌恶手工劳动的封建贵族子弟所占据。从这一阶层来的人们专心于教导工作、抄写稿本或办理行政。

只在具有强烈的宗教热情时期,象在宗教复兴时期,我们看到,僧侣在一种自卑情绪中,在一个短时期内,做些实际手工劳动。吉美厄治的威廉,在谈到那些建造柏克大寺院的僧侣们时,有些诧异地说道,“你们会看到:他们在教会办公时间之后走到田间去作农业劳动,以消费残余时间;住持头上顶着种籽,手里执着农具;有的人清除土地,有的人施肥于土地上,在这以后,在做祷告时间,他们大家回到教堂去,没有一个人饱食而不劳动的”。又有某一个叫朱理安的,在参观了一所寺院之后,报告说,“我在那里看到有些老人正在抄写。我问他们住持在哪里,而他们回答道,‘在寺院下面的溪谷里。他正在割草!’”

但寺院风纪的经常败坏,不能完全归咎于它的内部情形。外界的封建状况,对它们是具有巨大影响的。从寺院运动的开始起,寺院是由私人捐助的,就是说,业主阶层捐给它们土地,因而对它们保留着大量控制权。当地的巨头往往是一个“世俗住持”,他分封寺院的土地并为自己的利益使用它进款的一部分。在第九世纪,理姆斯的兴克马论及休·卫尔夫,即几所富裕寺院的世俗住持时,写道,“他和俗人生活的区别,只在于削髮而已”。国王、贵族、主教,由于虔诚和自我扩张的混合动机而建造了寺院。因为寺院

^① 坎布伦塞斯:《全集》,第四卷,《导论》,第33、60页(《案卷丛书》)。

一旦建成以後，它的基金由於善男信女的捐獻，迅速增加起來，而從這些增產所得的進款，部分歸於原建造者或他的家族。所以，建造一所寺院，在中世紀時代，是一種有利的投資形式。因為建造者就是寺院的領主。俗人所建造的寺院，是建造者的傳子傳孫的世襲財產，它們的進款成為他產業的一部分；它們可以遺傳、讓與並分配於他的諸繼承人之間。只有一種限制性的事實是：它們不能全部被還俗化或撤消。

在封建時代最黑暗而又最強暴的日子裡，寺院象其他機構一樣，走向下坡。“北歐人”的侵入法國與下萊茵蘭、匈牙利人的掠奪德意志和北意大利、薩拉森人對地中海沿岸與阿爾卑斯山路內地的侵襲以及封建貴族對寺院土地的侵犯與對它們財產的占奪；這一切使寺院陷於破產，因而僧侶中很多逃出寺院，而轉向於和世俗男爵一樣的掠奪生活。在寺院土地上的農奴中，有的已經逃亡或喪身於混亂局勢中，而留剩下來，在人數上已縮減到這樣地步，以致僧侶們不得不親自來耕種寺院的土地。而且，在十世紀對於僧侶，已噴有煩言：人們譴責他們縱情聲色、漠視誓約、齋日吃肉、酗酒以及拒絕接待旅客。當時寺院的情況，已經如此敗壞，似乎已不能自拔。

但十至十一世紀的寺院改革運動，把它們從這深淵裡拯救出來了。新的寺院團如克倫尼派、息斯脫西安派和卡德西安派^①先後興起。又跟着它們的興起，歐洲不僅進入了一個新的宗教改進的時期，而且進入了一個新的世俗改進的階段。莊園、田地、森林、葡萄園、牧場、磨坊、牛乳棚象陣雨般地捐給它們。寺院也開設了定期市場來出售它們的產品；它們的工場製造木器、皮革、織物、鐵器和銅器，住持象世俗貴族一樣，甚至鑄造它們的貨幣。基伯特·

① 1086年聖白魯諾在法國沙特勒茲所創設的寺院團。——譯者

得·諾戎生动地描写了这项寺院复兴运动:

除了最古老的寺院以外,当时没有什么地方可容留很多的僧侣,到处开始了新的建筑;因为僧侣从各方面蜂拥而来,进行了大量粮食的积储。又当没有充分经费来进行大规模建筑的时候,它们安排僧侣三三两两地膳宿于附近地方上。因此,僧侣群突然出现在庄园和市镇上,在城市和要塞里,甚至在树林和田野间;他们向四面八方分散出去……所以,有些贵族就自愿忍受贫穷;并由于鄙视他们的财产,把它们献给他们所进入的寺院;他们还诚心诚意地努力争取别人来做同样的事情。而且,还有贵妇们,遗弃了她们有名的丈夫,置儿女之爱于度外,把她们的财产也献给寺院……至于有些不能全部放弃自己财产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赠与的形式来维持那些已经这样做的人们。

建立一所寺院,通常是一种移民的行动,就是,移殖于辽远地区内的荒地、森林地或沼泽地上,不论在一个国家的腹地或边疆上。这样地开垦的大块土地,是从来未曾受斧砍或犁耕过的荒凉地区。这种处女地,现在只在人口增加的压力下,才获得了价值。当然,在一块地方上所采用的垦殖种类,常常特别决定于它的自然资源的。沼泽地可转变为肥沃的草地和田地;森林可提供木材、木炭;如果那里有橡树或三毛櫟,则用作养猪的牧场;河流、湖沼和海岸可提供鱼类和作为肥料用的海草。在欧洲沿海岸,凡是漂到海滩上的鲸鱼,一般作为当地住持的捕获品。柏立·圣爱德曼曾付出四千爱尔^①的布作某些土地的租金。

在布勒塔尼,有一所寺院,是在下面所述的情况下开始的:“科尼汪,由五个愿过幽静生活的弟兄伴随着,离开了主教的驻所。找寻静僻地方,经过若干时间以后,他选择了乌斯特河和发兰河合流处的一块地方,那里的崇山峻岭可作为天然屏障”。有一个诺曼历史家,叙述某位叫伯尔拿的在1100年怎样退出了波亚叠的圣息普

① 古尺名,等于45吋。——译者

立安寺院，因為那里已不復是一塊寂靜的場所；他和他的僧侶同伴走了好多路程之後，定居于一塊屬於沙特爾主教的森林地區內，叫做蒂倫。

大批信徒湧到他那里，並在這新寺院里，每個人從事他所學會做的工作。結果，在他的周圍，很快集合了工人們：金屬匠和木匠、雕刻匠和首飾匠、漆匠和石匠、葡萄藤修剪工和農夫以及工業各部門中的精巧手藝人。這樣，一所巍峨寺院承上帝的佑助，迅速地建立在新近還是盜匪匿跡的一塊可怕的森林地上了……於是，伯爵威廉建造了一條上達險峻山巔的陡峭困難山路，以通寺院；那是用鐵槌、鶴嘴鋤及其他鐵制工具砍斷岩石來筑成的。他還以石版敷設了一條沿河堤道。

同一史家，在另一處描述：“可敬的微塔利斯怎樣退隱于一處靜寂的地方；他看到在摩坦附近的薩維宜村里有大量古代建築物的遺迹，於是他建造了一所獻給‘三位一體’的寺院”。茨維發爾登的編年史家敘述：在十二世紀德意志全境上怎樣滿布着茂密森林。“但當僧侶們在這裡占有勢力之後，他們開始砍伐了不生果實的樹木，並連根拔除了荊棘叢林。他們把林地轉變為果園，他們建造房屋和住宅，播種田地、培植葡萄園……他們開掘溝渠，種植各類果樹並在樹林中以果樹苗來布置花園。”1147年康拉德三世在批准魯米林根·羅道福給一所寺院的一項贈與時，說了下面一段話：“朕還加上一些屬於王室的荒地，就是，一所樹林……朕願所說寺院的僧侶們拔除它，砍伐它、開墾它並移殖農民到那里；農民會砍伐並拔除樹林，直到他們能夠利用此地作日常使用。”

由於建築木材和木炭價值的日益上漲，歐洲大森林的砍除開始激起了某種程度的驚恐心理；但在这世紀以前，它們曾被認為是人類的敵人，應予砍伐。當時，歐洲人看待它們，恰如美洲墾荒者看待森林一樣。特累甫的聖馬利寺院住持在寫給一個通信者的信里說：“我相信，那毗連斐拉力契的森林，毫無用處地復蓋在土地上，這是一個不可容忍的損害；所以我已允准托布勒特居民在下列

条件下清除那里的森林：他们为此应每年缴给我及我的继承人三桶葡萄酒”。一所寺院即圣特鲁杜寺院，在十一世纪早期，尚有十三处森林。到了1120年，实际上所有的森林已经全被消灭了。

封建时代的“新寺院制度”，由于减少森林和开垦荒地和沼泽地而对农业方面产生了一次经济革命。在这一点上，息斯脱西安派起了一项卓越的作用。这寺院团，创立于1098年，以反对本尼迪克派和克伦尼派的奢侈风气为己任。息斯脱西安寺院团，以它的严肃的行动，以它的纯白墙而无装璜的朴素教堂，以它的避免富丽装饰与威风凛凛的仪式，来对克伦尼派的奢侈与豪华作风，提出一种抗议。圣伯尔拿在他的书简里一再指斥他的时代所流行的铺张浪费。同样，在下一世纪，圣法兰西斯竟要拆下在波伦亚和阿西栖的又新又壮丽的教堂建筑物。息斯脱西安派和它的托钵僧，是中世纪时代的清教徒。花纹玻璃、繁缛仪式、宏伟行列，在他们看来，都是带有世俗夸耀的气味。息斯脱西安派决心再恢复劳动的尊严地位，使自己不受世俗风气的玷污。

土地占有制的问题，在早期已经发生。本尼迪克教规原来禁止获得“〔寺院的〕实际境界之外的土地——田庄、农奴、磨坊或一个领主所可占有的什么财产”。然而，这项规定，在封建时代，已经变成过了时的东西。息斯脱西安派曾企图恢复这一条文，并从开始起，就保证新寺院团脱离领主权力的管辖。这种办法，在寺院组织中，确是一个新的转变。为了使僧侣脱离世俗财富的诱惑，又为了使社会不受寺院扩展财产的影响，它规定：寺院的土地，只以足够维持寺院为度，但不应大到足以提供财富的程度。

息斯脱西安派故意找寻欧洲的辽远而又偏僻的地区，而这些地区自然是在森林或沼泽地带内的；因为那些较好的农业区在好久之前已由早期寺院团和主教所占取。因此，我们看到：息斯脱西安派寺院建立在被威廉征服者所破坏的诺森伯兰的荒野上，在法

国比斯开灣沿岸的沼澤地上，在佛日山和阿尔卑斯山的山谷里，尤其是在德意志极东的边境上。在移民方面，次于息斯脫西安派的，是普勒孟斯特派牧师，他們采用了同一政策。巴列·吉拉尔德，談到息斯脫西安派时写道：“給这些僧侶們一块赤裸裸的沼地或一所荒僻的森林；經過几年之后，将可看到：那里不仅有着美丽教堂，而且有着建造在教堂周围的人們住所”。寺院团所喜欢找寻的地点是：未排干的盆地、未开垦的荒地以及茂密森林中的空地。

〔一个当时代的观察家写道〕他們找寻荒野中的不毛之地，逃避人群所常到的喧扰場所，以手工劳动来維持生存，并宁願居住在靜寂的地方。由于这个緣故，他們似乎要把寺院宗教的原始生活与紀律：它的清貧、它的粗衣淡食、它的节欲与严肃作风重现于人們的眼前。

关于約克州的息斯脫西安派，有人說，“他們变荒地為良田；他們种植树木；他們改进河道；他們使荆棘丛生的地方生长谷物；草地上，他們的牛群密布；高地上，他們的羊群遍地”。息斯脫西安派和普勒孟斯特派宁願在未开发的土地上找出居留地，而不願立足于古老的历史地区之内；由于这种傾向，这两种寺院团成为卓越的移民者。

这是一个很显著的事实：因为易北河是旧德意志和新德意志之間的界綫，所以，它也是这些新僧侶团和本尼狄克派之間的一条分界綫。除了波希米亚和波兰以外，在易北河以东，沒有一所本尼狄克寺院的存在，只有几所女修道院而已。旧秩序已一去不复返了。在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之后，連传教师团，也已变为过了时的东西。“大东北”已被征服，而那里的土地开放給人口的移殖与开发了。息斯脫西安派和普勒孟斯特派的前途，寄托在农业、森林和沼地的开垦、牲口飼养和貿易方面。他們在“新东北”所建立的寺院是农业訓練所，而不是什么传教站，也不是什么培养文艺的地方。他們让本尼狄克派去培养“高級”文化；本尼狄克教派在寺院

內生长起来的，他們只要一想到德意志边境上的粗野生活，就会觉得毛骨悚然。

寺院团受到慷慨的土地赠与。在十二至十三世紀里，濫給赠与是家常便飯。息斯脱西安派，一旦拥有土地之后，没有什么大的維持費，因為他們被豁免繳付全部土地稅，不論这些土地已开垦与否；也被豁免繳付他們牲畜群和役畜的各种捐稅。

而且息斯脱西安派教規責成寺院团做实际手工劳动；它不贊成使用农奴劳动，因为那是規避体力劳动对于身心都有好处这项原則的可憎方法。它的清靜主义，竟至禁止寺院占有封建采邑，为的是使寺院不致卷入封建糾紛的漩渦里。地点越偏僻，对自然界的斗争越艰苦，对于息斯脱西安派吸引力也越多。克雷尔服的一个新信徒热情地叙述說，他看到僧侶們在那里做工，“在花园里用鋤，在草地上用叉和耙，在收获的田地上用镰刀，在森林中用斧头”。

然而，情况不久改变了：息斯脱西安派和早些时候的本尼狄克派一样，在每个寺院里，让世俗弟兄們去做辛苦的手工劳动，而僧侶們的劳动只是监督性质的劳动而已。圣本尼狄克教規曾允許俗人参加寺院；这些俗人按羅馬教会所用“宗教”这个詞的意义來說，不得算作教会的人，只是在那里生活。他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可以受神学教育的人，他們經過訓練之后，得成为正式僧侶；另一类（“不識字者”、“愚蠢者”）构成了一种低級的僧侶类型；他們是做下賤工作的。后来，出现新的一类“世俗弟兄”，被准許加入寺院作为院內或农場上的僕人。他們学习信条、主祷^①和《福哉馬利亚》^②；他們被禁止結婚并强迫实行肃靜。他們得从寺院取得衣食

① 以“我父”一語起首之祈禱。——譯者

② 天主教徒追念圣母馬利亚之祈禱，其禱詞以“福哉馬利亚”开始的。——譯者

和住宿；作为报答，他們长久而又辛苦地工作着，或在农場、或在森林和采石場、或在作坊中。他們是异于农奴和工奴的一种特殊类型。

这些“世俗弟兄”充当了寺院和外面世界之間的中間人。本尼狄克派寺院团对这制度是不熟悉的。世俗弟兄在1038年最先出现于圣約翰·瓜尔柏塔斯所建立的发伦布洛薩寺院团里。在德意志，喜苏(Hirsau)寺院首先采用了这办法。他們必須服从一切加在“不識字僧侶”身上的义务和戒律，但他們不得成为教士。他們的特殊任务，是有关寺院的物质事务。他們耕种农場，他們在寺院内部做繁重工作，他們从事于那些为团体物质生活所需的职业。世俗弟兄也充当商业代理人，把寺院土地上的产物运到市場上去。

这种理想和实践的結合，使息斯脫西安派成为荒地上所很需要的移民者。他們真正是德意志民族向东扩展的垦荒先鋒，象薩克森人、伊斯特发里亚人、威斯特发里亚人、条麟吉亚人移民那样；后一批人在这同一时期从人口稠密的老德意志地区涌入易北河外人口稀少的新征服地区。息斯脫西安派僧侶清除森林，开垦低地，排干沼地；他們建造堤壩来阻止水流；他們筑造道路与桥梁。当荒野的整理工作完成之后，他們从“老西方”带来了新移民；他們导引这些移民东来，并使他們在沿途无数的寺院里获得舒适的住宿；这些寺院充作旅舍。

主教班堡的鄂图，是波美拉尼亚人間的传道者，普勒孟斯特派諾柏特(由罗塞耳二世指派为馬德堡的大主教)的朋友；在第一次传教旅行时，他認識到波美拉尼亚可作为北德意志过剩人口移殖地点之經濟价值。

〔主教傳記的作者赫波德斯写道：〕寺院当然可能在这地区內建立起来。在那里，魚类的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相信，海上，湖沼与河流里都有的是。人們用一便士，便可换取大量新配的海魚……至于野兽，这地区富于牡鹿、鹿、野

禽、熊、野猪、猪以及各种野兽。还可从母牛身上取得奶油，从牝羊获得羊乳并可获得羔羊和牡羊的脂肪；还有大量蜂蜜和小麦、大麻和罌粟以及各种蔬菜。从它丰富的果树来看，如果地方上再有葡萄、橄欖和无花果生长，我们真可把它作为乐园了。主教因为不愿这地区没有葡萄，所以在第二次旅行时，亲自带来一箱葡萄枝芽，并把它們散发出去，这样这地区就将会出产葡萄酒。

1175年，琉巴斯寺院的建立，是西利西亚历史的开始日期。那一年，波兰的瘦长子波尔斯拉夫（1163—1201年），为了移民上奥得河流域，招募息斯脱西安派移居那里。那是十二世纪日耳曼文化的极东点。

作为农民来看，息斯脱西安派胜过了所有其他的寺院团。这寺院团的一个“弟兄”，在十二世纪初期，以粗俗的而富有纯洁与正当热情的诗句，来描写息斯脱西安派的开发西利西亚的工作。他说，这地区原来是一片森林和沼泽地，由很穷而又很懒的波兰人居住着；他们用树干制的木耙作犁，用一对瘦弱的母牛或公牛拖拉它。居民的生活很苦，没有盐、金属与鞋子；他们的衣服也是残破不堪的。在那里，找不到一个城市。市场交易是在露天进行的，用物物交换的形式来代替货币交易。

在教皇和腓特烈红鬍子之间的冲突里，德意志的息斯脱西安派因为他们受到了法国息斯脱西安主义的影响，是坚决拥护教廷的。尽管如此，很多德意志贵族，即使自己倾向于基柏林派，还是赞成德意志的息斯脱西安派的；因为他们认识了后者在移民工作上的性质。可是，腓特烈一世则较少聪明。

当哈德良四世的可畏大臣罗兰继承了教皇位而成为有力的卫尔夫派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以后，皇帝立红衣大主教屋大维安作为“教皇”，以图对抗，后者自称“维克多”。息斯脱西安派当然支持亚历山大；为了这个原因，腓特烈下令把这寺院团逐出于德意志境外。在霍亨斯陶芬兵力所及的地方，他们的土地被合并于王室领

內，他們的谷倉被搜劫，僧侶本人被逐出于土地上；直到 1177 年，當教皇和皇帝之間的和約簽訂以後，他們才得回來。那時，息斯脫西安派成群結隊地重返德意志；在那里，他們象和平天使般地受到民眾的歡迎。

人們除非懂得過去的历史，很可能認為：保儲自然資源的政策，是一個完全近代的運動；精巧的工程技術跟着羅馬的滅亡而消逝，直到十六世紀它方復興；在較接近近代之前，土壤學和地質學的研究、經濟植物學、畜牧學和植物培養學等等的價值，人們完全是不知道的。人們也一般地相信：在中世紀時代，人類的開發自然資源限于沼地的開墾、粗糙的挖溝和排水、森林的清除、小型的采礦以及簡單的雖不是完全原始性的農業這些框框之內。

但在十二到十三世紀，德意志的息斯脫西安僧侶的勞動历史，駁倒了這種不公正的論斷。中世紀德意志的息斯脫西安派寺院，幾乎無例外地位于沼澤地區內，所以他們必須規劃出一種排水體系。在北德意志，他們很多寺院的廢墟迄今還保留着這些建設的痕迹。在哈次山脈和條麟吉亞的山區里，旅行者會碰到這些遺迹的。他們排干沼澤地，使新辟的土地（在荷蘭叫做“排去積水的新地”）成為可耕地或牧場。他們使用堤壩來把水流積儲于水庫內，以利灌溉并用在磨坊方面。他們還把溝渠作為養魚池。

和他們的水利工程同樣有意義的，是德意志息斯脫西安派在利用森林方面所作的努力。這個國家的很多地面上，復蓋着茂密的森林。息斯脫西安派，不象過去那樣隨隨便便地清除森林而不考慮到下面土壤的性質的；他們不僅研究木材，而也研究土質。他們知道或發現：哪里有硬木成長，哪里就可找到良好土地。他們從來未曾把森林完全伐盡過，而留下幾塊長着樹木的地方。而且，他們為了食物的目的，研究植物的生命、種籽的萌芽、水果樹的接枝，甚至偶然也研究異花交接法。我們知道：1273 年杜伯倫有一間玻

璃植物实验室。当一个“弟兄”漫游各地的时候，他总是随身拿着植物和种籽和树木的枝条，并带回来他认为在自己寺院的地方上可以培植的一切花草和种籽。这样一来，葡萄种植在莱茵兰推广到中德意志去。奥尔登坎朋的僧侣们把摩力蒙周围的巴息涅葡萄园内名贵的葡萄藤枝输入科伦，从那里其他芽苗传到条麟吉亚的窝尔肯立德，于是再传到普福塔和琉巴斯去。

在中世纪德意志，有几种更出名的息斯脱西安派的事业。这种事业的个别历史，有助于说明他们努力的性质与范围。其中，最著名的一项成就，是“金色草原”的建立。

今天，旅行者，乘火车穿过从吕讷堡到阿登这一带的肥沃地区的时候，不会知道：位于罗萨勒本和阿登之间的一条广阔地带谷禾在夏季的风里荡漾着，过去曾是全北德意志的最可怕的低湿地区。因为这些“金色草原”正是在条麟吉亚盆地的低层。在息斯脱西安僧侣们于十二世纪中期来到那里之前，这地区是一片荒野，充满着泥炭、沼泽和树木断枝。在史前时代，那里曾是一个湖。现在湖已变为一片大沼泽，那里的部分水流慢吞吞地通过赫尔姆小河而注入温斯特鲁河，再从那里流入萨勒河。这地区的形状，象一个三角星；一只角是从萨克森堡延伸到吕登，另一只角，是下赫米利特，从布律肯延伸到温斯特鲁河，第三只角，是上赫米利特，从布律肯延伸到松得哈逊。

1144 年，萨勒河畔罗登堡的伯爵克利斯兴把这在哥斯巴赫村附近的部分泥炭地区，赠给窝尔肯立德的息斯脱西安派；后来，还以接济的赠与，大大扩充了这一地带。与此同时，马德堡的大主教豁免了他们所有新辟土地的什一税。在四年时期之内，在过去只是沼泽的地方上，出现了草原。于是，僧侣们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下利特沼地去。在腓特烈红鬃子的晚年时代，他已懂得尊重那些从前他所迫害的人们，允准窝尔肯立德寺院的一个修道士约但排

除下利特整个地区的积水。几年后，“金色草原”上的僧侶們在利多夫、柏尼根、哥斯巴赫、溫德尔哈逊和迦尔登哈逊各地的磨坊已开始运转。

在勃兰登堡，芝尼亚寺院的僧侶們對他們寺院周围的水力，享有完全的控制权；他們利用了水力来經營他們的磨坊。1269年他們还购买了普勒丁附近的柏克斯太尔村，这个村必須用堤岸来保护。正是芝尼亚寺院僧侶們，发现了斯普累河畔路德斯村附近的有价值的石灰石場，并在那里建筑了儲棧，进行开采石头。这石場是在今天的柏林城的周围。

霍耳斯頓伯爵阿多夫三世（1164—1203年）的父亲，最先提倡荷兰人和佛来銘人移殖于下德意志低湿地区內；阿多夫本人在1186年建立了一块息斯脫西安派的移民地；他們来自汉諾威附近的洛昆寺院。这一寺院原来由亨利獅子建造在律伯克和奥尔德斯洛之間的特拉甫河低湿地区內的。在本世紀末期之前，这沼澤地被称为“快乐草原”（Die Heilsaue），（现在当地还是这样称呼它的）。都納孟德的息斯脫西安寺院，在都納河口，領有河口的拉美斯霍姆島，并在那里于1226年建立了一所磨坊。梅格棱堡·許威林的达干寺院，是由主教柏諾建造起来的。这寺院在1147年对汶德族十字軍出征之后，在汶德塞西帕尼族的旧土地上建立的；它对波罗的海的捕魚业很感兴趣；1270年，它的十二只漁船的通行稅得到豁免。

早在1154年，条麟吉亚森林里的伏尔肯罗得寺院已有三所磨坊，位于革默和格拉巴；又在1282年，它为另建三所磨坊进行交涉。从很多涉及它的耕地和它不断爭取新田地的資料中，我們可明显看出，这寺院大部从事于磨坊事业。1229年，它在睦尔豪曾（Mühlhausen〔意即磨坊〕这个詞的本身是有意义的）购进了一处农場，附有下列条件：息斯脫西安派在那个地方上应有制造啤酒和

出售谷物的专利权。

德意志的息斯脱西安派，是磨坊业者，也是大规模的麦芽制造者。霍耳斯頓的来斐尔寺院是一个息斯脱西安派的磨坊业单位的典型例子。1237年，它在巴度购进四块地皮和一所磨坊；1255年它在巴佐以二百四十四馬克购进另一所磨坊；1275年它派出一个“世俗弟兄”到尼利次去管理那里的一所磨坊。1272年，有人提到在帕喜謨（在新勃兰登堡附近）有一所教堂，来斐尔寺院把它当作仓库用。許威林的伯爵有一时期，因为需款孔急，出售城市的磨坊专利权給当地的息斯脱西安派来換得一千二百六十四馬克。值得注意：契約上談到水力磨坊和风力磨坊。1282年，杜柏伦寺院在梅格梭堡以八百八十五馬克购买帕喜謨和普罗的磨坊；在1287至1292年之間，以二千零五十馬克购进古斯特劳的磨坊；1298年，以三百一十馬克购进古汶的磨坊；在各次交易的契約上，給予僧侶們一項磨坊业的专利权。

息斯脱西安派通过垄断性控制磨坊这一类的地方事业，控制了周围地区的谷物种植。农民除出售他的产品給寺院外，沒有別的办法。而在那些未曾完全享有垄断权的地方，他們为了阻止其他可能同他們竞争的磨坊的建立，还霸占了水利权。梅格梭堡和紐恩坎奔的寺院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并出租水利权，以取得巨大进款。河流上造水閘，有时对附近土地所有人，产生了严重的損害。例如，由于普隆河上水閘的影响，馬都湖（波美拉尼亚的一个湖，十二哩长，二哩宽）的水位上涨了八呎，因而淹沒了周围的很多农场。

無論什么时候，只要有自然盐井发现，息斯脱西安派就赶快去占取它們。奥尔登坎朋寺院住持，在1298年訪問紐恩坎奔寺院的住持时，曾同他討論关于开发伦涅堡盐場的办法。那时，来斐尔、杜柏伦和沙尼貝克各寺院，正在那里提出“申請”，又在1326到1329年之間，阿米伦斯旁寺院也加入竞争，1301年，利提哈逊寺

院付出了一百四十馬克來取得開發馬德堡鹽井的權利。到了十四世紀中期，幾乎有十二個息斯脫西安寺院，在倫涅堡鹽場煮鹽。

除了經營谷物種植和磨坊業之外，各地的息斯脫西安派還很注意於牲畜飼養。他們種植並收割青草飼料以養牲口；他們腌漬鮮肉，熏烤咸肉，製造臘腸並硝制皮革。從這些企業很自然地會發展出制鞋業、馬具業和梳羊毛業。在德意志的極北地區，在波美拉尼亞海岸和魯根島上，由於天氣寒冷，谷物的種植是受到限制的。但那里三毛櫟森林提供豬群所吃的果實。1241年，巴納塔，即威士勞一世的弟兄，把那里遍布三毛櫟和橡樹的庫斯小島，贈給魯根的喜爾達寺院。洛昆寺院，在德特摩爾附近蒲艮堡山上，有一塊养猪場，在那里养着一百三十三头猪。

看来，息斯脫西安派在牲畜飼養業方面，曾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1300年，有兩個武裝貴族曾侵入窩爾肯立德的寺院內，趕走了那里的大批馬匹和牛羊。1302年，維涅基羅得的伯爵和基布哈德·馮·安斯坦從一所寺院里劫奪了馬、牛、羊和谷物。1309年，窩爾肯立德再次遭劫。約翰·馮·貝柏斯塔特，在某一夜里，搶劫了魯芬斯坦寺院並擄去三十四匹馬。幾年以後，這一寺院又被無賴男爵第特立喜·馮·厄赫勒本劫掠，在扭打過程中，兩個世俗弟兄被击斃。飼養馬匹，在息斯脫西安派中間，是一個重要事業。早在1157年，我們已可聽到埋怨之聲：他們所養的馬匹已超過他們所能售出的數量了。關於管理馬匹的出售，有着一定的章程；所有的買賣，必須在寺院圍牆內進行；小馬非長出四只牙齒，不得被出售。出售契約上注明：所售出的馬將用作“役畜，非用作賽馬、騎士馬或裝飾馬”。在巴明地區，欣麥爾斯福特寺院，在它的一處大農場上，養着八十頭牛、六十多只豬、八百多只羊。寺院紀錄里還提供有趣的資料，說明寺院所飼養的大量牛羊的情況。波未附近的聖天奎德蒙寺院，在一年之內，出售了七千包羊毛。

在德意志的較老地区,象萊茵兰那样,深耕細作的农业,已較普遍;甚至在那里,德意志息斯脫西安派也能改进条件,并采用新的农作方法。如果我們相信关于伯爵阿柏哈特·馮·阿尔特那的故事,那么,早在 1140 年,他們沿萊茵河的畜牧場,已經出名。据傳說,伯爵因为讎悔在同不拉奔公爵战争里曾杀死过大批的人,离家漫游;經過长途旅行后,他到达萊茵河畔摩力蒙的息斯脫西安寺院,在那里他充当了一个牧羊人和喂猪人。后来,伯爵的一个僕人偶然来到这寺院,认出了他的老东家;惊駭地喊道:“伯爵阿柏哈特看守着这寺院的羊群!”^①

西摩勒,在他关于斯特拉斯堡紡織工业的著名論文內,表揚了息斯脫西安派促进这門技术工业的功績。但他們不仅提倡了工业;他們也通过下列办法来促进了更好的貿易方法的发展:他們管理原羊毛的出售,限制抬高价格的轉卖,采取防止出售次貨或劣貨的措施,等等。

在波美拉尼亚、梅格梭堡、勃兰登堡和北德意志大部分“平地”上,亚麻种植,广泛流行,这种亚麻并織成为一种帆布。这项工业本来是波罗的海汶德族的一项老工业;后来移入的德意志人采用它并加以扩大。农民在他們的茅舍內,織造一种粗糙而未曾漂白的家制麻布,并把它們运到市場上去出售。但他們既沒有技巧,又沒有工具,又沒有专门方法来制造高級織品,象寺院所能織造出的那样,寺院掌握有洗染作、染色方法、优良織机,特別是优良織工。

葡萄种植和釀造葡萄酒,也是德意志息斯脫西安派的一项大规模实业,特別是在萊茵河和涅卡河流域內。如果葡萄不能在寺院所在地上种植,他們将在別处找得土地。在杜平根的适宜于种植葡萄的山地上,葡萄藤长得枝叶茂密。在 1193 年之前,窩尔肯

① “Graf Eberhard hütet die Schweine von diesem Klosterhof.”

立德寺院曾在波登罗得种植过葡萄，并建造一部榨酒机和一所酒窖；后来，它又在法兰星哈逊附近的塔尔海謨建造了一所新酒窖。1202年，它曾以一百五十馬克购进在符次堡附近的一所葡萄园。在这些产业中，每一处由一个“世俗弟兄”专家来监督。窩尔肯立德寺院在符次堡周围拥有这么多的葡萄园，所以在1206年它在城内购买了一块地基，建筑了一所酒窖，并开设了一片酒店。在普福特，在那里薩勒河流域与溫斯特魯河流域連在一起，所有周围的山地上，几乎沒有一亩地不是种着葡萄的。我們可看到关于在波森道夫、吉斯塔特、赫奇道夫、奥德斯罗得以及其他地方葡萄园的紀載。从窩尔肯立德寺院到亚尔美里克的桥头这一条长廊，都复盖着葡萄藤。我們不能正确地断言：普福特的制酒业的规模如何，但普福特，1202年在法兰德斯曾出售二百吨葡萄酒这一事实，是耐人玩味的。葡萄的种植在中世紀德意志比起今天的德意志还广泛得多。甚至勃兰登堡和薩克森，也种植葡萄。在条麟吉亚，象在諾曼底一样，苹果种植和苹果酒酿造，也是寺院的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在这里，乔根塔尔寺院，是以苹果园出名的。1227年，它在清理一个当地騎士的債務时，接受了海魯普和罕斯旁两座庄园；两者都种有大量苹果树。普福特有苹果园，也有葡萄园。

息斯脫西安派的大部土地，象他們以前的其他僧侶的土地那样，或者放租出去，或者由“世俗弟兄”去耕种。租戶部分用貨幣，部分用实物来繳付地租。寺院的这些依附人，象世俗业主的农奴那样，負担着各种庄园捐稅，例如免役稅（德文“Zins”，法文“Cens”）；他們繳付死亡稅（Heriot），这是按照情况分成等級的。如果死者曾娶一个不属寺院的农奴妇女，他的继承人必須繳出一半产业給寺院。然而，如果死者的妻子也是寺院的一个依附人，只須繳出他最好的服装。如果死者曾是一个財產所有者，他的房屋必須繳出，作为继承他的土地的继承費；如果他土地上沒有住房；那么，繳出

他的一半土地。中世紀教会的手臂是长的;它的心腸是硬的。

当息斯脱西安派的經濟体系欣欣向荣的时候,变动也接踵而来。跟着時間的进展,他們发现:全部工作由“世俗弟兄”去做这办法,是行不通的,因而产生了一种新的依附人(“雇农”)。这批人居住在寺院围墙之外,虽然也是在寺院土地之上。寺院贈給他們一方土地,作为开端,但任何其他土地必須是租賃的。这些“雇农”(Lohnarbeiter)无須立誓,也不是束縛于領地上的,象普通农奴那样。如果他对于条件感到不滿,他可自由离去;虽然事实上他也許很少能够这样做,因为他往往是拖欠租款的;因而他的命运和真正农奴的命运,表面上是很少差別的。

除了这些不自由或半自由依附者外,另有一种較高級依附人,叫做年金領受者。这批人在他們的晚年願意来到寺院里过活;他們把自己的財產贈給寺院,从而得从寺院領取年金。他們是从小自由业主和小紳士阶层中間来的。他們因为感到在大封建主的压力之下难于自卫,就用这种方式来取得教会的保护。

属于寺院的农庄,不是一片連接的地帶,而是一个分散土地的集合体;各地彼此之間往往相距若干哩,而在每一块土地上,各有一个农村,并有一个小监守人或管家駐在那里。这些地产,通过下列四种方式之一而得来的:(1)它們可能是由农民自然地集聚在寺院周围而形成的;(2)它們可能原来是自由农村而被降到依附地位的(汶德族村落,尤其如此);(3)它們可能是由当地业主所捐贈的;(4)它們可能是由僧侶們购买的。

除了这些农庄之外,寺院还有农田,往往是单独一块一块的、互相隔离的田地。在洛林的文特巴赫地方,有一块农田,由四个“世俗弟兄”和九个僕人来耕种;我們不知道它的面积多少,但在一个时期內,那里有过二十八头牛和二十只羊。在薩克森,利提哈逊寺院,在林台謨、馬息罗得和阿拉謨三地各有一块农田。我們看

到，布赫寺院約在 1352 年使用它在阿米尔哥斯特威次的农田，作为中央仓库和貿易站。这里有一个充当牧师兼經理的僧侶、一个厨司、两个“世俗弟兄”、一个农田管事、一个牧人、一大群依附农以及二十四匹耕馬。

息斯脫西安寺院，显然是为了开发荒地而組織起来的；所以它們对于建造教堂及其他建筑物所花費的錢，是很少的；其中沒有几所寺院維持着什么学校的；連对农村的传教也是漠不关心的。另一方面，他們特別注意于种植大宗谷物，如小麦、裸麦、大麦，并独占了地方上的磨坊权利；他們培植葡萄并釀造葡萄酒；他們为織麻布而种植亚麻，为得羊毛而养羊；他們是果园匠，也是牧場經營者和牲畜飼养者。

这里，值得注意那在轉变着的寺院經濟。在开始时期，寺院完全注意于农业，后来它們漸次扩展到工业，而最后也从事于商业。同时，在这些轉变的过程里，寺院活动的有形范围也越来越大了。

在 1157 年前，任何寺院人員不得走到距寺院一日行程外的地方上去购买或出售商品。在那一年，這項規則放宽了，准許四天的行程。在这个时期，寺院的經營，主要还是属于农业范围的。但稍后，我們看到：产品的过剩，使寺院去找寻市場。于是它們放弃了單純的物物交換的形式，就是，僧侶以他們所有的商品来交換他們所无的商品的形式；而代之以貨幣經濟，因而真正的貿易出現了。在十三世紀，可以看到：在波罗的海沿岸上的寺院已在利用海道，把它們的貨物运到律伯克和丹麦港口去。寺院团在里窩尼亚已經立脚得很穩，所以，1204 年，英諾森三世曾乘此机会大大表揚一番。到了 1209 年，息斯脫西安派在俄罗斯，也有几块兴盛的居留地。

到了 1241 年，爱尔登寺院在魯根已有权保持一个市場。律伯克和許威林两城，都是息斯脫西安派的貿易中心；罗斯托克是另一

个貿易中心。杜柏伦寺院同梅格梭堡进行了貿易。早在 1229 年，里窩尼亚的息斯脫西安派一定會和俄罗斯有过貿易关系；因为在那一年，教皇格列高里九世曾命令：里加的主教、里加的息斯脫西安派都納孟德寺院的住持和里加的市长应中断和諾夫哥罗得的貿易，除非俄罗斯人停止对芬兰人的騷扰；当时，后者新接受了基督教。在这一世紀里，我們看到：有谷物和葡萄酒从波罗的海港口运到挪威去，也有小麦从律伯克运到荷兰去。这些产品中的有些部分，一定来自梅格梭堡的息斯脫西安派寺院的。所有賜給息斯脫西安派的市場权，大部开始于十三世紀；当时，他們寺院的权力和財富正在蒸蒸日上，而他們的道德品质正在走向下坡。

息斯脫西安派在葡萄酒貿易方面的发展，可說明上文所提的关于經濟轉变的阶段。1134 年，寺院的葡萄酒不得出售給局外人的。在十二世紀后期，他們的葡萄园已非常繁盛；所以，所有剩余产品需要找一个出售的市場，無論在什么地方。有的寺院，甚至采用零卖飲料的办法；在寺院墙垣之外，設立攤子由“世俗弟兄”来售酒。后来，我們看到，葡萄酒在寺院范围之内公开出售，然而附有一項条件：在售酒的地方，不得有什么不正当的言行，尤其是严禁擲骰子的賭博。

息斯脫西安寺院团的优点，在于它在方法上能够适应十二世紀改变了的經濟条件。本尼狄克派和克伦尼派停留在一种簡單农业經濟上，但这种經濟已不复适合于新时代了。由于这个緣故，他們漸次丧失了地位。但息斯脫西安派則不然：他們按照地方情形来发展特殊的生产，如生产葡萄酒、飼养馬匹，等等；他們在出售他們的产品方面，也很活跃。息斯脫西安寺院，相互之間，密切联系。它們严格监督自己的企业；它們也是精細的簿記員和會計員。每个寺院对于它所建的一切新寺院，負有督促的責任；它監視它們的紀律，也稽核它們的帳目。

不久之后，息斯脫西安派也变得穷奢极欲；关于这一事实，有琉巴斯的寺院所作的下列申訴（1280年），可資証明；这申訴談到周围社会的不断求乞，或邻近貴族的敲詐勾当。这里就是摘自《琉巴斯古文献》中一段文字：

住持几乎沒有一个月，而且几乎沒有一天，不施舍一些东西就可以过去。他的袈裟并不能保护他。这个人哀求，那个人威胁。这个人要求馬克和便士的现款，那个人要求谷物；这个人要求面包，那个人要求干草，同时还取去一百只羊……几乎沒有一件想得到的东西不向寺院要求的……第三人求乞木柴，第四人討取干草，第五人要求听美好的合唱音乐，第六人要求他的馬匹应装蹄鉄，第七人要求灌滿他的酒瓶，第八人要求魚，第九人要求一大包干酪，第十个人要求香子餅，第十一个人要求苹果，第十二个人年年来討取制衣服的布匹……第十三人要求一双短袜或鞋子……但事情远更糟糕，当打猎的人們帶着他們的仆人和猎犬来到的时候……他們象飢餓的狼群那样，对一人一块面包，嫌太少。有的人要求飲酒，并賭咒說，他将毀坏寺院；別的人擅自走到酒窖門口，要求葡萄酒，边咒边喊：他不願給基督以一个便士，更談不上給僧侶了。

到了十三世紀，息斯脫西安派的僧侶們象他們以前的本尼狄克派和克伦尼派那样，也墮落下去了。財富、懶惰和恶习已逐漸使他們腐化，象所有其他教派僧侶的腐化那样。关于这方面，証据是多种多样的。亥斯脫巴赫·凱撒是属于这寺院的一个非常忠实的成員；他不止一次地承认了这种情形。这批僧侶不复抱着一种开荒者的精神；他們摆脱了边境上的艰苦状态。相反，他們开始集結在人口稠密的老地区；他們逐出那里的农民或者圈围他們的田地作为谷仓和牧羊場。整个村庄因此消逝了。

所有对寺院的贈予，是出于宗教和世俗的混合动机的。其中动机之一，明显地是属于經濟性质的。大荒野內的广闊地帶之所以贈給寺院，因为按圣本尼狄克的教规，如大家所知：僧侶将清除森林；排干沼澤地；逐退那些威胁小农村內生命之野兽；修建道路

和桥梁，并开垦荒地。不仅大块土地，而且整个村庄，赠给寺院，象赠给其他权利那样，例如市场权、征集通行税和什一税权、免缴通行税和什一税权、铸币特权、司法权、使用或占有矿场和盐井权、自由使用森林木材权。寺院保有这些土地，作为封邑，并把它們再分封出去。这项办法，当然会使寺院深深地卷入封建制度的漩涡——战争、诉讼、政治野心和政治冲突的漩涡。

寺院为了捍卫它們的广大領地，仿效了世俗貴族；它們在封建时代把它們的退隐所改为城堡式的建筑物群，有森严的女墙、城池、棱堡、守望楼并有好战的城堡时代所流行的建筑裝飾物。这些宏大的石头建筑物象封建城堡那样，是寺院财产的明显体现。这项转变促成了寺院精神和理想的一次转变，就是僧侣阶层同化于军事封建主。寺院团中富有宗教精神的人們对这新情况，感到伤心。試看下面一段抗議的話：

試看建筑方面，我們已多么远离古人的簡朴作风。你們的这种高楼大厦有什么意义呢？你們不会因此而能够更好地防止恶魔，反而更加接近了它。圣伯尔拿当看到象息斯脱西安派的初期茅舍般地盖着茅草的牧师的小屋时，感动到流泪；而如今他們开始住于石头造的宫殿，附有一切閃爍如天上星辰的装璜。你們为了富饒的仓库和土地的緣故，已丧失你們的自由意志了。

另有一个中世紀作家，对于僧侣向寺院土地上的农奴和賤农所勒索的繁重劳役，感到憤慨：

天真无辜的人們一定会死于飢餓；这些巨大的狼〔就是，貪得无厌的僧侣〕以他們的血肉来填滿自己的胃。这谷粒，这谷物，难道不是那些耕耘他們土地的可怜乡下人的血肉嗎？

一般說，中世紀政府对寺院的大扩展，是側目而視的。寺院的誓約和生活方式使僧侣們脫离了世俗的活动。住持不象主教那样，可随便使用于世俗行政或軍事方面；因为寺院具有較大的隔离性，而寺院內所流行的組織形式又較少紧密性。但寺院的物质財

富，甚至大于世俗僧侶的財富。寺院比起主教區，不僅相對地而且絕對地富得多。它們擁有較大部分的土地，而且通過特權和豁免權，它們使較大部分的土地脫離了國家的徵稅權。那些加在寺院身上的軍事和財政負擔，不象加在主教區身上的那麼重。在這樣的情況下，寺院比起世俗僧侶，不論對國家或對社會，較少實際利益。它們的財富超過了它們的實際需要；例如，供給寺院人員的日常生活費用，維持學校和寺院以及救濟事業的開支。“死手”^①還使它們的大部剩餘財富周轉不靈，而不能使之為社會的利益而自由流通；而這種財富又不能強迫拿出來使用，象教會的財富通過政府的征用而被拿出來那樣。

在許多寺院所擁有的大量財富和僧侶所宣誓的安貧樂道之間所存在的矛盾，是顯然可見的。於是，他們用法律虛構來規避寺院“教規”，就是說，寺院是一個法團。寺院人員，從個別的人來講，是沒有什麼財產的；作為一個集體來看，他們的進款是很大的，而僧侶還過着奢侈生活，除非一個嚴正的住持嚴格地實施寺院“教規”。其實，寺院“教規”之所以被重視，與其說是為了遵守，不如說是為了陽奉陰違。亥斯脫巴赫·凱撒說道：有些息斯脫西安寺院已多麼富裕，它們每天能供養五千人，如果它們願意這樣做的話。

老的本尼狄克寺院，幾乎都是頑強地抗拒寺院改革的。在拉·雷奧爾，僧侶殺死了由克倫尼寺院住持所派去的一個院長。在德意志，本尼狄克派不顧教皇的咒逐，繼續支持亨利四世來反對格列高里七世。克倫尼派是從來不願做手工勞動的一個寺院團；他們以考究的奢侈品、珍美的飲食和漂亮的服裝出名。中世紀文學里，時常指責寺院的貪欲，愛好財富那也常是公道的。證據，就是那些千百張偽特許狀；它們是由殘酷的住持為了增加他們寺院

① “死手”(dead hand)意即不能變換的營業。——譯者

的土地而伪造出来的。他们也常常把灾难转变为利益。例如，在“北欧人”侵入法国和馬扎儿人侵入德意志的时期，寺院曾大受掠夺；因为侵犯者馬上发现了寺院是大量财富的集中地。但在搶劫风潮过了之后，它們的财富就迅速增加起来。信徒們，因深受他們动人的呼吁所感召，紛紛以新的捐贈給予寺院，因而它們所得的綽乎有余地弥补了它們所失的财产。不仅如此，当贈与来得緩慢的时候，“它們借助于伪証状取得了财产；这数量超过了它們所失的财产”。僧侶們有时还巧妙地利用了社会上尊敬圣徒遺迹的热情来取得新的土地贈与。在乡村里因为捧着圣徒遺迹，列队游行，已成一項风俗，而且游行队在哪里停止，哪里就被要求为属于圣徒的土地。“格龙梦特寺院的創始人兼第一任院长于 1124 年死后，开始以治愈一个麻痺症的騎士和恢复一个盲人的视觉，来显示他的圣灵的时候，他的头脑簡單的信徒就哄动起来。这圣徒的继承人恳求，毋宁可以說，諫靜死者的幽灵說：‘您曾教导我們过靜寂生活，而现在，您企图把我們的靜寂地点轉变为一处市場和市集了。’”

而且，貿易也給教会带来了腐蝕作用。1223 年，貝穆亚宗教會議埋怨說，許多寺院所維持的酒店，把騙子、巡游演艺者、江湖医生、賭徒、小偷和妓女吸引来了。那些富裕而又有势力的寺院，常为貴族家庭的較年幼的子弟，提供了有利而又安逸的生活条件。克倫尼寺院的住持奧第洛，有一侄子在北意大利充当諾伐勒西寺院的住持；他不願过一个僧侶的生活，以一群酒肉朋友来圍繞自己；把寺院的土地分封給他們；而自己过着一种放蕩的刺激性的生活，象一个好斗的男爵粗坯那样。

寺院的人事組織是很有条理的。在住持之下，有一个院长，常有一个或以上的副院长；后者指导專門性的行政人員。总务长負責管理寺院的土地、进款和动产。隶属他的有：一个地窖管理員或儲藏所和作坊的監督員、一个會計員或司庫以及一个稽核員，即查

核進款和帳目者。

一所中世紀寺院的建筑物和地基的布置可以瑞士圣加尔寺院的平面图來說明〔見附圖〕。寺院包括一个修道院庭院，毗連僧會禮堂，在這禮堂和教堂之間是聖器所，由一座扶梯間隔着；在宿舍下面有一个儲放啤酒、葡萄酒和食油的地窖；教堂對面是食堂和廚房；盥洗所位于修道院南面路旁；在一个內庭院內有：一所病院、一所會客室、廚房、僕役房、圖書館和寫字間（抄寫書籍的房間）。還有一个普通庭院，設有為車輛出入的雙重大門，由谷倉、烘面包房、牲畜棚、儲藏所、僕役間、審判所、監獄和倉庫圍繞着；此外，還有磨坊、工場、釀酒所、花園、魚池。

寺院的資本，象近代商業公司的資本那樣，分成為固定資本和流通資本。固定資本，包括有土地、房屋和設備。流通資本，是由土地上的產品、勞動、商業利潤、市場捐、賦稅等等構成。中世紀的寺院住持，如果有成就的話，一定是熟練世故而又有判斷靈敏的一個人。基柏特·得·諾戎，本人也是一個住持，在談到一個有效能的住持時說，他“懂得怎樣來適應外界情況；在和別人進行交涉時，在辦理他們的法律案件時，（對於其中細節，他為了他們加以仔細研究），他既客氣而又寬大……這個人在法律事務方面，被認為比一般住持更精明，而且在城市里他是很聞名的”。布拉克倫·佐塞林的“編年史”生動地描寫了中世紀寺院內部和它周圍的生活情景；就是關於 1182 到 1202 年之間柏立聖愛德曼的聖愛德曼寺院的生活。他詳細敘述了它的住持參孫的活動，這項記載，很有說明性的：

這個住持派人去調查各個莊園的全部情況：關於自由人年付的免役稅，勞動者的姓名和住所以及每個人應盡的服務；并使這一切寫成了書面報告。他還修葺破舊大厅和傾斜房屋，在那里老鷹和烏鴉已在環繞翱翔；他建造新的教堂並且在許多地方上建造內室和上層樓面，在那里除有倉庫外，從來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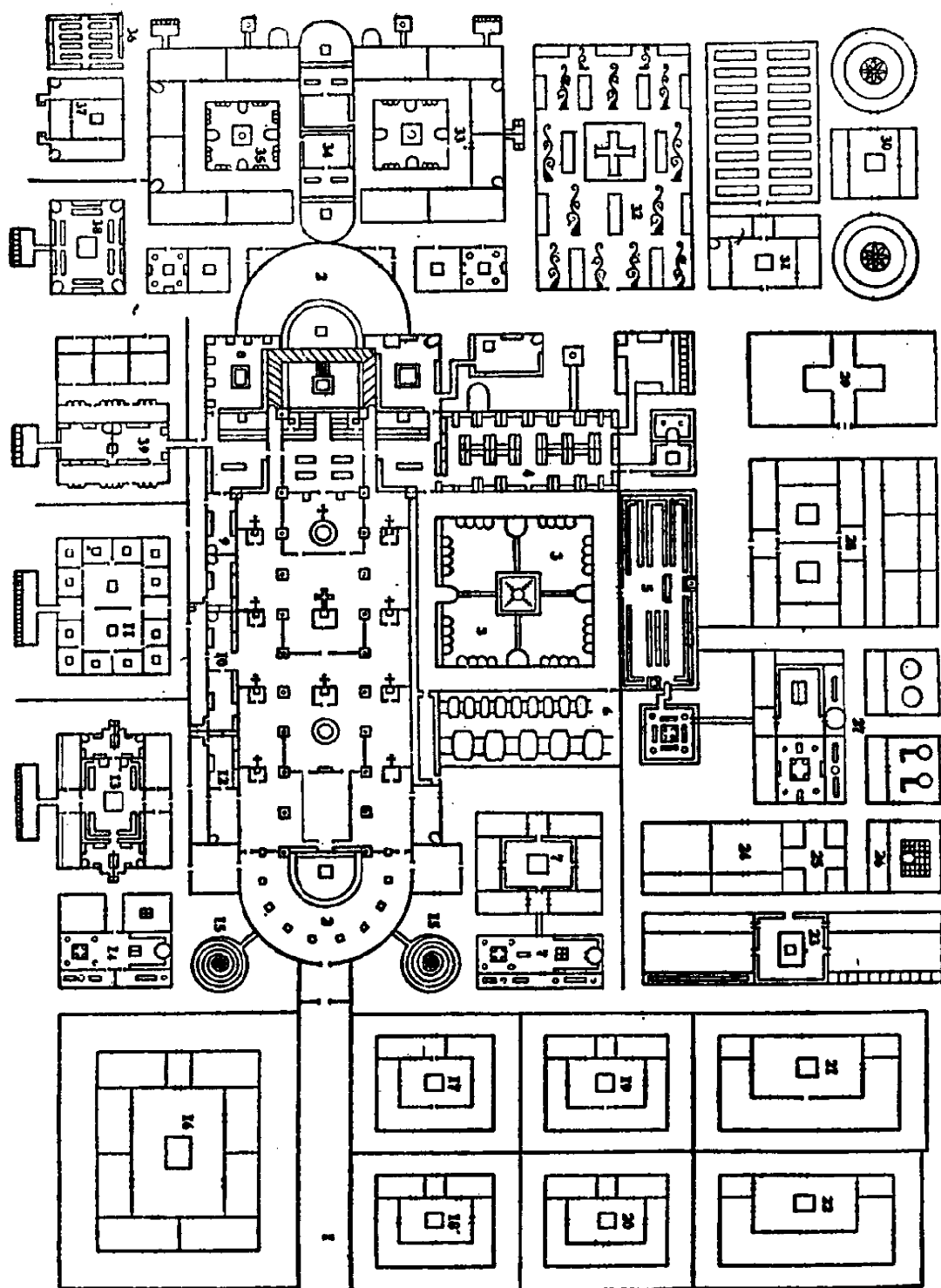
曾有过什么住所。他也封住许多园林，里面充满狩猎的野兽，维持一个猎人和几只猎犬；在有任何有地位的人来参观时，他和僧侣们坐在树林里，有时看着群犬奔逐。他改良大量土地，使之可以耕种……在管理这些庄园以及其他事务方面，他所指派的管理员，比起他们的前任，总是要谨慎得多……在耶稣复活节后，这个住持检查属于寺院的每个庄园……他建造仓库和牛棚，首先是关心整理耕地并注意保护森林；关于树林，无论在赠与或缩小面积方面，他是很审慎的。……他时常由于暴露于风雨之中，嗓子变得沙哑。

佐塞林关于住持参孙，还告诉我们说，“他似乎爱好活动甚于爱好沉思的生活；他对好办事员的称赞，多于对优秀的唱歌班僧侣的称赞；他很少赞许一个仅仅有点学问的人，除非那人有着关于世俗事务的知识；当他听到任何主教放弃照料灵魂事务而退隐的时候，他不会赞美他的这种行为的”。他还生动地叙述圣爱德曼寺院的住持和伊里主教之间关于砍伐造屋木材的一项争执。那些要被砍伐的树木是属于圣爱德曼寺院的，因而主教向住持请求准许。由于名字搞乱，主教必须作第二次的申请。在这时候，住持自私自利地把木材伐下并标出留作自用。就在这同一寺院里，住持参孙建造许多实用的、许多敬神的建筑物：住宅、教堂、教堂尖阁、仓库；还建造巴布威尔医院，配备圣爱德曼柏立学校的校舍。他还把那些原盖芦苇的屋顶，改为盖瓦片的。

所有新寺院团，都是诞生于改革的倾向和复兴运动里的，例如克伦尼派、息斯脱西安派和多米尼克与法兰西斯托钵僧；虽然他们常常有助于解除社会上某种弊病，但他们后来制造出新弊病或重复旧弊病。从克伦尼派和格列高里改革起，寺院日益摆脱了主教和世俗控制；使寺院团危险地脱离了国家而独立，并对民族主义和君主政权起着反对的作用。正是在这些寺院团最出名又最兴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对寺院制度的尖锐批判：不仅对它的弊端和腐化情形，而且对于这制度的基本原则都加以批判。寺院与庵堂以及它们的内部人员的大批增加，破坏了家庭的关系；而且私产的过多转

說 明

1. 从寺院围墙外到教堂的入口处。
2. 教堂：注意双半圆形室和許多祭坛。
3. 大修道院，显示拱廊和中央水池。
4. 宿舍，在第二层，下面有取暖设备。
5. 食堂，在底层，上面有衣帽间。
6. 地窖，上面有储藏室。
7. 香客和旅客的寄宿舍，附設烘面包房和酿酒作。
8. 写字间，上面設有图书馆。
9. 僧侣来宾臥室和宿舍。
10. 校长房間。
11. 教室，附設教师房間。
12. 搬运夫小舍。
13. 貴宾房間。
14. 属于上項(13)的酿酒作和烘面包房。
15. 高塔，有环形扶梯，頂上可俯瞰大片景色。
16. 一座大建筑物，用处未詳。
17. 綿羊棚。
18. 僕役間。
19. 山羊棚，附設牧羊人房間。
20. 猪圈，附設喂猪者房間。
21. 牲口披屋，附設牧人房間。
22. 馬房，附設馬夫房間。
23. 牝馬和牡牛棚，附設僕役間和堆干草的頂樓。
24. 木工、箍桶匠、轆轤匠的工場。
25. 酿酒谷物的储藏室。
26. 干果储藏室。
27. 常駐僧侶的酿酒作和烘面包房：注意石臼和手轉磨子。
28. 皮革匠和各种金属匠的工場。
29. 谷仓和打谷場。
30. 家禽飼养者房間附設母鸡棚和雌鷄圈。
31. 园丁房間，附設菜圃。
32. 墓地。
33. 小修道院和軟身者臥室。
34. 新修道者和残废者的教堂。
35. 医院。
36. 医院花园。
37. 医生診療間和配药房，附設病房。
38. 另一所医疗用的房屋。
39. 住持住所，表示到教堂和大修道院的入口。



一所理想寺院的平面图

(按现在保藏于瑞士圣加尔寺院图书馆内的原图缩小。原图
绘制于第九世纪。总面积,约四百呎长,三百呎阔。)

移到寺院，常使家庭陷于貧困。反对寺院制度的呼声不是完全来自寺院土地上的劳动农民的。它也有来自有見識的（虽然有时出于嫉妒心理的）主教和貴族、政府官吏和朝廷大臣。亥斯脫巴赫·凱撒曾詳細論述恩斯弗利德（科伦的圣安德累雅斯寺院的副主教）的品德，并摘引了他的一段話：“一棵好树不能从劣根上成长起来。在这些日子里，很少僧侶是按照教会法程序而进入了寺院的；很少人不是血緣僧侶〔就是，由于他們的家屬而勉强挤入的僧侶〕，便是滑稽僧侶〔就是，被一种势力强制加入寺院的僧侶〕，或是买卖圣职者，就是曾购买寺院成員資格的僧侶”。基柏特·得·諾戎本人是个僧侶，識見高明，能够看到一个問題的两方面。虽然是一个忠誠老实的僧侶，但他不是閉眼不见这制度的弊病的。他埋怨地說到下列情况：“过多的人过着修道生活”；“几所著名的巨型寺院的臃肿状况，在那里博爱热情已在消失”；从分封寺院土地所产生的流弊；貴族家庭安插“敗家子”于寺院中的慣例；僧侶的驕气使他們拒絕用手来劳动，因为貴族认为手工劳动是卑賤的；“道德墮落和金錢揮霍”。但基柏特也是近乎人情的。当他看到：富人們藐視寺院制度而扣紧他們的錢袋不再如前一样地捐贈土地的时候，他憤怒了。他諷刺地說，“往昔，人們怀着慷慨情緒来建立寺院，曾捐給寺院以土地和金錢；他們对于这类功德所消費的資財比起如今他們的子孙所加惠于我們的空好話，还要慷慨和乐意”。

俗人常指責中世紀僧侶的貪食、浪費、侈奢和放縱行为；但从保留下来的千百种寺院紀录或財產清单来看，这项指責是缺少根据的；寺院的管理，显得仔細、精明和廉洁。又从僧侶們所完成的中世紀欧洲的巨大經濟革新来看，总的說，他們曾是賢明的地主和农业家。农业是寺院的主要經濟活动，但由于他們必須出售他們的剩余产品的緣故，他們被吸引到貿易和商业的圈子里。冒必逊的富裕寺院，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这寺院的帳册表明：住持曾

以出售猪、木炭、青葱、铁、建筑石、木材来增加他的资财。寺院的建筑费详细地记载在帐册上。它的华丽设备品的清单，可有趣地说明：在伦第市集上所可买得到的东西。1110年，罕廷顿州圣伊甫斯寺院的住持，从亨利一世曾获得圣伊甫斯一市集的赠予；这市集在耶稣复活节后不久开始，得继续一周。

在纪录上特别指出的，有两类市场，就是周市场和年市场。在许多许可状中，周市场的举行日子是有规定的。圣得尼斯寺院为它的科美里村庄（在凡尔赛附近），取得一个周二市场；威海谟的罗耳士寺院和霍那的基斯兰寺院以及安兰寺院（为了它在亚尔萨斯的村庄），都得到周三市场。但对许多寺院市场来说，周四是最受欢迎的日子。我们没有关于周五（耶稣受苦日）市场的纪录，周六市场也是很少的。有许多寺院获得了举行周市场和年市场两种许可状。年市场一般是在寺院的“护神”节日举行的，延续至节日后几天或几周。圣得尼斯寺院在10月中举行它的年市场，在第九天，即狄奥尼素节日开幕，并继续四周，以接待来自外地的客商。比沙普斯堡的圣约翰寺院的年市场，在6月24日，即圣约翰节开始的；圣马泰阿斯寺院的年市场，在它的护神节开始的。厄森的寺院的年市场，在它的护神节日即9月27日科斯马斯和达米那斯节日前三天和后三天举行。

如果市场不是在寺院的护神日举行，它将在其他某大日举行，目的是要在人数集合得最多的时候来进行买卖。有人埋怨说，当群众集合在市场上的时候，要挤入教堂来做弥撒，是困难的。佛尔达寺院的年市场，在棕櫚主日^①举行，延长到耶稣复活节日。米登寺院在降灵节^②开始它的一个市场，另一个市场在秋天圣迈克尔节，即9月29日举行。考芬顿寺院在圣约翰节举行它的年市场。

① 复活节前之星期日。——译者

② 复活节后之第七个星期日。——译者

市場在教堂建築物附近舉行，可獲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尤其是在“上帝和平”運動之後。雖然教堂本身常常被利用，但它附近的公墓或墓地，也是一個受歡迎的地点。那個敘述聖腓力柏特奇蹟的編年史家告訴我們：有一個屬於聖得尼斯寺院的市場是在教堂內部舉行的。當商品未曾實際運到市場上的時候，購買者須承擔它在運輸上所碰到的風險，就是說，要防止充斥公路上竊賊和水路上盜匪的掠奪。有一項紀錄表明：聖澤利昂寺院的住持在科倫的寺院市場上購進了葡萄酒，但被迫往窩姆斯去取貨。這是中世紀時代寺院貿易的一個特點。

有少數紀錄只標明：在某某指定的地点上，僅僅什麼貿易可以進行。鄂圖一世曾准許若干所寺院在它們的土地上設立牲口市場。寺院市場上的商品，包括它們剩餘的農產品和各種工業的制成品。本尼狄克派和克倫尼派寺院，在世俗市場和市集發展以後，除在自己寺院市場上做交易外，也在這些市場上出售它們的產品。但息斯脫西安派的教規禁止在世俗市場上出售他們的產品。產物和制成品須直接在寺院的莊園土地上出售，並一成不變地須當場收取現款。不准延擱付款或部分付款，而以物易物的交易，也被禁止。在他們的時代即十二世紀，貨幣經濟的流行，使這項規則比在以前的時代更易于實行。

在理論上，寺院從出售它們剩餘品所得的進款，被認為是用在宗教目的上的。當我們知道這些寺院所做的大量慈善工作並看到這個時期所建造的壯麗建築物的時候，我們認識到：它們是把所得的大部分用在这种目的上的；但寺院由於它們商業活動的結果，也積累了龐大的財物。

關於寺院可出售的剩餘產品數量，我們只能從它們產業的範圍來判斷。有少數紀載談到有關某些寺院的特殊事情。在累根斯堡的帕波寺院和在累根河左岸下曼斯巴赫附近的恩米蘭寺院都曾

获得准许，可从“北森林”每周伐木两天。编年史家告诉我们说：森林附近的世俗领主曾企图阻止僧侣们把这种木材拖过他们的土地上，这样使寺院难于经营它们的木材贸易。

庄园所供应的剩余产品有：小麦、裸麦、雀麦、大麦和元麦；还有：猪、绵羊、羔羊、山羊、鸡、鸭、鹅，等等。在寺院土地中，僧侣所耕种的，只是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土地，分给工人、挤乳人、管林者、农奴等人耕种，所有这些人都以实物来缴付捐费和地租。在纪录簿中，还列举其他东西，如蛋、干酪、芥实、盖屋板、木柱、火把、小桶、大桶等等。妇女纺织麻布，并为僧侣们缝制衣服。在森林里工作的农奴制造木炭，管理鱼卵孵化所和蜜蜂培养；对于养蜂业，中世纪寺院是出名的。农奴还耕种土地，种植葡萄，为运输服务供应牛、马和货车并沿着水道推动粗笨的木船。

寺院的剩余产品、从它们产业上所征的通行税、什一税、免役税，等等，总加起来，一定曾是一个庞大数额。特根西寺院每年从它的产业上曾收到六千二百八十八“担”谷物、一万四千五百二十九块干酪、二千零二十五个蛋和三十三车葡萄酒。它需要五十五头公牛和货车来拖运这寺院的谷物，从丰兴运到仓库里。普鲁謨寺院据第九世纪的纪载，每年曾收到四百三十二担盐、三百担小麦、一百七十七担裸麦、四百七十三担元麦、一千六百三十一担大麦、四千五百二十五担雀麦、四百六十九担杂粮、四千三百八十二只小鸡、二万零八百九十六个蛋、四千二百七十七只猪、二百零七只绵羊，等等。

寺院也使它们的贸易组织得很好。它们在小路上利用驮马，而在大路上利用牛车。他们熟悉徒步旅行者所可走的小路和捷径。它们有自备的船舶在湖泊上和河流上行駛。它们在海口城市和河湾处获得储货地点；如属必要，它们还建造它们的货棧以堆储商品。它们组织商队，派遣护兵，把它们“代理人”所采购的货物护

送到寺院來。寺院使用代理人的辦法，是個普通事情。普魯謨寺院的住持累吉謨向他的僧侶們說：親自來來往往經營貿易，不是他們的分內事，因為那將降低寺院由於它的精神性質所應得崇高尊敬的地位。普魯謨寺院是中世紀時代的一個最重要的貿易中心。在葡萄酒和食鹽貿易方面，它經常使用六個代理人。後來，它還把代理人增加為十二人。

那些自己沒有市場的寺院，在附近市場上建立了貨棧。在這裡，它們把剩餘品儲藏起來，待價而沽，以圖厚利。有幾所貨棧，建立在科倫的外圍市場上，即在萊茵河上的一個島上。佛爾達寺院在一個離得很遠的市場上設立了自己的天平秤。

“寺院在可航行河流兩岸上的位置，由於交通上的便利，實質上有助於它的貿易的發展……可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不依靠這些便利的，因為它享有在它自己城市內有價值的市集特權。這項特權的行使，一方面受到了尖銳的攻擊，而另一方面也被頑強地捍衛着；由此可見，這項特權是多麼受重視。”^①幾乎所有的寺院都被豁免沿公路和沿河流的通行稅。關於這類通行稅的豁免，今天還有很多記載。這種豁免權是從寺院也處於其中的封建狀況下產生的。寺院住持控制着所有各種分散的土地，並盡量要使他的控制权發生效力。當寺院越來越多地參加了貿易作為增加它們進款的一種手段的時候，寺院的中央組織和它的附屬機構之間，需要更密切的聯繫。於是，在寺院本部和在它的重要地產附近的便利地點上，建立了市場。

由於土地贈與的結果，寺院得占有了廣泛分散的地產。聖加爾寺院不僅在瑞士的君士坦司湖畔擁有產業，而且在斯瓦比亞、紐斯的里亞、奧斯特拉西亞、亞爾薩斯、甚至在意大利，也占有大量土

① 《阿平頓寺院的編年史》第2卷，《導論》，第77頁。

地。这类赠与果然使寺院成为封建制度中的巨大经济因素，但也给寺院带来了瓦解的萌芽和封建的分裂。因为寺院的产业如此广泛地分散着，所以，维持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来使它们产业的管理有利于寺院也越来越感困难。寺院曾作很大努力来克服这种地区分散状态并要使寺院的贸易和商业管理能够从它们产业上带来尽可能多的利润。它们获得了通行税的豁免权以及在寺院本部内或在接近它们富饶的土地的中心地点上的市场权利；它们还把开发矿产或盐井的权利出租给一伙可靠的人。寺院所可应用的最重要方法是：把四处分散的土地调换为较为集中的土地。然而这项办法，是难于实现的；主要因为土地赠与大多附有一项约束寺院的条件：寺院须把这块土地保留于它们的产业之内；也因为教会的规则上规定：所有的调换必须是有利于寺院的，而这样的调换是不易找得的。

鲁尔河畔的维登寺院，正可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寺院的土地多么零星四散着，而寺院获得通行税的豁免权对它们的贸易是多么重要。880年，维登寺院在莱茵河畔夫勒美西谟的旧王室领上，有着一片广大的土地养着大量牲口。稍向南，在厄斯特河畔它有着一处接连王室领的良好庄园。在莱茵河中游，它有几处大葡萄园。在莱茵河出口处，它有广大草原地带，包括八个庄园，在那里养着无数的牛羊和猪群。从伊塞尔河到须德海的一条地带上，它有大量佃户，向它缴付免役税，还有一个窝赫孙塞治村庄。在威斯特发里亚，它有四五个村庄，另有约三百三十个蜂房，这些都是四处分散着的。在佛里斯兰，它有八十二处小庄园，也是四处分散着的，其中大部是缴付现款租的。在这里，它也控制几块森林地和几所教堂。它也有若干处供给食盐的地方；其中之一接近威斯特发里亚的威尔地方，那里的盐井，今天还在开发。总之，它有二百多个村庄和四百二十个大庄园以及几百块小土地。可是，它还是被

列为一个穷苦的寺院。

显然可见寺院从分散的土地上轉运产品到寺院本部或到它的一个大中心市場方面的通行稅豁免权所可获得的利益。維登寺院在 877 年能够获得紐斯地方的通行稅豁免权。又在 898 年，它从茨溫提波尔德获得萊茵河上通行稅豁免权；稍后还获全王国的免稅权。

还有关于墨洛溫朝后期的免稅紀錄。在第八世紀賜給圣澤門·得·普勒寺院和圣得尼斯寺院的住持通行稅或其他王家賦稅的豁免权。716 年，科維寺院不仅有从寺院到它海港福斯的自由運輸特权，而且有征发十匹馬和十二辆貨車来装运它商品的权利。下列寺院的住持都获得罗亚尔河上的自由航运：都尔附近的科默利寺院、奥尔良附近的圣麦斯敏寺院、夫勒里寺院和圣伯訥斯特寺院。在不平时代，奥尔良的圣亚格兰寺院保有六只船在罗亚尔河全部河流上得免繳通行稅。不平还下令說：所有寺院的商品，如果不是用車輛、牛、馬而运过他王国境內的，概免納稅。

寺院不仅竭力为它們的产品从它們的田野和葡萄园运到寺院或运往它們的市場去的时候，获得大路上的通行稅豁免权，而也力求在它們市場所在地区內特种貿易的专利权。賴赫璠寺院在它的阿伦巴赫市場內和它周围的整个地方上获得出售葡萄酒的专利权。它的佃戶、依附农和邻近小农被禁止在市場上出售葡萄酒，虽然他們得在寺院市場上自由出售他們其他剩余产品。在有些市場上，同行生产者被准許出售當場消費的小量葡萄酒，但不得按桶出售。在有些地方上，寺院享有葡萄种植的垄断权，并能阻止任何侵犯这种垄断权的行为，为私人消費者除外；同时，小生产者也被迫使用寺院的榨酒机，为了这项使用权須付大量葡萄酒稅。很多寺院不仅对它們的地区內所产葡萄酒的数量加以控制，而且對他們的竞争者出售他們剩余产品的時間与方法也加以控制。圣馬克

息民寺院在圣約翰节后的几个星期內，享有葡萄酒的专卖权。它不仅尽量利用这项权利，而且竟至迫使它的市場上商人购买相当数量葡萄酒；如果他们由于疏忽而没有购买，則把市場場长认为他們应需的葡萄酒的数量，擅自記在他們的帳上，并在购买者自負风险的条件下，由寺院把酒送到他們的家里去。

关于寺院的牲口貿易，我們不能正确断定它的范围如何。在純粹自然經濟时代，飼养牲畜与其說是为了供应交換的商品，不如說是为了供应个别地区的需要之特殊目的。只在大城市里，才有屠夫經營他的屠宰行业。然而，許多寺院力求并获得在它們的市場上經營肉类的特权。

寺院的食盐貿易，和葡萄酒貿易居于相等的重要地位。巴伐利亚的賴痕哈尔和洛林的馬薩尔盐場，可能还有提罗尔的薩尔斯堡盐場，在羅馬时代，已是賺錢的，而在整个蛮族大移动时期，依然是賺錢的。寺院早已認識到占有盐場所可获得的巨大利益。在整个中世紀时代，食盐的需要一向在日益增加，而寺院所享有的各种有关特权給它保証了一种确定而又丰富的进款。在庄园制度的时期，几乎沒有一个盐井不被某一寺院全部或一部分地占有了的。

只要在可能情况下，寺院也自己开发这些盐井。然而，如果盐井距离寺院太远，它們便把开发的特权包出去，并采用合股的办法；寺院同意供給必要的設備。当时使用两种方法把盐从盐井里提到地面上：一种是利用地下回轉軸；另一种是利用水力車輪。威森堡寺院把回轉軸沉入它的馬薩尔盐壙里，而普魯謨和麦特拉赫寺院使用了水力机。这种水力机也在整个巴伐利亚应用着。盐在达到地面上后放入小鉄桶或鍋子內，用慢火来煎煮。由于需要很多这类鍋子和火炉，寺院竭力取得这类的捐贈。

和占有采盐权相联系的森林贈与权，是非常需要的；因此，紀載上有許多关于盐井附近的森林地贈与，或关于在一定时期伐下

木材并把木材拖运到盐井附近居留地的特权。这些居留地一般是由寺院土地上来的农奴組成的,范围相当大;并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监督来管理。为了他們的住宿建造了小舍,他們并分得长条耕地。特根西寺院,經常保持二十个农奴住在它賴痕哈尔的阿克塞尔曼斯坦的村庄里。

食盐的薄片或厚片装入大小不同的小管子內。它的质量和价格,差別很大。在包装方面,尽量做得妥当,而在运输方面做到迅速。在賴痕哈尔,那属于阿尔台赫寺院的食盐,用貨車运到薩尔佐赫河后,用船装运,經由因尼河达到帕苏,于是,用馱兽运到多瑙河畔,再在多瑙河上用船运到阿尔台赫。路上有妥善的保护,从各領主方面取得过路的权利,如属可能,还取得捐稅的豁免权。从食盐貿易上所获得的进款,成为十一至十二世紀許多寺院能够积累大量財物之基础。在中世紀寺院里,因为在它的領地上有着成千上万的农奴,粗細劳动力都是很充足的。

当然,农业是这些劳动者的主要职业,但很多人被用来充当手艺人,制造器具和物件作为农业的副产品:例如,馬具、馬鞍、鞋子、毛織品和木制品。在一所大寺院里,这些工人住在寺院牆垣外的“居住区”內,而每个居住区是专营一种固定的行业的。关于这方面,圣里奎尔寺院,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在寺院經濟里,职业的分工分得很細。我們看到:园丁、車夫、牧人、耕田人、馬夫、屠夫、錫箔匠、漂布者、梳毛者、織工、銅鉄匠、木匠、石匠、制瓦匠、磨坊工、漁夫、捕鳥者、烘面包工、养蜂者、管森林者。寺院制度还有利于麦芽制造和酿酒业的发展;几百年中僧侶們是以所制的优良麦芽和所酿的麦酒著名的。“柏吞”(Burton)水宜于酿造啤酒的特质,看来曾是在十三世紀由僧侶們所发现的。到十二或十三世紀,僧侶們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进行了啤酒的酿造。

所有精細艺术品也是由有卓越才干或技术的工人制造的;例

如木刻和石刻匠、鍍金匠、油漆匠、金匠、銀匠、羊皮紙制造者。那些位在寺院墻垣附近的庄园社会，往往全部是由工业手艺人組成的。然而，有时，在寺院界限內，也有商店的存在，为了更大便利或安全，这些店鋪設在地下室、凹室和庭院內。在十二世紀的一項章程里，指出这种办法是有利于更大的安全的。

上文已說过，所有这些劳动者是不自由的，并也須記住：僧侶是享有許多特权和豁免权的。因此，关于制造品的成本和那些作为商品的自然产物的成本，僧侶所花費的比起自由手艺人或商人所花費的要少。自由人当然要把僧侶的競争，看作不公道的競争，因而彼此之間，跟着城市和手工业組織和商人行会的兴起，而产生了深刻的仇恨。这种情緒，就是那反映在城市經濟立法里的反僧侶主义之根源。这一主义在十三世紀已有表现，但到十四和十五世紀，它变得普遍而明显起来，所以經濟上的反僧侶主义可认为是促进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因素之一。

在中世紀文学里，对于僧侶的尤其是对于正规僧侶的爱財和貪婪，曾加以广泛而严厉的譴責。但我們必須以保留态度来对待这些辱罵，因为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对寺院財富的普遍嫉忌心理所引起的。尽管如此，善良老人、柏立的理查对僧侶所提下列的抨击，还是有充分的正确性的。

羊群和羊毛、谷物和倉庫、青葱和鍋菜、美酒和肥肉，是今天僧侶們所注意而考究的东西……唉，对三种瑣屑事物，就是，飲食、服装和房屋的注意已把他們蠱惑了……他們因为忘掉“救世主”通过《圣詩》作者^①所宣示的天命，即为貧困人着想的天命，专心于毀灭的肉体的欲望，不顾“教規”，追求豪华的筵席、奢侈的服装，而他們巍峨的建筑物，象城堡的女牆那样，达到和安貧誓約不相容的高度。

关于十二世紀坎特布里寺院，我們讀到下列一段文字：

① “救世主”，指基督；《圣詩》作者，指大卫。——譯者

財富的源源流入，产生了相应的浪費和奢侈的开支。寺院的好客态度在所有的西方教堂里，在大批返自殉道者神殿的香客中間是聞名的。內部开支也大得很。食堂是摆設着最丰富而又最美味的筵席的場所。在副院長的桌上端上十七盆菜。仆役很多，而一百四十个“弟兄”的装备很漂亮。

吉拉达·坎布梭息是个諷刺家，也是息斯脫西安派全盛时代的一个忠实观察家；他为他們的腐化作了一些辯解：

〔他說〕我想，好动机是他們〔僧侶們〕被全世界所咒罵的貪婪之原因；这种爱財心理起于这寺院团成員的不倦地盛情款待客人，无限度的救济穷人和陌生人，虽然他們自己是最节制的人；又因为他們不象別人那样有进款，但完全依靠劳动和他們双手的生产而生存下去，所以，他們貪心地竭力爭取土地，为的使他們为上述的目的，能够提供充分經費；这是他們为什么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来力求获得耕地和广大牧場的原因。

在寺院經濟企业的发展史里，我們已看到：它們接續的发展阶段是明显的。起初，寺院所經營的，是农业移民；后来，它們开始出售它們的产品，它們也开始制造木器、皮革品、紡織品和金属制品这类的商品。又当欧洲經濟和社会生活愈变得复杂的时候，无可避免地它們找到了新的投資形式。所以，再后来，当貨幣經濟已大部替代了老的自然經濟的时候，不足为怪，我們看到寺院发展了一种抵押和放款事业；最后，它們成为中世紀时代最早的銀公司了。

那禁止收取“重利”或利息的著名教会法令，已成为一紙具文；因为容易用捏造和遁詞来规避它的。例如，一个普通的論点是：寺院是“法人”而非自然人，所以收取利息，是不帶有什么罪孽的；又如，在收款时，所要求的抵押品这样大，以致即使不能归偿，寺院也可获得相当好的利潤；又如，在放款时，接受者在他所提出的抵押品之外，还需贈送“礼物”給寺院；又如，在借款付訖之后，寺院还要借款人再送“礼物”。寺院还使用短期放款方式，使借款人实际上不可能贖回他的抵押品。寺院又时常以那用作抵押的土地贈給寺院为条件，来取消借款。

随后,寺院的放款事业规模变为如此广大,以致住持不得不寻求受过训练的人员来帮助处理这类性质的各种交易。他们雇用了犹太人和伦巴人;因为在这个时期这两种人是熟练的錢兌商和捐客。从寺院这项放款事业的范围和它们促进营业方面所占的重要地位来看,人们可有充分理由指称寺院是中世紀时代的第一批銀行家。

十字軍运动特别促进了寺院的抵押放款事业;因为貴族由于突然需要现款,又由于急切要走上十字軍的道路,不是以低价出售他们的土地,便是在过高的利息的条件下用土地抵押现款。1192年,英王理查一世的贖身款和1248年法王路易九世的贖身款,各需要他的臣民集合巨額硬币或金銀块;因而寺院收取貴族的土地作为抵押,来提供大量现款。

寺院由于抵押放款和从它们市場和貿易上所得的利潤,自然地过渡到真正的銀行事业了。

在十一和十二世紀里,宗教团体是唯一的放款者;只有它们,拥有保持得好好的仓库;只有它们,是剩余物資的主人;甚至在十三世紀的最后十年里,一个人还可能陷入那些可信托的修女和僧侶的魔掌里,象分析某一洛林騎士所借的債款所指出的那样。^①

但也有不少住持看出:寺院参与十字軍时代的大规模財政事业,是冒险的行动,因为这种事业既非常复杂而又有起伏不定的价值。从十二世紀起,王室权力的成长、城市的兴起、农奴的释放、工商业的发展,这一切縮小了寺院的政治权力与經濟势力的源流。住持因为进款的萎縮,有时采用了財政的策略,而这些策略又常常是带着毁灭性的。在十二世紀后半期,寺院进款的减退已有迹象可见。有些管事职已变为世袭。要把管事放在薪水制度下或用其

^① 斐雪:《中世紀帝国》,第1卷,第257—258頁。

他方法来回复他們旧有的經濟依附状态之企图，未能实现。十字軍时期所組成的寺院团：神庙騎士团、医院騎士团、条頓騎士团，在十二世紀已取得了群众的爱戴，所以对老寺院团的捐贈开始减少了。旧式土地財富开始碰到从复兴的工商业所得的新式財富之竞争而受苦，所以，許多寺院觉得“土地穷”了。而且，这种特殊形式的貧困由于寺院地产的分散性质而加剧起来。住持白費心机地企图以交換別块土地或购买方式来集中他們的土地。又因为这些外围的領地往往距寺院市場太远，它們不可能运送它們的产品到那里，因而这类土地上的副主教或管理員就在俗人市場上出售了他們的产品；这样一来，寺院就丧失了它們从交易上本来可获得的很多利潤。加之，当地的庄园管理人，当住持的控制放松之后，越来越倾向于鬧独立，所以，寺院实际上终于被剝夺了从这类土地上所有的进款。

由于占有大量庄园和必須注意庄园所有部門的經濟情况，住持和院長已从专心于服务上帝的朴素教士轉变为大地主了，他們有着地主的一切困难与麻煩，周围是一些牢騷滿腹而又难駕馭的佃农。^①

許多寺院对于集中它們土地企图的失敗，无疑是它們經濟失敗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远隔的田庄和庄园落入不同的寺院团体手里，或者由于它們約定要供給建造某种宗教机关的經費，或者由于要照管它們的庄园，它們必須派遣一两个僧侶，通常在一个副院長的管轄下，来执管产业。又因为这些地产是远离大寺院的，严格的紀律往往沒有办法来实行；因而它們不再受到严密的監視；所以，那里的“修道室”（它們被这样地称呼的）的成員，不久以各种借口来放弃它們所屬寺院团的严格規則了。^②

而且，在十二世紀，生活費用已大大提高了。寺院为了索回債

① 吉拉达：坎布梭息：《全集》第4卷，《导論》，第8頁。（《案卷丛书》）。

② 同上书，《导論》，第24—25頁。

款和为了取消違約抵押品之贖回权而进行的迁延不决的訴訟都花費了很多进款。城市的兴起和十字軍运动的发生抽去了寺院領地上的农奴，所以它們常常采用了以高工資来雇佣临时工的办法。又在早期，当土地投資是有利的时候，寺院购进了大批土地，而这些土地在下一世紀里所收回的，却是亏本；由于这个緣故，它們被迫把自己的土地抵押出去，一般是抵押給犹太人的。此外，寺院財產的不良管理，也是它們衰落甚至破产的一个共同原因。維茲雷寺院住持休格被罢免，因为他使寺院負債达二千二百二十銀里佛尔。圣奥麦寺院在十三世紀末期，已瀕于破产状态。柏立·圣爱德曼寺院住持曾向一个叫做本尼狄克特的犹太人借款，来修理寺院，但后来无力还款。当他的債主向他催迫还款时，他曾徒劳地往圣托馬斯·阿·柏刻特神殿去进香，以期补充他的財產。他死在路上，而寺院的錢柜里竟沒有分文来支付他的殯殮費。当参孙接任寺院的住持时，寺院的債款达到三千九百五十二鎊；这一笔款一定是六倍或八倍于今天的貨幣价值。布拉克伦·佐塞林生动地描写了寺院在住持参孙接任时的貧困状态。“住持休格已老而他的眼睛已經朦朧；他是一个虔誠而又仁慈的人，可是不熟练世故……一切情况，越来越变糟糕。住持只有一种办法和出路；就是，談判一項付利息的借款〔注意他是在付，不是在收利息〕，为的要稍稍維持他寺院的尊嚴地位”。他从諾里奇的一个犹太人（这就是后来使柏立·圣爱德曼的住持破产的同一个人）借了八百八十鎊的一笔巨款。幸而，参孙是一个有才干的管理人，能在十二年之內付清了債款。

一所經濟窘困的寺院，为要恢复元气所采用的最普通的財政措施是：出售年金、撫恤金和津貼，最后一項仅仅是伙食恤金。但除非能够善于运用或投放由此所得的資本，这些办法，也是冒险的。

然而,关于寺院的經濟垮台的基本原因,当然是庄园制度的消逝,因为每个寺院的經濟,是以庄园制度为基础的。寺院曾在自然經濟时代兴起,但它們不善于安排自己来适应新的經濟革命;这革命开始于十二世紀早期,而一交十三世紀,已形成中世紀欧洲的一个經濟和社会革命了。寺院由押款所获得的土地,再不能按照老的經濟制度来有利地經營着,而僧侶們总是不能迅速地适应这些新条件。在最后分析里,可以看出,寺院是它們自己的一度优良的但现已过了时的經濟制度之牺牲品。

很奇怪,寺院的經濟困难使僧侶們成为教皇派。因为英諾森三世和他的继承人的教皇座享有庞大的进款(将在下一章內叙述),教皇迅即利用了寺院的貧困化,使僧侶比前更牢固地束縛于圣彼得的宝座上。为了实现这项目的,他們放款給僧侶們或替他們所談判的借款签名担保。因为到了十三世紀,到处都认为是对寺院財產的投資靠不住的。1188年,坎特布里的僧侶大发牢騷,因为羅馬銀行家對他們的任何放款,抱着怀疑态度,除非有教廷担保的支持。

这种情况是注定要产生出深远的政治后果。当新的民族君主国兴起并日益憤怒地反对教皇要求超越国家之上的世俗主权的时候,“僧侶們向羅馬教廷找寻同情的支持”。另一方面,“当主教和世俗僧侶反对羅馬教廷的集权的时候,寺院成为拥护教廷派的集合所。它們的同情和反感,完全和羅馬相同,而它們的民族精神則烟消云散了……在教皇和国王发生冲突时,民族站在国王方面,而僧侶站在教皇方面;因此,寺院表现更多教廷精神,而国家則更多民族精神了。”^①

在腓力二世时代(1180—1223年),法国王室摆脱了寺院的监

^① 士达布斯:《案卷丛书导論》,第371頁。

护权，并把信賴寄托在主教的忠誠方面，結果主教成为王国的支持，而住持的权力大为削減。法国国王实行压制僧侶的政策，竟至破坏寺院本身；这可說明为什么现在法国北部很少有保存下来的完整寺院的。另一方面，在諾曼和金雀花朝英国，英王利用了僧侶中两系的互相反对，因而得維持均势于自己手里。由于这个緣故，英国保存了它的寺院，直到亨利八世取消寺院团为止。

但是，約在 1200 年所表现出的这种寺院崩潰的情势，决不是完全起于經濟困难的。在十二世紀，寺院的組成分子感受了一种深刻的社会变更。老寺院团大部分——克伦尼派全部——原来是从封建貴族家庭补充人員的。在封建时代，上层階級代表着中世紀社会中的有力的、有智慧的和有能力的成分。整个說来，封建制度和它的服务、忠心、荣誉的崇高观念，連同上层階級所拥有的財富，培养了一批人才，他們比在下层階級所可看到的，具有更强的体格、更强的智力、更强的道德品质，因为下层階級由于几代的艰苦劳动和不自由的束縛，已变为迟鈍而又粗笨。农民体格和智力的水平，一般比貴族的要低，而且农民完全沒有那些封建貴族所具备的服务传统和行政与管理公共事务的长期經驗。

当然，当农奴制衰落和城市开始兴起的时候，寺院团开始被农民出身的僧侶侵入；他們虽然可能出于良好的动机，但不象他們的前輩那样能够成功地管理寺院。值得注意：这种貴族控制寺院制度的破裂，同这种从下侵入的情况，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这种情况最初表现于喜苏尔寺院，即克伦尼派的平民支派，后来还表现于息斯脱西安派和普勒孟斯特派以及其他在十二世紀成长的小寺院团里。

我觉得：上述的論点，对于那些沉醉并信仰民主政治的人們是讨厌的。但什么是“进步”？又什么是进步的标准？历史上有很多例証，表明一种事情的进步与其他事情的停滯或退步是同时进行

的。所有流行的概念，是很少分析的。

寺院的衰敗情況，最突出地表現在寺院教育和文化事業的退化方面。每個研究中世紀歷史者熟悉下列事實：到十二世紀，寺院的學校，在程度上遠低於世俗僧侶管理下的教會學校。關於寺院方面文化的衰落，也可從寺院圖書館目錄里獲得重要資料。在這些圖書館中，有很多可回溯到第九和十世紀的手抄本，而抄寫手抄本工作，是中世紀僧侶的重要職業。我們發現什麼情況呢？試舉出下列兩所典型的寺院作為例子；它們各曾一度以學校和教育著名的。這兩個例子可說明手抄本出產方面的顯著下降情況，附表於下：

賴痕璫寺院	聖加爾寺院
九世紀……一百份	二百三十七份
十世紀……二十九份	八十六份
十一世紀……七份	四十九份
十二世紀……四份	五十四份

關於寺院的衰敗，還有比經濟衰落或文化知識下降更惡劣的證據，就是，寺院內僧侶的自殺傾向。對僧侶的單純不道德行為之指責，必須稍加斟酌，雖然這種行為是很多的。作為一個階層來看，僧侶斷然不會比中世紀其他社會階層更荒淫。必須經常記牢：中世紀輿論，對於僧侶是以十全十美的標準，而非以世俗社會所流行的標準來判斷的。

到了十二世紀末期，息斯脫西安派、普勒孟斯特派以及其他在前一世紀出現的小寺院團一起都走着下坡路。克倫尼派在十世紀曾接替本尼狄克派，息斯脫西安派在十一世紀曾接替克倫尼派；同樣，息斯脫西安派在十三世紀自己也跟着被法蘭西斯派即討飯托鉢僧和多米尼克派即布教托鉢僧接替了。時間已使他們成為古董了。他們的奢侈和貪欲，使他們失掉了公眾同情。他們不能使自己適應于新的、反封建的趨勢，就是，城市生活、商業和貿易以及一

种资产阶级文明发展的趋势。不仅封建隔离和地方分裂主义已告破产，而且寺院的隔离孤立的理想本身也已陈腐了。

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不象克伦尼寺院团那样从封建贵族里来补充人员，而是从平民中来补充人员的。托钵僧不是住在偏僻的地方，“远离狂乱群众”的地点，而是在城市内建立了他们的寺院。他们不是要获得土地和物质财富，而是在藐视赠与并依靠施舍过活的。托钵僧不是使用他们土地上的农奴代做劳动来经营农业和工业，而是专心于教育、布道和慈善救济。托钵僧不是拘泥于死文字（至少就民众来说）所写的手抄本，而是使用方言（平民的语言）来布道，随便在什么地方有人集聚的地方，在城市广场上、在市场和市集上，甚至在乡间十字路口都可以。托钵僧不是被人奉侍而是奉侍人的。旧寺院的理想原是隔离世俗，使僧侣不受世俗所沾污；如果僧侣奉侍别人，那不是为了别人的缘故，而是作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种义务，作为获得天堂上的信用的一种手段，作为一种降低身分的行为——他们主观上没有什么服务社会的理想的。另一方面，托钵僧采用了一种新理想：救人才得救己。他们的慈善行为，是纯洁而又真实的，不象旧派僧侣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样。

必须记住：法兰西斯派的兴起同意大利城市运动的传布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在同一时期的。托钵僧是反映中世纪欧洲促使封建制度垮台的经济和社会革命的。他们显然是城市的而非农村的僧侣集团；在精神和组织形式上也是民主的而非贵族的。如果他们不能居住在城垣以内，他们的寺院则建立在市郊内，尽量接近市中心区。在目的和在实践中，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寺院是城市的传教团，也是社会救济的会社。

今天，城市由于近代工业和运输条件的推动，发展得这样快，以致在那里发生了尖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同样，在十二和十三世纪城市在没有适当计划的状况下，迅速地成长起来。城市街道既

窄狹而又嘈雜；居住條件很差；貧困和罪惡到處存在；那時和現在一樣，這種情況，往往以疾病和失業而更加嚴重化。對這些新的狀況和新的問題，城市當局和教會都不予注意。城市人口已大大增加，而在許多城市中，很少有或沒有新教堂的建立，同時，當地傳教師人數往往還是和兩百年之前一樣。約在 1100 年，當聖諾柏特來到安特衛普城時，他看到一個工作過重的教區教士；他工作所在的社会，由於它貿易的增加，已從一個小漁村轉變為一個城市。聖法蘭西斯沉痛地說：意大利城市內“充斥著不信上帝與在世無望的異端邪說”；那是由於僧侶的世俗性和他們漠視教會的伟大使命所引起。天主教詩人法蘭西斯·湯普遜以法蘭西斯托鉢僧和“救世軍”相比，那是有理由的。

那些灰色服裝的托鉢僧，經常成對而行——“一在前，一在後”正象但丁所描寫他們的那樣——他們從來不騎馬或騾或乘車，經常赤腳著草鞋，穿粗呢大衣，愉快地依靠施舍所給他們的東西來過活；到晚上隨便住在什麼地方。他們之所以深得人心，是易于理解的；因為他們的朴素作風和老寺院團的奢侈和傲慢形成了一個明顯的對照。他們在城市中受到愛戴；當他們從一個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而經過鄉村的時候，他們也同樣受愛戴。商人、小販、手工藝人和農民衷心愛戴他們；相反，僧侶和世俗僧侶以及封建貴族切齒痛恨他們，因為他們同情群眾，他們公開擁護城市自治運動甚至革命，他們譴責不義之財，他們藐視封建主和高級世俗僧侶。法蘭西斯派不僅在城市居民中獲得人心，而且也受大學生的歡迎。因為“年輕大學的貧困狀態和寺院的財富，呈現了一個不協調的對照”。

的確，法蘭西斯派，後來——并很快地——也象以前的寺院團那樣，變為衰敗而走上了衰朽和腐化的道路。但這一事實不應使我們閉眼不見他們關於實際道德和社会方面所提倡的理想和實踐。法蘭西斯派在他們反對財富所產生的罪惡和弊病時，走到了

另一极端；他們的过錯象息斯脱西安派的那樣，正是起于他們所理想化的貧困方面。他們在他們的怀里已孕育着他們最后失敗的种籽。但是，他們牺牲于一般的經濟情况，正象牺牲于品质的墮落那樣。敝开不談托鉢僧行乞本身是否是一个虛伪理想這個問題，确然，那依靠偶然的施舍作为維持生活的原則，在十三世紀比在今天，更难遵行，因为饥荒和疫疾的重复出现，那时比今天要多得多。由于这个緣故，托鉢僧对于財產和留恋产业的輕蔑态度，不久成为一个伪君子的态度；他們变成哀鳴的諂諛者和狡詐的行乞者，他們为了勒索經費，使用了有問題的方法，并迅速沉溺于貪財的深淵里。他們追求遺產，叫卖赦罪符，因而变为臭名远揚。罗哲·培根，本人也是一个法兰西斯派，死于 1292 年；他沉痛地写道：在他的时代，托鉢僧“丧失了他們过去的价值而可怕地墮落了”。圣法兰西斯确曾被說成是“許多时代中的最有自发性的而又最不受习俗拘束的天才”。但他的門人不复能保持住他的純洁、貧困和效忠人类的几乎超人的理想了。托鉢僧失敗的原因是和人类的性质分不开的。他們的垮台，象所有他們的先行者那樣，是无可避免的。

现在，我們高兴地从討論那些和寺院历史分不开的阴暗面轉到叙述寺院生活的一个光明面。在中世紀时代，寺院是“独一的消息总汇，也是王公貴族在来到他們庄园时的唯一消遣場所。如果没有寺院，乡村生活，在人們尤其是在劳动人們看来，将是一种凄凉的生活；就是，單純而无希望的苦役、沒有节日庆祝活动的斋期、沒有娱乐或假日的工作这一回可悲的事”。在收获之后，在中世紀寺院里，常有一大群变戏法者、音乐师和有趣的游蕩者来打破乡村里的沉悶单調的生活。当庄稼和果实收集之后，寺院和修道院常常是集会和演戏的場所；僧侶們演出神剧或神秘剧^①而角力比賽

① 在中世紀时代，表现基督奇迹以代說教之戏剧。——譯者

和粗俗游戏使庄园农民获得娱乐。的确，虽还没有学者能够追溯神剧的起源远至十三世纪里，但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后期，这种演出不是不常见的。在这些戏剧里，法兰西斯派似乎曾是很活跃的，可能因为他们看出其中有一种方法，可使他们的说教变为通俗化并可使群众熟悉圣经中的历史和教训。著名的“寺院剧”，全部是在法兰西斯派托钵僧手里。后来，行会也开始表演了神秘剧和神剧；但行会方面所表现的，带着一种马戏和淫猥趣剧的倾向；而托钵僧所演出的，是没有这种倾向的。在音乐方面，托钵僧也进行革新，他们采用了通俗调子来配他们的赞美歌，象今天“救世军”所做的那样；这些赞美歌，不象教会的赞美歌，是以拉丁文写的，而是以方言来写成，并以方言来歌唱的。

第二十五章 教会和封建社会

今天在欧洲，除了英国和西班牙外，无论在什么地方，教会的国教地位已被撤消，因而它和政府没有什么联系；而在美国，除了在殖民地时代的維吉尼亚州外，从来未曾有过一个国家支持的教会。所以，对一个近代人来说，很难掌握着一种国家教会制度的真实性，象它在中世纪时代存在于全欧洲的那样。

中世纪教会，与近代教会无论旧教或新教教会，是大不相同的。它到处行使的不仅限于宗教的统治，而且行使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的权力。它的管辖权推及到“基督教国家”中的每个王国；它不仅是每个国家中的一个国家，而也是一个“超国家”。“教会的统一性和它的官方语言在整个中世纪产生了一种世界主义；而这种世界主义从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就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知道，每个世俗王国是个独立的实体；但中世纪教会不是这样，它是个统一而又遍及各国的机构，它的管辖权是越过所有种族、民族、语言的分界线而通行无阻的。一切基督徒一方面是某个国家的属民，受自然法和他们的国家法的保护；另一方面他们是教会的属民。教会未曾要求过撤消封建法律，但它坚持要加上一种更高级的法律。它在封建法和这判断是非的更高级法典之间，划出了一条显明的分界线。必须经常记住：在中世纪欧洲，除了犹太人之外（他们因各个不同的时期与情况而受到容忍或迫害），每个人是教会的属民，他须对教会效忠；如果他反叛了教会，他将受处罚。不管属于哪个国家，不管谁是他的统治者，每个人是属于教会管辖权的；至于住在教会领地上的千百万人们，无论是附庸还是农奴，那些人也是教会的世俗属民。

教會的行政組織，是和國家的行政組織相同的；但它比封建王國的組織更加巩固并更加統一。它的統治者是教皇，它的省長是大主教和主教；它是以宗教大會和會議作為自己的立法會議；它制訂自己的法律，設立自己的法院和自己的監獄。教會擁有龐大的土地基金；它對每個社會中一切人們課征一種經常稅即什一稅；此外，它還收集無數的酬費。在幾百年中這些酬費是從教會行政機關和法院的形形色色的活動方面得來的，很象近代政府，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收取各種辦事上的手續費那樣。但到了後來，如在下文所述，征收酬費的辦法還被大大地推廣。

在中世紀時代，羅馬教會是一個行政長官、大地主、收租者、征稅者、物質生產者、大規模的勞動僱主、商人、手工藝人、銀行家和抵押擔客、道德的監護人、關於節約法的制定者、校長、信仰的強制者——這一切身份都集中於一身。它的權力如此普遍、它的活動如此多樣化，所以有人常常很正確地說：中世紀歷史基本上是中世紀教會的歷史。的確，教會是一個驚人的程度上把宗教活動和世俗事務、理想觀念和實踐行為聯在一起。如果說它的頭是在天堂上，它的腳則一向是立在地面上的。關於理解中世紀教會這種特殊的世俗利益和世俗權力之關鍵在於：由羅馬帝國晚期皇帝對教會所賜給的并由後來“蠻族”國王所繼續擴大的特權、獨占性的管轄權和免除權。另一個關鍵在於：教會成長為一個大地主。土地不僅是當時物質財富的最普遍形式，也是幾百年來差不多獨一無二的財富生產形式。教會的土地占有權和世俗性，跟着時間的進展而給教會帶來了政治權力、優越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的資源以及那管理和控制社會的權力，無論在宗教或世俗方面。威廉·拉姆塞勛爵就羅馬帝國內教會所說的話，同樣正確地可適用於中世紀教會：

把教會逐漸組織起來的行政形式，是由社會的狀態和時代的精神所決定

的……这些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制加在它身上的;〔但是〕……教会是主动地而非被动地接受它们的。教会逐渐意识到它所已承担的任务的真正性质。它逐渐认识到:它是一个世界性的机构;因而必须组织一种世界性的行政制度。它成长为一个有活力而又健康的有机体;这有机体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并得保持了自己的地位,来反对周围力量所起的分裂作用;但它发展的路线是由它的环境所决定的。

在讨论教会在封建时代所充当的角色时,我们不应武断。那个时候的制度、社会结构和理想与今天所存在的,是截然不同的。在中世纪欧洲的历史里,要在教会机关权力的正当使用和滥用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那往往是不容易的。我们可引述德皇亨利二世时代的一个例证来阐明这一点。皇后库尼根德有一弟兄,叫做阿达尔贝伦;他是一个典型的强盗男爵,一个任性而又喜争吵的洛林人。他在特累甫大主教区如此无法无天进行掠夺,以致这地区几乎变成一片荒地,而大主教被迫避难到科布林士去。在这样的情势下,所需要的不是一个文人,而是一个武夫。皇帝写道:“朕将派遣一个人来阻止你的狂妄行为”。他实行了他的这句话。因为他所选派的新任大主教,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士,而是一个顽固而又棘手的年轻法兰哥尼亚男爵,名叫班堡的波波;皇帝急急提拔他,使他经过各个不同的教阶逐步升任为特累甫的大主教。波波把六十块俸禄地分配给六十个骑士;于是,他率领了这一小队常备军围攻了阿达尔贝伦的城堡;最后使这地区重树立了和平秩序。

甚至在中世纪早期,教会财产已增长得非常巨大,使世俗统治者震惊。在第八世纪上半期,巴伐利亚的亚奇洛斐革公爵和高卢的查理·马德尔已经强制夺了教会很多土地。但教会的损失不久由于有更大的新捐赠而获得了补偿。因为喀罗林朝看到,他们在世俗事务里必须使用教士担任伯爵、巡阅使、外交官,甚至军队司令官;而在“自然经济”流行的时期,只有一种可能的方法来酬报他们——就是说,以土地来赐给他们。查理曼对待他帝国内的主

教和住持，完全象他对待世俗大貴族一样。圣加尔寺院的高僧写道：

伯爵們只要是住在“蛮族”的边境上或“边防区”內的，他就賜贈領土，否則，他〔查理曼〕从不会以一郡以上的領土賜給过他的任何伯爵，也从来未曾以什么寺院或教堂賜給一个主教作为王室恩賜的一部分，除非他有着特殊的理由要这样做。当他的大臣或朋友詢問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他总是回答說：“朕能以那种进款或那所庄园，以那所寺院或那所教堂，来获得某諸侯的忠誠；这諸侯象任何主教或伯爵一样好，也許是更好的人。”

由于事实上的需要，对教会的捐贈增加了。然而，如果认为一切“捐贈”都是出于慷慨无私的心理，那会是一种錯誤。有的僧侶，由于利欲熏心，往往勒索那些情势上不能拒絕的东西作为礼物。查理曼埋怨說：給教会的礼物太多了，所以，自由人陷于貧困境遇，而被迫走上犯罪之途。817年，路易虔誠者迫于情势，制訂了法律，来阻止僧侶接受那些可能使贈与者的子女或近亲丧失遺產之礼物。這項法令，后来在875年，由路易二世予以重申。

早在810年，亚琛宗教會議按照財富多少把僧侶分成为三个等級：第一等是有三千到八千块保有地的僧侶，第二等是有一千到三千块保有地的僧侶，第三等是有不滿一千块保有地的僧侶。

这类土地的大部分可能是真正的庄园，就是那些全部由依附农組成的村庄，其中每块至少包括一千亩农田；但許多保有地是比較小而更分散的农場，在那里没有什么村庄社会，只是有一所由农場長看管的田舍以及几个茅舍人。此外，可能还有零星分散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有二、三个劳动者；他們只在春夏两季住在那里，而在冬季則回到村庄去。^①

因为庄园不是一个固定的地面而是一个經濟的单位，又因为須考虑到比庄园較小的地产，所以难以估計上述数量究竟有多少。但有一个近代最大的历史家，就法国一所最富寺院所拥有的全部

① 庫普兰：《圣柏騰寺院》。

庄园,作出了一个平均数字,因为这个寺院在第九世紀好多年数的簿記迄今还保存着。据他的估計,第九世紀最富的僧侶有田七万五千亩到十四万亩;普通富裕僧侶有田二万五千亩到五万亩;甚至最穷的主教和住持也有田五千亩到七千五百亩。据这同一历史家的进一步估計,最富僧侶的每年进款有八万五千到二十二万五千美元,普通富裕僧侶的进款有二万八千到五万六千美元,穷苦的主教和住持的进款有五千到一万四千美元。在十、十一和十二世紀,由于种田方法的改进,大量土地捐贈,荒地、沼地、森林地的开垦等等,僧侶的土地财产,特别是寺院团的财产,还要大大地增加。

在中世紀时代世俗僧侶(主教团)和正规僧侶(寺院团)之間,为了爭夺地产存在着非常尖銳的競爭;那在他們之間达到了深仇宿怨程度,尤其是在十、十一和十二世紀,当克伦尼派、息斯脫西安派和卡德西安派所提倡的所謂“新寺院主义”或寺院复兴运动兴起的时候。在競爭中,一般說,正规僧侶較為成功。因为他們的修道禁欲生活給了公众很深的印象,而且他們所宣称的“出世主义”使他們享有那拒絕給予世俗僧侶的圣洁的名譽。中世紀留传下来的遺囑指出,寺院所接受的私人捐贈,比起主教区所接受的要多得多。其他原因也是有影响的。主教比起正规僧侶,更被視同世俗統治者,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維持的,而寺院是属于私人专有的或私人用捐款創办的。下列事例可更加清楚地說明这一点。在美国有許多私立学院和大学,而在每一州內有州立大学。前者接受遺產和遺贈是寻常的事。而州立大学几乎是完全依靠州議會拨款。同样,在中世紀时代,寺院因为它们一向是属于私人团体性质的,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而主教,作为“教会政府”体系的一部分,一般认为他們从所享有的产业和特权里已可获得充分的經費。当然,主教企图使自己适应这项情况,力求以整頓他們的产业来弥补私人捐贈的缺少。除了采用更有效的管理土地方法之外,教会也

力图把它零星分散的建筑物合并成为紧密的集合体，从而用科学的管理和縮減行政費用的方法来获得由于缺少私人施舍上所失掉的东西。在十世紀后半期和十一世紀的早期，我們看到教会出售它分散的或离得远的土地或把它們換取較近于主教区或寺院的其他地产这类的許多事例。从流传下来的資料看，这种試驗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但除了主教和住持之間为了爭取土地而进行的竞争之外，另有一种冲突的来源，就是关于寺院热烈爭取征收什一稅之权。象在查理曼时代原来所规定的那樣，什一稅只是由主教征收的，而所得的进款是被严格分配的。其中四分之一归于主教，其他四分之三是指定作为維持和修建教堂、維持教区僧侶薪給和救济穷人之用的。后来，因为什一稅是加在土地上的，象教会的其他不动产那样，什一稅也封建化了，也成为买卖、分封、庇护、继承、抵押等的对象——以致达到这样地步，在十一世紀什一稅的很大部分，被拿去用在世俗的和封建的目的方面，所以教区教士，常常处在貧困状态中，不得不以捐款和祭品，在落后的农村教区中甚至須从事田間劳动，来弥补他們的微小薪給。在法国和德意志，这种什一稅的还俗化，已大部做到，并广泛地获得了习俗的认可。然而，在英国，这种办法差不多还没有人知道。圣路易本人，是一个什一稅占有人；因而法国的法律规定：所有在1179年前已在俗人手里的什一稅将认作世俗财产，因而可以出售、让与、交换、遺贈或作为粧奩贈送。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取消什一稅的时候，它已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财产。

正规僧侶們因上述什一稅的让与和滥用，振振有詞地抗議主教对什一稅的垄断，并要求：他們应象主教那样，有权征收什一稅。这要求是根据“改革”的理由提出的，但經過仔細研究，就可揭露：“改革”这一个詞一般是僧侶用以掩盖自己的扩张势力企图之外

衣；他們沒有提出什麼廉潔行政或解除弊端的保證。而且，寺院團對什一稅的要求，理由較少，因為它只需要維持自己，而主教團則需要照顧和維持整個公共崇拜儀式。在這爭論中，寺院通常從羅馬教皇取得了一張免除主教管轄權狀；給予它們以征收自己的什一稅之權；這樣，僧侶和主教在這一點上，站在平等的地位了。的確，在中世紀中期，當克倫尼派和息斯脫西安派的勢力正在高峰而許多教皇本人也是僧侶的時候，這種辦法是很普遍的。我們應附帶地指出：教廷給寺院以免除主教管轄權狀的辦法，是對教廷有利的，因它為了這項教廷恩賜可勒索大量酬費和年貢。在亨利四世時代，對條麟吉亞什一稅的臭名遠揚的爭執，正可說明這一點。在這爭執中，馬因斯大主教卷入了鬥爭，激烈到使他同佛爾達與赫斯斐爾德的住持和條麟吉亞的侯爵德提，發生了一次戰爭。至於條麟吉亞遭受嚴重剝削的農民之福利，爭執的任何一方都是置諸不理的。

象教會所執行的那樣，

什一稅本質上是一種土地稅、所得稅和死亡稅，比起任何近代所知道的稅要苛重得很多。不僅農民和茅舍人必須繳納他們所有產品的十分之一——按理論，至少直到他們花園中的盆花為止——而且商人、店員甚至最勞苦的手藝人，按照同一的理論必須繳納這同一的稅，就是從他們的個人所得的每鎊里應繳付兩先令稅……、收取羊毛的什一稅被認為也應包括鵝毛在內。連從路旁所割下的青草，也應付它應負的稅；如果有農民在繳納他谷物的什一稅之前先扣除了工作上的費用，他將因此而自投地獄。^①

一個突出的封建宗教慣例——也是一個時常粗暴濫用的慣例——是庇護權或僧職授予權；依這權利，一所寺院的創立人或一所教區教堂的建造者，得保留對該寺院或教區財產的控制。庇護權制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五、六世紀里。夏龍宗教會議（639年）

^① 庫爾敦：《中世紀村莊》。

決議的第五條證明，俗人已控制了教區的財產。到了第七世紀末期，大部鄉村教堂被看作私產，而庇護權也常常逐步改變為真正的占有權了。

庇護制是在和領主制成長的很多相同的形式下，成長起來的；當然，在大多場合下，一身兼有領主和庇護人二重身份……一所教堂的僧職授予權被看作為一樁財產，它可以賜給、出售、分割或不公平地佔據，完全象任何其他財產一樣……宗教的尊榮職位，無論大小，不復看作為那附帶有維持任職者生活的基金的職位；而卻被看作聖俸，即所付的僧侶俸，象一種世俗恩俸那樣；它是附有某種義務的，但這種義務可隨便由任職者親自或由他的代表來執行。這樣，一所教堂的基金成為一種聖俸，一種財產，而庇護人的權利漸漸被認為主要是贈與那項財產的權利；而這項權利本身，就是一種財產。^①

對於這種由地主階級占有教區制，法蘭克國王給予承認，並使之合法化。它成為一種公共制度。794年，法蘭克福會議決定：自由人可以占有教堂，也可以讓與並出售教堂，但以教堂建築物本身不受破壞，宗教儀式不中斷為條件。查理曼在《莊園詔令》里曾仔細規定關於王室領上教區教堂的管理辦法。在810年另一項詔令里，他指令：主教應監視：鄉村教士是否“給予他們的領主以應有的榮譽”。的確，在原則上，這樣的一所教堂仍然是在主教的宗教權力統治下，關於這一點還有大批法令，可資證明；可是理論與事實之間，距離得很遠。事實上，一所私有的教堂，是領主領地的一部分。他權力所受到的唯一的真正限制是：他不得把那已劃出作為直接維持教區教士薪給的土地上的收入作為自用；也不得毀壞教堂的建築物。在教會中，有一派對這種流行的情況曾提出抗議，但沒有結果。里昂的阿哥巴德的信件、829年的事件、《偽造的教皇教令集》^②都證明了這種反對派的存在。在路易虔誠者時代，主教

① 福祿門：《諾曼征服》第5卷，第501-502頁。

② 偽造的教令，是旨在支持教皇反對俗人的宗教權力。《教令集》包括以早期教皇名義寫的約一百封信件和虛構的宗教會議的決議。——譯者

团对领主控制教堂，曾激烈地反对过。但所有抗議都无效，而在840年以后，仅仅有不平之鳴而不再有别的行动了。时代的精神和时代的条件已批准并认可这个制度。理姆斯的兴克馬的信件充分表明：教会怎样默认了这种情况。他未曾否认私人对教会甚至对主教机关的占有权；他仅仅要限制它。在十世紀特洛斯里會議（909年）上，以教会的法令来承认了这项原則与这项实践。那种购买来的僧侶圣俸，也是一种投資形式了。

这样，到第九世紀末期和十世紀初期，教会已不是分属于主教区和教区，各有自己的一个宗教首領即主教或教士来管理的；而实际上我們看到：許多宗教分区在封建过程里已轉变为大小不等的封建宗教产权的一个混乱的集合体。一句話說，教会已和政府与世俗社会一样地封建化了。在一所教堂的占有权和一所普通庄园的占有权之間，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別。从第九世紀末期起，关于私人教堂的不动产交易和关于庄园的不动产交易，是同样普通的。甚至喀洛林朝反对分割領主教堂的財產之禁令，也变为过了时的东西。我們看到教堂財產分成为二份、四份、六份等的事例。而且，这些分割不是单单分配进款于各所有人之間，而把資本仍然保留完整的。据文献所指出，这种瓜分是真正的瓜分。甚至教堂的祭坛，有时也被瓜分，所以我們看到有四个或更多的教士，在同一祭坛上司祭，各分別举行一次仪式；而这些教士是由各个的庇护人分別委派的。

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土地所使用的經營方法，完全象俗人土地上所使用的那样；而教会所征收的免役稅、劳役稅、地租等等，也和世俗世界里庄园所征收的捐稅，一模一样。在有些場合，世俗业主把向那些在教堂門口做买卖的商人征收的捐稅，作为自己的一项进款来源。此外，庄园領主还常常根据“授予权”占夺教堂墓地，并把那些未作实际埋葬用的土地租給农民，作

为园地或茅舍基地，因而他可获得一笔收入。庄园主大量占夺教堂的进款，竟至把施舍金、洗礼费、悔罪罚款、埋葬费也占用了。

在中世纪时代，建立一所寺院或僧侣会所或庵堂，常常是一件精明的事情，而许多施主的虔诚远不是大公无私的。因为这类宗教团体仍然留在创立人和他的继承人的控制之下；他们把一部分的收入放入自己的腰包里；而且这些继承人所得的利润跟着信徒所捐赠的礼物、遗产和新基金的激增，而增加到令人不可想象的程度。教堂附近的信徒，由于他们捐赠葡萄园、田地和农场给当地教堂，使创立人发了财。他们的财富增加了他的财富；他的教堂使周围人们的私产流入了他的钱袋里。

庄园领主还掌握着推荐神父之权；所以他对于担任神父的人可任意处理；后者往往还是他自己的一个旧农奴。奥尔良的约纳斯在第九世纪抱不平地说：“可怜的教士”被迫去充当僕从了。里昂的阿哥巴德附和了这项不平之鸣，举出例子，说明那些属于小礼拜堂的神父所遭遇的境况：他们被迫去做侍膳、修剪葡萄藤、照料群犬、替贵妇理发等等工作。888年，在梅斯宗教会议上，抱不平地谈到：有一个教士曾被他的庇护人打成残废，因为教士大胆责备了他的不道德行为。

毫不奇怪，喜尔得布兰宗教改革运动目的之一是：要取缔这类弊病并使教堂财产从俗人所有权或控制权里解放出来。许多教堂和寺院，为了防止封建主的掠夺，逐渐走上了接受教廷保护的道路上。由于这个缘故，教皇常常成为那些广泛分散在欧洲的教堂和寺院土地的最高所有主。这样一来，这些宗教团体摆脱了其他任何人的控制，无论是俗人的或僧侣的控制，并依靠教皇的咒逐来防止了掠夺；它们向教廷财政部缴纳年金来承认这项保护关系。在各种形式下，教廷把它的庇护权推广到德意志、法国和意大利的千百所教堂和寺院去。格列高里七世看出：这办法可作为扩展他的

权力并削弱主教的权力的一种手段，也可作为教廷收入的一种有利的来源；因而他广泛地推行了这种制度。在教廷的收入帐上，不仅有宗教团体而且有私人贵族甚至城市，作为“被监护者”，向教廷缴纳了保护费。

但庇护制也在另一种形式下成长起来了。在中世纪早期的冷酷而又狂暴的时代，主教和住持常常感到要有一个正式保护人来保护他们的财产方为得策；并以教会庄园的一部分作为后者服务的酬报。这样就兴起了“代理人”（拉丁文“advocatus”，法文“avoué”，德文“vogt”）的制度。代理人代表他的宗教上司来办理纯世俗事务；这些事务应归主教或住持去做的，因为他们具有教士和地主的双重身份。代理人出席宗主的法院为主教或住持的利益辩护；他以他们的名义在教堂的奴隶中间执行司法；他代表他的当事人来进行司法斗争，而这种斗争，教士是被禁止参加的；他主持主教的或住持的奴隶之间的争斗审判案件；最重要的，当教堂被征召服军役时，他指挥“教堂民兵”。

在第九世纪混乱状态下，当教堂开始建造它们的墙垣的时候，代理人的职务获得了进一步扩充。保护是这时代的迫切需要。然而主教或住持对于担任这项职务的人选，往往是没有选择机会的。世俗封建主对于这职位垂涎欲滴，因为它的担任者得支配某种宗教的进款并可为军事目的使用某些教堂的奴隶。由于这个缘故，主教或住持，实际上，为了满足一个附近贵族的食欲，时常给了这项职位，以收买他的保护，因为要不然的话，这个贵族会对他们的土地进行抢劫的。在这种讹诈方式下，吃药反使病势更沉重。法国卡佩特诸王使自己成为法国境内半打最富寺院的“俗人”住持。法兰德斯的伯爵们的权力就这样地建立起来。在德意志，腓特烈红胡子还把这办法推行到极端，因为他出征意大利的战役，大部是使用教堂的奴隶来进行的。

因为土地占有制和庇护制漸使教会庄园化，所以封建制度也漸使教会軍事化了。教会土地对国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同于俗人土地对国家的关系；它們逐漸变为封建采邑，而主教和住持也漸轉变为男爵了。于是，主教区成为男爵領；遇到主教空缺的时候，它落在王室监护之下，再由王室指派新任主教；新接任者对国王举行臣服仪式并宣誓效忠，象任何其他附属那样。国王对主教区如同对封邑一样，常常使主教职空悬，有时达三、四年或五年之久，因为按照封建法律，一个宗主有权收取空缺的封邑的进款，不論这封邑是俗人的或僧侶的。这样的一种趋势，当然是由于中世紀时代高級僧侶作为所有主的重大地位和教会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所产生的結果。主教和住持，以教会土地来分封給貴族和騎士，正象男爵們以封邑来授給他們的附庸那样。教会的封建制度，是俗人世界的封建制度的一种复制品。“主教的地位，是基于他們所占有的不动产的，因而他們的宗教地位，也是依靠他們作为土地領主的地位来决定”。

在第八世紀喀罗林諸王已建立了那种制度，即土地占有权必須附帶着軍事服役；这种制度在封建盛世已普遍盛行了。从那个时期起，好战斗的主教——住持較不好斗——在每个时代里都有，而主教必須熟练战斗的技术。在880年的战役里，曾有两个主教死于戰場上。955年，奥格斯堡的主教在对馬扎几人的勒赫斐尔德战役里，曾贏得了猛将的盛名。霍亨斯陶芬朝軍隊，主要是由教堂的农奴組成的。普伊的阿德馬尔主教，即第一次十字軍中的教皇代表，所享有的声望，仅次于高弗梨·得·布雍·巴叶的鄂多，英王威廉征服者的异母弟兄，在哈斯丁斯战斗里，“揮舞一种槌矛以代战斧”^①，因为对教士來說，流血是违犯教会法规的。在第三

① “un baston tenait en son poing.”

次十字軍里，当獅心理查在战场上找到了主教波未·腓力染着血漬的鳞鎧以后，他把它送给教皇并附着几句话：“这是由我們所找出来的。现在，您可知道：它是否是您儿子的战袍”。松利斯·格伦，在布文战役(1214年)里是法国人的战略家。連教皇也曾参加过战争，如約翰八世、約翰十世和利奧九世。王公貴族毫不顾及捐助基金的原来用意，把教会土地用于国家和世俗利益方面。在德意志，按照981年的兵員名册，队伍中有四分之三的兵員(在总数一千九百九十人中有一千四百八十二人)是从教会土地上招募来的。教会在1136年罗塞耳二世出征意大利时，提供了百分之七十四的武装部队。德意志国王赠給教会土地，来提高它的軍事效力，而这些贈与是附有这项条件的。由此可见，国王为什么要如此坚决地保持教职的委派权之原因；那是为控制教会的資源，包括人力和財力在內的最可靠的方法。

在这些条件下，教会的阶层組織越来越变为象封建組織般的軍事等級制了。巴斯噶二世在写给亨利五世的信里說：“在您的王国内，主教和住持如此专心于世俗事务；他們被迫常出入伯爵宫廷并充任軍职。祭坛上的祭司已成为朝廷上的公卿了”。在“男爵战争”时，康华尔·理查在給英国爱德华太子的信里写道：“看啦！德意志有着多么壮健和尚武的大主教。如果您在英国能培养出这一类的大主教，那对您來說，倒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情”。主教和住持施行了一种世俗主权，象他們在旧时的特权范围内长久施行过的权力那样。他們以教会和寺院的名义，賜給封邑、管理附庸、分配租地并控制农奴。与世俗封建主并肩成长着的，有一种由大主教和主教构成的宗教貴族，同时他們也是伯爵和男爵；还有大教堂的僧会和寺院，它們以团体的身份控制了大量的領地。那分封采邑的慣例，透入了宗教机构和职能的整个体系內。教会的土地、职务、祭坛、教士俸祿地和什一稅都已变为封建化。教会为了滿足封

建貴族的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常常不得不以它的土地分封給他們,来調整和他們的关系。在一个鉄血主义的时代,这样的安排办法,往往是相互有利的。主教和住持不会白白地給出;男爵們也不会白白地收受的。男爵可能威迫主教賜給封地,但他須服从那項封建契約,按这契約,附庸对他的宗主一定要服軍役义务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宗教民兵阶层,它在十字軍时代,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教会进一步深入封建体制了。教会的附庸和进款,被认为是属于王室軍事和財政資源的一部分,并被国王任意使用着。主教或住持(如果寺院是属于“王室的”)是国王的傀儡,恰象地方教士是他領主的走狗那样;教会阶层的行为已变得和世俗封建主的状况相同,即使不是和他們身分相同。主教和住持同公爵和伯爵在同一方式下并在同样大——甚至更大——的程度上应尽“輔助”〔封建援助〕的义务。

在中世紀时代,主教或住持領地連成一片的,即使有也很少。相反的,它是由大量分散的地块集合而成的;这些土地,是經過多年的時間,通过捐贈或购买的方式得来的,因而分散得很。整体的統一性不是在外形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主教或住持是这領地的业主,他的法律地位是由特权来保証的,就是,他不受任何世俗权力的管轄的。任何公爵或伯爵依法不得进入这个界限之內。这些土地,尽管是由碎块并合起来的,但构成了一个封閉的圈子。主教或住持,在他的領地之內,在这土地之上,是一个封建官吏。

在法律上和實踐上,这些宗教土地,都被看作一种特殊的男爵領。这是教会的看法,也是国家的看法;双方都不认为这种关系是不調和的或出乎常规的。空缺的主教座和空缺的寺院,都作为騎士的封邑来看待的。按照对俗人封邑的办法,国王在新旧两个任职者的中間时期,扣留那个宗教职位上所得的进款;新被委任者应繳付相等于世俗世界的一种“采邑相續稅”来取得任职的資格;教

会的土地和职位可以招人承包、分封或出售，完全象俗人财产那样。“在整个中世纪时代，教会僧职登用的一般方式，实际上就是付俸禄给任圣职的文官”。

教会社会象世俗社会那样，清楚地分成为上层与下层等级和独立和依附等级。上层等级，除了贵族出身者外，任何人照例不得参加的，而教区教士一般是从不自由的村民中来补充的。一个农奴教士，在接任圣职之前，须由领主给予正式释放。在第八和第九世纪，那些出身微贱的修道士大批涌入了寺院里；所以为了业主阶级的利益，就是说，“害怕田野变为荒蕪”，曾用立法方式来阻止这种趋势；路易虔敬者传记的作者德根慨叹那提拔农奴甚至只提拔到最低级的宗教阶层的办法。早在第九世纪，上层僧侣的贵族性质已显然可见。路易虔敬者为了委派一个农奴子厄波为理姆斯大主教曾遭受指摘。当鄂图二世提出出身微贱的奥里腊克的格貝特为教皇(西薇士德二世)的时候，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在亨利四世时代，奥斯那布律克的本諾二世，是唯一出身低微的德意志主教。在十世纪，爱好马匹与猎犬成癖的松斯的阿堪姆波德，曾把大礼拜堂内的祭坛迁移到户外的走廊里，而把教堂内部改为马棚和狗窠。据说，理姆斯的马拿西曾说过：“大主教的职位，如果不需要做弥撒，倒是一个好差事”。琅城的赫力南，“因为他出身于贫贱的家庭，他自知由于出身关系不会占有势力，乃把希望寄托在获得巨大财富方面”。有人反对圣得尼斯寺院的著名住持苏哲，理由是：他出身于卑贱的家庭里。匈牙利的貝拉在朝廷上曾拒绝接见一个主教，因为他出身于一个奴隶家庭。“德意志大批资料表明：在封建时代，教会中最重要的职位，照例几乎完全是由贵族出身的人充任的。主教和住持都是那个阶级中选拔出来的。只在中世纪后期，当附属的和不自自由的阶层的人员被准许参加教会要职的时候，这项独占性才开始被打破”。

中世紀教會的宗教權力和世俗權力的結合，雖然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多麼不適當，雖然它顯出和近代情況與理想是多麼不相容，但在封建時代卻是一件不可避免而又必要的事情。的確，這樣的結合是好的。因為任何偉大歷史性的制度，如果它不是反映時代的統治思想，如果它的組織不體現時代的慣例，是不會有什麼效果的。教會的職能，是在於領導而非在於尾隨，是在於指導和教訓；它是屬於它的時代的而要優於它的時代的；它應使用而不應濫用它所代表的文明；它為了社會的利益，應運用遺產、傳統和文化的本錢；關於這些，它是承受者或保藏者。教會的成功與教會的失敗，同樣和它的時代的制度與文明，息息相關的。弊病不在於正當使用時代的情勢，而在於濫用它們。對中世紀教會，作出批判，甚至作出嚴峻的判斷，是容易的。但要批判得公平，倒不是一件易事。因為公平的批判部分要依靠對錯綜組織和複雜文明兩者的清楚了解。應該永遠記牢：教會所面臨着一種情況，在許多方面是同它的理論和理想相抵觸的。

在這些世紀中，教會的性質，與其說反映在它所宣揚的教義上，不如說反映在它所擁有的組織上。那個組織，象中世紀時代任何其他的機構那樣已是徹頭徹尾地封建化了，徹底到使教會的基本職能與精神，到了十一世紀似乎已遭受破毀的威脅，因為物質的和世俗的事務長期凌駕了、而且終於不可容忍地壓制了精神本質的事情。誰懂得封建制度，誰就掌握着為理解喜爾得布蘭宗教改革運動中所牽涉的異常重大問題的關鍵了。

教會和世俗政府相同，是建立在土地基礎上的。僧侶的俸給，是從牧師俸祿地及其他的土地基金得來的。這些土地不是封邑，但它們漸漸依循封邑的習慣趨勢，而變為世襲。在這樣的一個時代，難以區別什麼是作為團體的教會所有人，什麼是作為個人的領俸給的僧侶，因為人們不按抽象的名詞，而按具體的名詞來思

維的。

在十一世紀，貴族日益侵占了教会的高級官职，不断发展的家族控制教堂职位和教堂財產往往形成了教堂职位和教堂土地的眞正世袭性，地方上的嫉忌和家庭間仇恨滲入宗教事件里，这一切情况都达到了高峰。維罗那的拉特，在十一世紀宣称：教堂职位的世袭性，在意大利几乎已是常态。1020年，本尼狄克八世在提斯諾會議上悲叹这项弊病的普遍流行。圣伯尔拿傳記的作者，在十二世紀說过：教士的結婚和教堂职位与教堂財產的世袭性在諾曼僧侶中間，已是普遍现象。

近代人是难于理解或認識到教会所面临着的危险的。

一个世袭的阶级就会建立起来，他們就会依法占有他們的教堂和土地……在一个局势未定而傾向已很明显的时代里，对教会來說，阻止象世袭占据俸祿地或私人占夺教堂財產这类的事情，乃成为它的非常重大的問題，所以，教会曾作出最大的努力来反对这些弊病。这项斗争延續了好几百年之久；而尊重僧权制的胜利，也許可认为是对我們文明的幸运……教会对它的成員应保有不可分割的权力已成为絕對必要的条件；应不让什么人类的情感来动摇他們对教会的忠誠心……教会的大量地产，应当保全并經常增加，作为教会的共有財產，并不得由于惧內或父子情感的关系而使之遭受不断的破損……在这方面，格列高里七世也許有一个隱蔽的动机来促进他的行动。他由于出身卑微，可能同情那使教会成为开放給农民与平民的唯一出路的民主因素……这一切都将化为烏有，如果由于僧侶結婚的合法化一般地产生了圣俸地世袭制，那使只有一般的共同利益的教会轉变为个别业主的一个特殊种姓……回头思索一下，我們更可清楚地看出：如果独身主义曾是一个有效的动力来为教会获得它所享有的无限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威，那么正是那項权力和那項权威，使独身主义成为对于文明的进步不无裨益的一个因素。

不难想象：教士会怎样选择具有政治性和足以提高地位的联姻；又因为財產的占有和圣俸的世袭会跟着准許結婚而来，一个宗教的种姓，由于把世俗的和宗教的权力联合到一个危险的过分程度，可能在欧洲重演了印度的婆罗門和首陀罗間的差別。可是，教会甚至在最貴族气派的封建时代所具有的特征是：它永远准許自力更生的人們进入教阶組織；这慣例是在几百年中对

人类平等原則之唯一的实际承认、^①

所以，为了阻止教堂财产的让与和教职的世袭，最可靠的、虽是最困难的方法是：禁止全部教士的結婚和創立一个独身的教士阶层。显然可见。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补救办法。可是，再引一个很卓越的历史家的話，“一个无偏见的学者，如果真正熟悉早期中世紀情况，会相信：僧侶的独身制度，在那个时候，在使宗教界与世俗分开、使教会純洁化和它对世俗的影响方面，是必要的；僧侶的独身制度，事实上是使欧洲社会宗教化的一个必要阶段。”^② 如果說羅馬教会今天还有正当理由来維持一个独身的教士阶层，那么，这样的做法，在封建制度时代，可有十倍更多的正当理由了。要了解独身的必要性和公众对这制度欢迎的原因，我們对中世紀的情况，必須有深刻的了解。“我們很难設想一种对近代文明的威胁类似十一世紀人們所遭受的那种危險，那种危險来自封建残暴，它藐視智力思考与憎恨道德約束。可是，只有經常想到这项危險的存在，才有可能来对中世紀教士所提出的剧烈补救办法作出公平的判断”。因为“只要当僧侶开始以宗教财产贈給他們的子孙的时候，教会的世俗财产就有被整个让出的危險；其次，一个結婚的僧侶阶层将自然地轉化为一个世袭等級，当它的地方权力增加以后，它很少願意再服从教皇的最高权力……格列高里七世可能是第一位能够認識到实行独身制对教廷权力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的教皇。不論他的前任教皇曾否象他一样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势，但从来沒有人爭論过：他們，或他們中的任何人，曾专心一志地要推广这寺院制度的理想的。”^③

十一和十二世紀教会如果在要求独身方面进行得緩慢些，溫

① 李亚：《僧侶的独身主义》，第三版，第1卷，第165、166、267—268頁。

② A. L. 斯密司：《中世紀的教会和国家》，第88頁。

③ S. R. 佩里納：《英国史导論》，第3章，第9—10节。

和些，就是說，把独身制的实行先从高級僧侶开始，逐漸推行到下級僧侶，直到使全体教士連教区教士在內都遵守它为止；同时也不使独身制有追溯既往的效力；这样，教会财产的让与和濫用之弊端，将会慢慢地縮減并終于消灭；这样的做法或許会是更聪明些。当时，也有賢明的教士，这样地考虑的，象英国朗夫兰克，他不去折磨教区僧侶，但禁止僧侶会會員娶妻；在这以后他拒絕授圣职給已婚的管事或僧侶；但他并不强制那些已結婚的僧侶离弃他們的妻子，也不誣蔑他們的妻子为姘妇，視他們子女为私生子。

但是，教廷和克伦尼派完全不願考虑这项緩和的政策，而采行了劇烈的方針；結果，僧侶阶层大致分为两个陣营：緩和派，即由主教領導的世俗僧侶，激烈派，即正規僧侶。这两个陣营之間的斗争既长久又激烈，因为两者各嫉忌对方的特权，各垂涎对方的政治势力，各貪图对方的財富。十一到十二世紀的教皇大多是修道士；他們玩弄这两派之間的矛盾，并根据情况，利用这派或那派反对国王与封建主，来压制世俗政权，到处建立教廷对国家的最高权。他們委派修道士接任主教空缺；指派正规的和世俗的僧侶會員替代大礼拜堂执事中已婚的僧侶；甚至教区教士也由僧侶来接替；为了这项明示的目的，取其位而代之，除非当地保护人坚决斗争要保持他的僧职授与权。安瑟伦的一项訓令里规定：“至于教士，如果能有过着正规的，也即独身的生活的人，就讓他們替代其他的人，就是，已結婚的教士。但是如果找不到或很少找到这样的人，应下令：在这段时期，修道士应为人民举行弥撒……这同一僧侶将代替已婚的教士接受懺悔和埋葬死者尸体。甚至对年高的僧侶，你也可这样地命令，直到已婚教士的这种頑固性屈服为止。倘使我們坚持那已开始的措施，時間也不会拖得长久的……如果那些被革除的人竟敢反抗，让全体基督徒反对他們；不仅把他們从他們自己的社会里擯除出去，而且从他們所占有的土地上連同他們女眷一

并擯除出去[!]直到他們覺悟過來為止”。我們雖承認教會政策的基本正確性，但無可否認：在實行喜爾得布藍的宗教改革里，曾產生很多不公平和不人道的行為；成千上萬的男人、女人和兒童曾遭受侮辱、虐待和社會放逐；正式妻子曾被宣布為姘婦而合法婚姻所生的子女被污蔑為私生子。

1059年，拉特藍會議第一次正式制訂了關於僧侶獨身的法律，並公布施行。這項法律，使財產有被迫交出的威脅，使教士家庭面臨着分裂的危險，使教士子女將蒙受橫加的臭名；這一切引起了反對的騷動。都靈、阿斯提、亞爾比、維瑟利、諾瓦拉和羅地各主教曾拒絕公布這命令。同時，倫巴城市尤其是在米蘭城的無產者，在一個煽動家叫做蘭杜爾夫領導下，開始了反對結婚教士的鼓動。

雖然在這些強暴而又激烈黨人中，有些人的目的是忠實的，但許多鼓動家是抱着可恥的自私自利動機的；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掠奪教士階層中那批不幸已結了婚的教士的財產。

共謀者利用了主教區內低級教士中間所存在的大量不滿情緒和平民對他們上司的輕視態度，很快在他們的周圍集結了一個人數眾多的黨派，主要包括低賤教士和暴民……蘭杜爾夫開始在街頭和廣場上活動，糾集烏合之眾，向他們大聲疾呼；他以最尖銳又最粗魯的譏諷詞句來攻擊大都會的僧侶……“沒收他們的財富，拍賣他們的財產；如果他們抗拒，應劫奪他們房屋；把他們和他們的私生子逐出城市”……當蘭杜爾夫正在城市鼓動烏合之眾的時候，阿利爾德忙於煽動鄉村居民來反對鄉村僧侶……一年之內……在倫巴城市的民眾中間，興起了一派新的清教改革家……這新黨派是以“帕塔立尼”(Patarini)出名的……據傳說，這個名字是從城市的一個街區得來的，在那里住着最貧困又最不滿的階層。^①

甚至在關於世俗或教會授職權問題的大鬥爭里，象在格列高里七世和亨利四世之間的衝突里，在亞歷山大三世和腓特烈一世

^① 格羅武德：《彼得大禮拜堂史》，第10卷，第178頁。

之間的冲突里，可以看到有很多經濟现象，关于这些现象，学者是很少懂得的。教廷之所以成为主权的一个条件，是教会占有庞大数量的地产；理解这一事实，对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所谓“授职权战争”里所争论的，是一个财产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统治权的问题。假使教会肯放弃它的封建岁入，它的世俗权力，教皇同皇帝及其他欧洲国王的和平，会是容易获得的。象阿柏拉德、布里西亚的亚諾尔和賴帕斯堡的澤霍这些敏锐的人在十二世紀就已經观察到这一点。甚至圣伯尔拿，尽管他对亚諾尔有着深仇宿怨，但抱着和他同一的意见：教会的大量财富是它的一个灾祸。中世紀教会象“新約全书”里所提到的某富人那样，因太富而不肯牺牲。

教会在封建制度传布之前好久，已占有了大量自由地。然而，在查理曼逝世后（814年）所贈給教会的土地，大部是属于封邑性质的。因此，如果教会真的实行了放弃政策，結果只会使教会土地縮减到它在路易虔誠者登极时所曾拥有的部分。这远不致伤了教会的心，因为甚至在早期，教会的地产，如上文所述，已經大得可观。所以，要求教会退出它的純粹封建領地，无疑是公平的，虽然要期待教会也放弃它的通行稅、市場权利，等等形式的财产，那在一个自然經濟时代，似乎走得太远了。正是这些进款的源流，使它能从中世紀早期的自然經濟里解放出来，并使它能够跟着时代的經濟变更而前进。問題不是一个教条的問題，而是一个实际利益的問題。封建国家的理由是：教会财产是教会按照封建条件并在封建条件之下获得的，所以教会必須执行服务来实现所承担的义务。教会的理由是：教会的财产是不能从它分离出去的，教会基金是教会的不可分割又不可分开的构成部分；教会财产是“獻給上帝的圣物”，任何其他权力不得使用它、控制它或把它移作別用的。

显然，这里在为宗教目的捐贈与为世俗目的捐贈之間，有着一

个差别,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产权和不同的条件。它們在理論上、法律上或事实上能够分开嗎? 十至十一世紀的教会,特别是德意志教会,曾接受大量土地贈与,条件是应对王室执行那些附着于土地上的封建义务。教会由于接受并利用封建制度因而承担了封建制度的义务。但格列高里的改革把世俗性和宗教性财产混为一谈,或可以說,巧妙地力图以漠視教会地产性质中的主要差别来規避它的世俗义务;这种差别是:部分教会财产,特别是早期的贈与,是为教会的合法維持經費,而后期的贈与大多是属于封建性和世俗性的。但喜尔得布蓝派却宣称:所有的教会财产都是属于宗教性的。

世俗政府认为:这样的一项解释到处是对它們的独立地位和它們的主权的一种挑衅;只有很牵强附会地可以說:那由于主教或住持的世俗性地产而行使的世俗授职权是“买卖圣职”或賄賂行为和政府对教会的威胁。凡是购买或使用教会的世俗性地产而不涉及什么供神事情的,不是买卖圣职的行为。在这样的一种交易中,神圣的职务不是或至少无须是交换的对象,因为一个俗人不能成为一个教士。教会内部的弊病,是由于它和封建制度合一化而产生的;所以,公平合理救济办法和打破僵局的出路,在于教会放弃它的世俗性地产。可是,教会因太富而不肯牺牲。它以下列論点作为辯护:宗教性和世俗性的贈与,是不可分割而又不可让与的組成部分。曾有两次提出建議:教会应放弃它的封建土地,就是,教会在查理曼逝世后(814年)按封建制度所获得的和保有的全部土地;但这建議两次遭到拒絕。教会回答說:不可能区别它的土地的种类,还爭辯說,这样的一种放弃,将是对一个伟大委托的叛卖,也是对“穷人的遺產”的牺牲。这是教会的誠实的話呢? 还是它的貪婪呢?

教会和政府之間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中世紀时代政

教分离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幻想者和梦想家才抱有这种思想；又因为教会拒绝接受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平等地位，相反，它企图以教会高于国家的原则来解决争端。在教会内部，逐渐成长了一个派系，他们急于不仅要建立教会的独立地位而且要建立教会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否认：皇帝的赠与曾附有条件；或教会曾同意和国家发生过这样的一种关系。这一党派把所有政府对教职的控制，都污蔑为“买卖圣职”行为，而他们看到：最容易达到他们目的的方法是否认世俗授职权的合法性。授职权战争，归根到底是为争取保护教会的控制权的冲突，而整个事件的根源，在于教会的世俗性财产。所以，这项斗争不是没有经济关系的。格列高里七世和他的后继者力图撤消教会和政府和社会的那种封建职务和义务，这些义务是跟着教会占有大量地产而自然地又合法地伴随而来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力图保持教会的土地。不管奥古斯丁的地面上“上帝国”之理想对格列高里所产生的影响多么重要，不管教廷的法律学家和策士所提出的论点如何，教廷永远不会企图把这些空洞而又抽象的愿望转变为现实的，如果教会的财产未曾激起教廷的野心并创造了机会的话。教皇和皇帝果然在其他的立场上进行斗争来解决问题；但他们间斗争的目的，大多在于财富与权力；就是在于土地。那在封建时代是体现财富与权力的主要形式。

格列高里七世在拥护教会对国家的至尊无上的地位上，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家。但毫无疑问，那个方式也可能给教会带来无限的物质扩张，给教廷带来巨大的政治特权。在这争执里，胜利既不属于教廷，也不属于国王。因为在这斗争里，教会世俗财产的控制权大都落在封建化的主教本人手里；他们成为宗教王公而把他们的主教区土地看作自己的封建财产。早在十二世纪，在德意志，我们看到主教已把属于他们主教座的土地叫做“我们的土地”。除了他们把宗教职位和世俗权力联在一起外，除了他们不得按世

袭原則移轉他們的职位和世俗财产外，中世紀欧洲的主教和当时的大貴族，是很少有什么差別的。

虽然授职权战争的价值与所牵涉的原則，甚至在今天的历史家中間，还是一个爭論的、意見分歧的問題，但无可置疑，教会在其他許多方面的改革，是具有进步性的。教会曾努力取締封建制度的弊病；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上帝和平”运动以及后来与此有关的“上帝休战”运动。“历史記載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以智斗力的胜利，象教士所赢得的胜利那样；他們处在混乱和战斗的时代，沒有物质力量可供指揮而只以人类灵魂和良心作为权力的基础，而能战胜了当时的凶狠战士。”^① 我們知道，私战是封建制度的一个最恶劣的残暴行为，它是从古代日耳曼族的“决斗权”里派生出来的。在封建时期，当国王的地位已被削弱到一个名义上的宗主地位因而沒有中央权力的时候，这私斗的慣例达到了高峰，所以下列爭执不是通过法院而是用当事人的宝剑来取得解决的：个人所受的損害或冤屈、关于财产要求的冲突、遺產的爭夺、附庸对宗主或宗主对附庸的或真或假的过错行为。而且，所有这些爭执的理由往往是为了进行强凌弱的卑鄙的自我扩张所采用的表面的借口而已。强盜男爵还干着这类勾当，如在公路上掠奪商人和香客；他們是以搶劫为生涯的。

然而，在私战里受害最深的人，却不是貴族，而是农民。誰也不需怜惜那些貴族；他們是依靠战争来自肥的，对他們來說，战争是一种英勇的表现；而且他們不时还欢迎战斗的。但是城堡里的妇女和孩子以及小販、旅行的商人或僧侶、香客，尤其是領主庄园上的农民，是在貴族的放肆私战里的无辜牺牲者。因为每一战斗員之第一項行动，是破坏他敌方的田舍和庄园。中世紀編年史关

^① 李亚：《宗教裁判所史》，第 一 卷，第 1 頁。

于这类例子，記載得很多。

这样的一种情况，不能无限地任其继续下去，要不然的话，封建欧洲的农民会遭受毁灭。所以，不足为奇，在十世纪——在十一世纪更多——我们也可看到，那些抗议和反抗封建庄园制里最恶劣祸害的迹象以及那些企图管理，即使不是取缔，最坏的弊病之行动，例如，最初所发动的“上帝和平”运动和后来所形成的更发展而更有效的限制，即“上帝休战”运动。可以作为中世纪教会的巨大功绩的是：它挺身而出，使用了它的宗教权力和它的世俗权力，双管齐下，来取缔私战暴动。关于这方面的初次提议，见于第九世纪，其时，政府大权正在旁落；查理曼的懦弱后嗣开始仰赖教会的支持。秃头查理曾使每个主教在主教区内成为一个钦差，每个教士在教区内成为一个警吏。驱逐盗匪出教，已经提到日程上。这同一法王曾要求他的附庸遵守“和平公约”，里面规定：贵族应宣誓取缔盗匪、放弃私人报复权、保护教会；这一切体现了维持法律秩序的原则。后来，由于王室的无力，教会被迫代它实行了这项原则。在九至十世纪，主教时常这样地使用了教会附庸。

但是使“上帝和平”之所以如此有意义、如此有重要性的是因为：虽然它是由教会倡议的但这运动确是一个自发的运动；它是符合于封建社会僧侣、贵族和农民各阶层的要求的；它使他们为了社会利益的共同事业而团结在一起。它反映封建制度下的集体精神和合作的社会觉醒；这种情绪非常强烈，以致当运动继续的时候，它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那存在于阶级之间的矛盾。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比它更好地表明封建制度的有机性和建设性；就是说，在封建制度里有着根本形成的力量，正在起着作用；这些力量，为了管理封建制度和在欧洲建立一种真正的封建政体，通过试验与错误，慢慢地摸索，但也获得了很大成功。这运动的倡议之所以落在教会身上，不是因为教会是那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受害者，而是因为

那些受灾难的无辜者和那些干着残暴行为的违法乱紀者，都是属于同一基督教社会的成員，而教会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领导者。教会的任务，是一个精神的任务、一个伦理的任务、一个社会的任务。所以，它比任何其他制度、比国家、比国王，更加重視了法律秩序与公平的原則、生命和财产的保护；而这一切是和每个政治社会分不开的。

所以，“上帝和平”的倡議，我們必須从两个观点来想象：从它所力图取締的实际暴行、斗争和不公平的观点来看；另从一个新的社会良心和新的社会觉醒发展的观点来看。教会所承担的，不是單純的警察权力。它是社会的领导。教会的真正伟大性，表现在后一项的地位上。它表达了一种新理想，它宣布了一项更好的法律原則和一种更高級的伦理，公布了关于一个非基于强权而基于公理、正义、法律保障、人身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的封建社会之理論。

这和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可表明它成长的各个不同的重要阶段。运动最先是在法国的极南地方，在沙魯（989年）、那旁（990年）和安斯（994年）的宗教會議上提出的；当时，它尚是一个純粹的宗教运动。決議宣布：教堂的财产，不得以对待好战俗人的财产方法来处理；违者处以咒逐处罰。在这里，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因为这类威胁早在第九世紀已經存在，但有一个新的特点，就是对那些劫夺穷人和农民的财产的人也予以咒逐。所以，教会在运动的最早阶段，未曾禁止私战，但它企图保护它的财产和各地的农民，使之不做这类斗争的牺牲品。于是，教会創造了一种受到特殊保护的阶级的范畴。它坚持：无以自卫的农民，尽管柔弱，但在法律面前尚有权利，对于这些权利，貴族尽管橫暴，必須予以尊重。下面是波未的主教在1023年所要求的誓詞的一个典范：

我决不帶走公牛或母牛或任何其他牲畜；我决不捕捉农民或商人；我决

不从他們那里拿取分文；也不迫使他們付贖身金；我不願使他們由于他們的領主所进行的战争，而丧失他們的貨物；我也决不毆打他們来获得他們的食物。我决不从牧場捕捉馬、騾和駒；我决不破坏或焚燒他們的房屋；我决不借口战争連根拔出他們的葡萄藤或收集他們的葡萄；我决不破坏磨坊，也决不拿走那里的面粉，除非它們在我的土地上，或者除非我是正在服軍役。

但即使认为教会在封建世界里最充分地代表并表达了进步性的輿論，下列說法也是夸张的：这样的观念是完全由于教会的創造。关于这方面，俗人中的优秀分子也有一些貢獻，甚至群众的意見也不是一成不变，象一般所設想的那樣。因为在不久之后，俗人包括貴族和不自由人，紛紛参加运动来制止私战。男爵阶层本身也开始觉得战斗的禍害，自願放弃它并阻止別人使用它。除教会处罰的威胁外，另加上有形的強制力。这项新运动最初出现于阿奎丹，后来从那里传入了勃艮第（1016年）。法王罗柏特在1025年領導了这运动；因而它不久遍布于整个中部和北部法国，它越来越变为确定，越来越成为一种肯定的制度。和平兄弟会組織起来了。与此同时，制裁办法也变为更加严厉。除單純的驅逐出教外，另加上停止宗教仪式的处罰（1038年布尔日宗教會議的决定）；那是一种宗教“罢工”，即停止全部教会职务直到犯罪者屈服为止。采用这种激烈办法，正是表明輿論的力量，因为輿論的压力毕竟和畏惧教会的心理同样迫使犯罪者向“和平”屈服。

在这时期，“上帝和平”在精神和組織两方面，都經受了深刻的改变并轉化为一种远更有效的制度，即“上帝休战”。我們看到：“有一种有意識的努力，要从周围的斗争范围内按一般界說划出一个和平的范围，因此，现在和平本身为了自己的緣故，成为所追求的目标”。因为在“上帝和平”运动里，两项弱点已变为明显：它沒有国法的支持；对私战的行动，沒有加上時間的限制——一个男爵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日子里可以进行私战。其次，这禁令只适用于

教士、教會財產和農民方面。但是，我們看到，1027年在魯息雍的厄爾因會議上第一次所公布的“上帝休戰”則不然：它規定了每周的某某日子和每年的某某季節作為“禁期”，就是說，在這時期內的私戰作為非法論。與此同時，世俗武力加入了運動，來支援並加強制裁。顯然，這種新方式比起舊方式來是更徹底的限制政策。“上帝休戰”是兼有宗教性的和政治性的運動。在有些地方上，群眾對“上帝休戰”的支持是有著一種“野外集會”^①復興之社會心理特徵。例如，在十二世紀後期，在基恩，有一木匠宣布：耶穌和聖母出現在他面前，並命令他在一切人們中間宣傳和平。在這些地方性的和平團體中，譜伊的團體表現出有組織的性質和獻身於神的思想，在那里僧侶和男爵組成了一個會社，叫做“上帝兄弟會”。象早期的“和平”運動一樣，“休戰”運動傳布得很快，在十一世紀後半期，宗教大會和宗教會議一次接一次地宣布它為普遍法。甚至在這時期之前，“休戰”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已經宣布。在英國，諾曼國王始終是有力量的；在那里，“休戰”從來沒有公布過，因為從來沒有需要過它。

可玩味地指出：“和平”運動和“休戰”運動繼續發展為一種制度的過程。起初，只有僧侶和農民特別是婦女與孩子的人身和財產，被宣布為不可侵犯的；後來，商人和旅客以及他們的財產也包括在內；制裁兼有宗教的和世俗的兩種性質，甚至包括流放或驅逐出境和沒收財產；“禁日”起初只在受難周^②的三天（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後來擴展為從星期三的日沒時至星期一的日出時為止；“禁季”起初只在四旬齋時期^③，後來它包括從四旬齋的開始到復活節後的星期日這一時期；再後它延續到降靈節之一周間；最後

① 即從事於祈禱或說教等的集會。——譯者

② 耶穌復活節前之一星期。——譯者

③ 復活節前四十日間的大齋，紀念基督在荒野的禁食。——譯者

延續到圣約翰节(6月24日)。同样,因为播种季节受到保护,所以谷物和葡萄收获季节也受保护,因而从圣母升天祭节(8月15日)到圣馬丁节(11月11日)之时期的私战,也作为非法論。总括起来,对一个强暴的男爵,只有留下最炎热的夏季和最寒冷的冬季,作为战斗的日子。在这些变更的同一时期,那取締私战的立法漸变为一种法典——条文从三条增加到八条、到十条、到十四条、到十九条,等等,而且除盜劫外,其他形式的罪行,也被列入;例如,制造或使用伪币,接受赃物,隱匿罪犯和逃犯。

教会这样剧烈地扩展警察权,不是沒有碰到抗議的,因为那是潜夺世俗王公和国家的特权的行為。連有些教士也提出了抗議說:这是不属于教会范围内的事情,教会行使警察权,将使它和世俗世界混淆不清,使它世俗化并使它道德墮落。在这种反对意見里,当然包含着正确性,但論点是教条性多于现实性的,因为在封建时代的最艰难时期,教会和社会都面临着一种现实情况,使它們不能听从理論的反对声。情势太现实了。在爭論中的問題自行解决了。在十二世紀,“休战”的立法轉化为格累西安的“命令”,轉化为教会法,轉化为国王和皇帝的法令。它成为欧洲的国内法,并繼續有效,直到在民族王国組成以后,它們有效力的行政制度使它成为过了时的东西。当近代政府和近代国家出现以后,单单国家的法律已有充分的力量来維持法律秩序。

还应注意:十一世紀中新的社会和团体精神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当时,欧洲存在着从来未曾有过的那样普遍活跃情况。在这类集体精神的现象中間,除了“上帝休战”以外,我們还可看到下列事件:团体往著名神殿去进香的习惯、圣迹崇拜、封建主等級內武俠精神的开始表现、行会和兄弟会的組織、宗教复兴运动;后者往往終于形成了异端教派。

在这些群众团体精神的表现中間,最为有趣的,是建造新教堂

的狂热——我們可称之为精神病。这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可說明在整个中世紀时代社会心理方面的情感主义的。建造这些新的更华丽的教堂建筑物，是与欧洲这种社会觉醒和这种新的权力感同时出現的，而这种权力感反映在建立更好的政府、更好的法律，反映在宗教和社会的新理想的形成。所有这些现象，在跟第九和十世紀的衰敗与混乱状态而来的恢复与复兴的世紀里，都集在一起，乃成为整个局势的各部分。

在这建造教堂的浪潮横扫欧洲之前，很多教堂，甚至大教堂和大礼拜堂，也是用木造的，或至少屋架大多是用木造的。在这些建筑物中，很少有玻璃窗或沒有玻璃窗的。顏色紋玻璃时代尚未来临，因而用油漆麻布来遮盖窗口。許多教堂的地沒有鋪，或只在唱歌台或祭坛周围鋪着石子。很多教区教堂，是不牢固的木头建筑物；有着硬泥地，这些教堂内部既潮湿又阴暗，又容易遭受火灾。的确，在几百年时期內，欧洲几乎每一所大教堂曾遭受过一次火灾，还有許多教堂曾遭受过多次火灾。

于是，新的宗教复兴运动风起云涌于意大利，越阿尔卑斯山而冲入了萊茵兰、法国、法兰德斯及英国南部，欧洲的羅馬式建筑术首当其冲就誕生了。新建筑物是用石块造成的，物料坚固，形式美观，还用更多艺术品来裝飾着。其次，(附带說)它們也表现出工业技巧和技术上的进步。这些新的洁白的石头建筑物，在十一世紀前半期的短短几年之內，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現，尤其是在北法，所以，一个有艺术感的勃艮第高僧，以美丽的詞藻来描写它們說：人們会以为，上帝下降白雪于教会的地面上了。說得很对：它們是“和平的来临与敬神的精神之表象”——“上帝和平”现在被賦予了真实的体现。关于許多这些早期羅馬式教堂的图样，是由意大利建筑家繪制的；并从意大利輸入了砍石工和石匠来建造它們。科摩的这类工人，是欧洲最为著名的工人。当时，欧洲不断激增的財

富，大量挥霍于教堂的装潢方面：例如，壁画、油漆、雕刻、刻花屏风、祭坛、精制的金银器皿。彩色云石，甚至旧罗马会议厅上的整个圆柱，从意大利输入；用以制青铜的锡，从英国输入；铅，从西班牙输入；宝石，从东方输入。虽然总的外表是罗马式的建筑，虽然有若干式样占着主要地位，可是在布局上还有很大的自由。建筑师们争先恐后来表现其独出心裁之处。地方的条件，如可以获得的石头种类，也促成了式样的不同。在奥芬涅，当地所产的彩色石，使那里的教堂具有特殊的地方风格。法匡各省和莱茵兰在建筑细节上所存在的相异之处，是和它们在方言上所存在的差别相仿佛的。

新的宗教热忱十分强烈，所以它促进了社会上一切阶层，不分等级，都齐心协力地为宗教的目的而努力。贵族和农民、农奴和自由人，为了社会的共同目的，并肩劳动；在整个运动之上还笼罩着教会的灿烂外衣。有许多例证，可表明整个村庄或社会参加运动，包括教士和俗人、农民和贵族、男人和女人。在一块地方上建筑师和别块地方上建筑师之间，在这里的教堂和那里的教堂之间，在此处的寺院和那处的寺院之间，有着真正的竞争。为了提早完成工程，群众自愿担任了劳役。教士还进行布道来激发积极性；于是富人和穷人的捐赠，如雪片飞来了。请求支援的传单，到处散发；关于工人的奇迹和故事也辗转传述；例如工人从鹰架上跌下而被神奇地救出；此外，给建筑人员的犒赏金也往往是很大的。

我们幸运地还有十一世纪保存下来的几封信，它们生动地描写这种建造教堂的热忱。在沙脱尔，热情达到了这样的强烈程度；竟至采用了十字军的形式。卢昂的大主教曾目击这项运动，在写给他的朋友亚眠的主教一封信里，他描述它说：

沙脱尔的居民已联合起来，以运输物料来帮助他们的教堂建造……在这以后，我们主教区及其他邻近地区的信徒，为了这同一目的，也组成了团体：

他們只准已經懺悔過的人加入組織……他們推選一個隊長，在他的指揮之下，他們沉默而謙遜地拉着他們的運貨車。誰曾看到過這樣的情況呢？誰曾在過去時期聽到過這樣的情況呢？就是說，世俗世界上有勢力的王公們、富貴家庭里出身的人們、男女貴族們，彎下他們驕傲的頭頸，套上運貨車的繩索；他們象馱獸那樣，拖着這些滿載着葡萄酒、谷物、油脂、石頭、木材以及一切為建造教堂所必需的東西的貨車，走向基督的駐所……他們沉默地前行，一句怨言也沒有……當他們停息在路上的時候，沒有什麼聲音，可以聽到，除了懺悔罪孽聲和純潔的祈禱聲之外……當他們達到了教堂以後，他們排列車輛於教堂的周圍，象一個宗教營那樣，而在整個夜里，他們唱着贊美詩和《雅歌》^①來歌頌守夜。在每部車輛上，他們點着蠟燭。

甚至那些拖曳石塊和木材的老牛有時也被拉入一種伙伴的關係中。當郕城大禮拜堂落成時，那些有感激心的群眾在兩座大塔中的每座塔內建立了四只大型石牛，來對不會說話的役畜表示感謝；因為它們在這功績中盡了它們的一份責任；這八只石牛，至今還屹立，了望四方，俯瞰那動人的中世紀山上舊城市下面的平原。

當哥特式建築術開始接替羅馬式的時候，我們看到，在所僱傭的手工業者的身分方面，已發生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變更。在這以前，其中大部人，除了由意大利輸入的石匠之外，是處在奴隸的地位。但到了十二世紀，有技巧的手藝人大多已變為自由的手工業者，並已組成行會。所以，農奴的釋放和他們社會地位的提高，是跟着這宗教復興運動而來的。庫栖·勒·沙托的大城堡，在它毀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有趣地保存了關於這項社會發展的資料。這宏偉的石頭建築物，是法國屬於同一類型的最大建築物，正在農奴制流行的時代，開始建造。石頭的下層是由農奴鋪設的，但因為城堡的建造歷時在百年以上，當上層開始鋪設的時候，石匠、砍石工，等等已變為自由人，並已組成行會；這些上層保存了屬於這些行會的石匠的標志或圖章。在許多哥特式的大禮拜堂里也可

^① 《雅歌》系《舊約聖經》中之一卷。——譯者

找到类似的工人标志。

在当时的著名建筑师中间有：印革尔柏、基約姆·得·貝郎、路易·得·波堡、爱蒙及坎特布里大礼堂的建筑师基約姆·得·松斯。这些建筑师签订契約，提出图样，常与别的建筑师相竞争，并督造工程。有时，几个建筑师被召集来一起磋商什么是最好的进行程序。建筑师漫游各地并到处传布他們的建筑思想。他們領收全部付款，并轉过来付給他們所雇佣的人們。据記載，五呎高度，作价五百苏里德。工資是以衣服、住宿、火食和现款来支付的。合同上規定每周、每月或每年付款的办法。建筑师保証他工程的完成。在完成某一部分重要工程如一座塔楼或屋頂之后，他們举行欢宴和娱乐。

一所中世紀大礼拜堂，是一个城市的市民自豪的对象，也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社会企业，在这里所有的社会各階級以及各种地位的人們都是感觉兴趣的，無論在精神上，或在捐助它的建造費用上。至于較小规模建筑物，下至矮小的教区教堂，也是这样。因为教堂是当地社会中的最大而又最好的建筑物，又是一所大家都有一份和共同的利益的建筑物，所以它用于許多世俗目的方面。在战争时期，村民——他們自己、他們的牲畜及他們的眷屬——到那里避难。在和平时期它是社会的和貿易的中心。在私战的黑暗而血腥的日子里，在一个安定的封建政府确立之前，旅行商人和流动小販設立他們貨攤于教堂的門廊之內；他們有时并陈列他們的貨物于墓地內的平面坟上。后来，当局势变为安靖的时候，市場散布在教堂前面的廣場上，甚至在貿易和商业的經營已变为很安全，而不再需要教会保护之后，市場十字标还保存了对早期情况的追忆。有时，当地的度量衡刻在教堂的牆壁上，使大众周知，象在弗賴堡大礼拜堂牆上的那样，在那里人們今天还可看到所規定的丈尺和面包的大小。

中世紀時代的人們對於教堂的使用比起我們近代人有着更大的——也許更寬的——想法。磨谷和釀酒有時在教堂內進行，冬季食糧和干草，儲藏在那里；葡萄酒和啤酒桶也存放在那里。米蘭城市當局征用聖安布洛喬教堂會議廳的走廊，作為堆儲穀物之所。早在1022年，布里西亞城使用大禮拜堂作為地方上的公共集會之所。在慶祝節日，假面劇和宗教劇，在教堂演出。在一個只有最粗俗的藝術和音樂，沒有世俗藝術、沒有世俗音樂的世界裡，大禮拜堂中的壁畫、花玻璃、音樂、燈盞和蠟燭的亮光、教士袍服的顏色（這些顏色按時間和場合，有所不同）和焚香的氣味，給人們以情感上和審美的享受。

的確，外界侵入教堂引起了煩擾和濫用的情況。封建領主常常在他們教堂的座席上，辦理當地的事務。金雀花朝亨利埋怨說，請願者“甚至在做弥撒時也對朕煩擾”。斯特拉斯堡市長在做禮拜時，經常在城市教堂的座席上，听取訴訟；聖路易的行動被認為是適當的，就是，在做神聖禮拜式時，他拒絕辦理行政事務。但儘管有這些弊端，必須承認：中世紀教會，曾使它的建築物社會化，使它的宗教人道化，而同時還保存了崇拜的尊嚴和神秘性。羅馬教會一直顯出一種明顯而又深刻的心理和社會意識；但從來沒有比1000年到1300年這些光輝的世紀中表現得更突出；在那個時期，教會的偉大又有創造性的物質與道德文化達到了高峰。

可是，教會雖然這樣地改變了世俗封建制度中所存在的暴行或緩和了其中很多積弊，但由於教會本身也是一個封建化的機構，它的內部也滋長着暴行和弊端。特權保護了教會財產，不僅保護那些正式用於宗教目的的方面的土地而且保護教會的全部土地；因此，為維持政府的開支又以另一種負擔加在世俗社會頭上。教會對它從世俗政府所受到的警察保護是不付給什麼酬報的。可是，教會的免稅土地占着中世紀歐洲全部地產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

一。“死手”即“永久管业”，可说明政府为什么反对教会的理由。教会是一个永久存在的法团；它永远不死，所以，凡是一旦转入教会手里的土地，是永远不会变更它的产权的，因而政府被剥夺了这方面的遗产税。在帕得波綸的主教《迈威克传》里，有一段轶事告诉我们说，甚至圣洁的皇帝亨利二世也能使用尖锐词句来攻击“死手”的弊病的。薩克森的主教們不倦地向皇帝申請土地的贈与；有一次他大声指責迈威克說：“願上帝和他所有的圣徒使你感到羞愧，因为你永远不停地夺取朕的地产，使朕蒙受严重的損失，使政府遭受巨大的損害”。到了十三世紀，“死手”的恶劣影响变为很大，以致政府采用立法来限制这项慣例。在十二世紀，貴族时常激烈地攻击教堂的财产；那不仅表明业主阶级的嫉忌心理，而且証明宗教财产已达到凌駕世俗财产的危險程度。在授职权战争时期，有一个反教廷的教士对教皇烏尔班二世的貪求世俗財富进行攻击；他的諷刺文章里包含着可怕的嘲弄。

在这非封建时代，需要一种想象力来認識中世紀教会怎样深刻地封建化的情况。它的世俗财产对僧侶所赋予的权利和权力，在类型上和程度上完全和那些附着于世俗領地的权利与权力相类似，甚至推广到生杀之权。它所征的賦稅兼有世俗的和宗教的两种性质。这种賦稅和封建主所征的賦稅，沒有絲毫不同之点。因为世俗土地和世俗官职已經封建化，所以，教堂教职和教堂土地，也有被看作封邑的傾向。格列高里七世曾徒劳地企图把主教官职和主教土地改为从教皇座所得来的封邑。在1139年拉特藍會議上，英諾森二世的确曾宣布：所有宗教高級职位作为得之于教皇和属于教皇的封邑。

可是，教会虽然已分成不同的教职阶级，尽管它的高級僧侶大多是从封建主中間来补充的，但有两种慣例，使教会不致成为一种完全的貴族制度，象封建社会那样。第一，独身制度阻止了僧侶成

为一个世袭的等級；其次，教会又是一向实行那可以称为“选择的民主”的。极为賢明的是，教会的尊荣职位始終是开放給有才能的人，不管他的出身或社会地位如何。羅馬教会历来相信机会平等的民主。羅馬教会历来是重視功績的。

教会提供了唯一向各个不同等級和地位的人們都开放的出路。在封建制度严密规定的等級区别下，对于非出身于貴族血統的家族的人來說，几乎不可能是有升迁的机会的。在教会里，虽然等級和家族的关系很有助于提升高級地位，可是一个人只要有才能和毅力，尽管他出身微賤，历来是能够脫穎而出的。烏尔班二世和哈德良四世都是出身于最微賤的家庭，亚历山大五世曾是一个討飯的孩子；格列高里七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息克斯塔斯四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烏尔班四世和約翰二十二世都是鞋匠的儿子；本尼狄克十一和息克斯塔斯五世都是牧人的儿子……这样看来，教会的队伍經常是以新血液来补充的。^①

中世紀教会是一个封建化的教会；它是处在封建世界里并属于封建世界的。但它从来不象懶汉般地照样接受它所看到的现状的。它从来不願让事情自流；它也从来不消极地容忍它本身內或世俗社会里的弊病和腐敗情况的。它在极大的程度上，具有领导的品质和倡議改革的力量。它以伟大的勇气和勤劳——虽然它的言行不一定相符合的——竭力要造成一个更好的封建欧洲，竭力要糾正封建政府和封建社会的缺点、暴行和弊病。它果然未曾企图推翻封建制度，但它力求管理封建制度；它想要从旧传统和旧慣例里建立一种“新”的封建制度。就它努力建立一种更好封建制度之建設性意义來說，它往往是反封建的。有很多例子，可資說明：教会力图鏟除古代日耳曼人的血緣复仇习惯，就是亲族以私人复仇行为来替眞实的或虛伪的受害者或受冤曲者进行报复的权利；撤消“司法决斗”和使用热火或沸水的上帝裁判法；除去封建监护

① 李亚：《宗教裁判所史》第1卷，第4頁。

权上的舞弊，就是由宗主监护一个附庸的寡妇孤儿，结果，监护人往往把被监护者的遗产吞没或消耗了；减少财产对夫妇关系的难忍的残暴统治，及封建家庭所安排的畸形的婚姻对家庭制度的败坏，例如，为了财产的原因，少女嫁给老翁或青年讨娶老妇。另一例子是：教会在德意志为了反对“接受”罗马法所进行的斗争（虽然那是在十五世纪，后于我们所讲的时期）；它的目的是要保护农民免受那庄园制度甚至在它的最坏时期从未有过的残酷剥削。“教会法，虽属于罗马法的范畴，但具有基督教的精神；它不可估量地更符合于日耳曼人基督教化的习惯法”。从历史上看，古代日耳曼法典是一个自由民的产物，而罗马法却是一个奴隶国家的创造物。

中世纪教会，在范围上如此普遍，在权力上如此独特，在利益上如此复杂；所以它包含着一大堆矛盾：有的是真实的，有的仅是表面的；它是宗教的，也是世俗的；封建的，也是反封建的；贵族的，也是民主的。教会在它管理社会方面，有时越出了习俗的社会立法而刺入事物的核心。教会虽然保存了封建制度并从封建制度获得了利益，但它有时却力求严峻地管制它，有时还明显地力求破坏它的完整性。关于这类政策的动机问题，是不一定容易解决的：它是为了一个真正道德的目的而行动呢？还是在扬言它的行动的道德目的或崇高的社会目的时，它是出于争权夺利的野心而行动呢？

有关的事例，是教会反对长子继承法。那是为了社会公平，就是使诸儿子获得土地的平均分配而进行呢？还是为了以分散大封建世家的遗产来打破它们的权力呢？同样，教会反对世袭君主制而赞助选举君主制，那是为了民众主权呢？还是为了使世俗权力屈服于宗教威力呢？格列高里七世支持反对亨利四世的封建主的叛乱和萨克森人的起事，那是因为他相信他们的主张合乎社会正义呢？还是因为他想要挫折他的敌人呢？教会拥护妇女继承封邑权，即女系的继承权，就是关于女伯爵马替尔达和公爵罗塞耳在多

斯加納和薩克森的繼承問題，那是因為它相信按正義婦女應和男人享有平等的財產權呢？還是因為它要改變男人對封建政府和財產的獨占控制權來打破封建主的勢力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剛剛引述的兩個事例里，教會曾立即並大量地獲得了利益。教會說，世俗法院多半是不公平並在它們的審判里有着賄賂行為，所以它堅持它的法院在很多案件中應作為上訴法院，而擁有最後的判決權，那是為了公道的利益呢？還是為了要削弱世俗政府的權力並增加教會訴訟費的收入呢？

不論這些政策的理由如何，教會有時在打破習慣法和推翻傳統方面，是很激烈的。例如，封建法律不僅支持長子繼承，而且也贊助家族之間的聯姻，以求防止封邑的分裂和分散，來使大家族的權力和財富盡量保持得完整不散。因此常常有着血緣親屬間的婚姻。但在1066年教會譴責了羅馬民法關於血緣方面之幾百年來的舊慣例，並建立了近親不得結婚的新條例。凡是按照民法方式推算親屬關係的結婚，將被宣布為亂倫；結婚儀式無效。民法上所規定的第二、第四和第六等親，改為第一、第二和第三等親；在這些範圍內的結婚概被禁止的。甚至宗教上的親緣，也是一個阻礙：就是，教父和教母^①和他們的子女之間的關係，也被認為屬於教會法禁止結婚範圍內的親屬關係。其次，教會主張：男女的結婚使他們婚前所生的子女變為合法。在封建主方面，他們為了維持家族土地的完整，堅持保存這種區別；因而憎惡私生子的合法化。

教會所作的這些變革是為了促進社會道德，要保護家庭的純潔，要防止城堡和莊園內同族繁殖呢？還是要分裂大貴族的家庭呢？還是要使解除婚約，在屬必要時，易于實現呢？又如教會通過赦免可放棄教會法的執行以得酬費，它的動機是牟利呢？還是教

^① 洗禮的擔保人；在兒童洗禮時，除為小兒命名教名之外，還代其父母擔保小兒之宗教教育者。——譯者

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政治上增加干涉社会的机会呢？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肯定的回答。但事实总是：教会倡议了很多有深远影响的社会性的立法，而这种立法的效果是深刻的。

教会的影响，似可說通过一种社会腐蚀的过程，渐把大封建家族打破，甚至把它們毁灭了。当一个家庭成员进入教会之后，家庭除在社会地位以外，一向是受到损害的；有时在它的延續方面受到致命的打击。当德意志皇帝亨利二世的唯一的弟兄成为奥格斯堡的主教以后，薩克森皇族是注定要灭絕的，因为皇帝本人是无嗣的。据必然不完全然而很重要的計算，有人估計：在中世紀德意志，于三百年的期間，百分之十二的王公家族、百分之三十六的伯爵家族、百分之八十的小貴族家族，因为它們的很多子弟加入了宗教团体而本家不得延續。这种效果，象一种节制生育的形式那样，終于使許多封建望族实际灭絕。

但从这种傾向和情况里还有其他效果产生出来。如上所述，在九和十世紀，封建主由于他們和高級僧侶之間的产业利益的联系，开始垄断了教会的高級职位。主教职位已經貴族化了。但从十一世紀起，可以看到，在主教中間漸多微賤出身的人們。封建貴族对于教会的高級职位第一次丧失了它的垄断地位，后来甚至还丧失了它对这些职位的优越控制地位。喜尔得布兰的改革运动，以对世俗授职权、保护权和推荐教堂教士的世俗权所进行的打击，又以在使僧职授予权脫离土地所有权方面所作的努力，促进了教会的这种民主化；由此而产生的效果当然有助于教会获得民众的欢迎，也有助于教会对貴族的抗衡力量。在十二和十三世紀新寺院团象息斯脫西安派、卡德西安派、普勒孟斯特派，尤其是多米尼克派和法兰西斯派托鉢僧，几乎完全是从平民队伍中来补充人員的，同时，在主教中間也越来越多地显出了这样的情况。当时，教会感受了一种社会革命，象全欧洲所感受的那样。所以，教会在这方

面的日益民主化正是在农奴制的衰落与城市的兴起的同一时期；那不是偶然的。

可是，怪得很，当教会跟上当时代的大多自由化趋势，甚至走在这种趋势前面的时候，当教会日益把它高級职位的大門开放給出身于平民的人們的时候，它对农奴制本身，依然是保守的，以至达到反动的地步。約在 1100 年时，煩瑣学派的創始人安瑟伦以下列一段話来表述关于世袭农奴制的正宗理論；这一理論常获得后来作家的同意：

因为如果有任何人和他的妻子……曾共同犯了一种凶恶而不可饒恕的罪过，又如果他們已为此被公平地降低身分而淪为农奴，誰会主张：他們在他們的定罪之后所生的子女，不应属于同一的奴役身份呢？

中世紀时代的教会从来未曾反对过当时代的奴隶貿易。它所提出的抗議——甚至在那个时候，也常常是一种表面文章而非出于一种眞意——只是反对販卖基督教俘虏到穆罕默德教国家去。它未曾反对过出售异教丹麦人和斯拉夫人为奴隶——在易北河外大战役之后数以千計的汶德人俘虏被分配給德意志寺院之間；在西班牙、科西嘉、撒地尼亚、西西里以及在海上的摩尔战争里所捕获的俘虏，不仅被售給俗人而也被售給基督教僧侶主人。在十一世紀及以后，在意大利的教会土地上，甚至在教皇国内也存在着作为动产的奴隶制度。

关于释放农奴方面，教会落后于世俗欧洲，甚至推迟了释放。教会最少屈服于經濟革命的压力，因而它比起俗人业主更不願意释放它領地上的农奴。撒尔微密尼的下列发现，是具有巨大意义的：1286 年 8 月 6 日关于取消农奴的佛罗伦薩命令是由于佛罗伦薩僧侶会的几个农奴請願之直接后果；他們請求不要把他們售給烏巴尔第尼人，理由是：那将有害于城市公社，因为它将失掉取得請願者的人身服务和金錢捐獻。这一事件可証明教会之所以取

消灭农奴制，是由于实际的理由，而不是由于什么人类自然权利的理论。

整个说来，教会土地比世俗土地管理得更精明、更有效，但关于教会土地上农奴的情况较少困难而他們所得到的待遇較人道主义这种常常听到的說法，則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因为在十三世紀之前，所有的历史家都是教士——即在这一世紀其中大部还是教士——对于他們的記載，必須謹慎使用，因為他們当然不会說不利于己的或不利于他們僧团的話。所以，我們必須以保留态度来看待他們所宣揚的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凡是熟悉十二世紀史料的人，都不会相信克伦尼寺院的住持彼得可敬人(死于 1156 年)所說的假仁假义的話；他說：克伦尼寺院的僧侶們“把男女农奴看作弟兄姊妹一样”。因为克伦尼寺院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貴族的又是排他性的寺院团；凡是非貴族出身的人休想得成为它的成員的。从仔細研究寺院的紀录所得出的結論是：教会土地上的农奴所处的境遇不会优于世俗土地上的农奴。而且我們有理由相信：总的說，他們的命运更糟糕。圣柏納寺院的《奇迹录》，表明了农奴所遭遇的可怕的貧困和艰难状况，虽然所記的可能是一个极端情况。教会对人类灵魂行使統治权这一事实，就教会土地上农民的經濟状况言，沒有說明了什么东西。在解放奴隶和释放农奴方面，教会是社会中最保守的分子。几乎所有大批解放农奴的事件，是由世俗領主而不是由宗教領主所做的。找不到例子可說明寺院曾释放过大批农奴。的确，教会法曾禁止奴隶或农奴的解放，除非給予教会因此受到的損失以补偿。在第九世紀，斯馬拉格达斯曾根据人类平等的理由拥护农奴的解放，但他所說的話，只是一种表面文章。一般說，教会是反对农奴解放，而竭力要拖延农奴制的。凡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中世紀史专家一定会同意故教授阿岐尔·卢察尔的論断；我們沒有比他更高的历史权威可以援引。他在他研究过

程的早期，原是相信旧傳說的，只在經過更深刻而長久的研究史料之後，他才不得不改變了他的主張，所以，他的意見愈加可以相信。下面引述他所精心寫作的一段文字，來表明他成熟的結論：

在中世紀時代，教士對待農民與市民的殘暴行為，幾乎和世俗貴族相同。事實上，封建概念在教士階層所組成的教會里流行着。有特權的宗教貴族的思想與行動占着統治地位。這種宗教貴族，即大量土地和無數男女農奴的所有人，是封建制度中的一個構成部分。他們力圖保護他們的權利與進款；他們以非常殘忍的手段來捍衛這些；而且更加容易做到，因為教會的土地是不可讓與的。他們對下層階級進行苛重剝削。迄今還沒有人能夠證明：教會的農奴比世俗領主的農奴生活得好些；絕對正確的是：教會對農奴的束縛比世俗貴族和國王對他們的束縛維持得更長久。甚至可以看到，有些僧侶竟主張農奴制不僅是必要的和合法的制度，而且是一種神命的制度。^①

同樣，朴洛克和麥特蘭，也嚴厲地譴責了教會領主特別是僧侶領主；他們的判斷幾乎是無可反駁的，因為再也沒有兩個學者象他們那樣精密，那樣富有科學精神：

現有大量資料可說明：在一切領主中，宗教機關是最殘酷的領主——它們不是壓迫最重的，但是對自己的權利是緊握不放的領主；它們專心於維持一種純粹農奴的租地制和農奴的人身關係。那不死而無靈魂的法團〔指教會〕具有精確的財產紀錄；它不願交出寸土尺地，不願釋放一個農奴，不願放棄一所房屋。實際上，世俗領主比它仁慈得多，因為他是具有更多人性，因為他是粗心的，因為他需要現款，因為他會死去……我們看到，農民所提出最嚴厲的控訴，正是針對他們（僧侶）的。^②

比利時歷史家梵得京特爾在廣泛研究比利時教會土地上農奴狀況之後，獲得了結論說：教會土地上農奴的地位，比起在世俗土地上農奴的地位更低。

使息斯脫西安派寺院團獲得榮譽的一件事，是他們拒絕接受

① 盧察爾：《腓力·奧古斯都時代的法國社會》。

② 朴洛克和麥特蘭：《英國法律史》，第1卷，第378頁（第3版）。

农奴作为基金的捐助。甚至在这項規則被取消以后，在息斯脫西安派也变为不自由的男人和女人的主人以后，他們尚記得过去他們初期行为中的人道主义，这反映在他們恪守下列原則：息斯脫西安派寺院的农奴永远不得被交換給任何其他領主；农奴家庭不得被拆散。关于拆散家庭的慣例，賢明而又公平的中世紀教士承认教会的立法比羅馬法更不人道。例如，普魯姆·累吉諾率直地說，“在这一方面，羅馬法的规定看来确是好得很多”。在圣路易时代，巴黎圣母院的僧侶会对它的农奴压迫得如此厉害，以致王后布浪希“十分謙遜地”进行規劝；而僧侶們回答說：“他們可随意使他們的农奴餓死”。但布浪希是一个有勇气的妇人；强迫寺院开放大門；释放了被禁錮的农奴。

在十三世紀中，农民反对教会过度的財政勒索所发动的叛乱，已是司空見慣。在 1207 和 1222 年，奥尔良的主教必須使用武力来迫使农民繳租。1216 年“新港”的村民杀死了圣窩尔堡寺院的收租員，当他們企图收集什一稅的时候。住持比主教似乎更加放肆地使用了极端办法。1220 年沙脫尔圣貝尔寺院的农奴，1246 年圣澤門·得·普勒斯寺院的农奴，1250 年圣迈克尔山寺院的农奴曾先后反叛。另一方面，在十三世紀中，农民反对世俗业主的虐待和野蛮勒索的叛乱則是稀少的。在 1251 年法国出现了“牧人运动”，即农民的反叛；这运动背后的推动力，是从十字軍运动里誕生出来的宗教感情主义，它夹着对教士，特别是对僧侶連法兰西斯派也包括在內的敌对态度；这种敌对是由教会的过度勒索所引起的。只要它一天鼓动猛烈攻击僧侶，它就一天受到群众的拥护。沿途各城市对暴民給以飲食并欢送他們。运动蔓延各省。部分暴民闖入了亚眠、卢昂奥尔良。于是，暴动和街道战斗发生了。卡斯提尔的布浪希起初纵容他們，因为她自己也是深恨僧侶的。

寺院土地上不自由农民所深恶痛絕的一件事是：他們須把自

己的全部谷物送到住持的磨坊里去磨粉。1274年,英国圣阿尔班寺院住持的土地上的农民曾拒絕再屈从这项对賤农的苛重勒索,并开始使用自己的手轉磨子。住持諾吞·罗哲尔对他們使用了威迫方法。于是,叛乱的賤农进行了鼓动,全城鼎沸。另一方面,寺院內敲响了大钟作为警报;僧侶排列在教堂內高祭坛前面,朗誦七首痛悔贊美歌,恳求上帝和圣阿尔班的佑助。国王支持寺院,进行干涉,因而运动暫被平息。但在1314年,斗争重起。村民进行大暴动,宣誓要严惩僧侶,乃至要置他們于死地,并在市場上可怖地树立了一架断头台。幸而寺院墙垣造得坚固,因为它遭受了一次平常的围攻。国王再度干涉,但直到很久以后,住持才把苛重勒索減輕。

所有被雇佣在教会和寺院的大工場內作为手工艺人和手工业者的农奴情况,是与教会領地上种田的农奴的情况相同的。在这批工匠中有:木匠、車輪匠、刷羊毛工、染工、織工、金属工、鞋匠、馬鞍匠、馬具制造者。世俗世界久已看出了农奴制在經濟上是不利而又浪費的,它也久已看出了使用那种为每天的现款工資而劳动的自由种田农民和自由手工业农民,比使用农奴的劳动有利得多;可是教会还是頑固地墨守陈规。教会反对解放手工业的农奴,反对組織独立的手工业者团体。由于这个緣故,在十三世紀,手工业者阶层的态度,是具有反僧侶色彩之特征的。而且,自由工人行会也憎恨教会的不自由工人工場的竞争。因为住持和主教特别是住持,照例是把他們的剩余制造品在当地市場上出售,而在那里他們当然能够以較低于自由工人的产品的价格来售出,因為他們所付給的工資既低,又可免繳稅款、市場捐等。在这一情况里,就可看出“宗教改革运动”之一个經濟的根源了。

教会虽然在某些方面是激进的,但在其他方面,它却是异常保守的。結果,在十二和十三世紀所爆发的农民叛乱,几乎一定都是

在教会的土地上而反对教会庄园制度的，并且是具有反僧侣制度的色彩的。在城市的市民运动兴起时，它的情况也是如此。主教和住持对市民运动的敌对，远甚于世俗封建主；他们力图取缔这项运动。

这里不打算讨论城市运动的兴起和传布。只要指出下列事实：旧罗马城市已自然地成为主教的驻所，在寺院墙垣的周围聚居了稠密的农民群，他们在寺院的领地上作为农奴劳动着。在十一世纪，当社会和經濟觉醒出现于欧洲时，这些居民集团空前地活动起来。一种潜伏了几乎千年之久的精神，开始在他们中间复苏了。这些居民要求城市宪章，不仅要使他们所申诉的弊端减轻，而且要获得固定的自治权利，如准许他们征收自己的捐税，管理自己的法院；当这些要求被拒绝的时候，他们就反叛了他们的领主，不论主教或住持，并组织了城市公社。公社这个名词成为僧侣所厌恶听到的字眼了。住持基伯特·得·诺戎谈到琅城市民反对他们主教的封建权力时，感叹道，“城市公社是一个新的而又最不祥的名词。”

僧侣对城市一贯地采取了敌对的态度，而且这种敌对几乎是普遍的。教会的高级职员往往是披着法服的男爵；他们看出新的城市制度有使他们的权利遭受颠覆的危险。所以，克雷尔服的伯尔拿和沙脱尔的伊甫斯都随声附和了基伯特·得·诺戎的话。不止一位教皇曾要求取消城市公社：英诺森二世曾命令取消理姆斯城市公社；尤金三世曾命令取消斯瓦松城市公社。当时代的教会作家也似乎完全未能了解城市运动的意义。德微兹·理查称之为“平民的骚动、王国的骚动、僧侣的懦弱”^①。但在所有对城市公社的诬蔑中，谁也比不上扎克·得·微特里反对波未公社的激烈程

① “*tumor plebis, tumor regni, tepor sacerdoti*”.

度。

有时，地方上反对僧侶的情緒，非常激昂，以致憤怒的群众竟至尽情嘲弄和恶作剧。在圣发列里寺院，群众为了嘲笑僧侶，穿着法服，繞着寺院游行，装作洒圣水。他們还放火焚烧教堂的大門，并把圣母象和約翰“洗礼者”象，一并投入火焰中；后来当一个孩子死了以后，他們当中有两个人給做了殯葬仪式。圣里奎尔寺院的僧侶們在每年游行时經常捧着圣里奎尔和圣維哥尔的遺物，而城市群众也很隆重地捧着一只死猫和馬骨游行；他們在以这些骨骸表演奇迹以后，还把它們存放在圣里奎尔寺院的圣殿內。

然而，教會也不知不觉地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正是它所要取締的这个城市运动。喜尔得布兰的計劃力图使祭坛到处摆脱俗人的控制，不論在大礼拜堂、寺院、修道院或教区教堂內，因而教會不仅放松了对社会的統治权力，而且为那个社会的成員树立了一个新自由的榜样。又在授职权战争时期，公社的精神和渴望民主的心理曾被有力地刺激起来。关于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教廷对薩克森农民和米兰城的帕塔立尼派^①的支援。在这个問題上，格列高里的改革运动掀起了一种为教會所不能拦阻住的社会和政治精神，而这种精神終於反抗了教會的世俗特权了。

在中世紀时代，教會行为的特征是：民主而又有貴族气派的，慈善而又剝削人的，慷慨而又吝嗇的，人道而又残暴的，放纵而又严厉压制有些事情的，进步而又反动的，激进而又保守的。然而，这些矛盾，不象它們表面看来那样奇特。因为必須記住：教會不是单一事物而是多种事物，一个复杂的世界性机构，也是一个富有地方色彩的机构；它执行宗教和世俗的两种权力，它又是一个錯綜的經濟和社会团体。在它的态度上，它是非常平易近人，它接

^① 在十一世紀創立于米兰城，旨在反对教士的納妾风气，它的名称是从米兰的一个街区“帕塔立尼”得来的。——譯者

触着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孩子，可是它是高高在上、縹不可攀的和理想主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足为怪，教会是个复杂而矛盾的事物的集合体。虽然教会的最高职位一向是开放給微賤出身的人們，但教会作为机构来看，是兼备貴族性和专制性的。甚至息斯脫西安派的影响（該派在精神与組織方面比起旧的本尼狄克派和克伦尼寺院团有較多的民主精神）及法兰西斯派与多米尼克派的寬大而又眞誠的民主作风，也未曾能使教会变为民主化。到中世紀末期，教会在政治上和宗教上依然是专制的，在社会上和經濟上依然是貴族性的。

中世紀教会的慈善事业，不是完全无私的。人們易于承认教会在救济事业方面所作的大量活动，它在医院和孤儿院方面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但这需要它救济的貧困，往往正是它自己的經濟剝削行为所引起的貧困，而且还有一个問題，即按照教会巨量的財資比例而論，它所做的救济事业是否和世俗社会所做的同样多呢？教会还常常傾向于請求甚至迫使俗人捐助救济經費而不肯以自己的資金作施舍。在《圣爱乐华传》里（他是第七世紀的人），我們痛心地看到許多教士的牟利作风。在传记里說，一个好基督徒應該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奉献祭品，他以他勤劳所得的成果的一部分献給上帝，他提供礼物与什一稅給僧侶——这是在什一稅由法律规定征收之前。教会果然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以暂时救济补助来緩和批評，来停息怨言，但那不一定是出于純粹的人道观念的。所以，教会的慈善行为，有时似乎是对社会不滿的一种止痛药片；它有減輕的作用而沒有治好的效力。另一方面，很多捐給教会的布施物，則是属于永久性贈与的。

中世紀教会是一个可怜的政治經濟学家，但在那种进款和財政事件上如在領地开发、市場管理和鑄币权利上，舒展了近于天才的精明手腕。教会的行政組織轉变为斂錢的精密机构。这一情况，

对世俗僧侶來說比对正規僧侶來說，更為確當，因為主教是教會的正式行政官，而修道士則否，又因為主教比起住持較多接近封建宮廷和一般的政治界。甚至早在十二世紀，在教會事務里“談判金錢斤頭”之丑事，已經臭名遠揚。住持基柏特·得·諾戎告訴我們說：當巴斯噶二世於 1111 年駐在法國的時候，他知道了在教皇隨從隊中的紅衣大主教“抱有撈一把錢的大希望”，所以他怎樣“在袋里放滿現金，來到教皇宮廷；我和我的同僚聖芬遜特寺院的阿達爾貝倫住持各攜帶了二十鎊現金來填平他們寬闊的欲壑”。我們已經講過：在授職戰爭里所牽涉的經濟和財政因素是多麼強烈。有人已以經濟的動機來清楚地說明了下列事實：在 1054 年教會分裂以後，羅馬教會與拜占庭帝國為了重建宗教統一而發生了長久的衝突。在那些最嚴厲批判教會腐化情況和最無情地譴責僧侶品質的人們中間，我們看到幾個最聖潔的和幾個最有思想的教會的兒子們——象聖伯爾拿、彼得·達緬尼、彼得·坎托、勒曼斯的喜爾得、布腊的彼得和羅伯特·格羅斯特這一輩人物。

羅馬教廷日益擴張的管轄權，給財政舞弊和腐化勢力開放了大門。早在十二世紀中期，有遠見的教士，象聖伯爾拿和索爾茲巴立的約翰那樣，已以疑慮和驚駭的態度來注視教廷宗教性所遭受的日益增長的威脅以及由於教會的過分財政政策所產生的貪污危險；而這種威脅之所以容易發生，是因為教皇由於集中了這樣多的教會事務於一身，負擔着龐大而又複雜的行政責任。聖伯爾拿在寫給他的密友龍金三世的一封信里，慨嘆道：“我只願在未死之前，能夠看到上帝的教會象它在往昔時代的情況一樣，就是，使徒們撒布羅網不是為了捕捉金銀，而是為了捕捉靈魂！”他還譴責了教皇的世俗統治權和各地主教的政治地位。幾年以後，我們看到：索爾茲巴立的約翰抱怨教皇座的負擔過重；他當然會擔心於他朋友哈德良四世的健康狀態。這個职位的摧殘生命的性質，在前一世紀

里已經激起了彼得·达緬尼猜測的好奇心；他估計教皇在位的壽命不會超過四或五年限度的。的確，在中世紀長任期的教皇，只有亞歷山大三世（1159—1181年）一人而已。中世紀羅馬城的出名的不衛生狀況，當然可大部說明教皇壽短的原因，但無限繁重的行政負擔一定也曾是使他們身體迅速垮台的一個因素，雖然還應記牢，在他們中間大多數人在當選的時候，已不是年輕人了。可是，甚至年輕的教皇，象英諾森三世那樣，也是未曾活到高齡的。

關於教廷進款的各種源流，我們有着詳細的記載……就是，1192年在宮內大臣辰西厄斯，即後來的教皇霍挪留三世指導下所編制的《調查錄》。除了從教皇領本部的收入之外，還從下列項目獲得進款：（1）從那些接受教廷“保護”的寺院和從那些在十二世紀時期獲得不受他們主教區的宗教和世俗控制的權利的人們；（2）從有些接受教皇“保護”的世俗統治者和貴族，他們承認教廷的宗主權，象阿拉貢國王和南意與西西里諾曼統治者；（3）從征收彼得便士，在英國從盎格魯·薩克遜時代起征收；在挪威、瑞典以及若干其他國家從十二世紀起征收。^①

教會在聖迹的崇拜、奇迹的表演和私人彌撒方面找得了新財源。在第九世紀後期，出現了一種起源於愛爾蘭的新懺悔制度，它批准了原來為法蘭克教會所拒絕的一整套捐稅。

十字軍運動，特別通過赦罪符的銷售，證明是替教會賺進了大量金錢。

1184年，教會訓諭那些不能親自參加十字軍者，應捐款來支持十字軍，並為了酬報這些捐款和為了三次重複“主禱”，允給他們部分的赦免。1195年，塞勒斯泰因在寫給他的駐英教使坎特布里的休伯特的信里說：“那些輸送他們的財物來幫助‘聖地’的人們，將按照他們主教所規定的條件，從他獲得他們罪孽的赦免”。1215年，第四次拉特藍會議再進一步，約許那些按照他們財產比例而捐助十字軍經費的人們赦免全部罪孽。跟着那個措施，教會開始走

^① 《劍橋中世紀史》，第5卷，第11頁。

向下坡。^①

然而，如果认为教会对这些卑鄙行为应負全責，那会是不公平的。“蛮族”法典曾这样大规模地以分等級的罰款来替代罪罰，以致有关錯过的抽象道德观念在公众心里已被抹去，而罰款已不再被看作一种罰款，而被看作一种赦免。如果人們想要公平地对待中世紀教会，必須懂得中世紀欧洲人的心理。千真万确的，在中世紀时代，各种东西是有着它的价格的——教会和国家的官职、給法官的“贈礼”、有利的婚姻和婚約、监护地位，等等。所有这类事情的办理，都是和酬費分不开的。由于如此现实想法的存在，懺悔制度无可避免地会反映出这种心理的。早在第五世紀，薩尔維安痛心地說，“除了极少数圣徒之外，人們已想要以一枚錢币来贖买他們的罪行了”。

在公众思想中认为“功績宝庫”^②的原則，即关于基督、殉道者們和圣徒們的分外德行的教义，便是可用功德或金錢来补偿罪行的一种信仰；至于教会所教导的眞誠悔过須先于赦免罪行这项有关赦罪的重要条件，已經不复可见或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降低了地位。的确，关于赦罪的理論与实践，都可从神学方面来辯解的，然而赦罪的制度可能是为募集教会捐款的最普遍的形式，也是最容易引起流弊的形式。

然而，赦罪制度，也是具有好的和光明的一面的。它在中世紀文明的发展里是一个显著的社会因素。为了慈善事业所发給的万千赦罪符对社会和經濟的情况起了巨大的影响。例如，用赦罪符的出售来創立并維持教会学校、医院、桥梁、公路和海港的建設、沼澤地的开垦或森林地的清除、为慈善和救济工作所組織的行会和

① 《劍橋中世紀史》，第5卷，第323頁。

② “功績宝庫”，即神命以外的分外功行，指基督教和圣徒們的余德，通过教会的祈禱，它即可代贖人間的罪惡。——譯者

兄弟会、象“公共当铺”那样的放款会。这样看来，教会募集经费，是为了物质的建设的；那些原来不能顺利进行的社会事业，因此得活跃起来了。

有几百件遗闻轶事，谈到十三世纪僧侣的腐败情况；这些故事即使去除其中夸大部分以后，还留给人一个痛苦的印象，并生动地绘出了当时的许许多多高级教士的贪婪情况。贪污的教会管理终于导致在执行圣礼方面的贿赂行为——交换或出售精神价值；即败坏僧侣的特权和权威以达牟利的目的。在某种限度内，可以指责教会说，它为了进款的目的把它的宗教权力化作资本。当然，教会虽从来未曾正式赞成过这样的一种行为，可是在宗教立法上，有充分证据，说明这类弊病已在广泛地流行着。硬心肠的教士拒绝做结婚、洗礼、甚至临终涂油和殯葬各种仪式，除非先付给他们一种酬费，这样一来把“随缘乐助”改为固定的酬费了。990年谱伊的主教，在给他的主教区内僧侣们的一项通告里说：“任何教士不得收取洗礼费，因为这是圣灵的恩赐”。

伯爵罗柏斯吞的罗柏特埋怨当地副主教说，他以过多的“赎罪金”加在他庄园内的农民身上，因而使他们贫困，并指斥他是“罪行的勒索者、犯罪的爱好者”。有一个故事中谈到有一个简朴的骑士天真地说：“我想，教士之做弥撒，是为了收取供品的缘故”。另一骑士认为：教士发明了弥撒，作为一个骗取供品魔术方式。据说在布罗温斯曾有一个富人，在死后，他的大量金钱遗给一所邻近寺院。他的儿子埋怨说，住持未曾替他父亲的灵魂说什么，除了“安静地休息吧”，一句话外，但住持对他讲，这句话的价值比金钱还大。

甚至早在十二世纪，僧侣的猎取遗产已成为一种大家知道的丑事。1170年，亚历山大三世曾下令：除非在一个教士面前订立，任何人所立的遗嘱，不得认为有效；而起草遗嘱的公证人将受到驱

逐出教的处分。在一次英国宗教會議上宣布：一个人在立遺囑時，為了他靈魂的好處，必須以他的部分財產獻給教會；而且當他立遺囑時，必須有一個教士在場作證。豪俠的威廉·馬歇爾在壯年時，曾以比武者和馬上比武英雄出名；在他彌留之際，一個教士在他的床側敦勸他把他的所有豐富獎品遺給教會。1234年，阿爾茲宗教會議上宣布：凡是不在一個教士面前所立的遺囑，概作無效。如果這樣地訂立了，立遺囑人將被剝奪葬於神聖墓地上的權利，而那起草遺囑的公證人將受到驅逐出教的處分。未立遺囑而死，被看作搶劫教會的行為。

甚至十二和十三世紀的異端運動的重要根源，也在於經濟和社會的狀況。夏龍的琉泰在夏龍主教區內創立了一個短命的教派，他以下列宣傳，在“鄉下人”中間獲得了信徒：征收什一稅，在《新約全書》中是沒有根據的，那是僧侶的一種舞弊。里昂的發爾多和發爾多教派，即“里昂的窮人會”代表著反對高級教士的財富和世俗性之勢力；他們力圖恢復使徒的貧困和朴素作風。布里西亞的亞諾爾企圖使用北意大利的公社革命，以達到同一目的；他勸告了城市的市民政府沒收僧侶的當地財產。在十二世紀的起初二十五年中，在法蘭德斯有一個著名的受公眾歡迎的異端者坦克姆；他得到了大量農民和鄉下人的信仰。他宣傳：取消僧侶所征收的什一稅和莊園捐以及其他激烈的宗教和社會主張。在他死了以後，有一個鐵匠，叫做馬那塞斯者，企圖繼續他所鼓起了的運動，並組成了一個兄弟會，有意思地叫做“行會”。值得注意：在法國南部，那里曾受廣大亞爾比教派異端支配好多年，被拖到宗教裁判所前面的很多犯罪者，是窮苦的織工；所以，“織工”(Tisserand)這個名詞本身竟成為異端者的代名詞了。在下德意志，斯德廷革運動，密切地結合著農民反對莊園制度的殘酷性和什一稅的負擔之憤懣情緒。所以，異端教派常常是表達又廣大又複雜的社會不安情態

的工具，也是反抗流行的經濟压迫和弊病的工具。

不幸，教会不去糾正它自己內部制度的腐敗，相反，它去加强并加紧它反对异端的政策；而在十三世紀教会的腐敗大多是激起异端流行的原因。它把那些不符合于自己的物质利益的政治社会主张和异端混为一談，并把所有异见，不論属于什么类型，一概列入同一个的受譴責和同一个毁灭范围內。教会对于群众攻击僧侶的自由与财产和对于教条的批判，都很敏感。它把城市行政官企图征收教会的财产稅（必須記住它的财产价值巨大而且全部免稅）和乡村农民反抗苛重的什一稅，都誣蔑为作乱的异端。最后，教会在南法，还采用了剿灭的办法，并組織了不光彩的对亚尔比教派的“十字軍”。

在这次十字軍里，教会求助于最卑鄙的經濟动机。异端者的财产被約許給告密人。封建貴族和城市长官使用这种掠夺方法，使自己发财。告密勾当成为一种职业。沒收财产和烧死异端者，成为貪婪的僧侶和爱財的貴族和官吏的一种經濟扩张和致富的办法。“迫害行为成为几乎象宗教事件一样的一种財政投机”。1184年，路求三世力图使教会独吞从判罪的异端者所沒收的财产，但未能实行。教会必須分取赃物。在对亚尔比教派运动的开始和最狂热的阶段里，所有异端者的财产被一扫而空。1237年，格列高里九世宣布：异端者的天主教妻子的嫁奩“除了某种情况外”将不予沒收。十年以后，英諾森四世正式把天主教妻子的嫁奩列入沒收范围內。在意大利，照例，一个判罪的异端者的财产的三分之一，归于告密者，三分之一归于宗教裁判所判官，三分之一归于当地行政官。罗德的主教驕傲地說，在他的主教区内他仅仅在一次对异端者的“搜索”就获得了十万苏尔。亚尔比的主教仓卒地把沒收了的财产的代价券售給那些悔过的定罪异端者。迫害异端，往往是勒索和致富的有利方式。

故亨利·李亚在广泛調查研究“沒收异端財產”这个題目之后,以下列一段文字来总结教会在十三世紀迫害异端,特别是对卡塔里派或亚尔比教派的迫害之經濟社会影响:

我們很容易看出:繁荣城市怎样貧困化,工业怎样萎縮,城市的独立怎样受到破坏……关于沒收貨物和家具的若干清单已被保存下来:例如,1290年12月和1300年1月,当亚尔比的二十五个或三十个最富市民突然被逮捕并定罪的时候,一个公証人雷門·卡尔維利的清单告訴了我們一个富裕市民家具設備的各种詳情——清单列举了各种枕头、罩布和被单,各种厨房用具、咸貨和谷物甚至他妻子的小裝飾品。我們也看到富商約翰·波提尔的一张同样的貨物清单。每一匹呢絨布料都加以适当地区分,如根特、伊泊尔、亚眠、喀姆布来、圣奥麦、卢昂、蒙科特等地的布匹。他的城市房屋和乡村田舍也被同样精細地开列出来……除了由于整批沒收財產而加到几千无辜妇女和儿童身上的苦难(他們被剝夺得一无所有)之外,它給社会各阶层在日常生活事件上所帶來的禍害更是不能再加夸大了。对各种交易的保护完全被撤消。沒有一个債主或購買者能够保証他所与交涉的对方的正宗信仰,而况异端罪不仅适用于活人而且推及死人;对于一个活人只要当他犯着异端罪之后,他的財產权就立刻被沒收;而对于死人也可追訴,甚至沒有什么時間上的限制;这样一来,任何人不可能觉得有財產上的安全,不論这財產是从他的家庭里世代传袭下来的,或者是他一生掙得的……宗教裁判所对死者的追訴程序,是一种假戏,因为事实上,死者的辯护是不可能的,而沒收財產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异端者所訂的一切让与契約作废和他們所出售的財產从購買者方面夺回,而他們所負的全部債款和作为借款担保的抵押品与留置权也作为无效……因为沒有人能够确定另一个人的正宗信仰,显然,在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每一項买卖契約和每一次出售交易籠罩着多么多的疑云。容易看出,这种情况对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上所發生的摧殘影响;而况它的出現正是在欧洲的商业和工业运动开始預报近代文明曙光的时候……不談迫害的其他后果,单单这一項影响已阻塞了法国南部文明的发展,因而商业和工业的优势轉移到英国和尼德兰去了,在那里宗教裁判少有所聞。^①

当教皇座的权威膨胀和教皇国的势力無論在教会和国家里凌

^① 《英国历史評論》,第2卷,第235—236頁。

駕全欧的时候，教皇进款的增加和他特权的扩大是同时并进的。当教廷从国王和公侯手里夺回了世俗授职权以后，教皇向每个新主教勒索大量酬费；这项酬费不断增涨到变成僧官的首年薪俸额，相等于每个新主教在任职第一年时期中从主教区内所得的全部进款。这种进款按实际货币来算达到了多少数量，可从下列事实得到了解：据说，1252年，在英国，单单外国僧侣，主要是意大利人和薩伏衣人的进款比英王的进款多三倍。在十三世纪，拉特兰教廷的收入一定比在那个时候欧洲全部国王的总收入还多。僧职首年收入酬费（即所谓“第一次果实”）、从主教法院移到教皇法院上诉案件的诉讼费、赦免费、兼职费（特准一个僧侣担任一职以上即同时兼任许多职位）以及它的相反的办法，即一个职位由许多人挂了空名（为了收费），上列进款及从其他许多行政手续上所得的钱，构成了十三世纪教皇座的财源，大得使欧洲震惊。当时，教廷是基督教国家中的最大银行家。它的财政代理人，即使人讨厌的“伦巴人”和“加奥尔人”，罗网般地撒布在大陆上。

因为这些新形式的捐税和剥削的负担大都落在一般的人民头上，又因为僧侣们当然把所加在他们身上的负担从上而下转移到教区居民方面，人们可以判断欧洲人所负担的宗教税如何巨大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的部分根源就在于僧侣的奢侈浪费以及从十三世纪起直至运动爆发之前的群众的重负。的确，在十三世纪，欧洲比以前要富得很多，但尽管欧洲有着更大财富和更多人口，欧洲人所负的教会所加的物质重担，是否不会大于在以前世纪里所负的重担，却是一个问题。

在各种各样的宗教捐税之外，还有建造大礼拜堂和寺院的庞大开支；当时，那先后产生的罗马式和哥特式建筑术的建筑狂热正在横扫欧洲。今天使游客们留恋忘返的大礼拜堂和寺院，在当年曾消耗了浩大的建筑费；而它们为维持日常仪式和祭坛所需的常

年經費也是龐大的；而這些經費都是從歐洲人民的勤勞和儲蓄方面搜括而來的。教會為了建造大量的宗教建築物和為了舉行許許多多不必要的宗教儀式所征收捐稅和所消耗的資金與勞動力，一定會是很繁重的。數字指出，教堂增加的比例，遠超過歐洲人口上增加的比例。在 1100 到 1400 年的三百年時期中，英國人口約增加了七十萬人，即每一世紀約增加了百分之十。可是在整個英國，在 1066 到 1216 年的一百五十年時期中，單從所建造的寺院來說——不包括教區教堂和大禮拜堂——就有四百七十六所寺院與修道院，八十七所僑民修道院。

不該讓崇高的動機來蒙蔽我們，因而看不見那些加在人民身上的重大犧牲或強迫負擔。“雖然這些建築物在某種程度上是熱烈信仰的反映，可是更多的還是那些建造它們的主教們的夸耀表現……我們不該看不見他們已盡了搜括之能事。”他們不能象世俗社會所建的許多建築物那樣以改善公共建設為借口。從當代反對這些捐稅的著作看來，證據確鑿，因而我們不能天真地認為所有這些壯麗的大禮拜堂、寺院和修道院是從純潔而又熱烈的宗教情緒產生出來的。另一方面，這類建築物，大可說明歐洲在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紀時期物質上的巨大進步；它們也可明顯地證明：人口一定是增加得很快；社會的能力已負得起這類龐大的開支，同時還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與物質享受。

教會的經濟措施未曾能夠跟上經濟條件的變更。如上文所述，教會是中世紀時代的最大地主。當歐洲幾乎是完全在農業經濟狀態里而幾乎所有的物質財富是以土地及農業社會的副產品，如生皮、皮革、綿羊、羊毛和一般原料來估計的時候，在那些日子裡，教會是很富的。但在十一和十二世紀，由於商業和工業的興起而發生了的經濟革命，開始出現了財富的新形式，如交換的商品和製造品；這種新財富同舊式的財富相競爭，並把農民從田野間吸引

到城市。結果，教会在找寻田間劳动力方面越来越多困难。教会变为“长”于不生利的土地而“短”于劳动力；換句話說，它开始变为“土地穷”了。

而且，經濟革命造成了物价上漲因而增加了生活費用；对这些情况，教会原是没有准备的；因为它不曾懂得也未曾預期到那些方兴未艾的深刻变更，或者它不愿意使自己适应它們。主教和住持过去所享有的优厚俸給，现在已不够維持他們了。全欧洲的教会进款，縮減到令人惊异的程度，所以，不仅教会的薪給和維持費的开支日益困难，而且甚至它礼拜仪式的开支也成为一件令人忧虑的事情。在这危急情况下，如上面所述，教会把权力化作資本来弥补亏空，并使用赦罪符、特免、捐費和“主教的首年酬費”来填充它的錢柜。但这种权宜办法，使教会付出在欧洲丧失很多尊严地位之代价。与此同时，它的腐敗已无可掩飾而它的貪婪也已臭名远揚。“教会是社会中最缺少伸縮性的成員……它未曾有适应新条件的手段”；那是說得很对的。

有远见的教士曾建議，教堂的数目“应减少，教堂的祭坛应减少，所委派的人員，也应减少；但对于他們的人选，不論任高級圣职的或任低級圣职的，应多加注意”；这项建議在僧侶中間是不受欢迎的。在一本題为《教会的珠宝》的出色著作里，十二世紀后期的一个主教描述了教会中某些弊病并指出了它們的补救办法。但他所說的話被当作耳边风。在談到按旧法律只有一所神庙和一个祭坛这一事实时，他写道：“所以，按一所神庙的标准，在每一城市里應該只有一所教堂；或者，如果城市有着稠密的人口，也只应有很少数教堂，而这些教堂应隶属于一个大教堂。小礼拜堂的增加，产生了非法的贈与以及其他許多駭人听聞的违法乱紀行为。如果教堂的数目較少，而教堂內所做的神圣仪式的次数也較少，情况会好得很多”。

教會不以建設性的經濟改革的辦法來應付生活費用的提高和物價的上漲；相反，它目光短淺，企圖以增加所征的什一稅的數目與種類，增加對農民所征的莊園捐稅，造出名目繁多的教會酬費，加上其他權宜手段，以求擴大它的進款，使它的收支相抵。它在大禮拜堂和大教堂內添設了小禮拜堂來吸收這些建築物的建造費的捐助和祭壇的基金捐贈；在同一天內二次、三次、四次，甚至更多次的彌撒，連續地舉行，並征收做彌撒與葬禮的酬費。一些無耻的主教加倍收費並有怨他們職員的敲詐方法。有一次，有一個主教在舉行了一所新建教堂奉獻典禮後，立刻中止了那里的神聖儀式，因為他所收到的酬費不夠大。另一次，有一個大主教在辯解買賣聖職的行為時說，“我不是出售教堂。我只是出售我的恩惠。為什麼有人要獲得我的恩惠而不應付出它的相當代價呢？”在主教中間，還有一個慣例，就是他們以教堂聖俸授給他們的尚在幼年的侄子們，在保護的借口下長期霸占利益，這是一件大丑事。主教還常把教堂基金和挂名職位，贈給“永不做好事”的親戚，以供養他們。教會的聖俸，是按復歸^①條件賜贈的。教會增添聖職來售給那些企求僧侶榮譽或僧侶特權的人們，以取得大量金錢，而由窮苦教士來實際執行這些職位的職務；有時，這些職位甚至不附帶着什麼職務的。在十二世紀一個大胆而憤怒的批評家寫道，主教“比崇拜太陽神教的僧侶還要壞，因為主教強制他們的下屬宣誓：他們將想盡一切方法來勒索酬費與罰款以送給主教的宮廷”。

在英諾森四世（1243—1254年）接任教皇位後，“世間最偉大的權力遂落入一個精明強干的商人”和一個無与伦比的法律家手里；他以一個生長並教養於富饒而又非常重商的热那亞城的人所具有的狡猾手段，運用到教廷的資源方面。他的財政活動，在中世

① 就是已讓給他人的財產，因讓與權或期限的終了而復歸於讓與者。——譯者

紀教廷的历史上，构成了一个轉折点；其时，就二万件文献的資料来判断，教会首領是濫用了他的宗教特权以求增加权力和財富的。英諾森四世，在他所享有的并有效地使用着的“全权”外（例如在1246年，他以巧妙的分配特免状方法来打破反对他的法国貴族联合），还有教会国的世俗权。但丁在他所描写的永居地獄的教皇中，沒有提及英諾森四世的名字，但他提及他的继承者尼古拉三世和彭尼非斯八世；对于后两个教皇，他“从来不倦地以丧尽廉耻的臭名相加”；但近代的研究已确然証明：教廷的財政舞弊和敗坏，是从英諾森四世开始的。尼古拉三世，出身于奥西尼家族，被描写成为“一只熊太切心于提拔小熊”——对他任用私人的挖苦——他“把大量財富放入自己的口袋里”。

从上述的事实看来，我們比以前更可清楚地了解阿西栖·圣法兰西斯的使命了：他使貧困理想化并对僧侶的世俗性和世俗豪华加以譴責。他和他所鼓起的运动挽救了教会，使之免于因腐敗而遭受毀灭的危險，在这方面他比別人出力更多。那些头脑清晰的、宗教观念强的领导人，象圣法兰西斯和圣多米尼克那样，曾痛罵教会的腐敗、它的世俗性、硬心腸、唯利是图的特性和对社会的傲慢态度。圣多米尼克說过：主教不复是他們羊群的牧人而已变为狼了。教皇曾把拉特藍宮殿里的財宝指給这严肃的圣徒看，并說：圣彼得的继承人现在已不复需要說彼得所說的話，即“白銀与黃金，我是沒有的”，其时，多米尼克冷淡地回答道，“是，彼得的继承人也不能說，‘收起你的床，走吧’”。行乞的托鉢僧即法兰西斯派以及布道的托鉢僧即多米尼克派，同样注重实际的慈善事业，并注重使用方言通俗布道使民众得熟悉福音。他們随处布道：在空地上，在街道上，在市場上，在市集上，沿着他們伴着香客群一同旅行到圣地去的路上，香客們是到坎特布里的柏刻特墓、昆波斯特拉的圣詹姆士神殿、圣米雪尔山和羅馬城去的。在十三世紀之前，布

道是教區教士職務的很小一部分。那只是屬於主教們的職務與權利範圍內的，而他們一般地又是太忙於教會行政或政治事務因而無暇顧及布道。於是，異端派利用了教會制度的這種弱點，因而獲得了聲望和對群眾的控制力量。為了自衛起見——也由於托鉢僧的成功榜樣的鼓舞——教會採用了它的反對派所用的方法，把應用方言的布道，作為每個教士的職務。教會儘管有它的貴族的傾向和它的階層組織的性質，卻不得不適應十三世紀的新的民主精神和狀況，其時，農奴制已在衰退，城市已在興起，貿易和商業，特別是老百姓的謀生方式已在發展。教會只有使它的方法通俗化，才能維持它的聲望並保留它對社會的勢力。

在中世紀時代，雖然許多個別教士曾顯出行政官的非常才幹，其中有的人，尤其是格列高里七世，還曾抱着遠大的經濟眼光，但整個說來，教會是一個可憐的理財家。教會的經濟理論的根源，在於《新約全書》里所記關於早期基督教的激進的社會民主思想。

《福音》關於世俗財物的教訓，是無可誤解的。它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人們要防止追求財富，因為那將使他們拋棄對上帝的服務並將使良好的種籽枯死。它在一個突出的事例里指出，精神的完善是和出售一個人所有的東西相結合著的，因為這樣他可使自己的東西轉給窮人了。它宣布窮苦飢餓的人會有福氣，並預言富人會倒霉。它教導說：信任上帝，不要為明天的食糧和衣服而擔憂；慷慨地救濟任何來求助的人，不要自私自利地占據着一個人所可獲得的東西。又在最早基督教會的成員中，它提出了那些人的榜樣：這些人放棄了他們的私人財產，而使一切歸於公共。我們不應奇怪：早期基督神父由於有着這類教訓，對異教世界的自私自利行為，曾起着一種有益的反感；那引導他們整個地譴責了追求財物。那還引導他們更向前進——乃至否認一個人有權以自己的東西來做他所願做的事情，甚至奢侈地享用他自己所有的財產……

然而，如果說一個人的力求致富行為是有罪孽的，那麼難道貿易本身可有正當的理由來辯護嗎？這一問題，在中世紀時代，使許多人在良心上感得困惑。一方面，他們不能完全忽視貿易給社會所帶來的利益，也不能不注意到，許多小商人只是為了糊口的目的而做生意的。另一方面，他們也看到，貿易

一般是由已經富裕的人來經營而他們的目的是為自己獲得財富：特圖良辯護說，“如果排除了貪婪心理，就沒有求利的理由；又如果沒有求利的理由，就沒有貿易的需要了”。而且，因為一個商人自己似乎沒有增加他的商品什麼價值，如果他从商品所得的多于他所付的，据圣哲罗姆的話，他的所得一定是別人的所失；無論如何，貿易对灵魂來說，是有危險的，因為一個商人有时几乎不可能不干着欺騙的勾当。除了所有这些理由之外，許多更圣洁的教士还添加了另一項理由；如果這項理由被听从的話，教会的世俗活动将被全部停止了。他們认为，救济个人灵魂，和神人的感通，是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的。这种思想驅使了成千上万的人过着荒野里的隱士生活，或进入寺院；它甚至引导了象奥古斯丁这一流的人說：“商业”本身就是一种罪孽，因为“它使人們离开了追求真正的安息，就是上帝”。①

在中世紀時代的早期，这些教条还不曾是一个巨大的經濟压制，因而很少有人抗議。因為从第五到十一世紀，商业不振，公共和私人經濟两者几乎都是属于农业性的；在主要的大宗生产方面，还存在着經濟上的“自給自足”状态。

但是，在十一世紀，停滯的积水开始出現了汹涌的波涛。城市的兴起、商人团体的組織、市場的設立——即使它們只不过是提供农民和庄园主为出售他們剩余产品的一个市場——引导了人們互相面对面地做买卖，而这种形式在过去从来未曾有过的。但这些市場所做的，还不止于此；它們为一个新階級，一个手工业者階級的成長，鋪平了道路；因为这一階級只在他們能够出售他們的制造品的条件下，才能存在。与此同时，在十字軍运动和建造教堂热潮里（后者是由十世紀宗教复兴运动带来的），出現了对金錢的新需要。由于这个緣故，經濟問題，特別是在卖者和买者之間、在債主和債務人之間的关系这一类問題，成为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了。当教会面临着这些新危險的时候，教士們再次开始把注意力轉向于經濟事件，并重新应用基督教原則来应付被他們看作羅馬法即“世俗的原則”所产生的恶劣趋势。他們特別坚持了两項原則——貨物的出售，应按照“公平价格”；收取利息，是有罪过的。他們从說教坛上、在懺悔室內、在教会法院內来实行这些原則。②

① 阿士力：《經濟史導論》，第123頁。

② 《經濟雜誌》，第31卷，第233頁。

“公平价格”是根据生产成本和需要程度，而估計的，并未考虑到竞争；因为竞争被认为是罪孽的。教会力图以法律的效力来支持这项“公平价格”，毫不注意到供求关系和竞争的要素。圣托馬斯·阿奎那虽承认商业的新需要，但他企图以經商的动机来挽救教会的經濟理論并把动机作为合法与否的准則。他說：“有两种方法”。

可使一个国家的繁荣增长起来。其中价值較大的一种是：利用肥沃的土地来生产大量必需品；另一种是使用商业来把必需的东西从各地方运到一个共同市場上。前一种是比較适宜，因为一个国家最好能够从自己土地上生产丰足的财富；如果人民需要商人来維持，在战争时期，当交通綫被堵塞住的时候，他們会蒙受損害的。而且，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响。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們有作出許多恶事的机会。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們的財富的时候，其他的人也会充滿着貪欲心理。商人的职业，迥然不同于兵士的职业。前者离开手工劳动，享受舒适生活，因而身体軟弱，心灵萎靡，为了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①

在工資和地租方面，煩瑣学派的思想也和經濟規律的实际运用，距离得很远。今天已經承认：一个手艺人的工資应跟他劳动的产品在市場上价格的增长而增加起来。然而煩瑣学派把劳动力作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象貨物一样，而工資就是它的价格。工人的报酬，不是以他的产品的价值而是以他所需的范围来估計的——这一原則，如果有效，会使工資永远低落，并使手艺人階級永远变为穷苦的工人。至于地租，煩瑣学派认为，它是一种合伙关系，在那里土地的所有者提供生产的一个因素，而劳动者提供了其他因素。虽然他們曾承认：土地的价值，应按照它土质的肥沃、改良情况、所在地点等而有差別，但因为在一個封建社会里，未曾有过象近代那样的自由处理土地的机会，所以地租变为固定的或习惯性的。因

① 达維孙：《圣法兰西斯的先行者》，第 341—342 頁。

此，可以想见：一般說，“公平价格”的原則，是有害于商人的；工資的原則是有害于手艺人的；但地租的原則，是对下层階級有利的；而对地主階級的福利是起着不利的影响的。

最高价格和禁止奢侈的法律，即“公平价格”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了。然而，在这里，教会和世俗法院是分道揚鑣的。教会遏阻——或至少表面要遏阻——貿易，把它作为世俗的和有罪孽的事情；而国家則公开地企图促进貿易。世俗法院尊循着实际知識和經驗的路綫。而教会的法令則体现着既不合于实际，又不可以实行的一种經濟的理想，而且它被务实的商人和手工艺工人看作大不公平的事情，旨在保持他們处于永远貧困的状态里。教会的“价值”概念，是某种絕对的、无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东西，是某种脫离供求关系的東西，某种实质的和固定的东西；教会从亚理斯多德得来的理論：“金錢是不結果实的”以及“福音”的成語：“放款，不希望再获得什么”，必須严格遵守而予以普遍实行；它把收取利息作为违反基督教义的和道德的行为，而予以禁止，因为它是剝削某种大家可享、大家共有的东西，就是時間（因为收取利息好象出售一种东西，因而收取使用它的費用）；它在理論和实际上否认了資本的活动性（的确，它的原則是：資本本身是世俗性的；占有資本是有罪孽的）；它否认了信用的原則和实践——所有这些由煩瑣学派所拥护而由民法和教会法来实行的經濟原理，对于中世紀社会的物质幸福，是具有一种損害的影响的。

到了十二世紀，当商业和工业已苏醒过来而无限活跃的时候，这些理論变为具有实际意义的爭論問題了；对于这些問題，不仅神学家和理論家，而且王公、行政官、法律家、商人、販子和老百姓都感到兴趣。人民的經濟实践拒絕遵守这些教会的教訓了。教会的命令，不是被置諸不理，便是大多被阳奉阴违。当代的商业巧計，造出了多种的“間接例外”。

第二十六章 封建制度 和封建階級

中世紀國家是一個松懈的領土集合體，它的“財產權和主權到處相互轉化”。各個國家在政治和社會制度上是很相同的；它們信仰同一的宗教而統治階級到處有着相同的利益。每個國家在政體、制度和社會結構方面都是封建的。

中世紀政治理論，是以下列三種來源為基礎的：羅馬法、“神父”的教訓和日耳曼法律傳統和社會制度。古代人相信：國家是真實的、至高的、不變的、永恆的、最重要的，是對臣民不負責任的。基督教，通過聖奧古斯丁教導說：政治社會，就是，由於有罪孽的人類而產生的國家（^① 是它的創造者）原本是罪惡的；教會是有組織社會的至善的形式；國家至多也不過是被容忍於教會之內并隸屬於教會之下的。至於原始日耳曼人則反是；甚至當雛型的國家開始在他們中間形成的時候，他們強調個人的權利。所有這三種相反的概念，都滲入中世紀國家的結構里。

法蘭克帝國在理論和實踐上，主要是封建性的。這項封建性制度跟着帝國的分裂，傳入了由它瓦解而形成的幾個國家內。但這項政治瓦解的過程，并不止於由法蘭克帝國分裂而形成的六個王國。這些王國本身也漸再分成為半獨立的公侯國；因此，每個王國成為一個松弛的封邑的集合體。在這些情況下，政權越來越變為私人的權力。所以，不可能把統治的原則和統治者個人截然分

^① 《聖經》：“他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他開始創立了國家。——譯者

开,而使社会联在一起之紐帶,則是領主地位和臣服之間的相互关系。領主和附庸之間的关系,是一种契約关系;而契約的理論向上推到包括国王在內。国家不象过去那样,是一个紧密的政治实体,而是改变为一个松懈的契約式社会有机体了。

喀罗林王朝的起迄时期(752—887年)——因为在887年之后,国王仅仅是一个領主,王位是选举的,每个国王是依靠一小撮大貴族支持的——是一个单一过程的两端,就是,封建制度的兴起和胜利。喀罗林朝諸王被一种潜在封建制度,或正确些說,附庸关系,提升到权力地位并在这地位上維持了百年之久。但喀罗林朝諸王只在他們保持他們土地所有权的优势的时候,才有力量。然而第九世紀,这制度走上了一个相反的方向。附庸日益强大,使自己成为比国王更大的土地所有者。他們以王位的空壳留給国王而自己占取果肉。他們的臣服变为一个虛构,他們的服务也变为一种姿态了。但这分化的过程,并不停止于法兰克帝国的毁灭阶段。因为在第九世紀,使王室的大封侯和大省区脱离王室控制的同一个分裂力量,到了十世紀,进一步使各省分裂为半独立封邑。大貴族过去曾用以反对国王的心理与势力,现在反过来打击到自己头上了。

封建制度的辽远根源在于:教会和日耳曼人所采用并繼續的过去羅馬世袭所有权制度以及日耳曼个人忠誠的古老概念,就是最初的战争队伍的全体成員對他們首領的忠誠概念。所以,羅馬貢獻了财产的关系,日耳曼人貢獻了人身的关系。它們的結合形成了封建制度的主要性质。这两种制度成为同一东西的正反面。喀罗林朝的恩賜地(即附有一定服务条件的賜地)和附庸关系(它本身是古代凯尔特人的保护制度和日耳曼人的忠誠心的混合物)的結合,造成了地主貴族的封邑,那是从某上級貴族所得的賜地。在这制度所由完成的一长列鏈子里的环节,是“委身制”,就是附庸

对上級領主即宗主的約許忠誠制。中世紀時代貴族的遠祖，是蠻族王國的武裝家臣（即在國王管轄下的人們）；他們起初是受委身宣誓約束的個人的附庸，這批人後來在喀羅林朝時代，成為占有賜地或封邑財產的附庸了。他們的義務成為兼有人身和財產的義務；“忠誠”代表精神的关系，“臣服”代表物质的关系，而“委身”儀式把兩種制度合成為一。歷史家關於下列問題議論紛紜，意見不一：這兩種各別的来源，依時間論，哪一種早些，依影響論，哪一種大些——是人身关系还是財產关系。實際上，這是無足輕重的；這是考古學家所注意的問題。須知這制度，作為一種政府形式來看，作為一種社會結構來看，是從第九世紀法蘭克帝國分裂中成長起來的，因而它的有機體是吸入了那個國家的很多殘余的。

另一有助於封建社會形成的因素，是諾曼人的侵犯，因而人們尤其是下層階級感到保護與安全的急切需要。九和十世紀的自由人在這些不幸的情況下有着三條路可以選擇：成為一個比他更有力量的領主的附庸，在這一場合，他也在等級上成為低於他宗主的一個貴族；進入教會；或成為一個農奴。當然，最後一項，是最大部分自由人的命運。因為只有擁有大量土地的人，才能使別的人願意幫助他來保護他的財產，而宗主也只在附庸對他做規定的服務條件下，才願進行保護。

不該認為：這項發展一定是在一種有秩序的形式下進行的。事實上，它有着強凌弱的很多放肆和掠奪行為、很多不公平和很多野蠻行為。這些早期誓約中，有的是屬於消極性質的——不損傷或損害——那是有益的。然而，儘管封建制度常常有着強暴而又惡劣的性質，無可置疑，整個來說，它是一個社會進步的和社會完整化的現象，而非一個社會腐爛的現象。如果我們從遠處來看，我們能看到封建時代的文明是多麼有建設性的、多麼有創造性的和多麼有偉大性的一種文明。無可否認，那九至十世紀的過渡時期，

是人类遭难的时期，但当那个轉化的时期过了以后，当那些正在酝酿过程中的新社会制度终于定形化以后，于是，一个更好的时代来了。新的封建制度反映在各种政治、社会和經濟性质的新制度上；而这些制度是符合于并表达了那个已經誕生出来的新社会的。在九至十世紀，流行着“野蛮主义的放纵行为”我們可同情于那个时代的人們；他們向往过去查理曼时代，把它看作为一个黄金时代，其时，欧洲是处在統一的状态下。可是，那些强暴时代，比已經消逝了的文明具有一个更伟大的新文明之萌芽、希望与潜力。封建制度以社会固定于土地上，来終止作为第六、七、八世紀野蛮生活特征之流动状况。欧洲变得更稳定了。封建制度所根据的原則，是不同于而高出于后期羅馬帝国的专制政治和奴隶制政治的。封建制度使早期过度的、野蛮的个人主义轉化为服从法律和秩序的精神，具体化为宗主权、附庸地位、忠誠、服务和契約的权利与义务的制度。依它的最好的方式，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有一个卓越的历史家写道：封建制度不是一座跨过野蛮和文明之間的海灣上的桥梁——它本身就是文明，这一种高級文化，在 1150 和 1250 年之間，达到了它的頂峰。

如果这个社会的权利与义务、責任和自由的观念，在早期（在十一世紀的初期）未曾这样地确定并正规化起来，又如果它的习惯未曾成为社会化而习惯的力量未曾被政治或宗教权力赋予法律的制裁力，封建时代的文明将永远不会产生出来，而欧洲将已陷入一种无政府的風暴里；在和这風暴相比之下，第九和十世紀的强暴状态，只不过是茶壶里的水泡而已。因为这些初期的領主，这些狂暴的战士构成了“从来未曾有过的最自由的人口”，他們的自由观念往往发展到肆无忌惮的程度。如果这批人未曾依公約和契約自动地联合起来，又如果习惯和传统未曾把这些公約逐漸硬化为法律，而荣誉未曾迫使他們服从它們，上面所說的无政府状态将已威胁

社会本身的生存。为了挽救自己的必要性，封建主不得不把自己分成等級，因而每个业主，無論大小，被束縛于上級的領主，而后者給他保护，同时也要求他服从法律。

封建主之間买卖“忠誠”的必要性——因为小貴族和他們的上級进行精明的討价还价——是使动产〔貨幣〕在十世紀不出現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是沒有什么用处的，因为除了土地上所提供的东西以外沒有什么可买，而这些土地上的产品他們已經有了。因此，貨幣被窖藏起来。由于这个緣故，服务日益以土地来酬报；又因为道路不良，安全难保，通行稅使所有的运输遭受麻煩，商品的流轉有着强烈的地方化傾向。因此，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在庄园內消費了，沒有什么剩余品来出售，所以，封建时代是一个沒有資本的时代。唯一的資本，是土地，而土地是固定的，不是移动的；这一事实，是社会結構在封建社会里之所以具有靜止状态与固定性的主要原因。

有人惋惜着古代文明的衰落或古代日耳曼农村公社的消逝以及在这过程里成千累万的小自由民的降低身分；那是感情用事的。人們果然可以爭辯哪一种政体較為适当这一問題。但一切政府的基本职能，是保护生命与財產；而按当时的時間、要素和条件論，在欧洲除了封建制度外，再也沒有其他的政府形式和社会形式可能实行的。我們处理問題，必須注意到当时所存在的历史条件，不应空談理論和教条主义。

理論上讲，封建制度可能曾是人們的头脑所能想出的最合适的政体。英国伟大历史家作了下面一段論断：

如果“天使長”曾能来施行封建制度，它将已是一个极好的体制……这制度的精髓，是忠誠相待，它的真正的后果，是創造一个团結的統一体，并获得每个成員，上自国王下至庶民对这统一体的承认。这种联結不是一个随意的联結，招之即来，揮之即去的。团結的原則，在全体群众中間是一致的。于是，

一方面，如果說制度的執行不善迫使民族的不同部分組成一個物質利益的聯合，〔另一方面〕那為任何執行不善所不能抵消的基本性質提供了正是道德力量所缺少的要素。獨立自助已證明不是和秩序、相互信任和尊重法律精神相矛盾的，相反，這些品質是為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所不可缺少的東西。^①

當那個混亂的過渡時期已經過去而歐洲開始在封建制度下安定下來的時候，它不是一個無政府的統治而是一個法律的統治，儘管有著很多犯法的行為。封建制度，可能在它的最盛的時候，差不多和近代社會同樣有效力地、同樣廉潔地實施法律。因為中世紀時代的思想與實踐迥然不同於今天的思想與實踐，我們不該錯誤地認為：過去的文明必然是比我們的文明低劣。封建制度雖已走過了它的歷史過程，但它的基本原則——財產的占有須附有公共義務，巨大私人財產應對社會負有某種責任——還是良好政府和公平的社会关系的精粹所在。

那些充滿流行的政治和社會民主思想的人們，容易譴責封建制度的貴族性質。但因為貴族階層的最優秀分子受到無論對上或對下的相互責任感的激動，所以他們對他們所屬的整個社會，抱有一種責任和社會義務的觀念。這種貴族是屬於地主貴族階層。他們的財產是在土地方面。中世紀的政治概念是：財產和社會勢力授給人們統治的權利。行政服務和占有土地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土地財產決定了政治。但這項中世紀概念也主張：財產附帶着對社會義務的履行并使責任和特權聯在一起。阿克吞勛爵寫道：“中世紀自由權概念異於近代自由權的在於這一點：它是以財產為依據的。”麥特蘭發表了同一的意見說，“在中世紀時代，自由權和財產權，是密切地聯系着的觀念”。

在那時候，各種不同類型的法律，可能正在它們的多样性里存

^① 斯達布斯：《案卷叢書導論》，第109頁。

在着刺激因素，而今天在我們方面，法律的一致性里潛伏着虛弱和單調性。不管我們對目前狀態存在着什麼偏見，當封建制度最後站穩時，它是一種高貴的政府形式；對於一種燦爛文明的創造是有貢獻的。

到了十世紀中期，附庸與宗主的相互依存關係，附庸對土地的实际權利（理論上土地是作為一種禮物來保有的），附庸把這些土地傳給子孫的權力，這些原則及其他一些原則已獲得了一般的承認，逐漸發展並調整了中世紀社會的機構。……一旦確立之後，又替一個新的人道概念鋪平了道路。完全以這些原則教養出來的第一批後代，就能夠停止長久以來關於行政問題的爭論。由於不討論統治方法，他們就可以專心致志於他們的社會和智慧福利方面……幾十年來曾消耗力量於這項鬥爭里，但結果證明了這項努力是正當的。^①

早在 988 年，不僅教會而且世俗君主，由於私戰的減少結果，能夠想及普遍和平的理想，並實際上為了這项目的，曾草擬過歐洲的國際聯盟的計劃。

我們用不到以小說的色彩來渲染封建制度的某些原則，使人羨慕它們。在实际的行動上，它們是高尚而可貴的；雖然其中有很多原則，象在所有的社會里一樣，常常是被陽奉陰違的。個人名譽心和忠心，甚至在最強暴的時代是一個積極道德力量，關於這一點，人們只要一讀那寫成於第九世紀後期的《都奧達的手冊》就可明白，並可發現：那里所包括的訓言決不是空話。在封建紀錄里，一個人的最無耻罪行，是暗殺他的宗主，而這種罪行在中世紀時代是最少見到的。在封建時代里，找不到關於附庸或臣屬暗殺他的宗主的事例。弑君是後來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時代所採取的一種政治策略。《魯息雍的吉拉特歌》是反映最強暴的封建時代的，我們從中看到一個杰出的例子，可說明附庸對他的宗主宣誓

^① 瓦梭，見《近代語言學會的議事錄》，新編，第 17 卷，第 51 頁。

效忠的关系所具有的崇高道德价值。故事里說，吉拉特在逃匿森林之后，当夜住宿于一个老隐士家里；他把自己要暗杀他的宗主的阴谋告诉了隐士。隐士深为駭异而惊喊道：

你将杀死你的宗主嗎！僧侶、圣徒、主教、教皇，他們都永远不会同意給你以教会的宽恕的。神学和聖經宣布：对于乱臣贼子应如何处理。他将被四馬分尸，軀壳用火焚毀，他的尸灰将被风吹散，他的行刑地点将是邪恶的地点，寸草不生。

在十世紀，当基柏特·得·諾戎猛烈攻击琅城主教阿瑟林的叛逆时，他所感到的惊异事情，不是一个主教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而是一个对他的領主曾宣誓效忠过的人竟至违反誓約而图謀杀害他。

从来未曾有过比封建政府更强烈的人治政府，而这种政府的基本原則是相互的負責。国家是一个松懈的契約性的社会有机体。誠然，教会的教义給国家注入了宗教的性质，但归根到底，政治性的制裁是多于宗教性的。甚至主教們的政治思想也进入了封建制度的常軌。

教会作为人类中間上帝意志的解釋者和制定者，在理論上是占有卓越地位的。它曾以废黜路易虔誠者和查理胖子来在实际行动上实行这项理論。因为正义是上帝的一个属性而教会是一个神命的机关，所以，教会要求：它有权决定在国王的行为里什么是正当而又公平的，什么反是。

为了更有把握地使国王将公正地統治，规定国王必須同意一項誓約即加冕誓詞；那可清楚地反映出国王权力的契約的和封建的性质。按誓約，国王的責任是：执行正义而自己也服从法律。如果他未能这样做，契約就可作废；而他的臣民是有权撤消这契約的。按封建法律，一个附庸有权对他的宗主甚至国王作战，如果后者拒絕了正义。他可撤消他的臣服誓約并对他的宗主挑战。反是

亦然，領主可廢止對他附庸的保護關係並對附庸挑戰。

一般人以為，中世紀時代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和蠻橫的強暴時期。這個時期果然是強暴的，但它不是沒有法律的。的確，雖然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對法律的敏感性往往正是暴力之所以產生的理由。關於這方面，主教斯達布斯在下面一段比近代任何歷史家寫得更精彩的文字里，予以闡明。

中世紀歷史是一種關於權利與侵權行為的歷史……權利或諸權利的觀念，是中世紀時代的指導思想——所以如此，因為在這時期的最偉大的人物中，存在著一種提高法律地位的有意識的企圖和一種遵守法律的意願；同時，在劣等演員中即在下層的人群中，有著要維持他們既得權利的傾向；當他們攻擊他們對方的財產或侵犯後者的顯然平等的權利的時候，他們這樣做，也是以法律的托詞作為理由的……中世紀時代……是法律成長的時代，就是說，在這些時代里，那體現於法律中的權利觀念，是政治家的領導思想，那按法律條文所可證明或辯護的權利之觀念，對政客們是有著一種深刻影響的……對於流血，沒有什麼害怕，但對於破壞權利倒有巨大的恐懼……〔這權利〕不是僅僅以強權者的邏輯，而是可以用法律的條文來辯解的東西……中世紀戰爭，照例是權利的戰爭：它們很少是未被挑釁的戰爭，從來不是絕對無理由的侵略戰爭……戰爭是很多的，不論公戰或私戰。它們的意義不是在於：人們愛好法律，而是在於：他們非常尊重法律，似乎要使它一直站在他們方面。他們進攻他們的鄰人，不是因為他們需要光榮，或因為他們不能容忍競爭，或因為他們鄰人的軍隊太強而威脅了他們的安全，或因為他們鄰人的軍隊太弱而很容易征服；但是〔作為作戰的理由〕他們提出一種法律的要求或一種法律的申訴；而在大多數場合，他們所提出的是真正的法律要求和真正的法律申訴……人們應用法律來報復他們所受到的侵權行為，來實現他們的權利；當他們不能使法律發生足夠的力量而獲得效果的時候，他們就採用戰爭的辦法了。^①

正是中世紀時代的人們對正義問題的這種敏感性（幾乎可以說是超敏感性），正是上述心理狀態的證據。正義觀念沒有過比在

① 斯達布斯：《中世紀和近代史第十七次演講集》，第241—253頁。

封建时代更少空談，而更多实际意义的。但正义包含着制裁，而这种制裁一定是法律。可是对中世紀人們來說，法律是經驗和傳統的產物。它是習慣，即过去經由各世代所积累起来的，而被当时代的人們所默認的东西。甚至王公也不能違反這項習慣法。習慣法是最高法律；它的任何变更必須經過大家的承認；如果社会太大，又太广泛地分散使无法表示贊成与否，那么，至少它也須由統治階級，即高級貴族的接受。国王本人不是在法律之上，因为他是属于貴族階級而有助于他的階級的法律的形成。他也是服从国家的習慣法的。他的权力远不是一个专制国王的权力。圣奥古斯丁的格言：不公平的法律不是法律，加强了这项和成文法有所区别的“自然权利”的原則。国家服从法律这项日耳曼原則，和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这一項古典傳統，是相抵触的。

我們看到，這項新的和絕對的理想反映在十一世紀历史編纂學方面。同时，中世紀法律的研究者也开始查出：法律的要素的根源既不是羅馬的、也不是教會的、也不是日耳曼的，但它們可說是封建性的。显然，有些新的和建設性的观念，开始在封建社会里起着发酵作用。在十世紀历史上，很突出的无政府和純粹野蛮力量的日子，无限制的强暴和蛮橫的日子已开始消逝，而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放出了曙光，在那里，权利与責任、特权与义务的相互关系，已被更好理解并更多地尊重了。

从社会方面讲，封建社会是貴族性的。我們有若干关于社会状态的精彩著作。那一个三分社会即三“等級”社会——僧侶、貴族与平民的社会——的概念，在中世紀历史里早已出現：僧侶的責任是：祷告、贊揚上帝并在精神上救济人类；貴族的責任是：保护秩序、执行警察权并防御侵犯；平民的責任是：劳动来支持上面两个特权等級。

我們看到，这两个上层等級的社会职能，在 747 年教皇撒加利

写給丕平矮子和法兰克国家的主教和显貴們的一封信里，已經特別指出。五十年后，阿尔琴說到英国时，慨叹僧侶的“世俗浮华”作風和貴族的“貪婪”与“不公平”品质。“三等級”这个名詞出现于821年法兰克主教們呈路易虔誠者的奏章里，而各等級（意指僧侶和貴族）出现于828年一道詔令里。在第九世紀末期，三等級在《圣柏騰的奇迹录》里已完全区分出来。稍后我們看到克伦尼的鄂多确定了封建社会內第二和第三等級即貴族与农民之間的关系：就是：前者保护，后者劳动。其次，琅城主教阿达尔貝伦，約在1000年时呈法王罗柏特虔誠者的奏章里說：

因为上帝家庭的三系认为属于一体，所以有的人祷告，有的人保卫，其他的人劳动。^①

扎克·得·維特里說过：僧侶是眼睛，因為他們看到并給人們指示安全的道路；貴族是手臂，他們的責任是：保护社会、实施正义并保卫王国；平民是人体的下部，他們的責任是：支持并負担着政治机体的上层部分。

这些特权和等級观念，渗透了封建制度盛行下各国的整个中世紀社会；就是說，在所有中欧和西欧的国家里。我們在盎格魯·薩克森英国看到“社会三分鼎足”的观念：在一本认为由阿尔夫立克写的手稿里写道：“每个公平的王座在三只脚上，这样，它立得完全对。一只脚是僧侶，一只脚是劳动者，第三只脚是貴族。僧侶是祷告的人；他們奉祀上帝并日日夜夜为全民族代求神佑。劳动者是做工的人們”。諾曼人的征服英国曾重申并加强了英-法人的这项社会态度。所以，在十二世紀，索尔茲巴立的約翰曾应用保罗所用的身体和四肢关系的旧比喻，来发表了下列一段話：

我称那些人是国家的脚，他們执行微賤的手艺，促进国家和它成員的物

① *Triples ergo Dei domus est quae creditur una;
Nunc orant, alii pugnant alique laborant.*

质进步。这批人是：永远被束縛于領地上的劳动者，制造羊毛織品或木器、鉄或青銅器的手艺工人，那些負責維持我們生活的人們，那些制造为生活上所必需的千百种用品的人們。下級人的責任，是尊重上司；但后者方面也必須帮助那些在他們之下的人們，并供应他們的需要。

在封建时代的德意志、意大利和西班牙作家中間，我們看到他們关于确定两个統治階級对被統治者的社会态度，有着相同想法与說法。在中世紀遺囑里，人們可常常看到处理一个农奴“和他那一族类”事例，这一句老套語原来是用以描写一窠小犬或小猫的。

軍事等級制比僧侶等級制远更傾向于形成一个关闭的等級制，在那里每个成員是一个有这种或那种地位的貴族。任何人不是“出生”于貴族家庭，休想进入这一阶层。在德意志，封建等級叫做“盾”(shields)分为下列各級：(1)国王，(2)作为王室的附庸的教会公侯，(3)大公爵和侯爵以及后来享有王权的伯爵，(4)保有教会封邑的世俗公侯，(5)属于世俗大王公的附庸的伯爵和男爵，(6)自由騎士，即伯爵或男爵的附庸，(7)“半騎士”即不自由出身的人們，由于担任軍事服务和表现勇猛而从农奴地位被提拔到半騎士地位。最后一种地位，可受封于正式騎士或其他貴族，但不得受封于相互之間。在法国，等級的划分既更松懈而又更多貴族性。然而，严格划分的等級，早已不复有什么意义了。一个伯爵可受封于另一个伯爵（連国王在一个时期也曾是圣得尼斯寺院住持的一个附庸），甚至低級貴族可被当作最高等級的貴族，象里摩日的子爵那样；他比許多伯爵拥有更大的力量、更高的声望，他是庫栖地方的“老爷”；他的自豪語是：“我既非公爵又非男爵。我是庫栖的‘老爷’”。另一方面，任何非貴族出身的人，休想爬上貴族的地位。在法国，自下侵入貴族階級的情况，象在德意志的“半騎士”那样是不可能有的。一个平常的自由人所可达到的最高等級，是騎士地位；即使如此，他的勇敢精神也須有清楚的証明。

每个附庸，是属于一个等級比他高的貴族的臣子。在封建等級里，最低的是騎士等級。只在德意志有着无土地的騎士，他原来不是出身于貴族血統的而是一个担任軍事服务的农奴。在其他的地方，騎士地位，只是属于貴族阶层的，而且騎士是一个拥有地产的人。一般說，騎士是沒有城堡的，但他們构成了一个大男爵的扈从队的一部分。在和平时期，他們是男爵的警吏，而在战争时期是他的近卫。此外，还有一种騎士，他們不是用于野外的服务而是用于活动較少的任务，特别是守卫城堡方面。他們叫做“陪臣”(Vavassars)。“他們留在家內，人数固定；他們耕种他們的土地，沒有象正式騎士那样地分心或遭受誘惑。这种騎士和下級附庸形成了一个环节，接着是农民階級”。

在封建时代，社会差別看来虽分得很清楚，但实际上，在每个階級內的差別却是模糊的，而且这些階級也是互相混淆的。在貴族階級中，最最低的等級(Minores, minores, mediocres)，低微得很；他們仅仅是小紳士呢？还是比普通自由人高一級的特种形式的自由人呢？如果如此，是怎么回事？他們是不是那些摆脱了封建制度的压力而得保留下来的自由地^①所有者之残余呢？貴族漸降为自由人；同样，自由人也漸降为各种不同程度的不自由人。自由人可爬上騎士地位，同样，在德意志，有才干的或幸运的农奴也可爬上“半騎士”地位。

在德意志，社会等級的差別沒有象在別处那样地明确表现。領主使用他們的不自由仆人(因材使用)，作为乘馬的信差、旅程上的随从、卫士以及在他們的小斗争中的兵士，甚至讓他們参加軍隊来

^① “alod”这个詞是从德文前置詞“an”和“lot”或“lod”两个字組成的，意即“用抽签方法所获得的土地”；这是起源于第五世紀日耳曼人征服时期分配羅馬人土地的方法。这种土地是“自由地”(參閱第四章)。“feodum”(“fief”是从这个字得来的)这个詞，是“lot”、“lod”、“od”(意指“地产或不动产”)和“feo”(意指“金錢”或“工資”)的混合詞。所以，“fief”(封邑)原来是一块俸祿地。

扩大自由扈从的队伍。“半騎士”、家奴、武装的和乘馬的侍仆，大批出现于領主的扈从队里；他們为了这类服务，領取那些經常准备好的配备与土地的賜与。这些“半騎士”形成了武装扈从队里的一种特殊等級；他們的地位較低，但有爬上重要而負責位置的很大可能性，并可終于获得和自由出身的兵士和騎士的平等地位。他們負責看守城堡、桥梁、商站和稅关。皇家“半騎士”的地位最高，但那些隶属主教或王公的“半騎士”也被委派为城市和地方的执行吏和行政官。他們所占的地位，非常有利；因而这批暴发戶侵入了騎士阶层。所以，出现了一种附属騎士团；就是，騎士团分为大騎士团和小騎士团，而“半騎士”属于小騎士团。

自由农在封建制度最盛时期中并在这个时期之后，究有多少人数得保存或遺留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問題，也是一个难解決的問題。我們知道：在薩克森、多斯加納和部分郎基多克，有大量这类的自由农維持到后来的时期，而且他們从来未曾完全被納入封建制度的框框內，不論在政治或社会方面。这一阶层的勇敢和毅力是杰出的：他們勇敢地抵抗了由邻近封建主迫使他們接受附庸关系所加的压力，他們还在沒有一个宗主保护的条件下坚决地粉碎了暴力和征服的企图。十一世紀似乎是使自由地封建化的最强烈的时期。在十二世紀，郎基多克的有些自由农組成了防御同盟。我們不知道它的結局如何。可能，由于对亚尔比教派的十字軍的結果，它跟着南法的遭受蹂躪破坏而消失了。

在下面关于庄园一章里，我們將談到：中世紀男爵在业主地位上获得若干种进款，而这些进款是他从自己庄园上所占有的垄断权得来的：例如，法院的訟費、烘面包炉、酿酒坊、磨坊，等等的使用費。但与此庄园进款不相干的，他还有其他进款，而这些进款是从他的封建主地位上所享有的“权利”得来的；这种权利从历史上讲代表着原属于中央政府主权下的地方权力的残余。其中有司法权

(按照他的等級, 分为“高級”或“低級”的司法权)、鑄币权、市場权、通行稅权、關稅权等等。很少貴族在行使这些权利时, 抱着什么公德的观念的。所以, 十一世紀当都尔的鄂多建造了一条横跨罗亚尔河上的大桥而不征收任何过桥費的时候, 他的行动曾使人們大为惊异。

在十二世紀, 貨币数量由于十字軍运动和貿易的复兴而大大地增加起来, 但在这以前, 現款支付曾认为是一个豪富的象征。所以, 貴族們切心要保卫这项鑄币权, 因为它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鑄币权是属于国王統治权的一部分。喀罗林朝貨币原来是純白銀的, 最古老的男爵貨币也是如此。但后来, 貨币逐步減成色, 搀杂其他金属, 重量減輕。“这种变质是合法而持久的, 又是不断发生的”。为什么发行了这种从經濟上来讲是劣币的呢?

这种經常的改变貨币之主要原因, 可能从鑄币权的性质里找得出来, 領主认为鑄币权是領地上的主要財源之一。他利用了自己所占有的这项特权来爭取最高利潤。貨币成为一所庄园正当收入的重要成分。鑄币稅^①改变为对所有买卖交易上的一种比例稅。这一种稅, 在实行方面既便利, 而在征收費用上又低廉, 而且沒有分別等級或人的麻煩。这就表现在經常誘使大业主搀杂币质和取消旧币来发行新币。这种行为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大的禍害, 因为那使很多人貧困化或陷于破产。而且, 那些繁杂的貨币, 对任何貿易的經營, 除了地方性的貿易外, 都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領主还有从他宗主地位上的特权方面所获得的其他进款。按封建法領主是已死了的附庸的未成年子女之监护人, 也是死者傳給他們的財產之保管者。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領主利用了这个地位来揮霍掉或吞沒整个財產。封建法院里有无数的訟案, 还

① 即統治者对于鑄币按成抽取利益的稅。——譯者

有許多小戰爭發生；因為受害嗣子的親屬向法院申訴，或竟訴諸武力，以求得賠償。同樣，一個領主對他去世的附庸的寡婦有管轄權。因為領主的主要利益，在於有一個凶狠而強壯的附庸來保管在他宗主權下的封邑，所以，他照例迫使寡婦再醮，並常常強制她接受他所代選的一個丈夫，絲毫不顧及女方的情感。中世紀的婚姻關係，遠不是象小說上所描寫的那樣，是感情的結合，而大多是一種利害關係上的婚姻，也是一種野蠻強制的婚姻。年輕嬌嫩的姑娘被迫嫁給粗魯而又往往是淫蕩的丈夫。那人人熟悉的《梅依和詹紐亞》^①的婚配故事，是普通的事情。為了逃避這種暴虐，年輕處女和年輕寡婦實際上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進入修道院做修女。所以，許多修女本就是傷心的寡婦或少女。一個有錢的寡婦會象潘尼洛比^②一樣有許多不合适的求婚者，他們常常採用強暴方法來強制求婚，例如，用圍困寡婦別墅或用搶親方式。當阿奎丹的愛蘭諾和法王路易七世離婚以後回到波爾多時，有五个求愛者追逐她；個個人拚命要抓住她，因為她是歐洲最富的女繼承人。人們可以相信：她之所以倉卒嫁給亨利·金雀花的原因，部分是為了她需有一個能夠保護她土地的丈夫，以防止侵占。一個富孀如果打算還要活在世界上的話，世界就不會讓她安身的。

婚姻常常是一種契約，是為了要締結一項有利的聯盟，要避免一塊封邑因無人繼承歸還國王，要保持一塊特殊土地於家庭里，要獲得新土地而訂立的。我們很少看到關於征求少女或她母親對婚姻意見的記載。象下列這類故事，是罕見的。“阿登的領主夫婦很歡迎基斯納伯爵提出的求婚，公開地表示了他們的高興，並詢問他

① 這典故見喬叟：《坎特布里故事》的《商人故事》篇中，里面敘述一個可愛的美女梅依嫁給詹紐亞老翁，一個六十歲的倫巴男爵。——譯者

② 見荷馬史詩《奧德賽》，奧德賽多年在外，音信全無，人們以為他已死了，很多無賴的求婚者見奧德賽的妻子潘尼洛比既美貌，又富裕，都想強求她答應婚事。——譯者

們的女兒是否同意。女兒沒有不愉快的情態，但看來很快樂，因此，她以面上的表情來証實了她的願意；她聽了她父母的話後眼睛裡閃閃發光，似乎說：她從來未曾有過比這更加合意的事情”。

在中世紀時代，婦女問題不見得比我們時代的要少；而且和我們的一樣，那主要是關於職業的問題。那時和現在一樣，婦女的人數比例超過男人的人數比例，又在一個好戰而又是顯著的男性形式的社會裡，那為婦女找尋一個職業的問題，可能比今天還嚴重。可是，畢赫爾發表過這樣的一種意見：在中世紀時代，婦女未曾被排除於她們所能够做的任何工業範圍之外。對有些婦女，修道院是一個避難所；對其他婦女，十三世紀創立了“婦女休養所”（*beguinages, samenungen*）——我們可稱之為“居留地”——在那裡，那些有文化而小有資產的婦女可找到住所。總之，我們可以說：中世紀時代，在處理婦女問題上，是和近代同樣地成功的；因為每個時代是按照它的見解來行動的。

在上面講到教會的一章裡，我們已略為談過中世紀時代私戰的禍害以及教會通過“上帝和平”與“上帝休戰”企圖管理或取締私戰所作的努力。在本章裡，我們也已指出：很多中世紀戰爭，是一種“為權利的鬥爭”；就是，受害人由於法院的軟弱或缺少法院，由於領主的不公平的行為，拿起寶劍來捍衛或保持自己“權利”所進行的鬥爭。

現在我們應該找尋私戰的經濟動機和經濟後果。但在這樣做以前，我們先略談几句應該注意的話。當私戰不再是象路劫商人旅客那樣的真正打劫的時候，當它不再是由強盜男爵所干的時候（必須從這種情況清楚地區別開來），它大部是屬於很小範圍和很小地方性的類型。而對它流行的情況，也有著過度誇張之處。一個中世紀歷史家，也象一個近代的新聞記者那樣，他喜歡報告例外的、特殊的和不平凡的事情。我們時代的文明，如果單單依靠各報

新聞欄內的消息來作估計，大部分似乎是戰爭、暗殺和突然死亡的文明。在世界上一件坏事所放射的光芒，一般比一件好事所放的要遠得多。編年史家對那些成千累萬的好人和誠實人沉默不談，那並不意味着在那個時代就沒有這些人的存在；他們力圖過着規規矩矩的生活，他們關心于在他們土地上農奴的命運，他們也不擾害他們的鄰人。如果我們能有更充分的資料，那無疑地將指出：在那整個時期內，在很多地方上，城堡內和莊園上的日常生活是依循它的習慣常規進行而很少有所變更的。應該記得：歷史，象近代報章雜誌所記載的那樣，“只不過是人类的罪行、愚蠢和不幸事件的記錄而已”；吉本冷酷地認為，這畢竟是歷史的主要內容。

很多中世紀戰爭的根源，是和它所從生的經濟土壤分不開的。

莊園制度具有領主與租戶的相互關聯的要求，錯綜複雜的共同與個別的权利，這是強烈地引起爭執的原因。爭執的機會，還由于下列流行的習慣而倍增起來：地主家族所占有的地產往往是廣泛地分散在全國境內的小塊土地……所以，每個大家族不是努力集中他們的利益于國境內的某一地段內，而是露骨地希望把它的權利要求擴張到任何角落里去；因此，一個領主差不多和商人一樣，必須經常地在路上奔波，騎馬或搭船，從一個莊園到另一個莊園去。

從軍事方面來說，封建制度是：

那種分駐于農民的家裡的一支常備軍來負責保衛并管理這地方的制度。戰爭和行政兩者都是私人的事情。對於在自然經濟狀態下的純農業人口，沒有其他解決問題的办法。農民既分散而又附着于土地，他們不能被利用于戰爭方面；而對於兵士或軍官也只能以土地的賜與作為薪給……土地既然是唯一的富源，所以唯一的經營，是在獲得更多的土地。為要做到這一步，只有兩種手段——婚姻與戰爭。所以，他們慣常採取這兩種手段，象今天從事任何種工業企業那樣慣常……戰爭使封建主獲得土地與農奴而發財，它也使他們的騎士和扈從獲得戰利品與贖身金而致富……正是這種貴族在繼續戰爭方面所享的特殊權益，幾百年使各種為取消私戰而作的嘗試歸于失敗。他們為了供

應軍隊會分租出他們的地產，直到土地不復能支持這樣多的不生產者；而這批不生產者只能用來打仗。^①

在諾曼底，在 1066 年前，男爵們的內戰已使他們的資源枯竭；所以，他們曾熱切地支持威廉征服者的侵入英國。如上所述，十字軍運動是另一個大規模的相似事例。

封建收入的結構，也可部分說明這項連綿不斷的小型戰爭的現象。對於象農產品那樣的易腐敗的財富，任何積累的過程，是不可能有的；在封建的盛世，除了珠寶和金銀器皿外，男爵們沒有任何別種財物。於是，占有產生這種財富的土地和土地上的農奴勞動，是貪婪的男爵們所可致富的唯一途徑，而最現成的取得方法就是戰爭。各處所採用的辦法是：“首先破壞土地，然後毀滅敵人”。但這項行動帶來了經常不斷的戰爭。

關於私戰禍害的逐步減少，不是完全由於教會與國王的壓制政策的效果；當時，終於完成中央集權化的君主政府已克服地方封建分裂主義而勝利出現。私戰之所以減少，一部分是由於經濟的理由。在這些鬥爭里，弱者被淘汰；只有強者得存留下來，因而鬥爭者的人數也遞減了。與此同時，農業的進步和人口的發展，使從莊園制度所獲得的收入增加了，所以生產品更多了，因而至少私戰的一個重要的刺激原因，即使沒有被除去，也已減少了。在十一世紀中期，已經達到這樣的地步，而且，男爵們的軍事力量，還在西班牙和“聖地”的十字軍運動里，找到了出路。

這項以對外戰爭來代替對內衝突的趨勢，還由於遺產繼承法逐漸改變的影響而加劇。古代日耳曼法律規定：土地平均分配於家庭的諸子之間。但在封建時代，關於男爵領地和軍事封邑的不可分割性的理論漸漸獲得了普遍的承認（德意志除外）；這項理論

① 《政治學季刊》，第 15 卷，第 599—600 頁。

后来导致长子继承法的建立，即长子继承父亲的全部世袭财产的法律；这样一来，幼子們只得漂流于外，以宝剑来在别处寻求生路。如果长子继承法未曾被采用，封建世界将无限期地留在各小邦互相冲突的混乱状态里，其中有的只有弹丸大小的領土。因为如果没有长子继承法，一个貴族一生辛辛苦苦为他的家族所建立的土地势力，在他死了以后，就全毁灭了；这些土地又分散了。維蒙答族的失敗，就是一个例証。在十世紀，維蒙答的赫伯特曾花費很长一段時間来占取了維蒙答、香宾、特啦、摩城各伯爵領地以及对无数寺院和主教区的僧职授予权。948年，在他去世以后，这些領地分給他的四个儿子，因而他所辛苦地創立的大国变为四分五裂了。

在十至十一世紀，当“上帝和平”和“上帝休战”运动开始要限制“私战”的时候，关于中世紀农民由于經常不断的男爵間的“私战”所遭受的痛苦，上文已談得很多。我們虽无意縮小农民从这个时代的暴力所受到的灾难范围，但必須在私战和純劫掠之間作出細致的区别。前者总是有着一項原則，尽管那項原則在今天大抵已成为过时的东西。而且，教会与国王不久先后对私战，即使未曾压制，也予以限制。在历史家所記載的这些强暴事件中，有很多被誤认为私战，其实，它們仅仅是拦路的打劫，也只可作为这类罪行論。誠然，这项区别不一定是清楚的，但历史家应有責任来区别这两种形式的暴力。从仔細閱讀九、十和十一世紀的編年史，我可断言：搶劫比私战的禍害还要大。在一百五十年期間，从850年喀罗林帝国崩潰的时代到1000年（在这时候，我們可以說，封建制度終于确立为一种政府的形式和一种社会經濟制度），可更公允地說：搶劫比“封建混乱”远更造成了当时的大灾难。在封建制度的“权利”出现和封建法的原则准許实现那些“权利”之前，“私战”尚未曾进入它的范畴。这些“权利”便是私战的根源。

强盜帮会在九至十世紀是普通的，而在十一世紀当政府变为

較穩定時則較少。後期喀羅林朝的詔令里常常提到盜匪，菲利厄寺院住持琉帕斯的一封信里談到 856 年的一個強盜幫會；《聖柏騰寺院編年史》在 870 年提到另一個幫會。夫羅杜阿的《理姆斯教會史》，曾三次提到過十世紀這類幫會。在“上帝和平”成立之前百餘年，我們看到，教會曾企圖以驅逐出教的威脅來遏阻這些匪徒。然而，還可置疑：在中世紀時代除在外來的實際侵略的情況下，正常生活，從整個看來，不也是象今天的生活那樣照常地進行嗎。今天的汽車匪徒可比諸中世紀時代的武裝馬賊，他們使美國的鄉村發生恐怖，可能和中世紀類似的匪徒曾使法國和意大利鄉村居民發生恐怖那樣。例如，伊利諾斯州所發生的鄉村銀行劫案，比美國任何其他各州所發生的要多得很多。在 1924 年，那裏有七十三次匪徒劫掠鄉村的銀行案件。在那一年 1 月到 6 月之間，有二十一次銀行搶劫案。如果人們從報紙新聞來估計美國的文明，美國的社會在公元 2500 年的未來歷史家看來是殘暴的，就象我們看十到十一世紀的社會是殘暴的那樣。

我們常常難於區別這些盜匪隊伍和雇兵隊伍；關於後者，在十至十一世紀尚是偶然提到，而在十二世紀，大封建主甚至國王就大規模地雇用他們了；那給老百姓帶來了沉重的苦難。這個時代自然地養成一群暴徒，他們是由跟隨封建軍隊的婦女所生的孩子；這批沒有家庭的人們，挺而走險，以劫掠為生。歐洲的邊境地區，在法國有布勒塔尼、不拉奔和洛林諸“邊防區”〔“馬克”〕，在基督教和穆罕默德教西班牙之間，有西班牙“邊防區”，在南意大利有亞浦利亞，在德意志王國的東方邊境上有斯拉夫“邊防區”，這些地區是這一類暴徒的成長之所。因此，他們常常稱為“邊境人”，或“馬克人”或“不拉奔人”（從低原國家的不拉奔得名的）或加達倫人（從南方的加達魯尼亞得名的）或“攔路人”，意即在公路上干着搶劫的人們。在理姆斯的一本編年史里，992 年最早提及這些“攔路人”。早

在948年，附庸的军事服务限期规定为四十天，因此对于这些雇兵的使用，更加需要。这批暴徒所干的暴行与掠夺行为比私战所产生的要多得多。敌对男爵的袭击，比较限于一个地区，限于只蹂躏相互之间的土地。而这些匪帮有时竟包围全村来勒索赎身金。从取缔这些匪徒方面，当地的男爵所可获得的利益和他的农民所可获得的利益，是同样巨大的。在这里，男爵的物质利益使他作为一个统治者责职相符合，因为他的整个财产在于他谷物的收获和他村民的劳动。在这一意义上，每个男爵是一种农村的警吏。

中世纪编年史里，富于这类掠夺的记载，常常是生动的描述。我们看到，在1138年有一个村庄就这样受到袭击：“农民正在农村的空场上打谷，而大堆柴草散乱地抛在茅舍的前面；所以容易找得起火的材料。因此，全村被焚毁了”。当碰到这类攻击的时候，如果时间许可，农民把牲口散放在森林里，让它们自谋生路。猪群当然在树林里乱跑。这种猪是瘦小的、背脊尖似剃刀的牲口，腿劲很捷；老公猪长着巨齿，确是凶狠的，几乎和真正野公猪那样；所以，除非遭到狼群的攻击，猪群一般是能够自寻生路的，但羊群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由于胆小成性而又习于成群结队，它真是“象羊一般地”被宰杀或被赶走了。

有时，农民有着一块天然避难所，他们在危险时期可以逃入。那在萨克森的绍图附近的“牛棚”，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这个“牛棚”是一条岩石的巨型拱道，只可从一边进入；所以这样地称呼它的，因为萨克森农民在危险时期把他们的牲口赶到那里以求安全。村庄教堂，特别是用石头造成的，也常常成为避难所，所有的牲口被赶到那里，而村民的家具什物也一并带入。

上文已经说过，关于封建早期的历史家包括当时代的历史家和近代的研究者，为什么大大地夸张了中世纪时代的劫掠和私战。其实，十三世纪和后来的时期，当英王以大量军费并在漫长的

戰線上作戰的時候，這些“大戰”的破壞性遠過於那些爭吵的男爵之間的戰爭，雖然後一種小型衝突也許是長期的，而且如上文所說，他們所僱傭的職業傭兵也是為非作惡的。

可是，就戰爭來說，我們切不可以為，以後的年代比起封建時代要“文明”得多。一個有資格的近代學者寫道：“封建戰事，按其本質來說，可能比後來世紀的戰事較不可怕，因為後一項戰事是在社會已失掉它的防禦力而尚未受到國際公約保護的時期進行的。不可能相信：諾曼底或都爾內在約翰時代所受的痛苦之深，象法國在百年戰爭時期或德意志在威斯特發里亞和約之前所受的那樣。”^①

中世紀戰爭，不是完全沒有限制的辦法的。

儘管有着很多變更，封建社會在十二世紀末期，是由許多原則來管理的；這些原則應用於和平，也同樣應用於戰爭。封建社會的法律是离不开武力的，但並未因武力而失色的；它們的結合是按契約理論進行的，而契約理論綜合着所有的封建關係的……武力從來不是不使用的，可是也從來不是無限制地使用着的。在司法程序中，我們可看到戰爭的要素，如司法決鬥與追捕犯人的呼喊聲；而在戰鬥里，我們也可看到經常應用法律理論的情況。戰爭是解決一個大訟案的方式。停戰條約很象一種准許當事人不到案陳述理由那樣；和約是按照最後同意而起草的和解協定；人質是一種擔保品；戰場上的軍務是法院上辯論的極相似的部分。

中世紀時代曾作過某種努力來尊重非戰鬥居民的權利，來補償那些蒙受巨大損失的人們。

在某種程度上，公道和慈善觀念在戰爭時期，表現得更為明顯。〔例如〕正式發還所繳的在戰爭時期被破壞的土地上的捐稅，準備接待從被威脅的城市里逃亡的難民；有時還補償教會財產所蒙受的損失；更慷慨地發放救濟金給窮人。但所有這些措施還是不能救濟了那種人：他們被時勢的艱難所迫無可奈何地出售了他們的土地或離開了他們的家乡。他們不能應付由飢荒所發

① 鮑威克：《諾曼底的喪失》，第357頁。

生的普遍影响，或佣兵的恣情纵欲的要求。关于由封建战争所产生的乞丐、妓女和餓殍之人数，我們只能作出些猜测。但可以断言，这批遭受灾难的人們一定是不可胜数的。^①

可是，这也决不是我們时代对封建时代的一种誹謗。

在中世紀时代，最惨重的禍害，是对敌人、俘虏、罪人和异端的残酷行为。关于这一点，羅馬的战争法和刑法的传统应負大部分責任的。然而，我們决不可以把残酷与野蛮行为混为一談。前者是从阴险的計劃而产生的。后者常常是从缺乏感情与想象而产生的。中世紀时代的艰苦和注重物质的生活——至少直到很后时期，当更高的文雅修养开始发生了它影响的时候——以及从社会的等級結構所产生的社会偏见，加强了这种不关痛痒的性情。中世紀的人們，不論貴族或农民，比近代人有着較粗糙的品质；他們的神經也不象近代人那样娇嫩，那样接近表面。他們的生活較粗暴并較有血气。近代社会由于这些坚韧品质的部分消逝，可能遭受了損失。

中世紀时代的人們，不象现代人活得那么长久。他們的平均寿命要短得多。但他們出来做事的时期較早，所过的生活也較紧张。长寿是人类的比較近代的成就。据一个詳尽研究过一千五百个中世紀人骨格的著名科学家的計算，在中世紀时代，死亡率的“最高点”是在四十二岁，而在今天它的“最高点”是在七十二岁。近代的卫生学和医学已綽乎有余地抵补了生育率的下降趋势。按比例說，虽然近代家庭比中世紀家庭要小，但现在生存下来的儿童人数較多；并有着更多的家庭。当然，人类的潜在寿命，在各时代里，没有什么变动，但现在比过去有較多的人延长了他們的实际寿命，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閱讀若干篇传记是很有趣的。中世紀

① 鮑威克：《諾曼底的喪失》，第 356 頁。

統治者與政治家，在和近代同樣地位的人們相比之下，壽命較短。在 918 和 1250 年之間德意志國王的平均壽命是四十六歲；在 987 和 1270 年之間，法國國王的平均壽命是五十五歲；在 1066 和 1272 年之間，英國國王的平均壽命是五十四歲。在德意志十四個國王中，只有六個人活到五十歲以外。腓特烈二世在五十六歲時逝世，可是他的事業已做得如此偉大；以致他被稱為“世界奇蹟”。腓力二世（奧古斯都）在五十八歲時死去，可是在那個時候，他已把法國版圖擴大了一倍。路易九世在五十六歲時死去；他已把他祖父所加倍擴張的法國版圖再擴張了一倍。獅心理查在四十二歲時死去；威廉·魯福斯在四十四歲時死去——的確，這兩個人都死於受傷而非死於疾病的。但在那個時候，戰爭風險本來是一個中世紀國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威廉征服者活到了六十歲。只有羅塞耳二世和腓特烈紅鬍子兩人，在封建時代的國王中，活到了七十高齡。

必須記住：這些在壯年死去的人們是中世紀社會中的優秀分子。教士的隱居生活可能使他們享有稍長的壽命。但農民與市民階級的死亡率怎樣呢？沒有一個近代保險專家會認為：中世紀的任何人——即使除了死於戰役的可能性外——可作為一個保險好生意的對象的。

在各階級里，兒童的死亡率，當然是高的。在一打或一打以上的兒童里，可能不會有三、四個兒童活得到成年的。《亞德勒斯的編年史》里，記着很多關於家族的瑣事，並涉及到三個世代；它指出：在三十六個家庭里，有七十一個男孩和五十五個女孩，每個家庭平均有着三個半兒童。它還提到：有十三個女人有着第二個丈夫；婦女再嫁與三嫁的事情，是常見的。

中世紀城堡中的生活情況，不象浪漫小說家和詩人所描寫的那樣。時代是艱難的，因而生活條件也是艱難的。在第九世紀當

城堡初次出現時，它僅僅是一個防舍，建造在一個小山上或在山岩邊緣上，或在一條河的彎曲處；如果在一塊平地內，則建造在一個人為的土墩上；這土墩是用從環繞它的溝池內所挖掘出的泥土堆積起來而成的。這些早期的城堡，完全是用木材造的。在十一世紀後期之前，沒有什麼石頭城堡出現；甚至在出現以後好多年中，在大多場合，石頭城堡的上層，還是用木造的。只有大“核堡”^①是全部用石造的。城堡是為了安全而犧牲舒適的。窗口只是厚牆上的裂縫；室內陰暗而又潮濕；扶梯峻峭。只在建築技術發展以後，城堡才得到擴大和改進。從建築式樣來說，中世紀城堡是一所有城垣的、有時還有城池的庭院，裡面有一個堅固高塔，是重要的建築物。從歷史上來說，它是一所設防的老式農場。在城堡周圍的原野上，遍布着農民的田舍，而村莊常常集合在城堡的山腳下。對城堡以外的其他建築物，也應用布陣法。教堂、寺院、橋梁、城門、甚至墓地，也是設防的。每個封邑錯綜交叉地布置着這類設防的工程。甚至大禮拜堂也表現出這種軍事的外貌。達拉姆大禮拜堂被恰當地說成是：“半是上帝的教堂，半是反對蘇格蘭人的炮壘”。亞爾比大禮拜堂的扶壁是真正的棱堡，它的門廊是通過一條登道進入的，而它的屋頂還有有槍眼的防禦牆。因為城堡有時成為強盜男爵的集結所在，所以有人太不加思索地推論說：中世紀城堡是一個社會的禍害，它所以被容忍了幾百年，只是因為人民無力剝奪它們的占領者。但事實適得其反。城堡的建造，不是為了侵略的目的，而是為了防守的目的；它常常是在周圍好多哩地方上的一所保護站，一所防止外來侵略的堡壘，一所壓制暴動與劫掠的重鎮。卡卡遜的大城堡，約在三百年時期中，曾為它周圍很大一片領土獲得了和平與安靖狀態。

① 中世紀時代城堡中之中間塔閣。——譯者

一所城堡，很少孤單地聳立着的，但它普通是一個確定的設防體系中的一部分……城堡從一個軍事的觀點來看，也同樣從一個財政觀點看來，是同周圍的或依附的地區分不開的。城堡主管轄區，包括城堡、土地、封建捐稅和財政措施；它是一個財產和軍務的人為的混合體，旨在維持領主的堡壘和利益。那以城堡作為中心的關係總體，是錯綜而複雜的。行政制度，象網羅般地籠罩在封邑上；把一切人都包括在它的結構之內，上自最高貴族、下至最低農奴以及森林中的隱士。

在這體系內，商人的活動和市集與市場的熱鬧都有它們的地位。寺院是以從遠處的執行吏管轄區所征收的什一稅來維持的……許多法律和習慣的維持依靠一個大“核堡”的存在……在山岩下的一所小教堂或宗教室作為它的禮拜堂。它大多是由于在它保護下的這小市鎮的創立人的勞動與貿易來維持的。城門外的或在偏僻地點上的醫院和傳染病院，是用王室的（或男爵的）進款來維持的。在城堡的大廳里，執行吏對周圍幾哩的鄉村，執行司法，並保護猶太人，准許他們在他們不能在別處購到的安全之下，進行他們的有利而負着風險的營業。各色各樣的人們，各帶着一張特殊証狀或保護証或出差証，集合在市鎮的街道上，並在大門口互相推擠……有法官、陪審官、申請者、押送國王犯人的騎士、攜帶財寶的仆人、飼鷹者和養狗者帶着他們的貴重付托物、帶着葡萄酒、魚類、造屋石、成捆的矛和槍的人們；還有商人、香客、辦理寺院事務的僧侶、售酒者、農民等。^①

當然，不是所有領主的莊園住所，都改變為這樣宏大森嚴的建築物的。莊園住所有時用木柵或牆垣，有時用溝池來圍圍，在戰爭時期，如果他的封邑遭受侵犯，領主就依靠他的城堡來保衛的。大貴族擁有許多城堡，但許多貴族只有很少的城堡。城堡主，是一個單獨城堡的領主。一個大城堡內，住着相當多的人口：領主的家族和來訪的朋友、各種家仆；還有馬夫、雜差、園丁、武士，其中很多帶着家族住在領主住宅外但在牆垣內的附屬建築物內；這些建築物是以庭院、拱廊或橋梁和主要建築物相連着的。這地方充滿着馬房和牛棚的臭氣，還夾着潮濕或蒸發的皮革臭氣。家禽可以在

^① 鮑威克：《英國歷史評論》，第22卷，第27頁。

房屋內自由出入，甚至女主人的房間要是沒人看守也會跑進去。有時，圍牆內有花園和果園，當領主出外打獵去的時候，在晴朗的天氣的時候，貴婦們坐在那里，忙于刺繡或奏音樂或作遊戲；在那個時候，打獵是中世紀貴族的一種特權，也是一種嗜好；而且關於這種狩獵，是沒有什麼“禁季”的。

但中世紀城堡內的日常生活除了在戰爭時期，是很單調的，特別是對婦女們來說；她們所看到的外面世界，不象男人們那樣多。在十二世紀文學復興之前，很少俗人能夠寫讀；因而書籍是找不到的。領主夫人和小姐們有着她們個別的例行工作，即監督和管理家務；但除此之外，他們就覺得日長如歲了。因此，當塔樓上更夫吹起号角報告有陌生人來臨的時候，那是一件歡迎的事，除非它偶然是敵人來臨的一個信號。不論來人是：主教或僧侶、男爵、香客、流動商人、游蕩者、游吟詩人、巡遊的演員或帶跳舞熊的賣藝者，他們概被歡迎，并按他們的地位給予款待。

食品是充足的，但它的種類是有限的，在十字軍從利凡得帶入了香料和調味品以前所流行的烹飪法，也是簡單的，可食的蔬菜是：菠菜、蕪菁、紅羅卜；只有蘋果和生梨是豐產的。肉類是大宗食品，而大吃是一個普通現象。肉的烹飪是把肉放在木炭上或在一根鐵釵上來烤，也放在爐灶上的鍋子內來煮。家具又少又簡陋：有放在支架上的木板桌子、木板長凳或靠背椅子、少數椅子（但更正確說是櫈子），在牆壁四周還有几只藏衣服和被褥的箱子。在十字軍帶入地毯和挂帷之前，地板和牆壁是光禿禿而又冷冰冰的。在冬季，用灯心草或柳條或麥秸鋪在地板上，直到它由於獵犬的污物和食時所投下的骨頭而變為臭氣熏人時，才把草蓆移去。羊毛織成服裝是普通的，夏季和冬季一樣；的確，這些城堡的內部是如此透風，如此寒冷，即在夏季，也必須穿厚衣服。衬衣在十三世紀被採用，也是因為在十字軍時期輸入了絲綢和棉織品。但這種衣料是昂

貴的。睡衣尚無所聞。甚至最高級領主和貴婦們也是赤身睡在床上的。床是高高放在地板之上，掛着帳子，以防通風。在這一方面，國王和王后的享受不見得優於他們最富臣民所享受的。當聖路易從“聖地”返國所搭乘的船隻起火焚燒時，法國王后一絲不挂地出現在甲板上。然而，優雅的作風還是維持着的。妻子一般先到床上去就睡而後她的丈夫解衣。早晨，丈夫先穿起衣服，而禮節是靠床上的帳子來保持的。一般人認為上層階級漠不注意清潔，那是一個錯誤。中世紀文明是一個“千年不沐浴”的文明這一類流行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每個城堡庭院里，有着一口水井，而只要可能，還常引入活水。在中世紀時代已使用鉛管。有洗澡桶，在條件好的城堡和寺院內也有廁所。在“教堂馬房”的周圍，已找出了十二世紀的定期沖洗陰溝的配備。在留埃斯修道院內，一百二十個修道士各有他私人的單獨洗盥所。最近也已發現了西敏寺修道院內的濾水池的遺迹。

騎士制度反映出貴族的輕鬆、浪漫和理想主義的風度。騎士精神遠不是一種純粹的風尚。它是一種制度。它最初出現約在1100年，但直至百年以後，它的原則和實踐才確立，而這制度才成長得羽毛豐滿。我們可從騎士團的條例里、有關騎士行動的誇張的手冊里，尤重要的，從騎士小說里，研究作為一種理想的騎士精神。在裝飾這類書籍的彩飾畫的殘余畫片里，也可找到有高度說明性的材料。騎士精神的根源，在於日耳曼和基督教傳統在封建時代的混合，但薩拉森文明對騎士制度也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影響，特別是關於紋章制方面。在十三世紀，騎士有着他的軍裝，和包括有彩色盾和盔帽的標志，這些標志是不可轉讓的。象僧侶一樣，騎士免交賦稅，他並以他的服裝和他的軍人腰帶（包括腰帶與寶劍）來和他的下屬區別開來。834年，當路易虔誠者在阿替尼遭受侮辱時，他拿下了他的寶劍和腰帶，並把它們放在祭壇腳下；他不願再

拿起他的宝剑，直到后来一个主教亲手再把腰带加在他身上。騎士属于某一等級，而它按照下列規則也有它的附庸等級：誰是另一騎士的附庸，誰就不是他的平等人，虽然两者都是騎士。所以有这种轉变的理由，是不难找出的。在封建早期，当男爵战争很普遍的时候，一个貴族需要大量武装扈从，并能够以战役中所得的战利品来維持他們。但当欧洲的和平趋势，由于教会的和平运动和王权的提高而日益增长的时候，男爵对騎士随从的需要和他維持他們的經費，也跟着递减了。于是，騎士团开始硬化为关门主义的貴族团体；因而参加这个团体，是受到严密防止的。这一种排他性的政策，在十二世紀后半期已显然可见，而到了十三世紀，騎士团在封建欧洲，除了在德意志以外，到处几乎都是一个不开放的圈子。

騎士制度中的基督教成分，当然是通过教会而来的。当教会变为封建化而主教和住持履行軍事服役以后，在基督教理想中开始了一次革命。虽然教会表面上慨叹地說，一切战争是有罪过的，但它认为，反对异端和不信神者的战争是具有正当理由的。然而即在这种战争里，它也不贊成教士参加战役的。但事实胜过理論。沙脫尔的孚尔培早在十一世紀已告訴国王罗柏特虔誠者說，沒有理由可以辯护主教参加战争的行动。但罗柏特的儿子亨利一世率直地向教皇說，主教和住持不能出席理姆斯會議，因为他需要他們去鎮压一处封建叛乱。夫勒里的阿波（死于1004年）詳細討論过“战斗的僧侶与他們的軍役”。^①

然而，屈从于时势的需要，教会从《新約全书》的思想和保罗的訓示找到了慰藉：前者指示說，每个基督徒是一个“十字架的兵士”，后者教导說，“穿着上帝的全部甲冑”。而且，教会发现了一项原則来区别“非正义”和“正义”的战争。这项差別在“上帝休战”和

① de militantibus clericis et eorum stipendiis.

“上帝和平”的公約里，已經默示，而最后在騎士制度和十字軍運動里，邏輯地規定出來了。辯護戰爭的正当理由，起初是旨在压制盜劫和私戕，保護僧侶人身與財產以及人口中的無防衛力量部分，如婦孺、農民和商人；但後來這種辯護在法國騎士對西班牙穆罕默德教徒進行冒險出征時，達到了高峰，基督徒從異教徒手里奪回聖墓和征服“聖地”的運動，則是從這裡再向前跨進一步，而達到的同樣性質的出征。

對這一種思想的革命，克倫尼派起了很大的影響。正是克倫尼派，提倡了“上帝休戰”；他們最先宣傳了對西班牙進行十字軍運動。也是從克倫尼派，神廟騎士團、醫院騎士團以及整個騎士制度獲得了他們的理想：完善的騎士，應是獨身者甚至削髮出家者，象神廟騎士團那樣；〔承認〕騎士宣誓的神聖性質和入團儀式的至聖性質。琅城主教阿達爾貝倫的諷刺，給克倫尼派好戰理想，打了一記耳光：他敘述說，一個奉命出差的克倫尼派僧侶怎樣“在晚間騎着一匹渾身是汗的駿馬回來”。主教幾乎認不得他了，問道：“你是我所遣送出去的修道士嗎？”他回答道：“過去是修道士，而現在是一個騎士了。我願在我的元首，克倫尼王奧狄洛指揮之下服軍役。”

第二次十字軍開始時，聖伯爾拿被推為出征的領導人，他記下了他的沮喪心情。他驚嘆道：“我是什么人，竟負責一個軍營而站在武裝兵士的面前呢？還有什麼事情和我的職業更不相稱呢？”但甚至聖伯爾拿也克服了他的躊躇；如果說他未曾正式參加戰爭，他也宣傳了：第二次十字軍和對異教汶德族的日耳曼十字軍都是正義的出征。還利用了神學來鞏固這種新態度。“正義”戰爭說成是為了消除良心上罪惡意識的一種方法，因為在戰爭中所遭受的苦難、傷害和危險可刺激一種原來無生氣和遲鈍的性質，恰象戰爭有力量來鼓起熱忱並作出忍耐、勇敢和自我犧牲的奇跡那樣。教會曾企圖建立下列原則，而且獲得了某種程度上的成功：使戰爭基

督教化，因為需要戰爭來擴展信仰；減少戰爭的恐怖、遏阻殘酷的本能並使人類的戰鬥傾向服從行為的準則，因為沒有這種準則，戰鬥只不過是大屠殺而已。建立一種職業兵士；可以說是讓他們學習戰爭技術並勸告他們：只對異教徒和不信仰者而不對同信仰者進行戰爭；保護無保衛者並維持法律，這便是教會的目的。

各大騎士團是國際性的組織，它們的成員，既獻身給一個軍事僧團，就不復有什麼他們自己的國家觀念，所以能夠不服從任何人，除了皇帝和教皇以外。因為騎士團的構成，是仿效僧侶團的；又因為騎士被認為對世界所負的世俗任務，恰如僧侶，尤其是寺院團，對它所負的宗教任務那樣；所以對一個團體，授予實體的寶劍，對另一個團體授予精神的寶劍；兩者各是普遍性的，各有它的獨裁的首領。奇妙的是，這些見解也和封建制度協調起來。^①

騎士如果違反他的約言，將降低自己的身份，這一思想，原來不是起源於教會的，但教會進一步使他把誓約神聖性銘記心頭，因此騎士的違反誓約將使他冒着喪失他的靈魂得救之危險。所以，騎士制度的道德紀律，大多從教會的影響得來的，正象它的軍事紀律從封建制度得來的那樣。

象很多其他制度那樣，騎士制度在它的青春時期是有着它的效用的。也象很多其他制度那樣，它在過了它的時代以後，不是成為一種笑柄，便是一種弊病了。當國外十字軍運動已經結束而在國內有力的民族政府和城市政府已在地方封建主義的廢墟上確立以後，當那些作為騎士溫床的小封建主宮廷已經衰敗或消失以後，騎士制度已過時。騎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於是，騎士淪落為路劫強盜，即攔路者，或長袖騎士^②。在前一類中，騎士的冒險精神已轉化為盜劫，驕傲已轉化為傲慢，保護已轉化為勒索敲詐了。那些過着馬鞍和寶劍生涯的人們已變為以劫掠為生了。他們掠奪無保

① 布賴斯：《神聖羅馬帝國》。

② 另譯絨毯騎士即無戰功而領受騎士的俸祿者。——譯者

卫的农民、固执的市民和苦恼的小販。騎士对农民特別殘暴，并以極細微借口驅散了市民。城市被迫建造了城垣和塔樓來防禦“那些自称为上帝与妇女的朋友之公敌”。在有些地方，人們竟这样地害怕，以致农民掘起洞來藏匿他們的牲口，以避掠奪。較少討厌但远更可笑的事情是：騎士漫游各地，找寻比武，來對他們所选的情妇表示尊敬。在这些游俠騎士中有一个人是以侍候两个情妇而得不到她們任何一个的重視而出名的。騎士既以特利斯坦^①作为他的榜样，他的情妇当然是一个易苏尔特。他情妇的每个願望，是一个命令，他毫不畏縮地服从它。为了情妇的緣故，他砍去一只指头，使她可相信他的真誠。有的騎士象荒唐的罗恩格麟^②那样漫游各地，在路上同无数騎士較量他們的武力，所向无敌。象国王亚塔尔那样，他們周游全国，做了其他风流事。

象騎士制度和游俠制度那样，紋章制度今天虽然遭受詭辯的作家的嘲笑，但它在封建时代是具有效用和某种社会含义的，同时它对艺术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紋章的根源可能追溯到古代凯尔特族的图腾制度。在某种爱尔兰的手抄古本中，甚至福音传布者也被描繪成走兽样子，那是具有拜物教气味的。

但真正紋章的起源是在不露出脸面的盔帽成为风尚的时期。这种风尚在十一世紀之前尚未出现。最早例子，出现于923年，在巴黎伯爵罗伯特的事件中，他在出发到斯瓦松戰場之前，为了使他的部下能够确认他本人，把他的灰白长鬍子穿过喉門而飄揚在他的胸板之前。当盔帽在封建主中間流行之后，如果没有某种突出的标记，則不可能分清友敌。赫弗理·金雀花在他的盔帽上戴着

① 特利斯坦是中世紀小說里的主角；他是“圓桌騎士”之一，易苏尔特是他的情人。——譯者

② 罗恩格麟是一篇德意志小說中的主角，叫做“天鵝騎士”，他的情人是伊尔薩。——譯者

金雀花的嫩枝；这王朝的称号是从这习惯而产生的。起初，这类設計是简单而又朴素的象征，但十字軍的紋章除了奇怪而又鮮艳的彩色之外，还采用了精致而又奇异的設計，如獅子、豹、独角兽，同时武器和城堡也提供了部分城堡、鉄閘^①等等的紋章式样。

后来，这些关于紋章設計和顏色的自由而又几乎放纵的做法变为服从一种严格的式样；产生了那些和紋章有联系的古怪而又精美的形式和顏色。这两种表达形式的适当使用，成为文明社会的一种要求，并有助于人們仪态的养成：騎士制度对客气和礼貌发生了影响而紋章图案和顏色的配合促进了优良审美力和艺术修养。騎士制度的意义也包含于紋章上的格言里，在那上面，常常可以看到荣誉、真理、勇敢的观念。从所有这些方面看来，紋章制度是具有社会意义和社会影响的。

① 中世紀时期悬于城門之鉄格子，敌人来侵时放下。——譯者

第二十七章 庄园:中世紀时代的农民状况*

庄园制度的性质与范围，是理解中世紀时代的經濟社会史的关键。中世紀的經濟生活，主要是有关自然經濟和土地占有的事情以及有关土地上农民所負担的义务。庄园制度曾流行于所有中欧和西欧的部分，即在拉丁与日耳曼基督教国家境内；它是一种政府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一种經濟制度。

中世紀社会的演变，是从地主貴族与私人大地产的优势出发的。要对庄园制度结构所包含的要素作出一个完备的綜合，是很不可能的，因为这制度看来虽具有表面的一致性，但它的内部却包含着几乎无限的差别，不論在数量方面或质量方面。历史传统、地方风俗、象土地的起伏那样的自然条件以及其他因素，都这样地渗入了庄园制度的结构，以致任何一种简单的解释是不够的。庄园制度，作为表达强烈的有机性生活的形式来看，是在不断改变的状态中。这种轉化反映出欧洲文明从一世紀到另一世紀的一般轉化情况，所以，欧洲的經濟社会程式，大多可在庄园制度的程式内找得出来的。

庄园制度是封建制度的下层。这制度实现了地主貴族阶级对那些住在他們所有地上不自由的、农奴的和奴隶身分的依附人等的农业劳动者的关系，就是說，它反映出貴族对中世紀社会内的“非貴族”阶级的关系。从時間來說，当封建制度还在形成过程的时

* 錫倍德：《历史地图册》，第104頁（一所庄园图）。

候，它已經确定。一切制度都是生根于辽远的历史的；所以，大体上可以說，庄园制度在第九世紀末期已变为固定，而封建制度在十一世紀之前尚未获得定形和固定性。高卢的羅馬人已經实行了村落制度(Villae)；所謂庄宅就是大农場連同它們的附屬地在內，也是大地产的中心；在那里住着許多租戶，有的集中，有的分散；这批人在奴隶或隶农的名义下，是直接依附着业主的。这种村落存留于法兰克王国境內，在查理曼时代还有大量村落存在。古典时代的土地表册标出下列区别：一方面，領主的住宅和属于他直接經營的土地；另一方面由各种身分的佃人所占据的土地；最后，还有不确定的部分——森林、牧場、沼澤地，作为所有領地上农民共同使用的土地。

在中世紀时代，老百姓的生活几乎完全是属于乡村的农业生活。这种生活在十一世紀以前很少变动，十一世紀时商业和工业主要由于和地中海地区及东方日益密切接触的結果而开始发展。在和近代經濟社会情况相比之下，当时，欧洲人口，住于乡村的部分，远比今天要多。城市又少又小，那里的大多数居民不是自由人，而是不自由的工人和手工业者。虽然欧洲的现代人口已有很大增加，但相对地說，中世紀欧洲的农村人口，較多于现在。在每个封邑之內，星罗棋布着大批村庄，那里的居民除极少数外，是不自由的或被奴役的农民；他們所有的职业是种田。按法律意义，在这些村庄中，每个村庄是个庄宅或庄园。它是最低級的行政单位，是家族上面的最簡單的社会有机体；它当然是一个純粹私人的集团。“庄园”这名词，在墨洛溫王朝后期以前，在历史資料里，未曾出现，而在喀罗林王朝以前，尚未变为通用。但这个有机体，作为一个經濟社会实体看来，在羅馬帝国后期已經出现。

关于庄园，已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它是中世紀时代的“土地管理单位”；它是“构成一个所有权兼行政权的单位”的大地产；它是

“社会結構中主要的和正规的組織細胞”。庄园的具体性质与机械性作用,已相当清楚。但不幸的是,中世紀庄园的起源是中世紀制度中的一个最难解决的問題。

那些住在城堡里的貴族,是庄园社会的地主和行政官(領主),这些社会是从后期羅馬世界的不自由和奴隶社会遗传下来的嗎? 中世紀庄园或庄宅可追溯到古代羅馬世袭地产嗎? 庄园主是羅馬世袭土地业主之中世紀的继承人嗎? 其次,古代日耳曼村庄社会(“馬克”)的原来自由居民现已淪为农奴了;这些中世紀庄园社会就是从它們传下来的嗎? 庄宅和庄园是相同的嗎? 羅馬和日耳曼形式的村庄生活、社会制度、农业实践曾融合到什么程度? 本来自自由的日耳曼农民階級由于上面的压力而被压到农奴地位呢? 还是自由日耳曼农民当定居于羅馬帝国境内和大量奴隶和农奴相接触以后,被一种可以說是来自奴隶和农奴方面的社会引力拖下来的呢? 还是象有些学者所主张,日耳曼民众本来是农奴并从农奴身份发展下来的呢? 庄园成长于农村公社里呢? 还是农村公社成长于庄园里呢? 是不是庄园在中世紀末期逐漸消逝,而留下了农村公社作为对近代的遺產呢?“敞开田”制度,是农奴制度遺留下来的“空壳”嗎? 那重新分配耕地的办法,是历来通行于“敞开田”制度下的嗎? 在封建时代,还有什么自由人留存嗎? 在封建欧洲,还有什么自由田嗎? 所有“非貴族”的土地所有权都是改为租賃权,即有条件的所有权的嗎? 在下层人口中,各种社会阶层——农奴、隶农、半自由人、賤民等等——是从何而来的呢? 土地占有或土地所有权,对这些阶层的分化,有什么关系呢? 土地怎样来决定社会的地位呢? 領主对这些庄园农民所加的地方捐稅之起源,是什么? 它們是从羅馬所有制慣例得来的嗎? 它們是有一个法律根源呢? 还是它們在第九世紀从僭取王室特权而产生的呢? 对庄园租稅的征收,在成文法或不成文法里,是有一个法律的限度的嗎?

我們一着手研究中世紀庄园起源問題，分析庄园結構中的要素并企图追查它們的历史起源与发展，所有上述的及其他的問題就产生了。引朴洛克的話，“真实的情况似乎是：在制度方面和在語言方面一样，有过广泛而又复杂的相互作用。在許多場合，日耳曼与羅馬的或多或少相似的思想之間的接触，造成了完全的融合，因而产生了某种不同于其中任何一种原来的东西，要不然的話，也引导到語言学家所說的什么‘混淆’的情况。”^①

现在几乎无可否认：中世紀庄园，就它的社会成分和它的农业实践來說，代表着羅馬和日耳曼制度的混合——有时还夹杂着更早的尤其是克尔特族的部族风俗的要素。在历史上当部族橫穿欧洲“大进军”的时候，“这些部族中的一个部族的移动可能把他們制度的特征印在一块土地上，而在那里原已誕生了另一部族的特征”。迟到十二世紀，在极南的羅馬語系土地上，象下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样，还有資料可証明日耳曼法律、风俗和心理状态的持續性。极端决定主义，想决定組合要素的比例或者它們融合的任何企图，无论如何是违反历史精神的。

关于解釋的問題，越来越感困难，因为所可获得的文献資料，既很少而它的意义又很模糊。理解那些為我們必須閱讀的小量資料方面，还有巨大的技术困难。可惜，关于早期几个世紀的資料，既稀少而又不够清楚，以致我們不能清楚地了解当时的經濟生活。而且，这些資料几乎都是从教会方面得来的，因而我們沒有获得关于世俗經濟状况的相应意见。至于說到日耳曼人的資料，我們可从研究后期的条頓法律，尤其是“北欧人”和丹麦人的法律，来获得一些帮助。但最大的帮助也許已从研究中世紀农村实践的近代残余里得到了。通过由今到古的推論方法，我們获得了关于旧生活

① 《英国历史評論》，第16卷，第750頁。

方式的很多新理解。大家知道，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看，是保守的，墨守陈规的。甚至在今天的欧洲，还有很多中世紀农业残余存留于許多农业地区內；特别是在近代工业制度和商业制度未曾侵入的地方上，或按居民风俗习惯來說，还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地方上，这种社会尚保存了它的几乎原始的簡朴风气。近来已經明显地証明：欧洲农民不仅繼續着这些风俗而且坚持地固守着他們祖传的土地不放，尽管从中世紀时代結束以来他們已感受到无穷的更动与变迁。有一个德意志历史家曾发现在奥斯那布律克附近的一个家族还住在“老农場”上，而这一块农場已有六百年的寿命了。若干时期以前，法国政府曾宣布：它将以“农业奖章”发給那些人們；他們能够提出文献資料来証明，他們的家族繼續耕种同一块土地至少滿三百年。由于这一命令，出现了約有七百五十个这样的家族：其中摩利尔附近庫第地方的一个家族保持了最高紀錄，它从第八世紀以来就住在这同一块土地上。西波姆描写了

一幅关于“敞开田”耕作法的图景：这种“敞开田”人們还可看到，当他們从安得那赫旧羅馬城市上的高处俯瞰那以萊茵河壯闊波瀾为界的并延伸到辽远地方象一幅大地图般的平原的时候。如果人們远涉到中欧的中心去，当他們从烏尔穆大礼拜堂（寺院）的塔樓上俯瞰巴伐利亚茂盛麦田的时候也可看到同样景色。

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土地上，在法国、德意志和斯拉夫国家里，“敞开田”制，今天多少还是一种活的制度……在許多地方，这一制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于地面上，这些痕迹会再繼續几百年时期，也許会永远繼續下去，来把它的过去历史告訴人們。^①

我們在克尔特族的部族組織里，找不出什么恰恰类似于庄园的东西。中世紀庄园，是属于羅馬-日耳曼的混合起源的，也許偶然有些更早时期的农业和村庄慣例的残痕在內。所以我們应首先

① 《通常的田亩史》，第3頁。

討論羅馬的庄宅。

羅馬庄宅，是一个富裕地主所占有的大农場，在那里有着奴隶和不自由依附人（隶农）两种人的村庄；他們替他耕种土地，而他們从自己劳动所得的，只不过足以糊口而已。奴隶是一种动产。农奴原来是一个自由人而淪于經濟的依附地位，由于拖欠地租一代又一代地束縛于領地上的；这些欠租，在理論上是可以还清的，但实际上，永远是还不清的，因为欠租是日积月累的，而农奴每天的劳动，仅足以支付当前的地租以及維持自己和他家庭的生活費用。他是一个負債的犯人；他天天在曠野里；在地主的土地上勤劳工作，以图减少他的債務但永远不能把它勾消。农奴的土地，叫做“保有地”（“Tenure”从拉丁文“Tenere”意即“保有”得来的），但按法律的意义來說，保有地是保有农奴的，而不是农奴保有保有地的。保有地规定了他的身份：法律上他是一个不自由人，按社会地位來說他是一个依附人。庄宅內由地主繼續使用奴隶^①劳动来直接耕种的土地，被称为地主的自留地。但当欧洲的奴隶制度——但不是奴隶貿易——衰落以后，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地主的自留地也逐漸由农奴来耕种；每个农奴除了为自己的保有地所做的劳动之外，还須以每季的若干天，来在地主的自留地上劳动。

“羅馬庄宅表现出所有中世紀庄园的主要特征。地主的自留地，作为周围隶农所聚居的地方上的中心。农夫不得分散他們的租地，因為他們不是租地的所有人。”^② 村庄原来不是相一致的政治单位，在羅馬地方行政的崩潰使世袭业主摆脱了上級政治控制之前，只是市鎮地区內一处农户聚居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并只在那个时候，可以說，羅馬庄园成为“兼有所有权和行政权的一个单

① 在庄园制兴盛时期，我們所可看到的奴隶，一般是家庭奴仆而不是田間劳动者。

② 費諾格拉道夫：《庄园的起源》，第33頁。

位了”。然而，还可怀疑：純粹羅馬型的庄园，除在意大利和南高卢之外，是否在欧洲任何地方存在过。羅馬从来未曾有过要实现完全一致性的狂热的，而对地方风俗和情况是采取容忍态度的。早期的传统和残余，得頑固地苟延残喘。“羅馬人，即使他們有此心願，也不会有可能来改变了农业的整个性质，来压制了所有北方农业上的自然趋势的。”^①

在萊茵河和多瑙河省区内，日耳曼农业实践自然地倾向于和羅馬的方法相融合。我們难于决定，羅馬方法在这些地区内曾流行到什么程度。在第四世紀所編的《功績录》里，指出：羅馬的权力一度曾扩展到萊茵河彼岸八十哩的地方去，所以它一定曾达到过佛尔达的附近地方；我們还知道：这种統治权力在那里維持了二百五十多年之久。我們不应作出太偏执的論断；無論是贊成在早期“蛮族”占領区内羅馬方法繼續存在的說法，抑是贊成日耳曼村庄制度和农作方法独占优势的說法。現有資料，可以証明：即使在帝国的有机体已經烟消云散以后，羅馬的耕种方法和风俗习惯仍存留于北欧洲。羅馬世袭业主在“蛮族”侵犯的潮浪退息以后曾繼續耕种他們的田地，而教会，就是，最大的地主，也是在組織和精神方面最多具有羅馬性质的机构，不仅曾安然无恙地存留下来，而且实际上还曾在第五、六和七世紀增加了它的权力。日耳曼人的公社制度（如果它曾是公社的話）漸漸让位給更有利的农村經營制度，就是羅馬人所知道的并由教会所实行的制度。这种結果，在經濟上可能是有利的，但它是付出个人自由的代价的。

在村庄生活和农业方面，日耳曼人带入了什么并加上了什么呢？日耳曼人是貴族与自由人的部族——他們有若干奴隶，但完全未曾有达到象羅馬帝国内所可看到的那样程度，他們曾把古代

^① 《經濟評論》，第15卷，第39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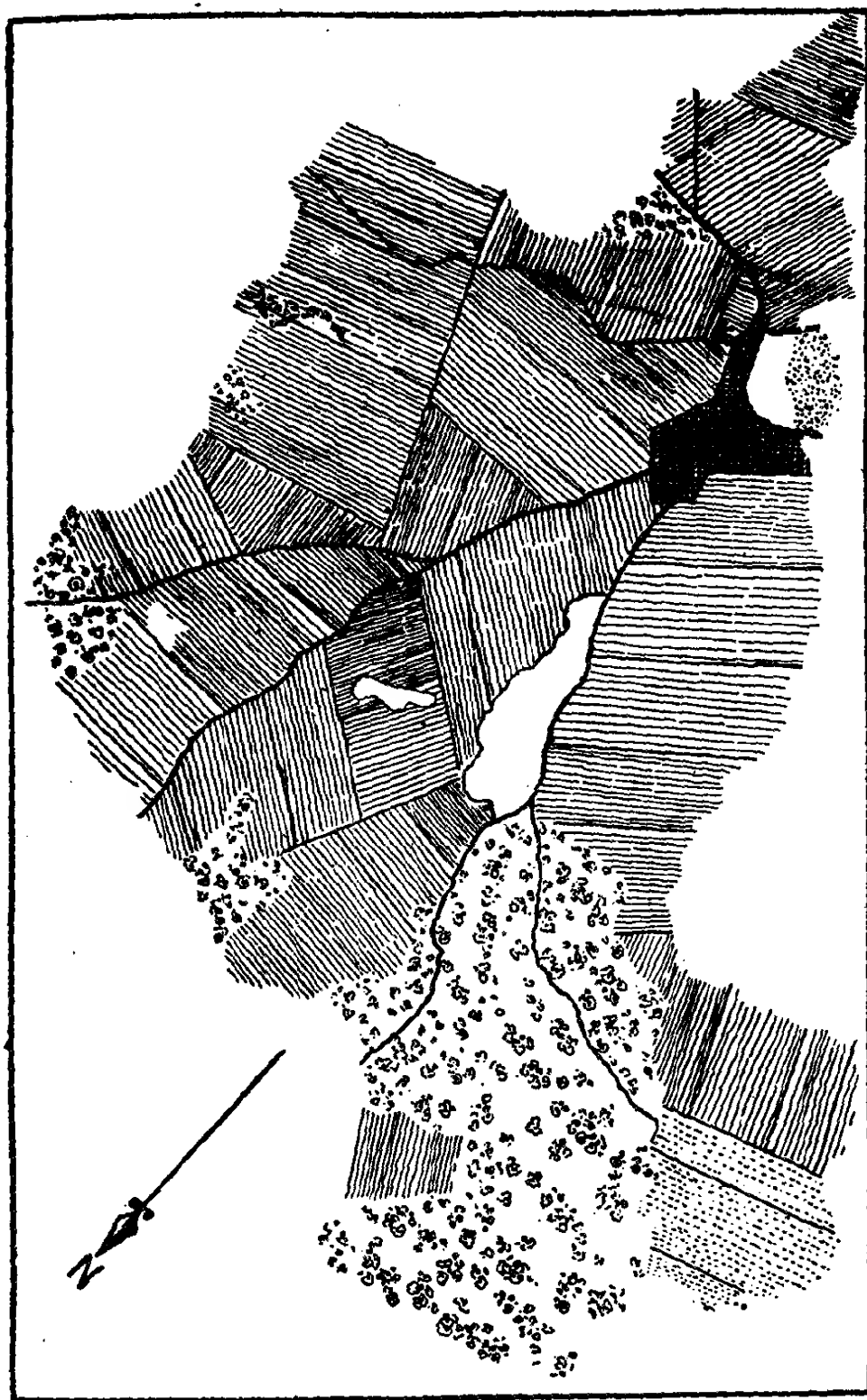
自由的(人們如此說)日耳曼农村公社移殖到羅馬土地上;这种公社在第五、六世紀日耳曼人征服以后,变为一个不自由的农村公社。如果这一假設是不錯的話,那么这自由农村公社——日耳曼人“馬克”——一定是后来淪入了农奴状态的;要不然的話,象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樣,大量日耳曼人,即在他們的本土上,已是不自由的依附人,仅仅把日耳曼不自由的村庄和农民移殖到羅馬土地上。上文已經說过,这种降低身份的过程曾在什么时候出现;也已提过那些力量的性质:“这些力量正在起着作用,而能使一个充滿自由农的村庄轉化为一个充滿賤农的庄园”。促使轉变的巨大因素是:墨洛溫朝时代的內战、查理曼时代强迫軍役的沉重負担以及第九世紀的战争、混乱、侵犯和封建的强暴行为;其时,小自由人被迫找寻大业主的保护,甚至在付出丧失自由代价的条件下;他們也常常被土地荒的男爵剥夺了自由并在自己的土地上被降到农奴的地位。这样看来,源自羅馬的农奴,找到了源自日耳曼的农奴的患难同伴;于是这两个阶层和这两种情况合而为一了,他們一起住在一个叫做“庄园”^①的社会单位內;而庄园本身也是由羅馬和日耳曼成分相混合而形成起来的。羅馬住宅和农奴化的日耳曼农村公社不仅有一个相似点,而且这两种各別而不同的形式漸变为模糊乃至混合为一个单一性組合的經济社会集团了。关于源自日耳曼的庄园制度的历史,是从多少有些自由而沒有地主的农村公社开始的,这个社会通过稍微复杂而現在已很清楚的过程,在第六至第九世紀之間,在緩慢的也許是断断续續的不景气阶段里,轉变为一个完全依附性的庄园集团了。如果說“馬克”的村民們在这項过程压倒他們之前的时期,原来是自由的,那么,使这个阶层淪为一个不自由的租戶这一事件,一定曾引起过一次深刻的經济社会革命的。

① “Mansus”(庄园)这个名詞从拉丁文“Manere”得来,在第七世紀初次出現。

現在我們可从这个有趣而煩惱的理論範圍，轉到中世紀經濟的較多具體性的事情了。如果讀者仔細研究了一處有代表性的中世紀莊園平面圖^①，然後在想象中站在一個典型的中世紀村莊的中央，他將覺得自己置身在一條穿過莊園的大路上，在擠成一團的茅舍群中間，即在“核心”村莊的中間；可是，在房屋的周圍還有空地足夠作為一塊菜園、一個雞場、一個牛舍或馬房，一個干草堆之用。一條來自森林泉源的溪水，橫穿村莊，流到大路旁，注入一個邊緣潮濕的池塘里，那是一個村莊的養鴨池。那從低濕地延伸的草地，也許是一塊天然的草地，也許是從干涸沼澤地而得來的草地。在大路的對面，位着領主的自留地，即村莊中最好的田地；在那裏的一個小山的頂上，即村中最好的位置，聳立着領主的城堡，如果這是一所大莊園；但如果它是一所小莊園，則莊園住宅沒有這樣地雄壯；它的近旁有着一所倉庫和牲畜棚。靠近它的還有一所小教堂，一塊小墓地和牧師的住所。但村民的田地在哪裏呢？我們可看到象扇形般地從村莊延伸出去的小路或車路；沿着其中一條小路約半哩的距離，也許多些，我們可找到田地。除了領主的自留地外，所有村莊的可耕地，都分成為三大塊田地：春耕田、秋耕田和休耕田。這就是“三田制度”。如果干草已經收割，可放牧牲口于草地上。如果干草還未收割，用石頭或木桩來標出在干草地段內每個村民所有的部分。這種“草地分段制”在歐洲許多地方，繼續保持到後來。無論如何，牲口一定可以在休耕田上吃新生的青草；如果莊稼的收穫已畢，它們還可吃它們的殘梗。在早秋時期，農民為了播種冬麥，進行了翻土工作。

兩田制度曾是羅馬人的辦法，而在日耳曼人中也是普遍應用的。但在一個未詳的時期，也許在第八世紀（關於三田制度的起

^① 最好的圖樣，見錫倍德：《歷史地圖冊》，第104頁；這對每個研究歷史的人來說，是一本必要的參考書。



一所庄园的平面图

上面是包括三十五户的中世纪村庄的一幅平面图。这村庄的耕地面积共計八百三十七畝。草地和森林地(在图的左方)是共同使用的。有的戶主占有多至五十二块分散的土地。村庄位于图下面的深黑部分。

源,我們所得的最早証据,是在 771 年),一个革命式的改变开始出现了。这便是从二田制到三田制的过渡。它早期曾流行于上德意志而后来遍传于萊茵兰、北高卢与东高卢;它被采用于教会的土地上和喀罗林朝国庫領上;似乎可泛然指出:在黑森的彭尼非斯派寺院,如佛尔达和赫斯斐尔德寺院,是可能的起源地点。我們知道:圣彭尼非斯是建立法兰克教会的什一稅的贊助人;甚至在查理曼时代之前,这项沉重的負担已引起重大的苦难与怨言。下面是迈曾的一个精辟的意见:三田制的采用,是“由于庄园和教会的苛重地租与什一稅的压力所引起的;因为它们需要出产大量谷物”。但撇开猜測而談事实的話,我們无可置疑:这项轉变包括有极大的經濟进步性在內。小麦或裸麦可在秋天和春天同样地播种这一項发现,毫无疑問,是人类进步的道路上一項极其有益的发现;因为这样一来,在以前只有一次收获的地方,现在可有二次收获了。格拉斯教授已明显地指出三田制比二田制的优越性。^①

〔他說〕試比較在有一千八百畝可耕的庄园上使用这两种制度的結果。使用二田制度,所得的結果是:

九百畝(耕地,耕一次)·····	九百
九百畝(休耕地,耕二次)·····	一千八百
耕地总畝数 ·····	二千七百

使用三田制度所得的結果是:

六百畝(冬耕地,耕一次)·····	六百
六百畝(春耕地,耕一次)·····	六百
六百畝(休耕地,耕二次)·····	一千二百
耕地总畝数 ·····	二千四百

这样看来,在二田制度下,〔每两年中〕我們在二千七百畝可耕的土地上,〔每年〕只有九百畝的收获,而在三田制度下,我們在二千四百畝可耕的土地上,可有一千二百畝的收获。

① 《农业史》,第 48 頁。

现在，那交替的办法是：在三块各别的耕地上春耕、秋耕和休耕；就是，二块地播种，一块地休耕的輪流。当然，这新方法不是反映出部族的习惯的，也不可以說是属于羅馬起源的或属于日耳曼起源的；但却是从农业經驗和观察里发展起来的。虽然因为老办法还是在应用，它从来没有变为普遍，但这新制度在中世紀时代是被广泛地采用的。

虽然关于中世紀文明的論著中很少注意到这回事，除非属于专门性的經濟論文，但毫无疑問，采用三田制度是中世紀超过古代的一个最大的前进步驟，也是对文明的一个很有价值而又独特的貢獻。在第一块土地上，在秋天播种小麦或裸麦，而在下一夏天收获；在第二块土地上，春天播种雀麦、大麦和豌豆，也在下一夏天收获而以第三块土地作为休耕地。这样，每年中三分之二的土地可以生利，而使三分之一的土地休息，并用作牧場来补充那些在干草收割后作为牧場的草地。大麦，可以說，是“飲料”谷，用作酿造啤酒；許多庄园并有一所当地酿酒坊。

尽管三田制度具有价值，但下列办法比它远更出色，就是，把耕地分成“条地”分給村民，以及把个人所有制和合作（或集体？）劳动相結合的办法。^①

不論这种办法是否属于公社起源的，还是起初由于村庄合作的（或集体的？）事业和个别所有权相結合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产生的，这种“敞开田”制度所具有的一种突出的性质，从任何观点看来，不可能在羅馬人或凯尔特或斯拉夫人的耕田慣例中找得出来

① 在早期日耳曼人中間有很严格的私有土地制的存在，从塔西陀以下的有資格的学者，沒有予以否认过。問題是：公社土地所有制，在早期日耳曼人中間，曾否存在过；如曾有过，它达到了什么程度。在早期喀罗林朝时代，无可爭辯，在住宅地上到处有私人财产。在公共地和联合耕种之間，是沒有必要的联系的。共耕制从来未曾普遍流行过；有些地方曾使用这方法；那似乎是由于它們的特殊地方情况的緣故。（參閱科伐勒夫斯基，第1卷，第267頁）。

的。而且当人們回想到这种田地形式在村庄周围的分散条地內繼續保持的时候，愈加觉得可以惊异了。因为它迄今还在欧洲大陆上的某些部分存留下来。一个英国观察家写道：

在今天，从高地上向圣奥麦之南眺望，乡村呈现出一片无規則的棋盘格子般的景色；各种谷物常常播种于——由英国人看来——不可相信的小块地內……埃培勒克的市长现时（1913 年）經營約九十二“碼地”（“Measures”）的一块农田；它包括四十五到五十小块地，而其中最远的一块地是距他的家有三公里半。^①

庄园的瓦解过程，似乎被那些流行于封建世界的同一分化力量所加剧起来。正象喀罗林帝国在第九世紀分裂为王国，王国分裂为公爵領、伯爵領、子爵領、城主管轄区等等那样，那些破坏国家之势力向下渗入了并瓦解了庄园，即社会机构中的最微小的細胞。在第九世紀，大庄园分裂为小庄园，和租地傾向拆散，是法兰克帝国瓦解过程中的一部分。在查理曼时代，軍事需要已迫使自由地的分裂。这过程在第九世紀时期又在加剧，所以秃头查理在 864 年曾白費心机地禁止进一步的分裂。不同程度的地产分裂，如对半分、四份分、八份分、十六份分是普通的，甚至在庄园兴盛的时代，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

在中世紀庄园耕地的平面和直綫丈量法里，我們看到我們土地測量制度的历史起源。那个扶犁而走的人或撒播种籽的人，自然地步出了他的田地的大小长短。他按照他的脚步，衡量出畦沟的长度或他所撒播种籽的数量。他的双步等于五呎；二或三个双步等于一竿。在巴伐利亚，一竿是十呎，在英国，是十五呎；諾曼底亩，是两倍于英国亩的大小；巴伐利亚亩等于英亩的三分之二；四分之一的亩叫做一“魯德”，但一“魯德”在諾曼底等于英国的半亩。一块“碼地”是四分之一的耕地，即三十亩。亩是一个耕种的单位，

① 庫普兰：《圣柏騰寺院》。

即用犁耕种的一天工作量的单位；它的狭长形，即四竿宽和四十竿长，是由所使用工具的实际便利来决定的。因为犁耕工作是按长畦沟进行的，当犁者翻过了四十竿即一富浪长（一富浪等于一条畦沟长）的“干硬的土地”以后，他转身过来回去。长期经验指出：一个早晨的平均劳动，能犁耕一块四竿宽四十竿长的田地；因此产生了“亩”或“晨地”，就是，一个早晨的土地。按照一亩七十二畦沟的比例，一头役畜，在一天的工作里，正常地可走九哩。但犁耕工作，须在正午时结束，因为在下午必须把耕牛送到牧场去。

这些中世纪村庄测量办法自然地转化为测量单位。西波姆说道：

当村民出来在割去庄稼后的土地上作游戏时，他们易于选择一条“亩地”，把球从一边投到另一边。法定亩的正确宽度，即二十二码，现在正是板球戏的投法。为了练习长弓，亨利八世曾命令：最短的射靶应是一富浪长，二百二十码即恰恰等于一亩的长度。竞走场是一条畦沟（在它作为一种徒步竞赛长度之前）。畦沟的来回长度迄今还作为四分之一哩的竞走标准。

在庄园制度的条件下，村庄保存了它的古代习惯，它的作法当然要从属领主的管理的。在 957 年的一项文献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说圣米希尔寺院的农奴，在执行一个农村公社的职务时，没有住持的干涉；他们按照三田制度来划分村庄的耕地面积，分配干草地的地段，规定村庄的地址；标出住持地主的自留地、建造市场市房、确定公共荒地、与森林边界等等。由于象这一类证据的存在，可表明：甚至在农奴制度下，还留存某种程度的自由与地方自治，即使它的行使是出于领主的恩惠，而不得被认为是一种权利。

我们可引述另一个与这突出的又仁慈又贤明住持相反的例证；就是，1038 年，在现在瑞士的左留尔州的服伦村里自由农民被残暴地降为农奴的事件。这块地方上的农民，在十一世纪大多还是自由的，但因为觉得需要保护，服伦村民乃求助于一个叫做甘特

兰的邻近領主；他背叛了他們對他的信賴，速即把他們降為農奴。當德皇亨利三世巡視到他帝國的這一角落時，這批苦惱的人徒勞地力求一個喊冤的機會。他們不能穿過擁在他周圍的貴族和官員群，而且他們的奇怪方言與鄙陋態度觸犯了德皇扈從隊的貴族驕氣。那由暴力和欺詐所創立的領地，在 1106 年移轉給穆里的寺院，在那里一個誠實的僧侶找出了關於這一事件的文獻。

不論莊園是由原本自由的農民而被降到農奴的一個村莊，還是從開始起是一個不自由的公社——雖然還可以從這一體系內找到若干自由人，盡管所流行的是依附關係，但在莊園的組成中，是有兩種土地成分溶合在一起的；就是，農村公社和“固定在這一村落的領主家產”。因為在領主成為一個村莊業主之前，他已是一塊領地的業主，有若干世襲農奴來耕種他的田地。這可說明：為什麼在封建盛世的每個莊園里，領主的自留地——有時叫做“內地”——是從租賃地中明顯地划分出來的；也許這還可說明：為什麼領主也占有幾塊夾雜在村民的“條地”之間的自留地。這些和整塊自留地分離的零星自留地，可能是“原來由領主所勒索的貢賦的殘痕”。所以，那種充分發展的莊園，是一個莊園所有地（莊宅）和一個農奴化的農村公社（馬克）的結合體。舊時的自由農民現已轉變為不自由農民；領主的宮廷替代了古代的村社會議；村民所做的事業，象過去那樣，依然存在着，因為村莊的基本經濟功能未曾由於它從自由農降到農奴地位而有所改動；但現在，這些活動已變為由領主所強加的強迫服務了。農民村莊和領主自留地之間的有機性的相互交錯形成了莊園。現有資料，可說明很多莊園制度的封建以前的性質。土地服役、繁多的共同權利、自留地與農奴租地間的區別、自由租戶，所有這一切，在第八世紀已可找到。那些非人身奴隸的下賤租戶，在封建時代之前好久，已經出現；這批租戶從上面由於自由人的委身制，從下面由於奴隸的釋放而增加起來。

領主自留地和农奴租地之間的區別，早在阿勒曼尼克和巴伐利亚法典里，已經出現，而在法兰克国王的詔令里，对奥斯达拉西亚地区表现得很明显。在日耳曼法典里，可以找出强制劳动的规定。显然，我們在这里可获得关于庄园制度形成的大概时期的一条綫索；它的慢慢的扩展和定形，是从第六世紀起繼續到第九世紀为止；到了 900 年它已普遍流行于中欧和西欧。在第九世紀，当“北欧人”、馬扎尔人和阿拉伯海盗蹂躪欧洲的时候，又当法兰克帝国的瓦解使建立有力量的地方政权成为必要的时候，保护的急切需要使庄园的統治固定下来并使它的制度具体化。于是，那筑有围墙的庄园住宅或城堡和集聚在它下面的村庄，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和象征了。

一个典型的庄园实际上包括有七种不同类型的土地；細閱地图，就可知道：(1)領主的自留地，那是严格地属于領主自己的，部分由自留地上的特种农奴，部分由农村的农奴来耕种的；后者的服役是强制的；(2)領主的“围地”，那是自留地的一部分，租給賤农或租戶农民的；(3)庄园农奴的租地，即散布在耕地的三种地区上的分条“碼地”；(4)干草地；(5)森林地；(6)荒地；(7)教区教士的領地，即有时称为“上帝部分的土地”。最后一种領地，或者是在单一块地面上，或者是夹杂在村庄耕地中間的条地，象属于領主的自留条地那样。那也是由农民代替教士来耕种的。

属于領主的房屋，包括有一所庄园住宅和一所倉庫。庄园住宅至少有三个主要房間：大厅、宿舍和日光浴室或接待室或凉廊。亚德勒斯·亚諾尔二世为他的夫人革特魯德建造了一所木头庄园住宅，关于这住宅，我們看到一段詳細的描写文字。

它是三层楼房，所以它看来象太阳般地挂在空际。地下室，地位寬闊，放着編結的大籃子、闊口瓶、木桶及其他家具。第一层包括一間居住室，有巨型火炉、食品間、碗碟柜、領主和領主夫人的臥房；靠近臥房的有：盥洗室、仆役

間和兒童臥房。接待室，叫做“涼廊”是接待客人的，也用作祈禱堂或小禮拜堂。廚房分設在兩層：在下層，烘烤豬肉，宰殺鵝、鸕鶿及其他鳥類，準備烹吃。在廚房的另一層上，烹飪其他食品，在這裡使用許多烹飪鍋並通過辛苦的准备工作，為領主準備最考究的食品。

在上層樓面有：用走廊道接連的各種房間或大厅。

莊園住宅的陳設品是稀少的。玻璃窗是罕見的；大厅里設着：放在支架上的桌子、幾只長椅和小凳或塞着草蓆或羊毛的長凳，一兩只椅子和一兩只麻布箱子。住宅中可移動的東西有：一兩只煮開水用的銅鍋和一兩只銅盆，幾只木制的大盆和切面包等的木板（較少用金屬制的），一副鐵的或皮革的燭台，一兩把廚刀、一只食鹽箱或鉢和一只銅水瓶或水盆……宿舍內包括一張粗陋床而很少褥單和毯子，因為白天所穿的大衣在夜里一般是用作蓋被的。^①

關於一所莊園的大小，我們不能作出估計。我們沒有充分資料來決定“平均數”。關於住持的土地上的資料編制，最簡潔而又最好。但寺院的可貴紀錄指出：莊園的大小沒有統一規定；它們的面積也相差得很大。一所莊園是沒有固定的或通常的規模的。在這方面，它的不規則性既不大於、也不小於一個美國農場。然而，它比起現代的一般農場要大得多。一所不滿十個家庭的莊園村莊，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從《末日審判冊》^②所搜集的統計資料里，可以看出：在第一組十四處莊園里，各有三十二個家庭，在第二組十四處莊園里，各有十四個家庭，在第三組十四處莊園里，各有十一個家庭。按照這一比例並以每塊租地包括三十畝來計算，最小的莊園至少應有三百三十到五百五十畝，不包括草地、森林地、荒地以及領主自留地在內。一定還有很多莊園比這莊園要大得很多。一般說，在布局方面，莊園是相當緊密的。但在下列場合，莊園的布局，

① 洛澤斯(T. Rogers):《工作與工資》。

② 指諾曼底公威廉於1066年征服英國後所編制的英國的土地丈量清冊。由於英國人民對這一掠奪土地之光榮的丈量冊深懷恐懼，故有此稱。——譯者

可能稍微散漫，而看来杂乱无章地散开在土地上：在吸收了旧凯尔特族的残余的地方上，或在由合并一个破碎的罗马住宅的一些地段而成的庄园上。今天，在欧洲，有很多村庄的界线，很准确地符合于往昔中世纪庄园的规模，而这些村庄就是从旧庄园兴起来的；其中很少庄园的面积少于一千亩。封建制度的格言是：“没有无土地的领主，也没有无领主的土地”，所以，只拥有一个庄园的领主在封建阶层制度里一定是属于最低级的领主。大贵族——公爵、男爵甚至子爵——拥有几百处庄园，而教会与寺院的庄园，是数以千计的。

一个贵族的“领地”（不要同“自留地”混为一谈），是他所占有的庄园之总和，不论多少或大小。在国王方面，这些领地叫做王室领，也总称为国库领。它们往往不是或不常是相毗连的；但分散在整个一个省内或封邑内；领主的附庸所有的庄园有时夹杂在他们宗主的庄园之间。在中世纪时代，许多土地的转移，是由于贵族、主教、住持为要获得接界的庄园，通过购买或交换方式所作努力之结果。只有一处庄园的骑士和小贵族的情形，一定是不少的。例如豪特维尔·汤克勒德，即这个姓的著名家族的族长，是在诺曼底的库坦斯附近只拥有一所庄园的骑士。

在这样的情况下，风俗只不过是出于需要而硬化起来的传统而已；它在庄园上的共同任务里，要求同时而且常常协作的工作。农民是在同一时期耕地，在同一时期播种，并在同一时期收获的。但共耕制只应用于领主的自留地上，不是应用于农民自己的土地上的。这也不是一向同样地进行的。在有的庄园上，整个自留地是由农民的全部耕牛队来耕地的；在其他庄园上，部分自留地，分配给各个农民来耕种的。收割谷物是用镰刀，那是一个缓慢而倒退刈割的方法。我们听到很多控诉：农民在收获时期偷窃了他邻人的谷物，他秘密地越过了界线，在他邻人的平行条地内，抓取了

一把谷物，有人偷偷使用鋤來擴占他的鄰人的一點地，或有人偷移了那些作疆界標記的石头或木桩要多得几英寸地上的干草。在村庄章程里，有一項普通而又重要的規定；就是，任何人在收穫時期，在日出前或日沒後，不得到田間去，不論帶着或不帶着一部貨車。打谷或者是用老牛來踏出谷物的方法，象《聖經》中所描寫的那樣，或者用連枷打下谷物方法，並在風中簸揚谷物——這一工作，常常是由婦女與兒童做的。

關於領主自留地的優先權，是從來未曾有過什麼問題的。它一向必須最先耕，最先種，最先收穫。因為領主要求農民的服役，他們常常必須放棄自己的田地上的工作，即使在它們最需要注意的時候。如果有風暴發生而莊稼遭受了危險，領主的谷物，須先行搶救。當領主出售他的農產品的時候，他也享有同樣的“優先權”。他的谷物、他的葡萄酒和他的牲口，須最先送到市場上去。當一個農奴死了，他的領主有權獲得他所遺下來的最好的牛和最好的羊；領主拿走這些東西，作為一種遺產稅。

草地所占的重要地位，是出乎今天我們的意料之外的，因為它是干草生產的唯一源流。在十七世紀之前，歐洲人還不知道播種草籽和採用各種青飼料。草地上的干草，是所可得的唯一的干草，直到他們發現了草籽可以搜集和大車軸草可以用作肥田的原料以後。當然，干草的供應，是有限的；因為只有那些屬於村庄所有的低濕地上才能生產它。而且，因為在草地上未曾使用輪種的辦法，土壤的肥沃性逐漸枯竭。干草在歷史上是具有現實的影響的，雖然農業歷史家尚未充分地看出了它的重要性。根據統計證明：在中世紀時代，草地在和耕地相比之下的價值要五倍大於它在今天的價值。現在，一個農民可種植干草於他所願意種植的地方，並且隨心所欲地種植多少。可是，在中世紀時期，在各個村庄社會里，干草的數量，有着嚴格的限制，而它的質量，由於報酬遞減律的作

用，也有着退化的傾向。

所出产的主要谷物是：小麦（但在德意志，是裸麦）、雀麦和大麦。亚麻种植于雨水条件相适合的若干地区內，而大麻有时也是种植的。元麦是在大麦与小麦之間的中間谷物。普通的蔬菜是：燕菁、蚕豆、豌豆、洋葱、菠菜、甜萝卜、药芹、大蒜、薑香、水芹。在水果中有：苹果、生梨、木瓜、梅子、櫻桃。櫻桃似乎尚未被种植，但野生的已經摘取。胡桃树是普通的，而在南欧洲，葡萄和橄欖是到处都有的。然而，葡萄藤曾被广泛地种植，并在中世紀时代比在今天远远地更向北传布。葡萄的培植代表着农业的最高級和最細致的形式。家畜和家禽，除了火鸡之外，象今天我們所知道的，当时都有。猪是最普通的农畜。鸽子是由領主飼养的，农民不得养鸽。蜜蜂是到处都养的。事实上，蜜蜂的經濟地位，在中世紀时代是很大的。除了果汁以外，它供給了唯一的甜味；在教堂中，为了封蜡和蜡烛所消耗的蜜蜡的数量，也是极大的。蜂巢常常用遺囑来特別处理，甚至象封邑一样地作为恩賜——由此可见对蜜蜂是多么珍視。公牛比馬远多用于田地上。公牛的飼养較便宜，它們又較少生病；此外，当它們到了老年的时候，还可供应牛肉。然而，这种牲口又輕又矮小；它們的重量远少于后世的耕牛。母牛除非在挤乳的时期，是在荒地上与沿着森林边缘上吃草。猪是散放着的。牛和猪都能懂得好好地保卫自己，但綿羊則不然；由于它們胆小和喜欢集合在一起的習慣，使它們容易成为狼和掠夺者的捕捉物。要以所产的少量干草来維持牲口过冬，是有很大困难的。牲口几乎完全吃着草秸和树上落下来的枝叶；所以，到了春天，它們常已变得如此瘦削，以致它們不能走动，而須把它們載运到草地上去。所以，普通的办法是：在冬季初期，除那些为耕地与繁殖目的所需的外，宰杀一切牲口并盐腌它們的肉。至于牛乳，是极少的。甚至在十三世紀，当农业方法已有改进之后，亨萊的窩尔特，英国的一个

農場管理員，曾写过一篇著名的农业論文；他只希望三只乳牛每周能生产三磅半白脫油。牛乳大多是用以制造干酪的。通常用的农具是：耕犁，是只在尖端上有鉄的笨东西；耙（常常是有刺木头装着一根木柄的东西）、鋤、鏟、鹤嘴鋤、尖嘴器、大镰、镰刀、連枷、用以碎土的大槌、鉄杆、斧头、螺钻、手斧等等。

村民的生活，是一种艰苦而又单調的生活，不象近代农民有着机械来減輕劳动那样。那些农民所处的苦难而又残酷的境遇，使他們的感觉性变得如此迟鈍而又麻木，以致今天我們会大吃一惊。甚至近代生活中最主要的礼貌是被漠視的。在气候很热的时候，男人一絲不挂地在田間和妇女并肩工作着。哈文特的腓力告訴我們說：在夏天，他“看到大多农民在市場日子里，在街道上和在村庄廣場上走来走去，不披上什么衣服，甚至裤子也不穿，为的要凉快。他們这样赤身露体地进行他們的工作。当有些僧侶震惊于这种景况而憤怒地加以申斥的时候，他們粗暴地回答道：‘那管你們什么事？’”

农民的茅舍，全部是用木材或枝条造成，屋頂盖着茅草而沒有烟囱的，所以茅舍人不能在室內烘着自己的面包。在夏天，烹飪工作大多是在戶外露天进行的；而在冬季則在茅舍內泥地上进行的；当開門的时候，浓烟会从門口或从屋頂上洞孔冲出，因而戶內的可怜人会睜不开眼睛的。中世紀农民，在一間泥地的茅屋內，是沒有人工照明的。用柴把作为火炬是有危险的，因为屋頂茅草可能着火；至于蜡烛，他无力置备。而且，在天暗之后，他沒有什么事情可做。他不能再工作。他不能讀書，因为他沒有书；即使有书的話，他也不知道怎样讀。所以，在日沒之后，他和妻子、儿女就去睡覺了。但臥床是什么样呢！它仅仅是屋角里的一堆草秸，有着恶虫而常常又是潮湿的。他是不脫衣服睡覺的。可是，我們会容易夸大了中世紀农民的艰苦状况，象我們将在下文所看到的那样。

关于一个平常的庄园(因为虽然有着多种多样不同的风俗习惯,但这些差别一般是程度上的而非种类上的不同)上的劳动生活,卡尔·毕赫尔作了下列描写:

在这种制度下,小地主亲自进行监督,而大地主通过一个管家来监督。那靠近庄园住宅的领主自留地,由永久附着在这块地上的农奴来耕种;他们在那里取得食宿,并在多方面的分工制下,从事于农业和工业生产、家庭职务以及对领主的个人服务方面。领主自留地是夹杂在人数多少不同的不自由农民的租地之间,每个农民独立地耕种他的“足够养活一家的土地”,而大家和领主共同使用着牧场、树林和水流。然而,同时,每块农民租地要求它的租有者履行若干种服役并缴付若干种自然产物的捐税给庄园。这些服务包括起初按照需要,后来按照时间计算的劳动,不论所做的劳动工作在播种或收获时期的田野间,在牧场上,在葡萄园、花园或森林里,或在庄园工场上,或在妇女工场内,在那里农奴的女儿们做着纺纱、织布、缝纫、烘面包、酿造啤酒等工作。在为庄园服役的日子里,不自由的劳动者在庄园住宅上可取得他们的膳食,完全象庄园农民所可取得的那样。他们还须修葺在庄园住宅和它的田地周围的篱笆,替领主住宅守望,并须承担传递书信与运送货物的工作。那些缴给庄园的实物租税,部分是农产品:例如五谷、羊毛、亚麻、蜂蜜、蜡、葡萄酒、牛羊、猪、家禽或蛋,部分是公社森林里所砍下来的并已可应用的木材:例如木柴、木头、葡萄藤桩、火把、盖屋板、桶板和桶箍;部分是手工业制品:例如呢绒和麻布、袜子、鞋子、面包、啤酒、桶子、碟、盆、酒杯、铁器、锅子和小刀。由此可见,那为供应商品所需的某种程度的专业化,已经存在。在劳役与地租之间,还有各种义务:例如从农民田舍运粪肥到领主的田地上,替领主饲养牲口过多,为招待庄园的客人表演游艺。另一方面,领主给农民以经济帮助:例如,饲养传种的牲口、建造为共同使用的渡口、磨坊和炉灶,为大家防止暴动和不公平行动,又当谷物歉收或其他困难发生的时候,他根据约言,从他的仓库里发给救济品。^①

从上面看来,庄园是一个相当自给自足的小经济有机体;它可免除古代罗马奴隶制大地产的严格集中情况;它给每个农民一间

^① 毕赫尔:《工业革命》,第103—105页。

单独的茅舍和几块田地以满足他家庭的需要；从而使他获得某种程度的个人独立地位。

庄园的自給自足状态，在封建的盛世，是一个真实的情况，虽然它从来未曾达到过完备的程度，因为特别是盐、鉄和磨石須从外面运入的。大庄园雇佣“交易人”来购买外面的商品并出售庄园的剩余品这项意见，是站不住脚的。每个庄园主要必需品，是由自己生产，自己制造的。除了在饥荒时期之外，很少有小麦及其他谷物的地方性市場；至于葡萄酒、啤酒、羊毛、麻布、皮革、毛皮，等等的地方性市場，也是很少的。这些东西是在庄园上制造的，也是在庄园上消費的。

关于中世紀农民职业的性质和它們的季节性质，在中世紀历本上所附很多古怪的插图內，已为我们保存下来（这些历本是我们近代农民历书之鼻祖）；每个有观察力的游历家也可从很多大礼拜堂的雕刻上看得出来，如亚眠大礼拜堂的大門口很显著地說明这所教堂是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建造的。米叶的《天使图》^①，表明了村庄晚钟在每个小村里所起的作用。在中世紀农民的談話里，常以取自日常生活的形象来增添风趣。有时，在这些語言里，反映出有趣味的心理。英国农民称他的田地为“犁地”或“畦沟”。日耳曼农民称之为“晨地”或“白天工作”地（在这两个名詞里，主要因素是時間，而非工作本身）或“轉弯”地，就是暗指耕犁的轉弯。耕地的終点，就是駢兽在畦沟里轉弯的地方，一向是最后犁耕的部分，因而有时叫做“头地”。那是标出白天工作的界限的。“所以，疲倦的犁夫和力竭的耕牛在季节末期所做的这项最后工作，成为大家所熟悉的劳苦一生終結前的最后掙扎之象征。布勒通农民，在臨終气息奄奄的时候，被說成是‘正在耕他的头地！’”。

^① 米叶是法国大画家（1814—1875年）。他的“天使图”繪于1859年。——譯者

我們不要以为：一个庄园的社会結構是包括层层上叠的一系列“层次”的。“紡織物”这个詞可更好地描写出这一情况，因为諸階級互相錯綜地交織着，构成了一个紧密的社会集团，虽然类型不一。最低微的階級，是奴隶。但在第八世紀以后，中世紀欧洲的奴隶制度已迅速衰落，以致到了1000年，作为一个制度来看，实际上它已是微不足道。我們所可看到的少数奴隶，不是田間劳动者，而是家庭仆役。庄园經濟的慣例是不容許欧洲奴隶制度繼續保持的。当“土地丈量”进行的时候(1086年)，英国奴隶人数只占王室領上的全部依附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在中世紀欧洲，奴隶制度的逐漸崩潰，不是因为人道主义的感情或一种新的良心起着作用，而是因为它的存在和时代的經濟状况和社会結構是相抵触的。甚至南欧洲也逐漸縮減了奴隶制度而轉到了农奴制度方面，并以“从农奴經濟产生出来的日耳曼法典来替代了从奴隶制社会产生出来的古典羅馬法……到了十二世紀，羅馬法理学和查士丁尼法典，在意大利已变为烟沒无聞，而伦巴人的法典正在全盛时代”。至于后来羅馬法的复兴，是起于完全新的而又不相同的經濟状况里的。

在中世紀社会的下层里，身份和租地如此交織着的，所以不可能撇开租地的性质来討論社会組織的。一般說，一处中世紀庄园上的基本人員包括有农奴和賤农。这两个等級的依附人，有着不同的历史根源、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的經濟状况。农奴的本原，从历史上看，是从羅馬的隶农和日耳曼的“半自由人”(litus)传下来的；就是說，这两类不自由的租戶在羅馬帝国的后期已經存在。按法律的假定——就是，在技术上对农奴的看法——农奴在人身上是一个自由人，而在經濟上是一个不自由人。但在喀罗林时代，老的不自由階級，由于很多自由人被降到农奴地位，而有着显著的增加，因而它不仅包括那些沒有財產的人，而也包括那些小有財產而不够維持自己和他們家庭的人。每个住在領主土地上的自由人

下降到低微地位。这些“可怜的自由人”和真正农奴很少差别，终于和他們相混合了。不是法律的理論，而是租地和所要求的服役的类别决定了农民的身份。第九世紀的一本寺院紀录里告訴我們說，有三种农奴：隶农、半自由人和被奴役的自由人，都住在同一的庄园上。

表面上，农奴的命运和奴隶的命运，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事实上，并不如此。奴隶是一种动产，可以象牲口般被买卖。但农奴是不得离开土地而出售的；如果庄园出售，他跟着庄园轉移到一个新的庄园領主方面。所以，农奴有着一块世袭地，正确地說，世袭地有着农奴，因他是土地上的不可分离部分。而且，农奴享有一个奴隶所不能享有的家庭关系；他的妻子和儿女时常在文献里被提到。虽然，直到中世紀相当晚时期以前，农奴的确非得領主的同意不得娶妻；非得准許，也不得娶本庄园社会以外的一个妇女；如果他这样地結了婚（混合婚姻），他必須付一种罰款。关于禁止混合婚姻的例子，最早见于格列高里一世的书簡里。混合婚姻起初是严厉禁止的，因为这种婚姻会使社会完整趋于破裂并使庄园的經濟效能趋于减低。但這項規則不能付諸实行。自然的和社会的傾向反对它，而且教会也反对这种拆散家庭的办法，就是，由混合婚姻所生的子女将分配給丈夫的領主庄园与妻子的領主庄园。因此，這項混合婚姻的禁令終於废止了。

乍看起来，封建制度的建立，似乎使农民的命运更恶化并使他們的情况比前更坏。但农民所遭受的經濟剝削，从他們在庄园上所享有的安全的增加，获得了部分补偿；在那里，領主保护他們的人身和他們的財產，是对己有利的，在那里如值外来的侵犯，城堡給农民以一种庇护，在九至十世紀，保护比自由还更需要。到了查理曼时代，那些沒落自由人所失掉的权利，已是代价昂貴的有名无实的权利，因为从它們所得，已不償所失了。皇帝的战争这样多而

且所有的战争都在辽远的边境上进行，所以那加在自由人身上的军役重担已超过了他们所能负担的程度。由于降为农奴，自由人可免除军事服役并能够安居在家内；他所负担的新庄园捐税，不大于，即使相等于，军事负担和所可能遭受的时间与产品上的损失；这种损失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春夏两季，当他的田地正在需要翻土播种和他的庄稼正在需要收割的时候，他被召去服军役而长期留在外面。农民的命运，在第九世纪新制度下，甚至比在老制度下可能好些。寺院纪录里，记述农奴的劳动与辛苦，但未曾揭露他们的可怕的艰苦或贫困状态。圣加尔寺院的高僧在 884 年所记的一件故事里表明：那时的犁夫边踏畦沟，边对牛唱歌，象他们在后来更不幸的情况下所做的那样。

农奴和贱农的地位，往往被认为相同而混为一谈。老实说，这两个阶层也常常是难于区别的。有各种程度的贱农，正象有各种程度的农奴那样；贱农的身份，也象农奴的身份那样；是由他所保有的租地的种类来规定的。租地分为：自由租地、力役租地和不自由租地。贱农被说成是“自由人中的最低微的人”。他也可说成是农奴中的最幸运的人。在英国法律里，我们看到贱农和农奴之间差别的反映：法律以二百先令的罚金来保护贱农的生命，而对于农奴生命的估价，只作六十先令。从历史上看，贱农阶层的起源后于农奴阶层。如上文所述，农奴阶层可追源到罗马时代。另一方面，贱农是产生于封建时代的早期，就是在封建制度正在萌芽、正在演化的时期。在英国，贱农的最初出现，是在诺曼征服之前从部族制度过渡到封建制度的时期；在欧洲大陆上，贱农是法兰克帝国瓦解，尤其是特权制度的牺牲者；这项制度授给乡村领地以独立与自治地位，因而削弱了王室的权力，扩大了庄园制度的主要特征。贱农阶层原来是从很小的自由农集团来补充的；后者所有的土地不够大得使大封建主寻求他们的同盟作为附庸；在过渡的混乱状态

下，他們的勢力也不夠強，足以在沒有保護的情況下而能保持他們的土地。他們是屬於小土地所有者階層；為了他們，查理曼曾以下列規定來放鬆了他們的軍役負擔：在兩個各有兩處莊園的人中，一個人應為另一人配備軍需，在三個各有一處莊園的人中，二個人應為第三個人配備；五個“半莊園”人應為第六個人配備等等。一句話說，賤農原來是一個在自由農村公社居民的地位之上的小自由農；他在情勢壓迫之下，把他田地的所有權交給某個有勢力的地主鄰人。後者把他的小地產合併于自己的大莊園（莊宅）內，於是，這土地的舊主人被降到依附人的地位，而在社會地位上，他和不自由的農村公社合而為一，雖然他還保存了他過去地位的一些痕迹或回憶。“占有自由土地果然是很好的，但有時，在混亂時期，一個封建領主卻提供了一種保護。”

農奴可能是由於整個自由村莊受到壓迫而整批地變為農奴的；賤農是由於經濟和社會的逆境的緣故，個別地變為賤農的。傳統和風俗保護着“自由”賤農，使之不受農奴制的最惡劣的虐待。常用以描寫他們的名称“習慣法人”，正是指出了這個事實。賤農是不可以隨便課稅的，就是說，對於他不可以無限度地或超過所規定的稅率或數量徵稅的；他能夠把他的動產傳給他的子孫；他的租地條款，儘管有着苛刻條件，但是由不成文的，可是有法律效力的習慣契約來規定的；他的勞動不能隨便并幾乎漫無限制地被剝削，象農奴的勞動那樣。賤農是永佃人，但在人身方面不是束縛于土地上，象農奴那樣；他的情況，似可說，是“屬於地的”多于“屬於人的”的；他之所以成為一個賤農，不是因為他父親在他之前已是一個賤農，而是因為他保有了一塊賤農租地（land in vilenagio）。農奴的釋放，如下文將談到，是依循賤農地位所指出的緩和路線來進行的，因為這兩個階層的接觸，甚至它們的溶合，產生了這樣的結果。就是，按照高級的而非按照低級的情況來調整的。賤農拉上農

奴，达到了他們的地位；两者終于一起轉到了自由人的地位。在十二到十三世紀，很多农奴通过释放而成为賤农。

“賤农租地”，看来和封邑相近似，但必須和它明白地区別开来。庄园世界是封邑世界的下层。政治上說，封邑是由一个貴族所統治的一块領土；他在隶属于一个高級貴族的附庸地位上保有它。經濟上說，封邑是“諸領地”的总和，而一块“領地”是“諸庄园”的总和。每一个庄园，是一块領地內的一个单位，而每块領地是在封邑中的一个实体。領主是属于某种等級的一个貴族，無論低級的或高級的；他的各个庄园上的租戶是农奴和賤农。他們的保有地，叫做“租地”。因为农民是“非貴族”的，所以他們的租地也是“非貴族”的，不論在本质和起源上，是农奴的或賤农的。在 1251 年的一件单个的文献里，我們看到，在同一块土地上，有着三个所有人，在不同的产权下保有土地：宗主、附庸和賤农租戶。

当自由賤农已执行他的服役并付清了所加于他的租地上的捐稅之后，他对租地有着完全的处理权；理論上，他在給領主繳付一种收費的条件下，能够把它让与出去，虽然事实上他是不能够这样做，因为賤农租地是要成为一种永久性的关系和状态的，并且，所有的負担一般是非常繁重，所以一个賤农不能够爬上这样的一种經濟独立的地位。

另有一种賤农地位，它包括那些不幸的小地主；他們不能过着独立的生活或他們的自由地太小，不足以維持他們；所以他們交出了他們的产权給某个业主——常常是一所寺院——但他們在繳納这些土地的封建租条件下，繼續保有它們。这样，他們被迫做若干种庄园服役，他們降到劣等地位而变为不自由的賤农并和农奴相混淆了。第三类賤农，是那些租种土地的人。因为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个貴族，因为拥有过多的土地，不能有利地使用农奴与不自由的賤农劳动力来耕种，因而願依照契約租出一块土地給

一个辛勤的农民。这种租地的条款，是明确地规定的。关于賤农的服役，史料上没有谈到，但可能在春夏耕种和秋收的时期，他到領主的自留地上去帮忙的。

显然，自由賤农是在庄园社会的后期演变出来的，在十二世紀的后期和到十三世紀出现的。关于賤农制度的历史，有很多还待研究——它的起源、它应尽的义务，尤重要的，它所包含的自由萌芽。十三世紀的法律家深湛地討論了賤农制度，但賤农的法律地位和他实际的、历史的情况，在那个时候已是大不相同的事情。

农奴和賤农是庄园社会中的两个最广大的和人数最多的阶层。但除了这两个阶层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农民，总的說，他們形成了一个不同等級的混杂，下等居民在村庄中所保有的地段，还不到“碼地”的大小。这批人是：“半自由人”(colliberti)、边缘居民、小佃人、茅舍人。“半自由人”是中世紀史上的一个最大的謎。“collibertus”这个詞的字源：“colum”和“libertus”，沒有提供了什么参考的意义，而各种关于“半自由人”的起源与地位的意见，又是推測之詞。他决然和羅馬时代的“collibertus”〔“同自由人”〕，没有什么关系的。他是处于农奴和賤农之間的中間地位呢？还是处于賤农和自由人之間的中間地位呢？他是一个高級的农奴呢？还是一个高級的賤农呢？不論所抱的见解如何，似乎可以断言，他的地位是被他下面的人們所羨慕的；他所享有的权利，可获得法院的保障。关于圣奥平·頓热寺院的“半自由人”之著名訟案，很可說明了这一点——即使我們还未曾搞清楚“半自由人”究竟是什么地位的人。边缘居民之所以被这样地称呼的，是因为他們的小租地是在“敞开田”的边缘上，但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們可能是从新来的人中招募来的；这批人由于战争、虐政、饥荒、水灾等不幸原因，不得不离开了他們的故乡，即法典上所称的“漂泊人”，他們漂泊到庄园內，被准许作“客人”居住下来并准予在庄园边界上荒地

中开垦一块新土地。“茅舍人”和“边缘人”在“敞开田”中间未曾有过“半点租地”；象有些历史家所认为的，他们只有庄园边缘上的小块土地；他们可能是很穷苦，所以他们被迫从他们的邻人或从他们的领主借用耕牛来进行他们犁耕工作。显然，这样的一块小土地是不够维持他们的全部生活费的，所以他们替领主或村庄的富农做些外面的工作，以求弥补。“小佃人”是没有什么租地的，但保有一间茅舍和周围的小小场地；茅舍人是穷得要命的人；他们仅仅有一间茅舍——一般只是草棚或小舍。这两种的人在富裕贱农的土地上作为雇农来工作，或替庄园领主做“杂役”。

在所有这些不自由人的社会等级里，法律地位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租地的形式甚于出身或先前地位，决定了不自由人在庄园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他日常生活的方式。属于这类中间型社会成分的群众，有时被指称为“乡下人”(buri)。但这种庞杂而模糊的中间等级的存在，是重要的；它“一定会促使我们提高对大量农民群众的法律自由和经济幸福所作的估计”。

庄园生活不一定是或一向是一种完全死气沉沉的生活。不应该认为庄园是一个社会衰败的现象。在它的结构中，有希望又有潜力。一个社会是永远不会灭绝的，也不会完全消逝的。它不会死亡；它会改变，会调整自己来适应新条件；它是有机性的，它生活着、成长着。

农奴制是一个世袭制度；一个自由人，如果和一个农奴女结婚，将丧失他的自由；自由租户，如果占有一块不自由租地满一年零一天者，就丧失自由；战争、犯罪处罚和劫掠，常常使穷苦自由人降到不自由地位；尽管如此，然而，通过整个封建时代，可以看出不自由状态是不断地有所改进的。到了十一世纪，农奴让位给根据租赁关系的佃户。在十一到十二世纪，如果庄园制度一直是并到处都是留在一般所认为的原封不动的地位上，欧洲不可能有人口

的迅快增加。在 1100 年后,欧洲的农奴制度迅速衰落。在那个时候,欧洲已感受到經濟社会的革命;在这以后,属于土地的农奴制不复能苟延残喘了。“农奴”这个名詞,虽繼續被使用,但农奴状态是在不断改进乃至在消逝的过程中。在十二世紀,欧洲的农业一般是在欣欣向荣的。当然,农民的日常生活,是辛苦的;他的社会地位,是卑微的,他的捐稅負担,是沉重的。但另一方面,他不能从他住所的地段上被赶走;而那不属于成文法范围的習慣法,也越来越多倾向于保护农奴。領主不得要求无限度的或办不到的服役。农民的义务是:服从规定的条件,并繳付作为地租形式的确定捐稅。

关于習慣法保护农奴的效果,我們容易作出过低的估計。試举一例來說明吧。那是早在 905 年发生的一件事。属于圣安布洛茲寺院的农奴曾向大主教申訴說:住持迫使他們从事新的超乎常规的强制劳动。大主教回答說:他們是农奴;需要他們付什么,他們就应付什么。农奴并不否认了他們的不自由地位,但繼續爭辯說,住持沒有权利来要求新的超乎常规的义务。于是,大主教进行了調查;在查明农奴所控各节确是实情之后,他判决住持不得征取超出习俗与傳統范围之外的租稅和劳役。有公平而又仁慈的領主的例子,也有不公平和不人道的領主的例子。还有农奴拒絕释放的事例。

五十年之前,法国大学者利奥波尔得·得利尔,就浪漫学派所作关于中世紀时代农民的虛伪和感伤的敘述,发表了異議;而比較近时的学者,象兰普勒赫、亨利·塞厄和費諾格拉道夫,大力支持了得利尔的論点。中世紀农奴是沒有象我們所认为在安适生活上所必需的东西的;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証明:他的生活是苦惱的。他本来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安适生活。故勛爵威廉·阿士力曾写道:

无疑的,小农、茅舍人和手艺人,有时因飢荒而遭受了苦难;无疑的,他們

所处的环境，也常常是不卫生的。但还是有一个安适的标准，那是一般意见曾认为是适合于他們的，那是曾用管理物价的方法来維持的。但现在我們會觉得滿意的，如果工資将由一个阶级所需設法維持的安适标准来决定；不让它放任自流，不让它遭受机器和外来劳工竞争的危險。^①

就保护和維持方面來說，农奴制对农奴是有着它的优点的。

領主为他的农奴的罰款負責；他可能被要求偿付他的农奴的債款；領主注意农村租戶的物质利益，是对己有利的。农奴所付的捐稅，在固定之后，一般是低于自由人所付的捐稅，他們的土地事实上是世袭的，当然，分配于他們的儿子之間……尤重要的，农奴制的理論和它的实践是大不相同的东西……有許多所謂“管帳者”；他們所处的境遇远优于人們从研究关于奴役的資料所可設想的。^②

庫普兰先生，在关于圣柏騰寺院农奴之出色著作里，写道：

农奴制，比奴隶制要高多少，或比自由制要低多少呢？整个看来，否认任何恒久水平的存在，比起叙述某一时期所存在的水平并推論它适用于若干世紀，可能更为妥当。从第九世紀起，很可能，没有什么恒久状态存在，古典的或权威的叙述的危險是：它們一向暗示有某种恒久而又一致的状态的存在……再也沒有比那一部分有关农奴的权威叙述危險更大。它說：农奴可以买卖，可以贈送或释放。另一种可称为极端见解的，是那被贈送或出售的农奴所处的地位，完全象近代租戶农民变换主人那样。他曾付地租給一个人，现在他付給另一个人。这项见解曾受到嘲笑；它果然不是全部正确的，但至少也包含着我們所找寻的真理中的一部分。

在十一到十二世紀，当业主阶级发现按租賃关系分配租地比征取固定的服役或捐稅更为便利又更为有利的时候，自由租戶迅速增加起来。那改变了的状况使他們減輕了責任和监督的麻煩。地租起初是以实物支付的，但在十二世紀当貨幣經濟开始流行的时候，地租常以貨幣来支付。这新租戶阶层中許多人不是从农奴

① 《經濟史导論》，第1卷，第139頁。

② 洛奇(Lodge)：《圣安德勒·得·波尔多寺院的庄园》，第96—97頁。

中而是从过去自由农民中轉来的；前者已轉入租戶阶层，而后者在战争或經濟困迫的压力下已經喪失了他們的祖传土地，因而成了租佃階級，而非自耕农階級。

曾有任何自由地所有人，在庄园制度时代并經過庄园制时代都还留存着嗎？是的，在欧洲的若干部分，有着相当数量的自由人。在薩克森自由农民阶层在十一世紀末期以前未曾被压到农奴地位。在多斯加納，地方上的多山或山区性质使很多当地自由人口未曾遭受庄园化。在法国山区特别是在奥汾涅，也有很多自由人留存下来。封建庄园制度，主要是以一个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哪里最有利于农业条件，那里封建庄园制度最流行。所以，我們看到，在弗里西亚和狄特馬士的沼澤地区內，也有大量自由人。对这类自由人集团，庄园的压力自然是很大的，而自由农阶层大多是屈服于这种压力的。自由地所有人被豁免了一切封建服役，但如值战争或掠夺时期，他們除了自己的力量外，很少有其他的保护了。在十二世紀，在南法的郎基多克，我們看到一項有趣味的紀录，就是，关于自由农为了反对封建化来保护自己和他們的土地而組成的同盟。这个“会社”在中世紀历史上，是独特的。我們至少沒有看到其他类似性质的紀录。大体上，除了在偏僻的地方和个别情况外，可以說，在九到十世紀时期，自由人阶层已大大地递减。在这时期，賤农的大量增长，証明了这一点。812年的一项寺院調查录里，列举出二千零八十个隶农、二百二十个农奴、三十五个“半自由人”，只有八个自由人。这些数字，是具有統計資料的意义的。但关于这些阶层的說明性的名称，还有其他的意义。它証明：农民階級，至少在羅馬語系的国家里，主要是从羅馬“自由出身的隶农”（被压迫到經濟束縛状态的羅馬自由人）而非从羅馬奴隶階級传下来的，后期羅馬帝国的日耳曼“半自由人”也提供了其中的一部分。賤农的性质迄今尚不清楚。正象农奴和賤农有着不同的等

級，在自由人階層中間也有各種社會等級的差別。“鄰人”(aoooolae)和“客人”(hospites)正是“自由人口的遺迹”。在那有自由人留存的地方，“普通自由人的土地，越來越更少于貴族的土地……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小塊土地，有時只包括幾條耕地，一行或兩行的葡萄藤，或僅僅一所房屋和園地，或園地的一部分”。但甚至在封建的盛世，自由人也未曾完全被消滅；在他留存的地方，他是最自由的人。他的土地雖是“非貴族”的，但他也是“非農奴”的。他的唯一義務，是繳付“免役稅”(cens)；在這情況下，它不是一項封建租，而是一項地方稅，付給那鄰近領主，後者是他的政治統治者而不是他的莊園主人。

在本章里，關於莊園的農民與農作，已談了很多，但關於莊園的領主，尚說得很少。莊園領主是一個莊園社會的統治者兼業主。現在，我們必須討論的，正是這個地方的政治統治權。他對他的農奴和賤農，兼有徵稅權和司法權。這些特權也構成了領主統治權的一部分，包括有物質的和非物質的財產在內。

這些地方特權的來源是什麼呢？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有爭論性的。有法理學觀點的歷史家，傾向於從過去的公法里，找出它們的起源；就是說，公法上的特權與職能是被封建主潛取的。另有贊成經濟社會解釋的歷史家，不是從“國家”的瓦解和領主潛竊公權方面而是從領地的經濟和社會的組織方面找尋它們的根源，這正是在“國家”觀念已經消逝的環境里大土地占有制的一個自然而又直接的後果。還有人說，“專利稅”、“人丁稅”、“通行稅”、“強迫勞役”，即各種服役或捐稅，是從莊園權利派生出來的，並由於公法和私權的混淆而生效力；這正是封建制度的本質。姑不談這兩種論點之孰是孰非，至少可以斷言：其中許多特權不是起於純粹野蠻的篡奪，而是由於先前秩序的崩潰，必然落在莊園領主身上。

正確地說，在封建的盛世，公共徵稅是不存在的。甚至國王也

“依靠自己的收入而生活的”，就是說，他們是依靠王室莊園的收入，而不是依靠賦稅的進款的。那編寫於十二世紀的《論國庫的對話集》是一件盎格魯-諾曼文獻；它的作者寫道：

據我們祖先的傳說，在“征服”後王國的初期，國王從他們的莊園所收到的，不是黃金或白銀的貨幣，而是實物的繳付……那些派去管理收款的官吏知道，每個莊園應繳付多少……我親自碰到過那些曾目睹糧食在規定的時間從國王的莊園運到宮廷去的人們。

在這同一文獻里敘述了那可能存在于一個領主與他的租戶之間的密切關係；里面談到英王亨利二世——但談到他的諾曼和安吉文莊園，不是談到他在英國的莊園——說“那里時常有喊冤的農民群眾涌進了英王宮廷；而使他感到厭煩的，他們時常攔路喊冤，舉起他們的耕犁作為標記”，有時控訴了一個不公平的管家，有時埋怨不論由於氣候、戰爭或賦稅造成的農業衰敗。

就莊園賦稅的數目和種類說，地方習慣相差得很大，而用以指示它們的名稱，幾乎是無窮無盡的。在杜·孔治的中世紀拉丁《詞典》里，這些名稱表充滿了二十七頁四開本各欄。關於這些稅，有一個共同的事實，就是，它們都是屬於直接稅一類。間接稅是起源於中世紀後期和近代早期的；它的出現是在商業和貿易占著重要地位之後。這些直接稅可分成不同種類；但最簡單的方法，是按照它的形式來分類。所以，它們可區別為：(1)租稅，(2)捐獻，(3)勞役。

租稅或以現款或以實物繳納。其中最重要的是：“農奴人頭稅”(capitatio)、“土地稅”^①(德文 zins)、“家庭稅”(taille 或 questa)、“田租”(champart)、“人頭稅”(péage)、“專利稅”(banalités)。“農奴人頭稅”，是加在農奴身上而不是加在賤農或自由人

^① 也可譯為“免役稅”。——譯者

身上的人头稅。这一項稅只是由农奴及庄园世界里象犹太人那样的最低社会等級的人繳付而別的人都不繳付的。它早已被认为是可憎的稅，因为它是农奴制的象征。下列苛重的稅也是从它派生出来的：領主有权在他的农奴中間征收結婚稅并对任何同庄园外的人結婚的农奴(混合婚姻)征收“超結婚稅”。

家庭稅(“*taille*”从拉丁文“*tallagium*”得来，意即刻痕于木条上，因而获得“*tally*”一字，意即中世紀时期的記帳方法；在德文里它叫做“*Bede*”，意即所要求的东西)，是一种典型的而又最普遍的庄园稅。它是加在农奴、賤农和自由人身上的一种稅，每年征收一次或一次以上；关于它的繳付，用实物比用现金更为普通。这个名称，首次出现于十一世紀，但这种稅，在这以前已有存在。它是对作为一个集团的家庭所征收的。在所有中世紀的捐稅中，再也沒有比“家庭稅”更明显地表明了从所有权和主权的混淆所产生出来的复杂情况。它是有法律根据呢？还是一种专橫的稅呢？有些作家认为：它是从农奴人头稅派生出来的。但即使如此，它怎样会应用于賤农和自由人方面呢？有人认为，也有人否认：它在法律上是从羅馬时代传下来的。还有人认为，也有人否认：在喀罗林朝的勒索和封建时代的“家庭稅”之間，有着繼續性的存在。它是一种动产稅，还是一种不动产稅呢？有时它似乎是这个而有时又似乎是那个。有时，要在家庭稅和“土地稅”(“*cens*”当然是一种免役稅的形式)之間，作出区别，也是困难的。但无论如何，“家庭稅”已成为这样地普遍，以致它时常概括了所有的租稅。另一方面，就它的实施來說，是有着很大分歧的。农奴可被課稅到随便什么程度——用当时的好听話來說，他“可按慈悲来課稅的”，就是，一直可課到領主慈悲的限度之內——而对賤农和自由人，“家庭稅”是有着一种确定的、习惯的稅額。在十三世紀，甚至对农奴也变为固定課稅，那标志着农奴地位上的一种真正的进步，即向自由又垮进了一步。家

庭稅的專斷性曾使它成為一種最苛重的稅。後來，它還漸漸加在几乎所有的東西上：禾捆、干草、葡萄收穫、牲口、小雞、蜂蜡。作為一種農業稅來看，它有時被稱為“田租”。但每種課稅的特殊對象可給予一種稅名。莫怪當時的人強烈地要求確定家庭稅的稅額，而他們終能如願以償。在硬心腸領主的統治下，它成為各種捐稅的總和。

“土地稅”是一種地租，有時可以實物，但一般用現款來繳付的。它不是由農奴而是由賤農和自由人負擔的。它是一種莊園稅，顯然從古羅馬的土地稅得來的；後者在喀羅林王朝和封建時代曾被占奪而變為分散。但有些歷史家主張：土地稅，也是屬於農奴制起源的。土地稅的變相名稱，是爐灶稅和房屋稅；那表明：它曾是一種房屋稅。如果有人不付土地稅，他就將喪失了他的租地。對一個自由人來說，土地稅當然不是一種地租，而是一種純粹的土地稅。

“專利稅”是莊園領主從壟斷性控制社會上若干種必要的經濟活動所獲得的進款。他有着磨坊、釀酒作、烘麵包爐灶、葡萄酒壓榨機、村庄耕牛、有時甚至占有村庄水井。那些擁護原始日耳曼公社制度的人認為：這些專利是往時自由村庄制度的莊園化的殘余。其他的人把它們看作領主自私自利剝削行為的例證。它們是屬於日耳曼的起源，還是屬於莊園的起源呢？還有若干其他歷史家把專利稅歸結到城堡生活所加的軍事條件。有些情感主義者的理論，虽然是錯誤的，可是有趣的；它說，這些企業是由莊園領主為了社會的福利作為慈善的措施而建立起來的，但可惜這項可愛的理論已被事實所揭穿：領主歷來是由求利的動機而行動的。他把他的地方特權作為資本，並利用了它來對他的佃戶進行壓榨。

“捐獻”不太繁重，多些偶然性，但同樣是麻煩的課稅形式。它們主要是維持強制性的招待。當領主從一個莊園旅行到另一個莊

园而在地方上逗留若干天时，他有权使自己和他的随从寄宿在村民家里；他們被迫給他和他的随从以及他們的馬匹供应食粮和飼料；甚至还須飼养他們的猎犬。这项办法是大可舞弊的，所以，它在早期已改为常规化；当它尚不是过时的时候，它改为一种习惯的义务，每年只实行三次。这惯例的历史根源，可追溯到羅馬的驛站制度；在这制度下，臣民必須供应政府的信差及其他官吏膳宿。日耳曼国王把这项法律改为他们臣民的一项义务，就是，在他们旅行的时候，要維持他們和他們的宫廷。封建貴族又从他們借用并实施了这项办法，以适应自己的当前利益。

“强迫劳动”（“*corvées*”这个字从羅馬的法律名詞“*corrogata*”得来，意即强制劳动的条件），是庄园領主对农民所要求的强制服役的总和；例如建筑公路、桥梁、堤壩，提供馬匹与貨車来拖运产品到市場去；还有其他的劳役：領主为自己的自留地和庄园住宅无偿地要求农民承担若干天劳动或做一系列杂役；城堡的保卫和住宅的日夜守望，也是强制劳役。严格來說，它們决不是軍事服役，而是庄园的服务。“劳役”这个名詞，在“蛮族”法典里可找到，而这一个勒索形式是庄园义务中的一个最古老的形式。劳役的征用，当然是有季节性的。如在春季、收获时期和晚秋。

关于这許多强制劳动，我們既不否认它們的压迫性，也不否认它們的专橫性。而且有时在征用劳役的方法上，还有野蛮性。同时，其中最恶劣的强制，逐漸被废弃，而其他的也趋于确立而成为习惯；要不然的話，它們也轉化为貨幣繳款；那減輕了很多专橫性与野蛮性。也應該記牢：征集劳役一般是由执行吏或管家經手办理的；他們本人也往往是由农奴轉变为“半騎士”的。他們或者是厉害的工头，要使領主觉得他們能干；或者夸大或濫用了他們的权力；小人得志往往如此。領主时常不会熟悉庄园上苛刻或残暴的情况的，除非他偶然来参观了这一所庄园；或只通过农民的一次反

叛，他才初次发觉这些情况。有人說得很好而又很聪明：“在中世紀行政里，不孚众望往往是和行政效能携手并进的，而强暴行为仅仅是一个力量的偏差”。庄园上压迫行为的真正責任，与其归結到庄园領主的故意濫用权力，也許不如归結到庄园的执行吏和管家的压迫措施。其次，也應該經常記牢：埋怨課稅，是一个老的、很老的人性特点。关于安如伯爵赭弗里的軼事，可資參考。他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了一個自己的农奴，而后者当面不認識他；两人不期而遇。对伯爵所問，农奴盛称他的領主，但深恶痛绝地訴述他的庄园代理人的行为和他們勒索的不公平。我們应避免对庄园制度贊成或譴責的泛泛概括。有体諒他們的租戶的好領主，也有虐待他們的租戶的坏領主。的确，不可能相信：大多数領主是如此蛮橫殘暴象臭名昭著的托馬斯·得·瑪恩那样；或者庄园的不公平和濫用权威是一个普遍禍害。

討論中世紀經濟史，不应不注意森林在中世紀生活里所起的重要作用。欧洲的森林，那时比现在，要广大得多。从远古以来，森林对农民曾是一块自由供应的場所。从那里，他获得了他的燃料，在那里，他的猪群和牛羊群吃着嫩叶，草地上的干草还作为冬季的飼料。一块森林地带的价值，是以它維持猪群的能力来估計的；一亩山毛櫸地，一般认为是够养十头猪的。在貴族开始占夺森林之前，村庄的任何成員可自由进行清除，而开垦一块土地。砍伐树木，可增加村庄周围的耕地，因而减少它的土地荒，并有助于保护牲畜群，因为可防止猛兽的侵袭。那也可削減森林火灾的危險。差不多唯一的限制，在于禁止砍伐硬木，例如橡树、山毛櫸和栗木这一类的树林；因为它們的果实是猪的飼料。这些清除森林的行动叫做“占据”(aprisiones, 从prehendere得来，意即占取或占据)或“圈围”(bifangs, 德文bifaenge从bifahren得来，意即用籬笆圈围)。

当封建制度的网罗撒布得越来越广的时候，当庄园制度对农民抓得越来越紧的时候，强壮的人一步步地深入了森林，以求出路；他们砍伐了那里的树木，并在残根之间播种了小麦与元麦，正象几百年以后美国垦荒者在“蓝桥”和阿利根尼山脉里所做的那样。当时，很少使用火烧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森林地，因为它是太危险了。这种工作是用斧、棒和镢来进行的。德意志有句谚语说，“斧头是对处女地的适合工具”。然而，这类森林居留地，在中世纪时代的欧洲比在美洲，需要更多的集体经营。中世纪的人比近代人，是更多依靠集体的通力协作的。他的工具，很少，又粗陋又昂贵，而且太重而不易使用的。甚至砍伐一棵树，需要几个人的协作才行。关于中世纪的伐木工作，我们只是偶然获得一些消息，但在威利巴尔德的“彭尼非斯传”里（763年），精细地写出了某种程度的伐木技术；传中有一段关于圣徒砍伐神圣树[“Robor Jovis”即托尔神树（“Tree of Thor”）的拉丁译名，它是异教黑森人的神圣树。]的特殊记载。第一次或下面的切痕，是切在要树倾倒方向的那一面并砍到树的中心，而第二次上面的或“前面”的切痕是切在相反的一面的。

从十一世纪起，全欧洲有着很多表示森林垦地的地方名称。地方尾词的例子，在英文中有：“霍尔特”（-holt）、“赫斯特”（-hurst）、“哈特”（-hart）、“查特”（-chart）、“罗埃德”（-royd）、“豪”（-haw）、“威尔德”（-weald）、“伏尔德”（-wold）；在德文中有：“奎特”（-reut）、“罗得”（-rode）、“窝尔得”（-wald）、“海英”（-hain）、“霍尔士”（-holz）、“哈根”（-hagen）、“什拉格”（-schlag）、“布兰”（-brand）、“布伦”（-brenn）。其中“查特”、“布伦”、“布兰”使人回想到使用火焚的方法来烧焦或烧倒树木；“豪”与“哈根”意即“砍倒”树木；“罗埃德”、“罗得”暗示这地点是把树木“除去了”的。“斐尔德”（field）这个词，在用作一个尾词时，通常并不意味着一块田

地,而是意味着树木曾被砍倒(felled)的地方。

有記載可稽考的最古森林贈予,是在 559 年。森林的村庄早在第七世紀已开始出现。关于森林属于王室領主最早的要求,是在 697 年。查理曼起初对于森林的清除,未曾加以什么限制——“在任何地方,人們可把树林連根斬下”^①——但在 810 年,他开始限制了这项行动,或者是为了要防止那些被軍役压迫的自由人的逃避軍役,或者是为了要保护森林作为狩猎的园地。这两种动机,可能对他的立法都有影响。通过十和十一世紀,对于森林价值的認識,日益清楚,它不仅是作为狩猎的地点而已。这狩猎法无疑是具有巨大野蛮性的;可是农民所受的更大痛苦,在于封建貴族的圈围森林方面;他們指派了森林管理人,勒索在森林中砍伐树木、捕魚、打猎、牧养猪群等的執照費。当私人控制森林权越来越推广的时候,第一批移民越向內地退却,所以我們看到:过去的森林开垦地由第二批涌入的移民来居住。然而,第二批的來人沒有象第一批移民那样的刻苦耐勞。但他們却是属于庄园农民的下层:边界人、茅舍人、小佃人、边缘人,他們力求获得大于小“碼地”或只够維持一家生活的土地,来改进自己的境遇。在若干地方,有这样多的大批农民从庄园移到森林里去,以致我們确实看到在 1114 年摩塞耳河地区发出了关于弃田的怨言。普魯姆的凱撒利厄,在 1222 年写作时,回顾了十二世紀时期的又长又有趣味的森林殖民史:他以一句話来总结它。他說:“在这漫长的時間里砍下了許多森林,建造了村庄,建立了磨坊,规定了賦稅,种植了葡萄;于是,无数的土地变为耕地了”。

森林的情况如此,沼澤地的情况亦然。遍及全欧的低湿地区的开垦运动,是关于欧洲人口增长和他們不倦勤勞的一个令人惊

^① “*ubicumque inveniunt utiles homines detur silva ad stirpandum*”。

訝的証据。我們看到这项运动出现在法兰德斯、弗里西亚和荷兰,在西法的河流网区域内,那里散布着波亚图、拉·色佛尔的低湿地;在德意志的威塞尔、易北河、奥得河的最低地区内,在伦巴第和亚浦利亚。其次,德文尾詞“奥”(-au,意即“草地”)、“利德”(-ried,意即“沼地”),英文尾詞“芬”(-fen)、“摩尔”(-moor)和“米尔”(-mere),法文尾詞“馬賴”(-marais),都說明了这一事实。在德意志的一个著名例子,是諾德豪森附近的“金色草原”;在法国的著名例子,是“杜尔沼地”,一个肥沃的平原,它在709年被海水淹沒,而在十二世紀被开垦出来,并用二十二哩的长堤来保护。象这类土木工程,需要这么多劳动,开垦出这么多土地,証明十一到十二世紀欧洲人口的激增。森林和沼地,对剩余人口,提供了出路。租地的分配与重分配,已不复足以維持生活。土地和人口之間的平衡在十一世紀已經失去。过剩人口在新开辟的土地上,找寻住所,或者流入城市里去,依靠手工业和小买卖来过活。因为农业和人口之間的旧比例打破,这就为新类型的职业开辟了場地。

在庄园业主之間为要保留他們的农奴和賤农,或要增加他們所有的这类农民人数所进行的竞争,完全把旧时关于逃亡农奴的法令打破了。一个抱有企业观念的領主,以甜言蜜語来誘使他邻人的农民归向于己。“在文献中,每一頁表明:农民不顾領主的明示意志而离开庄园的事件,已层现叠出”。释放农奴的大轉折点,出现在土地儲备跟着人口增加的比例而递减的时期,甚至清除森林与开垦沼澤也未能跟着人口齐头并进的时期。为了保持他們的租戶,領主必須緩和农奴制的条件;为了清除森林或排干沼地,領主提出寬大的移民条件。这些“客人”或“来人”在十一世紀中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經濟阶层,即一个有特权的賤农类型,接近自由人的身份,而又常常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上。“农民”这一个名詞正是从

这一个租戶阶层得来的；他們按一定的年限，或按終身，或按几个世代，保有他們的土地。因為他們为了在某一时期內使用土地而繳付了一笔“租錢”（“ferm”或“farm”从中世紀拉丁文“firma”得来）。原来，这个名詞不一定是和农业相联系的，但它可应用于任何按一定时期租出的不动产方面。它逐漸丧失了这项广泛的意义而变为专用于土地的租賃方面。这演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指出了自由农民的起源和他們在比較后期出现这一事实。

中世紀农民比近代农民远更是不幸境遇的牺牲者。由于他工具粗陋，农业知識有限，战事和狼的危險，他生活的界限，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窄狹的。那对一个近代农民可能是不便利的气候条件，对一个中世紀农民來說，可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灾难。这可說明为什么在中世紀編年史里有着无量数的气象記載——談到，甚至广泛描述干旱、大雨、严寒、潮汛、畜瘟、蚱蜢、蝗虫和毛虫等的影响。鼠患成灾，农民房屋都是用木材或草杆造成的；因而老鼠有躲藏的地方。人們可用中世紀时代的老鼠为題来写一篇有趣味的文章。老鼠是具有一个历史人物的重要性的。狼也是一个大害物。森林，又多又大。又在战争所破坏的地区內，狼的数量剧增。严寒常常会迫使它們离开森林到空曠的原野上来捕掠牲口和羊群，因而它們造成了可怕的損害。有一大批关于狼甚至威胁城市居民的事例。在十二世紀的一个冬季里，窩姆斯城曾人心惶惶，因为有一只巨狼常在城垣外出现。在1418—1419年冬季，巴黎滿城风雨，群情惶恐；狼甚至白天闖入了城市街道上。那时，乡村农民的情况一定又是怎样呢？

中世紀农民几乎沒有办法来对付虫灾。如果他使試用了火来灭虫，他的葡萄藤与他的庄稼会遭受危險。至于杀虫药是沒有的。因为非常迷信，他普通是乞助于教会的。乡村教士常常几乎和农民同样无知，同样地迷信的。因此，我們看到使用教会的咒逐来消

灭虫害的办法。下面就是这类咒語的一个例子：

願上帝佑助，亞們。鉴于在特啦主教区内，維勒諾斯居民控訴說：蝗虫、毛虫及其他的害虫蹂躪了这地方上的葡萄园已有几年时间，并且还在繼續为害，因而那块地方及其邻近地方上的居民蒙受了巨大損害；又考虑到他們所提出的請求說：上述的害虫应由我們〔特啦的主教〕給以警告并以宗教处罰的威胁来迫使它們离开上說城市的領土上；

所以，現在我們，根据在本主教区所行使的职权，对上述蝗虫、毛虫及其他害虫，不管叫做什么名字，用本文警告說：依本決定，將用詛咒和咒語的处罰，限在本警告公布后六天以內，一律离开所說的維勒諾斯城市的葡萄园內与土地上，并不得再在特啦主教区，無論什么地方上，作出任何損害；但如果上說的虫类在规定时期以內未曾絕對服从我們的这个警告，那么，在六天期滿之后，根据我們所說的权力，我們通过本文件將咒詛它們，并将依据本文件咒逐它們，决不寬貸。

1120年，琅城的主教也隆重地頒布了一項反对毛虫和蚱蜢的咒語。

在中世紀时代，迷信和信仰巫术，是普遍的。那些为了发生“魔力”、驅逐病魔、医疗牲口所作的巫术、神秘祝咒文句、符录、无聊的詩句、无意义的劣詩，迄今还有千百个例子流传下来。其中有的，是从古代羅馬人得来的，伽图在他的論农业的文章里，曾郑重地推荐它們。其中也有从古代日耳曼人祖先流传下来的。儿童的“順口溜”还保留其中的一大部分。那喚回迷路猪的中世紀拉丁文咒語“阿囉、塔哈来伊、斐高”^①声調多么响亮！伽图的治扭伤咒語：“达力斯、达达力斯、阿斯塔力斯，滾”^②！多么神秘！下面是一首典型的驅邪詩：

爱伊斯神圣，
伽底亚护神！

① “Alau, Tahalau, Fugau!”

② “Laries, Lardaries, Astaries, Disunapiter!”

雄鼠和雌鼠，
袋鼠，田鼠，
土撥鼠，野兔，
少的和老的
一起离开本土，
我命令。
你們已被咒逐！
上自地上下至底下
从田間你們帶來
病疫！
跟你們一起滾蛋，隨便你們到哪里，
阿非利亚斯，爱斯特利亚斯，帕拉米亚塞特！

“沒有畏懼心理的农奴，会反叛的”^① 这一句話是由圣加尔的爱克哈德約在 1000 年时写的；他是一个中世紀最著名的編年史家。他的話可作为一种主文，而中世紀时代有些农民反叛的記載，可作为它的注释。在那些經濟社会历史家的研究改变了流行的见解之前，十九世紀作家几乎普遍地傾向把中世紀时代的农奴的状况說成是一种忧郁恐惧和粗魯残暴的状况；这批历史家是浸沉于那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空洞民权观念的。但如上文所說，农民也是社会性的人，不是一直为了害怕未来更坏的情况而肯低首下心地忍受損害的。有不少事例，可証明：农奴大胆抗拒領主，并在法院上辯护他們的立場。关于圣安德勒·頓热的“半自由人”的訟案，在上文已經提过。

关于中世紀时代的农奴反叛，可提出两点重要的意见：它們可按地域来識別，也可按時間来区分的。在十三世紀以前，十字軍运

① “Servi qui non timent, tument.”

动及其他事件曾使农民熟悉了大规模的骚动例子；在这以前，农民反叛的“地带”是在北欧的沿海区，从下薩克森通过法兰德斯和諾曼底延伸到布勒塔尼。就時間限度來說，几乎所有这类运动都发生在九至十世紀。那些有史册可稽的十一至十二世紀少数运动，是地方性的，而又是暂时性的，而十三世紀的“牧人运动”及其相似的运动，不是叛乱，而是民众示威的骚动；他們反对他們所声称的想象的和实际的弊病，并带有宗教狂热的色彩。

十九世紀历史家，慣于把狂热情感归到这些农民运动方面，并在那里找出原始教会的結社冲动和博爱精神同早期日耳曼公社制度之結合；或是从那里看到：“〔日耳曼〕原始共产主义的記憶……那些連綿不息的中世紀时代农民反叛……一直在它們的背后潛伏着古代〔日耳曼〕自由的理想，那怕看来是空洞的”。这些理論，太浪漫主义化，是无足輕重的。它們已被事实所駁倒。总而言之，821 年法里西安人的叛乱、842—843 年薩克森·斯特林加的叛乱、997 年西部諾曼底农民的叛乱、1024 年布勒通人的叛乱；这一切都是反对庄园制度的残暴和弊病的强烈抗議。过去日耳曼自由的回忆，可能曾起着作用；也許在法里西安和斯特林加的运动里也是这样的，但其中看不出有过一种日耳曼公社主义的痕迹；至于諾曼底和布勒通的农民，他們所反对的，显然是当时的积弊。现有資料，可說明：整个北部法国有着喀罗林制度残余的存在，而这些制度是遭受着封建制度和庄园制度的发展趋势的摧残的；关于这一点，历史家福礼門未曾注意到，但他的推測还是巧妙的：他論及 997 年諾曼底农民叛乱时說：“我們几乎无可怀疑：它在地方制度中有着一項基础……所謂反叛，仅仅是保卫他們祖先的遺產”。諾曼底农民在 997 年所力求保存的，正是這項喀罗林制度的遺產。华斯在二百年后也論及这次反叛时，則反映了他自己的时代了。

在 1000 和 1200 年之間，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农民叛乱，除了

1075年薩克森的叛亂以外，如在前面一章里已經講過，那里的情況是特別的，因而使薩克森叛亂具有一種獨特的但地方性的意義。在這兩百年中，一般沒有農民騷動的原因是：這一時期確是農民日益繁榮和農奴地位改善的年代。叛亂的地域或地帶的分布，不應以南歐的農奴狀態較北歐的好一些這一事實，而應以下列事實來說明：北海和英吉利海峽整個沿海的居民，象下薩克森人和法里西安人那樣，久已受到他們所居住的沼澤地區的保护而能避免了封建制度；但當封建制度變為一個較安定的政府形式而土地變為更有價值的時候，他們舊有的自由權，由於莊園主階級向這些低濕地帶的侵入而遭到了危險；因為這批人的目的，是要把那里的自由農民壓到農奴地位。換句話說，這些農民叛亂的大部，與其說是農奴為爭取自由的反叛，倒不如說是自由人為反對農奴制威脅的反叛。最後，還應指出：在十二到十三世紀，幾乎所有這些運動（即使不包括所有其他運動），都是在教會的土地上出現的。至於其中原因，在討論教會與封建社會的一章里，已經談過。

關於中世紀時代農民悲慘的情況，作出太籠統的論斷是魯莽的。有好的領主，也有壞的領主。有很多壞男爵虐待他們農奴的事例。但另一方面，有賢明公平的領主的事例；他們對待他們的農奴是開明的，甚至寬宏大量的；在農奴患病或貧困的時候，予以救濟，並且不以過重的負擔加在他們身上。平均說來，中世紀領主在對待他的依附者方面，既不是個野蠻人，也不是個感情主義者。中世紀上層階級的一般理論是：農民是天生的勞動者。一個編年史家說：“上帝禁止：農民耽溺於懶惰並浪費時間於嘻嘻哈哈的事情，因為他的正當命運是天天做工。”

毫無疑問，中世紀農民最苦惱的事情，是飢荒。這種飢荒，如果屬於很廣泛而又是一般性的，幾乎一定是由於不利氣候條件所引起的。戰爭所引起的是無數地方性的飢荒，但很少是一般性的

饥荒。关于这方面的突出的例子是：南法在对亚尔比教派十字軍运动中所遭受的可怖蹂躪；那使几个省区整个变为荒蕪。关于許多饥荒，有着一种奇异的周期性，也常有着一种奇异的地方性。中欧洲在查理曼时代，即在790—793年之間，曾受灾深重；它又在805—809年之間，遭受了一次灾难；法国在842—843年之間也遭受了一次灾难，而这灾难对于凡尔登条約的签订确是具有一种影响的；到了十世紀，饥荒有着相对的减少。但十一世紀又是一个饥荒严重而又广泛蔓延的时期；无疑的，这引起了居民中显著的不安状态、集体迁移运动以及宗教热情；这种热情有时会达到純狂热的程度。洛林省和东法，在这一世紀曾遭受两次接連三年的灾荒：一次在1003—1006年之間，又一次在1031和1033年之間。关于后一次灾荒，一个勃艮第的僧侶拉尔夫·格拉勃保存在了一种可怖的記載，包括食人的事情。西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在亨利四世时代，曾遭受九次灾荒，其中两次都連續了三年时期（1060—1062年和1091—1094年），而北德意志在1066—1072年之間，連續遭受了四次谷物歉收。这些灾难，对德意志亨利四世时代的动乱——薩克森人和封建主的叛乱以及授职权战争的暴动——是具有一定的影响的。在南德意志，十二世紀一开始就有着三年的荒灾；到了1125年，德意志和法兰德斯遍地饥荒。在十二世紀中期（1145—1147年），饥荒蔓延全欧。对汶德族十字軍运动和第二次十字軍运动，同在1147年发生，它們一定會受到这大饥荒的某种反冲力的影响。十二世紀的結束象它的开始那样，也有着遍地灾荒（1195—1198年）。在十三世紀，1224—1226年、1269—1273年和1280—1282年，都是艰苦的年代。在十四世紀的起初二十五年中，有1310—1317年的饥荒或半饥荒的年代。这些灾难的降临，千篇一律地是和艰苦、严寒、漫长的冬季或干旱的夏季相关联着的。总括起来，第九世紀有四次大荒灾，十一世紀有二次，十二世紀有五次，

十三世紀只有一次。从研究德意志和低原国家的地方情况中可知：在九到十三世紀之間，比利时有十一次灾荒，萊茵兰有八次，西南德有十二次，巴伐利亚有十三次，薩克森有十三次，奥地利有七次，波希米亚有四次。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还没有作出充分的调查研究。总计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荒灾，在四百年中，比利时有十八次荒灾，萊茵兰有十八次，西南德有二十二次，巴伐利亚有十九次，薩克森有二十二次，奥地利有十一次，波希米亚有六次。如果作进一步的研究，无疑的，我们将会更多了解中世紀下列經濟社会情况的——农奴制的增长和与此相反的农奴逃亡，人口的移动，村庄和田地的遺弃，有时全村的逃亡，新地区的殖民与居住，农业因必須宰杀耕牛而衰敗的情况，象掠夺、游蕩和漂泊这一类的道德墮落，狼从森林里出来吃死尸的禍害。关于这些事情，編年史上富有悲剧性的和奇异的記載。弗賴微涅的休氏，論及 858 年大饥荒时写道：“許多人被迫离开他們的故乡而漂流到其他地方去”。在 1043 年饥荒时，列日的主教每隔两周在农奴中間分发便士，“害怕他們在饥荒的压力下会出售或宰杀他們的耕牛，因而他們放弃了土地不耕”。关于 1053 年巴伐利亚的荒灾，我們看到下面一段話：“所以农奴逃亡，很多村庄被遺弃”。在 1196 年的大荒灾里，“許多人被迫向外迁徙……狼群充斥路上，甚至毫无惧憚地闖入了村庄”。

的确，除了普遍性的大饥荒情况外，地方性的收成失敗可得救济，如果那里有着良好的道路的話。但由于封建主的剝削政策，情况变为严重化（查理曼有一次曾处罚一个做谷物投机的主教）；他們拒絕减低通行稅和关稅，甚至在粮荒时期还屯积了谷物，为的要等待高价出售。“屯积”和“搶购”，尽管有政府的和教会的禁令，还是中世紀的普通行为。

第二十八章 城市的兴起和 行会的形成

在前面若干章內，我們已举出各种关于新集体主义的意識即联合的推动力的事例，这种意識在十一到十二世紀已經表现出来。这些运动有很多尽管是重要的，但其中沒有一个运动再比城市的兴起具有更持久的意义。城市运动，比任何其他中世紀运动更明显地标志着中世紀时代的消逝和近代的开端。一个近代最大学者西摩勒曾說过：

这项运动是一个經濟革命；我认为它比任何后来的革命更为重要，甚至比文艺复兴运动和印刷术的发明和罗盘針的发现，或比十九世紀的革命和由此而产生的所有产业上的革命，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后来的革命，只是十二到十三世紀伟大的經濟社会轉化的从属的后果而已。^①

說得很对：在城市兴起的过程里，我們第一次在欧洲历史上写了“平民的传记”。前所未知的一个新社会集团，即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财富的方式开始流行，一种商业和工业使欧洲所能产生的财富是注定要远超过于农民組織和农业所曾能生产的财富。“新兴起的或已經兴起的城市，自然是这些市場的所在地。有的城市，因为它们已有城垣，成为貿易的中心。另一方面，相反的说法，也是正确的；設防也是为了那些已經成为貿易中心的地点之利益。商人开始在市場地点的周围，設立了貨攤。”^②

当时，城市是世界上的一种新东西，也是表达近代生活的一种

① 西摩勒：《斯特拉斯堡的繁荣与十三世紀的經濟革命》（1875年），第16頁。

② 麦特兰：《土地調查簿及其他》，第193頁。

最早的形式。城市运动不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它是出现于中欧和西欧的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之間的一种社会經濟现象，无关种族、語言或边界的。运动的性质虽然是相同的，但它在各个国家內的形态是不同的：这些差别是由历史传统、环境、物质与精神文明以及地方政治情况的分歧来规定的。然而，地理因素，对于一个中世紀城市生活的发展，是具有最大影响的。尤其重要的，地理的位置和它周圍的自然資源使城市获得了經濟特征和重要地位。

关于城市兴起的一般原因，在于象上面几章內已叙述过的經濟和社会的轉变；这些轉变是在十二世紀出現的，而它的影响延伸到十三世紀；在那个时候，城市的发展达到了圓滿的程度，这表现在：人口的增加、群众間集团意識的提高、农奴制度的衰退，商业和工业的兴起与貨幣經濟重要性的相应增长（这种經濟漸漸代替了旧的“自然經濟”）、公共秩序的加强、道路的改进和桥梁的建造等等。在这些现象中，要区别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不一定是容易的，但它們的总結果是无可爭辯的。不过为了寻找城市的起源，人們不应滿足于上述的一般解释，也不应滿足于那从所謂“联合性的原則”的空洞推动力所作的說明。如果要清楚了解这一运动，我們必須获得更加具体的历史事实。不幸，有关的文献，既散乱得很，而又是残缺不全的。我們找不到十四世紀以前关于城市历史的确实記載，而那些流传下来的少数叙述，只是遺聞軼事或非常事件，象关于 997 年喀姆布萊的和 1111—1112 年琅城的事件那样。对于十三世紀以前的城市运动，我們所可获得的大量知識，只是关于伦巴城市反对腓特烈紅鬍子（1162—1183 年）的斗争事件。如果总覽历史資料，無論关于空間或時間方面的，我們將发现我們所得的材料是残缺不全的。欧洲的广闊地面上，在长久时期內，好象曾籠罩着一块漆黑的帷幕。当这幕布揭开的时候，城市已經形成。但现在所要問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并在什么时候它們形成起来的呢？

从第七到十一世紀，几乎沒有一項有关的文献，而且这个巨大的空隙大概将永不会填补起来的。

象任何其他巨大而又复杂的现象那样，城市的根源深植于过去的历史里，而所有的城市也不是出于同一的根源的。城市运动的多种根源和它史料的歧异，是个麻煩的問題。然而，尽管有着困难，我們必須設法了解它們。过去有人主张：欧洲城市的萌芽于古代羅馬城市的残存遺迹中；撇开不談这项旧理論——今天不复有历史家相信它——我們还有着各种历史的假設，其中每一种假設是具有不同程度的真實性的。

(1) “公社”起源說。中世紀城市是从古代日耳曼自由农村公社即“馬克”发展出来的。这种說法在过去百年中曾是德意志历史家所喜欢的一种解釋；即在今天，它在德意志还受到广泛的提倡，虽然許多近代历史家认为这一理論和羅馬城市起源論已同样讲不通了。因为下列問題还是糾纏不清的：古代日耳曼农村公社原来是否自由；如果如此，除了象多山的瑞士和低湿的弗里西亚那样的偏僻地区以外，它是否能够通过封建的盛世而还保存着它的自由呢？

(2) 庄园起源說。中世紀城市，由于庄园制度改变为城市制度，是从庄园脱胎而来的；所以，城市社会是起源于奴役状态而非自由状态的。据称，依附庄园的小行政官吏(“半騎士”)和有技巧的手艺人，是后来城市社会的核心；当城市政府出现的时候，首先是从他們中間选择了市政官吏。为了支持这项理論，就賦与“métier”(“手工业”)这一名詞以重要意义，它一定是从旧庄园名詞“ministèrium”得来的。但这样起源的一个城市；怎样能够成为一个法权的单位，即有着自己法院的地区呢？麦特兰說過：

不仅仅是积累一些經濟事实就使我們能够回答那个問題的。我們正在找寻一个法律的原則……村庄常有一所庄园法院。領主可賜給一項宪章因

而減輕了領主權的壓力。這樣，村庄可長成為一個市民社會。但這項過程和這項解釋不足以說明所有的情況的……如果我們中間還有人以村庄法院作為原始資料出發點，他們的确能够不理睬很多……爭論，但我不能認為他們在其他方面也令人羨慕。^①

(3) “市場法”起源說。依這理論，那支配市場的“和平”創造了一個脫離當地封建法院管轄的被保護地區，從而產生了一個被保護的集團，主要是手工藝人和商人集團。僧侶所控制的市場上的十字架和在世俗管轄下市場上的查理曼的著名勇士“羅蘭”的雕像，都是這項權力的象徵。所以，未來城市集團的核心，是這些早期商人和手工藝人，城市的行政制是從市場行政制度里成長起來的。這項理論在德意志很流行，在那里很多的所謂“鄂圖特權”被引為証據。但關於這項說明，連在德意志，也有人懷疑，而在別處它被認為是“一種美麗的教條”。市場不是城市社會的起源，市場法也不是城市法律的來源。我們試回想一下：在第九和十世紀，這些中世紀早期的市場，是一年一次的或一季一次的事情，因而按事理，市場不能導致當地人口的任何經常的增加；於是我們對於“鄂圖特權”的重要性和“市場法”的理論，就打个折扣了。而且，很多這類市場是屬於大禮拜堂市鎮的僧侶，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市政機構；而它們的建立和組織是在城市興起之前。城市產生於市場這項理論，是站不住腳的。主教或教會的僧侶占有這些市場，而從它們獲得了大量利益；由於這個緣故，它們是規定在著名的聖徒節日舉行，就是，在可期待很多香客與參觀者來臨的時候。在十二世紀，由於人口的大量增加，很多這些年市場，改為月市場或雙周市場；但這也無助於城市起源於市場這一項理論。因為市場的法律性質，不能僅僅以它舉行的次數而有所改變的。無可否認，在初出

① 《英國歷史評論》第1卷，第14頁。

現的“城市”和在那里所流行的特殊和平之間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但什么是其間的紐帶，是不易确定的。这特殊和平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原来暂时性的和平怎样变为持久而有繼續性的和平呢？我們很难追隨那些主張市場法是市民法的原始来源的人們，因为他們这样的論点似乎是倒果为因的。

(4) 免除权起源說。这项理論特别是关于主教城市的起源是有人拥护的；它也是一項德意志的理論，因为正是在中世紀德意志，主教們享有最大程度的免除权；就是，除了国王的管轄权之外，他們是不受所有其他管轄权的支配的。据称，这项免除权不仅适用于主教城市的城垣以內的居民集团而且适用于附近的村庄；因此，就組成了一个市邑；后来这些居民摆脱主教的权力而建立了自治政府。自然，这样的一个地点，即使它的居民还是在农奴地位，也能吸引着商人和手工业者来到那里；他們后来和原住人口混合在一起。但这項說法，象市場法起源說那样，也是一个薄弱的理論。“免除权”区的面积远大于一个真正市場的圈子，而“免除权”的特权也是截然不同于市場特权的。在一个免除权的范围內，是不需要特种“市場法”的，因它已包含在免除权的特許狀里。另一方面，免除权不是包含于一种市場特权內的。“免除权”和“市場法”这两种說法，是不能彼此協調的，其中任何一种听起来是太武断而不符合于历史事实的。免除权起源說，是說得过火了。因为这样的一个地点，不一定是經濟生产的中心。“它的居民是依靠它周围庄园上的农民劳动而生活的；它的法院、它的造币厂、它的市場都是由外面的人来維持着的。”^①

(5) 卫戍起源說。这在德意志并部分在英国，是一项受人欢迎的論点。这一理論所引述的根据是：在德意志境內，那些由亨利

① 斯蒂芬孙：《美国历史評論》，第32卷，第11頁。

捕鳥者(919—936年)为了抵抗匈牙利人的侵掠而在条麟吉亚和薩克森建造的无数堡垒^①即設防的和卫戍的地点;在英国,那些由老爱德华为了保卫中英格蘭防止丹麦人的掠夺而建造的五座堡垒(勒斯特、林肯、諾定罕、斯坦福和德比)。在法国,最近似这类建設的,是那由秃头查理为了保卫塞納河盆地以防“北欧人”而建造的“堡垒”(castella),在那里,建立了“昼夜守望”制度;这一习惯在864年的一项詔令里已指称为“古风俗”。据称,这卫戍队的成員,在堡的周围是有着土地的;堡民流入这些被保护的地点上,带来了商业和工业,因而一个未来城市的核心就在那里形成起来;这些地点,从历史上看,在几百年的时期中曾摆脱了封建主的权力的管轄。这项假設的弱点是:它是太属于地方性的并太属于軍事性的。至多,它只可說明少数城市而已。

(6) 喀罗林朝地方制度起源說。依这理論,喀罗林朝的地方市政制度,在一种残缺而模糊的形式下存留下来;后来当城市終于出現的时候,城市的市长是从旧时“执行吏”即法兰克“百戶”或“邑”的官員演化而来的。这项理論在巴黎之东的訥永地方上,获得了显著的証明;这一块地方在它的主教管理之下,在整个封建时代,似乎是享有一种差不多是隱居生活的和平,在那里,迟至1237年时,选举規程还保存了喀罗林朝詔令里所規定的相同办法。但这一情况,似乎差不多是一个独特的残余,虽然在东北法和比利时,迟至十二世紀,还可看到“执行吏”在地方上存在的痕迹。

① 古德文“Burg”(堡)本来仅仅指一座炮台,不一定包括一个聚居的人口或甚至任何非武装居民在內。很奇怪的,“堡”虽无可爭辯地是德文,但这一个名詞的最先例子,出現于北法(在安茹),从那里它传布到法兰德斯并通过洛林傳入了德意志。但在法国,“堡”从来没有意味着一座炮台,象在德意志那样,但仅仅指示由木柵保护的一个居民集团。这些堡是有城垣的社会。于是,城垣成为每个城市的一个普遍特征,并使城市集团与乡村群众有所区别。所以,“市民”(burgenses)这整个階級的名詞是从那个住在一个設防的圈圈內的阶层得来的。

(7) 德意志行会起源說。另一派历史家力求在旧时德意志行会或团体和飲酒会里找出城市的根源——因为不复有人再以为：古代羅馬“行会”曾留存下来。但关于这些粗陋的团体和后来工业与商业行会之間所存在着的联系，从来沒有人能够予以令人滿意的說明。在查理曼的立法里，我們看到关于这些行会(*geldioniae*)的資料(注意：“*gild*”(行会)这一名詞是属于日耳曼起源的)。当时，政府与教会都曾企图取締它們；因为它們太富有异教色彩并太囂张，以致不堪容忍。但在第九世紀以后，它們就不复被人提及了。中世紀行会，是在城市公社后而非在城市公社前出現的。在英国的最重要城市里，象在伦敦、布里斯多、約克、厄克塞特、雅穆斯各城里，行会商人不是从来未曾存在过，便是迅即消逝了。同样，在最重要的佛来銘城市里，象在布魯日、根特、伊泊尔各城里，也未曾有过公社的行会形式的存在。

甚至在最大寺院的庄园上，在那里无疑是有着手工业者的巨大集团的，我們还是可怀疑：那里是否可以找出什么行会型的組織。的确，在許多行业里，必須有帮工；这些帮工对行业匠师可能是处在一个从属的地位的；因为許多行业不可能沒有助手而单干的；但“行业匠师”(*magistri artium*)的存在，不等于說同一行业匠师的組織的存在，正象有了一个厨司，不可以就說有了一个厨司的行会那样……人們认为，在家庭的需要得到完全滿足以后，不自由的手工业者就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制造手工制品；于是，他們的自由劳动，使他們能获得独立經營的地位；在这以后，他們通过他們的自治組織，得有效地利用他們在受奴役时即已領会的团結的力量。刻特根曾逐条援引所有可以举出作为証明早期寺院或农村庄园上行会型的組織的文件；并指出了这样的解释是毫无根据的。^①

如果行会起源說是正确的話，那么，我們應該在寺院的周围找到很多兴起了的城市。因为大寺院由于它們的經濟重要性，由于

① 《英国历史評論》，第19卷，第762頁。

它們所經營的工業和商業活動，由於它們有名的聖迹吸引來大批群眾聚集在它周圍，應該已成長為卓越的城市中心。但事實上，很多大寺院，由於居民流入城市喪失了人口，因而陷入貧困和毀滅的狀態，雖然有少數寺院在它周圍的不自由社會反叛以後，發展為城市，象在阿拉斯的聖瓦斯特寺院和在瑞士的聖加爾寺院那樣。克倫尼、克雷爾服、費岡、科比、赫斯斐爾德各大寺院都沒有成長為城市，相反的，它們蛻化為荒涼的鄉村社會。

至於十九世紀早期浪漫主義派的理論，我們在這裡無需再費筆墨來反駁它了；該派認為：中世紀城市的起源，來自如“人類聯合的原則”或“自由聯合的原則”或單純革命這類空洞的觀念。在959和962年之間，喀姆布萊“市民”的反叛主教不是一次城市公社的起事，而只是一次居民對不孚眾望的主教領主的反叛。約在同一時期，在列日，我們看到另一次相類的起事。在十世紀，歐洲人在政治上尚未有足夠的自覺性來想到組織一個獨立的城市政府。“市民”(oives)這個名詞那時只是意指一般的老百姓，不是專指市民的。

我們能夠看出關於城市起源中的主要因素，但不能決定其中每個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甚至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但毫無疑問，為了說明一般情況，單一的發端和單一的解釋，是不夠的。過去很多歷史研究工作上的缺點是：各個作家太偏執地強調自己的理論，而有時還把民族偏見交織於他的判斷中間。按照這些新制度的形成方式，已經提出了各種學說；每個作家把它們聯系到一個先前的不同的制度；但所有的理論，都是根據某種情況的一般化論斷所作出的推測。對於德意志是正確的理論，不一定可同樣地適用於法蘭德斯、法國和意大利的。地方情況，無論地理的或歷史的，必須給予相當的重視。歐洲城市生活的要素，無論在程度上或類別上，是大不相同的。刻特根教授說得很對：“在歸納關於一個國家

制度起源的这些理论之前，应先研究类似国家历史上的相应部分的事实。”^①在这样多的分歧理论的前面，看来这种意见上的广大分歧，正是代表着不同城市历史上的真正分歧所在。要从罗马法或日耳曼法的这项或那项原则里找出城市的起源，是徒劳无功的。中世纪城市，是经济社会力量的产物。

早期城市的居民，是中世纪时代的商人；他们或者出售别人的产品——象葡萄酒、谷物、其他国家的商品——或者因为自己是手艺人，出售他们自制的手工制品。那些出售东西的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在新中心营业的外来人呢，还是封建领主“家庭”以前的工人呢？关于这个问题已讨论得很多。在法国，用以称呼手艺人的是一个指封建主的旧农奴的一个名词；他们的活动叫做“*ministerium*”（役务）；那是法文“*métier*”（手工业）这个词的由来。然而，无论如何，他们已不复替封建主做工作；他们首先是售货者。在北欧国家里，“商人”（*mercatores*）是“市民”（*burgenses*）的同义词，包括手艺人 and 商人在内。他们或者在自己住所的窗槛上，或者在市场上出售东西。

的确，在城市运动的开始时期，大批手艺人亲自携带了自己所制造的东西到市场上去出售；在生产者与商人之间，尚未有区别。这一事实使我们得到城市起源说中最令人满意而又最先进的解释，就是，“商人”起源说。关于中世纪城市起源的真正线索，似乎是在于“商人”、“堡”和“市民”这些名词方面。

但这中世纪城市所从由来的“堡”不是老的卫戍堡，象亨利一世在条麟吉亚所建造的那样。它是一个新的堡。一个有木栅的或有城垣的圈围地，形成于封建城堡之外，或者在有古罗马城市的情况下，形成于旧“城堡”（*castrum*）之外；实际上，它是一个近郊。

^① 《英国历史评论》，第8卷，第120页。

它既不是从一个老的自由公社逐渐变成一个城市集团的,也不是由一个不自由或半奴役的集团逐渐争得自由和市民生活的;但它是一个新社会,从开始它已是一个“商人”的社会,并从开始它已享有一种乡村里所未曾有过的土地保有制……“商人”在某个城堡或寺院城垣的旁边建立了他們的营业所,这样,在靠近他們所占的地带上,将有伯爵或住持的賤农和农奴的住所和茅舍出现;后者在“庄园权利”下居住下来。后来,如果这个新的“商人”社会是成功的,它将扩大它的地盘并将并吞了“老堡”。①

布魯日是一个特出的例子,在那里,于 962 年后,伯爵鮑尔文铁臂曾在一条利斯小河的轉弯处,建造了一所城堡,在它的外面不久兴起了一个新“堡”或“郊区”,由小販、手工艺人和酒肆店員居住着。記載上說:

在这城堡建造以后,若干做买卖的人开始聚集在城堡桥〔就是橫跨河上的桥〕的大門前面的地方上;他們是:商人、酒肆店員,还有其他的“外来人”,他們是为了供应那些同伯爵办理交涉的人們的膳宿而流入的;而后者是时常来到那里的。为了招待他們,建造了宿舍和旅館,因为在城堡之內沒有空屋来安置他們。这些住所很快地增加起来,不久出现了一个大城市;居民即称之为“布魯日”(Brudge),意即“桥”(Bridge)。

为了建造这所城堡,石头曾必須从数哩以外的一个古羅馬城市的废墟上运来,因为在布魯日周围是不能获得建筑石的。这新“堡”即“郊区”,在十二世紀的中期以前曾用木柵来圈围着。

在諾曼底和法兰德斯交界处,近英吉利海峡的厄城的旧城堡之周围还有一个“堡”兴起;在 1195 年以前,它还未被圈围起来。这旧城市的一个大門,迄今还屹立着,被称为“帝国門”(Porte d'Empire),这是一个最稀奇的名稱上的訛誤;因为它原来的名稱為“市場門”(Porta Emporii)。②

布魯日出現的情況,可作为全欧洲在第九世紀所發生的情況

① 麦特兰:《中世紀城市里的土地占有制》,见《英国历史評論》,1890 年 4 月号。

② 斯退普尔吞:《諾曼底的轉變》,第 1 卷,《導論》,第 83 頁。

的典型。在欧洲的极南部分，即在继续遭受穆罕默德教盗船威胁的南法和意大利，我们看到那些建造在旧罗马城市的城堡外的“堡”，即中世纪的城堡。

在欧洲大陆城市的兴起是在并只是在那些有利于贸易条件的地方上。许多罗马城市又变为富庶，因为商业再次沿着它的老路进行着，但除了它们之外，还有一大批由新商路所发展起来的新的分配中心。这样的—个城市的核心，常常是那环绕一个王公堡垒而形成的商人殖民地。这个新“堡”很快成了典型的堡，到了十一世纪末期，“堡民”(burgenses)不复意味着一个城堡的兵士或仆从，而意味着市民了。可是往往还有一些未曾接触过新的经济潮流的城市，象往往还有这样一些城堡那样：它们在十三世纪的情况和在十世纪的情况差不多。固然有一个寺院成为一个城市的胚胎，但同时，有一打的寺院并不是这样的；也不是每个村庄市场会产生一个都市的。^①

从上面看来，城市的起源，来自一个由商人和手艺人居住着的“新”堡内，而不来自“城堡”内。后者是由伯爵或主教占据，他住在那里，还有卫士、骑士、“半骑士”和租地农奴在他的周围。在十一世纪，当商业开始兴起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关于行商和外地人定居在一个郊区的事例，这郊区后来用墙垣围绕起来。所以真正的城市，是“新”堡；它不是在十一世纪前诞生的，它也不是“老”堡或城堡。

这种郊区，在无数的场合，不是和商人集团同时出现的。这些例子在第九和十世纪甚至在第八世纪也可以看到。在已获证实的法国二十三个城市的郊区中间，所引文献中之一种，属于十一世纪，四种属于十世纪，其余的都属于第九和八世纪。显然，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件古代的事情。事实上，郊区可追溯到罗马帝国的后期，具体说，可追溯到第三世纪的侵犯和劫掠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罗马军事与警察权力的崩溃和人口的减少，一个城市已不复能

^① 斯蒂芬孙：见《美国历史评论》，第32卷，第15页。

充分地保卫周围城垣的一条漫长的防綫，所以，起而代之的，是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用拆毀的老城垣与塔楼的材料，建造了一个卫城或城堡。这个城堡即“老”堡，是某个当地官員的駐所，同时在外面的外面，平民人口也形成了一个“新”堡或“郊区”，也以被放弃的古老城市建筑物的残余，造成了围墙。在喀罗林朝恢复秩序以后，这些地区变为不必需的了，当地居民更广大地散开居住着。但在第九世紀的侵犯与混乱时期，古代的慣例又复兴起来，而老“堡”和“郊区”获得了新的用場。这样，在許多地方，有两个不同的集团同时并存，虽然有时它們分隔得很远，象在奥騰那样；在那里我們看到旧羅馬的城堡即“老”堡而在某些距离之外，还有城垣圍繞的郊区（即 *forum*、*emporium*、*portus*，因为所有这些名称都在使用）^①，这两类建筑物，都是用残破的羅馬城的石头来建造的，而在这些瓦礫廢墟中間还有一排破旧的房屋疏疏落落地散在两地之間并接連了它們。这样看来，古代羅馬“郊区”有时是后来中世紀“郊区”的原始萌芽，但后者有着商业的重要地位，而前者沒有。

① “*forum*”（市場）这个詞，是拉丁文，通用于羅馬語系的 国家里。然而，“*portus*”（市場）这个詞通用于北欧，特别是在低原国家里，在那里稠密人口和历史地理都有助于商业的大发展。过去曾一度认为：这个詞是从“*porta*”一詞（意即城堡或卫城的大門）得来的，在这大門之前，是最初商人的殖民地。但这一解释对語言学和对历史說来，都是不正确的。中世紀拉丁文把“*portus*”一詞从（古文）第 4 类变格移到第二类变格，通用于方位格的意义，即“在大門口”（比較上面所引的布魯日的例子）。这项用法給这个詞的意义提供了历史綫索。因为領主必須在城門口即市場上征收通行稅，所以这地点自然地成为最初商人的集合地。但“*portus*”一詞的征稅性质，在它更重要的商业意义里消逝了。后来，在法兰德斯和尼德兰，“*portus*”这个詞也用作指城市本身：它的市民，即有市民权利的人們，称为“*poorters*”（市民）。有人已明白地指出說，“这些事实越加有了重要意义，因为在佛来銘城市中我們原来看不到‘*mercatus*’（商場）的痕迹，在那里所設立的市場是属于比較近期，在市政制度成立之后”——比伦納：《城市、市場和商人》，[法国]历史評論，第 57 卷，第 68 頁。“中世紀城市，是从某个城堡前面或附近的‘堡’（或 *forum* 或 *emporium* 或 *portus*，因为所有这些名称，都可碰到）的一个地方化的商人集团兴起来的。我們必須区别两个中心：一个老的和軍事的——城堡，另一个新的經濟社會——‘堡’。最后，后者并吞了前者，因而两者合成为一个社会了”——《英国历史評論》，第 16 卷，第 555 頁。

这项富有繁殖力的社会过程的开端，可回溯到第十世纪，“北欧人”的入侵和混乱时期。我们愈深入研究这两百年的历史细节，我们愈多发现：这个时代有很多社会制度的起源、富于适应新环境的办法、和新制度的演进的。在十一世纪，一个从事商业的新居民和老的庄园上不自由的居民并居杂处，后来，商业的“郊区”吸收了老集团，并带给联合的居民以新的土地权形式和新的风俗。所以城市的胚胎，在于商人的聚居；他们在城堡或寺院的庇护下定居；后来他们对当地的依附人口的保护逐渐推广并终于把后者提升到自己的同样水平。

显然，威斯特发里亚的城市、多瑙河与莱茵河地区的城市（就是说，大部位于两条主要商业动脉上的德意志老城市）、法兰德斯和东北法的城市以及伦巴第与多斯加纳的大批城市，是起源于商人集团的；这些集团在城堡或城市墙垣脚下，开店营业。城市生活最初是在古代城堡墙垣外、在“郊区”或“新”堡内发展起来的；在那里，早在十世纪，我们已发现有移民或“外来人”，他们寻求城堡的庇护，他们不是依靠农业，而是依靠出售进口货或当地制造的产品为生的。

当然，过分强调这项城市商业起源说，是有危险的，但几乎无可置疑，中世纪城市基本上是一个经济社会现象；那是由于从事商业者需要保护而产生出来的，尽管有些例子，可表明有些城市社会显然在当地商人集团出现之前，已经存在。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行会规程，从来未曾是城市宪章的起源，而那些颁给商人集团的特许状，则常常是这种起源。

可是，这一理论虽比任何其他理论更符合于已知的事实，而且确实说，它是这样地有历史根据，不复是一项假设，我们也不该使它成为太概括，太公式化；我们至少应该让其他要素也占有一定地位。事实上，我们没有资料，可证明城市在城市公社出现之前是在

什么状态。但有一个事实还是不可动摇的：就是，中世紀城市的兴起，是平民的事业。无疑的，那些使城市产生的基本动力，是属于經濟性质的。虽然細節上有很多的不同，但應該指出：城市的“家族”是可以区别的；这些类似点或相同点，是与民族和語言的界綫无关的，也不是由民族的或政治的条件来规定的；由此可见，城市的真正起源，在于經濟和社会条件。例如，科伦、馬因斯和窩姆斯，很近似理姆斯、喀姆布萊、訥永和琅城；属于羅馬語系的里尔和阿拉斯同說佛來銘語(德語)的根特与布魯日，是有联系的。要企图为城市的民族分类，从历史上看，是錯誤的。十二世紀的城市复兴运动，不是民族性的。城市运动曾分別出現于欧洲的两端，就是，在意大利的沿海共和国和波罗的海与北海的沿海共和国。

在北意大利伦巴平原上，商业发展比在威尼斯、比薩和热那亚的沿海城市里，要慢得多。撇开不談細節的分歧，伦巴城市兴起的歷史，是属于整个欧洲在十、十一和十二世紀城市生活发展的一般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个时代，欧洲城市生活的兴起表现出若干相似点；不論它們位在北意大利或北法，位在法兰德斯或德意志，这种生活兴起和城市的經濟生活发展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中世紀城市生活的三項要素：貿易、市民和市政府，不論在南欧或北欧方面，是很相同的。資產階級由于逐步爭得当地公共权力的权利，到处剝夺了老的封建主管轄权。伦巴城市执政官的职权和北欧城市行政官的职权，没有什么不同之点。到处有三种接連的組織形式发展起来——市民社会、專門性和暫時性行政委员会和一个常設的机关(collogium)，这最后一項一向是政治性的，也是代表性的和行政性的机关：执政官或參議會。“好人”(boni homines)^①的法律职能，一向是他們属性的出发点，也是未来城市独立地位的法律基

① 指城市中占有政治地位的富商巨賈。——譯者

础：因为城市社会到处不是由全体人自行管理，而是受到管理的；并且它与农村社会不同，不是由一个单一的行政官而是由一个集团来管理的，而这一集团在日益显得是独占的和寡头政治的方式下要使自己永久存在。

就城市的发展来说，基本的共同原则是：这些城市中心起源于同一个有原动力的和积极的因素，就是贸易。在意大利城市方面，它们和拜占庭与利凡得的海上关系所起的作用，完全象羊毛贸易在低原国家城市如根特方面，莱茵商业与汉撒贸易在布鲁日、科伦和律伯克方面所起的作用那样。“好人”在各处城市的经济利益里所起的初步作用，使我们有理由把南欧的城市社会和法兰德斯与德意志的城市社会相比较，在后者中间很多也获得了对环城的大量土地、即公有地、森林和牧场的控制权。这“好人”集团掌握着城市政府的政权；资产阶级和城市成为等同的名词。这资产阶级的起源是相同的。无论在南欧的沿海城市，或在北欧的工业社会里，它是一个商人的集团或过去商人而现在为土地所有者集团。在城市不复有不自由的租地，每个所有者是自由人。财富决定了市民阶级并给予了地位。城市的诞生如此，城市的发展也是如此：城市自治社会的建立、资产阶级权力的扩大、城市法律的制定，这一切都是跟着城市社会的财富增长而来的。

所以，可以说，中世纪城市大多是从当地商人殖民地获得了它们城市地位的起源；这一项理论比任何其他理论更多符合于已知的事实，虽然还有它的反对者竭力否认在十二世纪末期之前有一个专靠商业谋生者的阶层的存在。

〔一个批判这项商人起源说者写道：〕即使这种移入商人的起源说法，能够证明是适用于这个城市那个城市及其他的城市，难道就可把它作为典型吗？……虽不否认在商队旅行的无家可归的商人之存在，但我们还可大大怀疑：这类商人，就人数与财富说，是否有足够力量，来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

从主教与伯爵获得土地并建立一个新型的和一个非常自由的安定的地方社会……这项理论尚是一项有趣的理论。^①

“mercator”和“negotiator”[商人]这两个词，在这些批判家的目光中，并不是指单一个商人阶级，而仅指那些贩卖他所拥有的任何种类的商品的人们。但这种解释，太窄狭了。无疑的，有很多人只是偶然出售东西的人们，这样他们可称为“mercatores”和“negotiatores”，如在象法兰克福这一类的比较落后和不发达的城市里，它们还保存了一种半农业的生活。但重要城市的情况则不然；我们有着充分而确凿的资料可资证明。在伦巴城市、在喀姆布莱、第南特、科伦及其他城市，在十字军运动前好多年，我们已可看到纯粹的、真正的商人，其中有的人甚至名列史册。更有意思的是：在第南特城的一项特许状里（1096年），曾特别标出商人的职业（“他依靠自己的商品而生活，不论怎样服务”^②）。一个十一世纪的作家阿尔柏特把商人“和社会的其他人们”区别开来。

“堡的治安”法(Burgfriede)，非“市场治安”法(Marktfriede)曾是最早的城市法。几乎从第一次提及“堡”的时候起，它们是“治安的所在”，但那里所施行的治安法，很不同于文献所显示的，当城市终于出现后的那种治安。因为市场治安法是由某一上级公共权力赐给的特许状所认可的；对违犯者处以重大罚款，而违犯“堡的治安”法者将遭受体罚。后一项治安法不能从前一项治安法发展而来并具有这个性质。可是如果说“城市治安”(Stadtfriede)法等同于“堡的治安”法，又如果说从刑法观点来看郊区的居民等同于“堡”的居民，那么我们应该在早期中世纪时代已看到“堡民”这个名词，但这个名词正是我们所找不到的。文献中叫他们“市民”(cives)、“城堡民”(castrenses)、“城民”(civitatenses)、“堡垒民”

① 鲍威克，见《历史学》杂志，1923年1月（评比伦訥的《比利时民主政治》一文）。

② “qui de mercimoniis suis vivunt cuuscumque officii”。

(castellani)，但直到后来才称他们为“堡民”(burgenses)；在这以后“堡民”和“商人”才作为互相通用的名称而出现了。在1127年的圣奥麦城特许状里，“堡民”清楚地和“军事的城堡居民”区别开来。1127年时，在圣奥麦城，商业利益和势力已占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所给予的特权，几乎完全是属于商业性质的。在这情况下，商人和手艺人的行会——因为他们还未分开——似乎已经完全和城市公社合而为一。这团体称做“基尔特”(gilda 意即行会)；它有着行会大厅，而行会的职员似乎也是城市的执行吏。但应该注意：行会大厅是属于法兰德斯伯爵的，伯爵的法院也是在行会大厅里开庭的。1127年所发生的事情的性质似乎是，一个事实上的统治制度得到合法的地位，并转化为圣奥麦城的市政府；然而伯爵对城市公社的行动还保持了一项保留的权力。

如果分析这些早期城市内财产占有权的类型，还可获得进一步的阐明。在城市诞生的时期我们可看到城市中不动产的混合所有权制。“领主税”(cens seigneurial)是在城市范围内领主的农奴所负担的一种奴役性的土地税；他们依然是他的农奴，甚至这旧领地上的人口有些或大部已变为自由民而获得了市民身份之后；他们是城市所从产生的那种旧庄园上的残余。另一方面，“土地税”(cens foncier)是对那没有附着租赁条件的土地的一种直接税。后一种，是商人所有的土地形式。它们是从属伯爵的政治权的，但不是从属他的庄园管辖权的。在十一世纪，在一个意大利城市里，以领有土地，作为元老等级的资格；只有领有土地的人，才有权参加城市政府。在上述的土地占有制中，我们看到城市不动产(城市地产)和庄园租地之间区别的起源。

后来，到了十二世纪，在欧洲，商人几乎到处已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多少属于地方性的商人组成，他们是坐商；另一类包括那些来自威尼斯、热那亚、塞亚那和米

兰的大市場的意大利商人；他們是“候鳥”；他們在春夏兩季，帶着東方奢侈品而來；到了秋季再回到老家去。

但城市的人口，並不是單由商人和手藝人組成的，還有從事農業者；他們耕種城市周圍的田地；這種情況，連在意大利也是普遍的。甚至在大城市內，也有牧場、谷倉、管理養豬的章程等等。在商人和自由的莊稼漢中間，沒有什麼矛盾，但在“市民”和“賤農”之間倒是有着矛盾的。這矛盾不是由於職業的不同，而是由身分上的差別而引起的。

在城市之內是否有一個地主階級存在呢？在十三世紀，確有一些人是屬於這一階級的。他們是經商發財的商人的兒子呢，還是那些出租土地給人耕種的很富的舊地主呢？關於北歐國家，未可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在意大利和南歐國家里，確有若干騎士地主。所以，城市的社會組成方面非常複雜。

因為雖然城市主要是由商人和手藝人組成，但它也自然地吸入了若干騎士和若干地主。這些出身不同的人們，在生活方式方面，是不一樣的，但獲得同樣的法律地位（市民權）。這樣，這個社會是由各種非分立的但集合在一起的自由人組成；它帶有一些近代社會的性質。這些階級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但在一種社會意義上不一定是完全平等的。他們除了在法律前以外，是不平等的。從開始那一天起，在城市里，就有一些地位優越的個人。在十三世紀的意大利城市中，有一種財富貴族，包括有那些站在手藝人之上的巨商和業主。這一階層是一種新貴族、一種市民貴族，它逐漸抓取了城市的權力。

城市的興起，論過程，是演進的；但論結果，是革命的。長期的聚居、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經驗終於在居民中間養成了一種強烈的共同意識；那反映在以和平方式要求領主，不論是男爵、主教或住持，承認城市為一個自治社會；如果這項要求被拒絕，就以暴力

方式来反抗封建权力并要求宪章的自由。因为毕竟

公社只是一种組織形式，也許作为一种安全保障来反对势力太强的領主，是必要的；但对于处境較好的城市，它是无需的。的确，可以說，所有那些达到最大和最持久独立地位的中世紀城市已看出：城市独立性愈多，它的成长愈少受到限制。这些限制起初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它可获得那些原来反对者之合作；但一旦建立后，限制就不容易放松了。^①

新形成的資產階級要求承认城市的权利与特权；这项要求从政治上来說是：那在封建世界几百年来有效的契約原則应扩充到非封建世界。平民也要求“权利”与“自由”来执行自己的司法、征稅、鑄币、市場管理等等，象封建王公在他們領土上所做的那样；而且在这些有关切身利益的地方事务方面，他們不再願意服从封建主的权力。他們要求在封建統治內的而非在封建制度下的一个地位。他們并不完全排斥領主的权力，而願意繼續負担服役和繳納賦稅，但这些捐稅的性质和程度应有严格的限制和确定性。由城市而非由領主，来課征賦稅。城市应有它的行政官，它的团体印章，它的市政厅，它的钟塔。这一切都是它独立的象征。所以

城市宪法有着双重来源：即公共的和公社的来源。公共的来源，包括那些由国家政府为在它管轄下的城市所制定的法令。公社来源包括城市社会的习惯法以及由它的机关所通过的地方法。

历史指出：市民为了爭取他們所要求的“权利”会不择手段来进行暴动；其中最激烈的要求，是取消庄园地租。他們的口号是：“如屬可能的話以和平手段爭取，必要的話就使用暴力爭取”。在有些地方，反叛的群众組成了誓盟；他們宣誓要團結在一起以求获得条件的改变。这样一类事例，虽然很少，但还通过記載流传下来；例如琅城、喀姆布萊，后一时期的未茲雷以及萊茵区主教城的事件。

① 刻特根，前引书，第124頁。

琅城事件是众所周知的。情况是：

民众經常准备斗争；主教一向是一方面在侵犯王室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在侵犯公社的自由；琅城的編年史曾簡略地記載：有过一次巨大的血腥叛乱，又有过一次对貴族更血腥的报复行动；有过一次大火；又有过一次大屠杀。琅城主教高德利，是一系列坏主教的一个坏继承人；他曾宣誓要遵守那由他以高价售給市民的宪章，但他一有机会就千方百計地违反了这宪章；他終被杀死，自食后果。

当城市宪章終于获得之后，它就是一件重要的文件。它被保存于市政厅內的有三把鎖和三把钥匙的档案柜內。有时，甚至把宪章鐫刻在市政厅的墙壁上或在一所教堂的墙壁上。1111年亨利五世所賜給的“斯拜耳特权”宪章，曾以金字写在大礼拜堂大門上面。1135年大主教阿达尔伯特所賜給的馬因斯宪章，也是这样处理的。在蒙德里馬，1198年的宪章也鐫刻在市政厅墙壁上。这样一来，城市居民就成为自由市民了，“市民权”这个名詞是由此得来的。到了十三世紀，实际上每个市民是一个自由人。当时流行着一句話說：“城市空气使人自由。”

城市的迅速发展曾引到农民状况的改善。城市非常需要劳动力，所以如果一个农奴遭受虐待的話，对他有着各种逃亡的引誘力。一旦逃入城市后，只要滿一年的停留，他就可获得自由。在意大利，卫尔夫派城市提倡释放农奴，在若干場合，甚至还供給农民金錢来贖买他們的自由；对于这项行动，基柏林派城市未能加以阻止。新城市的法律，总是不承认那老朽而又可憎的旧封建的法律程序，有时在法律的序言里，斥之为“可恶的”、“不足道的”、“恶劣的习惯法”。居民的反封建斗争的态度还常常表现在那些禁止他們打自家人的立法上。可是，与此同时，也表现出几乎火热般的对太平的願望。在梭崙西恩宪章的序言里，有一首頌揚太平的真正贊美歌。

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中世紀欧洲的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而在早期封建时代未曾有过这样的先例。可是，城市运动尽管是重要的，但令人惊异地看到，封建时代早期观察家对它的了解多么不够；他們都属于特权阶级的，自然是要譴責它的。《喀姆布萊主教史》的作者，在十一世紀写作时，使用了《旧約全书》、希腊人和羅馬人传下来的陈詞濫調来攻击它。然而，到了十二世紀，在布里西亚的亚諾尔的学說方面，我們看到一种新的积极的市民政治哲学，这一种哲学宣传之热烈，就象十八世紀宣传“人权”理論或象今天宣传社会民主主义那样。那个世紀最深湛的历史思想家，弗賴辛的鄂图，虽然反对城市运动，但能以公平的眼光来观察它。一个近代作家要比他描写伦巴城市的兴起描写得更好是很費力的。法国的一个伟大布道家，扎克·得·維特里，約在1200年时曾大力称道那流行于意大利城市的市民精神。他說道：“市民能深思熟虑，对公共事务勤劳而又热心；他們拒絕屈从別人，并防止任何人侵犯他們的自由。他們制定自己的法律并服从这些法律”。有时，一个城市常派遣一个使团到其他城市研究它們的政治制度。1187年，两个城市曾各派一个使团到斯瓦松。都尔內城曾研究六个不同城市的宪章与地方行政工作。奥格斯堡在1386年，科伦在1396年先后曾派遣一个使团参观巴塞尔、君士坦司、馬因斯、窩姆斯、斯拜耳、烏尔穆和斯特拉斯堡。根特著名的“三十九人”委員曾到过汉堡、布勒門、馬德堡、斯拜耳和律伯克。正是这种行动，可部分地說明市政制度的相似点或相同点。

跟着時間的进展，封建主对城市运动，不仅变为容忍，甚至变为促进它的发展；那不是从他們对民主或无产者的同情而是从他們的利益出发的。在商业和貿易增长的时候，貴族們发现在他們的領土內有一个商业中心，是对己有利的；建立城市是防止他們的农奴逃亡到別处去的一种方法，因为旧农奴在城市能够不种田而

做手工业者或小販，以求糊口。在新的貨幣經濟正在代替老的自然經濟的情況下，封建主征集現款租稅比征集實物租稅要容易得多，而且使城市收集這些稅款比自己收集，要較少麻煩。於是，整批解放農奴社會，也變為有利的事。因此，領主在他們的領地上，建立了新城市——有時，叫做“矮屋城”(bastides)——並提出了富有引誘力的條件：例如，輕的規定的課稅、寬大的司法、象道路橋梁等等的地方建設、茅舍地基、園地和市場貨攤。有些這類的慷慨的特許狀獲得了很大歡迎，因而其他城市紛紛仿效。波蒙的法律和布勒特厄的習慣法，是這樣地出名，以致可以找出各有三百多個模仿的例子。香賓的威廉，是理姆斯的大主教，也是腓力·奧古斯都的伯父；他在1182年曾賜給波蒙居民一項著名的憲章；曾有很多地方加以模仿。在北法，農奴階級獲得解放，大部分應歸功於這著名的法律。這項法律，不是通過武力，而是通過和平的協議，傳布開來，因而刺激了農業、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新城市”的建立，以下列兩種方式之一以示其永久存在——用成文的組織法或用樹立一個象徵性的十字架於該地。在北法，後一項方式是普通的，在那裡“自由十字架”常常在小市鎮里可以看到。在洛林、盧森堡，甚至亞爾薩斯，它也是可看到的。

這些新城市所呈現的外貌迥然不同於舊城市的外貌的；後者由於居民集聚混雜而發展起來：街巷彎曲、窄狹、房屋往往簡陋不堪，甚至起碼的衛生條件也沒有。新城市則不然：它是按幾何形來設計的，有四方形、六角形、八角形；並有從城門到城門穿越市中心區的直角的街道。在法國，我們到處可看到這種新型的城市，特別是在郎基多克，在那裡由於對亞爾比教派十字軍運動的破壞影響，地方化為一片廢墟，因而有可能來建造嶄新的城市。在易北河東的德意志殖民地上，情況也是如此，在那裡我們也可看到直綫街道和城市衛生的布置。律伯克在十三世紀有着引水制度，雖然大多

数城市还是依靠着水井的。

现在,这些粗鲁的市民,面临着关于设计行政制度和设立政府的整个问题了。不足为怪,他们曾犯了許多錯誤;在城市內曾发生很多騷动。但只要我們記取封建制度曾費了大約一百五十年的時間来使它的制度成为一种公平而有效力的行政机构这一点,我們一定可以原諒这些市民的过錯和强暴行动的;因为对于他們來說,自治政府还是一件新的事情。他們在封建制度內找不到什么先例的,因为城市运动在本质上是反封建的。

近代城市是中世紀城市的后裔,也許在中世紀文明中对于人类没有什么比城市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了。城市不仅需要解决大批混乱的垂死残余成分,而且必須发展新生事物,并試行大量无結果的實驗。关于起源的爭論、階級的糾紛、那些反映在新教区組織上的教堂混乱、那些体现于工匠行会和商人行会集团的工商业竞争;这一切也須予以解决;而且各个团体的地位与职能也須确立。在这些地方的居民中間,按照不同的情况,形成了各种不同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异于曾使他們束縛于領主的等級关系。騎士等級——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等級——和富裕的資產階級联合反对下层階級的居民。^①資本主义的影响沿着社会淘汰的路綫起着作用;“好人”显现出越来越趋向于形成一种城市貴族;他們支配着城市事务,所以,結果产生了一种依靠經濟权力的城市貴族政治。这样一来,城市組織,时常甚至通常地归結为一种寡头財閥政治。

地方政权是为了管理城市而組織起来的。我們看到有行政官、立法机关、法院和低級文官来治理城市。这制度的形式在各地地方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它是从两种权力,即貴族与人民团体的权力之間的一种明示的或默示的協議所产生的結果,就是,从两者之間

^① 在里曼,我們看到某些地方的貴族;在圣墨廷(在1045和1080年之間),我們看到資產階級、騎士和僧侶宣誓效忠于公社。显然,僧侶、騎士和商人构成了人口中的三个階級。

的一種平衡或協議所得的結果。

每個城市，有着它的行政機關來管理必要的公共防禦和公共秩序，例如民兵隊、稅局、財政局、法院、行政院等等。這些在細節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還有着大批行政人員與代表人。其中最普通的，是每年更換行政長官的政治現象。但可以穩妥地說，市民在百年或百年以上的時期中曾試用過各式各樣政府組織方案，也發明過幾乎一切可以想象得出的組合形式：例如，單一元首和多數元首制、直接和間接選舉制、有限選舉權和普選權制、等級代表制、比例代表制、長任期和短任期制、輪流任職制。城市會議的組織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從富人的極端貴族統治制到取消上層階級的選舉資格或剝奪他們的公民權甚至放逐他們，完全由群眾統治。地方機構有時變為如此複雜，以致它們周轉不靈；於是革命或無政府狀態接踵而來，因為在中世紀城市中，黨派情緒激昂。在亞威農、偉恩與蒙特皮列，情況曾一度複雜到這樣地步，選舉行政長官，是先把候選人的名字投入袋內，然後用抽籤方法來進行的。在根特，還採用過一種巧妙方法——“三十九”人行政院分成為三組，每組十三人；一組是實際負責者，一組是曾在前一年任職者，另一組是將在下一年任職者。

在中世紀城市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那些行使主權權利的自由城市；特別是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自由城市，在那里我們看到“主教自由城”和在國王領地上的“帝國自由城”。在這些城市中政權存在於一個顯貴的團體手里，它一步步地成為一個主權團體。它制定條例，訂立法律，宣戰，媾和。中世紀時代的真正共和國，就是這樣地組成的；其中，有的城市維持它們的獨立地位，達幾百年之久，象威尼斯、佛羅倫薩、熱那亞、德意志和瑞士的自由城那樣。行政權委託給行政長官，叫做“城長”、“市長”或“統領”(Bürgermeister, maire, podesta)，最後一個名詞，指的是意大利長官，開始出

现于十二世紀的后半期;“統領”一般是一个外国人,为了管理城市而入境的,以六个月为期。

另有一种事实上相似而法律上相异的制度,起源于若干城市里;这些城市的領主曾把他所有的权力移交給城市中的一个集团。这一种制度曾流行于法国和法兰德斯;我們看到,它也曾施行于德意志的若干領主城市。这些城市有着选举的官吏,从資產階級和城市貴族中选出。在南法,他們叫做“执政官”;在北法,叫做“执行吏”;在西法,叫做“老爷”或“市参事”(jurats)。他們的人数,是可变动的。在亚威农,有八个执政官;在馬賽,有十二个执政官,在土魯斯,有二十四个执政官;在波尔多,有五十个市参事。这些官吏組成了一个行政委員會,来控制市民兵、指派警察、課征賦稅等等。这个行政委員會包括富裕市民中的两个等級,地主(他們的財富在于他們的地租)和巨商。這項职位,毫無疑問,是世襲的。尽管遭受反对,大家族还保留着行政委員會的控制权。在一般情况下,还有一个“士紳”會議,也許是一个居民大会;这會議可能是沒有实际权力的,只是为了通过城市政府的法令而召开的。在上述两种相似的形式之下,那些代表全体人民的市长掌握全权:他們宣战、指揮民兵、保卫城市堡垒和城門;他們批准并課征賦稅;他們控制財政;他們执行司法并頒布法令;在某种意义上,我們可以說,这样一群地方长官是一个貴族集团,因为在南法城市如在毕伽第城市公社那样,这个集团拥有过去封建領主所有的权利。

在許多城市里,領主还保留对城市的一部分統治权,而他的代理人叫做执行吏或“市长”,行使某种权力。在西法和英国的城市,情况尤其如此。領主的这种代理人主持地方法院、指揮民兵并保卫城市。另有一种情况,可說明城市自由在程度上的各种差別;就是,貴族所給資產階級的,只是他們得按照他們的習慣法受到审判的自由和权利。他們沒有权力来建立自己的政府;行政首长是領

主的代理人，他行使一切權力、宣布判決、課征賦稅。在法國，這種形式是典型的。法王曾贊助在大封邑內的城市公社運動，為的要削減高級封建主的權力。但如果這項運動發生在王室領地內，他們是不會容忍的。然而法王也對新興資產階級作出让步；賜給了他們很多有限的免除權的特許狀，如著名的“羅里斯慣例”縮減了王室“市長”的權力。他們也准許巴黎的“市長”和“執行吏”判理有關商業性質的問題和巴黎商會的案件，所以，資產階級逐漸得插手於城市的政府。這樣，在城市公社的內部和在市長管轄下的村莊，發展了一個第三等級，這一等級在十四世紀獲得了一個全國範圍的意義。

從外形說來，一個中世紀城市是由三部分組成的：（1）城市本部，包括城垣內的部分；（2）郊區，城垣外的部分；（3）“禁區”（banlieue）或外圍地帶，所以被這樣稱呼的，是從“禁止里格”得來，就是，在城市法律或禁令管轄下的一里格寬的領土地帶，在那里所散布着的小村是在城市管轄權下的。

城垣對市民的实际生活上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東西要大，因為它是城市的主要防衛。晝夜守望和修建城垣是永久的事情。城市有時從租出城垣旁或城壕內的空地，作為園地甚至茅舍基地，來獲得進款。城中大塔樓，可用作谷倉，貨棧與馬房。在人口增加的時候，城垣內的屋基和房屋的价值逐漸上升，所以，這種財產的所有人，普通是城市的富商，成了一個發財的收租階級；跟着地租的提高，下層反對富人的情緒也激烈化了。城垣也有使人口壅塞的影響；這一情況，是用建造高房子來應付的，房高有時達五或六層樓高，而且還把上層樓面向外放寬到街道上面，因此，街道變為一條有復遮檐的拱廊。這種辦法，由於遮蔽陽光，常使街道變為陰暗而有害健康了；所以，我們看到那種限制房屋高度的“摩天大樓”條例和禁止建築伸到街道上面的法令。

“摩天大楼”这一祸害不是从近代开始的。在中世纪时代，那有城垣围绕的城市使造屋的土地价值变为昂贵，因而资本家为了获得适当利润，不得不建造了高楼大厦。另一方面，司法当局被迫制定造屋法来防止这些建筑物造得太高，以致危及公共安全。威尼斯城是建造在岛屿上的，这些岛屿上的面积有限，土地是很昂贵的——因此，事实上，城市会议被迫通过一项造屋法规定房屋的高度以七十呎为限度。在佛罗伦萨，当城市的面积被城垣限制的时候，这项限度是一百呎，在巴黎，六十呎，在托利多，七十五呎。理姆斯有一项奇异的造屋法律，禁止任何为居住目的而建造的房屋高出大礼拜堂的屋檐；据记载，无论什么时候当一座房屋筑造起来时，副主教被吩咐每天从屋檐的洞口望出，来看这建筑物的墙垣是否高于他眼睛的水平线。阿姆斯特丹的市民，可能从理姆斯会议获得了这种思想，而命令：任何房屋或住宅不得高出“市政厅”的第三层楼；这座大厦是城市所引以自豪的建筑物，他们殷切地要以这个办法来保存它对其他一切建筑物的卓越地位。

下层阶级是住在城垣外的郊区内的；如果他们不在他们的茅舍里劳动，象许多人做“计件工作”和“茅舍手工业”那样，他们就在日出时，城门开放以后入城，在日没时再出城。在城内常可看到花园与果园而“外围”地带的农村供应着其余的必要食料。

我们可按照中世纪城市的一次又一次扩大的城垣来衡量它的成长。因为在十二至十四世纪之间，许多城市曾拆毁它们的老城垣，填满它们旧城壕并建造了它们的新城垣，来把郊区包括在内。百年之后，再次进行了同样的事情，因为又需要建造新城垣来把新兴的郊区包括进去。“比萨到了1081年，皮阿森扎在1158年之前，各已有了新城垣；佛罗伦萨在1172—1174年之间，摩德拿在1188年和巴士亚在1195年各建造了‘第二个围墙’；这些事实暗示：旧城垣之外，在若干时期以前，已有重要郊区的存在”。如果仔细研究这类老城市的平面图，我们常常会看到下列事实：在城市之内有着环形街道；这说明它们是铺设在中世纪城垣旧基地上面的这一事实。巴黎城内的林荫道系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那为维持城垣所征的城市税，是苛重而失民心的；又因为这种税在直接税

形式下难于收集，它时常改变为一項間接稅，通常加在食品方面。今天，法国、意大利和德意志还保留这种形式的稅，作为地方“城市稅”(octroi)。一个中世紀城市有时还拥有森林地：列日售出它的貴重的木材来維持它城垣的費用。城市也租出磨坊权和水流权以及在“外围地带”內的打猎和捕魚权。

直到相当晚时期以前，关于中世紀城市的成长，無論在它們的数量，它們的人口或它們的进款方面，不可能有正确的数字。但有理由可相信：那些自治城市的数量在 1100 和 1300 年之間增加到十倍，而他們的人口有时增加到两三倍。当然，它們进款也跟着相应增加。的确，在 1214 和 1293 年之間，热那亚的收入增加了一倍，到了 1395 年，它的收入又增了一倍。在威廉征服者最后生病的时期，卢昂城的喧嘩曾使病人不能支持下去，所以他曾下令把他送出城而移到城西山上的圣哲佛教堂去住。公共广场，自然是城市的中心。有时它是一个市場广场，有时是教堂前面的广阔場地，有时是市政厅前面的广场。在意大利，它被称为“piazza”，在德意志被称为“platz”，在法国被称为“place”(广场)。但在所有的場合，这个名詞都是从古拉丁文“platea”(广场)得来的。在那旁和尼姆，凡是在公共广场上有着房屋或店鋪的人們，被称为“广场人”。

在十三世紀之前，公共建設除了在意大利城市以外，还未曾有过多大的进步。巴黎还未曾有一条鋪石子的大道，直到腓力·奥古斯都在 1184 年敷設了卢佛尔宮前的大道。1131 年，路易六世的一个儿子馳下拉丁街区内圣扎克路时，他碰到了一只正以鼻子掘出街道上垃圾的猪冲入他馬的两腿之間，因而他从馬上摔下而死。然而，在十三世紀有些先进的城市，象科伦和律伯克那样，已以石子鋪設了市場地点和它附近的街道。我們看到城市为了公共建設已經实行征用土地的事例。大部城市，在冒着伤寒病的危險

之下,依靠水井来取得飲水。但进步的大城市也有用水管来获得部分用水。1187年在阿伦逊城被围困的时候,它从薩特河得来的用水,由于水管的被截断而中止。1256年,有些工人,在从事清除伦敦一条旧阴沟的污物时,因水管中的污浊气冲出而昏倒。十二世紀,在有些城市里,阴沟已不是仅仅在地面上的排水小沟,而且是用砖石砌成的地下通水渠或用管子一头接一头砌成的地下泄水管;还有公共厕所,也曾被提到。所知道的唯一的街灯,是在某个神殿前面的一盞偶然点亮的灯;除非在庆祝日子的晚上,市民才常常在窗口上点起了蜡烛。在中世紀城市里,由于有着大量木房,火灾的危险是严重的,所以富人建造了石头房子;在有些城市里甚至下层階級按照法律也需用瓦片来盖着屋頂,以代茅草。到了1400年,中世紀城市房屋大多是用石头造的或用木头和水泥造的。如上所說,城垣以內的房屋是高的,但在郊区内穷人的房屋,是又小又骯髒的茅舍。在一个市中心区,由于空地缺少和房租昂貴的緣故,住宿情况,非常拥挤;有时多至十到十六人,住宿在三个房間內。有时,我們可看到几个人合有一座大房子;他們各領有一层,或者常常各領有几个房間。它的产权是分成份額的,例如占其中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甚至三十二分之一的份額。

象城市起源那样,中世紀行会的起源,是一个复杂而又有很多爭論性的問題。关于這個問題现有各种理論,正在流行。对于十九世紀早期所流行的理論,即行会是从羅馬的“公会”(collegia)和“秘密会社”(sodalitates)得来的說法,今天已很少有人贊成,因为那些古代会社的残余的繼續存在象羅馬市政制度的残余一样,不能获得証明。

另有一种理論,流行于那批主张城市起源于日耳曼“馬克”論的德意志历史家中間。他們认为:行会的起源,在于古代日耳曼原始会社中这个或那个团体;例如古代日耳曼“酒会”(convivia)或为

自衛而組織的“部落親屬會”(frithgilds)。

第三類歷史家認為經濟社會勢力比種族制度更重要；他們主張：“行會的胚芽萌發於莊園經濟的小天地中”。然而，這類歷史家可分為兩個集團。一個集團企圖從莊園的手工業中找尋起源，就是從莊園上不自由手藝人中，據他們說，這批手藝人逐漸分成為屬於同一行業的工人集團，如鞋匠、馬鞍匠、車輪匠、織工、漂布者和鐵匠的集團。他們分住在大莊園上各地段內，象在聖里奎爾那樣；這一事實被援引作為本論點的證據。第二集團認為：行會是從莊園的“工頭”階層里派生出來的——就是說，從莊園上管理手藝人和手工業者的“頭子”或“監督”里產生出來的；這批人雖然本身也居於不自由的地位，可是他們成為一種高級而又有更好訓練的工人；而且他們是具有管理和支配工業的經驗與資格的。

但在这兩種理論中，沒有一種能夠解決這個重要問題：這些工人是在仍是農奴身份時已組成了行會呢，還是在他們脫離了農奴身份之後組成行會呢？即使我們承認了其中任何一種理論，還需要證明：當這團體的成員還是農奴的時候，原始性團體——行會的核心——已行會化。看來，這些理論各包括得太多或包括得不够，否則也是把我們所可得的證據太牽強附會了。它們不是太狹，便是太寬，它們也沒有注意到那些由於種族集團的殘余、歷史傳統的不同、地方經濟或社會條件的影響所產生出來的地方偏向或變異。而且，商人行會也可象手工業行會一樣地歸入其中的任何一項根源里嗎？比較容易了解：人口的壓力和技術的發展逐漸使手工業中間產生了分工，於是有熟練工匠在市場或市集上或城市里可能變成為自己手工制品的負販者，從而有一種異於手工業者的“商人”出現。就是說，手工業行會和商人行會兩者，都是從莊園行業里起源的（許多領主覺得必須把他們依附人中間的某些人變成商人來供給他們的家庭需要）；但與這項假設相反，我們看到

有关另一类很不相同的商人的证据；他们似乎从来未曾充当过为供应寺院和庄园所需的外来货物的不自由商人，但他们一直是商人。在一个“堡”内所有的商人不是都属于领主的旧“人”的。这批人是那些最先住在城市的“堡”内的流动商或队商吗？那些最早的“堡民”是因经营商业而终于完全脱离了庄园的庄园农奴吗？庄园商人，当还未完全从手工业方面分化出来的时候，已组成行会呢？还是他们在成为羽毛丰满的商人之后才组成行会呢？又在什么时候，队商组成行会呢？一个行会能够合法地自行组织呢？还是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都是由于某种政治权力的一项法令而建立起来，象市场由法律来建立的那样呢？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但看来，行会的特许权利，象城市的特许状那样，或者是由于政治权力的正式赐给得来的，或者是由于统治的领主批准了那些由团体所拟定而呈请领主批准的规则与章程方面得来的。

另一类历史家，要从教会的各种类型的教区会社或兄弟会里找寻行会的起源；而这些团体是作为救济穷人、照顾病人和埋葬死尸的慈善机构而存在的。但这项理论是缺少实质的根据的。它所提的论点是：所有的行会都千篇一律地有着守护神；但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已经证明：行会采用守护神这一惯例，是在它们历史的后期，不是在它们历史的早期的。而且这些守护神的名字，也不同于兄弟会守护神的名字，例如：圣克力斯平（鞋匠殉难者）和圣尼古拉（商人殉难者），等等。最后，还有极少数作家，想要从那些由“上帝和平”或“上帝休战”运动所创立起来的地方团体内，发现行会的萌芽，但这种理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这样地探求行会的起源，有着双重危险：第一，所使用的名词意义超出历史资料所可证明的范围；第二，太严格地拘泥名词的正确定义，因而看不见那些隐藏在制度背后的动机。我们虽然不信任这样空泛的一个概念，象“联合原则”那样，却可坦白地承认：在

早期中世紀世界，下層社會到處覺得有組成某種集團的必要性。我們可同意刻特根的審慎的論斷：

事實……是：在早期，我們祖先中間，盛行著一種為持久的、實際的而又合理的目的所表現的自由結社與組織的精神，關於這一點是無需尋求更遠的根源的。它無需乎外地的榜樣，但只要當他們的一般文明狀態允許它並需要它的時候，它就興起了並按照情況與目的採取了各種不同的形式：例如，部族會、宗教團體、商人公會、飲酒總會、公社……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來自周圍鄉村的移民居住著的。他們由於變更了他們的住處，離開了他們的親屬，因而離開了那些患難相共、休戚相關的人們。行會在某種程度上所提供的，正是起他們親屬的作用。^①

行會的歷史重要性，不是在於它們的政治活動，而是在於它們的商業與工業活動。它們是中世紀時代解決商業與勞動問題的手段。行會控制資本並管理勞動；它們支配生產與分配；它們規定價格與工資。但在它們的組織里，也有著一種社會的影響。行會的目的部分是社會性的，部分是互助性的。商人行會和手工業行會，即使非完全同樣，幾乎都是在早期出現的。它們組織的目的中的一個巨大因素，是互相保護與保證，無論在國內或國外。行會尤其是手工業行會，在初期，是具有顯著的民主精神的；從學徒到匠師這一條路，開放給所有合乎資格的人們。但到後來，在十三至十四世紀，行會和城市政府同樣變為寡頭的組織。在這兩種組織里，都反映出同一的排他性現象。

行會是一個團體。正因為這樣，它所有的成員，住在城市中同一街區內。所有不屬行會的勞工都被排擠出去。每個從事手藝的人，必須屬於一個特殊“工場等級制”，從學徒逐步上升到幫工和到匠師的制度。匠師和學徒之間的關係，是家長式的。學徒被看作匠師家庭的成員，他的品德教育是和他的技術教育同樣受到注意

^① 《英國歷史評論》，第8卷，第125頁。

的。他不可以結婚，或寄宿在匠師的家以外。學徒繳付一種現款的學費，獲得膳宿，但沒有工資。學習時期，從二年繼續到五年甚至七年不等。“日工”或“幫工”所得的工資是很小的。匠師是一個卓越的手工業者，他已經制成了他的“傑作”。他教導工人的方式，一向是口頭的或用實例的。由於這個緣故，關於行會教育的內部情況，是很少知道的。從整個中世紀時代，只可獲得一種這類性質的成文文獻，即薇拉·得·翁尼庫特(Villard de Honnecourt)的“名冊”。

從開始那一天起，行會顯出了要求取得特權和封建壟斷權的迫切願望。雖然行會嚴格禁止內部競爭并野蠻地壓制它，但它們鼓勵它們的成員進行對外的競爭來扼殺對方，就是，他們可以隨便什麼價格“在外地出售”東西，不論是在鄰近的伯爵領、城市或教區內。

行會在初期原來是有內部民主精神的，但不久有一種分裂發展起來，而這項分裂到十三世紀末期就固定起來。匠師成長為行會成員中間的貴族，後來拒絕了普通工人入會，這樣把行會改成為一種關門主義的資本家的團體，而它們的會員資格，限於已屬於行會的富裕家庭中間，是由父傳子、子傳孫的職位。這樣一來，資本和勞動間的衝突，在中世紀後期，就出現於舞台上了。普通工人，成了象一個工廠里的工人那樣——雖然那時沒有工廠——他們從行會匠師領取原料并在家內製造它們；他們成為工資工人，以“罷工”來反對削減工資，或爭取更高的工資；他們遭受失業和“艱難時期”的危險；他們被業主或富裕雇主嘲笑為“藍釘”；這批雇主由於占有行會的積蓄與操縱價格與工資而獲利；除了這些所得外，他們還可從他們在城市中所占有的財產而獲得租金。

同時，勞動階級成了一個無組織的工業群眾。其中唯一的分裂，是技術上的差別：例如，梳羊毛工、織工、漂布者、硝皮者、染色

工和馬鞍匠，另一方面，雇主是集合在大商業或手工業組織內的。然而，雇主間差別的标准，大多不是行業的類別，而是各種行業所控制的資本數量。例如，在佛羅倫薩，我們看到有“大行會”與“小行會”的分別。大行會共有七個，它們的領導人，是城市內各主要行業中的最有錢的市民。在這勞資兩個階級中間，匠師是占着一個中間等級；他們是工人的監督或“工頭”。那些做繁重工作的人們是按周工作的，住在破破爛爛的郊區內，骯髒的宿舍里；他們的工作鐘點，是規定的；它們是受着城市大鐘的支配，他們的工作日是漫長的。他們做一天，吃一天，處境和今天的低級工人相似。他們服從主人或僱主；後者指派檢查員來監督他們的工作並規定他們的工資率。我們完全不知道最低等級的勞動人口的情況；這批人就是除了臂力以外沒有別的東西，沒受過專門訓練的工人。歷史上沒有談到那未入行會的、臨時僱傭的勞工階層，他們叫做“季節工人”。

在佛羅倫薩，大行會包括下列七種行會：（1）公證人，他們長于法律；（2）進口布匹商（Calimala），他們的業務，是輸入外國布匹並把它們染色加工，使式樣更加美麗；（3）銀行家和錢兌商；（4）呢絨布商——呢絨業行會，是佛羅倫薩最富的行會；織造呢絨是它的主要工業；（5）醫生和藥劑師；（6）絲商；（7）皮貨商。佛羅倫薩小行會，通常有十六個：屠夫、鞋匠、鐵工、皮革工人、石匠、葡萄酒商、烘麵包工人、油脂商、豬肉屠夫（與一般屠宰分開的專業）、麻布商、鎖匠、武器匠、馬具匠、馬鞍匠、木匠、旅館主人。

上列一表可以認為是具有代表性的，當然行會的數目與類別，在各城市之間是有差別的。這種差別是由于不同的地方經濟條件所引起的：例如，由于某種容易獲得大量原料的供應如鐵那樣，又如由于一個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所得的商業便利，象在威尼斯、熱那亞、科倫、布魯日那樣。

由此可见,在十三世紀,經濟的和社会的两种革命,在行会里和城市里,都已发生。富人阶级到处控制了地方政府和地方貿易与工业;他們并通过法律来支持他們的利益,如特权和专利,或表达了他們輕視群众的态度。例如,在布魯日,1241年的法律把伪造货币者、小偷和手工艺工人联在一起。从十三世紀中期起,在欧洲人口稠密的工业地区,如在伦巴第、多斯加納和法兰德斯,罢工和暴动是普通事件。1244年,在杜厄曾有一次工人暴动;1248年,在布魯日、伊泊尔、根特和杜厄,大规模地爆发了叛乱。在私战全盛时代,农村生活中的强暴行为,有了十三、十四和十五世紀城市中的强暴与野蛮行为相匹配。关于这一点,历史表明在礼节与道德方面没有什么进步。强暴行为只不过从农村轉移到城市而已。强迫实行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們看到引渡逃亡工人的立法,正象在庄园时代追回逃亡农奴的立法一样。

这种情势造成一种新的联合方式——就是,在一省或一个地区內所有城市的大行会人員組成了同盟——而在工人阶级方面也企图組成他們中間的同盟,甚至团结附近城市的这类联合。但工人的所有这种努力,在中世紀时代,未曾获得效果,除了在佛罗伦薩,但即在那里,也只有一个短时期的成功。职工联合会,是属于近代起源的;它不是一个中世紀制度。

所以,总括起来,在十一至十二世紀,通过所发生的逐步革命,对旧經濟和社会問題作了解决,但这解决,未曾絕對地解决了什么。因为新的情况,不論它們比过去有着多么大的改进或改善,产生了和过去同样地尖銳的新問題、新痛苦与新的不公平。約在1200年以前,欧洲的社会經濟問題,是在乡村里。在这以后,这些問題則移到城市里了,在那里,由于人口的拥挤,問題比在过去时期更为严重。在庄园制度下,农民尽管遭受痛苦,但沒有遭受失业的痛苦;一般說,他們是够吃、够穿并有足够的柴草来保持溫暖;他

們沒有因拥挤的居住情况而受苦；他們的進款，雖然微薄，但沒有受到象工人工資那樣的經常波動，而在習慣稅役轉變為固定的貨幣租以後，農民還大為興隆起來，因為他們所供應的食糧價格提高，同時他們所付的地租和捐稅沒有按同樣的比例而增加起來。貨幣購買力下降和物價提高的運動，都沒有給農民帶來了沉重的打擊。

另一方面，在城市里，低級工人付出了高額地租；他們住在郊區的矮小茅舍里，那里人口拥挤，又是全城市中的最沒有改進而最不合衛生條件的地區；他們的工資時遭變動；部分依靠市場的情況，部分依靠雇主的行動；他們還要遭受長期失業的痛苦；當市場貨棧堆滿食糧的時候，他們可能為了缺少現款來購買食糧而挨餓，又在冬天，他們可能為了缺少便士而不得購買燃料。一句話說，在後期中世紀——從1300年起——歐洲社會產生了無產者的問題、貧困的問題、房屋居住的問題、資本與勞動的問題。但對近代研究社會歷史的人們來說，對封建時代，也不應求全責備，因為他們也是處在有缺點的社會里。

第二十九章 早期中世紀 時代的結束

現在，我們必須強調指出區分十至十一世紀的文明與十二至十三世紀的文明的深刻不同之點。因為在十三世紀，歐洲曾發生一次革命式的改革。部分由於十字軍運動，部分由於與此運動無關的力量，一個新歐洲，就是，一個還保存着很多中世紀的東西，同時也具有按本質論很多近代特征的歐洲已經出現。如果可以說十三世紀是中世紀的結束，也可以同樣正確地說，它是近代時期的開端。

在所發生的改變中，一項最顯著的改變是地方封建政府的崩潰。國王利用了他們的附庸出國到東方去的机会，來在多方面鞏固自己的地位。貴族被削弱了。城市從那些願意參加十字軍的封建主方面購買了它們的獨立地位。封邑的統一使附庸對他們領主的聯繫更為密切；農奴變為自由農，或在城市中充當手工藝工人；老的軍事和財政制度已經改組；封建法開始讓位於復興的羅馬法；政府從封建的附帶的和偶然的收入，已被得之土地稅和商業稅的固定進款所代替。已採取了課稅估價的新方法和徵稅的新方式。這項改變中一個突出的事例，是把軍事服役轉變為貨幣繳款之逐步發展的辦法。亨利二世的“薩拉丁什一稅”，為徵收理查一世的贖身金所建立的程序以及後來為贖回在埃及被俘的聖路易所建立的程序，也是這種改變中的另一種反映，並建立了行政的先例。政府的特殊收入還大量增加了它所可獲得的資金數額。間接稅變成更普遍，因為它們更有利可得。在城市和鄉村，工業人口的增长——

因为在十三世紀，在公共安全方面，显著地作出了巨大进步——使这些进款激增起来。“如果說地租是缺少伸縮性的，那么，借款、貢稅和罰款是可以大量扩充的”。

這項新生活使政府的实际情况发生轉变。因为有更多貨幣在市面流通，国王能够雇用雇佣兵队伍；从而造成了不断需要金錢的情况，这是一个近代国家的特征；这种情况在我們近代常备軍和近代公債方面已发展为多么庞大的规模。最后，这新制度由于創造了新財富和新风尚，使賦稅的項目和类别跟着激增了。

破坏性內战的停止和有力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出现，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社会变为更安定，同时也更多流动性。交通運輸比过去时代更加便利了。在新的貨幣經濟与旧的自然經濟之間的竞争、繁荣景象与上升的物价都刺激了工商业方面的发展。

欧洲工商业的繁荣，从十二世紀开始到十四世紀初期，未曾遭受过挫折，除了地方性的挫折（尤其是在郎基多克的）以外。在英国，它是从諾曼征服的时期（1066年）开始；在法国和法兰德斯，从十字軍运动发动时期（1095年）开始；在德意志，从亨利四世时代的中期（約1085年）开始；在北意大利約从1000年，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从諾曼人征服那里时期（1016—1090年）开始。在西班牙的基督教国家里，这种景象直到1230年卡斯提尔与雷翁的联合以后，在卡斯提尔王阿尔凡索賢人（1236—1284年）与阿拉貢王詹姆士一世（1213—1276年）的时代才开始出现。

欧洲的新情况是普遍的，同时又是各各不同的；与此俱来的，到处是旧封建政府、旧經濟、旧社会的崩潰。封邑、庄园和教区的传统在瓦解。旧的恒久性的連系与結合、旧的相互利益关系、旧的行为准则、旧的睦邻关系、旧的人事与財產的地方性关系，一齐在迅速接着的新改变、新接触、新条件与新心理情况的面前让位了。

每个时代，即使不是每个人，关于人事、財產与行为方面，是有

着自己的想法的。這種習慣的想法，大多是由條件決定的。改變了條件，習慣想法也改變了。在十三世紀，情況就是這樣。中世紀農奴制迅速而又廣泛地衰落，即使它未曾完全消逝；中世紀政府和經濟形式衰退，即使它們沒有完全毀滅；中世紀社會的結構，似可說，按照一種不同的模型已被織入了新綫；過去凍結于土地財產的固定資本已被貿易和商業的流動資本所代替；在十字軍時期意大利城市，尤其是威尼斯和熱那亞，把在拜占庭曾維持了幾百年的資本主義企業，帶進了西歐；在那里，它還和那在西方無關十字軍影響所創造出來的新財富相結合；貨幣經濟和現款交易開始在自然經濟曾統治過幾百年的地方上流行着。這是一種兼有人事和財產性質的革命。財產的各種新類型出現了，在財產占有的形式與程度方面也來了新的轉變。於是，一個新業主階層也成長起來了。

這些社會和經濟條件的變動，在它們的相互關係上，是如此五花八門，如此複雜，因而產生了一種深刻的轉化；我們可以說，它是社會經濟上的微粒改變。這些改變又以受到十字軍運動的影響而加速起來，但其中有很多改變不是起源於十字軍運動的；即使未曾有過這一運動，它們也會發展的。象所有這類的力量一樣，它們是錯綜地交織着的；那怕在邏輯上可以區別，但它們在歷史上是分不開的。

在封建時代，歐洲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口的增加。關於早期中世紀時代，就人口的数量與密度、賦稅的負擔、政府與教會的進款與莊園上收入的總額，在各方面，除了大概情況以外，我們所知的很少。但從十二世紀起，我們有着關於這些方面的資料；它們雖然不很完備的，按近代所用的意義來說，更談不上“統計資料”的；但也可使我們能夠作出某些實證的解釋的。

歐洲的人口，在第二世紀羅馬帝國，開始了下降，並似乎逐漸跌落直到第八世紀為止。在查理曼時代，它看來稍有增加，但這項

增加的趋势被第九至十世紀的內战与外来的侵犯所阻碍。在第十世紀的后期,尤其是在德意志,人口显然有了增加。从1000到1349年(即黑死病的灾难降临欧洲的那一年)之时期中,人口繼續增加得很多,所以它可綽乎有余地抵消了因十字軍而抽調出去的人口。幸而,在这些世紀中,生活資料的增加能够跟得上人口的增加。关于封建时代欧洲人口的增加,德意志历史家兰普勒赫曾作出最透彻的研究。他所得的結果,虽只应用于摩塞耳河流域,但也許可以作为在欧洲許多地方人口增加的一个相当的指数。数字如下:

年份	村庄	人口	年份	村庄	人口
800	100	20,000	1150	810	140,000
900	250	60,000	1200	990	220,000
1000	350	80,000	1237	1180	250,000
1100	590	100,000			

这种人口的增加,反映在下列方面:公共建設进步,如沿河流和沿海岸筑堤、排干沼澤地积水、削平森林;这些世紀建造了又新又好的大量建筑物包括宗教的和世俗的建筑物,因为在这以前的世代未能負担这笔建造費,也未能提供这些工程所需的劳动力;剩余人口經常流入人口稀少的地区,北部法人和佛来銘人流到英国去,南部法人流到西班牙去,德意志人流到易北河外的斯拉夫人地区去,全欧洲人在十字軍东征时流到利凡得去;城市增长和农村人口的移入城市;土地更集約耕种、旧公共地瓦解、荆棘地和荒地的圈围、森林地的开垦、牧場地的改变为村庄以及村庄数目的增加。

在封建时代,就是說,在城市兴起之前,欧洲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也許住在农村,而近代欧洲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住在农村,除了英国,在那里城市人口的比例甚至还要大。欧洲的

若干地區，尤其是倫巴第、摩塞耳流域和法蘭德斯，到了1100年，就經濟的意義和地理的意義來說，^①顯出了人口的高密度。我們從這些地區的資料，可估計其他地方所發生的情況。早在1127年，法蘭德斯已被說成是一個人口稠密的地方。在摩塞耳流域，在900和1000年之間，人口幾乎加倍；到了1250年，它增加到四倍。結果是土地價值的提高，尤其是在城市周圍的土地，因為需要給養那里的稠密人口。很多經濟學家主張：人類進步的基本根源，在於人口的增加和對生活資料日益加重的壓力；十一到十二世紀的歷史似乎証實了這項說法。確然，看來那些作為這個時期標志的許多複雜的變動現象，歸根到底可歸結到這個事實上。

地主階級，由於這些跟着發生的變更，深受了損害。幾百年來，封建政府和封建社會是以土地壟斷為基礎的。土地占有權，賜給了財富，決定了貴族地位，支配了政府，保持了農奴制。早在第五世紀，勃艮第法典曾禁止把土地售給那些未占有土地的人們。封建貴族，曾以剝奪農民土地占有權，以禁止他們遷移或外遷到低廉的土地上去，一句話說，以保持農奴制，以土地價值提高到超過勞動者購買力之上，來保持他們的卓越地位。

但人口的逐漸增加，起初弛松了而後來又沖破了這種控制。在不自由的人口中間，最大膽的分子在生活資料的壓力增加時，不再願意被奴役關係束縛住而外遷到新地去了。當城市開始興起時，農村人口流向那里。結果，勞動人口中進步性最少的成分留在莊園上；因而莊園的經濟效能下降了。為了阻止他們土地上人口的進一步縮減，領主被迫對農民提出了寬大條件來留住他們：例如，改善對農奴的待遇，把服役改變為固定的繳款，最後甚至釋放

① 在討論任何人口問題時，必須區別“經濟密度”與“地理密度”。前者意味着人口對以食品生產與自然資源作為衡量的生活資料之壓力；後者意味着在人口與所佔據的面積之間的數字關係。

农奴。显然，从十二世紀后期起到十四世紀，中世紀欧洲的地主，要获得足够的重劳动力来耕种他們的土地，已感困难。有些作家沒有充分了解情况而輕率地认为：对内和对外的战争和远大于今天的死亡率一起縮减了劳动人口的人数，又因領主占有着这样多的土地，所以，他們被迫提出了优厚条件来保持他們的农奴。但这项解說已被事实駁倒了，因为証据确凿：在这些世紀里欧洲人口已大大地增加。地主階級所碰到的尷尬情况，是由其他的条件所引起的。

貴族的經濟困难，也許是一个主要原因，可說明为什么其中很多人起初倍增了庄园捐稅，如“土地稅”和“田租”等。在今天，一个地主能够以发展一种高級技术，以采用种田机器，以使用更集約的农作方法，以輪流播种谷物来提高他土地上的生产力。但在中世紀时代，則不然：地主在极大程度上受着流行的經濟条件的束縛。甚至耕种条件，也迟迟不加以細微的改进。所以，当对农民所行使的强制方法失敗以后，領主，如果有鑄币权的話，采用了操纵貨幣，甚至把貨幣貶价，来从每次接續发行的新币里取得利益。他們利用他們的特权，完全象教会利用它的权力那样。从这种办法所产生的民众的困苦和貿易上的不便利，是促使男爵阶层的衰落与王权增长的一个因素；国王逐步以王室政府来替代了地方与省区的封建政权，并取締了地方貨幣的流通以利于王室貨幣。

当这权宜措施失敗以后，地主开始释放他們的农奴，提倡自由賤农租賃关系，輸入“客人”、茅舍人、小佃人（自由而卑微的劳动者），以求获得充分而穩定的劳动力。甚至这项办法也未能获得完全的成功，因为生活費用的上涨比进款的增加快得多，于是地主干脆地轉向于一种地租制度。封建經濟的崩潰，就跟着这项从服役到地租制的过渡而俱来了；地租制的迅速发展，是十二世紀的一个特点。

即在地租制採用之前，過去的賤農服務與“服役”制已未能供給地主以足夠的進款，所以在這過渡的時期，領主一定要使地租足夠。於是，捐稅乃慢慢地轉變為固定的租款。當過去實物繳租轉變為貨幣繳租，和農奴與賤農服役的性質和範圍變為固定而有習慣性的時候，情況就弛松下來了。但由於對習慣的莫大重視，這些租率，一旦確立以後，變為不可更動的了。在租稅固定之後，要改變它們，就是違反習慣。一塊地產可以出售到十多次以上，但它的地稅和地租却是不得改動。唯一可改變的，是在房租與居住稅方面。這些租賃的條件，一般是一代又一代地由傳統來保存着的。有一件著名文獻，當談到“現在已經衰老而對這些事情的記憶已經模糊的農夫”時，它寫道：他們“從他們的祖先已知道並很清楚地懂得他們應該繳付多少地租”。到了十三世紀，“習慣人”(coustumier) 這個名詞，普通是用以指示這個新階層的農民；由此可見這項轉變的意義了。這些“習慣”租稅可能或多或少是苛重的，但它們形式的固定和他們負擔的不可改動性，就它們本身來說，是一個較好情況的保證。農民獲得了保護，來防止新稅或舊稅的增加。據經濟學家所確立的原則，最好的稅，是人民所熟悉的稅，而在征收方面不會有什麼困難或抗議的情況。為要了解對農民課稅上所作出的巨大進步和固定的習慣稅對專橫征稅之優越性，我們只要把這情況和愛爾蘭農民近在前一世紀還憤怒反對的“勒索地租”的禍害相對照一下就行。到了十三世紀末期，除了在欧洲最落后的部分外，再也沒有象那項可憎的辦法存在了。

到了 1300 年，農奴，其中至少有几百万人，已上升到自由人的地位；如果他們還是被稱為農奴，那是一個法律的虛構，因為還有若干舊條件附着於他們所可能有或可能租的若干土地上。“免役稅”、“分配地段”(lots) 及其他陳腐的名稱，過去曾一度意味着真正的勞役和真正的負擔，而現在已變為一個空名、空壳特權的殘痕，

象我們有時看到的附着于所有權上的古怪條件一樣，其根源可追溯到遼遠過去的立遺囑者。如果說農民未曾成為自耕農，他們至少已是自由租戶。過去的莊園村莊現在已變為一個自由農的村莊，一種鄉村的行政制度已替代了過去莊園領主的政府。

歐洲的經濟革命曾迫出了農奴的釋放。說人道主義的情感在這過程里曾起着什麼巨大作用，那是荒謬的。如果理想主義曾是激起這項運動的動機，那麼教會農奴應該最先被釋放，然而他們却是最後被釋放。在這方面，僧侶落在世俗業主之後。那些表達慈悲性的禱詞：“為了上帝的愛”，“為了找靈魂的幸福”等，是口頭陳套語。

但是領主曾犯了一種錯誤，就是，准許依照莊園慣例的長期地租制，在這慣例下，服役的數量與類別，一旦取得協議，就變成固定的。他未曾看到未來情況，未曾預計到物價的逐步上漲和生活費用的逐步提高，從十二世紀中期繼續上升到十三世紀末期。結果，後來在生活費用上漲而地租依然固定的情況下，領主覺得自己還是處在經濟困難的狀態中。

實際上，農民所獲得的利益遠過於領主。正因為貨幣地租很緩慢地代替了為領主耕田和收穫的勞役制，前者採取了後者的最重要特徵——一致的習慣性；傳統還使它們停留在某種水平上，這一水平是很難更動的，即使領主的利益和時代的情況已經大大地改變。物價是在波動而逐步上升，貨幣的購買力是在漸漸下降，但習慣地租依然和前一樣地是原封不動的。所以，跟着歲月的流逝，情況的轉變是有利於支付地租者方面……〔在英國〕1189年所舉行的葛拉斯吞伯立土地調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確定地租實際上是否符合地皮的價值，並要作出必要的調整，但象這一類的課稅估價，是很罕見的，也難於把它們付諸實行的；一般趨勢，顯然是走向習慣地租的穩定性的。^①

教會尤其是寺院，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因而它們從這些改變所遭受的打擊，也特別嚴重。因為寺院主要是以農村為基礎的，而主教

① 費諾格拉道夫：《英國的賤農制》，第181—182頁。

的駐地是在城市里。

地主貴族，即使還未曾消逝，但已經減少，不論在人數上或在勢力上。與創造新類型財富的同時，革命也創造了社會的新成分。除了城市的資產階級以外，還崛起了一種新的暴发貴族；他們的稱號，不是從出身而是從王室恩寵得來的，他們的財富，不是在土地上，而是在政府的俸祿、恤金和官位上。殘存的老貴族，已是過了時的，是驕傲但常是窮苦的貴族。

關於舊封建貴族的這種日益貧困的情況，我們有着若干奇妙事例可資說明。舉例說，因為充當一個騎士的費用是很大的，新騎士必須具備一匹戰馬和一匹後備馬、甲冑、華麗服裝、侍從，此外還須加上騎士授爵儀式的費用和祝宴的費用，人們可看到推遲“騎士授爵儀式”的趨勢。在騎士制度的早期，一個人在十五歲可以成為騎士，後來延遲到十八歲，再後延遲到二十一歲。如果一個未來的騎士是屬於望族的子孫，當他已成年而尚未被授予騎士爵位的時候，至少就長子來說，那認為是一種社會恥辱。結果，有很多家族在進款日減的情況下，為了保持它們的社會聲譽，落入了猶太人高利貸者的魔掌手里。關於收養，也可看到同樣的情況。貴族把女兒的婚嫁延緩；如果大女兒已出嫁，她妹子的出嫁一定要等待，直到她們的家庭由於一次幸運的降臨或由於小心節約得彌補它為嫁長女所受財產上的損失為止。

因為地租的增漲不是按照生活費用增漲的比例的，貴族越來越變為貧困化了。他們被迫抵押出他們的莊園；當他們未能付出利息的時候，抵押品的贖回權被取消而他們就喪失了土地。十二世紀的歐洲在不太尖銳的程度上已感受到世界從1918年以來所感受到的；就是，那些依靠固定收入過活的人們的痛苦。商人、手工藝工人或自由農民的進款，是有伸縮性的；如果他們克勤克儉，他們的進款會增加而不會減少。但那些依靠從長期租賃所得的固定

地租而生活的地主，則不然。當生活費用上升的時候，他們一年比一年更加勞苦。封建貴族的這項沒落過程，在意大利最為突出，但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到處是存在着的。廷廷那諾族原是多斯加納的大貴族之一；它的最後一個領主，就這樣地喪失了他祖傳的地產而依靠施舍過活；1250年在塞亞那街頭上討飯而餓死在那里。

但老貴族果然更貧困化，可是比他們的前人有着更好的儀態。那些野蠻的早期封建社會的日子，在最大的男爵還是愚昧無知的時期，在十三世紀已一去不復返了。可是這種新的文雅風度也有着它的渣滓的。貴族的驕傲——尤其是法國貴族的驕傲是盡人皆知的——大多硬化為傲慢態度。當十字軍運動促進傳布騎士思想的時候，那些思想已喪失它們早期的淳厚品質和階級理想了。騎士組織已成為一種國際團體，一種國際種姓。十一至十二世紀的粗魯野蠻性被一種雅致的殘暴性所接替，而後者更壞。結果，人們在十三世紀文學里，可以看到貴族反對資產階級、自由農民與自由賤農之誹謗語調以及有些貴族，雖非全體貴族，對這些階級所作的無意識的嘲笑。

當然，不該設想：所有封建貴族都是遭受不幸的。有些相當聰明的貴族，保留着他們土地的一部分於自己手里，不把它租出而由自己來經營；他們需要勞動者時，僱用他們；當工作完成以後，即解雇他們；這批貴族還能勉強度過。如果貴族和業主階級曾能耕種他們的土地，象農民所做的那樣，他們的地位會是大不相同的。但他們不願也不能這樣做，也不能支付自由種田工人所要求的新工資標準。於是，貴族在經營自己田地的方面感到困難，因為農民不是離開他到城市去，便是要求太高的工資。但整個說來，貴族很少有經營實業的傾向，而且在莊園制度的傳統與習慣下，很少有甚至沒有什麼教育可使他們了解新的形勢的。土地已變為一項商業資產，一個可以買賣的對象、一種商品——那在封建時代是聞所未聞

的事情。事實是：在 1150 和 1250 年之間，地主階級處於進退維谷的地位，就是說，他們遭受了進款的縮減和生活費用的提高與高物價之兩面夾攻；關於他們進款之所以縮減，是由于不善于有利地經營他們的土地，或由于不能提高地租的緣故。因為這個時期是以一種物價與工資革命為特征的。

我們不能敘述中世紀時代物價的準確歷史，因為流行的貨幣這樣繁多，它的物價又時常波動，特別是因為不可能確定貨幣在某一時期，在某一國家或地方，所具有的購買力如何。但大概說，在後期封建時代，無疑的，物價與工資有着巨大的上漲。工資的上漲，因為它和物價的上漲保持了大致的平衡，補償了工人和生產食料的農民，但那些依靠地租與投資的人們則吃虧了。換句話說，貴族與教會吃虧最大。但教會一向能以請求捐助來彌補虧空；如上文所述，它還利用了它的宗教權力以取得大量財政進益，而貴族則不能作出這樣的呼喚，也不能採用這樣的辦法。

十三世紀革命的另一特征是：城市對封建經濟消逝的影響和它們對莊園制度的崩潰與自由農民階層的形成之關係；當時，市區地租已日益用於促進商業方面。確然，關於改進農民狀況的一個基本因素，是那些能夠經營對外貿易的大城市的活動。

這些城市的利益，在於贊助自由，以便宜於獲得原料。於是，資本在城市里的成長導致市民願意投資於土地。但封建制度和它把農奴束縛於一個世襲租地上的制度，阻礙了對土地的自由投資；這是為什麼城市反對農奴制的另一原因。因此中部意大利城市首先提倡了整批釋放農奴；那不是為了給予農民土地，而是為了城市可投資於土地，當土地成為一種市場商品以後。

城市在破壞舊莊園的耕種制度方面所起的這項作用，特別在多斯加納和倫巴第，有着顯著的效果，因此農奴的人身地位和土地的租賃形式都有了改變。

在布里西亞，1303 年曾建立一個專局來幫助圈圍土地和取消公地。的確，

在那里不久就兴起了一相当大的土地市場，在十三世紀的意大利，也有着相当大的土地需要。事实上，在十四至十五世紀，意大利所进行的革命，很象十六世紀英国所碰到的革命那样，就是，城市資產階級地主替代了貴族地主，短期租賃制和分种制度替代了永佃制，土地分成为接連的租地，依靠工資的农业劳动阶层逐渐兴起，农业方法获得了巨大改进。^①

新貴族和富裕資產階級，是土地的主要购买者。在十三世紀，甚至有很多旧农奴，现已成为自由人，殷切希望自由耕地，他們也购买了土地。城市周围的土地价值，增加得最多，因为在那里，人口的增长使蔬菜种植变为有利，或因为富商巨子要在那里建立乡村別墅。

生活标准的提高和物价的上漲对上层階級的打击比对下层階級要沉重。因为象亚当·斯密士所早已指出的那样，“必需品的价格，并不象奢侈品那样地跟着一个国家內財富的增減而漲落着的”。其間的比率，是变动性的而非經常性的，因而市場情况是有益于普通人方面的。或者，象有人說过，“由于需要奢侈品，因而需要金錢，正是这种願望起着溶剂的作用，使旧秩序完結而产生了一种新秩序……于是，賤农制度就从地面上被抹去了”。^②

到了 1300 年，欧洲的旧庄园制度已变为有名无实；它已是旧时庄园的一个單純的框框儿、一个空壳、一个骨架。新的經濟和社会力量已磨灭了它的实体，象风雨的力量侵蝕了一座建筑物那样。即在庄园苟延残喘的地方，它也和过去不同：它是另一样子的一个新的經濟单位，有着另一样子的新的經濟，另一样子的新的社会結構。

到了 1300 年，中世紀农民的情况和他在 850 年时的情况，已

① 上面两段引文，摘自《經濟杂志》，第 21 卷，第 435 頁（科伐勒夫斯基的一篇书评）。

② 卡里尔：《貨幣史》，第 257 頁。

經大不相同，當然，儘管還有落後的地區。事實是：歐洲社會從第九世紀以來經常在流動和變化的狀態中。“在 1300 和 1100 年時，都有農奴制的存在，但這個名詞在前一時期與在後一時期，有着很不相同的涵義……時間是有利於農奴的”。^①

有人常常說，中世紀歐洲貨幣經濟的出現是遲晚的；這種經濟推論之所以產生，是因為膚淺地檢視資料的緣故。中世紀莊園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单位，因而不需要也不知道什麼貨幣經濟，準確地說是在什麼時候呢？這類概括性的論斷，是需要縝密審查的。就莊園執行吏的紀錄看來，我們找不出在十三世紀中那項特殊革命痕迹，就是，以貨幣經濟來代替莊園的自然經濟革命痕迹。在十字軍運動開始之前，貨幣經濟的興起已經顯著。很多資料指明：在中世紀歐洲，一種貨幣經濟在早期已經出現，雖然據故費諾格拉道夫教授的話，“在中世紀時代，自然經濟和現款交易之間的鬥爭，不能以正確的年代差別來規範的”。

關於許多其他中世紀經濟史上的問題，我們可以說它們不可能有固定的日期或單純解決辦法。貨幣的購買力、主要物品的價格、工資和俸給的數額、賦稅的負擔，依今天這類標準來看，是很難決定的事情。當然，貨幣的購買力在中世紀時代比在今天要大。但大到多少呢？為了比較的目的，如果說“一”代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貨幣購買力，那麼，850 年的貨幣購買力可能大到九倍，而 1200 年的購買力大到四點五倍。但真正重要的問題，是那個時候的購買力對標準商品價格的比率。的確，從第九世紀到 1300 年時，貨幣的價格是漸漸下降的。

利凡得國家，除了黃金及象布匹這類的少數商品以外，不願接受什麼別的東西作為對它們輸入歐洲貨物的付款；所以，西歐所有

① 庫普蘭：《聖柏騰寺院史》，第 95，147 頁。

的黃金是經常在流出。另一方面,當十字軍運動開始的時候,無限量的窖藏白銀被投入西歐市面上,此外,還有大量白銀器皿和金屬塊被熔化而鑄成了貨幣。理查一世的贖身金,大部是從宗教團體的器皿得來的。結果,西歐出現了白銀過多的現象,而白銀對黃金的比價經常在波動,並徐徐在下降。在第一次十字軍時代,黃金和白銀之間,這種不穩定的比率是顯著的,因而一次又一次地變更了鑄幣。例如,1103年,一本古老的編年史上寫道:“在這一年,局勢很艱難,而銀幣按照對黃金的比率而更動並重行鑄造過。”九年以後,在1112年,我們看到:“再次改動了貨幣而其他〔輔幣〕也按新分量鑄成”,就是,按白銀對黃金的新比率鑄成。第三次在1120年,記載上說,“在11月更動了貨幣”。由此可見,在十七年時期中,曾有过三次不同的貨幣貶值。卑鄙的統治者,象法王腓力一世那樣,曾力圖彌補自己的亏空;他以黃銅摻入白銀貨幣內來欺騙人民;基柏特·得·諾戎寫道:“所以,由於這項行為,很多人陷於貧困,而很多人迅即破產。”^①

① “一般使用的通貨是銀便士通貨,而鎊是一個記帳的名詞,等於二百四十個銀便士。計算是以重量為基礎,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為‘金衡制’。二十便士重量,作為一盎司,十二盎司作為一鎊。但貨幣的中間階段的價值,在它們最後穩定以後,被轉換了,所以在十二世紀象現在一樣,十二便士作為一先令而二十先令作為一鎊。但重量的觀念還未被遺忘……八盎司作為一‘馬克’。但沒有相應於這些單位名稱的任何一種的硬幣(就是,既沒有馬克,又沒有先令和鎊)……黃金對白銀的比例……是九比一(在十二世紀),一盎司黃金等於十五先令而一個金馬克等於六鎊。但鎊、馬克和盎司都不是硬幣……指英國銀便士的諾曼名稱,是‘伊斯脫林’。早在1100年左右,它已出現。當時,有必要來使用一個特殊的名稱,因為英國便士價值等於兩個里曼便士,等於四個盧昂、翁熱和都爾便士。這個名稱的意義未詳,但它顯然和東方商人即日耳曼商人沒有什麼關係,象許多書上所說的那樣。這個詞在拉丁文作為‘sterlingus’或‘sterlingo’;到十三世紀後半期,它意味著一個英國便士……小銀幣是半便士……有時還使用一種外國金幣,即‘貝占’。……‘貝占’(或奧利阿)據一般人說,是拜占庭的‘蘇里德’,它通過商人的交易而被帶入了西歐。它有時為了修詞關係,也叫做‘達倫’。但可能這個名詞也指那最先由西西里國王羅哲爾二世在1140年所鑄的‘德干’(ducat)幣;‘德干’這名稱是從幣上題跋‘Dux Apuliae’得來的。”——史坦利·蘭蒲爾:《十二世紀的財政部》,第88頁。

补救的办法，当然是在西欧建立金本位的措施。但在十三世紀後半期之前，就是，在諾曼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薩以及后来的法国采用金币之前，这一办法是不可能实行的。新財政的錯綜复杂性、信貸制的精細的运用、課稅新形式的問題，对那些世代來說，是困惑不解的，因而欧洲政府还需要学习这些有关的基本原則。

銀币的貶值是一个負担，在西欧有着大量白銀在流通，而它的价值是按黄金估价的；所以，在危急情势下，需要庞大数額的白銀来支付債款。这一情况，可以 1250 年圣路易在曼苏拉战役被俘后所付贖身金的事例來說明。“〔法人〕曾以这样大量的‘达伦’币和科伦的通用币〔不是巴黎或都尔的劣币〕，送給法王；他們需用十一輛馬車来裝載它，每輛用四匹强壮的馬來拖拉到海岸去，而后把它裝載到一只热那亚船上，最后送往法王那里。当时，每輛馬車运着为运現款而特制的两只鉄箍的桶子，里面并裝滿着上述的現款”。当这庞大現款运到达米伊塔的时候，法王特为此抱歉地說，“我們西方人沒有这样多的黄金，象你們東方人那样”。

中世紀欧洲的新旧情况，反映在土地价值的差別上。当我们試以自由地或长期租地的价值同庄园土地相比較的时候，我們可看出后一項土地的价值比前一項土地低得很多。有关德意志的若干数字似乎指出：这项价值上的差額，在十二世紀是百分之三十三而在十三世紀則加倍了；換句話說，自由地或租地的价值比庄园地要高出百分之三十三到百分之六十六。

十三世紀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十至十一世紀的固定情况，形成了一个鮮明的对照。騎士与貴族、香客与十字軍士、流动的負販与商人集团的經常移动，虽久已成为司空見慣的景象，但现在我們可看到下列新现象：自由农民在收获时期，成群結队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做工，按日收取工資；他們甚至在收获的紧要关

头,以“罢工”手段来要求較高的工資,因为在那个时候,地主几乎不惜任何代价要搶收他的已熟的庄稼,否則他将遭受很多損失。最可令人奇怪的,是城市工人在收获时期也赶到农村去做工。

虽然上面所說的农民阶级情况的改进是起于許多經濟与社会的影响——旧式封建經濟的崩潰、固定地租和其他的改变以及由于人口的增加和那构成巨大消費阶层的新资产阶级的繁荣而兴起了的农产品市場——但我們却不应不注意到:农业上的改进未曾跟上其他活动上的改进,农民从高物价比从較好的农作方法所得的要多。可是,如果认为在农作方法方面没有什么进步,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看到:增加使用牲畜粪和泥灰石作为肥料——在海岸上使用腐烂的水草——越来越多地放弃單純的休耕地制,扩展三田制而日益减少两田制度,愈益普遍地采用谷物輪种制,合并土地在一起的情况开始徐徐替代了旧庄园土地分散的情况。在革新农具方面,所作的成績最少。但这一情况繼續到近代时期为止。至于土壤枯竭的說法,是不能予以証实的。我們所可获得的間接資料——因为沒有办法来获得直接的比較資料——是不会支持土壤枯竭递增这一說法的。“如果說人类由于土壤枯竭而更难获得食料,那么,我們怎样能够說明那些并不增加食料供应的工商业的扩张呢?又为什么工資会上漲呢”?又如果农业情况如此不利,怎样来解释人口的稳定增长呢?

在十二至十三世紀,欧洲所遭受的深刻轉化与改变,不能不引起当时有思想的人們的注意。值得指出:象在十二世紀基柏特·得·諾戎、弗夫賴辛的鄂图、紐堡的威廉和在十三世紀罗哲尔·培根、圣托馬斯·阿奎那与罗柏特·格洛塞特斯特这一輩有能力的作家都曾觉察到这些轉变。甚至喜空談的哲学家也曾認識到这一点。这一时代,对于奥古斯丁派哲学和陈腐的神学理論的兴趣,已明显地降低,同时希望有一种更切实际而又更具体的思想。人类

已不再能容忍末世學^①的觀點和天啟的動機，而要求某種更切實際、更具体的東西，某種更能够应用于現世的東西。活潑的思想家注意于社會和社會里所發生的改變。我們看到資料可表明他們日益大胆地批判政府、抗議經濟的特權、宗教與思想的權威。在十三世紀，邏輯與實驗科學之間存在着密切的聯繫，同樣，在哲學與社會有機體之間也可看到一種聯繫。聖托馬斯·阿奎那是一個偉大的玄學家，是一個使奧古斯丁派神學與亞理斯多德哲學相協調的學者；甚至他也相當注意城市的興起，來評論一個城市的適當地點和農業與商業作為城市富源的相對利益。聖微克多·雨果注意到十二世紀的最高神秘性，制定了人類在精神和物質文明上一種進步性的演化理論，在他的學說中特別強調經濟、政府與歷史。他因為生活在自由工匠、自由手工業者脫離農奴狀態的時期，在行會正在形成的時期，極其注意這些新活動與新組織；他竟至按學校中的“七種自由藝術”即“三種藝術”和“四種藝術”^②的形式來把機械技術分類。所以，他標出土地種植、食品科學和醫學屬於前一类；服裝、制甲冑、建築和——注意它的重要性——商業屬於第二類。如果我們稍微思索一下，這種社會思想在中世紀時代並對中世紀時代是和近代思想在近代時期同樣地適合而又有力量的。

近代社會的根源是深深地扎根于中世紀時代的歷史里。中世紀歷史是近代所承襲的遺產。不應該認為它是與我們無關的東西。它的文明在多方面已滲入了我們的文明里。正象歌德說道：

你們叫做時代精神的东西，
只是你們大家的精神，
這精神反映了時代。

① 指研究死亡、末日審判、靈魂不滅、世界終極等等的學說。——譯者

② “三種藝術”包括文法、論理和修詞，“四種藝術”包括算術、音樂、幾何學和天文學。——譯者

参考书目提要*

导 論

关于中世紀文明内容与价值的参考讀物:

湯普逊 (Thompson, James Westfall): 《中世紀史参考书》, 第1編, «导論»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23年); 亚当斯 (Adams, G. B.): 《中世紀时代的文明》, 第1—2章; 斯达布斯 (Stubbs, W.): 《中世紀与近代史十七次講演集》, 第9—10章; 泰罗 (Taylor, H. O.): 《中世紀的心理》, 第1卷, 第1章; 刻尔 (Ker, W. P.): 《黑暗时代》, «导論»; 索特威尔 (Shotwell, J. T.): 《中世紀时代》, «英国百科全书》, 第11版; 赫因萧 (Hearnshaw, F. J. C.): 《中世紀对近代文明的貢獻»; 欧坎 (Eucken, Rudolph): 《近代思想的主流》, 第331—344頁; 士特 (Tout, T. F.): 《中世紀史在教学上的地位》, 載《历史》杂志, 新編第4卷; 柏耳 (Burr, G. L.): 《关于中世紀时代》, 載《美国历史評論》, 第17卷, 第714頁, 第20卷, 第813頁; 刻特根 (Keutgen): 《論在美国研究近代欧洲国家早期历史的必要性》, 載《美国历史学会年报》, 1904年, 第94頁; 桑达克 (Thorndike, E. L.): 《文明的簡史》, 第6卷; 布洛奇 (Bloch): 《上中世紀的社会》, 載《学术杂志》, 1926年11月号; 华尔夫 (Wolff, G.): 《論大陆上羅馬文化与中世紀早期文化的联系》 (《关于法兰克福艺术与古物的文集》, 第1卷, 1908年); 《文化史文庫》, 第16卷 (1925) (論文集)。

第一章 羅馬帝国

英文著作分类书目:

湯普逊: 《中世紀史参考书》, 第1編, 第1—8頁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23年)。

一般著作:

* 罗斯托甫切夫 (Rostovtzeff, M.): 《羅馬帝国的社会經濟史》 (牛津, 1926年); 吉本 (Gibbon, Edward): 《羅馬帝国衰亡史》; 柏立 (J. B. Bury)

* 除非在1900年前刊行, 照例不注明出版日期。

版, 伦敦, 1900 年, 第 1—4 卷(柏立的注释与附录, 很有价值); 尼尔森(Nilson, Martin): 《帝国罗马》; 度律伊(Duruy, Victor): 《罗马人史》, 第 4—8 卷(英译本); 霍治金(Hodgkin, Thomas): 《意大利和它的侵犯者》, 第 1—2 卷; 法兰克(Frank, Tenney): 《罗马的帝国主义》; 琼斯(Jones, H. Stuart): 《罗马帝国》; 布奇尔(E. S. Bouchier)著有下列著作: 《罗马属非洲的生活与文学》; 《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西班牙》; 《作为一个罗马省的叙利亚》; 米伦(Milne, J. G.): 《罗马统治下的埃及》; 格累姆(Graham, A.): 《罗马属非洲》(罗马占领北非的纲要)。

帝王传记:

伽德豪森(Gardhausen): 《奥古斯都》; 塔维尔: 《提庇留》; 微拉里奇: 《加力古拉》; 汉德森(Henderson, B. W.): 《尼禄》; 柏奇(De La Berge, C.): 《图拉真》; 格列高罗微厄(Gregorovius, F.): 《哈德良》; 拉库尔(Lacour Gayet, G.): 《安多尼虔诚者》; 瓦特孙(Watson, P. B.): 《马卡斯·奥理略》; 普拉特瑞尔(Platnauer, M.): 《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 霍普金(Hopkins, R. V. N.): 《亚历山大·塞弗拉斯》; 克里斯(Crees, J. H. E.): 《普洛巴斯》; 荷摩(Homo, L.): 《奥利连》; 普垒斯(Preuss): 《戴克里先》; 斐司(Firth, J. B.): 《君士坦丁》; 伽德纳(Gardner, B. M.): 《哲学家兼皇帝朱理安》; 尼格里: 《朱理安叛教者》。

商业:

*蒙森(Mommsen, Theodor): 《罗马省分》, 第 2 卷(英译本); *查理华兹(Charlesworth, M. P.): 《罗马帝国的商路与商业》(1924 年); 马瓜特(Marquardt, J.): 《罗马帝国的组织》(1881 年); 马瓜特: 《财政》与《军事》(两篇均见蒙森与马瓜特: 《古代罗马手册》, 1884 年, 这项文献有法译本, 共十七卷; 第 9—10 卷概述省分); 亚诺尔(Arnold, W. T.): 《罗马省行政制度》; 散狄斯(Sandys, J. E.): 《拉丁研究的辅导书》, 第 644—648、659—671 节; 比斯涅(Besnier): 《罗马商业》, 《学术杂志》(1920 年)。

罗马和东方的商业:

*赫茨(Hirth, F.): 《中国与罗马东方(1885 年)》; *罗灵逊(Rawlinson, H. G.): 《从太古到罗马灭亡时期印度和西方世界的来往》, 第 6—8 章; *叔夫(Schoff, W. H.): 《红海的周围》; 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柏立版, 第 4 卷, 第 534—535 页; 苏特希尔(Soothill): 《中国与西方》; 威廉(Williams, E. T.): 《昨天与今天的中国》, 第 16 章; 帕刻(Parker, E. W.): 《中国史》, 第

41—50 頁; 叔夫:《沙勒的以錫多的帕提亞站》(The Parthian Stations of Isidore of Charax); 海格(Haig, M. R.):《印度河三角洲》,第 25—33 頁; 克拉克(Clark, W. E.):《古典語言學》,第 15 卷(1920 年),第 11—22 頁; 華明登(Warmington, E. H.):《羅馬帝國與印度間的商业》(1927 年); 庫雅特(Couyat):《希臘羅馬人的紅海港口》,載《藝術學院報告》(1910 年),第 525 頁及以下。

工業與團體:

* 瓦爾貞(Waltzing, J. P.):《羅馬人的職業團體》(1896 年),第 2 卷;
* 威斯脫曼(Westermann, W. L.):《古代貿易》,載《美國歷史評論》,第 23 卷,第 102 頁; * 布朗(Brown, W. A.):《第四世紀國家的工業管理》,載《政治學季刊》,第 2 卷,第 494 頁; 霍普金:《亞歷山大·塞弗拉斯》,第 151—153 頁; 提爾(Dill, S.):《從尼祿到奧理略時代的羅馬社會》,第 2 卷,第 3 章; 達倫堡和薩利奧(Darembourg and Salio):《古代詞典》,詞目:《團體》; 阿博特(Abbott, F. F.):《古代羅馬的平民》,第 205—233 頁; 勒南(Renan, E.):《使徒傳》,第 268—274 頁; 度律伊(Duruy, V.):《羅馬人史》,第 8 卷,第 32—37 頁。

農業:

* 亥特蘭(Heitland, W. E.):《農民》,第 336—459 頁; 瓊斯:《古代羅馬的土地問題》,載《愛丁堡評論》,第 224 卷,第 60 頁; 罕廷吞(Huntington, Ellsworth):《氣候轉變與農業枯竭是羅馬滅亡的因素》,載《經濟學季刊》,1917 年 2 月号; 法蘭克(Frank, Tenney):《羅馬經濟史》,第 6, 16 章; 辛克霍維奇(Simkhovitch, V. G.):《再論羅馬的滅亡》,載《政治學季刊》,第 31 卷,第 201 頁; 瓊斯:《羅馬史的輔導書》,第 304—315 頁; 威斯特曼:《一個埃及農民》,載《威斯康辛大學語言與文學研究叢刊》,第 3 卷。

隸農制:

* 佩蘭(Pelham, Henry):《帝國莊園與隸農制》; * 羅斯托甫切夫(Rostovtzeff):《羅馬隸農制史的研究》(萊比錫, 1910 年); * 佛斯特爾(Fustel de Coulanges):《羅馬隸農制》(見《歷史上若干問題的研究》, 1885 年); * 費諾格拉道夫(Vinogradoff, P.):《莊園的成長》,第 1 卷; * 塞克(Seeck, O.):《隸農制》,見保利-威沙瓦(Pauly-Wissowa):《不動產百科全書》; * 羅斯托甫切夫:《隸農制》見《政治學詞典》,第三版; * 波杜溫(Beaudouin, E.):《羅馬帝國的大莊園制》(1889 年); 亥斯脫堡(Heisterberg, B.):《隸農制的起源》(萊比

錫,1876年);哈第(Hardy, E. G.):《羅馬隶农制》;舍格累(Segre, G.):《羅馬隶农制起源与发展的研究》,见《司法档案汇编》,1889—1891年;雪尔頓(Schulten):《羅馬庄园》(参閱[德国]《历史杂志》,第42卷);密斯波勒(Mispoulet):《羅馬隶农制》,載《学术杂志》,1911年,5月号;谷米拉斯(Gummerus):《隶农的劳役》(赫尔辛福斯,1906—1907年);蒙森,见《黑梅斯》(Hermes)杂志,第19卷(1884年);科伐烈甫斯基(Kovalevsky, M.):《欧洲的经济史》,第1卷(1905年)。

帝国庄园:

*希斯(His):《羅馬帝国时代的庄园》(1896年);*佩兰(Pelham, H.):《帝国庄园和隶农制》;荷摩(Homo, L.):《羅馬帝国庄园的起源与发展》,載《考古学与历史杂志》(1898年);赫斯斐尔德(Hirschfeld):《古代史的研究》,1902年;佛耳内(Fournier),[法国]《历史評論》(1882年)。

羅馬的地主貴族:

除了上引关于农业、隶农制和帝国庄园的著作外,参閱:

*波杜溫(Beaudouin, E.):《封邑制度起源的研究:委身制与領主的司法权》,格勒諾布尔(Grenoble):《高等教育年鉴》,第1卷,第1期(1889年);*波杜溫:《羅馬帝国的大庄园》,載《法律史新評論》,1897年,第543頁及以下(附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录),1898年;*佛斯特尔(Fustel De Coulanges):《自由地与乡村庄园》(特別注意第1—97頁);*朱留塔(Zulueta, F. De):《后期羅馬帝国的庇护制》,见《牛津社会与法律史丛书》,第1卷(1909年),第二篇論文;法拉契(Flach, J.):《古代法国的起源》,第1卷;勒克利文(Lecrivain, C.):《自戴克里先以后的羅馬元老院》,(1888年);罗德柏特斯(Rodbertus):《皇帝时代的羅馬农业发展》,載《喜尔得布兰年鉴》,第206,293頁。

城市制:

*黎德(Reid, J. S.):《羅馬帝国的市政制度》,特別注意第13—14章;*提尔(Dill, S.):《从尼祿到奥理略时代的羅馬社会》,第2卷,第2章;华德-佛勒(Warde-Fowler, W.):《希腊人与羅馬人的城邦》;散狄斯(Sandys):《拉丁研究的輔導书》,第542—563节;《劍桥中世紀史》第1卷,第553—557頁;度律伊:《羅馬人史》,第6卷,第83章。

賦稅制:

散狄斯:《拉丁研究的輔導书》,第498—519、556—563节;亚諾尔:《羅馬省行政制度》,第6章;費諾格拉道夫:《庄园的成长》,第52—83、104—113頁;《劍桥中世紀史》,第1卷,第38—44頁。

羅馬帝國內的東方影響:

丘蒙(Cumont, F.):《羅馬異教中的東方宗教》; 提爾:《從尼祿到奧理略時代的羅馬社會》,第4卷,第5—6章; 提爾:《西羅馬帝國的最後百年》,第3—26,74—112頁; 勒啟(Lecky, W. E. H.):《歐洲道德史》,第1卷,第2章; 海伊(Hay, J. S.):《驚人的皇帝赫力奧加巴拉(Heliogabalus)》,第8章; 霍普金:《亞歷山大·塞佛拉斯傳》,第1—2章; 勒格(Legge, F.):《基督教的先驅與競爭者》,第2卷; 普拉特瑙爾(Platnauer, M.):《皇帝塞普替密斯·塞佛拉斯傳》,第9章。

戴克里先的價格詔令:

*蒙森:《王家薩克森學會的報告,哲學歷史組》,1851年; 窩定吞(Waddington):《倫理與政治科學院的會議與工作報告》,第38卷; 洛林(Loring):《希臘研究雜誌》,第2卷,(1890年); 赫爾茨(Hultsch):《語言學與教育學的新年鑑》,第121卷(1880年)。

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

*塞克(Seeck, O.):《古代世界衰落史》,第三卷,柏林,1895—1909年,第二版,第1—2卷和兩篇補充論文,1898—1911年(對整個問題的最深刻的研究; 關於這著作的書評,見[德國]《歷史雜誌》,第58和84卷;《社會經濟季刊》,第16卷;《拜占廷雜誌》,第23卷;《英國歷史評論》,第4卷); *羅斯托甫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 *羅斯托甫切夫:《希臘化時代埃及社會經濟生活的基础》,載《埃及考古學雜誌》,第6卷,第161頁; 貝爾(Bell, H. Idris):《文明的衰落》,同上,1924年,第207頁及以下; *費諾格拉道夫,見《劍橋中世紀史》第1卷,第19章; *威斯脫曼:《古代文化的經濟基础》,載《美國歷史評論》,第20卷,第723頁; *亥特蘭(Heitland, W. E.):《羅馬的命運,一篇解釋的論文》; *貝爾:《拜占廷在埃及的奴役統治》,載《埃及考古學雜誌》,第4卷,第86頁; *法蘭克:《羅馬帝國內種族的混雜》,美國歷史評論:第21卷,第689頁; 辛克諾維奇(Simkhovitch):《再論羅馬的滅亡》,載《政治科學季刊》,第31卷,第201頁; 度律伊:《羅馬人史》,第8卷,第364—382頁; 柏立(Bury, J. B.):《後期羅馬帝國》,第1卷,第1冊,第3—4章; *提爾:《西羅馬帝國最後百年中的羅馬社會》,特別注意第3卷; 霍治金(Hodgkin, T.):《意大利和它的侵犯者》,第1卷,特別注意第2編; 馬文(Marvin, F. S.):《西方種族與世界》,第4章(由瓊斯執筆); 勒啟:《歐洲道德史》,第1卷,第2章; 墨累(Murray, Gilbert):《希臘宗教的四個階段》,第3章; 泰羅(Taylor, H. O.):

《古代理想》，第2卷，第1—96頁；霍治金：《羅馬的灭亡》，載《現代評論》，第73卷(1898年)，第59—70頁；薩爾維奧利(Salvioli)：《蠻族侵犯前后的意大利狀況與人口》，巴勒摩，1900年；比倫納(Pirenne, J.)：《布魯塞爾大學評論》，第18卷，第555頁(一篇出色的綜合解釋意見的論文)；凱塞爾巴赫(Keiselbach, W.)：《中世紀時代世界商業經營和歐洲人民生活的發展》(斯圖伽特，1860年)。

第二章 羅馬帝國內的教會

廣泛的參考書目：

《劍橋中世紀史》，第1卷，第624—643頁(倫敦，1911年)。

英文著作分類書目：

湯普遜：《中世紀史參考書》，第1編，第9—20頁。

下面只能列出一張關於大量著作的簡表：

*哈那克(Harnack, A.)：《基督教的傳教師團與擴張》，二卷；*拉姆塞(Ramsay, W.)：《羅馬帝國的教會》；*哈茨(Hatch, Edwin)：《早期基督教會的組織》；*《劍橋中世紀史》，第1卷，第4—6章；*提爾：《西羅馬帝國最後百年中的羅馬社會》，第1卷，第1—4章，第2卷，第1章；丘蒙(Cumont, F.)：《羅馬異教中的東方宗教》，特別注意第8章；度申(Du Chesne, L.)：《基督教會的早期歷史》，三卷；哈第：《基督教與羅馬政府》；卡爾(Carr, A.)：《教會與羅馬帝國》；格洛維爾(Glover, T. R.)：《羅馬帝國的宗教衝突》；赫特曼(Huttman, M. A.)：《確定基督教為國教》，載《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叢刊》，第60卷；柯爾曼(Coleman, C. B.)：《君士坦丁與基督教》，載同上叢刊，第60卷；波德(Boyd, W. K.)：《狄奧多西法典的宗教詔令》，同上叢刊，1905年；斐司(Firth, J. B.)：《君士坦丁》；柏立：《從狄奧多西到查士丁尼時代的後期羅馬帝國》；烏德華(Woodward, E. L.)：《後期羅馬帝國的基督教與民族主義》。哈維特(Havet)：《朱理安》，見[法國]《歷史評論》，第6卷(1878年)。

第三章 蠻族世界和大移動

廣泛的參考書目：

《劍橋中世紀史》，第1卷，第649—653頁；藍普勒赫(Lamprecht)：《德國史》，第12卷，第86—95頁。

英文著作分類書目：

湯普遜:《中世紀史參考書》第1編,第21—29頁。

关于影响大移动的因素:

*皮特里(Petrie, W. Flinders):《民族移动》,載《人类学学院杂志》,第36卷(1906年),第189頁(附有出色的地图);*威脫謝姆(Wietersheim):《民族移动史》,新版,由丹恩(Dahn)出版,二卷,1880—1881年;*帕尔曼(Pallmann, R.):《民族移动史》,1863年;*藍普勒赫:《法兰克人在萊茵兰的殖民与移动》,載《西德杂志》,第1卷(1882年),第123頁;*佛斯特尔(Fustel De Coulanges):《日耳曼人的侵入》;杜普西(Dopsch, A.):《欧洲文化发展的經濟社会基础》二卷,1918年;亞諾尔:《日耳曼人的原始时代》,第3版,1881年;柏特曼-霍尔威(Bethmann-Hollweg, M. A. Von):《論日耳曼人的移动》1850年;高普(Gaupp, E. T.):《日耳曼人的移民与土地分配》北勒斯劳,1844年;瓦刻那格尔(Wackernagel):《日耳曼人的商业与航运》,載《考古学杂志》,第21卷(1853年),第553頁;李希脫(Richter, H.):《西羅馬帝国,特別是在格累細亚、瓦伦丁尼安二世和馬克息馬斯时代》,1865年;斯密特(Schmidt, L.):《日耳曼部族在大移动前的历史》,1902年;海斯(Hayes, C. H. C.):《关于日耳曼族大移动的資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霍治金:《羅馬帝国在萊茵河与多瑙河間的屏障》,伊力安那(Aeliana):《考古学杂志》,新編,第9卷,第73頁。

早期日耳曼制度:

关于批判研究这个問題的近代著作:

*阿士力(Ashley, W. J.):《历史和經濟的概論》,第115—136,161—166頁;佛斯特尔:《土地所有权的起源》(阿士力夫人的譯本);西波姆(Seeböhm, F.):《英国农村公社》,特別注意第9章;拉普斯利(Lapsley, G.):《土地所有权的起源》,載《美国历史評論》,第3卷,第426—446頁;关于《羅馬派》与《日耳曼派》的爭論,閱讀下列关于庫兰治(Coulanges)的討論,可获得最好的理解。參閱:琴克斯(Jenks)的文章,載《英国历史評論》,第12卷,第209頁;斐雪尔(Fisher, Herbert)的文章,同上,第5卷,第7頁;厄尔登(Elton)的文章,同上,第1卷,第427頁;达勒斯特(Dareste)的文章,載《学术杂志》,1886年,10月号;印巴特(Imbart De la Tour)的文章,載《通訊报道》,1905年3月25日;摩諾德(Monod)的文章,載[法国]《历史評論》,第61卷;亚布阿(Arbois de Jubainville):《两种編写历史的方法》(相反意見);費諾格拉道夫:《庄园的成长》,第114頁及以下;格劳德(Guiraud):《佛斯特尔·

得·庫兰治》(Fustel de Coulanges), 1896年, 和他的一篇論文, 載《伦理与政治学院的會議与工作报告》, 第166卷(1896年), 第287頁; 肯尔(Kehr)的文章, 載[德国]《历史評論》, 第71卷(不公正的意见); 古治(Gooch, G. P.): 《十九世紀历史学与历史家》, 第208—213頁。

“蛮族”侵犯的性质:

*提尔:《西羅馬帝国最后百年时期的羅馬社会》, 第4卷; *佛斯特尔:《日耳曼人的侵犯》; *利奥太特(Leotard, E.):《論第四世紀定居在羅馬帝国内蛮族的情况》, 1873年; 孟祿和塞勒利(Munro and Sellery):《中世紀文明史》: 第50—59頁; 賴維斯(Lavisse, E.):《法国史》, 第2卷, 第1編, 第61—67頁; 海斯(Hayes, C. H. C.):《日耳曼人侵犯……的导論》, 第7—8章; 阿士力:《經濟和历史概論》, 第137—143頁(书評); 塞波姆:《英国农村公社》, 第272—288, 316—366頁; 霍治金:《意大利和它的侵犯者》第2—3卷(散漫的叙述); 奥比茨(Opitz):《羅馬帝国内的日耳曼人》, 1867年; 斯塔克尔(Stackel):《羅馬帝国内服务的日耳曼人》, 1880年; 高普(Gaupp):《日耳曼人在羅馬帝国省区内的移民与土地分配》, 1844年; 布洛奇(M. Bloch):《上中世紀的社会和它的起源》, 載《学术杂志》, 1926年11月号; 休馬赫(K. Schumacher):《从原始时代到中世紀时代的萊茵兰殖民与文化史》, 二卷, 1921, 1925年; 华尔夫(Wolff, G.):《大陆上羅馬文化和早期中世紀文化的联系》, (1908年)。

第四章 日耳曼王国

一般参考书目

《剑桥中世紀史》, 第1卷, 第654—655, 658—659, 671—675頁; 湯普逊:《中世紀史参考书》, 第1編, 第25—31頁; 賴維斯和藍包德(Lavisse and Rambaud):《通史》, 第1卷, 第92, 95, 158, 272頁。

一般著作:

达恩(Dahn, F.):《日耳曼人的国王》, 第1—2卷(1861年), 第3—4卷(1866—1871年), 第5—10卷(1894—1907年); 馬特洛伊(Martroye, F.):《拜占廷时代的西方: 哥特人和汪达尔人》, 1904年; 賴維斯和藍包德:《通史》, 第1卷, 第2—3, 5章; 霍治金:《意大利和它的侵犯者》, 八卷; 吉本:《羅馬帝国衰亡史》, 第1—2卷; 柏立:《后期羅馬帝国》, 第1卷; 卫茨(Wirth, Max):《日耳曼人建国时代的德国史》, 1862年[有一种法文譯本, 由克隆布拉格(Crombrugghe)翻譯, 书名是《日耳曼国家的建立史》, 二卷, 巴黎, 1873年]。

西班牙的西哥特人:

*霍治金的文章,載《英國歷史評論》,第2卷,第209頁; *蕭烏(Shaw, R. D.)的文章,同上,第21卷,第209頁; *達恩:《西哥特人的商業和商業法》,載《商法雜誌》,第16卷(1871年),第387頁;《劍橋中世紀史》,第2卷,第6章;弗利曼(Freeman, E. A.):《第五世紀的西歐》,第171—287頁;高普:《日耳曼人的移民和土地分配》,第372—414頁;伊維爾(Yver, G.):《西哥特國王歐里克》,見《摩諾德研究》(1896年),第11—46頁。

非洲的汪達爾人:

*斯密特:《汪達爾人史》,1901年;霍治金:《意大利和它的侵犯者》,第2卷,第241—290頁;雷克勒克(Leclercq, H.):《基督教的非洲》,第2卷,第143—213頁;斐勒爾(Ferrer):《從第四世紀末期到汪達爾人的侵入時期羅馬非洲省的宗教狀況》;那都塞斯(Nathusius):《漫遊僧侶教派(Circumcellionen)的特征》(格萊福華,1900年)。

匈奴人與阿提拉:

*《劍橋中世紀史》,第1卷,第3章(傑作);霍治金:《意大利和它的侵犯者》,第2卷,第2冊;帕刻(Parker):《韃靼人的千年史》,第1卷;尉利(Wylie):《古代匈奴人和中國的關係》,載《考古學院雜誌》,第5卷,第452頁,第6卷,第41頁,第9卷,第53頁,第10卷,第20頁。

關於中亞細亞乾燥氣候,作為匈奴人的西侵及他們與中國關係的一個因素這項理論,參閱罕廷吞:《亞洲的脈搏》;還參閱《氣候與歷史》,載《美國歷史評論》,第18卷,第34頁。

狄奧多理東哥特人:

*霍治金:《意大利和它的侵犯者》,第3卷; *霍治金:《狄奧多理東哥特人》;勒克利文(Lecrivain, C.):《戴克里先以後的羅馬元老院》;柏立:《後期羅馬帝國》,第1卷,第4編;弗利曼:《哥特人在拉溫那》,見《歷史論文》,第三集;格列哥洛維斯(Gregorovius, F.):《中世紀時代的羅馬城》,第1卷,第253—333頁;杜穆林(Dumoulin, M.),載[法國]《歷史評論》,1902年。

倫巴人:

*哈特曼(Hartmann, L. M.):《意大利人史》,第2卷; *羅曼諾(Romano, G.):《蠻族在意大利的統治》,第3卷(米蘭,1910年)《劍橋中世紀史》,第2卷,第7章;霍治金:《意大利和它的侵犯者》,第5—6卷;柏立:《後期羅馬帝國》,第2卷,第5編,第8章。

拜占廷意大利。伟人格列高里和教皇世袭领的形成:

*杜顿(Dudden, F. H.):《伟人格列高里》,第1卷,第295—320页; *度申(Duchesne, L.):《教皇世俗权的开始》; *底尔(Diehl, C.):《拜占廷在拉温那总督区行政制度的研究》; *蒙森:《格列高里一世时代的教会财产的管理制度》,见《社会经济杂志》第1卷(1893年),第43—59页; *爱瓦尔德(Ewald, P.):《格列高里一世的支出纪录的研究》,见《德国古代史学会的新文库》,第3卷,第433—625页(总结见霍治金文,第5卷,第333—343页); *法勃尔(Fabre):《第六世纪以前罗马教会的隶农》,载《历史与宗教著作评论》,第1卷,(1896年),第73—91页; 费诺格拉道夫:《庄园的成长》,第104,111页; 比杜温(Beadouin):《格列高里一世时代罗马教会的世袭领地》,载《法律史新评论》(1898年),第201—219页; 格力萨(Grisar, H.)的文章:见《天主教神学杂志》,第1卷(1877年),第321—360,526—563页; 霍治金:《意大利和它的侵犯者》,第5卷,第309—322页,第6卷,第446—449页; 格列哥洛维斯:《中世纪时代的罗马城》,第1卷,第178页,第2卷,第59—61,194,247,251—258,359—369页; 斯皮林(Spearing, E.):《伟人格列高里时代罗马教会的世袭领地》; 苏特克里夫(Sutcliffe, E. F.):《爱尔兰宗教纪录》,1921年7月;《剑桥中世纪史》,第2卷,第233—235页; 哈特曼:《意大利史》,第2—3卷; 科恩(Cohn, I.):《拜占廷总督在上意大利与中意大利的地位》。

第五章 寺院制度

广泛的参考书目:

《剑桥中世纪史》,第1卷,第683—687页。

英文著作分类书目:

汤普逊:《中世纪史参考书》,第1编,第45—50页。

埃及寺院制度:

*度申:《教会早期史》,第2卷,第14章; *《剑桥中世纪史》,第1卷,第18章; 布特勒(Butler, E. C.):《帕雷狄阿斯(Palladius)的路塞克史》,剑桥,1898—1902年; 雷克勒克(Leclercq, H.),词目:《修道生活》,见《基督教考古词典》(1910年); 瓦特生(Watson):《帕雷狄阿斯和埃及寺院制度》,载《教会评论季刊》,1907年4月号; 麦基安(Mackean, W.):《埃及第四世纪末期前的基督教寺院制度》。

圣巴錫尔和早期希腊寺院制度:

克拉克(Clarke, W.):《圣巴錫尔传》;伽德納(Gardner, Alice):《狄奥多好学者》;拉克(Lake, K.):《阿托斯山上(Mount Athos)早期的寺院制度》;多策(Tozer, H. F.):《阿托斯山游記》,載《教会評論季刊》,1912年;《巴錫尔时代的地方生活》,載《教会評論季刊》,第186卷,第420頁。

都尔的圣馬丁和早期高卢寺院制度:

巴斯(Bas, H.):《都尔的圣馬丁传》;喀則諾維(Cazenove, J. C.):《波亚叠的圣希拉利(Hilary)和都尔的圣馬丁》;庫拍-馬斯頓(Cooper-Marsden, A. C.):《阿尔茲主教凱撒》;庫拍-馬斯頓:《雷林(Larins)群島史》;霍尔姆斯(Holmes, T. S.):《高卢基督教会史》。

爱尔兰寺院制度:

*柏立:《圣巴特里克传》(胜过过去所有的传记);*齐麦(Zimmer, H.):《中世紀文化中的爱尔兰要素》;*普弗琉克-哈东(Pflugk-Harttung):《大陆上的古代爱尔兰人》(譯文),載《王家历史学会》,新編,第5卷,第75頁;麦尼尔(McNeill, J. T.):《凯尔特人的悔罪总則》;迈尔(Meyer, Kuno):《爱尔兰的学术》;瓦登巴赫(Wattenbach, W.):《德意志的爱尔兰寺院》,載《厄尔斯特考古学杂志》,第8卷,第227頁及以下;哈登(Haddan, A. W.):《爱尔兰传教师团在大陆上》,见他的《遺著》,第258頁;斯洛維(Slover, C. H.):《不列顛与爱尔兰之間早期文学上的交流》,載《德克薩斯大学英文研究》,第6期(1926年)。

圣本尼迪克与本尼迪克寺院团的传布:

卡脫(Carter, J. B.):《古代羅馬的宗教生活》,第8章;霍治金:《意大利和它的侵犯者》,第4卷,第5編,第16章;杜頓(Dudden, F. H.):《伟人格列高里》,第1卷,第109—115頁,第2卷,第160—173頁;托斯第(Tosti, L.):《圣本尼迪克传》,胡茲的譯本,伦敦,1896年。

寺院制度的經濟社會影响:

*馬力南(Marignan, A.):《法国文明的研究》,第1卷,《墨洛溫时代的社会》,第2卷,《墨洛溫时代圣徒的信条》;杜頓:《伟人格列高里》,第1卷,第296—320頁;第2卷,第173—201頁;布魯厄(Brewer, J. S.):《吉拉德·坎布伦塞斯(Giraldus Cambrensis)的全集导論》,第4卷(《案卷丛书》);孟祿和塞勒利:《中世紀文明》,第114—128頁;克宁汉(Cunningham, W.):《古代与中世紀西方的經濟文明》,第92节;克宁汉:《英国的工业和商业》,第1

卷,第33节。

第六章 东罗马帝国(395—802年),查士丁尼

广泛的参考书目:

《剑桥中世纪史》,第2卷,第720—727、747—757、766—769页。

英文著作分类书目:

湯普逊:《中世纪史参考书》,第1编,第33—36、58—60页。

商业与工业,赋税与财政:

*第尔(Diehl, C.):《查士丁尼与第六世纪前拜占廷文明》;*亥德(Heyd):《利凡得商业史》(1886年),第1卷,第1—24页;*柏立:《后期罗马帝国》,第1卷,第472页及以下;*柏立:《从狄奥多西到爱里尼(Irene)时代的东罗马帝国》,第1卷,第441—447页,第2卷,第316—333页;霍尔姆斯:《查士丁尼时代与狄奥多拉》,第1卷,第1—2章,第2卷,第9、12章;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柏立版,第4卷,第40章;《评论季刊》第73期,第346—376页。

欧洲与远东,中国和印度:

*赫茨(Hirth, F.):《中国与罗马的东方》;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4卷,第230—235、534—535页;苏特喜尔:《中国与西方》;察朴特(Chapot):《阿拉伯征服之前厖培在幼发拉底河的疆界》,1907年;狄尔曼(Dillman, A.):《从第四到第六世纪时代的阿克苏姆(Axum)帝国》,载《普鲁士王家学院学报》,1880年。

社会结构与状况:

*柏立:《后期罗马帝国》,第2卷,第3编,第1章;第6编,第6章;*第尔:《查士丁尼与第六世纪前拜占廷文明》;第尔:《拜占廷帝国史》;格勒海尔(Grehier, P.):《拜占廷帝国的社会与政治的演变》,二卷,1904年;赫斯林(Hessling):《论拜占廷文明》;貝納斯(Baynes, N. H.):《拜占廷帝国》。

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殖民地:

*《剑桥中世纪史》,第2卷,第14章;*柏立:《斯拉夫人在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殖民地的早期历史》(《英国学院的議事纪录》);*柏立:《后期罗马帝国》,第2卷,第114—144、274—280、331—338、450—458、470—476页;柏立:《从狄奥多西到爱里尼时代的东罗马帝国》,第2卷,第292—315页;柏立:《帝国政府的条约》,载《拜占廷杂志》,第15卷,第517—577页;吉本;

《羅馬帝國衰亡史》，柏立版，第4卷，第543—551頁；比士雷(Beazley, C. R.):《近代地理學的曙光》，第2卷，第467—514頁；雪微爾(Schevill, F.):《巴尔干半島的历史》，第5—6章。

拜占廷統治下的埃及:

*貝爾(Bell, H. I.):《拜占廷對埃及的奴役統治》，載《埃及考古學雜誌》，1917年4月号；米倫(Milne):《羅馬統治下的埃及》；魯依亞爾(Rouillard, G.),《拜占廷埃及的行政制度》，巴黎，1922年。

愛索利亞人利奧和聖象破壞派:

*柏立:《后期羅馬帝國》，第2卷，第318、460—469頁。*哈那克(Harnack, A.):《教條史》，第5卷，第304—329頁；伽德納:《狄奧多好學者》；布羅克斯(Brooks, E. W.):《皇帝芝諾和愛索利亞朝》，載《英國歷史評論》，第8卷(1890年，4月号)；李亞(Lea, H. C.):《教會史的研究》，第25—31頁。

第七章 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兴起

广泛的参考书目:

《劍橋中世紀史》，第2卷，第760—765頁。

英文著作分类书目:

湯普遜:《中世紀史參考書》，第1編，第52—57頁。

穆罕默德前的阿拉伯:

*亞諾爾(Arnold, T. W.):《伊斯蘭教的傳布》，第1章；*霍伽茨(Hogarth, D. G.):《阿拉伯》；*霍伽茨:《深入阿拉伯半島》；*胡次馬(Houtsma, M. T.),詞目:《阿拉伯》，見《伊斯蘭教百科全書》，1913年；休士(Hughes, T. P.)詞目:《阿拉伯》，見《伊斯蘭教詞典》；巴吞(Barton):《閃族的起源》；查索引《部族》、《綠洲》、《棕櫚樹》等等；哥爾德塞爾(Goldzieher):《希伯來人的神話》，第79—89頁；威爾豪森(Wellhausen, J.):《計劃與準備工作》，第4卷(1889年)，(穆罕默德前的麥地那)。

伊斯蘭教的擴張:

*亞諾爾:《伊斯蘭教的傳布》，第2—7章(任何文字中的最好著作)；*馬哥琉茨(Margoliouth, D. S.):《伊斯蘭文明》；*《劍橋中世紀史》，第2卷，第10—12章；哥爾德塞爾:《穆罕默德與伊斯蘭教》；赫姆霍特(Helmholt):《世界史》，第2卷，第270—342、694—711頁，第3卷，第255—269、298—347頁；貝根姆(Berchem, Max Van):《早期哈里發時代的土地財產與土地稅》，

(日内瓦, 1886年);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柏立版, 第5卷, 第51章, 第6卷, 第52章; 基斯麦: (Kisner, A. L.):《穆罕默德及其直接继承人所施行的宗教容忍政策的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27年。

波斯、叙利亚和埃及: 北非、西班牙与西西里:

*柏立:《后期罗马帝国》, 第2卷, 第261—273、510—517页; *蒲特勒:《阿拉伯人对埃及的征服》; 第尔:《拜占廷非洲》; 锡克斯(Sykes, P.):《波斯史》, 第2卷, 第261—273、510—517页; 革斯特(Guest, A. R.):《佛斯塔特(Fustat)的建造》, 载《王家考古学会杂志》, 1907年1月号; 布罗克:《萨拉森人征服埃及》, 载《拜占廷杂志》(1895年), 第435页;《阿拉伯人在小亚细亚》, 载《希腊文艺研究杂志》, 第18卷, 第182页; 蓝浦尔(Lane-Poole, S.):《中世纪时代的埃及》; 库德尔(Caudel, M.):《阿拉伯人在北非洲的早期侵略》; 佛尼尔(Fournel, H.):《柏柏尔人, 研究阿拉伯人对北非洲的征服》, 二卷; 多济(Dozy, R.):《西班牙伊斯兰教》; 阿马利(Amari, M.):《西西里穆斯林史》。

萨拉森文明、商业、贸易、工业、社会与经济情况:

*马哥琉茨:《伊斯兰文明》; *克勒麦(Kremer, A. Von):《哈里发时代东方文化史》, 二卷; 亥德:《利凡得商业史》, 第1卷, 第24—74页; 勒彭(Le Bon, G.):《阿拉伯人的文明》, 1884年; 蓝浦尔:《中世纪时代阿拉伯人社会》; 华尔特(Huart, C.):《阿拉伯文学》; 柏尔麦(Palmer E. H.):《哈伦·厄尔·拉希德(Haran-al-Rashid)传》; 勒·斯特朗治(Le Strange, G.):《东哈里发国家的疆域》; 比士雷:《近代地理学的曙光》, 第1卷, 第392—425页; 斯普棱革(Sprenger)的论文, 载《王家亚洲学会杂志》, 第14卷(1844年)第2编, 第519页; 雅科布斯(Jacobs):《地理发现的故事》, 第3卷; 尼斯(Nys, E.):《经济史的研究》(1899年), 第1章; 奥兹本(Osborn):《穆罕默德教法律的成长与性质》, 载《现代评论》, 第29卷, 第1092—1111页, 第30卷, 第55—71页。

第八章 法兰克人和查理曼

广泛的参考书目:

《剑桥中世纪史》, 第1卷, 第657页, 第2卷, 第728—732、801—813页; 赖维希:《法国史》, 第2卷, 第1编, 第42、94、117、170、216、257页, 特别注意第305、331页。

英文著作分类书目:

湯普遜:《中世紀史参考書》,第1編,第39—41、61—66頁。

法兰克人扩张与占領的性质:

*提尔:《墨洛溫時代高盧的羅馬社會》,第1卷;藍普勒赫:《法兰克人的漂泊与移殖》,1882年;斯勒得(Schröder, R.):《薩利克法兰克人的散布》,載《德意志历史研究文集》19期(1879年);佛斯特爾(Fustel de Coulanges):《日耳曼人的侵入与羅馬帝國的結束》;休馬赫(Schumacher, K.):《从原始时代到中世紀时期萊茵蘭的殖民和文化史》,二卷(1921,1925年)。

墨洛溫朝的高盧与德意志:

賴維斯:《法國史》,第2卷,第1編,第42頁及以下,第117頁及以下,第216頁及以下;达恩:《德意志國王》,第7卷;惠芝(Waitz, G.):《德意志宪法史》,第2—3卷;印那馬(Inama Sternegg):《德意志經濟史》,第1卷;佛斯特爾:《法兰克王國》;塔第夫(Tardif, J.):《墨洛溫朝时代法国……制度的研究》。

专論文明性质的著作:

*提尔:《墨洛溫朝时代高盧的羅馬社會》,第2卷;道尔頓(Dalton, O. M.):《都尔的格列高里与法兰克人史》,第1卷;*馬力南:《墨洛溫朝社会:墨洛溫朝时代圣徒的信条》;*佛斯特爾:《自由地与乡村庄园》;《封邑制度的起源》;劳貝尔(Loebell, J. W.):《都尔的格列高里和他的时代》;賴維斯:《法國史》,第2卷,第2編,第170—256頁;发坎达德(Vacandard, E.):《圣奥文(Ouen)传》;馬丁(Martin, E.):《圣科兰班传》;普拉茨(Plath):《墨洛溫朝与喀罗林朝的王宮》;罗茨(Roth, P.):《封邑史》;《封建主与附庸》;勒斯納(Lesne, E.):《羅馬时代与墨洛溫朝时代法国的教会财产》;基力尔摩茲(Guilhiermoz, P.):《論法國貴族的起源》;德洛奇(Deloche, M.):《法国最初两个王朝时代的王家侍从制》;布勒伊尔(Brehier, L.):《中世紀开始时代东方人在西方的殖民地》,載《拜占廷杂志》第12卷(1903年);雪佛-波厄科斯特(Scheffer-Boichorst, P.):《叙利亚人在西方的历史》,載《东方交通史》,第4卷(1885年),第520—550頁;孟祿与塞勒利:《中世紀文明》,第60—87頁;关于法国的纪录,參閱泰罗(Taylor, C. H.):《略談租稅簿的起源》(和那里引述的論著),《历史杂記……亨利·比伦納》(1926年),第475—481頁。

查理曼:

近时出版的两部出色的著作:

*杜普希(Dopsch, A.):《喀罗林朝时代的经济发展》,二卷(1912年);

*哈尔芬(Halphen, L.):《批判研究查理曼的统治》(1918年)。前一作者稍微激烈的见解,已引起了广大的注意。关于批判方面参阅:

[德国]《历史杂志》,第112卷;《社会经济史季刊》,第10卷,第546页;《格丁根(Göttingische)评论》,1913年4月号;[法国]《历史评论》,第110卷,第332页,第115卷,第222页,第116卷,第91页;《中世纪时代》,1922年,第180页;1923年,第40页;《英国历史评论》,第29卷,第134页;《美国历史评论》,第27卷,第102页;《经济杂志》,第28卷,第428页。杜普希对批评者的答复,见《社会经济史季刊》,第17卷,第41页及以下。

比伦纳先生的论点是:穆罕默德教海权在西地中海的兴起,在破坏西方商业并使西欧陷入漫长的自然经济状态方面,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论点发表在*《一个经济的对比:墨洛温朝与喀罗林朝》,载《比利时语言学与历史评论》,第2卷(1923年),第223页及以下;更出名的,发表在他的《中世纪城市》。还应参阅哈尔芬(L. Halphen);《十一至十二世纪欧洲人征服地中海》,《历史杂志》……亨利·比伦纳,第175页。

商业和贸易、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

*杜普希:《喀罗林朝时代的经济史》,第2卷;*罗亚塞尔(Loisel):《喀罗林朝的经济立法》;*印巴特(Inbart de la Tour):《商业特权》,见《摩诺德研究》;印那马(Inama Sternegg):《德意志经济史》,新版,1909年,第1卷,第5章(受到杜普希严厉批判);惠芝:《德意志宪法史》,第2、3卷;垦普斐(Kaempfer):《查理大帝》,1910年(关于经济的叙述,特别出色);赖维希:《法国史》,第2卷,第2编,第331—356页;发格尼兹(Fagniez, G.):《法国商业史文献》,第1卷,《导论》,第25—31页;勒伐索(Levasseur, E.):《法国商业史》第1卷,第27—44页;赫未林(Huvelin):《市集与市场法史》;第6章;普罗(Prou, M.):《喀罗林朝的货币》,1896年;叔尔特(Schulte, A.):《中世纪西德与意大利之间的商业与交通史》,1900年;克伦克劳兹(Kleinclausz, A.):《喀罗林帝国的起源和转变》;佛斯特尔:《喀罗林朝时代王室的转变》;西利革(Seeliger):《中世纪早期庄园的社会经济意义》;印那马:《大庄园》。

法里西亚的独特商业:

波尔曼(Poelmann):《墨洛温朝和喀罗林朝时代北尼德兰的商业史》,海牙,1910年;克伦刻(Klumker, J.):《查理大帝时代法里西亚布匹商业》,

1899年;比倫納:《法里西亞的布匹,還是法蘭德斯的布匹?》,載《比利時語言和歷史評論》,第3卷,第155頁。

西班牙“馬克”〔邊防區〕的殖民:

印巴特:《西班牙的農民殖民地與荒地的占領》,見《保羅·法勃爾(Paul Fabre)論文集》;科伐辽夫斯基:《歐洲的經濟發展》,第3卷,第9章(1905年)。

王室領與莊園詔令:

*杜普希:《喀羅林朝時代的經濟史》,第1卷,第107—180頁和上面所引的批判杜普希的文章; *加萊斯(Gareis):《查理大帝的莊園管理》(原文和德文譯文,柏林,1895年); *斯坦尼茨(Steinitz, B.)的文章載《社會經濟史季刊》,第9卷(1911年),第317—372、481—560頁; *雪爾-克拉麥(Schill-Kramer, E.):《喀羅林朝時代土地占有制的組織與主要情況》,《社會經濟史季刊》,第17卷,第247—293頁; *洛特(Lot, F.):《關於喀羅林朝時代的國庫領的範圍》,載《比利時語言學與歷史評論》,第3卷,第57頁; *西厄(Sée, Henri):《中世紀時代法蘭西的農村階級與莊園制度》,第1卷,第1—3章; 普拉茨:《墨洛溫朝與喀羅林朝的王宮》; 格拉德(Guerard, B.):《莊園詔令》,載《沙特學院(l'École des Chartes)圖書提要》,第三編,第4卷(法譯本); 藍普勒赫:《德意志經濟生活》第1卷,第719頁及以下,第804頁及以下;《德意志史》,第2卷,第40頁及以下; 法來希曼(Fleischmann, W.):《查理大帝的莊園詔令》,柏林,1919年; 卡美爾(Kummel, A.):《查理大帝的莊園管理》,載《礦業史雜誌》,第51卷(德譯文與原文); 泰羅:《莊園詔令的統一性》,載《比利時語言學與歷史評論》,第3卷(1924年),第759頁。

教會的地主地位:

*索麥拉德(Sommerlad, T.):《德國教會的經濟活動》,第2卷,第102章; *格拉德-朗嫩(Guerard-Longnon):《伊爾密嫩(Irminon)的地租簿》,《導論》; 杜普希,上引書,第1卷,第181—269頁; 赫塞爾斯(Hessels, J. H.):《伊爾密嫩的地租簿》(811—826年);《聖里邁(St. Remi)寺院的地租簿》,見語言學會的譯文(倫敦),1899—1902年,第471、650頁; 德孟特(Demante),《教會地產的不穩固地位》,《法律史新評論》,1860年,第45頁。

彭尼非斯寺院與東德意志殖民:

*索麥拉德,上引書,第1卷,第259—348頁; 湯普遜:《東德意志殖民》,載《美國歷史學會年報》,1915年,第125—126頁; 藍普勒赫:《德意志史》,第3

卷,第311頁及以下;穆勒(Müller, J.):《爱斯斐德的法兰克人殖民》,第1—13頁;迈曾(Meitzen):《殖民与农业》,第2卷,第401—406頁;詹里(Kylie, E.):《以德意志各省的情况来说明圣彭尼非斯的方法》,載《劍桥神学研究杂志》,1905年10月号;湯普逊:《封建的德意志》,第387—399頁。

第九章 法兰克帝国的分裂

广泛的参考书目:

《劍桥中世紀史》,第3卷,第569—572頁;賴維斯:《法国史》,第2卷,第1編,第358,367,383,395—396,414頁。

英文著作分类书目:

湯普逊:《中世紀史参考书》,第2編,第81—84頁。

卡尔默特(Calmette, J.):《喀罗林朝的外交,从凡尔登条約到秃头查理的逝世(843—877年)》;克来克劳兹(Kleinclausz, A.):《喀罗林朝帝国的起源和转变》;布耳日瓦斯(Bourgeois, E.):《瓦兹河畔基尔舍(Kiersey-sur-Oise)的詔令(877年)》;辛森(Simson, B.):《路易虔誠者时代德意志帝国的編年史》,二卷;丹勒(Dummler, G.):《东法兰克帝国史》,三卷,第2版,1887—1888年;賴維斯:《法国史》,第2卷,第1編,第358—438頁;佛斯特尔:《喀罗林朝时代王室的转变》,1892年;希姆利(Himly, A.):《瓦拉(Wala)和路易好人》,1849年;洛特和哈尔芬:《秃头查理的统治(840—851年)》;勒斯納(Lesne, E.):《从彭尼非斯的改革到辛克馬的死亡时期高卢和德意志的主教区的教阶制度》,1905年;巴利索特(Parisot, R.):《喀罗林朝时代的洛林王国》;浦帕庭(Poupardin, R.):《喀罗林朝时代的普罗溫斯王国》;諾尔登(Noorde, C.):《理姆斯大主教辛克馬传》,1863年;惠芝:《德意志宪法史》,第5卷。关于作为分配土地根据的教会土地測量,参閱泰罗:《略談地租簿起源》;《杂記……亨利·比伦納》以及那里所引的論文。

本章所述喀罗林帝国的分裂,主要是由于王室領的分配;別的事情都是由此而产生的。这是作者自己的见解,他希望在往后著作中,将予以詳細發揮。

第十章 北欧人的扩展

广泛的参考书目:

《劍桥中世紀史》,第4卷,第618—624頁。

英文著作分类书目:

湯普遜:《中世紀史參考書》,第2編,第85—90頁。

北欧人的旧时世界:

《史話》(Sagas)是最好的資料來源。關於史話著作的出色的概述,見微格佛孫(G. Vigfusson)出版的《斯圖林加史話》(二卷,1878年)的緒論。還應參閱理查·克利斯比(Richard Cleasby)的《冰島詞典》中的序論(1874年);雷因(Laing)的《Heimskringla》;約克·鮑威爾:《民間故事》,第5卷(1897年),第97頁。*格澤塞特(Gjerset, K.):《挪威人民史》,第1卷,第8—26節;*威廉(Williams, Mary W.):《外侵團時代斯干的那維亞的社會狀況》;*布革(Bugge, Alex.):《北歐人史》(到1030年止),(克利斯辛那,1910—1912年);窩薩(Worsae, J. J. A.):《丹麥人的工業技術》,見《南肯星頓博物館手冊》,二卷(1882年)及《丹麥的原始古物考》(1882年);杜·切留(Du Chaillu, P. B.):《外侵團時代》,二卷;歧塞(Keyser, J. R.):《古代北歐人的生活》(巴拿德(Barnard)的英文譯本,倫敦,1863年);魏和德(Weinhold, C.):《古代北歐人的生活》,1856年;南森(Nansen, F.):《在北歐的迷霧中》,二卷。

一般著作:

*摩維爾(Mawer, A.):《外侵團》,1912年;*比士雷:《近代地理學的曙光》,第2卷,第17—111頁。*布革:《中世紀早期北歐的交通路綫》,載《社會經濟史季刊》,第4卷,第227—273頁;*瓦茲坦因(E. Wadstein):《法里西亞人與北歐古代商路》,見Göteborgs Kungl. Vetenskaps-och Vitterhets Samhälles handlingar,第5編,第21卷,第149—228,274—275,412—417,533—538頁,哥騰堡,1920年,(附有地圖)。基力(Keary, C. F.):《外侵團與基督教國》;哈斯金(Haskins, C. H.):《諾曼人在歐洲》;《劍橋中世紀史》,第3卷,第13章;李安特(Riant, P.):《十字軍時代斯干的那維亞人往聖地的遠征與進香》(1865年)。

英國:

拉奔堡(Lappenberg)[托爾普(Thorpe)的譯本]:《盎格魯-薩克遜國王時代的英國》,第2卷,第18—220頁;奧曼(Oman, C.):《諾曼征服前的英國》,第382—491頁;霍治金:《盎格魯-薩克遜英國》;拉森(Larson, L. M.):《卡紐特大帝》;格澤塞特(Gjerset, K.):《挪威人民史》,第1卷,第11—12,28—30節;布革:《不列顛群島上北歐人的殖民地》,皇家歷史學會譯本,第4

集,第4卷,第173頁。

爱尔兰、苏格兰、西方群岛、冰岛和格林兰:

格泽塞特:《挪威人民史》,第1卷,第9、14、24、25、28、36、39、40、41节;奥尔奔(Orpen, G. H.):《北欧人在爱尔兰》,载《英国历史评论》,1906年7月号;1907年4月号;霍华茨(Howorth, H. H.):《爱尔兰僧侣和北欧人》,皇家历史学会译文,第8卷,第281頁;赫雅尔塔林(Hjaltalin, J. A.):《冰岛首批殖民的文明》,载《人种学学会会议事纪录》,伦敦,新编,第6卷,第176頁;达孙特(Dasent, G. W.):《冰島上的北欧人》;达孙特:《焚毁的纳雅尔(Njal)的故事》,即关于十世纪末期冰島上的生活(从冰島文《纳雅尔史话》里译出),爱丁堡,1861年,二卷;霍弗伽德(Hovgaard, W.):《北欧人在美洲的航行》,1914年;基塞克(Giesecke, C. L.):《格林兰东岸上挪威人的殖民地》,载《爱尔兰皇家学院会议事纪录》,第14卷,第47頁;斐西尔(Fischer, J.):《北欧人在美洲的发现》,1903年。

法国:

*福吉尔(Vogel, W.):《诺曼人与法兰克帝国》(1906年);*约兰逊(Joranson, E.):《法国的丹麦金》载《芝加哥大学毕业论文集》,(1923年);湯普逊:《第九世纪法国的商业》,载《政治经济杂志》,第23卷(1915年),第857—887頁;洛特:《大侵犯,856—862年》,载《沙特学院图书提要》,第69卷,第1—62頁(1908年);发佛尔(Favre, E.):《法王欧得传》,第207—226頁。

俄国:

魯斯(Roos, W.):《瑞典在外侵团出征里所占的地位》,载《英国历史评论》,第7卷,第209—223頁;湯森(Thomsen, V.):《古代俄罗斯与斯干的那维亚的关系》(1877年);柏立:《东罗马帝国史》,第2卷,第13章;馬服(Mavor, J.):《俄国经济史》,第1卷,第1—21頁;摩維尔:《外侵团》第7章。

第十一章 薩克森和薩利安德意志(919—1125年)

广泛的参考书目:

哥采克(Kotzschke, R.):《十七世纪前德意志的经济史》,第48—84頁(扼要的历史论述,附有有价值的详细参考书目);藍普勒赫:《德意志史》,第12卷,第105—117頁;吉布哈特(Gebhardt):《德意志手册》,第1卷,第4版(1909年);《剑桥中世纪史》,第3卷,第604—617頁。

*尼采(Nitzsch, K. W.):《德意志人民史》(第2版,1892年),第1卷;

*藍普勒赫:《德意志史》,第2—3卷; *革德斯(Gerdes, H.):《薩克森皇帝統治下的德意志人民和他們的時代(1898年)》; (*每一卷的第二部分都是專講經濟和社會史的); *湯普遜:《封建的德意志》第1—10章;《劍橋中世紀史》第3卷,第8—12章; 馬尼提斯(Manitius, M.):《薩克森朝和薩利安皇帝統治下的德意志史(911—1125年)》(1899年); 漢普(Hampe, K.):《薩利安朝和斯陶芬朝時代的德意志史》(第2版, 1912年); 赫爾曼(Hellman, S.):《十字軍東征前的中世紀時代》; 惠芝:《德意志憲法史》,第5、6、7卷; 斯圖茨(Stutz, U.):《本地教會作為中世紀日耳曼教會法形成中的要素》, (1895年); 斐雪(Fisher, H. A. L.):《中世紀帝國》二卷(1898年)。

第十二章 十字軍前的法國(912—1095年)

廣泛的參考書目:

《劍橋中世紀史》,第3卷,第587—591頁; 賴維斯:《法國史》,第2卷,第2編,第3、39、78、107、144、179、203、283頁。

英文著作分類書目(很少):

湯普遜:《中世紀史參考書》,第2編,第96—97頁。

一般著作:

*布亞索那德(Boissonade, P.):《中世紀時代基督教歐洲的勞動狀況》,第1卷,第7—9章; *塞厄(Sée, Henri):《中世紀時代法國的……農村階級》; *卡爾默特:《封建社會》; *微達爾(Vidal de la Blanche, P.):見賴維斯:《法國史》,《導論》; 勒伐索:《法國商業史》; 賴維斯:《法國史》,第2卷,第2編,第1冊; 第2冊,第4章; 藍普勒赫:《中世紀早期法國的經濟狀況》(馬力南譯本1889年); 法拉奇(Flach, J.):《古代法國的起源》,第2—3卷(1886—1917年); 洛特:《喀羅林朝的最後時期》(1891年); 洛特:《休·卡佩傳》(1903年); 普菲斯特(Pfister, Ch.):《羅伯特虔誠者的統治》(1885年); 提雷(Tilley, A.)(主編):《中世紀法國》,第1、2章(第1節);《劍橋中世紀史》,第3卷,第4、5章。

第十三章 十字軍前的意大利

廣泛的參考書目:

《劍橋中世紀史》,第3卷,第594—603頁。

英文著作分類書目(很少):

湯普遜:《中世紀史参考書》,第2編,第95—96頁。

許多引在十字軍時期意大利一章的參考書,也是講到這一時代的。

*哈特曼(Hartmann, L. M.):《早期中世紀意大利經濟史》(1904年);
*蕭布(Schaube, A.):《從地中海區羅馬人時代到十字軍運動末期的商業史》(1906年);
*罕德洛厄克(Handloike, M.):《在主教統治與公社興起時期的倫巴城市》(1893年);
*休普斐(Schupfer, F.):《公社復興時期的米蘭社會》;載《司法檔案集》,第3卷,第115、252、460、732頁,第4卷,第309頁,第5卷,第40頁(波倫亞,1869—1870年);
德勒斯納(Dresdner, A.):《十至十一世紀意大利的精神文化與風俗史》(1890年);
蓋依(Gay, J.):《南意大利與拜占廷帝國(867—1071)》(1904年);
布賴斯(Bryce, J.):《神聖羅馬帝國》(新版,1904年),第9、10章;
福吉爾:《拉特力厄斯·馮·味羅那(Ratheriu Von Verona)和十世紀》,二卷,1854年;
奧吞(Previte Orton, C. W.):《薩伏衣王族史》;《意大利和普羅溫斯》,載《英國歷史評論》,第32卷,第335頁;
拍岐(Pach, H.):《米蘭的帕大利亞派(Pataria)》(1893年);
奧弗曼(Overmann, A.):《中世紀意大利城市》(1914年),講述九至十世紀情況。

第十四章 東羅馬帝國(802—1095年)

廣泛的參考書目:

《劍橋中世紀史》,第4卷,第782—850頁,特別注意894—898頁;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柏立版,第4卷(附錄)。

英文著作分類書目:

湯普遜:《中世紀史參考書》第2編,第117—120頁。

關於拜占廷文明的一般著作:

*第爾(Diehl, C.),《拜占廷的盛衰》(1919年);《拜占廷研究》(1905年);
《拜占廷帝國史》(1919年)(英譯本,普麟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革爾塞(Gelzer, H.):《拜占廷文化史》(1909年);
貝依納斯(Baynes, N. H.):《拜占廷帝國》(1926年);
《劍橋中世紀史》,第4卷,第22—23章;
赫斯林:《論拜占廷文明》(1907年);
佛雷銘(Fleming, W. B.):《太爾城史》,第9章;
布岐爾(Bouchier, E. S.):《安提阿》,第9章;
布賴斯:《神聖羅馬帝國》新版,第16章;
哈禮孫(Harrison, F.):《拜占廷歷史》(勒德講演),見《我的叢書》,第21章;
比基拉斯(Bikelas, A.),《拜占廷帝國》,載《蘇格蘭評論》,第17—18卷(1886—1887年);
弗利曼:《歷史論文》,第3集,第241頁;
格勒尼爾(Grenier,

P.):《拜占廷帝国的社会与政治演变》,二卷(1904年)。

历史概述:

芬雷(Finlay, G.):《希腊史》[托塞(H. F. Tozer)出版],第4—5卷(牛津,1877年);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柏立版),第6卷;雪微尔(Schevill, F.):《巴尔干半岛史》,第8—9章。

十字軍前的拜占廷商业:

*亥德(Heyd, W.):《利凡得商业史》,第1卷,第24—74頁;柏立(Bury, J. B.):《东罗马帝国从爱里尼的傾复到巴錫尔一世的登位时期的历史》,第10、13章;比士雷:《近代地理学的曙光》,第2卷,第221—223、467—514頁;布伦塔諾(Brentano, L.):《拜占廷的国民經济》,載斯摩勒(Schmoller)的《法律年鑑》,第41卷(1917年);尼斯(Nys, E.):《經濟史》,第1章;阿士柏納(Ashburner, W.):《罗得島海洋法》(1909年);布朗(Brown, H. F.):《威尼斯》,第3—4、16、22、29—34、48—50、64—68、80—81、86—93頁,《劍橋中世紀史》,第4卷,第8章。

財政、賦稅和土地問題:

*安德利得斯(Andreades, A.):《拜占廷的財政》,載《政治学評論》,第2卷(1911年);《拜占廷帝国預算的上升》,載《希腊研究評論》,第34期(1921年);*柏立:《东罗马帝国从爱里尼傾复到巴錫尔一世登位时期的历史》,第7章;《第九世紀帝国的行政制度》,英国学院,补充論文,第1卷(1911年);《帝国行政制度論》,載《拜占廷杂志》第15卷,第517—577頁;《劍橋中世紀史》,第4卷,第22—23章;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柏立版),第5卷,第525—533頁(土地問題)。

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

*柏立:《东罗马帝国从爱里尼的傾复到巴錫尔登位时期的历史》,第11—12章;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柏立版),第5卷,第543—551頁;《劍橋中世紀史》,第4卷,第7章;霍华茨(Howorth, H. H.)的論文,載《人类学学院杂志》,第7卷,第329頁,第8卷,第65頁,第9卷,第65頁;比士雷:《近代地理学的曙光》,第2卷,第478—514頁;明斯(Minns):《西徐亚人和匈奴人》,第543頁及以下。

俄罗斯人和喀什尔人:

*柏立:《东罗马帝国从爱里尼傾复到巴錫尔登位时期的历史》,第13章;
*勒达威(Reddaway, W. F.):《研究俄国史导論》:《对研究历史者的輔導书》

(S. P. C. K.), 伦敦, 1920 年(附有参考书目); 《剑桥中世纪史》, 第 4 卷, 第 7 章; 霍华茨: 《第三次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工作报告》, 第 2 卷(1879 年)。关于喀什尔人, 参阅词目: 《喀什尔人》, 见《犹太人百科全书》; 柏立: 《东罗马帝国史》, 第 394—423 页。罗斯托甫切夫(Rostovseff, M.): 《基辅罗斯的起源》, 载《斯拉夫族研究评论》, 第 2 卷(1922 年), 第 1—18 页; 《南俄的伊朗人和希腊人》(1922 年), 特别注意第 210—222 页; 《美国历史学会年报》(1920 年), 第 165 页及以下。

和伊斯兰教的冲突:

*《剑桥中世纪史》, 第 4 卷, 第 5, 6 章; *柏立: 《东罗马帝国从爱里尼倾复到巴锡尔登位时期的历史》, 第 8—9 章; 布塞尔(Bussell, F. W.): 《罗马帝国》, 二卷, 1910 年(查阅索引, 特别注意《亚美尼亚》); 劳伦特(Laurent, J.): 《拜占廷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亚美尼亚》(载《法国雅典和罗马研究》, 第 117 期, 1919 年); 安德森(Anderson, J. G.): 《东小亚细亚的道路系统》, 载《希腊文艺研究杂志》(1897 年), 第 22 页; 勒·斯特伦治(Le Strange, Guy): 《东哈里发国家的版图》; 革尔塞: 《亚美尼亚简史》(1897 年); 布鲁克斯(Brooks, E. W.): 《拜占廷人与阿拔斯朝时代阿拉伯人的关系》, 载《英国历史评论》, 第 16 卷, 第 84 页; 拉姆塞《穆斯林和基督徒争夺小亚细亚的战争》, 载《现代评论》, 第 90 卷, 第 1 期; 奥曼(Oman, C. W.): 《中世纪时代的战术》, 第 4 卷, 第 4 章; 帕刻(Parker, J. H.): 《突厥人的起源》, 载《英国历史评论》, 第 11 卷, 第 431 页。

第十五章 巴格达哈里发国家与伊斯兰教的扩张

广泛的参考书目:

《剑桥中世纪史》, 第 4 卷, 第 831—836 页, 第 5 卷, 第 864—866 页。

英文著作分类书目:

湯普逊: 《中世纪史参考书》, 第 1 编, 第 55—56 页。

一般著作:

*亥德: 《利凡得商业史》, 第 1 卷, 第 24—74 页; *克勒麦(Kremer, A. Von): 《哈里发时代东方文化史》, 二卷(1876—1877 年)[科达·布克什(S. Khuda Bukhsh)的英译本, 加尔各答, 1920 年]; 克勒麦: 《伊斯兰教地区的文化和战斗史》(1873 年)(科达·布克什的英译本, 书名《对伊斯兰教文明史的贡献》加尔各答, 1905 年); 亚诺尔: 《伊斯兰教的传布》(第 2 版, 1913 年); 华尔特(Huart, C.): 《阿拉伯人史》, 二卷(1912—1913 年); 勒彭: 《阿拉伯人的文

明》(1884年); 赫尔(Hell, Joseph): 《阿拉伯文明》(科达·布克什譯本, 1926年); 勒·斯特伦治: 《东哈里发国家的版图》; 勒·斯特伦治: 《阿拔斯哈里发时代的巴格达》(1900年); 馬拉斯特(Marrast, A.): 《第六世紀的拜占廷生活》, 第305頁及以下(1881年); 穆耳(Muir, W.): 《哈里发国家的兴起与衰亡》(新版, 1915年); 穆勒(Müller, A.): 《伊斯兰教在东方与西方》, 二卷, (1885—1887年); 本雅明(Benjamin ben Jonah of Tudela): 《游記》〔亚雪(Asher)出版的譯本, 1840年〕; 福特斯丘(Fortescue, A.): 《东方的小型教会》(1913年); 瑟德(Shedd, W. A.): 《伊斯兰教与东方教会》(1904年)。

第十六章 十字軍

广泛的参考书目:

《劍橋中世紀史》, 第5卷, 第867—871頁; 布勒伊尔(Brehier, L.): 《中世紀时代教会与东方: 十字軍》, 第1—13章及各章所附参考书目(第4版, 1911年)。

英文著作分类书目:

湯普逊: 《中世紀史参考书》, 第2編, 第121—132頁。

一般历史:

*亨尼(Henne am Rhyn, O.): 《十字軍和它們時代的文化》(1894年); *普魯茨(Prutz, H.): 《十字軍時代的文化史》(1883年); 布勒伊尔: 《中世紀時代的教会和东方: 十字軍》, 第1—13章(第4版, 1911年); 庫格勒(Kugler, B.): 《十字軍史》(第2版, 1891年); 亥克(Heyck, E.): 《十字軍》; 亚契尔和金斯福德(Archer and Kingsford): 《十字軍》; 剛德(Conder, C. R.): 《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 斯蒂芬孙(Stevenson, W.): 《十字軍士在东方》; 紐霍尔(Newhall, R. A.): 《十字軍》。

参拜圣地:

*比士雷: 《近代地理学的曙光》, 第1卷, 第2—4章, 第2卷, 第3—4章; 希司(Heath, S.): 《中世紀時代的进香生活》; 琼斯: 《凯尔特不列顛与进香运动》〔辛罗杜立昂(Y. Cymrrhodorion)会〕, 第90—107, 149—228, 274—275, 412—417, 533—538頁; 李亚(Lea, H. C.): 《懺悔和赦罪券》, 第2卷, 第123—135頁; 《爱丁堡評論》, 第120卷, 第217—249頁, 第109卷, 第86—120頁; 朱塞兰(Jusserand, J. J.): 《中世紀時代的旅行生活》, 第3編; 《評論季刊》第93卷, 第432頁, 第190卷, 第217頁; 雨果(Hugo, T.): 《进香標記》, 載《考古学杂志》, 第38卷(1860年), 第128頁。

十字軍的原因与动机:

*孟祿 (Munro, D. C.):《十字軍論文集》,第1章(柏林敦,威尔蒙,1903年);李亚:《懺悔与赦罪符》,第2卷,第123—135頁; *亚契尔:《克勒芒會議和第一次十字軍》載《苏格兰評論》,第26卷(1895年),第274—295頁; *孟祿:《烏尔班二世在克勒芒的演說》,載《美国历史評論》,第11卷,第231頁; 克累 (Krey, A. C.):《第一次十字軍》; 李斯 (Lees, Beatrich A.):《法兰克无名英雄的功績》,《导論》; 丹卡夫 (Duncalf, F.):《农民十字軍》,載《美国历史評論》,1921年4月号; 霍伽茨 (Hogarth, D. G.):《十字軍的路綫》,皇家地理学会譯本,第3卷,第2編,第38—78頁; 优达尔 (Yewdale):《波希蒙德》;《劍橋中世紀史》,第5卷,第7章; 华尔夫:《1096年农民十字軍》(杜平根,1891年); 布兰霍尔 (Bramhall, E.):《十字軍士的特权》,載《美国神学評論》,第5卷,第279頁; 孟祿和塞勒利:《中世紀文明》,第248—256頁。

耶路撒冷王国与拉丁东方的文明:

*多杜 (Dodu, G.):《耶路撒冷王国君主政治制度史》(1894年); *布勒伊尔:《中世紀时代教会与东方:十字軍》,第4—9章; *勒伊 (Rey, E. G.):《十二至十三世紀叙利亚法兰克人殖民地》(1883年); 普魯茨:《十字軍时代的文化史》(1883年),特別注意第1—32、39—181、314—354、396—415頁; *孟祿:《十字軍論文集》,第1章,《基督徒和异教徒在圣地上》,(同一篇論文,发表在国际月刊,第4卷,第690和726頁); *士达布斯 (Stubbs, W.):《案卷丛书导論》,第325—349頁; 亚契尔和金斯福:《十字軍》,第19—20章,特別注意第282—384頁; 剛德:《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載《評論季刊》,第CCXXIX (原文如此)卷,第3期; 孟祿:《耶路撒冷王国的建立》,載《瑟瓦尼 (Sewanee) 評論》(1924年3月号),第16卷,第215頁; 剛德:《諾曼巴勒斯坦》,載《巴勒斯坦开发基金会》,第29卷(1890年); 达姆兰 (Damland, F.):《十字軍时期的安提阿侯国》,載《考古学杂志》,第15卷,第234頁;《英国历史評論》,第11卷,第143頁(許多杜的书); 优达尔:《波希蒙德》; 爱塞伦 (Eiselen):《西頓史》,第2編,第4章; 孟祿和塞勒利:《中世紀文明》,第257—268頁; 弗雷銘:《太尔城史》,第10章; 布岐尔:《安提阿簡史》,第10、11章; 尼斯:《經濟史》,第9章; 斯蒂芬孙:《十字軍士在东方》; 德·拉涅散 (De Lanessan, J. M. A.):《殖民的原則》(1897年); 普勒斯吞:《耶路撒冷王国的农村情况》(《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論文集》,1903年); 丹卡夫:《环境对耶路撒冷王国的影响》,載《美国历史学会年报》(1914年),第1卷,第137頁; 密勒 (Miller, W.):《耶

路撒冷的拉丁王国》載《評論季刊》第 230 卷，第 3 期。

商业与十字軍(參看上面一节和十字軍时期意大利一章的参考书目):

*亥德:《利凡得商业史》，第 1 卷，第 129—476 頁; *萧布(Shaube, A.):《从地中海地区羅馬人时期到十字軍末期的商业史》(1906 年); *普魯茨:《十字軍时代的文化史》，特別注意第 377 頁及以下; 凱勒(Keller, A. G.):《殖民运动》，第 60—73 頁; 特威斯(Twiss, Sir Travers):《海軍部的黑皮书》，第 4 卷，「导論」(《案卷丛书》); 普魯茨的論文，見孟祿編:《十字軍論文集》，第 2 章，第 45 頁[同一篇論文，見《国际月刊》，第 4 卷(1902 年)，第 251 頁]。

拜占廷皇帝和十字軍:

*察兰登(Chalandon, F.):《康尼南朝(Comnines): 十一至十二世紀拜占廷帝国的研究》，二卷(1900—1913 年);《剑桥中世紀史》，第 4 卷，第 11、12 章; 孟祿:《十字軍論文集》，第 3 章[同一篇論文，見《国际月刊》第 5 卷，(1902 年)]。

威尼斯与第四次十字軍:

*皮阿斯(Pears, E.):《第四次十字軍》;《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王国》; *密勒:《拉丁人在利凡得》，第 1—2 章;《剑桥中世紀史》，第 4 卷，第 14、15 章; 布勒伊尔:《中世紀时代教会与东方: 十字軍》，第 7 章，附有参考书目; 微勒哈度因(Villehardouin):《君士坦丁堡的征服》(《人人丛书》); 福得麟罕(Fotheringham, J. K.):《热那亚和第四次十字軍》，載《英国历史評論》，第 25 卷，第 26 頁; 雪微尔:《巴尔干半島史》，第 11 章; 洛德:《阿奇亚的王公》; 托塞:《法兰克人与伯罗奔尼撒》，載《希腊文艺研究杂志》，第 4 卷，第 165 頁; 柏立:《伦巴人与威尼斯人在优卑亚(Eubaea)》，載同上杂志，第 9 卷，第 91 頁; 伽德納(Gardner, A.):《尼西的拉斯卡立·狄奥多》。

塞浦路斯:

斯提华特(Stewart, B.):《塞浦路斯島上的人民、中世紀城市、城堡、古物和它的历史》(伦敦, 1908 年); 士达布斯:《中世紀塞浦路斯和亚美尼亚王国》，載《十七次講演集》，第 8 章; 科布罕(Cobham, C. D.):《塞浦路斯历史資料选輯》(剑桥, 1908 年)。

十字軍的結果:

就情勢來說，十字軍同十二与十三世紀欧洲的轉变，如此錯綜联結着，以致难于作出参考书目。可參閱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八各章的参考书目。下列各书，也可供参考:

普魯茨的論文,見孟祿編:《十字軍論文集》,第45—87頁,同一篇文章,見《國際月刊》,第4卷,第251頁;克寧漢:《西方文明,古代與中世紀》,第103—104節;克寧漢:《英國工商業史》,第1卷,第89、142、186、196、198、205、212、475頁,特別注意,第68節;契納(Cheyney, E. P.):《美國歷史的歐洲背景》,第1、2章;布朗:《威尼斯》,第114—115、116—134、152、190—192、211、218、237—238、251—256、318、324—326頁。關於威尼斯和熱那亞的衝突,參閱司書,第141—148、158—161、190—203、222—234頁;孟祿和塞勒利:《中世紀文明》,第212—223、248—268頁;凱勒:《殖民運動》,第60—73頁;赫欽孫(Hutchinson):《東方貿易和倫巴公社的興起》,載《經濟季刊》,第16卷,第413頁;赫爾姆霍特(Helmholtz, H.):《世界史》,第7卷,第1—137頁;尼斯:《經濟史》,第4章;布浪葵(Blanqui, J. A.):《政治經濟學史》,第14章;柏納(Byrne, E.):《熱那亞人在敘利亞貿易中的商業契約》,載《經濟季刊》,第31卷,第132頁;柏納:《十二世紀熱那亞人在敘利亞的貿易》,載《美國歷史評論》,第25卷,第191頁;柏納:《熱那亞的東方人》,載《美國東方學會雜誌》,第38卷,第176頁;伊立亞特(Yriarte, C.):《威尼斯》,第3章;亞當斯:《新帝國》,第69—85頁;德伊(Day, Clive):《商業史》,第97—99節;摩爾孟蒂(Molmenti):《威尼斯史》;黑茲力特(Hazlitt, W. C.):《威尼斯共和國》,第1卷,第141—187、362—384、442頁;霍治孫(Hodgson, F.):《早期威尼斯史》,第4章;霍治孫:《十三到十四世紀的威尼斯》;帕爾格累甫(Palgrave, F.):《英國與諾曼底史》,第4卷,第455—468、522—540頁;蕭烏(Shaw, W. A.):《貨幣史》,第1—6、9—13頁;布朗:《威尼斯史》,第142—146、158—161頁;阿利絲·羅(Law, Alice, M.):《若干著名的商人大王》,載《經濟學評論》第12卷,第309頁;第12卷,第411頁;塞治尉克(Sedgwick, H. D.):《十三世紀的意大利》,第1卷,第2章;比士雷:《近代地理學的曙光》,第2卷,第394—411頁;芬雷(Finley)《希臘史》,第4卷,第3章,第一節;微厄納(Wiener, L.):《經濟史與語言學》,載《經濟學季刊》(1911年),第239頁;丹弗茲(Danvers):《波斯灣路》,載《亞洲評論季刊》(1888年4月號);尤爾(Yule)版,《馬哥波羅遊記》(哈克琉特會,1903年)《導論》,第9—12節(第41—45頁)。

第十七章 十字軍時期的意大利

很多關於霍亨斯陶芬時代的德意志的著作,也是講到意大利的。

普勒微特(Previte Orton)所編广泛而出色的参考书目:

《剑桥中世紀史》,第5卷,第875—877頁。

英文著作分类书目:

湯普逊:《中世紀史参考书》第2編,第114—116、154—155頁。

一般著作:

*萧布(Schaube, A.):《从地中海地区羅馬人时期到十字軍末期的商业史》(1906年);*哈特曼:《中世紀时代意大利史》,第3—4卷(1915年);*伊維尔(Yver):《十三至十四世紀南意大利的商业和商人》(1903年);*馬斯(Mas Latrie):《中世紀时代和平与通商条約以及有关基督徒和北非阿拉伯人关系的各种文献(1866年)》,續編,1872年;*《剑桥中世紀史》,第4卷,第4、5、11、13章;*亥德:《利凡得商业史》,第1卷,第129—426頁;馬法罗尼(Manfroni, C.):《意大利海軍史》(400—1261年)[勒格洪(Leghorn), 1899年];塞治尉克:《十三世紀意大利》,二卷;庫尔吞(Coulton, G. G.):《从圣法兰西斯到但丁》[根据法拉·撒冷本(Fra Salimbene)的《自传》];泰罗(Taylor, H. O.):《中世紀的心理》,第1卷,第21章,《撒冷本的世界》。

伦巴城市:

*赫欽孙:《东方貿易与伦巴公社的兴起》,載《經濟學季刊》杂志,第16卷,第413頁;*司乃得(Schneider, F.):《意大利城市与乡村教区的起源》(1924年)(杰作);蒲特勒:《伦巴城市公社》;特斯塔(Testa, G.):《腓特烈一世对伦巴公社战争史》(1877年);兰薩尼(Lanzani, F.):《意大利城市公社史》(1882年);霍勒微尔(Haulleville, P. de):《伦巴公社从它們的开始到十三世紀末期的历史》(二卷 1857年);黑格尔(Hegel, C.):《意大利城市宪法史》(二卷, 1847年);霍斯拉茨(Hausrath, A.):《亚諾尔·馮·布里西亚传》(1891年);斐雪:《中世紀帝国》,第2卷,第11章;塞治尉克:《十三世紀的意大利城市》,第1卷,第13—15、18章,海涅曼(Heinemann, L.):《意大利城市宪法的起源(1896年)》;基尼尼(Gianini, F.):《意大利城市公社(1000—1300年)》;微拉里(Villari, P.):《中世紀意大利》,第2卷,第4、9、10章;孟谷西(Mengozzi, G.):《中世紀时代意大利城市》(1914年)。

阿尔卑斯山路:

霍夫曼(Hoffman, J. W.):《中世紀德意志阿尔卑斯山路》,載《政治經濟杂志》,第31卷,第826頁;克拉尔(Clarke, C. L.):《勃伦納山路》;柯立芝(Coolidge, W. B.):《自然界和历史上的阿尔卑斯山路》;柯立芝:《阿尔卑斯

山研究》(历史的和描写性的論文);安劳夫特(Umlauf, F.):《阿尔卑斯山的风土、地质和历史》(1889年);普勒微德-奥吞(Previte-Orton, C. W.):《薩伏衣王室史》(利用山路名称的索引);貝得刻(Baedeker, K.):《瑞士手冊》(关于东阿尔卑斯山,中阿尔卑斯山)。

羅馬城和教廷:

巴尔薩尼(Balzani, U.):《教皇和霍亨斯陶芬朝》;格列高洛味斯(Gregorovius, F.):《中世紀时代的羅馬城》,第4卷;魯夢特(Reumont, A. Von):《羅馬城市》,三卷(1867—1870年);哈尔芬:《中世紀时代(751—1252年)羅馬城行政制度的研究》。

威尼斯:

*西門斯斐尔德(Simonsfeld, H.):《威尼斯的德意志商站和德意志威尼斯的商业关系》(二卷, 1887年);*列尼尔(Lenel, W.):《威尼斯亚得里亚海上霸权的起源》(1897年);《劍橋中世紀史》,第4卷,第13—14章;克勒采迈尔(Kretschmayr, H.):《威尼斯史》,第1卷;摩尔門蒂:《中世紀时代的威尼斯》,第2卷;哈士力特(Hazlitt, W. C.):《威尼斯共和国》;布朗:《威尼斯》;布朗:《威尼斯的国家文件日历》,第1卷,《導論》,第51—113、135—141頁;霍治孙:《威尼斯早期历史》。

热那亚:

*柏納(Byrne, E. H.):《热那亚和叙利亚的貿易》,載《美国历史評論》,第25卷,第191頁;*柏納:《热那亚人在叙利亚貿易中的商业契約》,載《經濟季刊》杂志,第31卷,第128頁;柏納:《热那亚的东方人》,載《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38卷,第176頁;本特(Bent, J. T.):《热那亚》;坎納斯特力尼(Canestrini, G.):《黑海与中世紀意大利人殖民地》,載《意大利史文庫》,新集,第4卷,第1編(佛罗伦薩,1857年);卡罗(Caro):《热那亚与地中海上的权力》,二卷(1895—1899年);圣安极乐(St. Angelo):《卡发洛(Caffaro)和他的时代》(1894年)。

佛罗伦薩,塞亚那,比薩:

*达維德孙(Davidson, R.):《佛罗伦薩史》,第1卷(1896年),意大利文譯本:《佛罗伦薩史,它的起源》(1907—1912年);卡岐斯(Caggese, R.):《佛罗伦薩史》,三卷(1912—1921年);达·吉諾(Da Gino Aria):《佛罗倫薩共和国的商业条約(1901年)》;司乃得:《多斯加納的国家行政制度(568—1268年)》;雪微尔:《塞亚那》;道格拉斯(Douglas, Langdon):《塞亚那史》;戈烏

德:《比薩史(十一至十二世紀)》。

諾曼意大利和西西里(在羅哲爾二世和腓特烈二世統治時代):

*刻替斯(Curtis, E.):《西西里王羅哲爾和下意大利的諾曼人(1016—1154年)》; *察蘭登(Chalandon, F.):《諾曼人統治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歷史》(二卷, 1907年); 哈斯金斯(Haskins, C. H.):《諾曼人在歐洲》, 第7、8章及參考書目, 第248—249頁; *哈斯金斯:《十二世紀英國與西西里》, 載《英國歷史評論》, 第26卷, 第433—447、641—645頁; 卡斯帕(Casper, E.):《羅哲爾二世和諾曼-西西里王國的基础》(1904年); 哈斯金斯和洛克烏德(Haskings and Lockwood):《君主國論的西西里翻譯家》, 載《哈佛古典語言學研究》第23卷, 第155—166頁, 第25卷, 第87—105頁; 馬維爾:《外侵因》, 第11—12章; 尼斯:《經濟學史》, 第2章; 弗利曼:《巴勒摩的諾曼人》, 論文集, 第3集, 第437頁; 弗利曼:《腓特烈豪華者》, 論文集, 第1集, 第283頁; 阿馬里:《西西里的穆斯林史》, 三卷。

安吉文意大利和西西里(1268—1282年):

*喬柏特(Joubert, A.):《那不勒斯王國內安如王族的得勢》(1887年); 約丹(Jordan, E.):《安吉文族統治意大利的起源》; 杜黎(Durrieu, P.):《查理·安如統治下那不勒斯王國內的法國人》(1887年); 麥基爾:《查理·安如在皮德蒙特和倫巴城的統治》(1891年); 斯騰斐爾德(Sternfeld, R.):《查理·安如》, (1888年); 斯尉夫特(Swift, F. Darwin):《阿拉貢王詹姆士一世》, 第9—12章。

第十八章 十字軍時期的法國(1095—1285年)

廣泛的參考書目:

《劍橋中世紀史》, 第5卷, 第901—902頁(只到1280年為止); 賴維斯:《法國史》, 第2卷, 第2章, 第203、227、283、311、334頁; 第3卷, 第1章, 第1、28、83、122、203、297、364、390頁; 藍波德(Ramnaud, A.):《法國文化史》, 第117、135、150、160、177、206、239頁。

英文著作分類書目:

湯普遜:《中世紀史參考書》, 第2編, 第97—100頁。

一般著作:

*盧察爾(Luchaire, A.):《法國在早期卡佩特朝的政治制度史》, 二卷(第2版, 1891年); 盧察爾:《法國制度手冊》(1892年); *盧察爾:《腓力·奧

古斯都时代的法国社会》〔第2版,1909年,克勒比尔(Krehbiel)的英译本:《腓力·奥古斯都时代社会的法国》,1912年];布亚索那德(Boissonade,P.):《中世纪时代基督教欧洲的成就》,第1卷,第7、8、9、10章;第2卷(全部);*加卢(Garreau,L.):《十字军时代法国的社会状况》;塞厄:《中世纪时代法国的…农村阶级》;赖维希:《法国史》,第2卷,第2编,第2册;第3卷,第1编(全卷);《剑桥中世纪史》第5卷,第17、19章(只到1200年为止);提雷(Tiley,A.)(主编):《中世纪法国》,第48—78、179—192、201—206页;蓝波德:《法国文化史》,第1卷,第8—13章;勒伐索(Levasseur,E.):《法国商业史》;勒伐索:《法国工人阶级》,第1卷;勒夸(Lecoy de la marche):《圣路易时代的法国》;倍格诺特(Beugnot,A.):《圣路易时代的制度》;得利尔(Delisle,L.):《中世纪时代诺曼底农民阶级地位和农业状况的研究》(第2版,1903年);柏格尔(Berger,E.):《布浪希·得·卡斯提尔传》;季喜尔摩兹(Guilhiermoz,P.):《中世纪时代法国贵族的起源》;隆格蜡(Langlois,Ch.V.):《腓力大胆人的统治》;勒斯平那斯(Lespinasse,R.de):《亚田·布亚罗(Etienne Boileau)的手工业志》;毕伽达:《水上商人》(1901年);芬克-布伦塔诺(Funk-Brentano,F.):《中世纪法国》,第2—14章。

第十九章 霍亨斯陶芬朝德意志:低原国家 (1125—1250年)

有极好而简要的说明,并附完备的参考书目:

库采克(Kotzschke):《德意志经济史》,第84—92页;革布哈特(Gebhardt):《德意志史手册》,第1卷(第4版,1909年)。

参考书目:

蓝普勒赫:《德意志史》,第12卷,第117—125页;《剑桥中世纪史》,第5卷,第850—854、872—874、878—884页。

英文著作分类书目(不完备的):

汤普逊:《中世纪史参考书》,第2编,第114—116、154—155页。

上面第十一章内所引的很多著作,也讲到霍亨斯陶芬朝时代的。但还应加:

*革德斯(Gerdes,H.):《霍亨斯陶芬朝历史和他们的时代》,1908年;
*印那马:《德意志经济史》,第2卷,1891年;巴哈托尔德(Bachtold,H.):《十二至十三世纪初期北德意志商业史》,1910年;普鲁茨:《皇帝腓特烈一世》,

三卷, 1871—1874 年; 皮洛(Below, G. von): 《中世紀德意志國家》, 第 1 卷, 藍普勒赫: 《中世紀德意志經濟生活》; 尼采: 《宗教事務與市民》, 1859 年; 策爾特(Schulte, A.): 《中世紀時代貴族與教會》, 1910 年; 斯圖茨(Stutz, U.): 《本地教會作為中世紀德意志教會法的要素》, 1859 年; 腓力普孫(Phillipson, M.): 《亨利獅子》, 1918 年; 浦爾(Poole, A. L.): 《亨利獅子》; 勞麥(Raumer, F. Von): 《霍亨斯陶芬朝史》, 六卷(第 5 版, 1878 年); 克勒采麥(Kretschmer, K.): 《中歐歷史地理》, 第 5、7 章; 邁克爾(Michael, E.): 《十三世紀德意志人民的文化地位》, 第 1 卷, 第 1—85, 129—204 頁(1897 年); 惠芝: 《德意志憲法史》, 第 5 卷, 第 185—442 頁(《人民和他們的地位》); 湯普遜: 《封建的德意志》, 第 8—11 章; 加斯納(Gasner, E.): 《德意志公路狀況》(1889 年)。

第二十章 東方殖民運動、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

參考書目:

庫采克: 《德意志經濟史》, 第 85 頁; 藍普勒赫: 《德國史》, 第 12 卷, 第 126—128 頁(第 1 和第 2 版); 帕都(Paetow): 《研究中世紀史的指導書》, 第 220 頁。

*藍普勒赫: 《德意志史》, 第 3 卷, 第 10 編, 第 2 章, 第 343—388 頁(第 3 版, 1906 年); *叔爾茨: 《扎勒河與易北河間地區的殖民地與德意志化》, 1896 年; 湯普遜: 《封建的德意志》, 第 11、13—17 章; 圖特爾(Tuttle, H.): 《普魯士史》, 第 1 卷, 第 1—2 章; 庫采克: 《東德意志殖民史資料》(1912 年); 革德斯(Gerdes, H.): 《霍亨斯陶芬朝和他們的時代史》, 第 428—440 頁; 賴維斯: 《在阿斯坎尼安(Ascaniens)時代的勃蘭登堡, “馬克”》(巴黎, 1875 年); 印那馬: 《德意志經濟史》, 第 3 卷, 第 1 章。

第二十一章 斯干的那維亞國家

丹麥:

*比士雷: 《近代地理學的曙光》, 第 2 卷, 第 514—548 頁; 李奇(Leach, H. G.): 《安吉文不列顛和斯干的那維亞》, 見《劍橋中世紀史》, 第三卷, 第 309 頁及以下; 魯賓遜(Robinson, C. H.): 《歐洲的轉變》, 第 16 章; 阿倫(Allen, C. F.): 《丹麥史》, 二卷, 哥本哈根, 1878 年; 丹爾曼(Dahmann, F. S.): 《丹麥史》, 第 1—3 卷(1840—); 尼爾森(Nielsen, O.): 《哥本哈根的历史與現狀》(哥本哈根, 1877 年)。

挪威:

格泽塞特(Gjerset):《挪威人民史》,第1卷,第174—483頁;威尔逊(Willson, T. B.):《挪威的教会和国家》;鲁滨逊:《欧洲的轉变》,第17章。

瑞典:

格泽(Geijer, E. J.):《瑞典史》,第1—3卷[倫布拉德(Lundblad)的法文譯本];蒙特琉斯(Montelius, O.):《从古代到近代的瑞典史》,第1—2卷,(斯德哥尔摩,1877—1881年)。

第二十二章 穆罕默德教和基督教西班牙

参考书目:

布亚索那德(Boissonade, P.):《西班牙經濟史的研究》,載《历史綜合評論》,第23卷(1911年),第75—97頁;卡洛林(Carolin):《社会經濟季刊》,1913年,第2期;阿尔塔密拉(Altamira, R.):《西班牙史》,第4卷,第587—672頁(1914年);賴維斯和蓝波德:《通史》,第2卷,第719頁;察普曼(Chapman, C. E.):《西班牙史》,第527—540頁;帕都:《指导书》,第149頁(穆罕默德教),第317—320頁(基督教);湯普逊:《中世紀参考书》第2編,第135—138頁。下面只引述英文著作。

穆罕默德教西班牙:

多則(Dozy, R.):《西班牙伊斯兰教》,斯托克斯(Stokes)譯本,1913年;察普曼(Chapman, C. F.):《西班牙史》,第5、6、8、9章;柏克(Burke, U.):《西班牙史》,第1卷,第11、16、19、36章;輝蕭(Whishaw, E. M.):《阿拉伯人西班牙》(1912年);亚諾尔:《伊斯兰教的传布》,第5章;藍浦尔:《摩尔人在西班牙》;伯金斯(Perkins, C.):《西班牙的締造者》,第1卷,第1—3章;里阿諾(Riano):《西班牙的工业技术》;科佩(Coppee, F.):《阿拉伯摩尔人对西班牙的征服》,第2卷,第10冊(文明史);《評論季刊》,第189卷(藍浦尔的书評);阿米尔(Ameer Ali):《薩拉森統治下的西班牙》,載《十九世紀杂志》,第34卷,第498頁;孟祿和塞勒利:《中世紀文明史》,第224—239頁。

基督教西班牙:

*麦立曼(Merriman, R. B.):《西班牙帝国的兴起》,第1卷,第1—7章;柏克:《西班牙史》,第1卷,第13、17、18、20、21、24、25章;斯尉夫特(Swift; F. Darwin):《阿拉貢王詹姆士一世》;比士雷:《阿拉貢王詹姆士一世》;克莱因(Klein, J.):《米西达》(“Mesta”),載《哈佛經濟研究》,第21期。

第二十三章 中世紀時代商人旅行、市場、 香賓市集、貿易經營

參看《十字軍時期意大利》(第十七章)和《十字軍》(第十六章)所列出的參考書目。

牛頓(Newton, A. P.)等:《中世紀時代旅行和旅行家》(一系列論文);其中包括有:主編者:《中世紀時代的世界觀》;雷斯特納教授(M. L. W. Laistner):《地理學知識的衰落》;貞琴茲教授(Claude Jenkins):《基督徒的進香》;馬維爾教授(Alan Mawer):《外侵團時代》;亞諾爾教授:《阿拉伯旅行家和商人》;迈恩道夫男爵(A. F. Meyendorff):《東歐貿易》;鮑威爾(Eileen Power):《通中國的陸路》;主編者:《旅行家的故事》;羅斯勳爵(Sir E. Denison Ross):《祭司約翰(Prester John)》;普勒斯塔奇教授(E. Prestage):《通印度的海路》。

*比士雷:《近代地理學的曙光》,三卷;*布奎洛特(Bourquelot, F.):《香賓市集的研究》二卷,《藝術學院叢書》(1865年);*比倫納:《城市和市集》,載《歷史評論》,1898年;基爾福德(Guilford, E. L.):《中世紀時代旅行家和旅行》;赫微林(Huvelin):《市集和市場法史》;瓦爾福德(Walford, O.):《過去和現在的市集》。

第二十四章 新寺院團

廣泛的參考書目:

《劍橋中世紀史》,第5卷,第909—920頁。

英文著作分類書目:

湯普遜:《中世紀史參考書》,第2編,第110—113、166—169(法蘭西斯派與多米尼克派)。

一般著作:

《劍橋中世紀史》,第5卷,第20章;*盧察爾(Luchaire, A.):《腓力·奧古斯都時代的法國社會》,第2章;*盧察爾:《法國制度手冊》,第1卷(附有參考書目);加盧(Garreau, L.):《十字軍時代法國社會的狀況》,第427—462頁;柏利厄爾(Dom Berliere):《寺院團》,《從開始到十三世紀》,二卷(1924年);真涅斯塔爾(Genestal, R.):《寺院在建立信貸制度中的作用》(1901

年)。

十一至十二世纪的宗教复兴运动:

亚当斯(Adams, Henry):《圣米雪尔山和特許状》(杰作);泰罗:《中世紀的心理》,第1卷,第3册;普賴厄(Prior, E. S.):《哥特式建筑术史》;李亚:《教士的独身制》。

克倫尼:

*薩科尔(Sackur):《克倫尼教派》,二卷(关于书評,见《英国历史評論》,第10卷,第293頁,第23卷,第762頁,第24卷,第123頁);《天主教百科全书》;孟祿和塞勒利:《中世紀文明》,第137—152頁;格累姆(Graham, Rose):《十一世紀克倫尼寺院生活》,載《神学研究杂志》,第16卷(1916年);格累姆:《克倫尼对其他寺院运动的关系》,載《神学研究杂志》,第15卷(1915年);湯普逊:《封建的德意志》,第2—3章。

息斯脫西安派:

*阿布亚(Arbois de Jubainville):《息斯脫西安派寺院》(1868年);霍夫曼(Hoffman, E.):《息斯脫西安派寺院团的經濟原則的发展》,載《哥勒学会的历史年鉴》,第31卷(1910年);多尔堡(Dolberg):《息斯脫西安派僧侶和他們的轉变为农夫与工人》,见《本尼狄克派与息斯脫西安派的研究与資料》,第13卷(1892年);《天主教百科全书》;馬孙(Mason, W. A. P.):《息斯脫西安派的开端》,譯文,皇家历史学会,新編,第19卷,第169頁;格累姆:《未茲雷的一个住持》;文特(Winter, F.):《北德意志的息斯脫西安派》二卷。寺院制度下的妇女:

*厄坎斯坦因:《寺院制度下的妇女》;萊特(Wright, T.):《妇女界》,第5章;帕特南(Putnam, E. J.):《女士》(女住持)。

圣法兰西斯的先驅:

达維德孙(Davidson, E. S.):《圣法兰西斯的先驅》(1927年);塞治尉克:《十三世紀的意大利》,第1卷,第4、7章。

法兰西斯派:

*塞治尉克:《十三世紀的意大利》,第1卷,第7、25章;第2卷,第7章; *庫尔吞:《从圣法兰西斯到但丁》; *約根孙(Jorgensen, J.): *《阿西栖·圣法兰西斯传》,(1912年); *布魯厄(Brewer, J. S.):《法兰西斯派的古文献》,第2卷,《导論》和第7—9章;泰罗:《中世紀的心理》,第1卷,第18、21章;哈那克:《教条史》,第6卷,第84—117頁;爱麦吞(Emerton, E.):《法拉·撒冷

本(Fra Salimbene)和法兰西斯派理想》，載《哈佛神學評論》(1915年)；庫爾吞：《托鉢僧的失敗》，載《希柏特(Hibbert)雜誌》(1907年1月号)；庫爾吞：《法兰西斯派的側面觀》，載《中世紀研究》，第3期；澤索普(Jessopp, A.)：《托鉢僧的出現》；杜布亞(Dubois, L. L.)：《社會改革家聖法兰西斯》(華盛頓, 1904年)；休勒特(Hewlett, M.)：《一個中世紀著名的傳道師》，載《十九世紀雜誌》，第28卷，第171頁；休勒特：《一個流浪托鉢僧的自傳》(撒冷本)，載《十九世紀雜誌》(1905年)，第1009頁；立特爾(Little, A. G.)：《討飯的托鉢僧》，載《英國歷史評論》，第9卷，第121頁；賴維斯：《法國史》，第3卷，第1編，第246—263頁。

多米尼克派：

卡爾布勒茨(Galbraith, G. R.)：《多米尼克寺院團的規程》；巴刻(Barker, E.)：《多米尼克寺院團與教士會議》。

第二十五章 教會與封建社會

本題的性質非常複雜；所以幾乎不可能作出一張完備的參考書目表。下面只列出大量著作中的一小部分。

廣泛的參考書目：

《劍橋中世紀史》，第3卷，第636—638頁，第5卷，第846—854頁。

英文著作分類書目：

湯普遜：《中世紀史參考書》，第2編，第102、142—150頁。

上帝和平運動：

赫伯特(Huberti)：《上帝和平與公共安全的法律史研究》(1892年)；麥特蘭(Maitland, F. W.)：《選輯》，第2卷，第290—297頁；鮑威克(Powicke, F. W.)：《諾曼底的喪失》，第93—98頁。

教會的封建化過程：

盧察爾：《法國制度手冊》，第1卷；*革德斯：《德意志人民在薩克森國王時代(651—709年)的歷史》；*革德斯：《薩克森皇帝的歷史和他們的時代，449—564年》；*革德斯：《霍亨斯陶芬朝史和他們的時代，567—643年》；*斯圖茨(Stutz, U.)：《本地教會作為中世紀德意志教會法的要素》(1895年)；*湯普遜：《封建的德意志》，第1—3章；*盧察爾：《腓力·奧古斯都時代的法國社會》，第1、2、4、5、6、7章；孟祿和塞勒利：《中世紀文明》，第188—201頁；惠芝：

《德国宪法史》，第7卷，第183—301页；加卢(Garreau, L.):《十字军时代法国的社会状况》，第365—426页；印巴特:《古代法国乡村教区》(1900年)；印巴特:《法国教会的主教选举》(1890年)；库尼革(Koeniger, M.):《窩姆斯的柏查德(Burchard von Worms)和他时代的德意志教会》(1905年)；霍克(Hauck, A.):《德国教会史》，第3卷；斯图茨:《教会恩赐地制度史，从它的开始到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代止》，第1卷，第1编，(1905年)；托马斯(Thomas, P.):《中世纪时代俗人对教会财产的产权和俗人的庇护权》(1906年)；司乃得:《十二世纪的教廷与寺院》，二卷(1910年)；李亚:《迷信与力量》；李亚:《教会史的研究》，第346—391、524—574页；布拉茨福德(Blatchford, A. N.):《教会会议和它们的命令》(1909年)；斯密司(Smith, A. L.)《中世纪时代的教会与国家》；维奥雷特(Viollet, P.):《法国的政治制度》，第2卷，第2章(附有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帕卡德(Packard, S. R.):《英诺森三世时代的欧洲与教会》。

教会的地主地位:

很多上引著作，也是有关本题的。参看本章和二十七章的书目:

*库采克(Kotzschke, R.):《罗尔河畔威尔登大庄园管理史的研究》(1901年)；*库普兰(Coopland, G. W.):《圣柏腾寺院》，见《牛津社会法律史研究》，第4卷；纳尔逊(Nelson, N.):《拉姆塞寺院的经济情况》(1898年)；阿第(Ady, S. O.):《教会与庄园》；洛奇(Lodge, E.):《波尔多圣安德勒大主教与僧会的庄园》，载《牛津社会法律史的研究》，第3卷；黑尔(Hale, W. H.):《圣保罗教会的土地调查录》，《导论》(坎登学会，1858年)；泽索普(Jessopp, A.):《一个出家人的研究》，第143页(《过去时代的土地和它的所有人》)；史蒂芬孙:《阿平顿寺院的编年史》(《案卷丛书》，第二集)，《导论》，第78—88节；《布罗克兰的佐塞兰寺院的编年史》(《皇家古典著作丛书》)；莱利(Riley, H. T.):《圣阿尔班寺院的簿册》(《案卷丛书》，第28集)，第3卷，《导论》，第29、37页；赖雪尔(Reichel, O. J.):《十一世纪教会和教会的基金》，译文，得文州协会，1907年，第360—363页。

教士与民众:

*泰罗:《中世纪的心理》，第1卷，第20章；*斯密司:《中世纪时代的通俗传教》，《英国历史评论》，第7卷，第25页；哈斯金斯:《十三世纪巴黎大学的布道》，载《美国历史评论》，第10卷，第1页；迈立克(Myric, John):《给教区教士的训令》〔皮科克(Peacock)主编，英国古文献协会，1902年〕；刻兹(Cutts,

E. L.):《教区教士和他們的群众》;哈那克:《教条史》,第6卷,第108—115頁;加斯奎特(Gasquet, Cardinal F. A.):《中世紀英国的教区生活》;理查孙(Richardson, H. G.):《十三至十四世紀的教区僧侶》,譯文,皇家历史学会,第3集,第6卷,第89—128頁;泽索普:《英国宗教改革前的教区教士》,載《十九世紀杂志》,第36卷,第46—88頁(也见于他的《一个出家人的研究》);庫尔吞:《宗教改革运动前的教士与民众》,載《現代評論》,第91卷,第795頁,第92卷,第71頁;休勒特:《中世紀时代的一个通俗传教师》,載《十九世紀杂志》,第28卷,第471頁;斯密司:《十三世紀的法国传教师》,載《爱丁堡評論》,第179卷,第537頁;斯密司:《十三世紀的僧侶生活》,載《都柏林評論》,第4集,第7卷,第1期;庫尔吞:《六百年前的一个复兴主义者》[累根斯堡的柏托尔德(Berthold)],載《中世紀研究》,第1集,第2期;西蒙(Symonds, J. A.):《专制者的时代》,附录IV;勒夸(Lecoy de la Marche, A.):《中世紀时代法国的主教座》;洛息厄尔(Rosieres, R.):《法国宗教史的批判研究》;窩尔(Wall, J. C.):《一个古老的英国教区》。

关于十字軍的宣传:

*勒夸:《十三世紀十字軍的宣传》,載《历史問題評論》,第48卷(1890年),第5—23頁;*罗立赫特(Roehricht, R.):《反对伊斯兰教的十字軍宣传》,載《教会史杂志》,第6卷(1884年),第550—572頁。

教会与救济事业;医院:

《天主教百科全书》,第3卷,第594頁;《軍事服务制度杂志》,第12卷,第734頁(关于医院);《評論季刊》,第197卷,第384—394頁;馬开(Mackay):《巴黎的医院与慈善事业》(1923年);克雷(Clay, R. M.):《老英格兰的中世紀医院》;斯比克曼:《中世紀医院》,載《都柏林評論》,新編,第40卷(1903年),第8頁;藍柏特:《中世紀时代的麻疯病》,《十九世紀杂志》,第16卷,第467—489頁;柯斯格罗夫(Cosgrove, J. J.):《卫生史》;勒·格兰德(Le Grand, L.):《城市主要医院的地位和麻疯病医院》(1901年)。

教会的腐化:

*泰罗:《中世紀的心理》,第1卷,第20章;*卢察尔:《腓力·奥古斯都时代的法国社会》,第2、4、7章;*李亚:《懺悔与赦罪符》,第1卷,第240—249頁(略讀);*李亚:《宗教裁判所史》(略讀);*李亚:《秘密懺悔史》(略讀);李亚:《教士独身制》(略讀)(參閱《評論季刊》,第117卷的书評,第514頁);塞治尉克:《十三世紀的意大利》,第1卷,第7章;布魯厄(Brewer, J. S.):《吉

拉蒂·坎布伦塞斯(Giraldi Cambrensis)的著作»,第2卷,《导論»,第54頁及以下(《案卷丛书》),庫尔吞:《托鉢僧的失敗»,載《喜帕特杂志》(1907年)。

异端运动,可看作社会經濟不靖状态的表現。关于这方面,沒有专门論著。但可从一般讀物里找出資料。

一般参考书:

孟祿:《中世紀时代»,第30章;阿克吞勳爵(Acton, Lord)的論文:《英国历史評論»,第3卷,第773頁(評李亚的《宗教裁判所史》一书);李亚:《教士独身制»,第23章;李亚:《宗教裁判所史»,第1卷,第2章;李亚:《异端財產的沒收»,載《英国历史評論»,第2卷,第235頁;吐柏微尔(Turberville):《中世紀异端和宗教裁判所»;卢察尔:《英諾森三世»,第2卷(第2版,1906年);发坎达德(Vacandard, E.):《宗教裁判所》(巴黎,1909年)[康威(P. L. Conway)英譯本,第一版,紐約,1908年];杜林革(Doellinger, J. J. I. von):《对中世紀时代教派史的貢獻»,二卷(1890年);柏立:《思想自由史»;特伦岐(Trench, R. C.):《教会史講演集»,第15章;牛曼(Newman, A. H.):《关于中世紀教会派的最近研究»,載《美国教会史学会議事紀录»,第4卷,第167頁(1892年);伊尔斯(Eales, S. J.):《圣伯尔拿全集»,第1卷,《导論»,第51—82节;发坎达德:《圣伯尔拿传»;《天主教百科全书»,查閱“异端”、“亚諾尔派”、“发尔多派”、“卡塔里派”等詞目。

卡塔里派或亚尔比派:

*摩利涅厄(Molinier, A.):《教会和卡塔里会》,〔法国〕載《历史評論»,第94卷,第225—248頁,第95卷,第1—22,263—291頁; *杜亚斯(Douais, C.):《亚尔比教派》(巴黎,1879年); *李亚:《宗教裁判所史»,第1卷,第3—4,7—14章,第2卷,第1章; *卢察尔:《英諾森三世,对亚尔比教派十字軍》(1905年); 卢察尔:《腓力·奥古斯都时代法国社会》(查閱“异端”和亚尔比教派詞目索引); 得·科松(De Cauzons, T.):《亚尔比教派与宗教裁判所》(第2版,巴黎,1908年); 杜亚斯:《亚尔比教派与十三世紀那旁的传教弟兄会》(巴黎,1894年); 貝拉特(Peyrat, N.):《亚尔比教派史»,三卷(巴黎,1870—1872年); 孟祿和塞勒利:《中世紀文明»,第432—457頁(摘自卢察尔); 哈那克:《教条史»,第3卷,第316—336頁; 发坎达德:《宗教裁判所》第3—5章; 斯密特:《卡塔里教派的历史与教义»,二卷(1849年)。

发尔多派或里昂穷人会:

*得·科松:《发特人(Vaudois)与宗教裁判所»,第3版(巴黎,1908年);

*穆勒 (Müller, K.): «十四世紀开始前发尔多派和他們的个别集团», 皋塔 (1886 年); *普勒革 (Preger, W.): «对中世纪发尔多派历史的貢獻», 巴伐利亚皇家科学院, 語言历史組, 第13卷 (1877 年), 第181—250 頁; 还应参閱《古代法国发尔多派的組織》, 同上, 第 19 卷 (1891 年), 第 639—711 頁; 狄克霍夫 (Dieckhoff, A.): «中世紀时代发尔多派» (格丁根, 1851 年); 孔巴 (Comba, E.): «发尔多派的历史»; 斯密特: «卡塔里派的历史与教义», 二卷 (1849 年), 第 95 章, 第 1—22, 263—291 頁; 威得 (Vedder, H. C.): «美国神学杂志», 第 4 卷, 第 465 頁; 李亚: «宗教裁判所史» (利用索引); 麦特兰: «事实与文献», 說明亚尔比派和发尔多派的历史 (1832 年); 美利亚 (Melia, O.): «发尔多派的起源、迫害和教义» (1870 年)。

教会和教皇財政:

*李亚: «懺悔与赦罪符», 第 1 卷, 第 275 頁及以下, 第 404—411 頁, 第 4 卷, 第 4 章; *伦特 (Lunt, W. E.): «中世紀教廷的財政制度», «經濟學季刊», 第 23 卷, 第 313 頁; *微阿德 (Viard, P.): «十二至十三世紀法国教会的什一稅史» (2 卷, 1909, 1912 年); 伦特: «征收僧官的第一年进款», 載《美国历史評論》, 第 18 卷, 第 48 頁; 伦特: «早期教廷的征稅估价», 載《美国历史学会年報》(1917 年), 第 265 頁; 伦特: «爱德华一世时代的教廷稅», 載《英国历史評論》, 第 30 卷, 第 398 頁; «1304 年英国教廷征稅吏的帳冊», 載《英国历史評論》, 第 28 卷, 第 313 頁; 格累姆 (Graham): «尼古拉四世的征稅», 同上, 第 23 卷, 第 434 頁; 格累姆: «瓦尔吞修道院的財政», 譯文, 皇家历史学会, 新編, 第 18 卷; 眞森 (Jensen): «神圣彼得便士», 同上, 新編, 第 18 卷; 尼斯 (Nys, E.): «經濟学史研究», 第 9 章; 斯密司: «中世紀时代的教会与国家» (論英諾森四世); 得利尔 (Delisle, L.): «神庙騎士团的財政管理» (《文艺学院論文集》, 第 33 卷)。

第二十六章 封建社会

关于本題, 不可能企求作出一个参考书目, 因为它涉及中世紀經濟社會史的每一角落。关于德意志、法国、意大利、教会、寺院制度、庄园、城市所引的大量著作, 也是有关本章的。为了避免重复起见, 下面只列出一张簡表。卢察尔 (Luchaire) 的《法国制度手冊》, 第 2 編, 是有关本題的最好作品。书中有大批参考书目。

*道烏和塞諾博斯 (Dow and Seignobos): «封建制度», 紐約, 1902 年;

費諾格拉道夫:《十一世紀的英国社会》;維奧雷特(Viollet, P.):《法国的政治制度》,第1卷,第237頁;卢察尔:《腓力·奥古斯都时代的法国社会》,第8、9、10、11章;亚当斯:《中世紀时代的文明》,第9章;孟祿和塞勒利:《中世紀文明》,第159—211頁(封建制度的真实性),第240—247頁(騎士制);布里苏德(Brissaud, J.):《法国的公法》;爱斯迈(Esmein, A.):《法国法律史初阶》(第6版,1905年),哈斯金斯:《諾曼底的騎士服务》,載《英国历史評論》,第22卷,第636頁;爱斯迈:《大陆上的刑事程序史》;李亚:《迷信与力量》;亚当斯:《中世紀德意志的法律》,載《北美評論》,第113卷,第198頁;厄普科特(Upcott):《有关十一至十二世紀礼节的文件汇编》(关于这本杰作的书评,见《評論季刊》第63卷,第414—454頁);霍尔(Hall, H.):《金雀花朝的宫廷生活》;巴特孙(Bateson, Mary):《中世紀英国》,特別注意第2、8章;馬克尼尔(Macneal, E. H.):《封建貴族与教会》,《美国历史学会年报》,1914年,第1卷,第149頁;劍橋中世紀史》,第3卷,第18章;伊文斯(Evans, Joan):《中世紀法国》;大卫斯(Davis, W. S.):《中世紀男爵阶层的生活》;巴拉德(Ballard, A.):《城堡卫士和男爵住宅》,載《英国历史評論》,1910年10月;克拉克(Clark, G. T.):《中世紀軍事工程》;維奧雷特:《一座炮垒史》(1876年);維奧雷特:《一个家族的历史》(1874年);奥曼:《中世紀时代的战术》,特別注意第6卷;泰罗:《中世紀心理》,第1卷,第521—613頁;庫尔吞:《不列顛的社会生活,从諾曼征服到宗教改革运动止》;賴維斯:《法国史》,第3卷,第1編,第364—389頁;藍波德:《法国文化史》,第1卷,第2編,第117—238頁。

中世紀时代的犹太人。

1. 一般参考书:

紐巴厄尔和斯騰(Neubauer and Stern):《中世紀犹太編年史》,四卷(參閱《英国历史評論》,第11卷,第553頁);阿伯拉罕斯(Abrahams, I.):《中世紀时代犹太人的生活》(1896年);腓力普逊:《老欧洲的犹太族》(1894年);格拉茨(Graetz, H.):《犹太人史》,第3卷;李亚:《懺悔与赦罪符》,第2卷,第123頁及以下;尼斯:《經濟学史》,第7章;帕尔格累甫(Palgrave, R. H. I.):《政治經濟詞典》,《犹太人》;赫黎斯(Harris):《中世紀犹太人的历史(711—1492年)》;《犹太百科全书》,“英国”、“法国”、“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各詞目;比士雷:《近代地理学的曙光》,第2卷,第15章;沙夫(Schaff, P.):《教会史》,第5卷,第77节;布浪葵(Blanqui):《政治經濟学史》,第15章;得令革(Dollinger, J. von):《欧洲历史研究》,《欧洲的犹太人》;斯

比尔斯(Spiers):《中世紀时代犹太人与基督教的爭論》,載《犹太評論季刊》,第3卷,1912—1913年,第512—537頁;高夫曼(Kaufman):《中世紀时代犹太告密者》,載《犹太評論季刊》,第8卷,第217頁及以下,第572頁及以下,第709頁及以下;康德尔(Conder, C. R.)《东方犹太人》,載《苏格兰評論》,第35期;沙夫:《中世紀犹太人》,載《宗教书目提要》,第60卷,第547頁;《英国历史評論》,第7卷,第543頁(一篇書評)。

2. 英国的犹太人:

格勒茨(Graetz):《犹太人史》,第3卷,第12、14、16、17章;密尔曼(Milman, H. H.):《犹太人史》,第3卷,第25編;立格(Rigg, J. M.):《十三世紀英国的犹太人》,載《犹太評論季刊》(1903年10月号,參閱《英国历史評論》,第18卷,第206頁);立格:《英国逐出犹太人》載《犹太評論季刊》,第7卷(1894—1895年),第75—100、235—258、428—458頁,第8卷,第360頁;立格:《度支部案卷中关于犹太人的辯訴及其他紀錄选編》(1220—1284年),塞尔登学会(參閱《雅典杂志》,1902年3月22日,第364頁);雅科布斯(Jacobs, J.):《安吉文英国的犹太人》;雷奥那德(Leonard):《1290年爱德华一世驅逐犹太人》,載《皇家历史学会报告》,新編,第5卷,第103頁;科科斯(Coccos):《1290年密封案卷中关于犹太人的摘要》,載《犹太学会报告》第4卷(1903年);《英国历史評論》,第2卷,第161、363—365頁;第8卷,第543—544頁;第10卷,第788—789頁;第17卷,第551—554頁;第18卷,第206頁;第21卷,第369頁;第25卷,第322頁;第26卷,第380—383頁;雅姆孙(Hyamson):《英国犹太人史》(參閱《雅典杂志》,第1卷,1908年,第228、442頁);麦特兰:《教会管事与犹太妇女:或习惯法上的背教》,《法律評論季刊》,第2卷,第153—165頁;哥德士密特:《英国的犹太人》;格罗斯(Gross, C.):《中世紀时代英国犹太人度支部》,二卷;紐波尔:《关于牛津犹太人筆記》,《牛津历史学会》,第2卷,1890年;克宁汉:《英国工业与商业》,第1卷,第93章;鮑威克:《諾曼底的喪失》,第354—356頁;阿伯拉罕斯:《犹太历史学会报告》,第2卷,1894—1895年,第76—105頁;阿伯拉罕斯:《1290年犹太人的被逐》,載《犹太評論季刊》第7卷,1894年,第75—100、428—458頁;雅科布斯:《关于安吉文国王时代英国犹太人筆記》,載《犹太历史学会报告》,第3卷,1896—1898年,第126—143頁。

3. 法国的犹太人:

格拉茨:《犹太人史》,第3卷,第11—17章,第4卷,第1—5章;达美斯

特脱(Darmesteter):《十四世纪法国的犹太人》,载《双周评论》,1892年3月号;《英国历史评论》,第8卷,第543页。

4. 西班牙的犹太人:

格拉茨:《犹太人史》,第3卷,第7—11、14—17章;第4卷,第2—11章;阿德勒:《宗教裁判所和犹太人》(参阅《英国历史评论》,第24卷),第345页;微拉密尔(Villamil):《早期西班牙历史上的犹太人》,载《天主教世界杂志》,第54卷,第86、360页,第55卷,第649页;微拉密尔:《西班牙驱逐犹太人》,载《天主教世界杂志》,第58卷,第49页;斯尉夫特:《阿拉贡王詹姆士一世》,第115、170—177、221—224、233、245—252页;柏克(Burke, U.):《西班牙史》,第2卷,第68、119—128页;林度(Lindo):《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史》;斯科特(Scott, S.):《欧洲的摩尔帝国》,第3卷,第24章;阿德勒:《君士坦丁堡的西班牙助手》,载《犹太评论季刊》,第11卷,1899年,第526—529页;雅科布斯:《西班牙犹太人史》,载《犹太评论季刊》,第8卷,1896年;雅科布斯:《西班牙犹太人历史资料》,载《犹太评论季刊》,第6卷,1894年,第597—632页。

5. 意大利的犹太人:

格拉茨(Graetz):《犹太人史》,第3卷,第14、16章,第4卷,第2、4、6、8、10章;《南意大利犹太人早期殖民地》,载《犹太评论季刊》,1892年7月和10号;《犹太评论季刊》,第2卷,1890年4月号;摩尔孟蒂:《威尼斯:中世纪时代》,第1卷,第7章;犹太百科全书,第7卷,第1—10页。

6. 德意志的犹太人:

纽波尔和斯腾(Neubauer and Stern):《五种犹太编年史的希伯来语原文和德语译文》;《犹太百科全书》,查阅“德意志”词目;格拉茨:《犹太人史》,第3卷,第8—9、16—17章,第4卷,第3—5、7—9章;卫布纳:《德意志私法史》,第83—86页。

第二十七章 中世纪庄园:中世纪时代农民的生活

关于庄园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很多是带有争论性与技术性的。可惜,大部英文著作是讲述英国的,而英国的情况常和大陆上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摩尔(Moore, M. F.)的两种研究中世纪史参考书目选辑里,第71—167页(1912年),可找出一张长的参考书目表。关于本题的入门书,列举如下:

*拉普斯雷(Lapsley, G. T.):《土地产权的起源》,載《美国历史評論》,第8卷;厄尔吞(Elton):《土地占有的早期形式》,載《英国历史評論》,第1卷,第427頁; *佛斯特尔(Fustel de Coulanges):《土地产权的起源》,阿士力(Ashley)夫人的譯本(第2版,1892年); *迈曾(Meitzen):《殖民和农业》,三卷(附有很多地图,1895年); *科伐辽夫斯基(Kovalevsky, M.):《欧洲的經濟发展》(六卷,柏林,1901年),第1—4卷; *費諾格拉道夫:《庄园的起源》; *費諾格拉道夫:《英国賤农制》; *格拉斯(Gras, N. S. B.):《农业史》,第4章; *格拉斯:《經濟史导論》,第3章; *阿士力:《英国經濟史》,第1卷,第1、5、6章阿士力的論文載《經濟杂志》,1913年6月号; 阿士力:《賤农租地》,載《美国社会政治科学院年鉴》,第1卷,第412—425頁; 阿士力:《历史和經濟概論》; 麦特兰:《末日审判册及其他》(Domesday and Beyond),特別注意:第2章;《古代社会的残余》,載《法律評論季刊》,第9卷,第36、211頁;《敞开田制的繼續》,載《經濟学季刊杂志》,第20卷,第62頁;《农业服务》,載《經濟杂志》,第10卷,第308頁;《英国百科全书》(11版)查閱詞目:“末日审判册”由朗德(J. H. Round)作;塞波姆(Seebom, F.):《英国农村社会》(第4版,1890年);塞波姆:《习惯亩》;利普孙(Lipson, J. E.):《英国經濟导論》,第1卷,第1—3章;契納(Cheyney, E. P.):《中世紀庄园》,載《美国社会和政治科学院年鉴》,第101期;格果(Gray, H. L.):《英国田地制度》;克宁汉:《英国工商业史》,第1卷,第79—82节。

中世紀耕种方法和农民生活:

*卢察尔:《腓力·奥古斯都时代的法国社会》,第13章;辛克霍維奇(Simkhovitch):《干草与历史》,載《政治科学季刊》第28期,第385頁; *刻什曼(Curschmann, F.):《中世紀时代的飢荒》(1900年); 霍納(Hone, N. J.):《庄园和庄园紀录》(1906年); 厄瑟(Usher, A. P.):《土质肥沃和土壤枯竭以及它們的历史意义》,載《經濟学季刊杂志》,第27卷(1923年),第385—411頁; 达文波尔特(Davenport, F. G.):《一所厄塞克斯庄园上的农奴制》,載《英国历史評論》,第20卷,第479頁; 得利尔:《中世紀时代……农民阶级情况的研究》; 亚甫涅尔:《七百年来的农民与工人》(1890年); 藍普勒赫:《十一世紀法国的經濟状况》(馬立南譯本); *亨雷的窩尔脫(Walter of Henley):《农业》,拉蒙(E. Lamond)出版,(1890年); 克宁汉:《亨雷的窩尔脫农业书》,皇家历史学会譯本,新編,第9卷; *汉森(Hanssen, G.):《农业史論文集》,第2卷,特別注意第179—329頁; *塞波姆:《英国农村社会》,第1、4、

10 章(附有有价值的地图); 藍普勒赫:《中世紀时代德意志的經濟生活》, 第1卷, 第1編, 第331—385, 532—584 頁; 費諾格拉道夫:《十一世紀英国社会》, 第279—304 頁; 庫普兰:《圣柏騰寺院》, 见《牛津社会法律史研究》, 第4卷, 第8章; 斯密司:《中世紀英国农业》, 載《評論季刊》, 第159卷, 第323 頁; 斯密司:《英国庄园》, 載《評論季刊》, 第207卷, 第129 頁; 福勒(Fowler):《一所典型的中世紀村庄》, 載《經濟学季刊杂志》, 第9卷, 第151 頁; 哈斯巴赫(Hasbach, W.):《英国农业劳动者史》(1908年); 李丹(Leadam, I. S.):《英国的賤农》, 載《政治科学季刊》, 第8卷, 第653 頁; 泽索普(Jessopp, A.):《过去时代的土地和它的所有人》, (对一个出家人的研究), 第143—183 頁; 泽索普:《托鉢僧的出现》, 第2章; 斯尼尔(Snell, F. J.):《老英格兰的习惯法》, 第18章; 洛泽斯(Rogers, J. E. T.):《农业和物价史》, 第1卷, 第1—2章; 洛泽斯:《工作和工資》, 第2章; 卡弗尔(Carver, T. N.):《农村經濟讀本》, 第151—162 頁; 朱德溫(Jeudwine, J. W.):《社会基础和土地》(1918年); 刻特勒(Curtler, W. H. R.):《英国农业簡史》(1909年); 加內(Garnier, R.):《英国土地利益史》; 庫尔吞:《中世紀村庄》(1926年)。

中世紀时代的奴隶制:

*比吉拍(Pijper)的論文, 載《美国历史評論》, 第14卷, 第675 頁; *威泽兰(Wergeland, A. M.):《中世紀时代德意志社会的奴隶制》, 載《政治經濟学杂志》, 第9卷, 第98和398 頁; 李亚:《教会史的研究》, 第524—574 頁, 同一篇論文, 见《北美評論》, 第100卷, 第21 頁; 瓦士本(Washburn)的論文, 載《北美評論》, 第41卷, 第174 頁; 印格兰(Ingram, J. K.):《奴隶制史》; 涅波尔(Nieboer):《作为一种工业制度的奴隶制》, 第4章; 克宁汉:《英国工商业史》, 第1卷(利用索引); 《劍桥中世紀史》, 第2卷, 第62—66, 149—150 頁。

物价与工資:

格拉斯:《英国谷物市場的演变》, 第11—17, 261—270 頁; 洛泽斯(Rogers N. S. B.):《农业和价格史》, 第1—4卷; 亚文涅尔(Avenel):《财产、工資、商品以及一般物价的經濟史》, 第2—4卷。

第二十八章 城市和行会

一般运动:

*阿士力:《中世紀时代城市生活的开端》, 載《經濟季刊杂志》, 第10卷,

第 359 頁; *比倫納:《中世紀城市,它們的起源和貿易復興》; *刻特根(Kentgen, F. W.):《中世紀城市公社》,載《英國百科全書》,第 11 版,第 6 卷,第 784 頁; 厄斯皮那斯(Espinas, G.):《中世紀時代杜亞的城市生活(四卷,1913 年)(傑作)》;《劍橋中世紀史》,第 5 卷,第 19 章; 吉利和勒維爾(Giry and Reville):《城市的解放》[杜烏(Dow)的英譯本]; 孟祿:《中世紀史》,第 29 章; 亞當斯:《中世紀時代的文明》,第 12 章; 泰羅:《中世紀心理》,第 2 版,補充章; 克寧漢:《中世紀和近代的西方文明》,第 86—88,94 節; 赫因蕭(Hearnshaw, F. J. C.):《中世紀對近代文明的貢獻》,第 8、9 章; 印格蘭:《奴隸制史》,第 4—5 章; 尼斯:《經濟學史研究》,第 3 章; 賴維斯和藍波德:《通史》,第 2 卷,第 44—76 頁; 西摩勒耳(Schmoller, G.):《商業制度》,第 6—13 頁(1884 年); 布岐爾(Bucher, K.),《工業演化》(衛克特譯文),第 114—133 頁; 皮洛:《經濟史上的問題》,第 202—257 頁(1920 年); 斯蒂芬孫:《人丁稅的起源》,載《比利時語言和歷史評論》,第 5 卷,第 801—870 頁。

城市起源說:

*比倫納:《中世紀時代的城市憲法》,載《歷史評論》,第 53 卷(1893 年),第 52—83 頁,第 57 卷(1895 年),第 57—98,293—327 頁; *布琴(Bourgin, G.):《城市的起源》,載《歷史綜合評論》,第 7 卷(1903 年); *阿士力:《歷史與經濟概論》,第 167—226 頁; 黑格爾(Hegel, C.):《中世紀時代德意志人民的都市與行會》(二卷,1891 年)(反對城市起源於行會說; 比較刻特根的評論,見《英國歷史評論》,第 8 卷,第 120 頁及以下和《經濟評論》,第 3 卷,第 784 頁); 黑格爾:《德意志市政的起源》(1898 年); 瓦治斯(Varges, W.):《德意志城市憲法的起源》,載《全國經濟和統計年鑑》,第 61 卷(1893 年),第 195 頁及以下; 斯蒂芬孫:《英國城市的起源》,載《美國歷史評論》,第 30 卷,第 10 頁。意大利(參閱第十七章《十字軍時期的意大利》的參考書)。

法國:

參考書目,見《劍橋中世紀史》,第 5 卷,第 906—908 頁; *巴特孫(Batenson, Mary):《布勒特厄(Breteuil)的法律》,載《英國歷史評論》,第 15 卷,第 73—78,302—318,496—523,754—757 頁,第 16 卷,第 92—110,332—345 頁; 盧察爾:《法國城市公社》(第 2 版,哈爾芬,1911 年); 杜烏:《若干法國城市公社》,載《美國歷史評論》,第 8 卷(1903 年),第 641—656 頁; 法拉岐(Flach, J.):《古代法國的起源》,第 2 卷; 法拉岐:《法國居住區的起源》,(1899 年)(關於農村公社); 得雷特:《法國城市公社》(1900 年); 吉利(Giry, A.):《盧

昂城的建立》，二卷(1883年)；吉利：《圣奥麦的市政制度》；勒法朗(Le Franc, A.)：《纳永城市史》。

法兰德斯：

比倫納：《比利时民主政治》〔散得茲(J. V. Saunders)的英譯本，曼彻斯特，1915年〕；比倫納：《比利时史》，第1卷；克宁汉：《入境的外人》；阿士力：《历史和經濟的概論》，第240頁及以下；布洛克(Blok, P.)：《尼德兰人民史》，第1卷，第7、14—15章，凡得·林登(Vander Linden, H.)：《卢芳城市宪法史》(1892年)；雷涅克(Reinecke, W.)：《喀姆布萊城市史》(1896年)；哈普克(Hapke, R.)：《布魯日发展为中世紀世界市場》(1908年)；萧布(Schaube, R.)：《1273年英国的羊毛出口》，載《社会經濟史季刊》，1908年。

德意志：

*黑格尔(Hegel, C.)：《德意志人民的城市和行会》，二卷(1891年)；*黑格尔：《德意志市政的起源》(1898年)；藍普勒赫：《德意志史》，第4卷，第211—252頁(部分譯文，見孟祿和塞勒利：《中世紀文明》，第358—365頁)；*西摩勒耳：《斯特拉斯堡的繁荣状态》(1875年)；*腓力比(Phillippi)：《威斯特发里亚主教城市的宪法史》(1894年)；皮洛：《德意志最早的市政制度》(1898年)；《德意志城市宪法的起源》(1892年)；索姆(Sohm, R.)：《德意志市政的起源》(1890年)；芬森(Vincent, J. W.)：《十二世紀的城市生活》，載《美国历史学会年报》(1898年)，第415頁。

行会和工业：

*厄柏斯塔特(Eberstadt, R.)：《行会制度的起源和中世紀早期手工业行会》(1900年)；*刻特根：《营业和行会》；*多倫(Doren, A.)：《对中世紀商人公会的研究》(1893年)；布亚索那德：《中世紀时代基督教欧洲的工艺》，第2、3卷；*伊文斯：《中世紀工业的管理問題》，載《政治科学季刊》(1921年)；克宁汉：《英国工商业史》，第1卷(利用索引)；圣雷翁(Saint-Leon, M.)：《手工业团体史》(第2版，1909年)；勒伐索(Levasseur, E.)：《工人階級史》，第1卷；瓦脫斯(Wauters, A.)：《教区行会》(1874年)；吉里：《圣奥麦的市政制度》(1877年)；格罗斯(Gross, C.)：《行会商人》(二卷，1890年)；薩尔士曼(Saizmann, L.)：《中世紀时代英国工业》(第2版，1923年)；累那德(Renard, Georges)：《中世紀时代行会》；密勒特：《十三世紀巴黎手工业行会》，載《历史、政治、經濟学报告》皇后大学，第17期(1915年)；狄克孙(Dixon, E.)：《手工业志里的手工业妇女》，載《經濟杂志》，第5卷(1895年)。

譯名对照表

(上册表內已見的譯名,不列入。)

三 画

干得斯亥謨	Gandersheim
干地亚	Gandia
勾蓝	Shoreham
士魯茲巴立	Shrewsbury
卫尔夫派	Guelf
飞厄索勒	Fiesole
女谷神	Ceres
才茨	Zeitz

四 画

巴得利	Badri
巴斯噶	Pascal
巴度	Badow
巴佐	Borzow
巴納塔	Barnuta
巴明	Barmin
巴塞洛繆	Bartholomew
巴佛勒	Barfleur
巴耳·緒·奥布	Bar sur Aube
巴息涅	Basigny
巴耳	Bar
巴尔第	Bardi
巴塔格里亚	Battaglia
巴本堡	Babenberg
巴多威克	Bardowick
巴叶	Bayeux
巴拉尔利	Barardi
巴撒	Baza
巴尔的摩	Baltimore

巴勒摩	Palermo
巴布威尔	Babwell
巴坡謨	Bapaume
厄尔士山脉	Erzgebirge
厄尔多拉多	El Dorado
厄尔丙	Elbing
厄波	Ebbo
厄波罗	Ebro
厄格勒西	Egresch
厄美力克	Emeric
厄斯特	Erst
厄赫勒本	Echleben
厄尔柏夫	Elboeuf
厄克塞特	Exeter
厄士里諾	Ezzelino
厄坦普	Etampes
厄甫勒	Evreau
厄帕內	Epernay
厄革	Eger
厄特納山	Mount Etna
夫垒德蒙	Froidmond
夫罗杜阿	Flodoard
夫勒美西謨	Fremersheim
夫勒斯科巴第	Frescobaldi
扎威拉	Zawilah
扎拉	Zara
扎卡利亚	Zaccaria
日内佛尔山	Mount Genevre
日德兰	Jutland
不拉奔	Brabant
內华达	Nevada

孔拉丁 Conradin
 木尔西亚 Murcia
 丰兴 Funsing
 文特巴赫 Wintirbach

五 画

切斯特 Chester
 布耳各斯 Burgos
 布里西亚 Brescia
 布腊 Blois
 布勒得厄 Breteuil
 布勒斯劳 Breslau
 布律肯 Brucken
 布罗温塞尔 Provençal
 布达佩斯 Buda Pesth
 布朗 Brown
 布林的西 Brindisi
 布文 Pouvines
 布吉亚 Bougia
 布雍 Bouillon
 布赫 Buch
 布亚罗 Boileau
 布伦尼都·拉提尼 Brunetto Latini
 布里萨克 Brissac
 布里斯多 Bristol
 布里 Brie
 布拉提斯拉夫 Bratislav
 布鲁那波尔 Brunabor
 布柯 Bukow
 布鲁希提 Bruschetti
 布拉克伦 Brakelonde
 布浪希 Blanche
 卡里尔 Carile
 卡次尼伦波根 Katzenellenbogen
 卡那华 Kanawha
 卡拉特·阿那佐 Calat Anazor
 卡卡逊 Carcassonne
 卡斯提里 Castelli

卡德西安派 Carthusians
 卡塔伦 Catalan
 卡雷 Calais
 卡塔里派 Catharist
 卡塔尔人 Catalans
 卡佩 Capet
 卡尔维利 Calverie
 卡尼鄂拉 Carniola
 弗赖辛 Freising
 弗赖斯达 Freistadt
 弗赖微涅 Flavigny
 弗利阿里 Friali
 圣伊维斯 St. Ives
 圣波托尔夫 St. Botolph
 圣马洛 St. Malo
 圣米雪尔 St. Michel
 圣得尼斯 St. Denis
 圣提兰 Santillan
 圣保罗 St. Paul
 圣勒米 St. Remy
 圣垦廷 St. Quentin
 圣柏訥 St. Benoit
 圣米内阿多 San Miniato
 圣布雷兴 St. Blasien
 圣提阿哥 San Tiago
 圣腾永 St. Aignan
 圣阿乌尔 St. Ayoul
 圣安布洛乔 San Ambrogio
 圣摩里左 San Maurizio
 圣勒穆 San Remo
 加斯科尼 Gascony
 加雅 Gaillard
 加拉达 Galata
 加伦坦 Carentan
 加奥尔 Cahors
 加厄大 Gaeta
 加塞尔 Cassel
 加西阿 Garcia

加尔达湖	Lago di Garda
加达尔几維	Guadalquivir
比士雷	Beazley
比哥洛提	Pegolotti
比力斯	Pilis
比卡	Bucca
比沙普斯堡	Bishopsburg
比伦革	Billunger
比薩	Pisa
比斯开	Biscayan
比伊苏	Puiseaux
尼德拉斯	Nideras
尼达洛斯	Nidaros
尼古拉	Nicholas
尼謨威根	Nimwegen
尼利次	Nelitz
尼奥尔	Niort
瓦格	Waag
瓦伦	Walloon
瓦連西亞	Valencia
瓦茲河	Oise
瓦格列	Wagri
瓦根	Vaagen
瓦洛涅	Valognes
古斯特劳	Gustrow
古汶	Guvien
兰杜尔福	Landolfo
兰普勒赫	Lamprecht
兰美尔斯堡	Rammelsberg
兰杜尔夫	Landulph
兰布罗	Lambro
本諾	Benno
本尼狄克柏伦	Benedictbeuren
皮尔·得·策勒	Pierre de la Celle
皮斯托雅	Pistoia
皮恩河	Peene
申喃多亚	Shenandoah
汉撒同盟	Hanseatic League

左留尔	Soleure
台斯	Theiss
卢察尔	Luchaire
卢奇塞	Lucchesi
卢芬	Louvain
卢佛尔	Louvre
史梯芬	Stephen
丙根	Bingen
立士	Lys
冉·敦格里	Jean d'Angely
宁祿	Nimrod
东涅尔	Tounerre
艾伯特	Albert

六 画

朴洛克	Pollock
亚尔美里亚	Almeria
亚摩拉維德	Almoravid
亚布·犹塞夫·耶庫布	Abu-Yusuf-Yakub
亚勒	Aller
亚丹	Adam
亚眠	Amiens
亚多亚	Artois
亚格得	Agde
亚馬厄斯	Amadeus
亚达	Adda
亚第达	Addetta
亚尔薩斯	Alsace
亚尔諾弗	Arnulf
亚罗斯特	Alost
亚克塞尔	Axel
亚丰斯·得·波亚疊	Alphonse de Poitiers
亚田·麦紐尔	Etienne Manduel
亚維拉	Avila
亚貝威勒	Abbeville
亚奇洛斐革	Agilofinger

亚諾尔	Arnold	安瑟伦	Anselm
亚塔尔	Arthur	安斯坦	Arnstein
亚德勒斯	Ardres	安斯	Anse
亚胡斯	Aarhus	安达露穆亚	Andalusia
亚尔比教派	Albigenseo	西門·得·巴尔第	Simon de Bardi
亚格·摩特	Aignes-Mortes	西門·得·蒙特福	Simon de Montfort
亚平敦	Abingdom		
亚克城	Acre	西摩勒	Schmoller
亚柏斯堡族	Ebersberger	西烏达·洛德里哥	Ciudad Rodrigo
亚格德尼斯	Agdeness	西格夫里	Siegfried
亚尔美里克	Almerick	西普塞	Zipser
亚尔加尔威	Algarve	西普斯	Zips
亚格兰	Aigrain	西薇士德	Sylvester
亚仁	Agen	西利西亚	Silesia
亚戛斯塔	Aosta	西兰	Zeeland
伊拉伯尼	Irapani	西敏寺	Westminster
伊尔杜布兰的尼	Ildobrandini	西波姆	Seebohm
伊撒克	Issac	发兰河	Valaine
伊西多	Isidore	发伦布洛薩	Vallombrosa
伊薩	Isar	发尔多教派	Waldensians
伊罗	Ilow	发特	Warthe
伊塞尔河	Yssel	瓜的牙納河	Guadiana
伊摩拉	Imola	瓜尔柏塔斯	Gualbertus
伊力穆安	Elysian	瓜达拉薇阿	Guadalavir
伊甫累阿	Ivrea	瓜达拉馬山脉	Guadarrama
伊斯伦庭斯	Islaendings	瓜尔夫勒第	Gualfredi
伊斯特发里亚	Eastphalia	吉拉尔达	Giraldus
安德魯	Andrew	吉拉尔德	Gerald
安吉利列·索拉斐卡	Angelier Solafica	吉洛	Gero
安妮	Anne	吉尔恩豪逊	Gelnhausen
安亨	Arnhem	吉拉德·奧力維	Gerard Oliver
安得那赫	Andernach	吉斯塔特	Gernstadt
安德勒	Andre	吉罗纳	Gerona
安极乐斯	Angelos	吉伦特	Gironde
安吉文	Angevin	米第亚	Mehdia
安德累雅斯	Andreas	米登	Metten
安兰	Andian	米拉	Mella
		米恩	Meung

米約	Millau
米雪尔	Michel
多特蒙德	Dortmund
多斯加納	Tuscany
多米尼克派	Dominicans
多宾	Dobbin
多柴姆	Doetchem
多尔頓	Dordogne
托利多	Toledo
托东那	Tortona
托托薩	Tortosa
伏尔肯罗得	Wolkenrode
伏赫尼茨	Wohnitz
色佛尔	Sèvre
色刻伽	Suttkerka
印那馬·斯特涅格	Inama Sternegg
印革尔柏	Ingelbert
乔吉亚	Georgia
乔伊維尔	Joinville
乔根塔尔	Georgenthal
休柏特	Hubert
优尔	Yull
亥斯脫巴赫	Heisterbach
亥力根克垒次	Heiligenkreuz
朱登堡	Judenburg
因尼河	Inn
考芬頓	Kauffington
孚尔培	Fulbert
芝尼亚	Zenia
华斯	Wace
扫桑普敦	Southampton
达干	Dargun
达福尼	Damieni
达維孙	Davison
达拉姆	Durham
达米那斯	Damianus
达克士	Dax
迈曾	Meitzen

迈尔	Mayer
伟恩	Vienne
伦卡里亚	Roncaglia
伦德	Lund
伦涅堡	Lüneburg

七 画

利欧波尔得	Leopold
利提哈逊	Riddigshausen
利邦加	Ribbungar
利多夫	Riethof
利西阿第	Ricciardi
利普斯大特	Lippstadt
利普多	Liptau
利凡革	Levanger
利坦尼	Litany
利林斐尔德	Lilienfeld
利堡	Libau
利伯	Ribe
沙托·第·罗亚尔	Chateau du Loire
沙拉堡族	Schalaburghausen
沙拉利	Solari
沙尼貝克	Scharnebeck
沙魯	Charroux
沙提永	Chatillon
克洛斯脫紐堡	Klosterneuburg
克伦尼派	Oluniacs
克魯多	Kruto
克勒比-恩-瓦罗亚	Crepv-en-Valoio
克力都	Cito
克伦地亚	Carinthia
克拉科	Cracow
克力斯兴	Christian
克力斯平	Crispin
克立斯坦尼亚	Christiania
克雷尔服	Clairvaux
克雷因	Clain
杜德拉	Tudela

杜平根	Tubingen
杜柏伦	Dobberan
杜易斯堡	Duisburg
杜孔日	Ducange
杜罗	Douro
杜厄	Douai
貝拉	Bela
貝郎	Belleme
貝云	Bayonne
貝梭加里阿	Berengaria
貝尼得多	Benedetto
貝藏松	Besançon
貝柏斯塔特	Beberstadt
貝列科西	Bellicozzi
貝拉度·馬基	Berardo Maggi
貝穆亚	Beziers
貝加摩	Bergamo
里伊	Rye
里維耶拉	Riviera
里瑟維那斯	Richervinus
里窩尼亚	Livonia
里曼	Le Mans
里摩日	Limoges
里加	Riga
里本	Ripen
里帕	Rippa
里士滿	Richmond
里奧尼	Leoni
麦地那·得·坎坡	Medina del Campo
麦特拉赫	Metlach
麦尔克	Melk
麦紐尔	Manuel
麦斯敏	Mesmin
麦特兰	Maitland
坎比杜尔首領	Old Campeador
坎托	Cantor
坎布梭息	Cambrensis
伯斯	Perth

伯訥斯特	Benoist
那慕尔	Namur
那瓦	Navarre
狄特馬士	Ditmarsch
狄奧尼索	Dionysius
狄克摩德	Dixmude
苏格提	Scotti
苏哲尔	Suger
苏尔德	Soord
苏薩山峽	Val di Suse
苏薩	Susa
呂貞堡	Lutjenburg
佐塞林	Jocelin
佐帕	Joppa
芬替里亚	Vintimiglia
芬宁	Funen
谷耳維尔	Gourville
亨萊	Henley
毕赫尔	Bucher
毕加第	Picardy
辰西厄斯	Cencius
伽魯斯	Gallus
条拉拉	Teulala
廷廷那諾	Tintinnano
劳英堡	Lauenburg
劳馬立克	Raumarike
劳狄栖亚	Laodicea
判普罗那	Pamplona
罕斯旁	Hundsborn
底河	Dee
庇里尼斯	Pyrenees

八 画

阿微納	Avenay
阿西栖	Assisi
阿克塞尔曼斯坦	Achselmannstein
阿尔台赫	Altaich
阿达尔貝倫	Adalberon

阿伦巴赫	Allenbach	阿伯哈特	Eberhard
阿勒散德里亚	Alessandria	阿岐尔	Archille
阿多英	Ardoin	阿瑟林	Ascelin
阿斯提	Asti	阿奎那	Aquinas
阿甫龙士	Avranches	阿尔夫立克	Aelfric
阿格涅	Agnes	阿替尼	Attigny
阿利根尼	Allegheny	阿波	Abbo
阿达尔伯特	Adalbert	阿那雅	Anaya
阿尔特曼	Altmann	阿尔伐	Alava
阿尔滕则尔	Altenzelle	阿尔坎达拉	Alcantara
阿尔伯特	Alpert	阿哥巴德	Agobord
阿伦逊	Alencon	阿德马尔	Adhemar
阿尔摩黑德	Almohad	阿杜尔河	Adour
阿耳凡索	Alfonso	阿堪姆波德	Archambaud
阿拉貢	Aragon	阿利尔德	Ariald
阿尔加布	Algarbe	阿柏拉德	Abelard
阿尔发·富尼士	Alvar Funez	阿卡	Arga
阿斯都里亚	Asturias	阿尔特那	Altena
阿苏夫	Arsuf	阿拉伯化的基督徒	Mozarabs
阿帕米亚	Apamea	法兰西琴路	Via Francigena
阿塞里	Amaury	法拉·薩冷本	Fra. Salimbene
阿米尔哥斯特威茨	Amelgostewitz	法兰西斯派	Franciscan
阿拉謨	Ahlum	法兰西島	Ile de France
阿堪	Acay	法馬古斯塔	Famagusta
阿味薩	Aversa	法兰西斯科·达庫沙	Francesco d'Accorso
阿貝第尼	Albertini	法兰曼哈逊	Frankenhausen
阿尔比西	Albizzi	法勒姆	Falem
阿的西奥尼	Ardiccioni	法林斯堡	Flensburg
阿奎勒里	Acquerelli	法拉多利	Valladolid
阿布的拉曼	Abd-er-Rahman	法克斯坦族	Falksteiner
阿布·撒加利亚	Abu Zacaria	法兰西根納	Francigena
阿尔-曼苏	Al-Mansur	波涅族	Bogner
阿登	Artern	波默森林	Bohmerwald
阿多夫	Adolph	波登罗得	Bodernrode
阿米伦斯旁	Amelongsborn	波森道夫	Borsendorf
阿布沙龙	Absalom	波塞諾立	Buonsignori
阿尔杜布兰得奇	Aldobrandeschi	波揆耳	Peaucaire
阿細乔利	Acciajuoli		

波尔斯拉夫	Boleslav	易宾·卡尔顿	Ibn Khaldun
波鲁克	Plock	易苏尔特	Isolde
波亚图	Poitou	易格劳	Iglau
波普罗	Beaupreau	拉姆塞	Ramsay
波拍林厄	Poperinghe	拉特	Rather
波弗雷	Beauvray	拉涅发德·查尔	Ragnvald Jarl
波堡	Bourbourg	拉尼·緒·瑪恩	Lagny sur Marne
波伦亚	Bologna	拉古薩	Ragusa
波米达	Bormida	拉·雷奥尔	La Reole
波那	Bona	拉美斯霍姆	Ramesholm
波提尔	Baudier	拉·斐得·緒·奥	La-Ferte-sur-
波柏	Poper	布	Aube
波森	Posen	拉策堡	Ratzeburg
波瓦錫	Poissy	拉特蓝	Lateran
波基洛特	Bourquelot	拉第斯劳	Ladislaus
波哥	Borgo	拉·罗瑟尔	La Rochelle
罗斯托克	Rostock	拉希达尔	Rashdall
罗斯基尔德	Roskilde	佛利德堡	Friedburg
罗道福	Ludolf	佛利犹	Frejus
罗基亚·摩薩运河	Roggia Muzza canal	佛亚	Foix
罗基奥	Roggio	佛斯布林	Veszprem
罗薩勒本	Rosaleben	佛开亚	Phokaia
罗登堡	Rothenburg	帕塔立尼	Patarini
罗比特	Lobith	帕得波綸	Paderborn
罗道福·馮·苏刻	Ludolph von Su- chem	帕拉泰因	Palatine
罗柏斯吞	Robertstone	帕波	Pabo
罗德斯	Rodez	帕苏	Passau
罗恩格麟	Lohengrin	帕喜謨	Parchim
罗地	Lodi	佩里革	Perigueux
罗特	Lot	佩伦	Peronne
罗耳士	Lorsch	佩拉	Pera
罗格罗諾	Logrono	佩魯齐	Peruzzi
罗里斯	Lorris	林茲	Linz
羅馬納省	Romagna	林尼	Lynn
易宾·瑪达涅岐	Ibn-Mardanich	林伯的尼	Rimbertini
易宾·罗永	Ibn Loyon	林台謨	Remtheim
		图耳圣扎克	Tour St. Jacques
		图魯特	Thourout

图棱	Touraine
图納	Turner
英諾森	Innocent
英基兰·得·庫栖	Enguerrand de Coucy
服庭堡	Vordingborg
服林	Wollin
拍克涅格人	Pechenegs
彼得拉斯·得·提力科	Petrus de Teri o
坡恩河	Poene
岡功	Guingamp
欣麦尔斯福特	Himmelspforte
帖克塞耳	Texel
直特芬	Zutphen
参孙	Samson
明韶	Mincio
坦克姆	Tanchelm
孟都亚	Mantua
宝承	Bautzen
金斯林	King's Lynn
松利斯	Senlis
阜姆	Fiumo
陆力亚	Loria
耶姆特兰	Jemteland

九 画

卑尔根	Bergen
約納斯	Jonas
約阿喜謨教派	Joachimists
約翰逊	Johnson
約內河	Yonne
約瑟	Joseph
約尼	Jeanne
哈罗德	Harold
哈尔德拉德	Haardraade
哈德比	Haddeby
哈布斯堡	Habsburg

哈伯斯塔特	Halberstadt
哈尔斯塔	Hallstadt
哈斐尔	Havel
哈斯金斯	Haskins
哈康	Haakon
哈特普尔	Hartlepool
哈得孙	Hudson
科德柏克	Caudebec
科瓦辽夫斯基	Kovalevsky
科通儒	Cotentin
科美里	Cormeliae
科維	Corvey
科默利	Cormery
科柏利奥	Coparion
科蓝那·得·康德	Coruna del Conde
科罗曼	Koloman
科比尔	Corbeil
科琉麦拉	Columella
科比	Corbie
科尼汪	Conuoion
科文	Corwin
柏尼根	Bernigen
柏克斯太尔	Burchstall
柏諾	Berno
柏特蓝	Bertram
柏納	Bernay
柏卡	Birka
柏刻特	Becket
威士劳	Wizlaw
威海謨	Weinheim
威利巴尔德	Wilibald
威斯馬	Wismar
威森堡	Weissenburg
威塞尔	Weser
威廉	William
昆斯多克矿脉	Comstock Lode
昆波斯特拉	Compostella
昆布兰	Cumberland

昆尼諾斯	Comnenos
革因穆	Guernsey
革默	Germer
革特魯德	Gertrude
洛昆	Lokkum
洛澤斯	Rogers
洛德里谷	Rodrigo
珀皮尼安	Perpignan
勃兰登堡	Brandenburg
迦尔登哈逊	Kaldenhausen
卑尔根	Bergen
美多克	Medoc
美里	Meri
耶基多克	Languedoc
带尔河	Dyle
柯尔秋契	Colechurch
冒必逊	Maubuisson
屋大維安	Octavian
柳文斯基	Lewinski
弥列	Millet
查理斯敦	Charlestown
查塞兰	Jusserand
刻兹	Kerz
刻特根	Keutgen
俄亥俄	Ohio
垦塔启	Kentucky

十 画

茨維特爾	Zwettl
茨維发尔登	Zwifalten
茨温提波尔得	Zwentibold
納里	Neri
納澤拉	Najera
馬卓維亞	Mazovia
馬格努孙	Magnusson
馬利尼拉斯	Marinellus
馬歇爾	Marshal
馬葛利特	Marguerite

馬都湖	Madu See
馬息罗得	Mascherode
馬薩爾	Marsal
馬克息明	Maximin
馬斯特立喜	Maestricht
馬立賴	Marillais
馬洛斯	Maros
馬薩拉	Mazzara
馬拿西	Manasseh
馬替尔达	Matilda
馬科尔第	Marcoaldi
馬里威德	Marienwerder
馬那塞斯	Manasses
格陵維爾	Granville
格尼蓀	Gnesen
格来福森林	Greifswald
格拉齐	Graz
格累西安	Gratian
格洛塞特斯特	Grosseteste
格麟武德	Greenwood
格林斯比	Grimsby
格里馬	Crema
格勒諾布尔	Grenoble
格龙梦特	Grandmont
格拉巴	Graba
格拉那达	Granada
格丁根	Gottingen
格列高里	Gregory
格伦	Guerin
格柏特	Gerbert
格伏登	Gevaudan
格尔德	Guelders
格罗内河	Garonne
格拉勃	Glaber
特拉巴尼	Trapani
特拉尼	Trani
特啦	Troyes
特魯杜	Trudo

特棱特	Trent	哥德多尔	Cote d'Or
特勒基尔	Treguier	哥斯巴赫	Gorsbach
特力格維森	Trygversen	紐喀斯尔	Newcastle
特里次密斯	Trithemius	紐斯	Neuss
特累維索	Treviso	紐恩坎奔	Neuencampen
特利斯坦	Tristan	紐斯达	Neustadt
特伦肯	Tlemcen	恩斯	Enns
特洛斯里	Trosly	恩斯佛利德	Ensfrid
特伦卡維尔	Trencavel	恩米兰	Emmeran
特根西	Tegernsee	恩布伦	Embrun
庫斯	Koos	涅旁	Nerbone
庫騰堡	Kuttenberg	涅策	Netze
庫斯特林	Kustrin	涅卡	Neckar
庫坦斯	Contances	高弗梨	Godfrey
庫普兰	Cocpland	高德利	Gaudri
庫栖·勒·沙托	Coucy-le-Chateau	夏龙·緒·梭恩	Chalon-sur-Saone
庫尔頓	Couiton	索睦耳	Saumur
庫尼根德	Kunigunde	索尔茲巴立	Salisbury
庫第	Coutie	索本兰	Sorbenland
庫耳特累	Caurtraï	索斯特	Soest
庫尔	Kyrre	索尔	Thore
庫曼人	Kumans	索恩	Thorn
爱德立塞	Edrisi	翁布隆	Ombrone
爱尔薩	Elsa	翁提布	Antibes
爱斯坦	Eystein	息牟德	Sigurd
爱尔登	Elden	息德	Cid
爱蒙	Aimon	酒神	Bacchus
爱因柏克	Einbeck	埃培勒克	Eperlecques
爱尔福特	Erfurt	桑科	Sancho
爱乐华	Eloi	宰登斯得敦	Seitenstetten
烏耳赫尔	Urgel	翁热	Angers
烏尔立喜	Ulrich	盎古伦	Angoulême
烏斯特比克	Oosterbeek	喜尔达	Hilda
烏斯特河	Oust	契斯威尔	Chiswell
烏巴尔第尼人	Ubalдини	留埃斯	Lewes
哥尼斯堡	Konigsberg	剛吉赫尔	Kongehelle
哥騰堡	Gothenburg	哲那普	Genappe
哥斯拉尔	Gos'ar	哲佛	Gervais

十一画

萊塔	Leitha
琉巴斯	Leubus
琉帕斯	Lupus
琉特波德	Liutpold
琉泰	Leutard
基姆卑尔	Quimperle
基安斐格利西	Gianfigliuzzi
基洛提厄尔	Guillotiere
基斯卡	Guiscard
基斯兰	Ghislain
基浦司科阿	Guipuzcoa
基阿拉瓦尔	Ohiaravalle
基柏林派	Ghibelline
基布哈德	Gebhard
基尔	Kiel
基恩	Guienne
基斯納	Guisnes
第奥米狄提	Deomidiedi
第厄普	Dieppe
第戎	Dijon
第斯特	Diest
第特立喜	Dietrich
第南特	Dinant
第尼尔	Daenell
累根	Regen
累吉諾	Regino
累蒙·貝伦伽	Ramon Berenger
累士茲	Razes
康判尔第諾	Campaldino
康奇斯	Conchis
康华尔	Cornwall
康边	Compiègne
曼夫勒德	Manfred
曼茲柏立	Malmesbury
曼斯巴赫	Mensbach
勒斯特	Leicester

勒謨堡	Lemberg
勒梨达	Lerida
勒内	Rennes
勒赫斐尔德	Lechfeld
勒克	Leck
都納	Duna
都納孟德	Dunamunde
都鐸	Tudor
俾阿特立斯	Beatrice
俾安日	Bierge
俾安岐	Bianch
密勒	Miller
密士失必	Mississippi
梵得京特尔	Vanderkindere
培托·得·帕查斯	Puerto de Pajares
培龙	Peronne
通斯堡	Tonsberg
理查	Richard
紹图	Schaudau
菲力克斯·法布里	Felix Fabri
許威林	Schwerin
海魯普	Haingrupe
哀薩尔服	Gonsalvo
得利尔	Delisle
郭刻桑	Quarquessone
盖薩	Geisa
設特兰	Shetland

十二画

斯坦尔馬克	Steiermark
斯馬拉格达斯	Smaragdus
斯瓦松	Soisson
斯卡諾尔	Skantor
斯卡巴洛	Scarborough
斯汾	Sven
斯加基拉克	Skaggerak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斯塔得	Stade

斯特拉尔松得	Stralsund	塔巴卡	Tabarca
斯塞尔	Schesel	塔和河	Tagus
斯塔凡革	Stavanger	塔特拉	Tatra
斯騰基佛	Stenkiver	塔拉哥納	Tarragona
斯干的那維亞	Scandinavia	塔尔海謨	Thalheim
斯干尼亚	Scania	喀西諾·斯卡那西	Cascino Scanasio
斯退普尔吞	Stapleton	奧	
斯匹格里提	Spigliati	喀拉特勒瓦	Calatrava
斯达伏伦	Stavoren	喀拉布里亞	Calabria
斯拜尔	Speyer	喀姆布萊	Cambrai
斯塔勒	Stara	喀尔巴阡山	Carpathians
斯坦福	Stamford	喀因	Caen
斯維多波克	Swietopolk	腓力·奥古斯都	Philip Augustus
斯达拉卡德	Staragard	腓力伯特	Philibert
斯騰达尔	Stendhal	腓特烈斯塔德	Frederickstadt
斯普果	Sprea	腓力匹	Filippi
斯图尔桥	Stourbridge	喜苏尔	Hirsauer
斯德廷革	Stedinger	喜尔得布兰	Hildebrandine
斯尼格魯-哈勒	Sneglu-Halle	喜苏	Hirsau
普洛	Plan	斐拉腊	Ferrara
普隆河	Pione	斐沙	Fischa
普福塔	Pforta	斐拉力契	Fellarich
普勒丁	Pretin	鄂列伦	Oleron
普罗文斯	Provins	鄂多	Odo
普魯士	Prussia	鄂托卡尔	Ottokar
普勒斯堡	Pressburg	提波特	Thibaut
普雷恩-普来斯坦族	Plaaien-Pleiste- iner	提尔	Tiel
普麟斯·乔治	Prince George	提斯諾	Ticino
普利謨堡	Priemberg	閔登	Munden
普卢斯卡特	Plouescat	閔斯德	Munster
普魯茨	Prutz	黑德馬堡	Hedenmarken
普里比斯拉夫	Pribislav	黑累斯	Xerez
普魯姆	Prum	凱撒威茨	Kaiserwerth
普勒孟斯特派	Premonstraten- sians	凱撒利厄	Caesarius
塔那洛河	Tanaro	散得維德	Sandwich
塔拉斯空	Tarascon	庫农	Chinon
		筏侖西恩	Valenciennes
		馮·柏洛	Von Below

蒂伦	Tiron
須德海	Zuyder Zee
葛拉德士吞柏立	Gladstonbury
梅格棱堡	Mecklenburg
堪明	Kammin
舒尔特	Schulte
腊伯	Raab
彭霍維德	Bornhoeved
彭托尔孙	Pontorson
彭替安	Ponthien
費堡	Faaborg
費諾格拉道夫	Vinogradoff
隆第特	Lendit

十三画

奥斯那布律克	Csnabrück
奥西尼	Orsini
奥狄洛	Odilo
奥波德人	Obodrites
奥罗夫	Olof
奥拉夫	Olaf
奥斯陆	Oslo
奥得立克	Orderic
奥维亚多	Oviedo
奥微尔那	Ovierna
奥卡	Oca
奥坡托	Oporto
奥尔康	Orcon
奥尔巴	Orba
奥尔德斯洛	Oldesloe
奥德斯罗得	Odesrode
奥第洛	Odilo
奥得立克·維退力	Ordericus Vitalis
斯	
奥里腊克	Aurillac
奥尔得威坎	Alderwicam
奥基斯	Orchies

奥平·頓热	Aubin d'angers
奥斯特拉西亚	Austrasia
奥克尔	Ocker
奥伦	Oran
奥尼斯	Aunis
奥尔登坎朋	Altenkampen
奥德牟桥	Pent-Audemur
奥登	Audun
奥舍耳	Auxerre
奥尔堡	Aalborg
奥本海	Oppenheim
奥登瓦尔得	Odenwald
塞哥維亚	Segovia
塞勒斯泰因	Celestine
塞肢	Secchia
塞尔奇	Cerchi
塞伏夫	Saewulf
塞西帕尼	Circipani
塞尔比	Selby
塞尔維亚	Servia
塞芬	Cevennes
塞比尔維达	Sepulveda
塞厄	Sée
蒙馬特耳	Montmartre
蒙蒂伦·德尔	Montieren-Der
蒙托班	Montauban
蒙雷里	Montlhery
蒙馬丁·緒·米尔	Montmartin-sur-Mer
蒙德里馬	Montelimar
蒙特	Mantes
蒙特納特	Montcornet
蒙特柏提	Monteperti
蒙利尔	Monreale
微特波	Viterbo
微司开雅	Vizcaya
微馬雷	Vimarais
微克	Vick

微拉尼	Villani	赫力南	Helinand
微塔比亚	Vettabia	窩尔特·馬普	Walter Map
微拉赫	Villach	窩尔堡	Walburge
微达尔	Vidal	窩尔特	Walter
微勒諾斯	Villenoce	窩姆斯	Worms
溫德尔哈逊	Windelhausen	窩赫孙塞治	Wachszinsige
溫提族	Venti	窩尔肯立德	Walkenried
溫斯特魯	Unstrut	窩得馬尔	Waldemar
溫彻斯特	Winchester	瑪基伦	Maguelonne
雷德尔	Ladre	瑪拉加	Malaga
雷扎尔	Lazare	瑪第亚	Mahdia
雷門	Raymond	瑪約喀	Majorca
瑟力	Shirley	瑪恩	Marne
瑟宁	Schonen	福尔斯特博	Falsterbo
新堡	Newburgh	福赫海謨	Forchheim
鉄特馬尔	Thietmar	福尔沙·坡提納里	Folso Portinari
楞雅諾	Legnano	福祿門	Freeman
路德斯村	Rudersdorf	維特里	Vitry
路德福	Rudolph	維肯	Viken

十四画

魁因卡	Guenca	維哥尔	Vigor
赫波德斯	Herbordus	維晉薩	Vicenza
赫尔姆	Helme	維登	Werden
赫尔米利特	Helmerieth	維蒙答	Vermandois
赫尔曼	Hermann	維涅尔	Venere
赫尔曼斯塔	Hermannstadt	維涅基罗得	Wernigerode
赫尔德克尼	Heradcany	維格尔	Verger
赫微力安人	Hevellians	維支特	Vecht
赫尔摩德	Helmold	維开奥	Vecchio
赫奇道夫	Hecherdorf	維茲雷	Vezeley
赫布里底	Hebrides	維斯比	Wisby
赫米里提	Humiliati	維塞拉德	Vysehrad
赫尔	Hull	維吉尼亚	Virginia
		維斯杜拉	Vistula
		維也納森林	Wienerwald
		蓬他茲	Pontoise

滿佛里多尼亚	Manfredonia
謬登	Meuthen
瑯城	Laon
裴德福	Bedford
豪特維尔	Hauteville

十五画

摩德拿	Modena
摩坦	Mortain
摩力蒙	Morimond
摩拉維亞	Moravia
摩納哥	Monaco
摩那尔第	Mona'di
摩薩	Muzza
摩立尼	Morigny
摩里內斯	Malines
摩豪克	Mohawk
摩城	Meaux
摩耳道	Mo'dau
摩利尔	Molieres
魯佛斯	Rufus
魯伊	Roye
魯米林根	Rumel'ingen
魯芬斯坦	Rufenstein
魯尔	Rhur
魯根	Rugen
諾德豪森	Nordhausen
諾里	Noli
諾达尔宾吉亞	Nordalbingia
諾柏特	Norbert
諾瓦拉	Novara
諾伐勒西	Nova'lese
諾定罕	Nottingham
諾伦多夫	Nollendorf

德的摩爾	Detmold
德雷斯登	Dresden
德隆亥姆	Drontheim
德提	Dedi
德微茲	Devizes
德根	Thegan
德勒	Dreux
德达尔第	Tedaldi
德比	Derby
德兰斯瓦尼亞	Transylvania
撒加利	Zachary
撒母耳·哈·勒維	Samuel ha Levi
撒列諾	Salerno
撒尔微密尼	Salvemini
賴赫瑙	Reichenau
賴賓哈尔	Reichenhall
賴帕斯堡	Reipersberg
緬因	Maine
墨西拿	Messina
嘿武德	Heywood

十六画

鮑尔文	Ealdwin
鮑威克	Powicke
霍耳斯頓	Ho'stein
澤拉斯	Geras
澤霍	Gerhoh
澤利昂	Gereon
澤尔	Zell
穆尔得	Mulde
默麦尔	Memel

十七画

薩摩斯	Samos
-----	-------

薩哲	Suger
薩維宜	Savigny
薩克遜堡	Sachsenburg
薩爾維安	Salvian
薩羅尼卡	Salonika
薩特	Sarthe
薩爾佐赫	Zaizoch
薩紐多	Sanudo
薩拉哥撒	Saragossa
薩普斯堡	Sarpsburg
薩窩那	Savona

薩爾斯巴赫族	Sulzbacher
薩爾斯威德爾	Salzwedel
薩盧達	Saluda

十九画

贊木納	Jumna
-----	-------

二十一画

露西	Rocci
----	-------